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HISTORICAL TRUTH & COLLECTIVE MEMORIES

宋永毅 主編
Yongyi Song
Editor-in-Chief

上 冊 (Part 1)

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HISTORICAL TRUTH & COLLECTIVE MEMORIES

宋永毅 主編
Yongyi Song
Editor-in-Chief



下冊 (Part 2)

文化大革命

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宋永毅　主编

2007年出版

香港田园书屋

目录

附录

前言

宋永毅

今年（2006 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发动的四十周年。

由美国 21 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及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合办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 40 周年国际研讨会」，于 2006 年 5 月 12 日至 14 日在纽约举行。60 多名海内外文革研究学者济济一堂，探讨文革历史真相、爆发原因、它在中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及其深远影响。这次研讨会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台湾民主基金会和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的资助和国际驰名的数十家中英文媒体的广泛而持续报导。如同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FRENCE NTERNATIONAL）和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的《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所一致赞誉的：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文革国际研讨会。

在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之际 （1996 年），美国 21 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也开过一个国际研讨会， 并出版了五十余万字的会议论文集《红色革命和黑色造反》（杨建利主编，美国 21 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1998 年）。那次会议和那本论文集都为晚近的文革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而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一百万字、提名为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的论文集，则是十年前会议的延续和这次新的国际研讨会的成果结晶。当然，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近十年来的文革研究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本书也收集了一些会议外的海内外学者的论文。 就“新发展和新成果”， 我以为这次会议独特的象征意义和何这些论文的深度广度；它们表现出来的挑战性、建设性和当代性；它们对于重构对文革的集体记忆的战略性的呼吁；尤其是海内外华人学者对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深入理解，都不仅会对文革作为一种历史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 还必然对中华民族汲取历史教训，推动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发生影响。

独特的象征意义和罕见的深度广度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共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化、反人道的人间惨剧。这场浩劫不仅残酷地清洗了被毛认为是他的党内对手的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的高级干部，更在所谓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和“破四旧”等等的名义下，杀戮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民众，毁坏了遍及全国的文明古迹，使中国的经济陷入濒临崩溃的泥沼，使一个文明古国的教育、文化、道德都毁于一旦。 它不仅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是一场浩劫，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无疑是一场只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法西斯纳粹党徒发动的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才可以比拟的人道灾难。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的肇事者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伟大

领袖”毛泽东，为此，中共当局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年内， 一直在大陆禁止独立的文革研究。设法使中国民众遗忘文革，忘却历史的创痛。今年，中共有关部门非但在中国大陆严禁对文革的任何纪念和研究活动，还千方百计阻止海外的文革纪念活动。这次国际研讨会本来邀请了近二十名中国大陆的学者与会，但是中共的有关部门以“海外敌对势力介入”的荒唐理由阻拦了多名著名学者与会，。但是，仍然有多名中国大陆学者冲破封锁，勇敢地与会。不能与会的大陆学者也大都递交了他们的书面发言。中共有关部门的倒行逆施甚至引起了海外中间势力的极大反感。香港亲中的大报《明报》5 月 14 日就在头版头条以<北京禁纪念文革爆发 40 周年：劝阻学者赴国际研讨会>为题，指责中共当局的做法“不利于全民反思文革”。

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 中共有关部门禁止文革研究，掩盖历史真相的目的正是为了延续它的专制统治。中共有关部门煞费苦心的拦阻和会议的成功召开反而使这次研讨会有了独特的意义：它是中华民族不泯良知的一次体现；它象征着海内外知识分子对学术自由的有力坚持；它还是国际民主力量对专制势力的一次成功打击。

就这次国际研讨会的规模而言，也是自文革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中国大陆、台湾及澳门的 60 多名文革研究学者提交了 51 篇论文和安排了 62 次中英文演讲。 台湾方面也有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教授与会，说明会议确实学术精英云集。会议 5 月 13 日和 14 日在纽约皇后区图书馆演讲大厅举行的公开演讲，吸引了近 400 名听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FRENCE NTERNATIONAL）；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多维时报》等；北美最大的新闻网站《多维网》、《大纪元》和《博讯网》等几十家网站都发表了追踪报导。其中北美最老牌的《世界日报》 竟一连发表了 10 篇头条新闻和长篇报导文章。不少会议的报导已经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目前，美国之音、BBC 和香港的《信报》、《动向》等报刊还在发表对会议的长篇评述文章。 一次国际研讨会在国际媒体中引发如此长久持续的报导，也确实是少见的。

就会议讨论的课题而言，也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文革和世界”、“文革中的少数民族，宗教等问题”、“文革研究中引起争议的一些问题 — 造反派、林彪问题等等”、“文革研究的史料学”、“被扭曲了的文革记忆”等等，都是文革研究中从未或很少涉猎的领域。

文革研究的新阶段：挑战性、建设性和当代性

这一国际研讨会和他所发表的论文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国际媒体的报导和宣传，而是在于它们所肩负着多重使命和对“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贡献。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FRENCE NTERNATIONAL）在报导这次会议时指出：它代表了海内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 这不是一个言过其实的赞词。

在我看来，会议的主要成功还是在于它的挑战性、建设性和当代性。

其一，“挑战性”是指会议揭露了许多被中共当局长期掩盖的历史真相，驳斥了中共官方的文革理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动摇中共当局的合法性。例如，长期以来，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协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叶剑英都被认为是文革的单纯受害者和抵制者。 但是会议的论文有力地揭示了：文革后中共官方有意地夸大了他们和毛的分歧，掩盖了他们其实也是文革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的真相。美国明州诺曼底学院教授丁抒在他的论文<叶剑英在文革初期>以翔实的例证说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积极参与了整到罗瑞卿、推崇对毛的个人迷信、建立“首都工作组”镇压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和迫害不同派系的军队干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因此，叶决不是一个“反文革派”而是一个地道的“文革派”。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的论文<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你不知道的故事>则从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中的极左理论和实践，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对成千上百万干部和群众的无情迫害等历史真相中揭露：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革作出他们各自的贡献。颇具讽刺的是，其中要数文革最大的殉难者之一刘少奇的贡献最大。事实上，文革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所为，刘少奇等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中共高层重要领导人都是有份的，他们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因而，文革是中共的一次集体犯罪。

对于文革和中共上层斗争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澳洲莫纳希大学教授孙万国的演讲和论文<文革尾声天安门事件再探---毛泽东晚年的中国精英政治危机应对>。孙万国教授在他的论文通过翔实的考证和细致地分析揭示：“很难说天安门危机是出于‘四人帮’明确的反周战略所造成的结果。虽说“四人帮”急于批邓，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视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这当然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已故总理的不满和他对追悼活动的压制，决定了天安门事件的大气候。”他的论文还进一步认为：“通过天安门危机事件和研究，乃至于从林彪事件之后整个高层政治的动态来看，“四人帮”这个概念或提法，显然难以成立。王、张、江、姚四人，原本只是中共体制中的边缘人物，但由于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提拔，先后攀上了权力的高峰，进入了政治局。四人之间，在核心的共同利益与激进的意识形态方面，诚然有其相通之处。然而，有关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恶、从未间断的猜疑，和各种鸡毛蒜皮的摩擦，也存在着大量的证据。甚至在毛泽东西归的当月，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守护神之后，还能见到这类现象。论者都说四人合谋串通，意图夺权抢班。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进行，也没有弄出一套协同合作、周密无间的政治行动方案。”

对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会议也有完全不同于中共官方结论的真相揭露。如大陆徐海亮教授的论文<武汉“720 事件” -- 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就揭示了 1967 年 7 月发生在武汉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冲击毛泽东住所的“武汉事件”其实是毛泽东、周恩来处理不当而引发的一场“兵变”。而毛事后为了稳定军队抛出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替罪羊。

其二，“建设性”是指会议提供了多重的研究文革和当代中国历史的崭新角度，

从而把海内外的文革和当代中国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革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著名西藏女作家唯色的书面论文<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 年尼木、边坝事件> 和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的论文<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读对西藏、内蒙地区的文革有全新的描述。例如，程惕洁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比较了民间、中共官方和半官方的内蒙学界关于文革中血腥的“内人党事件”的受害者的人数：1）逮捕关押了 80 万人，多达 50 万人致残，5 万人被拷打迫害致死；2）34 万 6 千多人受到关押迫害，1 万 2 千 2 百 22 人被迫害致死。另有 8 万 7 千 180 多人致残；3）2 万 7 千 900 余人被迫害致死，有 12 万多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总数，相信应该在 50 万人以上。程惕洁认为：第三种数字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但当时整个内蒙的“蒙族人口总数才两百多万，即使这个中间数字，已经占到蒙族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迫害比例之高，在全国是罕见的”。

再如，把文革放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世界左翼思潮和整个国际共运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是这次会议的又一个特色。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郭建的<文革、世界六十年代及西方文化理论>，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的<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既讨论了文革发生的成因及其机制以及文革对世界和当今中国的影响。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在他的题为<中苏文革比较>一文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非毛泽东在中国的首创，而恰恰相反，是毛泽东从苏联类似运动中吸取灵感模仿而来。此一论点引起了会议的热烈讨论，尽管不少意见认为，文革从持续时间，运动的规模，群众动员之广泛等方面来看，并非苏联 1928 到 1931 年的“文化革命”运动可比，但此论点引出了“文革”是否共产极权制度下必然发生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

还值得一提的有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苏杨对文革中农村大屠杀的数学模式型的研究（见本书中<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一文）。他和他的斯坦福大学导师魏昂德（ANDREW WALDER）一起运用官方县志中的死亡人数研究文革，比较湖北、广西、广东三省文革中的大屠杀，以地方志所记载的屠杀数字翔实地证明中国文革曾严重侵入农村，颠覆了认为文革仅仅发生在城市的一般成见，同时也雄辩地表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和官方各级政府的操纵乃是暴力发生的主要原因。

最后，这次国际研讨会有着它鲜明的当代性。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改变了中国大陆整个的政治经济面貌。从经济层面上来说，如果没有文革后濒临崩溃的经济，邓小平等人也不会搞改革开放。 从政治结构上来看，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已几乎全是文革中的“红卫兵一代”，文化大革命在他们身上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政治烙印。然而，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对于胡锦涛等人的文革经历对于他们执政思想方针的影响，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学界，都还没有过系统扎实的研究。这次会议中宾州萨斯奎汉纳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魏楚雄教授的论文<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做了可贵的尝试。他认为：毛时代刚结束后的权力斗争也造成了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快速崛起，而“太子党”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丑恶表现“为提升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官员铺平了道路。”他的论文重点分析了文革对胡锦涛的影响， 认为：胡在文革中是清华大学的“四一四” 派，“这一事实表明，到了文革期间，胡锦涛的政治思想和风格已基本形成：他是追随刘少奇和邓小平路线的典型的技术官僚他任期内的“改革”政策

恐怕就是努力恢复到共产党的十七年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的施政纲领发挥到它的极致效应而已，绝不会超越这个限度。”从而，他从一个侧面批判了中共当前的领导层向文革和文革前倒退的种种理论政策。

海内外学者共同重构对文革的集体记忆

因为中国官方的蓄意阻扰和误导，长期以来历史真相被掩盖，中华民族对于这场灾难的集体记忆当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文革已经结束了三十年了，但是中国大陆的“毛泽东热”一直经久不衰，而不少年轻人已经全然没有了文革记忆，甚至连“文革”发生在那一年都不清楚所有这些“失忆现象”都绝对是有害于整个民族吸取文革教训和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的。这次会议还集中表现了海内外学者共同重构对文革的集体记忆的努力和把反思文革是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任务呼吁。关于中国国内的所谓“毛泽东热”，本书中的两篇论文就有精辟的分析。

美国《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的论文<文革后三十年的大陆毛泽东热分析>就着重分析了“毛热的兴起，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却是被官方诱发的”的过程。北京学者陈小雅的论文<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 ——“毛泽东热”透视>则从历史的长河中涉足 指出:“（一）延安时期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其目的是打出中共的“品牌”人物;（二）建国初期的毛热，可以分为民间和中共高层两个层次，民间的毛热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活动；在高层，却存在明显的“赎买”动机;（三）文革的毛热，是毛泽东由“品牌人”走向“神”的过程，究其内在发动原因来说，既有毛泽东及其同党的阴谋元素，也有党群矛盾及社会压抑的借题发挥;（四）最近这波发自民间的毛热，表达的是位于社会下层的人民大众对于现实的喜怒哀乐”。对于大陆目前仍然存在的毛泽东幽灵不散的现象 ，她认为:“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仍将是艰苦而漫长的，战线是广大而层次是复杂的。因为它有赖于我们——每个从毛泽时代过来或受其影响的人的彻底“去毛化”——从理念到思想，从思维定势到行为方式，从语言到手段的彻底“脱毛”过程”。

有关文革记忆，加州圣玛丽亚大学教授徐贲的论文<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解读三种文革记忆>是一篇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理论探索之作。他成功地运用了西方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把目前的文革记忆分为“虚拟博物馆的文革记忆”，“说故事的文革记忆”和“消遣娱乐和商业化的文革怀旧记忆”三种。直面流行的商业化的文革记忆，他不无担忧地指出：“从政治、社会和人性的灾难性去认识文革，只有在自由社会的公共政治空间中才有可能。人们需要有开放的讨论、研究、不受权力限制的历史教育、博物馆、公共论坛和各种反思、纪念形式。唯有如此，自由的文革讨论才能有制度的保证条件。在自由公共空间中被展现的军用皮带将不再是文物市场上的有价商品或者历史清白的纪念品，而是一件残害过活生生受难者的凶器。那些品类繁多的“毛头象”也不是什么制作精美的工艺品，而是千千万万副套在人们身上的思想枷锁。”他的另外一篇论文<怀旧物品和文革记忆> 也指出：“物品对于记录历史有重要的作用,但历史并不全然记录在物品之上文革的真正意义并不记录在那个由革命图记所描绘的光明和谐图景之中,在这个光明和谐的表面之下,深藏着苦难、残暴、恐惧和压迫。不涉及这个层次,关于文革的公共意识定然不会完整。”

在会议的举行过程中，大陆社科院教授徐友渔传真来了大陆学者不久前举行的一个地下文革讨论会的简报， 并由那次讨论会的参加者之一的徐海亮教授宣读。这是一个不被官方认可的「地下」研讨会，但反映了民心所在--大陆人民不会忘记文革。那次会议的最后一个单元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关系。与会者认为首先要注意的是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40 年过去了，当年 10 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 50 多岁；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 80、90 岁，再不抢救，历史就要被带进棺材。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邢晓群在她给纽约研讨会的论文<口述史与文革研究>中提出："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 40 周年。由于官方以行政权力设阻——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出版物受限制，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大陆步履维艰。出于历史的使命感，民间的独立学者对于文革，仍然坚持抢救性的学术研究。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就成为目前条件下，推动文革研究继续深入的一条可行之路。"

在这一方面，大陆学者朱建国的论文"大陆文革博物馆萌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也有其独到的见解。针对一些学者积极呼吁官方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努力，朱建国认为，正如官方目前广泛举办的反腐败展览一样，文革悲剧的重演将不会因为官办博物馆而避免。他因此大力提倡民办博物馆，提倡民间独立深入地反省文革灾难及其后果。另外，他还对巴金的文革博物馆模式提出了有道理的异议和批评。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时十年、生灵涂炭数以千百万的历史事件，即便是这本一百万字的著作也难以记载起历史真相于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 更何况这里面还有因中国大陆执政者的种种阻扰而导致的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淡化和丧失。然而，这个国际研讨会和这本论文集却代表了一种正直的良知和坚韧民心，即决不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 为此，我们必须要揭示出文革的历史真相，必须要健全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

序

林培瑞

本书副题是“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这两个概念都很重要，各有各的价值，但关键处在那个小小的“和”字。“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恐怕得同时追求才行。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是达到了集体意识，但记忆的内容是神话，不但常常无济於事，甚至对当代和後代都可能有危险。反之，要是记忆的内容是真实的，但只有个别的人私下能考虑和谈论，也根本不可能起到社会所需要的教导和痊愈作用。

“尊重历史”和“对历史负责”

2005 年 4 月 12 日中国总理温家寳在印度新德里答记者问说：“只有尊重历史的国家，只有对历史负责任的国家，只有能赢得亚洲和世界的人民的信任的国家，才有资格在国际社会上担任更重要的责任。”温评论的是日本进不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问题，但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有广泛意义的基本道理。

近代历史上的例子不少。比如，後纳粹的德国应该算是反省得相当的彻底：道歉，赔偿，建博物馆，立纪念碑都有。在南非，“种族隔离法”以後的南非政府设立了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效果虽不能算十全十美，但是也算很可观。俄国和东欧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 米沃什(Milosz), 索尔仁尼琴 (Solzhenitsyn), 哈维尔 (Havel),等等--都已经有力地探索了斯大林时期的噩梦过程和噩梦後果。日本虽有一部分顽固人士拒绝承认战争的罪恶，但毕竟政府首相口头上道过几次歉，国家宪法上也拒绝了核武器。（日本教科书也并不像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千篇一律掩盖日本的罪恶。课本的説法不一，但总的来说比掩盖大跃进，掩盖文革的中共课本客观。）美国奴隶制的黑暗历史时段一百多年以後，经过教育（包括教科书），电影，博物馆，和政府的具体措施，虽然不能说伤口全好了，但“真相”和 “集体意识”的问题还是达到了一些成果。

二十世纪的中国如何呢？毛时代中国的“非自然死亡率”比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都多，最极端手段的残忍度不比日本人 1937 年在南京的差，对传统文化的摧毁不亚於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成绩。但中国的“集体意识”怎麼样呢？“真相”能露出多少呢？

毛泽东时代的分水岭性质

从大源大本的层面上看，我不认爲中国人忽略了毛时代的分水岭性质。随便翻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作品，从梁启超到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一直到延安时期的赵树理等，十篇当中縂有九篇是“向前看”的作品。中国当前的问题虽然多，但我们可以挣扎，可以探索，应该进步。未来还是在前面！相比之下，总的来说，毛死以後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向後看”的。我们到底发生了什麼事？怎麼可能对彼此那麼残忍？从“伤痕”和“寻根”自然如此，连後来的余华，韩少功，残

雪等的 “先锋怪诞”很难説跟毛时代的荒诞没有关系。可能是一种变形的表达法而已。

并且，对“真相”感兴趣显然不限於作家和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所比喻的“一盘散沙” 的中国老百姓相比，今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对“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概念还是清楚得多，敏感得多了。

我不相信中国人不想回顾，或对历史真相不感兴趣。要是显得不认真回顾的话，问题的一大部分与政治压力有关。1978 年邓小平鼓励了民主墙和“伤痕文学”，但不到两年之後就开始逆转了，要求中国人“向前看”，要求同胞假裝说整个儿毛时代的灾难是四个人惹的，而毛还是“七分好”的。邓有“理论”，江有“重要思想”，胡有“和谐社会”的提法，但毛一直是七分正确，人爲地饿死至少两千万人一直还叫做“三年困难”，毛的屍体一直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不以爲然者受到警察的注意。所谓“注意”从“善意的规劝”出发，再不行就能发展到思想工作，隔离审查，劳改治疗等等。

毛泽东闯的祸像一个大逆向磁鉄扎沉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潮流里。不少人对它感兴趣，想研究它，解剖它，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免得同样的悲剧有重演的机会。但人们走到离这块大逆向磁鉄一定的距离之後，不知怎的，每次都得转向其他方向：或是停止在‘四人帮’的层面上，或往‘七分好，三分坏’走去，或写成荒诞语言处理。死不肯逆转的人，人身就得逆转，被驱逐出境，流亡到海外。

心理障碍需要时间的沉淀

无疑，中国人认真回顾文革，最大的障碍是共产党的干扰。但还有别的障碍。假如要是共产党一夜之间消失了，中国有了个自由民主的环境，也还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搜集材料和掌握材料的工作。中国的文革那麼复杂多端，中国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八亿人有过八亿人的经验，即使信息自由流通的话，也不容易掌握，不容易总结，不容易分析和理解。

除此之外，回顾自己过去的疼痛或自己的错误，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総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痛苦的事情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希特勒浩劫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写集中营。似乎有一种较原始的心理反映：“我不忍写那麼丑恶的事情”，甚至（虽然自己是受害者）“我感到羞耻，不肯揭露羞耻的事情。”过了二十年德国人和犹太人就写得多一点了，但比较全面深刻地描写，即‘浩劫文学’的高潮，是等了五十年以後才出现的。中国写文革也自然面临这个问题。我记得九十年代中叶，郑义和北明刚刚从中国出来到普林斯顿定居，普大中国学社的朋友就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举行了一次研讨会。美国普大应该是一个较爲没有共产党压力的环境，参加的人也都是敢独立思考的人。然而，就郑义书中的“吃人”片段还是有不少不同看法。没有人说吃人的细节是不真实的。问题不在此，而在於要不要发表这种事实？中国人能不能接受？外国人能不能理解？会不会有损於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参加讨论的人似乎都觉得这种心理难题是中国独特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然。德国，日本，俄国，美国 （以及柬埔寨，越南，卢旺达，亚美尼亚，等等许多国家）也面临过，或者正在面临，同样的心理障碍。

有时候，面对真相所需要的勇气还超过“敢不敢说”或“能不能写”的问题。有时候还得从新考虑自己的基本概念，接受对自己的挑战。比如，二十五年前，很少人会提“造反派”的半句好话。没有人提所谓“毛的文革”和“人民文革”的区别。但水落石出，再过一些时间，有人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文革前饱受官方虐待而“趁机造反”的老百姓。这本书里头就有五篇好文章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

这本书里搜集的是一些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的中国人回顾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虽然文革已经过了四十年，但这些好文章还只能算一种开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良好开端。

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朱　正

◇　反右派斗争的远因

１９５７年发生反右派斗争不是偶然的。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同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夕，提出了一个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言而喻，这是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这一方针的核心和重点，是“改造”这一项。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在全国知识界开始了历时近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正义感和独立精神，使之产生一种原罪感和负罪感，感到自己的出身、教养、经历、社会关系和世界观……无一不是有罪的。在运动的进行中，普遍采用侮辱人格的手段。史学家顾颉刚１９５２年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受：李琦同志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之感。（７月３０日）学委会派来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８月８日）

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觉，就好像狱囚遇到了狱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样。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一些胆战心惊的知识分子只好努力去做一个伪君子，以保平安。这也正是思想改造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知识分子更沉重的一击是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这场被称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紧接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场文字狱开展的，遍及全国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大学师生、中小学教职员工、工商企业、文化团体……都在紧张进行。列入“肃反对象”的多达一百四十万人，占当时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四分之一以上。从胡乔木为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7月１８日）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可以知道，在这数以百万计的肃反对象中，查出了“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另外还查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人。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１９４９年以前在旧军政机关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官职的人。而在占肃反对象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那一百三十多万人，不但没有现行问题，就是在履历表上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记录的。把他们列为肃反对象来审查，来斗争，只能说是斗错了，肃错了。不用说，这被错斗错肃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当然是满腔的委屈和怨恨。

肃反运动是１９５６年基本结束的。正好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示出一种广开言路的姿态。于是，这一百多万被错斗错肃的人中间，就有许多人趁此机会诉说冤苦了。这表现为当年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大

矛盾。

概括地说，经过从思想改造运动到肃反运动这些不间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打击。因而就形成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

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呢？在知识分子这一方，希望对于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无端伤害，给他一个说法，还他一个公道。他们对于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按照自己最大的好意去理解，以为肃反之类的政治运动，正是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集中表现，以为自己蒙冤受屈的问题可以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殊不知这并不符合毛泽东整风的本意，毛最终是用反右派斗争来解决这一矛盾，把诉说冤苦定性为倡狂进攻。由此可知，反右派斗争是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的猛烈爆发。中国的民主党派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也同共产党保持着距离。当国共两大党的斗争激化起来，在“二者择一”的条件之下，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投身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殊死斗争中，大敌当前，也很需要民主党派的合作，至少在影响敌占区人心向背这一点上他们能起的作用甚大。在这个时候，对他们即使有所不满，也是采取一种忍让克制的态度。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可见是十分注意不要得罪这些同路人，而在心里却早已打定了胜利之后跟他们分手的主意了。苏联解体之后，从公开的秘密档案中可以看到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致史达林的电报，其中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史达林没有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复电中表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大约是几年之后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方针的最早渊源。

中国的那些热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因为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主张，才组织民主党派，才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才因此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当国民党的统治即将被推翻的时候，他们曾经幻想可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罗隆基以民盟留沪中委的名义，“写了一个向中共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 1.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 2.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 3.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 4.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国民党被赶出了大陆，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这些民主党派的矛盾就尖锐了起来。其实，共产党早就预计到了这一点并且决定了对策。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现在回头看就很清楚了：从这个文件发出之日开始，到反右派斗争为止，十年之间，共产党就是按照这个态度处理它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步一步实施这个既定方针。到了１９５７年，矛盾积累到了极点，终于给了他们毁灭性的一击。这些民主党派从此名存实亡，不再是一种多少有一点独立性的政治力量了。

◇　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曲：整风运动

１９５７年4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整风运动。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以《这是为什么？》为题的社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写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就内容和性质来说，反右派斗争首先是算前一阶段整风运动的账，所以有“由整风转变为反右”一说。就时间顺序来说，也可以说整风是反右的前奏曲。我们在探讨反右派斗争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之前，要先看看整风运动。

就我看到过的材料来说，最早提出要在１９５７年开展一场整风运动的，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中央全会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起义之后几天召开的，听取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的报告，刘介绍了他如何同赫鲁晓夫商讨处理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情形。可以认为，这次中央全会就是为了讨论波匈事件而召开的。匈牙利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刺激，他当然极不愿意在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事件。他在会上提出开展整风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国也出现匈牙利事件的一项措施。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可以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呢？毛在１９５７年6月8日写的发动反右的党内指示中作了这样的说明：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即照此办理，在一些地方制造出“许多小‘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案是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升学问题上街游行，被人为地制造成一起民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处死了三个无辜者。这一案件有助于人们对毛泽东这篇文章的理解，他说的“主动整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于这次计划中的整风运动的性质和做法，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对于人们理解整风运动的性质，这一段话真是太重要了："整风，就是思想改造"。人们对于数年前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记忆犹新，而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原来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具体的做法，毛泽东说了一项：发动学生斗教员，人人过关。他把匈牙利那种群众上街的情形称为资产阶级大民主，那么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右派斗争这些了。

毛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不仅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也有国内甚至更是党内的原因。他在１９５８年3月１９日为重印一批按语写的说明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１９５６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１９５６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倡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他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指的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国内方面"的"反冒进"事件，显然更是他希望通过整风运动解决的问题。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为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谈到在这年的下半年，"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毛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他就这样吹响了各行各业全面冒进的号角。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冒进的恶果大量显现出来，刘少奇、周恩来这些比较务实的领导人感到形势严峻，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１９５６年6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篇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发表的社论宣称：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提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恼怒，在这一天的报纸上批了这样一些话："尖锐地针对我"，"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５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七八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１１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１９５７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基调也是反冒进，其中提出：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为了这事，后来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例如１９５８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调侃地说："恩来在１９５６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据报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

示》所宣布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从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改善党与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关系。但是从毛在这前后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知道，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之后，中国的这些民主党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装饰品。它的头面人物虽说大都安排了颇高的职位，其并没有什么实权，不能做什么实际的工作，更不要说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因而显得很是消沉。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之后，民主党派一时颇觉兴奋，他们就象经过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动活动了。１９５７年三、四月间，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开会：致公党（３月２１－２３日)、民主建国会（３月２２－２３日)、九三学社（３月２２－２８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３月２５－３０日)、民主同盟（３月２２日－４月５日)、农工民主党（４月１２日）都开了会。讨论在这新气候下的工作问题。这里只举民主同盟的情况为例。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表示要更加广泛的参与国是。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却是毛泽东所厌恶的。这也就是后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不过这时他想要打击的还不是这些民主党派，而是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他想，是不是可以来一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民主党派哇啦哇啦提意见，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种消极因素，只是如果把他们提意见的积极性加以引导，使其锋芒针对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那就化为积极因素了。他怀着这样一种愿望，就来着手调动民主党派这个力量了。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整风指示》见报的前一天，１９５７年4月３０日，他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党中央的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也都到场。毛讲话的主旨就是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了这样一些话：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

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尽管他对民主党派开的这些会并不高兴，但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夸奖了几句。他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希望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们在他划定的范围之内多提些意见，这就是对国务院所属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这些部门，也就是总理周恩来领导下的部门的工作提意见。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也就对刘少奇的系统多提意见了。假如这些民主人士能够多提意见而且符合他的意图，毛还许诺给予一份回报。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

这天毛泽东还讲到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他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也是知识分子很欢迎的意见。不过，后来凡是引用这话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整风指示公布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５月８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日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件事进一步反映出了毛泽东借重民主人士进行党内整风的意图。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成问题的是，这些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完全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并不在毛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对教育、卫生等等工作中的缺点提意见，批评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义，甚至有人在发言中还流露出反冒进的意思，例如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就提出了“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的问题。会上的许多发言谈到党委代替行政直接发号施令、外行领导内行、肃反运动的偏差，等等问题，实际上涉及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体制问题和严重弊端。这些都是毛没有料想到也决不愿意听到的意见。

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共产党内的情况其实颇为隔膜，不知道（或很少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反冒进问题上的意见根本对立，而把他们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导集体，他们没有想到在提批评意见的时候要分别对待，在批评刘少奇、周恩来工作中种种错误的同时要赞美毛泽东的英明正确，表示对毛泽东的尊崇拥戴。像储安平的那篇要命的“党天下论”，标题竟是荒谬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陈铭枢甚至直接写信给毛，批评他本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种表现使毛泽东震怒。反右派斗争就从打击民主党派开始。

当年有机会经常接近毛泽东的李志绥在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１９５７年，而不是１９６６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

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简单化为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打击周恩来，李志绥的这个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确实知道这样几点：毛在发动整风运动之时确实想要同时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为了反击向共产党倡狂进攻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得不把反冒进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求得党内的团结一致。李志绥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林克（毛的秘书）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在１９５８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谈到为什么"反冒进"一阵风仍然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时候，他说，这是因为"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可见他无意于把党内反冒进的人全都划为右派分子，给一些人另外准备了观潮派和促退派这两顶帽子，罪名轻得多了，并且接着说，"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可能改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这种不为已甚的态度当然有助于全党团结一致去反右派。

也因此，没有能够在整风和反右中去算反冒进的账。这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反右派斗争过去之后，毛还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　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在１９５８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又说："'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调侃周恩来，这在上文已经引用了。他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更说，有些同志不经合法手续，"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暴发，提出反冒进"。可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进问题。这笔账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后的清算。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理由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

◇　反右派斗争的战果和遗产

前面已经引用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准确地表明了整风运动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是预告了：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的最后阶段。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要给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总结了，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真是说得简明扼要："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反右其实是一回事，要说差别，不过是时间先后的两个阶段而已。

既然说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那么，开展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当然早就在毛的成算之中。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当初毛表示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究竟是真心诚意的求言呢，还是引蛇出洞或者说钓鱼的一种手段，阴谋或阳谋？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敌视是一贯的，从延安的整风和抢救到进入北京之后的思想改造和肃反，开展一场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说这一回的整风运动，他已经明说就是思想改造。当然可以认为在决定整风之时即有钓鱼之意，这事实上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或准备阶段。是知识分子不知底蕴，以自己最好的愿望去解释整风指示的文字，误入白虎节堂，自投罗网。毛泽东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大战”来指挥的，提出了要使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谋略。“引蛇出洞”不过是“诱敌深入”更形象化的说法，就是诱使那些将要打击的对象充分暴露自己。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呢？在《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说：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５月８日至６月７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这里所说的５月８日至６月７日，正是从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到工商界座谈会结束的这两个座谈会期间。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具体部署反右派斗争了。引蛇出洞或者说诱敌深入就是战役的第一阶段。

李慎之认为，这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他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说：“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他引证了毛在１９５７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像“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毛的这些话当然表示他有引蛇出洞的意思了。但是我以为，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开展一场后来实际进行的那样的反右派斗争。我这看法有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在同一篇讲话中，毛说，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这些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李慎之在致胡绩伟的一封信里批评了我写的《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按：此书的增订本改名为《反右派斗争始末》），他说：（朱正）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倡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１９９７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这里，他不是照引我书中的原文，而是概括地转述。在我的书里，对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原因并不是说得这样简单。在他决定整风的多种动机之中，我提出毛一开始确实也包含想要消除那些太刺眼的弊端，改善一下执政党形象的愿望。这里也有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毛在5月１６日写的一个党内指示。这时他已经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了，可是他在这指示中还是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

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毛即使在布置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就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要打出多少右派分子，７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一个党内指示的时候，写下了他对于“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的意见，他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４０００人左右”。到了８月１８日，他在修改统战部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写的数字增加了许多：“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最后的实际战果，“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５５２８７７人。”应该指出：这是给“错划右派”进行“改正”之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必定比当年实际所划的数字要少些。当年究竟划了多少，要等到他日档案公开的时候才知道了。不久前看到一个３１７８４７０的数字，我对它的准确性甚至真实性不无怀疑。这篇材料的标题是《反右派运动档案解密》，却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由什么机关宣布解密的，也不见档案号。再就内容看，所提出的数字也不足信。１９５７年那时，中国“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五百万左右”，那么这三百一十七万就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强了。在我这个过来人的印象中，没有这样高的百分比。在没有找到确证以前，暂且让它聊备一说吧。

反在派斗争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是它打出了多少右派分子，以及这许多右派分子及其亲友在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吃了多少苦头。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或者如有的作者所说的是“大逆转”。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看作历史的分水岭的，他说，毛泽东的领导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而来的，是大跃进。毛泽东１９５８年9月5日在第１５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情也确是如此。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

大跃进这一场新的灾难造成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千万计。毛泽东知道：大跃进的失败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大降低，于是决心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对手，重建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时他就在准备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了。

以打倒刘少奇为重要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是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有材料表明：准备工作是早就在进行了。毛自己说过，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就看出了问题。谁的问题？当然是刘。准备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造）能够置刘少奇于死的罪证。李冰封的《吁天辩诬董狐篇》一文谈的是历史学家吕

振羽在１９６３年１月被秘密逮捕的事。逮捕吕振羽的目的就是要他作伪证，证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抗日的时候，刘少奇充当了内奸。所以李冰封认为，１９６３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各项准备完成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　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斗争的异同

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同他在１９５７年发动反右派斗争一样，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强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打击有可能向他的权力地位挑战的对手。

在１９５７年，毛原来想借助为冲击力量的民主党派人士不明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不分老和尚小和尚一律批评，不但出现了对他本人的批评，甚至还涉及到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根本问题。他原本就认为民主党派怀有二心，这时候更感觉到虽然八年来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打压和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民主党派仍未归顺。面对着这种七嘴八舌纷纷议论的局面，他感到当务之急不是跟那些反冒进的党内对手算账，而是赶快把被他放了出来的那个魔鬼重新收进瓶子里去。于是以民主党派为第一个打击对象，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反右派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倡狂进攻。

因此，在１９５７年，任何一个基层党组织，乃至任何一个党员，都是不能批评的，谁批评了就是向党进攻。因为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这些具体的支部和党员组成的。通过这样一场斗争，党的威势大大提高了；作为党的领袖，毛的威势更是大大提高了。这里我用“威势”一词，不说“威信”。因为有人说过，反右派斗争使共产党立了威，却失了信。

到了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从一开始，毛就明确告诉人们：决不可把共产党看做一个统一体。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写下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更明确宣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来人都记得，当年那些大大小小的党内领导人几乎无一不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而受到冲击，这就同１９５７年的做法完全相反，不过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却是进一步大大提高了。

１９５７年发动整风运动的时候，毛还颇有一些自信。这时他执政八年，工作中积累的错误，群众中积累的不满，都不算太多。有错误，他以为也不过是某些党员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造成的，无损于整个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只要按照整风指示说的，让大家在和风细雨中批评批评就可以了。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甚至连这三个“主义”也不承认了。谁批评教条主义，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批评宗派主义，就是攻击党的领导……如此等等。用一顶右派帽子把一切批评都挡了回去。

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１９６６年，工作中积累的错误就更多了。其中还包括大跃进这样的绝大错误，甚至应该说是滔天罪行，远不是可以用“三大主义”那样的轻描淡写能够解释过去的。这时，人们对大饥荒记忆犹新，心里都在想：这些错误乃至罪行是怎样造成的？应该由谁来承担罪责？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这样解决的：有一条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十七年间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切错误，灾难和罪行，都归罪于刘邓路线。毛要打击的一切党内对手，一切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归属于刘邓路线。这样强调党内的路线斗争，是１９５７年没有提出也不必提出的。

在１９５７年，毛原来想要利用的冲击力量是民主党派人士，可是他们太不识相，有负厚望，因而受到沉重的一击，早已溃不成军，尸居余气。到１９６６年时已经不成其为一种力量，毫无使用价值了。这一回被毛泽东找来作为冲击力量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看来这是他因为有了１９５７的记忆而作出的决定。

在１９５７年部署整风和反右的时候，最开始，毛并没有想到学生。是5月１９日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学报，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他们自豪地称为“五．一九运动”之后，才引起了毛的重视。在5月１９日以前，毛泽东写的有关整风和反右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到学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别的一些大学的学生们，出大字报，办民主论坛，闹烘烘，使毛泽东大伤脑筋，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酝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回忆起１９５７年这些娃娃们为了自己认准的“理”而奋不顾身的勇气，觉得可以用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力量。于是所谓“红卫兵”就应运而生。他们之中多是大学生、高中生，甚至还有初中生。他们更年幼无知、更轻信、更容易被煽感。他们不但不知道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连中共执政以来十七年的历史也不甚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父兄的遭遇中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但被告知这是受到刘邓路线的迫害，于是他们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他们成群结队，四处抄家，打死老师，破四旧，闹得乌烟瘴气。他们的这种种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都被称赞为革命行动，受到鼓励。在他们的冲击之下，各地党委在很短时期内就瘫痪了。“红卫兵”做到了毛希望他们做的事。

文化大革命当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会，都是１９５７年经验的直接继承。

毛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采用这种革命形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对这几样是如此喜爱，后来甚至把这些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写入《宪法》之中。直到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才有了一个新说法。他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

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他说的是“从来”，就是说，这个“四大”不论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

从形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跟反右派斗争相似之处甚多，只是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受到冲击的人更多，造成的破坏也更大。在这个意义上看，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预演。

在１９５７年，毛泽东把他提出的“百家争鸣”解释为“两家争鸣”：“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照这样的解释，所谓“两家争鸣”，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思想后来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可见就指导思想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延伸和发展。

毛泽东想要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对手的目标，在１９５７年没有能够达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达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流产的文化大革命。同１９５７年那时不同的是，随着刘少奇及其同事在弥补大跃进灾难性后果过程中威信的日益升高，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变得更加强烈与急迫。十年之后，“霸蛮”的毛泽东终于腾出手来，开始了他自己视为一生中在打倒蒋介石之外的第二件大事，即发动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的的文化大革命。

(2006 年２月１１日初稿，５月１８日改定）

毛发动文革，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

张显扬

金钟先生：

惠寄的大作《苏共二十大与中国文革》，早已拜读。迟迟未能把我的意见告您，让您久等了。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文革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一件大事。当然，不是甚么光荣的大事，而是耻辱的大事。如果有人提议把二〇〇六年为国耻年，以纪念那十年浩劫，我举双手赞成。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总结并吸取这件事情的教训，以免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

说到总结教训，首先当然要弄清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您的文章主要也是谈这个问题的。您把文革和苏共二十大联系起来考察，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无疑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发斯大林的罪行，并由此开创一条中共被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赫鲁晓夫路线分不开。但是，我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宜作直线式的推论，好像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是指向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及其路线的。

◇　毛发动文革，防止死后被鞭尸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双重的：一则以爱，一则以恨。赫鲁晓夫推倒斯大林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毛泽东是高兴的。他评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能想问题了。”这里所说的“大家”，其实主要是指他自己：这下他毛泽东终于可以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龙头老大”了，他敢讲话了。至于想问题，他倒是历来都敢想的。在这层意义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满心感激。

可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毛泽东不仅不喜欢赫鲁晓夫，而且非常痛恨他：因为他反对个人崇拜。如果赫鲁晓夫用别的甚么名目否定斯大林，毛泽东也许就不会那么恨他了。毛泽东是一个打从骨子里喜欢个人崇拜的人（当然是对他的个人崇拜）。因此，他在中共八大上，对刚刚开过的苏共二十大，做了一下姿态，应付了一下门面以后，很快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违背列宁关于群众、阶阶、政党、领袖的理论的，并且提出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历来是独裁统治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独裁者实行统治的一个重要工具。反对个人崇拜，就是反对独裁统治，就是反对独裁者本人。这是毛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都耿耿于怀。

同样，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同中国文革的关系也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们

惊醒了毛泽东，让他清楚地意识到，独裁者身后会有人鞭尸。斯大林便是前车之鉴。如果不想（当然不想）改变独裁制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尸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早早地消灭掉。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消灭“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免死后被鞭尸。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又被毛泽东用来充当发动文革的“稻草人”：他用赫鲁晓夫的恶名来胁迫人们跟着他去反对和打倒他所要反对和打倒的人。从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毛泽东已经把赫鲁晓夫妖魔化了十年，在中共党内外，赫鲁晓夫早已被认定为一个背叛马列主义，出卖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十恶不赦的、天字第一号的坏人。现在，中国党内也出了这样的坏人，岂不应该赶快起来反对吗？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宣示的逻辑，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参加文革的人的思维定势。毛泽东狠命批判赫鲁晓夫如何如何，其真实意图，就是要利用赫鲁晓夫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赫鲁晓夫早在文革发动前两年已经下台了，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不过是一种姿态，是做给中国人看的，尤其是做给那些可能同情和支持赫鲁晓夫的人看的。

◇　夺权，是文革的直接起因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据说，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权就被篡夺，死后便可想而知了。为了保住大权，他曾经发动了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解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形势反而更加严重了，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防止他们篡夺最高权力，他不惜以七十三岁高龄之躯，抖擞精神，发动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他们彻底打倒，把已经旁落的大权从新夺回来。简单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直接的起因。夺权，是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主题。实际上，一开始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夺了中央的权。文革小组，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常委之下，实际上隶属于毛泽东一人之下。接着，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面夺权。待到该打倒的都打倒了（其实，不该打倒的也打倒了）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便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真是昏了脑，竟把台湾给忘记！记得当时特别发行了一张邮票，就叫“全国山河一片红”，结果大出洋相，急忙收回来。这张邮票，后来成了高价抢手货）。

总而言之，文革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夺权运动。

夺谁的权呢？夺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权。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全国上下的党政部门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到处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军队系统有林彪替他管着，尚可放心。毛泽东之所以要把全国的党政机关统统砸烂、打碎，目的就是要把刘少奇连同他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一起打倒。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居然幸免于难。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没有要打倒邓小平的意思，这从后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对他网开一面，留有余地，可以看出来。当时把他放进刘少奇的“司令部”，不过是让他陪绑而已。光刘少奇一个人，怎么能成一个“司令部”？邓小平当时是总书记，在工作上和刘少奇

联系较多，把他同刘少奇捆在一起，正可以壮大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声势，以表明问题的严重性。这样，邓小平便扮演了半个黄盖的角色（一个愿打，一个不愿挨）。至于后来林彪也被打倒了，那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林彪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号帮凶，后来毛泽东怀疑他有二心，才把他打倒。毛泽东死后，江青也被打倒了，那更不是文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新一轮权力斗争的第一声惊雷。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革，无论是为了防止生前被篡权，还是为了防止死后被鞭尸，都紧紧围绕一个“权”字。毛泽东一生视权力为生命，这一点周恩来看得最透彻，最懂他的心思。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生病（大概是在林彪出逃以后），昏迷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周恩来俯下身子大声对他说：“主席啊，大权还在你手里啊!”研究文革的起因，一定不能忘了这个“权”字。否则，就会如堕入各种意识形态的五里云雾。

◇　拆穿路线斗争的骗人把戏

有一种看法，显然是受了迷惑，那就是过分看重毛泽东所标榜的那些东西，甚么路线斗争呀，反修防修呀，以及诸如此类的口号，把它们都当真的了。一位哲学家曾经提醒世人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这是很对的。毛泽东打出这些旗号，只是他对自己进行的斗争所作的一种解释，是他的自我表白，是不能作为判断他真实意图的根据的。在这些堂而皇之的旗号后面，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的，是权力斗争。甚么叫政治？说到底，政治就是为权力而斗争。这里没有这阶级那阶级、这党那党之分。区别只在于，在民主制度下，斗争的胜负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在独裁制度下，取决强权，特别是军队。在决定性时刻，谁手里有军队，谁就稳操胜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以来，毛泽东夺取了军队大权，从此以后，不管进行甚么样的“路线斗争”，他都是“正确路线”，而且百战百胜。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说过，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以“路线斗争”为旗号的权力斗争的历史。这是真正的高明之见。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这样看。

有没有“路线斗争”这回事呢？要说有也有。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开始的时候，最初的参加者，理想主义者居多，那时候，内部斗争往往真的是为是非而斗，即使这种是非并不像当事人想像的那么严重，彼此之间也争得很真诚、很执着。这大概可以算作路线斗争的雏形吧。及至后来，见到了权力，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情况就不同了。把“路线斗争”弄到性命相拼的地步，是苏共的发明，毛泽东把它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目的当然为了争夺权力。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权瘾比赌瘾、毒瘾还要强烈，还要难解。染上了权瘾的人，如果中途不出意外，到头来都是独裁者。这在斯大林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为了保住并扩大已有的权力，他不断制造各种理论、提法和口号，以便把他视为敌手的人一个个装进去，然后宣布一次又一次路线斗争，名正言顺地把他们一个个打倒，并从肉体加以消灭。然后宣布，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审判，就是用这套把戏把一个个老布尔什维克送上断头台的。毛泽东也是这样。所谓文革，不过是莫斯科大审判的中国版。区别只在于，中国版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花样更翻新、害死人更多，因而更残酷、更丑恶、更荒诞。

如果看不清这种所谓路线斗争的虚伪和险恶，那就太善良，太纯真了。在中国

，所谓路线斗争，除了独裁者用作打击异己的工具，还是有一个巧妙用途，那就是用来进行自我辩护。不管犯了多大错误，出了多大乱子，都可以推到错误路线上，自己一贯伟大正确。可是，这一回他们遇到了难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且是一次全局性的、持久的错误。即一次极其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又怎么办呢？他们自有高招：例如，被邓小平称之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就装一付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这次就不提路线错误了吧？”为甚么？据说“马克思也没有说过路线斗争”（其实，马克思不止一次说过）。既然马克思没有说过，为甚么几十年来把路线斗争提得那么高，认为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路线斗争史？现在事情落到毛泽东头上了，“就不要再提路线错误了”。这表明，甚么路线斗争，防修反修，都不过自欺欺人而已。能用来打人的时候，是路线斗争，自己碰上了，不过儿戏而已，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至于这么荒谬的文革怎么能搞起来，而且持续了十年之久，那是一个需要从文化、历史和制度背景上另行研究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误导了几十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设法让下一代不再被误导。总结文革的意义，恐怕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我相信，当年轻的一代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不再人云亦云（确切地说，不再官云亦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起来。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

华新民

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国内的历史学者韩钢提出了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梳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直接动因要从毛本身寻找，毛的思想、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至于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因素，都是透过毛这个因素发生作用的，这是另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这个‘怪胎’的问题。”〔１〕

本文试图就第一个问题，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见解作一点回顾和评论。

毛泽东死后，中国官方对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被写在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它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作了这样的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沿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说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２〕因此，发动文革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修正主义；是为了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在文革前直到文革后，中国官方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这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反修访修”。只不过从前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现在不这么认为了，而是说他的追求“带有空想色彩”，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换句话说，虽然文革是搞错了，而且错到要彻底否定，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从来是无可指责的。

这样一种解释，在国内的文革研究文献中占主流地位。例如，金春明在他对于文革的定义中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领袖亲自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所谓'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３〕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这个"神圣目标"，而且把它写到文革的定义中去，赋予一种不容置疑和争论的地位。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样一种评价由于官方的教育灌输，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中还有一些市场。如一九七零年出生的卢周来在"文革七问"一文中说："我从毛在莫斯科谈话以及７０年与斯诺谈话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他说，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４〕他在这里强调毛发动文革的本意是推动民主，让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这样的观点在经历过文革的人中可以说已经不多了，这少数人中有代表性的是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黄廉，黄廉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以"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罪名，被隔离审查，１９８２年被判处１８年有期徒刑。他出狱后在访谈录中说："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５〕

卢周来、黄廉的这样一种认识，至少在文革的最初几年里，确实是大多数造反派、青年学生的一致的共识。正因为人们当时这样来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使得毛泽东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比之文革前又大大提高，这是超出个人崇拜之外的建筑在理性认识上的因素。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展开，这样的共识逐步瓦解，以至到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时候，人们用"秦皇的封建社会"来影射毛泽东本人和他统治下的中国，说明十年前在同一个天安门广场上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欢呼的人中，相当多数人已经抛弃了从前对毛泽东的崇拜，当然也抛弃了原先对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认识。也就是说，随着文革的展开，人们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从开始全心全意接受毛泽东自己的说法，转变为对此提出质疑，甚至进一步转变为完全抛弃。

不过这种质疑和抛弃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只是许多人心中的情绪，在当时中国的环境里也难以形诸公开的文字。中国政府开放留学初期，出国的人员大多有文革的经历，有些人就开始在留学生办的刊物上发表回忆和反思文革的文章。到了一九八六年文革发动二十周年的时候，湖南省文革中的激进组织"省无联"的积极分子、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陷狱十年的杨小凯发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

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文革的背景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当时饿死的两千万人数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每次战乱中的死亡人数。……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史称七千人大会）不敢违抗潮流，不得不承认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以力挽狂澜的态势，……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线，并公开声称‘彭德怀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后来，毛泽东在五八年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党内外有识之士都心怀不满，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６〕

杨小凯的这一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第一次以公开的文字表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自己在五十年代推行的经济路线彻底失败，遭到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集体抵制和党内公开的批评，受到党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满甚至嘲笑，毛泽东自知理亏又难于忍受，发动文革是他反扑和扭转局势的一种努力。其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态有不理智的一面，这包括因为刘少奇为彭德怀翻案而怀恨在心，因为有人嘲笑、讽刺、挖苦他的政策而恼羞成怒。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文革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推行的“三面红旗”有关是显而易见的。然而，１９８１年官方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解释以及上述金春明的定义对此却只字不提，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都知道，文革的发动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国内的文革时研究学者王年一早在１９８３年即已指出“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７〕王年一上面这段话说明作者其实看出了其中的关系，甚至也婉转点出了毛泽东的意图是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然而大概是受国内的政治环境所限，他把更多的责任归在江青身上，他在同一文章中说：“江青心怀鬼胎，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挑拨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份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至于毛泽东的动机，他又在同一篇文章中为他开脱：“毛泽东主观上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对此他没有加以论证，给人以“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印象。可以说，在文革同“三面红旗”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上，王年一的这篇文章已经接近了杨小凯的结论。但是由于言论禁区的存在，他只是点到为止。杨小凯在海外发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没有言论禁区的约束，毫不含糊地说明了

毛泽东维护“三面红旗”，不是什么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死不认错。

显然，杨小凯当年积极投身文革时不是这样理解毛泽东发动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期支持学生和工人造反，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批判“血统论”，使人们觉得他确有为了“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而揭露共产党政权的阴暗面的目的。杨小凯当初无疑是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他甚至觉得毛泽东的文革会导致“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８〕。然而十八年后，到了一九八六年，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他把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还人权于民”的一些做法理解为只是为了动员群众击败政敌而打的一张“民意牌”，是他在处境极为被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常规的“右的策略”〔６〕。毛泽东的这个策略确实很得人心，不管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又得到平反的人们，还是因为谨慎小心没有受到多少打击的人，都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新政策中，如“十六条”规定要保护少数，声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感觉到了一种１９５７年反右以来没有的宽松气氛。这种“解放感”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他们忘记了就在几个月前，报刊上还在批判彭真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口号，也忘记了几个月前受到批判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主要的罪名就是影射和挖苦“大跃进”的失败。直到他们原来憧憬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成为泡影，现实中的“革命委员会”比文革前实行更加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后更加讲出身和成份，才变得困惑起来，反过来追问当初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杨小凯指出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失败同他发动文革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他的失败如何导致文革的过程没有作详细的论述。到了文革结束二十年的１９９６年，王若水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一文中沿着杨小凯的上述思路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从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案入手，指出“毛泽东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给刘少奇定‘反革命’罪的。这一点，毛泽东难道不清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蓄意罗织罪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一定另有原因。毛泽东发动‘文革’，一定有隐秘的动机。要探查出这个隐秘的动机，就要弄清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原因。”〔９〕确实，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说辞最难以解释的问题之一。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尽管不无认识上的错误，那他为什么要如此蓄意地罗织罪状？所以一般的持有或接近官方观点的学人都回避这个问题，例如喜东在“‘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一文中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一案，说成是在“文革的混乱之中横生出的一个枝节，后来喧宾夺主，最后被认为是文革的主要成果”〔１０〕。

王若水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枝节”，相反，而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揭示毛泽东的“隐秘的动机”，为此他作了如下的分析：１９５３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但是，毛要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为了使中国赶上苏

联，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原因。不料，大跃进搞糟了。毛泽东从此有块心病，那就是，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像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一样来算这一笔帐？果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立即将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倾”，把他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进一步蓄意诬蔑他们“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由于庐山会议的转向，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政策没有得到纠正，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饥荒中饿死。这样严重的后果，使得原来在庐山会议上站在毛一边的刘少奇等人开始同毛泽东拉开距离。在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对大会的书面报告所做的口头说明中说了一些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话，例如“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最使毛心惊肉跳的是刘少奇这样的话：“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这些话使得毛认定刘少奇会像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后清算斯大林错误一样，等到自己死后来算帐。与此同时，林彪抓住机会说了一番迎合毛泽东心思的话，替毛解了围。王若水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下了决心用林彪换掉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为此作了四年的准备，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革来实现他的计划。〔９〕

王若水的文章除了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以外，还指出了毛的政治野心和对刘少奇的“蓄意罗织罪状”，这就明确地把毛泽东这个人的政治品质问题放到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他也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作出了罢黜刘少奇的决定。

高文谦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做出了相似的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高文谦所说的毛泽东的“恐惧感”同王若水所说的“心病”根源是一样的，那就是：斯大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然而“大跃进”惹出乱子，毛只得退居幕后，而把刘少奇推到一线收拾烂摊子。而毛泽东的恐惧感也由此而生，因为刘少奇采取的紧急调整举措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受到了普遍的拥戴。而且刘本人也有针对毛泽东及其失败的“三面红旗”冒犯的言论，如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甚至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使毛泽东觉得刘就是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绕，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同王若水一样，高文谦也认为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已经在认真考虑解决刘少奇的问题。〔１１〕

２００５年出版的张戎和 Jon Halliday 所著《Mao，The Unknown Story》一书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分析同王若水和高文谦有着类似的思路。不同的是，该书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有同苏联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因素，也同毛泽东想把中国迅速建成一个军事强国的想法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为了更有效地把全中国人民组织动员起来，生产更多的钢铁来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征集更多的粮食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这条路线遭到严重挫折，也使毛泽东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威望受到打击。同王若水和高文谦一样，该书也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的转折点，他们根据对王光美、王力等人的采访和其他材料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按照毛泽东原来的用意，“七千人大会”是为了代替按党章应当召开的党的“九大”——毛担心由于“三面红旗”的失败，如果召开正式的党代会自己会被选下去。根据毛的安排，中央先预备好一份决议的草案给大会定下调子，草稿里笼统而轻描谈写地承认过去几年里犯了一些错误，然后宣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且宣布在新的一年里再来一个大跃进。会议的头两个星期没有全体大会，分组对这份草稿提出意见，由于与会人员不能互相交流，而且由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寒蝉效应”，人们对草稿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修正。然后在全体大会上由刘少奇来宣读“集中”大家意见之后的定稿。这样毛泽东既可以把自己的意图变成党的决议，又可以使全体出席会议的人为这个文件共同负责。然而，刘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发言中出其不意地离开了原定的调子，用作者的话说，是对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他当着毛的面在七千党的干部面前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过去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不仅没有大跃进，反而退了许多；成绩和缺点的比例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刘的讲话扭转了会议的气氛，在出席会议的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刘少奇讲话的鼓励下，他们纷纷大胆直言，表示再也不能继续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了。这就使毛泽东不得不延长会期，把林彪请来发言以抵消刘少奇讲话的影响。林彪以军队首领的身份，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肯定，毛主席一贯正确；这几年的困难只是交了点“学费”；“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更加紧跟毛主席。”林的讲话阻吓了出席会议者的对毛泽东灾难性经济政策的深入批评，使毛泽东得以过关。据王光美对该书作者说，刘少奇见到林彪出场就嘀咕：“林彪来讲这样的话，麻烦了。”不过毛泽东从七千干部在会议中表达出来的强烈情绪中感受到了压力，因此在一月三十日作了建国以后唯一的一次公开自我批评，并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不得不放弃严厉的粮食征购计划。这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大一次挫折。他竟然给平时小心翼翼的刘少奇赢了一着棋，又等于被当时全国的当权派喝了倒彩。这使他认识到从上到下的整个干部体系不是他的治国路线能够依靠的对象，相反，从此时此刻开始，毛泽东内心对刘少奇和所有出席会议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党滋生了满腔的怒火，国家主席和党的骨干成了他复仇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要发动文革让刘少奇和大多数出席会议的干部——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受地狱之苦。〔１２〕

《Mao，The Unknown Story》一书的作者在王若水和高文谦提出的“心病”和“恐惧感”以外，还加进了毛泽东对广大干部的愤恨。看得出来，他们除了试图回答王若水提出的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和心理因素这个问题，也试图理解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行为，比如他为什么不仅贬黜了刘少奇，而且要罗织罪名陷害他；又比如毛泽东为什么打倒刘少奇之外还要使整个党组织以及各级干部受到冲击，而且

放任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对他们施行暴力。

从杨小凯到王若水、高文谦和《Mao，The Unknown Story》的作者，他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同所谓“追求完美的社会主义”这一类理想主义、神圣目标无关，而应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红旗”）分歧中去探求。这种观点同官方说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近年，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突破官方设置的禁区，接受和认同上述杨小凯到张戎等人观点。例如韩钢就认为毛发动文革的“直接原因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高层的分歧”。而且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这个分歧的起点，因而也是毛发动“文革”的起点。作为这种认识的佐证，他认为一九六六年毛写《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１〕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四年前的七千人大会始终在他的心头，他要算这笔账。

有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持介于二者或兼蓄二者的立场。例如学者高华认为：“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个因素：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１３〕这种说法照顾到了两种对立的因素，既有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权旁落的恐惧感。

高华在论述六十年代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时也提到了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他说，“在六十年代初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的狂热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使刘少奇中央领导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们心里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毛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他们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也都负有责任，他们愿意弥补这种损失和灾难，因为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但是不同于《Mao，The Unknown Story》里的说法，他认为当时刘少奇没有对毛泽东“突然袭击”的意思，在大会上还是想为毛泽东开脱的：“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 〔１３〕

高华同张戎等人这种差别，给历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深入研究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的课题。刘少奇在大会上究竟是冒着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风险试图阻挡错误政策的继续，或者只是希望通过为毛泽东开脱劝使毛泽东接受他的新政策？如果是后者，王光美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是不是有事后为刘少奇添加“烈士”色彩的嫌疑？这些问题的澄清，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收集和研究。

高华虽然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这表现在他在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对官僚体制和干部特权的批判，例如他提出了“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概念，直到后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但在同一文章中，他揭示了毛的这种追求的前后不一致性：“在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五十年代，

毛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尤其不允许进行工农收入的比较。”我们知道，梁漱溟曾经提出过工农差别的问题，受到了毛泽东的痛斥，现在却连“八级工资制”也成了他不满的对象。“广大农民看病难，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此相对照的是等级严格的干部保健制度，这种医疗保健制度由来以久，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是过去毛未曾严厉批评。”现在却把卫生部斥为“城市老爷部”。“毛批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说到底，特权行为是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共产主义原则相违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批评过这种现象，却被认为是‘反党’；１９５７年，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又提出这个问题，被指责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托洛茨基解释这是‘工人国家蜕化’；以后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即旧译德热拉斯）说，这是‘新阶级’，苏联人骂杰拉斯是‘修正主义者’，中国也骂他反动。”而现在毛泽东自己也批判起“官僚主义者阶级”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长期默认‘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规则的，这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的铁的逻辑，给全国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变了”。如何解释这种种前后矛盾呢？高华认为“可能毛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干群关系表面好像没有问题，但矛盾在增长，苏联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也存在。”　〔１３〕

高华没有看到的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在五十年代，毛是在第一线领导党的各级干部，所以“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退居二线后的局外人的地位使他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问题；而刘少奇以下的各级党的领导正在纠正他的经济政策错误，而且居然做得颇有成效，在干部中深得人心，毛泽东自知在经济政策方面已经没有资本争取人心，因此不再过问经济政策，这同他在一九五七年及以后的几年中具体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甚至钢铁、粮食产量的年度指标成为鲜明的对照。然而他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他的妒贤嫉能和急于扭转局势的心理使他把目光转到“阶级斗争”和干部特权这样一些容易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领域。

虽然高华不否定毛泽东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他也觉得毛泽东的理论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例如，文革初期，毛支持群众造反，但没过两年，就在群众中“清理阶级队伍”，大抓“五一六”；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绝不容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等于又回到了文革前的逻辑。他还指出毛泽东自己言行不一之处：在毛泽东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样板戏”之时，却让有关部门秘密组织著名演员为毛排演“折子戏”，再予以录像，送北京给毛欣赏。文革期间，全国城市职工，包括干部，都没有调整工资，只有江青例外，从９级调到６级，月工资３４２．７０元。又如对干部特权表示深恶痛绝的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却对一些人利用干部资源“走后门”读大学表示理解和支持。〔１３〕总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里有没有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成分？这涉及到毛泽东的心理活动，很难有确切的证据。即使是不否认他有这方面动机的真诚研究者也会被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困惑。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认为毛泽东有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动机的论者多是根据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言论和在他指示下发表的官方讲话和文章。这种观点假定毛泽东的言论都反映了他的真实内心思想，因此除了引用他的话以外，未见做很多深入研究，如卢周来在“文革七问”一文中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文化革命有两点最不满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虏，我们战争年代都不虐待俘虏。有人说他是说

假话，但他反复与斯诺说，我们都没有变，我不对你说假话，你也不要对我说假话。而且，从他与斯诺的那次谈话的全文看，至少我没有看出他偏要在这一点上说假话。”〔４〕他在这里对于毛的讲话是基本采信的态度，因为毛泽东“反复”地说他不说假话。

否认这种动机的论者，如杨小凯、王若水、高文谦和张戎等，则是试图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党内同事们的分歧的发展过程来理解毛泽东的心理状态，追寻毛泽东言论背后的隐秘动机。笔者认为这是具有历史观的正确思路。但是由于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的缺乏，近年的一些个人回忆材料不免都带有个人视角的限制，还有许多艰巨的考据和索隐的工作要做。

注释：

〔１〕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见 http://www.lsfyw.net/political/yuelu/unite/qzfz/200508/3893.html）
〔２〕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六月
（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4／cr214.hz8.html#2）
〔３〕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４〕卢周来：“文革七问”（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1/cr95.hz8.html#5）
〔５〕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
（见 http://museums.cnd.org/CR/HuangLian.htm）
〔６〕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知识分子》，１９８６年第四期（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4/cr227.hz8.html#1）
〔７〕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9月３０日（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1/cr113.hz8.html#2）
〔８〕杨曦光（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http://museums.cnd.org/CR/ZK99/zk189/hz8.html#2a）
〔９〕王若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十月
（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98/zk145.hz8.html#2）
〔１０〕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96/zk83.hz8.html#2）
〔１１〕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８６－８９页
〔１２〕Jung Chang ＆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Random House，２００５，４７０－４７９页
〔１３〕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２００３
（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5/cr302.hz8.html#1）

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

程晓农

在有关共产党国家政治演变的研究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向被视为毛泽东独创的异想天开的政治试验。中国和西方的学者谈到“文革”这一概念或政治运动本身时，往往不约而同地把它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后１０年联系在一起。其实，“文化革命”并非毛泽东独创，而是他从苏联模仿来的政治舶来品；“文化革命”的始祖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

早在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１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其政策话语里，从苏联模仿来的“文化革命”一词曾频繁出现在重要的党政文件里。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与苏联３０多年前推行过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从１９６６年８月起，毛泽东将一场类似于苏联的“文化革命”转变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产生了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更为恶劣、广泛、深刻的后果。

１９７８年，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编辑出版了一本《俄国的文化革命，１９２８－１９３１》〔１〕，介绍苏联的“文化革命”。１９８５年，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派珀（suzanne　pepper)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此书。〔２〕派珀在书评中提到，费茨派垂克关于苏联“文化革命”的书本来应该引起西方国家许多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人士的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此书知之甚少。〔３〕

派珀的书评发表至今已２０余年。尽管中国的“文化革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从概念到方法有种种相似之处，但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还是苏联问题专家，通常都只观察分析单一国家的“文革”，很少有人将中苏两国的“文化革命”纳入比较研究的范畴，因而研究者和读者都没有机会通过“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发现单一国家“文革”研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rodrick　macfarquhar)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三卷本专著〔４〕探讨“文化革命”的起源时，把“文革”解释为“百花齐放”和“反右”的延伸，由此回溯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这一角度虽然将苏联因素引入了关于中国“文革”的研究，但麦克法夸并未把苏联的“文化革命”纳入分析，自然也无法从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中得出任何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初步分析这两场“文化革命”的异同，从中提出一些供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一、苏联的“文化革命”：“文化专制”加“文化进步”

２０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主张是左翼还是右翼——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启蒙大众来提升民众的素质，进而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整合社会。政治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认知视为底层民众应当接受的样板，在俄共（布）党内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左翼“前进派”高度强调，在政治和社会转变之后，文化的转型必须立即跟进。“前进派”的领导人阿列克桑德·波哥达诺夫主张，革命成功之后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新文化应当有全新的艺术、文学、生活习惯和伦理，那时侯文化领域要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掌权。〔５〕

“文化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来。而俄共（布）的主流势力，比如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文化其实是超越阶级的，俄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落后，而不是把文化“无产阶级化”。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３年，在列宁生命的晚期，他还在文章中强调，推动文化的进步应当包括克服农民社会的落后性、培养讲究卫生和效率的习惯、破除对科学技术的迷信。〔６〕

在斯大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这个词在俄共（布）的话语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准确定义的比喻。

１９２８年斯大林发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该词的英译是 great breakthrough in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国读者或许会由此联想到毛泽东１９５８年提出的类似口号)，“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斯大林出于其政治目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采纳了俄共（布）“前进派”的激进主张。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对抗，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在俄文里这个词的原意是“阶级战争”)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来占领教育文化阵地，形成无产阶级的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７〕

因此，苏联在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１年间所推行的“文化革命”，并不单纯是列宁主张的那种“文化进步运动”，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为实现当局的“文化专制”服务。

由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依赖于思想专制，因此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政治观念都被视为“异端”，而任何不愿意充当执政党“应声虫”的人都被看作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导致苏共当局对“十月革命”后仍然留在专业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对共产党不能彻底控制教育文化领域耿耿于怀。这种情境下，借推行“文化革命”政策而实现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似乎是这种制度的必经之途。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成为专家，成为自己事业的主人”〔８〕；他强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管好自己的国家”。〔９〕

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经常本着良知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希望共产党能纠正一些不应发生的错误。哪怕这类批评有时只不过是私下里传播的微词贬语，在极权国家里，这仍然被当局视为对极权主义政党与领袖之权威及正确性的挑战。回顾苏联“文化革命”的

历史背景，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强制型农业集体化导致农民的反抗和农村的大范围饥馑，最后导致数百万农民饥饿而死〔１０〕；同时，快速工业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１１〕。对自身错误极为敏感的苏联当局，自然不愿意再听到任何“杂音”，即便是真话、实话也会令自诩“永远正确”的苏共感到难堪。当然，消灭“杂音”要另找理由，于是就有了用“阶级斗争”作借口来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苏联的“文化革命”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骤。首先，当局精心组织了一些公开的政治性审判，如１９２８年的沙赫基审判和１９３０年的“工业党”审判，声称工程师和“资产阶级专家”是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反革命集团”，透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对全国详细报导这些审判过程，形成对非党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强大政治压力，为把这些人从原有岗位上赶下来造舆论；其次，通过大规模的短期培训计划，将工人培养成工程师和企业主管，将农民培养成农业集体化后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的负责人，将忠于共产党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艺术团体和研究机构。随后，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大批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被迫离开原职，而大批共产党支持重用的激进分子占据了大学、研究所、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领导职位。〔１２〕同时，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许多“阶级敌人”的子女被所在学校开除。〔１３〕当局还授意基层的激进分子关闭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当局也发动了提升工人农民文明程度的社会运动，包括培养工农大众建立良好的基本卫生习惯、改进口语中的粗俗俚语、阅读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观看古典歌剧舞剧等。

在苏联“文化革命”的开始阶段，激进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经过苏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宣传教育，１９２０年代后半期的苏联社会里，青年人当中出现了一大批急于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激进分子。“文化革命”开始时，这些青年人冲击中学和大学，把“资产阶级专家”赶出研究机构，袭击教堂，声称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要废除货币、家庭和法律。〔１４〕

尽管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时采纳了俄共（布）早年“前进派”的激进主张，但他走得并不远，一旦政治上达到了“占领教育文化阵地”的目的，斯大林就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１９３１年，斯大林发表了“经济建设的新条件、新任务”这一讲话，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暂告一段落。

苏联的“文化革命”将大量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逐离岗位，以“马克思主义斗士”和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取而代之。斯大林宣布，经过这场运动，大部分沙皇俄国时代留下来的技术精英现在是可以信任的了〔１５〕，从此共产党实现了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１９３２年４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宣布，解散所有现存的文学和艺术家社团，用统一的“全苏文学与艺术家协会”代替。〔１６〕紧接着，斯大林在同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在短短的一年里，二百万农民经过短暂训练走上了集体农庄的管理岗位，而１１万工程师和农业经济学家则被从城市驱逐到乡村去，同时，农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１７〕随后，为了暂时安抚知识分子，斯大林黜降了一些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最活跃的“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时期的应景产物“共产党人科学院”。〔１８〕

二、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异同

１９６６年夏，中国的官方媒体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对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故意曲解。“文化革命”不仅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早有先例，而且中共也在１９５８年正式宣布过“文化革命开始了”。〔１９〕据史而断，毛泽东１９６６年发动的“文革”其实是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１９６０年代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中共的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前新华社就介绍过苏联的“文化革命计划”。〔２０〕建政之初，中共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把斯大林的制度架构和统治手段当作治国“宝典”。所谓的“苏联模式”有一系列施政特点，例如，建立政权之后经过将近１０年的稳定期，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为此需要强制型农业集体化，与此同时实行打击知识分子和普及大众教育的“文化革命”，伴之以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共执政后的政策轨迹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时间与苏联稍有差异。凑巧的是，中共建政后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起始时间恰恰与苏联同步，１９５８年中共首次宣布“文化革命开始了”，正是执政将近１０年之时。

１９５０年代，随着中国的“全盘苏化”，中共把“文化革命”作为“苏联经验”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搬到了中国，但不同阶段对“文化革命”的解释却视政治需要而随时变化。例如，１９５６年1月２４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２１〕

按照这一说法，似乎“文化革命”就不是打击知识分子，而是依靠知识分子了。几个月以后，刘少奇１９５６年9月１５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则把“文化革命”说成是“文化教育”的另一种表达：“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在１２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２２〕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越来越深，对“文化革命”的提法也相应“革命化”了。在１９５８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刘少奇的说法是：“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时他还提出，要“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２３〕这一政策设想基本上是斯大林“文化革命”计划的翻版。

按照中共的最初设计，“文化革命”是“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不甘于屈居“晚辈”赫鲁晓夫之下、急于争当共产主义阵营新领袖的毛泽东求功心切，不择手段，结果他的“大跃进”比苏联的“大跃进”失败得更惨。于是，中共不得不选择休生养息之策，毛泽东也黯然退居“二线”，将烂摊子交给刘少奇等人收拾，中国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疾而终。然而，“文化革命”

这个政治口号和政策设想却一直留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旗帜，试图夺回对政局的绝对控制权，他选择文化领域为突破口〔２４〕，“文化革命”又卷土重来。按照１９６４年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２５〕

在当时的官方话语〔２６〕和一些文人的应景文章〔２７〕中，这场“文化革命”有时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其政策含义与斯大林模式的“文化革命”并无二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这种他们十分熟悉的“文化革命”不仅没有任何抵触，而且积极参与。刘少奇个人对毛泽东掩藏在“文化革命”旗帜背后的真正用心察觉与否，其实无法阻止“文化革命”的发生。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从１９６６年开始刻意换用他那套毛主义的“文革”话语，以区别于以往中共推行的斯大林式“文化革命”，其中最主要的话语就是为党内“大清洗”制造舆论准备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继续革命”等“理论”。１９６９年４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九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专门解释了“文革”的“准备”过程。然而，此报告一字未提中共在１９６６年以前所主张的“文化革命”，仿佛那个“文化革命”从来就未存在过。历史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掩盖了，从此以讹传讹，人们普遍接收了官方的这一说法，仿佛１９６６年发动的“文革”还真是“史无前例”的。

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政策时，可以说是就事论事，达到目的便及时收兵。苏联的“文化革命”结束后，政局仅仅平静了几年，斯大林又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著名的“大清洗”。随着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送上审判台，全国有大批苏共中央委员、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秘密逮捕，送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就象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中所描绘的，人人都害怕秘密警察的黑色轿车停在自己住宅的楼下。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产生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个黑色政治幽默：一个人感到最轻松自在（在俄语中这个词也表示“幸福”）的时刻，是秘密警察来敲门抓人时，发现不是来逮捕自己，那就可以响亮地告诉秘密警察，“你们找错门了，那个人住在隔壁”。

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１９６６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中苏两党及其控制下的极权社会其实有着文化特质上的重大区别，这决定了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苏联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驯化出独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原来是工人、农民，通过速成的专业教育就转行成为专业人士或管理干部。其特点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但与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同，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进步和世界事务缺乏兴趣，而专注于工艺技术方面的小发明，或热衷于落后省分开发、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方面胆大妄为的计划。〔２８〕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自从１９６０年代中共提出“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之后，教育部门对在校大学生和调干生的培养，产生了与苏联“文革”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特质相近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当中的党、团干部又十分典型地集中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色。比如，在他们的个人知识积累当中，理工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官方意识形态教条为主，缺乏人文素养，未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虽有大学学历却对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鲜有认识，政治上自觉扮演“积极分子”的角色，热衷于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甘当“驯服工具”，没有独立思考的兴趣和能力。当“又红又专”的这一代按照年龄阶梯升入权力高层之后，他们的人格缺陷对国家的政治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多数成了共产党技术官僚的中坚，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一代”〔２９〕。统治精英个性、能力上的趋同化，体现在治国方面就表现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僵化保守的政治特征。

以上分析说明，对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政府而言，“文化革命”是极权主义统治彻底控制文化教育领域的必然过程。就此而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绝非偶然，因为“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极权制度内生的、为全面达成极权主义控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当然，毛泽东对１９６６年的“文化革命”之种种操纵设计还有其个人政治动机。

三、提升还是降低社会的文明程度：中苏两党文化特质的体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远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恶劣，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之外，还与中共的文化特质有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中国传承者全盘继承了苏联“导师”们的政治遗产，但却抛弃了苏联“导师”们基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而维持不坠的那种对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尊重，这与中国传承者自己的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

在共产党国家，执政党的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因为极权体制下执政党只允许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活动，它宣称自己的成员“天然”地代表着“先进文化”，因此在贯彻其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的过程中，执政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支配整个社会文明的演变。由于执政党的集权性质和民众自下而上的盲从，其领导集团的文化素质又对社会的文明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中苏两党建政时期领导集团文化素质的差异使得两国“文化革命”对社会的文明演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众所周知，俄共（布）的领导集团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在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过程当中以及“文化革命”之后，苏联当局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希望把工人农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尔乔

亚”的文化层次上去。

在苏联的“文化革命”年代，当局提倡的“文化”包含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低层次的“文化”是基本的卫生习惯，如洗手时要用肥皂，要每天刷牙，不随地吐痰，扫除文盲等。这主要是针对苏联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生活习惯提出来的，旨在消除社会生活中落后与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城镇居民而言的，要求大家注意餐桌上的举止、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对女性的礼貌谦让，还要求大家掌握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知识；第三个层次是礼仪文化，它曾一度被称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化，这包括要保持良好仪态、说话时用语优雅、穿着整洁适当，还要具备一些对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和芭蕾舞等高雅文化的鉴赏能力。总之，苏联当局希望企业管理阶层和新政治精英能达到礼仪文化所要求的水平。〔３０〕

虽然苏联当局排斥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但它对科学本身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尊重。当局对苏联科学院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在“文化革命”和历次政治迫害当中，苏联科学院的制度从未受到冲击，科学院院士的精英和特权地位也一直受到保护。〔３１〕

“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这是苏联“文化革命”后，即１９３０年代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一场社会文明运动的主题。在此笔者抄录一份刊登在１９３６年苏联媒体上的“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１０个问题”〔３２〕，在当时苏联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团体配合共产党的“社会文明教育”宣传中，它很有代表性。

“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十个问题”：

1.能否完整地背诵普希金的一首诗歌？
2.能否说出出莎士比亚的 5 部剧作的名字和主要特点？
3.能否列举非洲的 4 条河流的名称？
4.能否说出你最喜欢的作曲家的名字以及他的 3 首代表性作品？
5.能否列举 5 枚关于苏联汽车的邮票？
6.能否不假思索地用小数报出分数３／８的数值？
7.能否说出上一个赛季最重要的体育比赛以及它们的结果？
8.能否介绍一下上个季度杰出艺术家拍摄的你最喜欢的照片中的 3 幅？
9.您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吗？
10.详细地说一下，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会出现“斯达汉诺夫运动”？

在这１０个问题中，只有最后一个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其他问题都与提升大众的文明程度有关。虽然苏联当局并不要求工人农民都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在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当中，“当一个有文化的人”却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当然，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尽管苏联的极权体制延续了将近７０年，苏联民众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脑教育中，但苏共文化政策的现代文明取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苏联民众在培养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传统。从政治之外的文化

层面上看，苏联民众平均的文明素质并不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国民的水准。这样的文明素质与俄国政治转型的平稳性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作为“革命党”的中共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党，其早年政治领袖当中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纷纷落马，自１９３０年代初期开始，占据领导岗位的党内精英集团成员大多数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多数领导集团成员长期生活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现代文明处于隔离状态。在长期依靠低文化程度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夺取和掌握政权的过程中，中共习惯于打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抬高工农干部，形成了工农干部“老粗”高人一等的党内传统。这种局面自从“延安整风”之后愈发严重了。自中共“七大”开始，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则成了党内至高无上的“君主”，毛泽东的个人文化素质因此对中共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长期以来有“反智”情结和“反文明”情结，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观察他这两个情结的一个样本。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个人卫生习惯上仍然对文明持抗拒态度（如讨厌洗澡、刷牙），自然更谈不上对稍高层次的现代文明的尊重了。毛泽东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让“大老粗”扬眉吐气的话指导国事，于是他领导下的中国就沿着反文明的方向行进。

１９５０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盘苏化”的方针，苏共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观念，那时苏联流行的文明习俗和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里深受欢迎。许多１９５０年代的大中学校学生的外国文学和音乐修养基本上都来自“全盘苏化”时期苏联文化的熏陶。然而，随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彻底失败，他在国际共运阵营里的威信遭到重创，毛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之梦从此破灭。面对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轻慢，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倾全力于中苏论战，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于此时问世。中共尊奉的佛教高僧赵朴初的逢迎之作“某公三哭”（又称“哭三尼”，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经《人民日报》发表后，更是在坊间广泛流传。“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成了妇孺皆知的口号，中苏两国关系从此恶化。在“反修防修”的旗号下，苏联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进的苏共党文化均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

当毛泽东１９６６年把“文化革命”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推向疯狂的颠峰时，中国在文化领域里实际上被引导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仅反对西方的文明，也反对苏联的文明；既反对外国的文化，也反对本国的文明传统。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同时又发展出了一整套现代愚昧来替代文明与文化。正是在这种现代愚昧的支配下，“挥舞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充满了中国古代民间神巫文化色彩的祈祷赞神仪式，挟权力之威席卷１９６０年代的中国大地。

“文化革命”在苏联提升并保持了国民的文明程度，而在中国却降低并毁坏了国民的文明素质。“文革”之后人们批判这场政治运动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文革”的有形破坏上，却较少谈到“文革”的无形破坏。事实上，“文革”对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毁灭性打击，后果深远。

时值“文革”４０周年，回溯这段历史及其影响，令人感慨颇深的是，今日中国国民的文明程度仍然难以追比当年苏联国民的文明水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西方的现代文明里只选取了商品和技术，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仍然持排斥态度。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里，中国社会在疯狂追求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道德和伦理日渐消亡。精英层文明程度的退化和道德堕落尤其触目惊心，物欲、肉欲、权欲成了许多精英的唯一追求，并且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

中国反文明的“文化革命”和缺乏文明熏陶的“革命精英”所留下的这些重创，已经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沉重负担。由此来看，中国的不幸不仅在于无法拥抱苏联式的文明建设，还在于中国式的“文革”不死。消灭文明不难，重建文明却实非易事，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背离文明而走向现代化。如果要问“２０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是否进步了”这个问题，仅从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去评价，恐怕很难回答一个“是”。这是个有关文明兴衰的大题目，中苏两国“文革”的比较研究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假如说，极权主义统治是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难以逃避的噩梦，那么中国的灾难比苏联要严重得多，中国特色的“暴力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将对２１世纪中国的演变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文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涉及“文革”这一研究领域，它同时属于共产党国家文明的比较研究，而后者对认识共产党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作者说明：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宋永毅先生提供了一些中国的史料，特此致谢。

注释：

〔１〕Sheila fitzpatrick.Ed.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928-1931(bloomington, 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
〔２〕China quarterly,no.103 (Sept.,1985),Pp.534-537.
〔３〕Ｉｂｉｄ.，ｐ．５３４。
〔４〕Rod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５〕David l.Hoffmann.Stalinist values:the cultural norms of soviet modernity,1917-194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38.
〔６〕Ｉｂｉｄ，ｐ．３９。
〔７〕出处同注〔１〕，第８－４０页。
〔８〕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１９４５年出版)，第３５４页。
〔９〕出处同上，第３６９页。
〔１０〕参见高王凌的“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１１〕David r.Shearer.Industry,state,and society in stalin's russia,1926-1934.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１２〕出处同注〔１〕。
〔１３〕Sheila fitzpatrick.Everyday stalinism-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8.
〔１４〕出处同注〔１〕。
〔１５〕出处同注〔５〕，第４０页。
〔１６〕Catrioa kelly and david shepherd.Russian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43.
〔１７〕出处同注〔８〕，第４８４页。
〔１８〕出处同注〔１３〕，第１７页。
〔１９〕“文化革命开始了”，《人民日报》社论，１９５８年6月９日。
〔２０〕新华社１９４９年4月１１日报导，“实现苏联文化革命计划，青年团员是积极参加者，卡夫坦诺夫赞扬共青团学术成就”。
〔２１〕“中共党史上的８０句口号：‘文化革命’、‘技术革命’”（ｈｔｔｐ：／／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303/5304/20010608/484747.html).
〔２２〕新华社１９５６年9月１７日报导。
〔２３〕刘少奇，“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１９５８年5月５日），新华社１９５８年5月２７日报导。
〔２４〕新华社报导，“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闭幕，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式”，１９６４年8月１日。
〔２５〕新华社报导，“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６４年１2月３１日。
〔２６〕例如，在新华社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关于“陆定一副总理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讲话，会劳动又会从事文艺活动的人是最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导中，“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是混用的，两者并无区别。
〔２７〕曹禺，“文化大革命万岁”，载１９６４年１0月１７日《人民日报》。
〔２８〕Chris ward,ed.The stalinist dictatorship.London:arnold.P.112.
〔２９〕出处同注〔１３〕，第６页。
〔３０〕出处同注〔１３〕，第８０页。
〔３１〕出处同注〔１３〕，第１０８页。
〔３２〕原载莫斯科的Ｏｇｏｎｙｏｋ（《精神》）杂志，１９３６年第１期第２２页，引自沃尔科夫的文章“文化的概念，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８年：苏维埃的文明化和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Ｖ．Ｖ．Ｖｏｌｋｏｖ，“Kontseptsia kulturnostsy,1935-1938 godei:sovietskaya tsivilizatsia I pofcegnefnostsi stalinskovo vremenyi (conception of cultureness,the years from 1935-1938:soviet civilization and everyday life of stalin's time."Moscow: sotsiologicheskyi dzrurnal (sociological journal),1996,no.1-2,Pp.194-213.V. V.Volkov是俄国圣彼得堡市欧洲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教师。

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宋永毅

把“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作为一篇论文的题目，看起来好像偏离了人们通常对“文革”的认知。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在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后几乎所有悼念刘少奇的文章都称其为“最大的受害者”，同时往往强调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经济政策方面与毛的区别[1]；然而，这些文章对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态度以及他在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往往语焉不详，似乎刘少奇只不过是个“文革”受害者而已。有的论者甚至推断，毛泽东“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刘少奇）相当被动”，“很快又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2]

历史的真相往往十分复杂吊诡。在过去 50 多年里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党内许多人成为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过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识形态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也并无明显区别；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后仍然认同迫害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甚至对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罗瑞卿、邓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杀者临死前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3]，或者“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4]。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十余年后终获正式平反，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如此表白：“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致于纯朴真诚的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5]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并不是因为他抵制“文革”。事实上，无论是他与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刘的悲剧之根源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认定刘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权位，故而绞尽脑汁务必除之而后快。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不声讨清算“文革”的历史罪恶，不去发掘“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毫无意义的一页，中国人也无法彻底告别“文革”时代。笔者想强调的是，追究“文革”的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一、“四清”运动：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预演

1966 年 5 月，当“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 1963 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今天官方论述刘少奇和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看法时大都强调两人之间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认为，“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条件下、有组织的充分发扬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个人专制加无政府主义）对付假想敌人，走向极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这显然过分美化了刘少奇。事实上发动“四清”运动时，毛关于“文革”的设想还处于萌芽状态。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中的真实表现，他不仅跟着毛的“左”调亦步亦趋，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独创；即便毛在 60 年代初就想发动“文革”，刘少奇也未必会加以抵制。考诸史实，毛的“文革”思想与刘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互相影响之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刘少奇对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实有推波助澜之“贡献”。

1963 年 2 月 11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发动“四清”运动，其中 12 日到 13 日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这次会上刘宣称：“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 而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说法却似乎比较温和，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9]

在 2 月 25 日的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0]”刘在中共领导人中首次把防止“蜕化变质”的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种观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意识形态基础。3 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与刘少奇上述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1] 毛不仅把当时的“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2]”，此后又从这一论断出发，延伸出一系列发动“文革”的“理论”观点。

在毛的“文革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刘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调显然启发鼓励了毛。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的立场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加剧了运动的“左”倾倾向，而且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就是刘少奇。1964 年 5 月 15 日到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 6 月 8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13] 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比毛泽东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泽东最初的看法是，有 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向毛汇报“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于是毛改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刘少奇却强调，“三

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 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高度一致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毛、刘在政治观念上高度一致，1964 年 5 月到 6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于 1964 年 8 月 5 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系是相当好的。刘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16]、河北省的“桃园经验”[17]以及天津的“小站经验”[18]。虽然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这三个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是刘少奇。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说这一思路是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19]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20] 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这一经验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绍和传达，无疑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大字报的普遍运用作了铺垫。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1]，到毛泽东在 1967 年 1 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

其次，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是刘少奇总结的“四清”经验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对人的批斗体罚其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手法。“文革”期间，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

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22] 这里提到的“燕飞”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看来它是通过“桃园经验”推广开的。国内有学者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都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23] 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 77,560 人，在城乡共整了 5,327,350 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 5,760 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 276,256 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558,220 人。[24] 毫无疑问，刘少奇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换个角度看，当时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立场似乎还没有刘少奇那么“左”，1965 年 1 月毛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复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错、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毛泽东随后便启用江青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打手。1963 年 11 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不过说了一句“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26] 1964 年 8 月 19 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 月 27 日，毛批示“同意”。9 月 1 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桃园经验”政治上的恶劣性质上文已有叙述，刘少奇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还在于，开了最高领导人利用权力安排夫人参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包括毛泽东在内，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这么做。此例既开，毛泽东欣然从之。1966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与刘少奇批准下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而江青则为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

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知道，1964 年底刘少奇与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过争论。既然刘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泽东还要“左”，毛对刘的不满因何而生？据国内历史学者肖冬连介绍，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 年）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趁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会议没开几天，毛

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里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已经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27]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继续开了下去，从 1964 年 12 月 20 日断断续续地开到 1965 年 1 月 14 日。虽然毛泽东想对刘少奇发难，找碴泄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话被打断、未被邀请出席会议闭幕式之类的借口，所以他就从政治上"挑刺"。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毛泽东先是抓住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断，"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经过毛同意的，而且已经写入下发的中央文件，刘一时不愿意否定自己，便耐着性子辩解，主张"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面对刘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光其火，于是"上纲上线"地开始了对刘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刘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接着批判刘主张的"蹲点"，继之又在 1965 年 1 月 3 日的会议上批判刘的"打歼灭战"和"扎根串连"，最后在 1 月 5 日批了刘少奇的工作队实施"人海战术"，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8]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所批判的这些刘少奇的观点和方法，其实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并大力提倡的。与其说毛是因为与刘有"重大理论分歧"而对刘不满，还不如说是毛因为对刘不满而制造出了这些"重大理论分歧"。更为戏剧化的是，在 1964 年 12 月 28 日下午的会议上，毛还拿出《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兴师问罪：为什么在 12 月 15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给他"言论自由"？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9] 由此可见，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其实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可冒犯的"龙颜"——这才是 1964 年底至 1965 年初毛刘之间突然出现分歧的真正原因。

刘少奇对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1965 年 1 月 13 日下午，刘少奇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 17 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面，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30] 但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31] 毛泽东未能自圆其说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并提倡刘少奇的这些"经验"时，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义"立场？其实，这次的毛刘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独裁者心理，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曾在 1970 年 12 月 28 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 1964 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32]

历史学者高华针对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

而转移，1964 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 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 156 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变。”[33]

二、“文化革命”的由来：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他确实抵制过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吗？一些为刘少奇辩护的书试图引导读者往这个方向去认识。例如，《刘少奇之路》一书写道：“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虽然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从全国各个方面的全局上来看——例如，对文化艺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对党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门等等——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象毛泽东那样严重。就阶级斗争存在的层次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过，在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基层，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对这个‘上面’的认识上，他们的理解却很不一样。毛泽东认为根子可以而且应该挖到中央领导层，即中央内部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却可能只到省、市这样一些层次。[34]”这一说法显然是罔顾历史事实的。

拂去历史资料上的尘封，追溯“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起源、演变以及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领导干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发现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并非毛泽东的个人独创，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推行“文化革命”经验的影响。早在 1954 年，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阳翰笙就提出要学习波兰共产党用“巨大的群众运动”作为“城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强大杠杆”。[35] 刘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其他一些讲话中也一再倡导“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36] 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又说：“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37] 刘少奇讲话后，《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了题为“文化革命开始了”的社论，提出了一系列贯彻刘少奇讲话的方针政策。该社论写道：“在文化革命大进军的行列里，谁是领导者？是要党来领导，还是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说，必须由党来领导。政治是统帅，因为政治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的，是规定整个事业的目标和政策的。任何业务不能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38]

196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和刘仁的信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师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9]”刘少奇完全赞成毛泽东对文化艺术

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1964 年 1 月 3 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 30 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批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紧接着他又指出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有问题："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40] 中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29 日的文件"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 而刘少奇的看法显然比当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说法更"左"更极端，他把几出戏文上纲上线到"影射"和"反党动机"的吓人高度，并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点名批判两位著名的党员作家（《李慧娘》的剧作者孟超和《谢瑶环》的剧作者田汉）。此外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42]"

1964 年 4 月 9 日，刘少奇与外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43]"在 1964 年 6 月 11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当时刘少奇明确表示赞同康生的说法，刘还提出要把这部小说作为"反面材料"，"印给党内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滥觞于"四清运动"。据中共官方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形式的人是当年身兼副总理之职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64 年 12 月 27 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45] 随后陆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文化部的整风，他们主持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5 年 10 月 30 日）"。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扩展延伸，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该报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46] 虽然陆定一和周扬在"文革"中先后被打倒，但他们确实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义，时间上先于毛泽东，而且陆定一和周扬主持起草的这份文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说法非常接近毛后来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论。在中共党史上，陆定一和周扬在产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

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线领导工作，他们于 1966 年 1 月 23 日向全国

批转了中宣部主持领导下起草的这份文化部党委的“汇报提纲”。在“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语：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见，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并非“文革”的反对者，他们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都拥护“文革”，也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手法作了部分“贡献”。不过，在刘、彭、陆等人的心目中，“文革”应该属于思想文化诸领域内的政治清洗，要由他们和各级共产党组织来领导，目的是巩固党的统治，他们自然不认为“文化革命”会清洗到自己头上。上文提到，“四清”时刘少奇对通过残酷斗争式的政治运动来“反修防修”极为热衷。在 1964 年 6 月 11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一起大谈特谈“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刘甚至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 《刘少奇之路》一书称刘少奇把“反修”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限定在“省、市这样一些层次”，这个说法是违背史实的。如果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打击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一目标上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刘少奇认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除此之外，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其他问题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刘少奇在 1966 年 8 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伪命题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这样一个官方说法：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随着刘少奇之子党内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后人的落魄，出现了一些大力美化这条“反动路线”的说法。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自己写的书中借他人之口说：“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49] 由于刘少奇在“文革”发动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赞成的，因此他对“文革”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连刘源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50]

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有过一系列重要“贡献”。从延安时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确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刘少奇都发挥了带头领先的作用。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则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的具体准备。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无任何“抵制”，相反却千方百计地揣摩上意，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刘少奇在位期间，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责任？确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职”吗？

要回答以上问题，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官方话语迷雾所营造出来的几个错觉。一旦史实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过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谜团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错觉之一：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

此说的理由是，刘少奇对毛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过修改意见。在大陆党史和刘少奇研究者的文著里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51] 这一说法本身漏洞颇多。刘少奇建议修改的究竟是什么，是重要文字还是标点符号？若只是建议改动标点符号，无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都无法导出刘少奇反对毛发动的“文革”这一结论；即便是建议改动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断刘反对发动“文革”，因为还存在着把文字改得更激烈这种可能性。这一说法实际上是用一种含糊不清、事实不明的话语，把一种无法证实的意向当做真实行动来美化刘少奇的形像。

当时会议亲历者的回忆表明，上述说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 1966 年 5 月 4 日到 26 日期间召开的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5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 5 月 16 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 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录也从没有任何关于刘少奇反对“五·一六通知”的记载。[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泽东于 1966 年 4、5 月间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定罪。彭、罗、陆、杨四人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班底还是刘当年领导北方局时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刘提拔倚重的亲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垮台，使毛泽东得以控制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和中央办公厅。刘少奇对此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却积极配合毛的部署，采取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的态度。据李雪峰回忆，1966 年 4 月 19 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 3 月 16 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

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54] 刘少奇“点名”某人为“反党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刘点名抛出来的大概就包括他的亲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会见时刘少奇告诉这位越共领导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其问题已经解决了。[55] 当时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朱德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因而被中央责令检讨，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

从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案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态度。在这个座谈会上刘少奇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56]

毛泽东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难道刘少奇竟然会毫无觉察？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于5月18日作了发言，大谈“政变经”，李雪峰和与会代表当时便知道矛头指向了刘少奇：“他（指林彪）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7]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还包括周恩来。[58] 既然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危如累卵，他为什么还积极拥护毛泽东针对他的行动，毫不留情地尖锐批判自己的亲信彭真？了解中共党内政治文化的人其实不难明白，刘这么做，除了表明他仍对毛心存侥幸外，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仅以自己坚决支持“文革”的态度争取求得毛的谅解，还用牺牲别人——包括将他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送进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绞肉机——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幸免。简言之，刘少奇当时的所思所为就是害人保己。

错觉之二：刘少奇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确实以请教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法的不同意见，但毛批评他后，刘便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以臣服姿态赞成并拥护这一提法了。

从1966年5月到7月，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这段

时期内，刘不但在口头上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的“文革”运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59]

在刘邓的一线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无一不是经过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当时定性为“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当时定性为“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当时定性为“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当时定性为“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当时定性为“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当时定性为“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定性为“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定性为“黑帮”）。在上海市，由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的叶以群和王西彦等人。

此外，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 年 5 月 21 日至 7 月 25 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刘、邓、周与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60]”。7 月 2 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 7 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

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自此乌兰夫开始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1]

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错误地以为：上述这些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黑帮人物”是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实，对他们直接下手的是刘邓主持领导的一线中央，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的是各级党委直接操纵的“革命群众”——那时候“四人帮”和“造反派”还未出世呢！

显然，就抓“党内走资派”这一原则而言，毛泽东和刘少奇本来就没有“路线”分歧，只是两人的个人企图不同而已。毛泽东想通过抓“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垮刘少奇；而刘少奇则希望通过打击毛所憎恶的一大批党内主管教育文艺和宣传的高级干部，保全自己。刘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和“三家村”，就能满足毛泽东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借此混战而得以脱身。

错觉之三：“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运动展开？

时下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62]，这显然违背了史实。

在“文革”运动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发动“文革”一直持肯定态度。例如，1966 年 7 月 2 日，经毛批准，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 号文件）。该文件提到：“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1966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中发[66]378 号文件）也提到：“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 事实上，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领导下级单位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惯例。“文革”初期最早派出的两个工作组——以陈伯达为首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以张承先为队长的北大工作组都是毛泽东同意和赞成的。[64] 所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时说：“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认为：“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 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 6 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 1966 年 6 月 20 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

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 17 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 1966 年 6 月 7 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66]

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整肃干部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之外，还表现出了他领导下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67] 1966 年“文革”爆发时全国有 1 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刘少奇划定的 1%的“右派指标”（在实践中打击范围一定会扩大），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 24 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 10,211 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 2,591 个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68] 由此可见，刘少奇在残酷迫害无辜群众这一点上丝毫不逊于毛泽东。

刘少奇派工作组抓“右派”这一做法其实是毛 1957 年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之翻版，何况事先获得毛的允准。因此，当毛 1966 年夏从外地回到北京，然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时，刘明显不服，认为是毛出尔反尔，以致于两人当面发生了争执。其实，无论刘是否同意毛的主张，是否派出工作组，也无论他怎样前倨后恭、小心谨慎，甚至以牺牲亲信同僚的政治生命来讨毛的欢心，毛泽东都会寻找借口把他打倒。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文革”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托刘“相机处理运动问题[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毛就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同样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对抗文化革命”。当刘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各学校针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师生大玩毛泽东 1957 年“引蛇出洞”的“阳谋”游戏时，毛泽东正等着与刘少奇玩一个更大的“引蛇出洞”游戏。当时的局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以说，刘少奇自始至终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输家。

考诸历史，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革”初期，刘少奇的决定都报经毛的批准，而那时毛也从未提出过与刘少奇的政策主张有所区别的什么“革命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初期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两者是一回事。如果说毛与刘之间有所区别，那就是毛除了支持刘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还有另一套策划，即躲在刘的背后，一面为倒刘预作准备，一面等着抓刘的“辫子”；而刘站在前台，既无法也无力抵抗毛的“暗算”。至于毛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如何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其

实是不难看清的。中国大陆专门研究刘少奇的黄峥对此也有同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张。”[70] 现在，刘少奇之子把当年刘邓的“文革”路线说成“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刻意美化刘少奇、夸大和制造他与毛泽东政治上的“分歧”的天方夜谭。

历史的真相是，“文革”初起，毛泽东发现刘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后，于 1966 年 7 月 18 日回到北京，出尔反尔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指导“文革”的运动方式，仿佛毛本人从来不知道、也从未同意过派工作组一事。1966 年 8 月 4 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刘搞突然袭击，指责他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当时未能按捺住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曾冲口而说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71] 第二天毛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此，刘少奇被赶出了中央一线的领导位置，开始了漫长的软禁、批斗、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应当指出的是，刘少奇直到毛泽东直接攻击自己、个人生存受到威胁时，才开始有一点不满言论（此仅见于史学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属的回忆）和辩解。然而，在毛的压力下，刘每每按照毛无理攻击他的调子做“检查”，从大量现存史料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刘少奇对毛泽东作“抵制”、“反抗”和“抗争”的证据。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违心地做检查呢？难道他们真认为自己错了吗？抑或只是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这样问：刘少奇明知毛泽东要整垮自己，为什么不联合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抗抵制呢？

笔者以为，这些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作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之地位以及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他们迅速缴械认错的最主要原因——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对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泽东捧成半人半神式领袖人物的造神运动，始于延安的“七大”时期，而刘少奇就是这个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到了在 60 年代林彪又把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顶峰。这种造神运动的结局只有一个：造神者们对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无解悖论；在“神”与皈依的信众之间若发生任何对立，其结果只能是信众的认错和臣服。就刘少奇个人而论，他在中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战功和地盘，只是作为毛最忠实的依附者和献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刘本人既无任何政治实力，也无任何精神力量去与毛抗衡。刘在中共党内地位之脆弱诚如毛泽东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当时的高层政治格局而言，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联合其他中央领导共同反抗毛”的念头。

概言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毛泽东在推行“文革”一事上并无所谓的“两条路线”的分歧，刘、邓、彭等人的悲剧其实不过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代版而已。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置他们于死地的现代“君王”恰恰是这些自称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臣子”们主动供奉在“神坛”上的。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起源于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臻成熟。1981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72] 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文革”的发生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过，也不只是其忠实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过；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革”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的“贡献”为最。

本文将被刻意掩藏的刘少奇与“文革”的关系之真相揭橥于世，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高层人物，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革”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本文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分析，澄清了一些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尊奉的神无情抛弃并残杀的悲剧，也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

【注释】

[1] 尽管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但他目睹“人民公社”的祸害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60 年代初，他和党内务实派陈云、周恩来等人通过推行“经济调整”政策，为国家走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作了贡献。

[2] 黄铮，《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5 页。又见刘源的“忠实坦荡昭日月”，载《中华儿女》杂志 1998 年第 10 期。

[3] 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 年），第 213 页。

[4] 袁鹰，“玉碎”，载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 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 年，第 3 卷），第 128 页。

[5] 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载香港《开放》杂志，2003 年 5 月号。

[6] 郑谦、刘波，《刘少奇之路》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年），第 1334 页。

[7] 刘源、何家栋，“可贵的尝试”，载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 年），第 79-80 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571 页。

[9]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2-33 页。

[10] 出处同上，第 32 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92-293 页。

[12] 见中共中央[63]347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13] 肖东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 年），第 1055-1056 页。

[14] “1964 年 7 月 21 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见郭德宏、林小波的 《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32 页。

[15] 出处同注[13]，第 1054-1055 页。

[16] 见“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 年 6 月 23 日。

[17] 见“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 年 9 月 1 日。

[18] 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 年 10 月 24 日。

[19] 这类中央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 年 6 月 25 日）和“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1964 年 11 月 12 日）等。

[20] 分别引自注[16]和注[18]提到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

[21] 出处同注[18]。

[22] “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揭开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1967 年 5 月，第 4 页。

[23] 出处同注[9]，第 348 页。

[24] 罗冰，“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档案解密”。香港：《争鸣》月刊 2006 年 2 月号。

[25] 出处同注[9]，第 276 页。

[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 487-488 页。

[27] 出处同注[13]，第 1102 页。

[2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1117-1130 页。

[29] 出处同注[7]，第 77 页。

[30] 出处同注[6]，第 1126 页。

[31] 出处同注[7]，第 78 页。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173 页。

[33] 高华，“1964-1965 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执”。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 年 4 月号。

[34] 出处同注[6]，第 1335 页。

[35] 阳翰笙，“向波兰人民学习”，原载《人民日报》，1954 年 9 月 27 日。

[36] 原载《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17 日。

[37] 原载《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7 日。

[38] 原载《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9 日。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92-293 页。

[40] 出处同注[13]，第 1084 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47 页。

[42]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 年 9 月。

[43] 出处同上。

[44] 出处同注[13]，第 1054 页。

[45] 出处同注[28]，第 1121 页。

[46]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共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北京：[内部出版]，1987 年），第 653 页。

[47] 出处同上。

[48] 出处同注[13]，第 1056、1060 页。

[49] 刘源，《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第 219 页。

[50] 王光美、刘源等，《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 年），第 241 页。

[51] 冯来刚、鲁彤，《刘少奇在建国后的 20 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11 页。

[52]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612 页。

[53] 见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 年），第 265-270 页。

[54] 出处同注[52]。

[55]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8 页。

[56]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57] 出处同注[52]。

[58] 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59] 这些文件包括，中发[1966]326 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1966 年 6 月 26 日），中发[66]342 号文件“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1966 年 7 月 6 日），中发[66]344 号文件“中央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6 年 7 月 6 日），中发[66]347 号文件“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6 年 7 月 7 日），中发[66]345 号文件“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 年 7 月 8 日），中发[66]353 号文件“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的意见”（1966 年 7 月 11 日），中发[66]363 号文件“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1966 年 7 月 19 日），中发[66]372 号文件“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 年 7 月 21 日），中发[66]374 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1966 年 7 月 21 日）等。

[60] 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纽约：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6 年。

[61] 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 2001 年出版），第 61—62 页。

[62]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63] 毛泽东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69 页。

[64] 1966 年 5 月 30 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65] 见“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1966年5月3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6] 王友琴，“刘少奇和文革暴力”，《民主中国》（美国网络杂志）2003年6月号。

[67] 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第2页。

[68]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撰，《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洛阳：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六兵团”印，1967年)，第56页。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以当时北京有近30万大学生计，按刘下达的指标至少也要打3千名右派。

[69] 王年一，“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载《回首文革》(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69页。

[70] 出处同注[55]，第38页。

[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这里所说的“五不怕”，是指毛泽东过去提倡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72]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

任不寐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一场否定性的巴别塔事件。人类自以为神，并纠集种族在理性和意志的带领下通过合作建造通天塔，这在世界历史上并非罕见。然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理性的自负”之外，仍然拥有完全属于灾民社会的品质。一方面，它不是合作性或肯定性的乌托邦事业，而是内战性或否定性的乌托邦事业；而这一特征与中国的灾民理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文革现象是中国无神论传统、特别是敌基督传统的政治后果：从纯粹信仰角度看，文革不过是长期背逆真理赢得的惩罚；从神学理性上看，文革乃是这种悖逆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与此相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文革是从历史深处出发的，而作为政治现象的文革至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代三年文革不过是三百年文革在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大典。

◇　无神论文革理论研究述评

不仅仅由于北京掌权者对文革研究的限制，也由于汉语思想传统本身的限制，三年文革过去４０年后，文革研究并未获得具有“两希”品质的学术成果。这一时期令人尊敬的学术表现乃是艰苦的材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然而，这些材料至今并未构成文革研究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些材料大部分成为文学抒情、政治指控或道德指控的证据，而在西方，所谓文革研究乃是对这些材料的再整理，理论框架和分析体系仍然是罕见或不能使人满意的。这一点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形成了至为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目前的文革研究主要仍然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吸取灵感，然而却完全过滤掉了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属灵品质；而一旦经过这种无神论处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就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文革研究使法国大革命白白发生了，路易十六再次被砍头，拿破仑再次称帝，而汤玛斯·潘恩的《人权论》再一次战胜了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１〕。

由于中国的文学理性传统，１９７６年以后的文革研究首先进入文学抒情阶段。“伤痕文学”先后经历了“某些人是文革灾民”和“所有人都是受难者或所有人都是文革灾民”这样两个阶段。这个时期大约截止于１９８６年，邓时代的非毛政策半推半就地鼓励了伤痕文学对毛派力量的指控，而一旦指控逐渐涉及制度层面，特别是经过１９８９年政治危机，“伤痕文学”随着文革重新成为研究禁区而终止。事实上早在１９７９年3月１５日，北京就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像的通知”，以控制反思文革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随之而来的时代“忏悔文学”粉墨登场，所有人都是有罪的这种新观念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种就观念分享了文革反思情绪。然而忏悔文学并没有从神学基础上展开，９０年代另外两种思潮的对立撕裂了这种半途而废的文学忏悔。第一种思潮被称为新左派思潮，他们反过来从“文革民主”中看见了抵抗现实不公正的的思想资源。另一派自称为自由派，他们通过借鉴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成果和英美的保守主义理论，强调文革民主乃是多数暴政，是对个人自由及其基础——财产权的粗暴践踏〔２〕。

１９８６年以后国内文革历史整理方面有了一定进展。然而，１９８６年以来的海内外文革研究，在理论上大致未能超越道德指控和苦难记忆的层面。这一点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所言："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每一个档的后面都隐藏着数不尽的血和泪"〔３〕。余赞成毛及所代表的党应该承担文革罪孽的主要责任："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４〕。２００５年6月１８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在北京"三味书屋"的一次演讲中总结说：西方对文革的研究超越了帝王将相史，他把西方的研究分成三派：第一派认为毛发动文革是为了他的社会理想；第二种解释正相反，把文革的发动归因于纯粹的权力斗争；第三种观点居于前两者之间。〔５〕然而这三派的观点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是共同一致的：掌权者承担责任，罪的根据在纯粹世俗领域。

与此相关，问题进而涉及到文革与传统的关系，由此也产生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相信，文革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文革乃是传统文化中的黑暗方面在现代社会的爆炸性呈现。前者如林毓生、杜维明等海外儒家学者，他们持这种亲近传统的立场，他们更愿意把文革理解为对五四的反传统激进主义的回归。一些英语研究者支持这一观念。〔６〕这些分歧焦点在于对中国传统的认知不同。如果不在"两希"文明的参照系之下，或者缺乏希伯来－圣经文化的介入，就无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物件化。换言之，相关评论无法拉开中西文化的距离，也无法分别厘定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空隙。

从经验理性上看，反传统的观点应该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正如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学者所看见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与诸子百家等历史传统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谈到，儒家的人性本善道德万能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法家的强权主义、墨家的平均主义、兵家的诡道等等，都在毛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身说法中，在文革的"以传统反传统"的逻辑中逐一呈现。〔７〕然而这些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同时陷入这样一种困境：既然在中国传统中找不到超越文革精神的资源，他们又不愿意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寻找自由的根据，避免文革悲剧的力量就只剩下五四精神，只剩下"德赛二先生"；而这赤裸裸的"德赛二先生"正是引导法国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领袖"。近年对这种局限作出反应的著述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的观点颇引人瞩目。郜在《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些话》一文中谈到：反思历史不能只审问领袖而放过群众；"文革"研究应该反思整个中国现代文明，至少应该从"五四"开始——"五四"知识份子几乎一致反对或冷淡基督教，人被放到了神的位置；"中国现代文化"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体"，结果文革研究只剩下道德论断。〔８〕不过郜仅仅把五四知识份子放在被告席上不完全公道。从法律上看，毛当然首先在被告席上；其次，五四以前的汉语主流思想一直是反基督教的，而梁启超在这之前就提出了"新人"概念（《少年中国说》），而这个"新人"概念一直是汉语人本思想的最高理想：新人不过是圣人、真人与立地成佛的近代语言。根本没有神，人可以成为神，这不是五四才开始有的东方信念。"文革"中的很多词语都体现了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从来不是现代性的一个命题，而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有了。

我不完全否认新儒家对现代性的指控。然而，一方面，五四以来从西方吸取的“现代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主流思想和文化本源；另一方面，这些西方的非基思潮却仅仅在东方彻底掌握了民众和他们的精英，这种情况就只能在本土寻找答案，确定“差别原因”。共产主义幽灵之所以在中国获得了最为稳定的国家形式，必然因为这里存在它可以茁壮成长的文化土壤。“有灾变无信仰”，是文革精神维系和泛滥的基本处境。

灾变社会为文革消除了世俗障碍。首先，灾民社会骚乱的机会成本较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在社会动乱中所失不多，却可能通过动乱获取身份变迁。计划经济进一步把人民搞得一贫如洗，从而使社会动员更为容易。人们没有财富和政治自由的荣耀，唯一可能获得荣耀方式就是“投身革命”。其次，灾民社会的政治动员具有更多机会主义特征：文革抗议经过了灾民理性精致的算计：与最高权力或与人民权力合作可以极大降低政治风险。这一点使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区别开，在法国，拿破仑是革命的结果，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前提。文革并非完全是一场狂热的激情主义骚乱，无论是对掌权者还是民众，他们更可能是“政治巨人”、“文化李逵”和“激进愤青”面具下面精明的政治灾民。“道德理想国”如果不是逃避责任的谎言，就是故作小儿状的灾民神话。第三、灾民社会的普遍敌意为上面的政治合作规定了否定性方向：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否定成为自我荣耀或牟取利益的唯一路径。灾民的敌人意识一方面源于残酷的生存竞争（包括政治斗争），这种敌意只能通过进一步的你死我活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则因普遍贫困和精神无聊导致了对不平等的极端敏感、不可遏制的仇恨，以及对打破现状追逐任何一点可能变化的热望。然而由于资源的绝对短缺，改变不是向内反省而是改变他人——改造社会的内在动机是重新分配邻居的财产、政治身份，并通过侮辱他人成为他人的上帝；或者为了成为他人的上帝必须侮辱、否定、指摘、消灭他人。

否定性的政治革命同样需要在精神世界自我合理化。假上帝为了否定性目标必须把自己想像为上帝，从而解脱任何内在约束或摆脱真上帝的主权以便为所欲为。基督教信仰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在于将人类的否定性意志完全锁定在内部，指向自我，但无神论将人从这种“捆绑”中释放出来；如撒但所鼓动的，人可以象神一样论断善恶。文革之所以获得了内在良心的援助，乃在于这种无神论自义，由于铲除了上帝这最根本和最后的约束，因否定神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否定人和一切。在这种否定中，每个自我得到了撒但给他们的应许：“可以象神一样”。当然，这种狂妄必然得到了象撒但一样的惩罚：短暂的空中荣耀以后是突然的坠落和永远的羞辱。

无论从灾变论还是从信仰角度看，文革因此并不是一个突发性事件。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的三年文革根植于中国数千年的灾民理性传统和敌基督传统；而清晰可见的，包括文革的动机和目标、动员方式、内战策略、否定性专案等等，都从十七世纪初到今天的三百年中的历次非基运动中表现出来，三年文革不过是这三百年文革的现代总结。一方面，三百年文革为三年文革提供了政治经验；另一方面，三百年文革由于否定了上帝使三年文革中的非上帝暴乱或自我惩罚终于成为可能。这三百年的非上帝事业是这样逐渐发展的：从明末清初３００年的禁教和教案，经２０世纪前５０年的义和团运动、非基运动、到１９４９以后的三自运动、控诉运动、反右派、文革，直至今天逼迫家庭教会的禁教政策，中国三百年多来一直存在

一种针对基督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构成了１９６６年发动的文化革命的文化基础和宗教报应。这三百年的文革历史有一面共同的旗帜，“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徒３：１４）。毛泽东不过是千千万万个非上帝或凶手的代表。文革乃是大大小小的非上帝和凶手互相践踏的内战史。而这一切否定性罪恶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第一个否定：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

◇　从１６１５年到１９４９年

回顾汉语思想反基督教历史并不能给文革的起源提供直接的证据。问题在于，一方面，汉语思想是以文革的经典方式在反基督，或者说，中国人在反对基督教的三百年历史中，奠定了三年文革所有的“指摘技术”。另一方面，中国的敌基督历史扫除了文革罪恶行径最后的精神阻力；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权者及其仆从恰恰为了这一目标而加倍逼迫教会。

１５５３年（１５５２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这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沙勿略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Ｖａｌｉｇｎａｎ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在澳门眺望北方，他的呼喊代表了罗马世界面对中华帝国的焦虑和无奈：“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有耶稣会士更感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９〕

晚明到清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从马礼逊到爱德生，福音在中国逐渐扎根成长。然而，由于教会从来没有在中国取得过相当于它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因此基督教在中国总是处于政治权力的淫威之下。基督教在华存在的这种先天不足，给他的敌人提供了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予以打击的条件——在弱者身上表现权威意志，这切合灾民理性之精要。“景教”的覆没（８４５年唐武宗发布铲除外宗教的诏书），似乎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受难的历史。遗憾的是，在这一连串苦难中，凶手主要是由中国士大夫来担当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诽谤者或告密者，极端的时候，他们就是刽子手。

在这似乎令人费解的名单中，晚明的沈潅和清初的杨光先特别引人瞩目。他们和皇帝一起发动了第一场针对教会的文化革命。１６１５年，沈潅任南京礼部侍郎。这一年５月他向皇帝上奏书要求将传教士与中国信徒判处死刑，这一“檄文”揭开了“南京教案”的序幕。他对基督教的指控为所有指控基督教及政治对手的后来者提供了范本：传教士秘密潜入帝国因此是外来敌人；在儒学经典中找不到基督教的教义，天主教自诩它的道德体系要优于儒学的三纲常伦理；基督教不承认皇帝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否定领袖和精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传教士个人生活堕落，是人民的敌人；男女信徒深夜聚会图谋不轨，更重要的是，信徒画十字是发动革命的暗号……这显然是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诉。这些指控不仅是阴险的，在投皇帝之所不好方面也是精明的。沈潅的“第一张大字报”得到了除了徐光启等人以外的大多明朝知识份子的回应。沈潅胜利了，１６１７年皇帝发布了逐教令。传教士被关进监狱、被驱逐，而信徒被迫害。传教被视为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臭名昭著的魏宗贤为首的“阉党”和沈潅为代表的知识份子结成了同盟。不仅如此，“诗人和

流氓的共谋”还成功地阻止了欧洲对明朝的军事援助，那时候，满人挥师入关已经准备就绪。第一个敌基督的朝代被满人彻底剿灭。〔１０〕

沈漼的系列文章后辑为《破邪集》，于１６３９年再次发表，长期以来，被唯物论知识份子奉为宝典。１６２４年4月１9日，沈漼死了。传教士开始辛苦地在废墟上重新耕耘，汤若望和清顺治帝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标志着这场努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１６５９年，一个声名狼藉的文人开始发动反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政治运动。这个人叫杨光先。“他的观点显示出他是一个充满仇恨的、顽固的，但又思维敏捷的人。”“他声称……他有先知先觉具有预言世间万物的力量。这一点使他在当时北京的女士中间受到普遍欢迎。”（George h. Dunne,1962)这位姚文元加王洪文式的人物首先得到了一位张春桥式的知识份子吴明烜的的支持。吴明烜是钦天监的官员，他因嫉妒毫无根据地指控汤若望（时钦天监监正）几次预报天象失误而受到过惩罚，甚至被判处死刑，由于汤若望的请求才免于死刑。汤若望的宽厚加深了吴明烜的仇恨，他“以他一知半解的天文学知识来支持杨光先。”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杨光先又得到了另外一位林彪－江清式恶人的支持，这就是摄政大臣鳌拜。在鳌拜的支持下，杨光先于１６６４年9月１５日向礼部控告汤若望，罪名是：汤若望的天文历书有错误、传教士以测绘地图的方式反对国家、传教士向人民灌输不良信仰……。其后鳌拜开始逮捕传教士，朝廷开始新一轮禁教运动，教堂被关闭，教士被处死和驱逐，教堂的财产被查收。这些做法直接被后来的现代国家复制在各类“反动分子”身上。

雍正和乾隆年间的信仰禁锢与文字狱事件更为人所熟知。１７２４年雍正诏书产生的严厉政策一直持续到条约时代——《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在羞辱中华帝国的同时开辟了传教的合法性。１9世纪晚期，“进入内地的　传教士历尽艰险，开荒传教士在传教区平均只能存活７年”。“１８７０年６月，天津教案发生。从鸦片战争起，全国发生大小教案４００余起，大部分集中在１9世纪６０－９０年代这３０年中。外国传教士、中国传道人常遭殴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视，房屋、田产遭损失；有的甚至殉道”。〔１１〕在清朝众多殉教的信徒中，一位叫林昭（１８１７－１８５８，贵州人）的女信徒特别引人瞩目。她和２０世纪北京大学另一位女信徒林昭同名而给人印象深刻。两个林昭同样死于无神论专政。——审判第一位林昭的官员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他真诚地相信林昭得了“神经病”。她的死同样是惨烈的。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教案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近年来由于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和相对开放的研究，真相已经开始披露出来。总体上说，在这一整场灾难中，传教士是无辜的。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那些乡民所相信的关于传教士的各种荒唐而恐怖的传闻（教士吃婴儿、剥人皮，挖小孩的眼睛、军事间谍、集体淫乱等等）是从哪里来。显然是当地知识份子编造和提供了这些故事或谣言。他们拥有这种“创作能力”和“艺术想像力”。还有一点，当时的知识份子（特别是所谓的清流党人）为义和团提供了全部的民族主义偏见。这场文革是灾难性的。义和团和官员残杀２３１个洋人；而残杀的中国人数以万计，财产损失巨大；给外国的赔款四亿五千万两。１８９９年春夏间，义和团“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１２〕

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普通中国人死于者场动乱。教会方面的损失不完全统计：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５人，教士４８人，教徒１８０００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１８８人（其中１／３是内地会的教士），教徒５０００人。东正教至少２２２位传道人殉道，平信徒罹难者不可数记。〔１３〕

没有比义和团运动更接近文革：伟大领袖慈禧“错误地领导并发动了这种动乱”以转移政治危机，而在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以后，又出卖了这些农民红卫兵。然而，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知识份子发起却置身事外的一场排外反教运动，知识份子在“庚子事变”这场动乱中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这是一个极其不光彩但却至关重要的角色。天朝还来不及清算这些知识精英就崩溃了，知识份子的傲慢在天朝的背影中继续无限膨胀。

１９１９年5月4日，隐藏在幕后的知识份子终于来到了前台。这时候，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出现了。中国知识份子不得不放弃宋明理学这种反教资源，开始从不同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全部胡说。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和法国的激进知识份子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饥饿状况中总结了欧洲对宗教的历史性偏见，但他可能没想到，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见解在中国拥有了最坚定、最持久和最庞大的信徒——即使到今天，即使那些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学说嗤之以鼻的学术精英，也打算在“鸦片论”和“反映论”面前俯首称臣。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右翼开始帮助他的左派对手：它打算复兴孔教、以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与中共的“卖国主义”（亲苏）争夺民众的掌声。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国共两党及其知识精英，在反宗教这个问题组成了某种“统一战线”，这种“联合”使人想起太监和知识份子在晚明时期的“精诚团结”。于是以“非基运动”命名第三场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文化义和团运动，那些批评义和团为“拳匪”的进步知识份子，现在开始将“拳匪”的未尽事业发扬光大。非基运动为后来的三年文革提供了定型了的语言习惯和述事方式。“非基运动”也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提供的全部思想渊源，它先使国民党１９２８年背叛了基督徒孙中山领导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中国知识份子因此赢得了惩罚，其后在台湾，特别是在大陆，这些非基运动的主干或其继承人，当他们疯狂赶走上帝之后，自身不断沦为恺撒任意践踏的文字奴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精英被从中释放出来，并逐渐掌握了国家成为知识份子的新主人。

“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在１９２２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德（john r-mott)主持，有３２个国家的１４６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１９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

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３月２１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７７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

“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这些大字报与三年文革中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文章如出一辙：“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１４〕

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而４月４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１２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４月９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无兴奋地总结说：“长达６年的非基运动，把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在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和团体，如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知识精英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批评。”〔１５〕

“非基运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２０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１９１８年李大钊、李石曾、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遇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１９２１年他们信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１９２１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３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在这里“坚定的无神论者”恽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钊一样不可忽视，这位作者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１９１５）、《怀疑论》（１９１５）、《论信仰》（１９１７年）、《我的宗教观》（１９２１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１９２６）等“檄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国人自由办理。”

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归功于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民族利己主义思潮。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义——前者提供了科学合法性，后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非基运动是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联合在一起的。１９２１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

，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１９２２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１９２４年4月２２日广州“圣三一事件”使运动从知识界变成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同年８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中国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１２月２５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尖锐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１９２５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和“圣约翰大学事件”，使“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激进化。当时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运动继续高涨，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当时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这一运动，惟恐追之不及，向来文人相轻、党争惨烈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终于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表面上是通过向强大的帝国主义咆哮来完成的，而实际上是通过向软弱无力的在华教会扔石头来实现的。这一壮举事实上也是知识份子发扬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这一实用主义传统的结果。然而这些知识份子没有预料到，几十年以来，从反胡风运动开始，他们加诸于基督徒的所有这些语言暴力和多数暴政，一丝不苟地被新政权加诸己身。换句话说，“非基运动”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宗教的同时也消灭了自由。１９４９年以后，威权主义以最鄙俗的方式站在上帝的位置上，针对教会余民、所有知识份子和党内敌人以及邻居的最后一场文革不可避免。三百年的文化革命必须对后来的三年文化大革命负责——中国人民及其精英自己争取到了文革式的全面专制，也许不该抱怨。

◇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９年

１９４９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教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毛的意见，很多知识份子和民众乐于看到以国家的方式清除“宗教迷信”并占有教会资产。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宗教信仰被彻底消灭了，连它作为宪法的伪饰也不需要了——与此同时，知识份子也被消灭了。不过知识份子在灾难中仍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和发生在宗教界的灾难区别开来，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受到的迫害是冤枉的，而后者是罪有应得。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２０００万人死亡；Ｒ．Ｊ．Ｒｕｍｍｅｌ教授称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居美学者丁抒相信文革死亡人数为两百万人。〔１６〕“文革”后中国知识份子开始从“古拉格”归来，在他们的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读者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故事。——无论经历多少苦难，反宗教这一传统总是一如既往的。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反基督文革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８年

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当局利用三自教会消灭了独立的宗教信仰；最后三自教会也被铲除。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９年为第二阶段，当局利用红卫兵等“群众运动”，表面彻底消灭了基督信仰；最后，被利用完毕的红卫兵群众同样被权力遗弃。三年文革（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发生在这一阶段后期——当真神被弃绝之后，假神以最恬不知耻的方式隆重登场。不过时间不是很久，这位假神、这位万岁在无神论者特有的死亡恐惧中去世，而他的余党，包括自己的妻子，被这个无神论国家关进监狱，逐一悲惨死去。在这２０年的短暂岁月里，围绕逼迫基督教展开了五条历史线索：第一、迫害信仰愈演愈烈；第二、与此同时个人迷信或对毛的假神崇拜愈演愈烈，相应的，大跃进和三年文革是两次逼迫信仰的高潮，因此也是偶像崇拜的高潮；第三、所有与掌权者联合逼迫教会的群众、组织和个人不断被掌权者使用之后所遗弃或迫害，掌权者最后也被“历史”抛弃；第四、在每次大规模逼迫之后都是大规模的灾难，第一次是三年大饥荒，第二次是文革大动乱。第五、基督信仰在逼迫中不断民间化，１９６９年以后，家庭教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复兴。

无神论专政不仅铲除了教会，也铲除了教会史。由于意识形态的恐怖管制，中国当代大陆教会史几乎一篇空白。然而“神有预备”，在海峡对岸，一位叫赵天恩（Jonathan　chao,ph.d)的基督教学者用了毕生的精力保留了这段历史。赵天恩博士也许是为这项事业而出世的，也在完成这个事业之后猝然离去。〔１７〕

按赵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７》一书中的记载，１９４９年中国大陆基督徒应在１５０万人左右。〔１８〕圣经上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歌林多后书　３：１７）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对教会的逼迫不是赶尽杀绝式的；５０年代以前，大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由空间。至今，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仍然怀念那个黄金时代。先秦诸子时代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时代，那时候的言论自由是针对他国事务的，对本国君王只能通过打比方（寓言）进行谏劝。中古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只能自由思想王政以外的问题，或者按王的意思思想、最低不能直接否定假神的意志。但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现独立知识份子的时代，梁启超和胡适，王国维和鲁迅，都是这个时代慷慨给予中国的。然而，１９４９年结束了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是，“新中国”消灭自由的历史恰恰同样是从消灭信仰自由开始的。

１９５０年7月２８日，官方喉舌《天风》刊登了三自革新宣言，假神对真神的战争正式揭开序幕。１９５０　年１２月２９日，政务院通过副总理、中国当代杰出的知识份子代表郭沫若先生《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同时，政务院颁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对教会的抄家、游街和打砸抢、大鸣大放开始，也就是说，１９４９年以后，对教会的第一场文革全面开始。１９５１年2月１２日，由美国津贴３２年的燕京大学被教育部接收（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文、理、法科各系并入北大；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圣约翰、东吴、岭南、华西、金陵、之江、齐鲁等大学先后于１９５１年内由政府接办，２００多所教会中学和１７００多所教会小学也由政府接办。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亦无例外。〔１８〕１９５１年4月１６日至２１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党内知识份子的领袖（如陆定一等）和基督教界内的领袖人物（如吴耀宗等）启动了对“

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教会的“控诉运动”。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社论。党开始通过三自教会发动群众迫害信徒，并在三自运动中对拒绝参加御用教会的信徒强迫政治学习。另一方面，党开始垄断神学教育和出版业。与此同时，到１９５２年底，３５００多外国传教士几乎全部被迫离开中国。

三自运动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革浩劫——可悲的是，整个国家，也就是后来被逐渐全部投入文革的人民及各类精英，即使不是赞助也旁观了这场灾难。这也意味着，第二场、第三场文革的到来不可避免。下列资料多少显示了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基督教人士遭害的况惨：至少５６，０００多人遭监禁，被处决的信徒高达１０，６９０人；更多受害者无法统计。〔１９〕遗憾的是，在９０年代以来海内外文化界令人尊敬地公布文革受害者名单、特别是名人名单的时候，没有一位信徒，更没有教会知名人士。而事实上，在“文革受害者”还是旁观者甚至是施害者的日子了，教会领袖就遭遇了文革灾祸。在胡风和右派分子罹难之前，１９５２年当局秘密逮捕了“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倪柝生，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１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倪柝生有期徒刑１５年。“基督徒聚会处”各地拒绝参加“三自”教会的信徒皆被以“倪柝生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１９５５年８月７日夜，北京逮捕了“基督教会堂”的王明道夫妇及１８位信徒，９月１４日，广州“大马站聚会所”林献羔等人被捕，同样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成员罪名被捕的信徒遍及全国。１９５８年４月王明道被判无期徒刑，妻子被判刑１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林献羔被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与此同时，北京“福音堂”的袁相忱北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在第一次文革中，被捕的著名教会人士还包括上海的谢模善，厦门的袁迪贲等。有罗马背景的天主教界更不能幸免。１９５３年全国逮捕数十起天主教“间谍案”。１９５５年上海主教龚品梅被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摧毁”，许多教友都起来纷纷以文革方式“揭发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２０〕

对生命的杀戮总是伴随着掠夺财产和剥夺自由。文革以后退还教会财产表明，当局承认这是一场国家领导的无视财产权关系和国际准则的违宪抢劫行动。这场文革不仅对教会是一场灾难，对整个国家更是一场灾难：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受到重挫；而在政治逼迫中，在社会动乱和大饥荒中，中国人失去了欧洲人历史上拥有的最后“逃城”：可以到与政权分治的教会机构那里寻求庇护和救助。随后发生的大饥荒赤裸裸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２０、３０年代，中国的历次大饥荒中，教会组织扮演了最重要的赈灾角色。

党通过第一场文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将精神生活绝对地置于权力之下，在这一计划中，信仰自由比言论自由更难以控制并是言论自由的基础，因此，摧毁信仰自由是消灭一切自由的前提。有论者称财产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第一自由，看来党比这些知识份子更清楚什么是第一自由或自由的基础。党取得了初步胜利，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２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八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党通过这个机构成为中国基督徒的凯撒。党从教会的废墟出发，开始征服整个国家的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第二场文革开始了，反右运动和大跃进成为这场文革的政治标签。

第一场文革中的打手三自教会此时成为被打的对象，它与中国５５万知识份子一起沦为帝国的政治渣滓。１９５７年８月，三自教会内部开展反右斗争，各地大部分教会头面人物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劳动改造”。而大约２２３０多教会内的右派分子被处决；〔２１〕数字还不包括随后以“反革命分子”为名受杀害的教会人士。同时，三自教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多传道人转业从事劳动生产。而大量的三自教会开始合并，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宗教的影响。到１９５８年，党利用三自完全摧毁了民间教会之后，又利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基本上摧毁了三自教会。１９４９年，中国有２万间教会及福音堂，１９５８年不到１００间。同时，神学院由３０几间压缩到２间。其他出版社、教会医院、教会大、中、小学校及其他福音机构。未来到１９５９年就早已停顿了。〔２２〕

惩罚马上临到，在第二场文革中变本加厉地硬着颈项的中国法老们，迎面撞在三年大饥荒的“十灾”之中。这场悲剧包含着这样一种悲剧，如此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死亡，至今仍然搞不清楚死难者人数和第一责任者。不过目前通过官方解密的材料可以接受的数位和结论是：至少三千万中国人饿死，而当局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有人甚至根据这些材料推出“准确数目该是４１６５５０００人。〔２３〕值得参考的数字是：仅四川省，１９６０年底比１９５７年全省人口减少１０００万。〔２４〕一位美国学者在分析相关材料后总结说：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is famine was the worst of modern times in terms of the human suffering and excess deaths.yet there has been surprisingly littl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famine.〔２５〕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大饥荒源于大跃进，而大跃进的基本指导精神乃是以人为神，相信人定胜天。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首先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１９５８年底，决策者把预计粮食产量夸大为４２５０亿公斤（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７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１９５８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２０００亿公斤。其次，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人为地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当局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职工人数１９６０年达到５９６９万人，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８６８万人，城镇人口１９６０年达到１３０００万人，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３１２４万人。〔２６〕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１９５７年的１９３１０万人急剧下降到１９５８年的１５４９２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９３．２％下降到７７．８％（《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５页）。与此同时，无偿调拨农业劳力物力。１９５８年秋收未完，抽调农村劳动力３０００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同时减少粮食播种面积。１９５９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１７４，０３４万亩，比１９５８年的１９１４２０万亩下降了９．１％（《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４５－４９页）。最后、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１９５９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６７４亿公斤和４１．６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１９６０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５１０．５亿公斤和２６．５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１９５８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第３９３、４２２页）……而这一切的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乃基于这样的无神论信念：“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２７〕面对十灾，毛这位法

老的反应与埃及法老的反应如出一辙：１９５９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４月２４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指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２８〕

三年大饥荒中法老没有任何悔改，整个党没有悔改，整个国家没有悔改——而且在危机中准备杀人了——１９６２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这意味着，三年大饥荒将毫厘不爽地迎来三年文革“击杀长子”的最后惩罚——整整一代青年“兴起”了，却最后倒闭在“广阔天地”的旷野之中。第三场文革、三百年文革最后（？）的血腥大典、将自己的儿女经火于摩洛的偶像祭坛，已经在红海洋的火焰中被高高举起。

最后的演出之前必须清除宗教最后的残余或羁绊。大跃进期间教会基本瘫痪，聚会也基本被迫停止。仅存的一些主日崇拜中，牧者被严密监视，人身自由被限制，讲章内容受到审查，并要求曲解圣经为政治服务。如当局鼓励孤立地传讲罗马书１３章１－７节，彼得前书2章１３－１７节，因为这些经文强调信徒对掌权者的顺从；此外绝对禁止崇拜中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资讯。１９６０年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要求教牧人员在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中成为“红色牧师”、“红色神父”。〔２９〕６０年以后，幸存的三自会领袖成党的反美工具，他们被组织起来编辑史料全面歪曲中国教会的历史。在“文化革命”前夕，御用教会编写了《解放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参考材料》和《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些资料》两份内部大批判材料，对中国传教史进行了最后的政治清算。

在假神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前，必须在人们心灵中彻底根除对基督的最后一点感情。１９６３年中共突然加大了无神论教育宣传，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在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１９６３年5月9日《人民日报》向中国读者推荐苏联作家写的《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等等。１９６４年4月2日，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在》光明日报》撰文《破除宗教迷信问题》，强调“宗教也是迷信”;“宗教迷信思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存在严重的危害性”。事实上基督教对文化大革命和非上帝的事业存在严重危害性。１９６５年四清运动中，共产党积极发动信徒批判宗教，强迫信徒公开自我批判，毁坏宗教设施、经书等。当时宗教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对宗教进行组织上搞垮、思想上搞臭，进而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３０〕在信仰上，当局正为文革进一步开辟道路。在毁灭信仰的同时，巴别旷野的金牛犊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工了。１９６４年5月,《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据１９６７年底统计，全国共印发3亿5千万册。〔３１〕１９６５年全国纷纷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由于恐惧真理之光复燃，１９７２年4月当局从俄文转译出版了法国无神论者撰写的《袖珍神学》一书，翌年出了第二版，以巩固假神崇拜在精神世界的表面胜利。今天中国很多自由派知识份子仍然深受此书之害。

假神已经被人民膏抹，中国终于迎来了第三场文革的暴风骤雨。三年文革以消灭宗教为起点，以把毛泽东崇拜为神为中点，而以红卫兵被假神抛弃结局。

１９６６年8月“破四旧”运动是文革的开业典礼，而消灭宗教正是“破四旧

”的目的之一；在这里，红卫兵取代了三自会成为撒但的鹰犬。首先，连统战部控制的“宗教事务局”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被撤销。其次，１９６９年８月《红旗》杂志发文重申２０年代“非基运动”的纲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剥削阶级压迫、奴役、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武器，它束缚了把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反抗。科学共产主义和宗教是对立的，为争取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和‘在地球上建立基督之国’是水火不相容的”。最后是斩草除根式的对教会的大逼迫：绝大部分的宗教设施被毁灭、教堂被红卫兵占据，有的改为工厂、仓库和干部办公室、甚至猪圈和畜棚等；圣经和福音书籍被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焚烧，而聚会被绝对禁止；很多信徒（无论官方或民间）被逼迫、抄家、示众、折磨、体罚、监禁和杀害。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三年文革期间基督徒死难方面的准确数字。“资料显示，无论在城市、在农村、在沿海地区，或在内陆省份，基督教神职人员与信徒，或多或少，都因他们的信仰而遭遇残酷的批斗，身、心、灵皆严重受创，至今仍心有余悸”。〔３２〕这场大逼迫或许可通过一些幸存者的回忆见证一斑：

一位女信徒和丈夫被红卫兵绑起来，他们的头发被剃光。红卫兵用枪口对准他们二人的胸膛，而四个女儿被迫站在一条细长的板上，问他们信耶稣还是共产党，孩子们回答要信耶稣，便将大锤打下去，孩子一一仆倒下来。只有十一岁的大儿子，一直与红卫兵顶嘴，被拉到外面，打到牙齿脱落，血管破裂，终于不治而亡……〔３３〕

英国研究者 Anthony　lambert 感慨：“在现代史上，除了北韩和阿尔巴尼亚，中国差不多是唯一在一段时间内关闭全国教堂的国家，以拆堂、焚书、殴打、杀害等方式，全面消灭国内的宗教，置教会于死地，迫使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３４〕

就在真神被凌辱的同时，就在红卫兵用大锤砸扁信徒的女儿的头颅的同时，假神出场了，而手沾鲜血的中国青年潮水般在午门外的刑场上举行偶像崇拜大典。三年文革中，毛泽东的像取代耶稣和十字架挂在教堂里。对毛的个人崇拜无以附加，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中国人民大大救星等等恬不知耻的口号成为民族语文，毛成为偶像、成为绝对真理，成为神。而一切罪恶，都是从假神崇拜中被合理化，并从那里疯狂地扑向全社会和每一个家庭。这就是文革的无神论精神：“以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取代中国现存的宗教，可说是文革的一个主要目标”。〔３５〕

然而假神不是神，它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和说谎的。文革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已经成为文革研究的主要项目。天安门的疯狂刚刚落幕，那些不可一世地占领教堂凌辱信徒的红卫兵群众，也被利用之后流放到“广阔天地”之中。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１９６８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８０００多万人，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３６〕进入７０年代以后，这些被遗弃的政治孤儿开始大规模抗争，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以西双版纳为

焦点抛弃了假神。然而，至今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仍有数十万人。〔３７〕在这场悲剧中，蹂躏信徒女儿的女神遭遇了悲惨的蹂躏。“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按当时的说法，这些色狼统统被称为破坏上山下乡份子”。〔３８〕

红卫兵和知青的命运是令人同情的大悲剧，而且毫无疑问是一场偶像崇拜的大悲剧：毛和革命是大偶像，自己是小偶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后的伤痕文化时代甚至到今天，没有看到一篇专门忏悔自己逼迫信仰的反省文章；他们仍然认为，也许手段过激，但破除迷信仍然是对的。同样遗憾的是，今天的一些文革研究者就是当年焚烧圣经的人，也是今天仍然谈信仰而变色的人。

偶像毕竟不是神的最大确据在这个地方：救星和万万岁都死了，他的追随者也凄惨中打发余生；而教会在逼迫中逐渐复兴。１９６９年以后，公开教会消失了，家庭教会反而逐渐兴旺。“到了文革后期，家庭教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信主的人数大大增加，其中尤以浙江、河南、山东、福建等省的家庭教会，最为兴旺”。〔３９〕文革中被宣布为“为无宗教区”试点的温州，８０年代后奇迹般地涌出几十万信徒，并持续骤增。成为中国的“安提阿”教会，差传打发的传道人遍及全国各地。关于这三年文革和三百年文革的历史总结，早已经启示在圣经里——

关于文革大批判和阶级斗争：“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凸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诗７３：６－９）

关于无神论和为所欲为：“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诗篇１０：４）

关于大跃进和文革崇拜：“有乾旱临到她的众水，就必乾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颠狂。”（耶利米书５０：３８）

关于毛派力量的毁灭和红卫兵的命运：“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以赛亚书２５：11b);"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以赛亚书３０：３）。“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抱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以赛亚书４５：１６）“事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诗篇　１０６：３６）。“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耶利米书１０：８）

关于文革的结束和“伤痕”文学（唉哼文学）：“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以赛亚书４１：２９）“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唉哼。”（耶利米书５１：５２）。

所有教训写在最大的戒命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申命记５：８）“万军之耶和华说，那

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撒迦利亚１３：２）

◇　文革与信仰之冲突

在理性领域，本文的观点并不是：因为毛要发动文革所以刻意毁灭基督信仰。本文的观点乃是：第一，客观真理：因为没有基督信仰，必然发生文革运动；因为文革的所有罪恶都为圣经的戒命所禁止，包括杀人、抢劫、强迫等，特别是偶像崇拜和人的骄傲，为圣经最大的戒命所禁止；因此我相信，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不可能发生文革式的悲剧。第二，主观责任：由于没有对真神的敬畏，一方面人必然“大无畏”，并把自己当神；另一方面，这些假神或每一个假神存在的主要价值是打倒另外所有的假神，并在这种否定运动中谋取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第三、历史责任：为了上述目标，必须进一步毁灭基督在这地上的余民，一方面，所有的独立信仰与毛的个人崇拜及党的极权目标冲突；另一方面，基督信仰毫不妥协地拒绝向任何偶像低头；结果客观上中国因为消灭了信仰自由也消灭了所有自由。

一位当代美国神学者将美国基督徒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归结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因此必然是对自由和真理的威胁。首先共产党是不敬神的，并以领袖、党、人民、民族、国家取代神。这些神从不自我否定，活着的唯一目的是否定别人，并不惮以暴力和杀人来毁灭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尊严。不敬神的结果是不尊重人，不相信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人看作是可以任意处置的动物。事实上不相信神也意味着不相信末日审判，因此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对罪恶的批评，因不相信审判而免除了犯罪的绝对恐惧。无神论者可以为所欲为。共产主义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一味反对权威，仇恨富人、甚至反对父母和家庭，也不重视私人财产。共产党不重视真理，谎言、做假见证成为政治的本质。共产主义鼓励仇恨、制造贫困，极度贪婪却否定获利的正当性。共产党否定原罪，因此不可能建立限制政府。他们不择手段在世界上建立道德王国，他们不容忍任何自由和批评，结果建立了一个一个道德集中营和人间地狱。〔４０〕

本文关注的焦点在这里：我不否认文革是权力之间的冲突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也不否认文革是毛派分子与党的冲突，也不否认文革是所有人与所有人的冲突；我的观点是，这所有的冲突在理性上起源于灾民不可调和的生存战争，而在信仰上根植于人与神的冲突，根植于人的理想狂妄和人的信仰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通过以巴弗案来进一步说明这根本冲突的性质，毛泽东与吴维尊之间的征战展示了文革危机的神圣奥秘。〔４１〕

吴维尊（教名“以巴弗”）生于１９２６年4月，１９４１年5月信主重生。１９４６年秋至１９４９年初，吴维尊在“中华神学院”学习。１９４９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起至１９５７年，吴维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他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的“红豆田”。在“全国人民”和大多数知识份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就说出了今天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当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并每一个人写总结报告时，维尊经过祷告写了一句话：“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

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１９５７年夏天，吴维尊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不久因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自５０年代后期，吴维尊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１９６４年7月３０日，吴维尊被捕。从此，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这一原则他在地狱般的监狱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由于这种坚持，１９６７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不久，妻子与他离婚。

在监狱中，因为争取吃饭谢恩的权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１９７０年9月１０月间，当局对吴维尊再次正式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吃饭前不祷告谢恩；念毛主席语录。他立刻很明确地回答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因为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厌恶的；而人“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１００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７０年代末期，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２００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只剩下吴维尊一人了。但吴维尊坚决不去申诉。８１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将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即再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然而，更惊心动魄的冲突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犬儒世界与基督世界的冲突。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吴维尊“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吴维尊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因此坚决拒绝出狱。１９８７年5月２８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１９６４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１９６４年7月３０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

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吴维尊决定“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８１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出狱后的吴维尊就成了“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１日上午，吴维尊在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住所内安祥离世。

吴维尊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不在于吴维尊主动要与毛泽东征战，正相反，这场冲突之所以是真正的冲突，乃是因为吴维尊根本不想与毛泽东冲突；仅仅是因为他毫不妥协地坚守信仰而被毛视为对自己构成冲突。这种冲突超越了平面上的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抗，而是因为顺从真理不得不在信仰毛泽东还是信仰耶稣之间作出选择。这不再是世界内部的对立，不再是因为世界内部的对立进一步更深刻地对世界之王表示孝顺。这种对立乃是因为自由。这种选择在逻辑上并不造成对任何他人的伤害。但是，这种信仰必然造成对假神事业的威胁。对于所有偶像来说，不在自己金像面前的下跪者就是敌人，而这些在人类社会的直立者将成为文革伪神主义运动的真正障碍。在那些年月里，吴维尊可能是几亿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连犬儒主义的假装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当然暴风骤雨般临到他，但是他不仅不恨这些凶手，还为他们祷告。然而假神事业宁愿要仇恨也不愿意容忍被宽恕——被宽恕意味着自己仍然是有缺陷的，而有缺陷的就不是神。

文革与吴维尊的信仰是完全对立的。在消极方面，为了文革事业必须消灭吴维尊式的信仰；在积极方面，为了使自己成为神必须发动文革——这个神以及所有参与这位假神事业的民众也奢望同时分享假神的荣耀，成为大大小小的神祉——文革假神事业的目的的确不是神圣的，乃是为了可以无所不为、无所顾及地占有别人的财产、地位和心灵。先肯定自己是神，然后实现灾民理想：否定他人并剥夺他们。然而无论是肯定自己是神，还是否定他人是人，都与圣经两条最大的戒命所禁止。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２２：３７－４０）。

文革派首先否定有神，并通过这种否定肯定毛是神。而由于毛是神，跟随者也获得了神的荣耀和权力。假神不是要神的爱，乃是首先要神的权力，其次要神的否定权力——象神一样论断善恶。假神事业是一个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否定有神、肯定自己是神；这个假神可以否定他人；否定他人造成的罪恶感通过进一步肯定自己是神而消除；但自知毕竟不是神而进一步否定神以免除最终审判之大恐惧。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与基督信仰发生冲突。在这世界上存在很多宗教，也有各种哲学，这些观念或者支援和部分支援文革的假神事业，或者漠不关心文革的假神事业，对世界完全置身事外，或者只是某些环节反对文革的假神事业。但是，只有基督信仰是文革的假神事业每一个环节都加以否定，而且是不屑否定的否定，一种绝对之“不!”。这个绝对之“不!”并非为否定而否定，而是为了绝对之“是!”。基督信仰的终点不是“无”，乃是“一”，是一切。“福音不自我解释，也不毛遂自荐；福音不乞求，也不谈判；福音不威胁也不允诺。……然而在基督身上，上帝道出了他的真情，揭露了这个世界上的非上帝的谎言。通过否定我们的现状，上帝肯定了他自己”。〔４２〕

所以不难理解，汉语政治可以容忍甚至利用任何宗教和哲学，但对基督信仰和基督教神学势同水火。毛泽东一直对佛教抱有好感。毛１９５５年3月8日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谈到：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２日毛同班禅谈话中再次重复这一点：“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１９６１年1月２２日毛再次告诉班禅：“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份子”，１９７５年6月毛会见外宾时的谈到：严复和“赫胥黎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毛后来在审阅《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时特别加上这样的批示：“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然，毛的骨子里是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法家哲学的真正信徒。１９６４年8月１８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赞扬庄子：“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人，敲盆而歌。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毛似乎也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与回教建立统一战线，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５日，毛在陕北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宣布：“我们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４３〕

在毛看来，“唯心论”也有“反动的唯心论”和不反动的唯心论之分，因此“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同统一战线”。〔４４〕基督教无疑属于前者。基督教不仅是“人民的鸦片”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更重要的是，基督信仰拒绝接受任何假神崇拜；并宣称任何伟大光荣正确的人都是罪人，并且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早在１９５０年6月6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七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４５〕

毛泽东对基督信仰的敌意不是没有“理由”的。更早在１９２４年，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天主教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以拉丁文编撰的《主教会议条例汇编》第２０１条针对共产主义的兴起就明确提出：“要人们提防那些有害家庭及财产的破

坏性组织，因为他们不是为自由服务，而是实际上导致对全民的奴役”。１９３７年，教宗在《神圣救主》通谕中指责无神论共产主义是人类和家庭的破坏者。教会这些反应获得了当时中国右翼知识份子的好感，但无疑和“左翼文艺”及其大本营延安结下了仇。基督教界一直反对共产主义，因为福音要求尊重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同时反对民族主义。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３１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共产党，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杀戮。

教会最清醒地看到了假神取代真神所造成的人类危机，并预言了乌托邦运动的灾难性前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１９４６年７月任驻华大使。１９４８年全国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称“教会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基督教“承认每个人有绝对的价值，教会应当对剥夺人自由的政治行动提出抗议，对牺牲个人以维护阶级利益的任何残暴提出反抗。”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美国增派大量传教士，“以使中国社会增加与共产主义不相合的精神因素”。中华圣经公会１９４９年动用了１２架次飞机，将总重１００吨的圣经运往即将解放的华中和西南地区。为了便于分散隐蔽，传教士提出教会的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教会进入家庭——这事实上是“家庭教会”产生的最早根据。１９４９年后，梵蒂冈不承认中国政府。公使黎培理在南京反对无神论，１９５１年9月４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其驱逐出境。１９５２年1月１８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公函《开端，我们切愿声明》，称中国发生教难，要求中国信徒信从罗马。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７日，教宗庇护十二世《致中国天主教会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上海主教龚品梅发言“反对总路线”，他说“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４６〕

不容否认，毛镇压基督信仰获得了无神论知识份子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合作。事实上，毛泽东不过是领导三百年文革的精英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而已。儒释道禅哲学一并鼓励人可以成为神，而基督教的原罪观和末世论是对肉身成道的“神圣事业”的绝对侵犯。面对这种外来对神州的真正侵略力量，知识份子中的假神精英一直站在非基运动的前线。当代美国耶稣会士邓恩神父（george h dunne,1905-1998)在分析沈傕的反宗教心理根源时谈到：

“沈傕是官僚主义阶层中的一员。这种官僚体制则是几百年来各种势力相互斗争而产生的结果。……但在理性王国或是宗教领域，人们看到了新的地平线的时候，这个体系则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反动的官僚们时刻提防着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们一直在奋力地维护宋明理学的虚幻的神话。……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官僚们在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上忠诚。而这一套利益是与一套思想体系相联系的。他们则是这一体系的最大收益人。更没有理由怀疑，为了维护这种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他们反对新生事物的内在动机。这一点可以通过事例来证明。一般来说，在学者中，要数通过了秀才考试的年轻人最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们过了第一道关卡，未来的名利与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封闭的教育体制当中。他们是在这个体系中受到薰陶的，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决心捍卫这个制度和他们的优越

地位，由而导致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保守的运动中来。利玛窦起初在肇庆、后来在韶州所遭遇的一些侵扰，大多来自这些年轻秀才的煽动。”〔４７〕

中国知识份子是作为中国人唯一的精神导师（上师帝王，下教百姓）而自我确认的，它不能容忍新的篡夺者，尽管后者可能根本缺乏这种“商业动机”。需要补充的是，面对宗教的挑战，中国士大夫所恐惧的既得利益专案不仅仅是仆从在王权偶像之下的分赃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样重要的是，宗教要剥夺他们“做男人的特权”。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一夫多妻制、童婚制、妇女缠足、祖先崇拜等问题提出了毫不妥协的批判，而显然，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来一直“获益匪浅”。与此相关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千百年来一直把吃喝嫖赌、说谎使诈视为一种“阶级特征”，但传教士们对此提出了规劝和警告。也许宗教在个人道德上的这些“过高要求”，一直是包括今天知识份子在内的中国人反感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反感往往是下意识的或隐蔽的。

由此不难理解，当前文革反思最高的深度到康得、哈耶克和汉娜－阿伦特为止，而在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中，仅仅无神论的部分常被引证。事实上阿伦特对“现代极权主义”的批判，〔４８〕不过是重复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洞见。〔４９〕而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看法，乃是从柏克的相关批评所依据的宗教传统中获取灵感。没有人否认，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是一个基督徒对无神论暴政的忍无可忍。

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开始于“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至今看来仍然只证实了一切都可以被摧毁。“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　极权主义蔑视合法性：“它宣称要使人类自身成为法律的化身。”我们再看看托克维尔怎么说：

（在法国大革命中）不是坏法律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教会自然与所有要废除的古老制度结为一体，毫无疑问，这场革命必当在推翻世俗政权的同时动摇宗教；从那时起，无法说出革新者一旦摆脱了宗教、习俗和法律对人们的想像力所加的一切束缚，他们的精神会被哪些闻所未闻的鲁莽轻率所左右。但是认真研究过国家状况的人本不难预见到，在法国，没有哪种闻所未闻的鲁莽行为不会被尝试，没有哪种暴力不会被容忍。〔４９〕

勒庞揭示了这场“最不人道的革命”乃是基于“乌合之众”的群众心理，〔５０〕但是，勒庞毫不保留地服膺柏克的观点：

大革命中的激进派曾经力图普遍地改造法国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推行户籍身份非宗教化，在最激进的地区掀起了一场毁坏所谓天主教的“外部标志”的风潮，砸烂教堂中的圣物圣像，在圣母教堂前焚烧圣经中君王的模拟像……我们无往而不在服从与受支配之中，虽然现实生活中有上下之别，有治者与被治者之分，但所有人生下来都同样要服从那永恒而先在的伟大法律（上帝、自然之法）……如果人对人的支配都是上帝的安排，那么这种支配就必须受到上帝所给予的永恒法律的制约。〔５１〕

所有文革的研究和反思都抱有这样一种善意：让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能避免文革暴政的伤害。与此相关，“中国能否避免下一次文革”，“文革会不会再发生”，也成为文革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文革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发生，也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领域小规模地发生（到处是形形色色的个人狂妄，到处是形形色色的多数暴力）；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继续任凭自己挣扎于“有灾变无信仰”的沦陷状态中，文革将继续发生，并将作为更为严重的惩罚而超越过去的危害程度。文革一直存在还将继续存在，这种悲观现状与前景更与三年文革之后的反思局限有关。

人们将导致文革暴行的那种现代性思潮视为避免文革的出路。这种现代性思潮就是所谓的启蒙思潮，在“重新启蒙”、“启蒙万岁”的口号下，对中国文革的反省却回到了法国革命的出发点。反省者毫不保留在赞成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５２〕人类的根本问题正相反，人类的愚妄恰恰在于：第一，本是有缺陷的（道德和理性），自己却加之于自己一种成熟状态，一种自以为神的狂妄；第二，这种自以为是目的首先在于成为别人的启蒙者，然后在于攫取被启蒙者的精神崇拜和物质奉献；第三、人类一直成熟地犯罪，但有时候故作不成熟姿态（故做小儿状或与怂恿“小儿”站在“三大革命”的前线），乃是为这犯罪寻找免除责任的藉口。启蒙思想的无知或伪善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宣称要唤醒别人的权利意识。然而，权利意识根本不需要唤醒，这是人的罪性或第二天性；人们有时候放弃权利要求，恰恰是因为他们成熟地进行了理性的盘算而不是因为愚昧无知。第二、宣称要唤醒别人的权利意识的启蒙者，乃是要唤醒别人对自己的权力意识，从知识权力直到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启蒙思想的谬误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事实错误。人类的灾难绝大多数来自人类“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却不愿意“运用自己的谦卑”。第二、真理错误。启蒙的逻辑前提是：启蒙者本身是理智者、是精神导师，但这一智力优势完全是一种自以为是，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理智”的结果。这种智力或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思潮是所有现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基础。事实和真理正相反：人在灵魂上是平等的，在神以下都是蒙昧者；但人有神的形象，但这形象不表现在启蒙别人，乃是顺服真理和爱人如己。悲剧在于，本是瞎眼的却要为别人领路，而其“理智”目标并非自由，乃是不择手段地获取领路人应得的各种回报。权威和食物，无限的权威和无限的食物，这是所有启蒙者打算向被启蒙者或草丛下面的猪索要的全部礼品。

“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口号；这就是文革全部口号的注解。这句口号几乎等于说：“要不理智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事实上，无论怎样运用理智，勇气和理智都无法分辨它所运用的是纯粹理智还是混合勇气的理智、超人意志或非理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勇气所追求的目标同样是利益最大化——权威和无限的权威。托克维尔在另外一个地方精确地反对了这种狂妄：“我本人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东西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我只承认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至于造成危险，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始终是与他的权力相等的”。〔５３〕托克维尔的“上帝”不是一个逻辑假设或先验判断，而是创造者、主权者、审判者和救赎者；他不是存在者，乃是一切存在的原因。托克维尔之所以能认识到这一点，不是因为他有勇

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乃是因为来自启示真理，来自人的“勇气”在绝对真理面前的折服。缺乏在真理面前的谦卑是真正的蒙昧，连基本是非都是无知的，而且善恶不辨，缺乏“分别为圣”的意愿和能力。神是人类唯一的启蒙者。文革继续上演的根本原因是：愚妄人继续做启蒙之神。

无神论是人民的鸦片。启蒙是这鸦片绽开的骄傲之花——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及文化大革命，不过是骄傲之花在灾民或亚灾民沃土中结成的罪恶之果。文革精神的本质就是人的骄傲，就是不知道羞耻。但基督教并只有基督教，是骄傲的葬身之所。道成肉身至少为文革灾民宣明了两条悔改得救之路：第一，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罗马书 １２：３）；人算什么，“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路１：５１）。第二，“不要看任何人为无价值的，因为基督为他（她）而死”。〔５４〕

２００６年3月下旬于蒙特利尔

注释

１．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法国革命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
２．参见朱学勤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３．余英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序，转载美国中文网站“议报”。
４．余英时转引Richard pipes,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new york,1993,第２８１页。
５．徐友渔《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转载美国中文网站“议报”。
６．参见《痛苦的革命：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斗争》Bitter revolution: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拉娜·米特尔 rana mitter著，牛津大学出版社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７．参见胡星斗《文革学研究——文革与诸子百家》一文，转载美国中文网站“议报”。
８．参见部元宝《现在的工作》，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９．（法）沙百里（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中国基督徒史》,,耿生、郑德弟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１０．（意）柯意霖Gianni criveller著,《晚明基督论》，王志成等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１１．参考生命季刊杂志总第十一期 《中国基督教纪事（近、现代部份)》 作者，汉芮。
１２．《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９４页。
１３．参考《生命季刊》杂志总第十一期“中国基督教纪事（近、现代部份)”作者汉芮。《东正教会在义和团事件中的殉道史 》Dionisy pozdnyaev著，陈爱洁译，真理论坛网站。
１４．《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１１期。
１５．“非基运动相隔材料和资料参考《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份子》史静寰、王立新著，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

新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法）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著，耿升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传教士与中国科学》，曹增友著，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中土基督》，郭卫东著，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中国天主教简史》，晏可佳著，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中国基督教简史》姚民权、罗伟虹著，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　，章开沅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吴梓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１８７７—１９２７)》，胡卫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出版。下同。

１５．参见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１９９６年出版。

１６．参见赵天恩相关著述：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华神出版社，１９８３年。Wise as sepents,harmless as doves christians in china tell thee story ，
cmi,1983.洞烛先机——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会评论，中福出版社，１９９３。灵火淬炼——中国大陆教会复兴的秘诀，中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７》，赵天恩、壮婉芳　著，台北中国福音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７．赵天恩《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７》第１６页，参注２９。

１８．同上，第２８－２９页。

１９．同上，参第５３页。

２０．参见《中国天主教简史》晏可佳著，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

２１．赵天恩《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７》，第１０１页。

２２．同上，第１１５页。

２３．参见：《大跃进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作者魏紫丹，原载议报。

２４．李锐《　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　序言，原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七六期。

２５．Ｃｈｉｎａ’Ｓ great famine:introductory remarks,d.Gale johns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

２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页。

２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作者陈东林，原载《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２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８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２０９页。

２９．赵天恩、壮婉芳　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７》，台北：中国福音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３０．同上，第１４２页。

３１．同上，第１４２－１４４页。

３２．同上，第１９９页。

３３．同上，第１９７页。

３４．同上，转引第２０５页。

３５．同上，第１８７页。

３６．参见胡平、徐静《她改变了８０００万知青的命运　》，原载《三月风》２

００３年第８期。
３７.《２０世纪中国全纪录》，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编辑，北峪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３８.《被亵渎的青春——上山下乡女知青惨遭蹂躏录》，作者巴山，转载《议报》。

３９.赵天恩《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７》，第２４５页。
４０.参见《迟延的盼望——基督教与美国文化之探讨》Hope deferred:astudy of christianity and american culture,wright doyle 戴德礼著，沈裕民译。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出版，第２３５－２４４页。
４１.参见《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尊见证、文集》，美国生命出版社２005年出版。下同。
４２.Der romerbief,karl barth,theologische verlag zurich,1922.Logos and pneuma pess,第５４、５６页。
４３.参见《毛泽东论宗教信仰自由》，转子“中国妙音佛法线上”网站、“上海反邪教（７１）协会”网站、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中国人权”网站。
４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第７００页。
４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２２页。
４６.参见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
４７.（美）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余三乐、石容译，《晚明基督会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４８.《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一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著，林骧华译 台北：时报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
４９.《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冯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
５０.Gustave le bon,1841-1931,gustave le bon,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new york,1913.
５１.参见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法国革命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
５２.康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
５３.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
５４.The daily study bible:the gospel of luke,william barclay,1985

四十余年回首看内蒙文革

程惕洁

一、引言

如果史料能逐年积累而非加速流失，人们的观点能百家争鸣而非一言堂，那么，时间差对于恢复民族的历史记忆来说，未必全是坏事。甚至可以说，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审视和深刻理解，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时间距离（比如说远隔四十余年），甚至一定的空间距离（比如说远在美国纽约）。我不敢说这是否是个规律，但起码，这是我此时此刻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做为一代文革经历者，我们已经步入老年早期。纵使当年大名鼎鼎的文革明星，不论观点派系，也大多数烟消云散，其中不少人已经做古。但做为当年内蒙造反派的普通成员，四十年来我时常回忆和反思那场运动，许多人物事件仍然记忆犹新，无法淡化，难以忘怀。特别是我的老朋友，被称为“内蒙聂元梓”的高树华老师，刚刚六十二岁，两年多前含冤去世，壮志未酬，留下许多文稿托我整理加工。他的突然去世，勾起我许多联想。因此，想借此机会，从社会运动和角色互动的观点，对内蒙文革旧事加以梳理，试图总结成几个略带新意的命题和论点，同与会朋友讨论分享。

二、“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交叉互动

这个话题涉及到对内蒙文革的宏观分析，属于所谓“宏观社会学”观察方法。我们都知道，文革发端于毛江“文革左派”同刘邓“走资派”之间的所谓路线斗争，或者说贴了政治标签的权力斗争。在争夺话语权和宣传阵地上，表现为上海《文汇报》同北京《人民日报》之间的较量；在争夺政治领导权方面，则表现在马拉松式的前门饭店会议上（１９６６年5月２１日至7月２５日），连续斗跨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在同一个前门饭店会议上，最后一场斗争围绕着乌兰夫进行，耗时４３天。虽然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后来的文革左派狼狈为奸，给乌兰夫生搬硬套了若干条所谓的“修正主义罪证” （例如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等），但真正打倒乌兰夫及其家族成员的杀手锏，是所谓“民族分裂罪行”，强行制造了一个“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时间（毛泽东反对一切帝修反的歇斯底里高潮）和特殊空间（中蒙中苏边境，国防前沿），中共领导层几乎全体一致给乌兰夫往民族矛盾上拉。因此，官方规定的内蒙文革斗争目标，自始至终有两个东西交叉互动：一个是和全国相同的所谓“反修妨修”；另一个则是边疆特有的所谓“反民族分裂”。前一个比较虚，后一个更具体，更紧迫，更要害。

基于此原因，乌兰夫被斗倒之后，不但失去权力，而且失去自由，被事实上软禁在海军大院。而这一切，发生在文化革命尚未正式开始之前。因此，到６６年６月文革正式开始之前，遭到清算的乌兰夫及其家族和亲信，已经完全成为死老虎，

明摆着的“阶级敌人”。从党政军负责人到普通群众，已经找不到不声讨乌兰夫，不同乌兰夫划清界限的人了。虽然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活动中（１９６６年某月某日）破例开恩，让乌兰夫也陪同上了一次天安门城楼，从而有谣传说毛要保他。但事后证明，那只不过是毛领袖又耍的一次手腕而已。

由于文革开始时，根本不存在公开的“保乌”势力，所以，从六月到九月的三个多月中间，内蒙文革的斗争焦点，主要围绕反不反工作组，反不反本单位的当权派而展开。而工作组和本单位当权派的后台，也不是统治内蒙长达十九年（１９４７－１９６６）的乌兰夫及其亲信，而是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的“反乌功臣”，号称“内蒙左派书记”们。他们以自治区和盟市两级的汉族高干为主，仅有一两名象征性的蒙族干部（例如军区副政委吴涛）。

表面上看，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建立的一年多当中，内蒙文革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起码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院，蒙族同学生多数，明显站在造反派一边，与汉族造反派一起，先反工作组的镇压，接着反自治区党委的“资反路线”，又反“二月逆流”，最后迎来毛周主持制定的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八条决定，即所谓“红八条”，正式承认了以呼三司为主的内蒙造反派的“正确性”。

但是，从中央煞费苦心地筹备内蒙革委会，到仓促决定头脑简单、对民族政策毫无知识的滕海清出任一把手，到迅速调派２７军和６９军进驻内蒙战略要地等等一系列动作，不难看出在所谓“路线斗争”的背后，仍然深藏着中共决策层的心腹大患——民族斗争，或者所谓的“民族分裂危险”。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所谓“反修防修”“反对民族分裂”等等耸人听闻的斗争口号，和“阶级斗争为纲”一样荒唐可笑，都是毛泽东这个新时代的唐吉柯德，向历史车轮发起的挑战。果然，从后来披露的历史资料看，滕海清在北京接受圣旨，快速空降内蒙时，是带着深刻的民族偏见而来的。偏见的根源既有他个人的粗暴和无知，更有中共高曾对他的面授机宜。因此，他内心从来没有信任过任何一个蒙古人，就连他的老搭档吴涛将军也不例外。

滕海清的偏见无知，加上中共高层（毛、林、周、康、江、谢等）对内蒙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坚持误导，基本上种下了后来走火入魔的“内人党冤案”的祸根，为一系列错误奠定了基调。至于那些枝节性的诱发事件，例如从２０６专案的沉渣泛起，乌兰巴干个人讲述的演绎故事，到“群专”逼供信打出来的种种所谓“确凿证据”等等，统统都是“民族斗争”路线主导下的必然结果。

如果按照官方十年文革的时间划分，“内人党”冤案肯定属于文革的内容，但是，如果按照刘国凯的三年文革论，那么，“内人党”案件基本上发生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１９６７年１１月）之后到中共九大召开（１９６９年４月）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虽然从时间上勉强可以归入文革阶段，但同群众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那场迫害蒙族同胞的大疯狂，基本上是中央到地方，从军外到军内，从政府各部门到基层厂矿、部队、单位、学校、农村牧区，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的国家政权行为，跟文化革命中典型的群众运动没有什么共同特征。表面上看，似乎也有群众参加，有标语口号，有批斗会，有隔离审查等等，但是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派性的介入。因为有滕办和革委会核心小组的直接指挥，因此它应该属于“领导运

动”而不是“群众运动”，是“领导闹事”不是“群众闹事”。当然，毛泽东批评“扩大化”之后，受害者大批上访告状，才真正出现了短时间的群众闹事和无政府主义。那属于“内人党”运动的后遗症，不是冤案本身。

官方的文革史，往往将文革期间的种种怀事，一股脑儿推给红卫兵和造反派，而且还简单地把红卫兵等同于造反派，于是在没有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当中，制造了许多时间、观念和事实上的混乱。挖“内人党”这件事也不例外。即使图们和祝东力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也有抹黑造反派的痕迹，虽然当年的图们，也属于内蒙军区造反派的一员。那么，究竟有没有造反派，充当挖“内人党”的打手和急先锋呢？当然有，比如内蒙军区造反派头头马殿元，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他不但坚决主张和即将参与军区政治部的挖肃，而且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打人。当造反派老战友高树华当面批评他搞“逼供信”之后，他还反骂高是“右倾保守”，“同情坏人”。运动后期，马因为手上有血债，被送到石家庄高级步校隔离审查，据说因精神失常而跳楼自杀。但我认为，马殿元的例子只是个案。既非造反派的组织行为，也非造反派头头的普遍现象。反之，就我接触的情况，多数造反派，都对挖“内人党”的走火入魔，表示怀疑、反感，甚至公然对抗。特别是那些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人。例如内蒙党委“红旗造反团”的那松巴雅尔和白彦太，分别成为内蒙革委会常委和委员。在第一个“内人党徒”特古斯被揪出之后，他俩就公开在会上发言，表示“特古斯是革委会委员”，不经司法程序而任意逮捕，破坏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威信和工作成效。结果，他们的发言被滕海青打断，后来怀疑他们也有内人党嫌疑。其他进入常委会的造反派领袖，例如高树华、王金保、王志友等，也对内人党案表示过疑义。但是，恰恰因为内人党案件是一道圣旨，任何人也阻挡不住。再加上，真正的实权并不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因此，他们的声音才微不足道。假如挖肃运动不是党政军系统的有组织行为，而是群众运动的自发活动，肯定会触发严重的派系斗争，既有造反和保守两派的分化，也会有以民族成员为标准的观点分化。可惜，在整个挖肃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分化。

这里顺便谈谈“内人党”冤案造成的伤亡人数问题。汇集我目前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１，第一种说法来自官方，是图门、祝东力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３４万６千多人受到关押迫害，１万２千２百２２人被迫害致死。另有８万７千１８０多人致残。

２，第二种说法来自反对派运动。例如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学者巴赫认为：逮捕关押了８０万人，多达５０万人致残，５万人被拷打迫害致死。

３，第三种说法，来自于半官方的学术研究机构。根据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中记录，有２万７千９００余人被迫害致死，有１２万多人被迫害致残。但资料没有提到被关押者的总数，相信应该在５０万人以上。

综合三种说法，我个人倾向于第三种，即关押５０余万，致残１２万，死亡两三万。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共官方在披露所谓“黑暗”数字上，向来人为缩小，习惯于遮遮掩掩，例如五八年的右派数字，６０年代饥荒死亡人数等等；第二，而

巴赫先生所说的８０万人被关，５０万人致残的说法，与我当时做为内蒙日报记者所目击的情况有差距，因为当时全自治区的蒙族人口总数才两百多万，８０万人占三分之一还多，似乎比实际情况有夸大；第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现代史研究所，有一批功底扎实，态度严肃的学者（以郝维民为首），他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下功夫，做一番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因此有可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数字。即使这个中间数字，已经占到蒙族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迫害比例之高，在全国是罕见的。

然而，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中共重新启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的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复兴意识开始抬头，海外的蒙族民主运动形成组织，一个货真价实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已经宣布成立多年。总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两条脉络

关于文革的分期问题，我基本同意刘国凯有关“人民文革”的论断，也同意他的“文革三年论”。此处不想过多涉及“人民文革”的定义分歧和相关争论，只想以我对内蒙文革的亲身经历，和以记者身份所广泛接触的资料，来旁证“人民文革”的真实存在，以及它与“官办文革”的交叉互动过程。

我认为，“人民文革”在内蒙不但脉络清晰，而且在短暂的几个月内（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７年四月），几乎曾经扮演群众运动的主导角色。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民文革”，是指在文革大框架之内，有限度捍卫民众自身权益的有组织活动。或者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打者红旗反红旗”。从１９６６年春夏之交到七八月份，各高校的文革主要围绕“保党委保工作组”还是“反党委反工作组”而展开，总体形势是保守派占优势，有组织、有后台，相比之下，造反派只是被动防守、零星孤立、各自为战，其主要精神支柱是不定期发布的“两报一刊”社论和毛领袖的最高指示。这一阶段，仍然以官办文革为主导，人民文革尚成不了气候。

到八九月份，文革由学校发展到社会，一方面是红色恐怖风暴残害所谓黑五类，另一方面是各单位的党委普遍把敢于率先贴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从而制造了社会上的大批冤假错案，为随之而来的造反派大串联提供了土壤。

从九月份开始，三大原因促成造反派由无组织变成有组织：一是批判血统论和资反路线；二是跨单位的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合法化；三是全国范围的免费大串联。虽然中央文件一直把大串联限定在大中专学生中间，但工人和机关干部的大串联仍然数量庞大，无人干涉，我的感觉他们和学生数量相当。短短一两个月，运动初期被党委和积极分子们压制的落后份子、反党嫌疑、黑五类们，迅速组织起来，成为造反派重要力量。其势头之猛，在中共历史上罕见。按照社会学关于群众组织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只要有魅力型领袖，共同的利害关系，阶梯式的权力划分和有效的奖惩制度，一个组织的战斗力就可以长久维持。

内蒙古几大造反派组织的诞生和成长，例如教育系统的呼三司、铁路系统的火车头、军工系统的河西公司“八一八”，文化系统的“鲁迅兵团”，党政系统的“

红旗总部”，部队机关的“红色造反团”等等，都符号社会学总结的这些特征。即使保守派组织“一司”“二司”，“红卫军”“无产者”等等，也符合上述特征，只不过它们的壮大和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背后往往有当权派（特别是王铎和王逸伦）的策划与支持。

从１９６６年冬到１９６７年春的几个月内，呼和浩特地区的党政机关全面瘫痪，就连公安系统，也分成誓不两立的派别，分别办案，各自为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人民文革”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有限的空间。许多有明确诉求目标的跨行业跨地区组织，开始成立并筹备活动。例如上山下乡知青、临时工合同工、复员专业军人、下放农村的工人、铁路工人、石油工人、三线军工企业等八大组织。从宣传材料看，他们大多以自己的行业特征为号召力，强调本系统群众所遭受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公正待遇。到１９６７年春节前后，正当八大组织在北京酝酿成立全国总部的时候，被江青周恩来等断然宣布为非法，其头面人物遭到逮捕。尽管如此，这些系统的造反派们，仍然锲而不舍，各自在本地区坚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组织抗争。以上八大组织的产生和覆灭过程，如果不归类到“人民文革”，我很难想像它们如何被归类到“官办文革”的范围。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人民文革”例证，是震惊中外的“石拐沟煤矿工潮”。发生在１９６９年夏秋之交。当时处于“内人党”平反之后的另一次无政府状态。矿务局革委会在情理过期文件档案时，发现有一份煤炭部文革前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工每人每月增加６元，井上工４元）。但乌兰夫当时以内蒙财政没钱为理由，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消息传开后，全矿五万多职工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因为累计数量庞大（一千几百万），矿革委会不敢做主，于是触发了长时间的罢工潮。据说全矿职工家属特别团结，原来的两派也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并肩战斗。在数万工人和家属昼夜围攻之下，最后革委会主任杨秀（领导干部）和副主任吕华（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签字，而另一位副主任（军代表）拒绝签字。最后款是提了，钱也分了。数万矿工和家人的确痛痛快快过了几天大年。

然而好景不长。中央１９６９年底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到７０年春，利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的机会，军管会对革委会实行突然袭击，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大礼堂，当众逮捕杨秀和吕华。宣布周恩代表党中央来对煤矿工潮的定性：“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主义妖风，是性质及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后来杨、吕二人被判处死刑缓期，补发的款项，再分期从工资中逐渐扣回。

如今回忆那场风潮，我们不得不把它归类到“人民文革”中去。说它是“文革”因为它打着批判刘少奇、乌兰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旗号，要求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说它是“人民的”，就是因为它的利益取向，同中共的利益取向背道而驰，因此最让中共头痛，最让周恩来痛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文革”始终在官方文革的夹缝中生存，只在局部地区或者短暂时间内，展现其影响和力量。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它的存在和意义。因为说到底，在中共一党专政之下，人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政治迷信的最后破除，总要有个缓慢过程。任何质的变化，都需要建立在微小的量变基础上。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应该对“人民文革”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造反派”与“保守派”壁垒分明

内蒙文革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造反派与保守派两个阵营，起码在自治区一级，基本上阵线清晰，壁垒分明。即使个别组织内部，有重组和改名的情况，例如我原来参加的组织叫师院井冈山，属于造反派当中比较激进的一个，后来在本院大造反组织“东纵”的说服下，集体加入他们的大山头。另外，保守派的“抗大兵团”，最后众叛亲离，剩下寥寥几个骨干份子，跑到社会上重组了“无产者”，成为内蒙军区依靠的对象。但总体上说，既没有哪个组织自行分裂为新组织，然后斗得你死我活、互相残杀；也没有哪个组织公开宣布解散，然后投诚到对立组织方面去。

造反与保守的搏斗，可以分四次高潮来观察。

第一次高潮，是六月初的大字报运动，率先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基本上构成了后来的造反派。而用大字报反击“右派进攻”，坚持“保卫党组织”的人，构成后来保守派的骨干。

第二次高潮，是工作组工作队进驻以后，其灭火队的面目逐渐暴露，开始整造反派黑材料的时候。于是爆发反工作组还是保工作组的两派斗争。随着红卫兵和战斗队的成立，两派阵线趋于分明。

第三次高潮，是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屁股坐到保守派一边，对造反派开始武力镇压。这时，围绕拥护还是反对军方，又爆发了更大的派性冲突。 由于军队有武力做后盾，因此保守派空前壮大。

第四次高潮，是中央发布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之后。虽然造反派士气大振，随着中间派和游离派的加入，人数也迅速膨胀。但保守派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马上瓦解。反而在军区的暗中操控下，一度变得更加嚣张，几近疯狂。闹得滕海青无法下飞机，无法吃饭睡觉。只有在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抓捕了几个军区领导人之后，才使形势得到控制。

我至今想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内蒙文革两派的壁垒分明？我能想到的可能原因，大致有这么三条：

一是乌兰夫势力被清除得比较早，也比较彻底。而新的掌权人物相对说来都没有什么盘根错节的传统势力。

二是内蒙与北京地理位置接近，方便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前来串联。首都各大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在呼和浩特常设了联络站，而且也是一边倒地支持以呼三司为首的造反派。

三是中央两报一刊驻内蒙的记者站和联络员，自始至终同呼三司站在一起。他

们经常扮演中央文革派同内蒙造反派之间的联络角色。由于这些原因，内蒙造反派消息比较灵通，头脑也很灵活，基本上步北大清华北航等造反派的后尘，很少犯方向路线方面的错误。而紧跟党委和军区领导人的保守派们，则处处循规蹈矩，按照传统的共产党思维模式办事。而这次文革的发动和进入高潮，恰恰是毛泽东打破传统办事方式的结果，起码是一个“大胆尝试”。所以，保守的领导人和保守的群众落后于形势，继续沿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老皇历，因此屡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就成为必然结果。当然，我们说他们处处被动，仅仅是指从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９年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如果说把历史的进程拉长到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或许保守派并没有错，而是始终坚持了“相信和紧跟顶头上司没错”这个共产党政权下千古不变信条。反倒是造反派被“卸磨杀驴”，充当了另一次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右派上当是上了毛泽东本人“阳谋”的当。而造反派吃亏，是吃了邓小平“反攻倒算”的亏。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当时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恐怕没有谁能料到，毛死之后邓可以翻案，更没有料到邓翻案的实质，并非是用邓的正确，去取代毛的错误。反而是用邓新的错误，取代毛的老错误。此是后话，暂不细说。继续分析内蒙文革中保守和造反两大派别的壁垒分明。这种自始至终的一贯性，起码导致了日后事态发展的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压倒性一边倒，基本上给造反派及其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打了一百分，而给保守派和他们的后台“二王”，以及内蒙军区的将军们打了零分。查遍所有中央八条决议，找不到号召“大联合”的只言片语。而主张两派“斗私批修大联合”，是其后中央处理许多省区两派冲突的重大原则之一。中央在处理内蒙问题上的一边倒态度，对于造反派固然是喜讯，但对受到蒙蔽的保守派群众和广大军人，却是灭顶之灾和晴天霹雳。从而导致了他们顽固而持久的抗争，甚至大闹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到中央对内蒙军区领导人采取隔离措施，才使形势渐趋稳定。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埋下了日后保守派反攻倒算的长远祸根。中央八条下达之初，由于中央文革派，特别是周恩来本人，不但对内蒙造反派全力支持，甚至个人感情上比较偏爱。秉持上意，滕海青到达内蒙之初，做出了若干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的重要决定。例如，追认二月逆流中被解放军枪杀的造反派领袖、师大外语系英四学生韩桐为烈士，由当时的中央内务部（现改为民政部）部长曾山（现任副主席曾庆红的父亲）签署烈士证书；立即逮捕杀人凶手、内蒙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并速审速判柳青死缓两年。另一名被保守派打死的师大外语系俄四学生欧阳儒臣，也被追认为烈士。而打死欧阳的保守派“红卫军”的头头张三林，也被下令逮捕，从快从重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然，在短时间内，这些决定对于稳定内蒙大局起过重要作用，也着实让造反派们高兴过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周毛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抓之后，天地再次翻覆。不但韩桐和欧阳的烈士证书宣布无效，革委会和造反派给韩桐立的墓碑被砸烂，而且杀人兄手也不再是凶手。柳青出狱之后，恢复一切军官待遇，被送到石家庄干休所养老。张三林出狱平反之后，则被复出掌权的王铎、王逸伦看中，提拔到政府当官。原本出身于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张三林，恐怕以前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好事。当然，张三林的发迹，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相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保守派的核心人物，在改革开放年代，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提拔和重用。

如果说，上面所讲的这些个人案例，都仅仅涉及少数头面人物和核心人物，对普通老百姓影响不大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大清查”运动（从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中），则使广大造反派领袖和骨干人物遭受了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从首都造反派的八大领袖（有的说十大领袖）、上海造反派的掌权人物、到各省市、自治区、市地县和公社，各级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尤其是通过三结合进了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们，统统成为清查对象。据说逮捕判刑者数以十万计，开除党政公职者数以百万计，遭到隔离审查、内查外调、需要“说清楚”者总数，则上千万。历时之长，打击面之广，株连人数之众，远远超过文革中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打击和迫害。更何况，十年动乱中，大多数迫害都是中共组织和革委会授意的政府行为（例如“内人党”冤案），属于造反派自发组织的迫害打击行为少之又少。而邓小平复出之后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打击迫害，可是百分百的党和政府行为。

以内蒙为例，虽然上文提到，内蒙造反派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特别小心谨慎，基本上没有让保守派抓到任何致命的把柄，这也成为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个人对内蒙造反派特别信任的原因之一。然而，内蒙造反派并没有因为自身的乾净而逃脱被清算的命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内蒙造反派相对乾净，导致了中央处理内蒙问题时过分偏袒了造反派，过分打击了保守派，反而埋下祸根，造成日后清算造反派时，更加严厉、狠毒，几乎赶尽杀绝。例如：结合进内蒙革委会的那些常委和委员们，郝广德、王志有、李锋、王金保、那顺巴雅尔、贾国泰、李金保等等，无一例外进了班房，最后获致长短不等的刑期。因为从他们身上，难以找到打、砸、抢和个人迫害的具体例证，就找别的藉口抓捕判刑。例如原呼三司司令郝广德，无法以造反派领袖入罪，只好以“破坏军婚”判刑；那顺巴雅尔，以“偷税漏税”判刑。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我的老师和朋友高树华（内蒙师大造反派组织“东纵”领袖）。先是两年多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注意，这是在所谓文革“正式结束”好几年之后），接着是三年多的正式逮捕和准备起诉判刑。但查来查去，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入罪的“罪名”，连“男女关系”方面的稻草也捞不到，检察院认为实在够不上起诉条件，但清查办的领导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办案人员罗织罪名，判他十年。

事有凑巧，正在僵持之中，高树华的一封申诉信，送到胡耀邦的案头。那时，刚刚复出的胡耀邦，正负责全国落实政策的工作。他对高树华这个人印象颇深，因为１９６９年春天中共召开“九大”期间，高树华做为九大代表，和胡耀邦在同一个华北组学习讨论，有过多次私下交谈。胡问高如何看待共青团组织，高因为长期担任团委工作，所以对共青团肯定较多，而且认为应该加强团的工作，以便恢复文革之后的社会秩序。他的观点，正中胡耀邦的下怀。大组讨论会上，高大胆发言，支持胡耀邦当中央委员。他的发言，后来遭到江青的当面训斥，胡当中央委员的事也没有成功。但胡耀邦对内蒙这个造反派青年，留学了深刻印象。

胡耀邦读罢高的申诉材料，立刻给内蒙古书记周惠打电话，怒斥周惠，为什么仅仅因为高是造反派，没有罪行也抓住不放，关押审查五六年，还坚持无罪重判？正是在那段时间，主持落实政策的胡耀邦表示，全国的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的八百万人。胡耀邦说：“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劝你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正是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之下，以

“和稀泥”着称的周惠，才不得不给呼和浩特司法部门下令，让他们“事实求是”，尽快给高树华结案。于是，高树华才以“免于起诉”的判决，最终走出监狱大门。然而，大大小小的邓小平们，对胡耀邦的“宽宏大量”和“怀柔慈悲”并不认同。他们利用手上的权力，千方百计剥夺造反派们的生存空间。高树华出狱之后，被勒令在工厂“劳动改造”，每月只拿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到他去世前的２００４年，生活费刚刚长到１９０元。他为了谋生，不得不下海经商，或者到处打工。虽然他的俄语和文学造诣很深，但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之下，没有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敢于聘任他。长期压抑和处处碰壁之中，终于导致积劳成疾，以６２岁壮年英逝。其他几位造反派领袖的命运也大同小异，例如王金保、李锋、那顺巴雅尔等人，都在遭受牢狱之灾以后，五六十岁含冤去世。

五、“政治立场”与“个人恩怨”微妙平衡

如果说，以上所总结的几个内蒙文革特征（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保守派与造反派等），基本上属于所谓“宏观历史”的考察角度，那么，我想总结的内蒙文革的第五个特征，将从“微观历史”的角度入手，看看个人关系在内蒙文革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

总所周知，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历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日益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开始关注人际交往和关系互动这类“微观”事件，对宏观历史事件的重要影响。因此，我想试用这一方法，专门探讨造反派领袖高树华，和乌兰夫之子力沙克（后改名乌杰）之间的私人关系，及其贯穿于内蒙文革始终的重大影响力。

要到个人关系，其实胡耀邦对高树华案件的干预，也已经带有个人关系的色彩。因为，假如没有高树华和胡耀邦在九大期间的个人交往，没有他们在“共青团”问题上的共同语言，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高树华给胡写信的愿望。即使写了，也不见得胡耀邦会亲自过问；即使过问，也不见得会那么快、那么热心地直接打电话干预。然而，如果深究，高和胡的关系，严格说来，主要还是工作关系，或者说上下级关系。其关系中的私人成分，远没有高树华同力沙克之间，那么深厚持久，那么神秘隐蔽，那么充满戏剧色彩。

力沙克是乌兰夫的三子，原在苏联留学，专业核物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力回到内蒙，１９６２年到师范学院教俄语，和高树华同事，曾经和高分配在同一个单身教工宿舍。由于共同的文学和语言爱好，于是成为朋友。两年之后，力调去参加四清，每月的工资由高送到力的家中。力的母亲云婷是乌兰夫前妻，当时同长子布赫同住。由于经常走动，高有时候也帮助云婷老太太做些家务，因此也和布赫、以及布赫的妻子珠岚等人熟识。前门饭店会议之后，特别是文革风暴一来，乌兰夫家族的成员全部成为黑帮份子，纷纷被软禁、隔离或者正式关押，力沙克也被关进师范学院的牛棚。高树华虽然因为贴第一张大字报而成为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但处境险恶，身世沉浮。直到６６年十月批评资反路线以后，才处境好转，基本控制了师院内部的局面。十一月大串联开始。力沙克通过管理“黑帮队”的外语系学生，要求单独见高树华一面。原来他想求高树华，念私人交情，帮他逃离看管，回上海看看久无音信的妻子杨珍云。

这个棘手的要求，逼迫高树华在政治立场和私人关系之间选择取舍，或者谋求平衡。要知道，内蒙文革爆发以来的许多斗争回合，都围绕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议题：那就是高树华造反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高树华究竟是不是乌兰夫黑帮份子？从院党委到内蒙党委，从工作组到工作队，都一口咬定是，而且突破口就是高树华和力沙克的私人关系，因此一定要把高树华打倒。而支持高树华的造反派也一口咬定否，并反击保守派的攻击，认为那是诬陷高树华，将贴大字报的造反派往黑帮线上生拉硬扯，是政治迫害。

在此关键时刻，如果高树华不念私交，又缺乏政治智慧的话，他肯定会一口回绝力沙克的要求，让他按照“党的政策”或“组织程序”去一级一级递交申请。但高树华的聪明和高尚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虽然也有风险，但基本上稳妥的“私自逃跑”策略：他同力沙克定立约法４章：１，绝对保密，不向任何第三者透露；２，商定好逃跑的路线和方法；３，给力准备好一套伪造的红卫兵证和红卫兵袖章，路上零用的２０元钱；４，第二天夜里，高亲自用自行车带力到火车站，送他上车。并嘱咐他逃出内蒙之后，千万不要再贸然回来。何时安全了，高会派人通知他。

第一次的“逃跑”十分成功。但力没有完全遵守约定的计划。他在上海住了半年，就放松了警惕，到１９６７年夏天，粗心大意地返回内蒙。立刻第二次被抓，受到外语系学生的监管。他再次给高树华写信，要求帮他再“逃跑”回上海，但是遭到高树华的断然拒绝。据高树华自己回忆，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形势已经完全大变，此时的师院，已经不是６６年冬天的无政府状态。自治区一级的革委会筹备组已经成立，高树华是筹备组成员之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逐渐恢复。内蒙师院处于军训阶段，校内有军代表驻守，行政管理和审查比较严格。全国的大串联已经停止，红卫兵证不再有用。

力沙克对高树华拒绝第二次帮忙，很是生气。他可能以为，高树华当时在内蒙的地位如日中天，大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据高自己回忆，其实力完全错估了高的个人能量，更对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懵懂无知。这个时候要求高帮忙，高无论如何难以插手。如果走非法渠道，几乎没有可能。如果循正常渠道，等于公开把高自己挂在乌兰夫的线上，正好证明那些反对高树华的人一贯正确。因为此时，从中央到内蒙，正处在新一轮揭批乌兰夫黑帮的高潮之中。

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乌兰夫家族一一平反，全家人庆贺大难不死。云婷老太太还专门请高树华到他们的新居，与乌兰夫的众子女一同聚餐。１９７５年春，高树华在北京参加四届人大期间，同力沙克（改回原来的名字乌杰）再次重逢。乌杰告诉他，“总理病很重，主席身体也不行了，今后是邓小平主事，到那时一切会好起来。”

高半开玩笑地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可能被划到江青这边，到时候你会不会拉老弟一把？”

乌毫不犹豫地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们都知道你的观点，你不会有什么事的。”

两年以后，高树华被隔离审查。其妻宗馥华投诉无门，想起高和乌１９７５年的谈话，于是趁去北京出差机会，给乌挂个电话，希望能见他一面。乌的答复很勉强。宗于是打消同他见面的念头，再也没有同他联系过。后来还是胡耀邦的电话起了作用。高树华得以恢复自由，枉受五年多牢狱之灾，还丢了公职和党票，成为孑然一身轻的自由职业者。

１９９５年秋，高树华出差期间，偶然与布赫在北京的内蒙宾馆不期而遇。布赫态度友善，拉着高树华想拉几句家常，并且说全家人经常谈到他。乌杰也总想见见高。希望再打电话到宾馆，能和高约个时间。此时，布赫已经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几个贴身保镖，急着催促首长，赶快离开人多眼杂的宾馆大厅。而高树华本人，也没有心思同首长深谈。

高当时的心情是：“这年，我已５４岁，早该‘知天命’了，我不再似当年毛头小子那般幼稚。我深知，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圈子，俗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断续相识多年，我却不沾乌兰夫亲属这个圈子的边，主观客观皆然。…文化大革命，我是乌兰夫黑帮份子、乌兰夫的第五纵队；清查中，我又成了反乌兰夫的罪人。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我已经领教够了，领教得通体透彻，无怨无悔，死也瞑目了。眼下，肥皂泡早已破灭，故事何不赶紧结束。当晚，我断然搬出内蒙宾馆，中止了同乌家这场梦一般的来往。”

通过高树华和乌杰个人恩怨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三条对今后内蒙文革研究不无裨益的特点或者规律：第一是高树华在“政治路线”和“个人恩怨”之间，保持了巧妙的平衡，显示了难得的人性本色。做为造反派领袖，他坚定站在毛路线一边，始终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但做为血性男儿，他并未丧失人性。据我分析，他在决定帮助力沙克“逃跑”的时候，并非没有衡量过风险，当时形势险峻，一旦他的计划泄密，即使仅仅在造反派内部泄密，对他也是巨大的风险甚至灾难。但是，他或许内心深处也不认为力沙克是坏人，或许仅仅出于朋友义气，两肋插刀，总之，最后还是人性占了上风。从高树华的这个事例，使我联想到文革两派与人性多少之间，似乎也有某种联系。由于造反派多数人由文革前受到压制的弱势群体构成，其中不乏所谓调皮捣蛋份子，落后白专份子，和党团组织闹对抗的份子等等，而这些人当中，恰恰包括了许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较有头脑的人。他们虽然也喝了不少狼奶，但相对于喝狼奶更多的那些革干子女，党团员积极份子，他们喝人奶的比例仍然偏高，因此，面对复杂政治局面时，稍微还能做些独立判断。

第二，个人秘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例如高树华的这个秘密，一直深藏不露，只有他和力沙克两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即使他的家人和最亲密的造反派战友，都毫不知情。其保密之成功和彻底，可以从内蒙文革的整个历程得到验证。文革前期的院党委、工作组、工作队、保守派，文革后期的革委会、核心小组、滕海青和高锦明本人，直到师院造反派内部分化出的“揪乌联队”等等，都曾经长期怀疑高树华与力沙克有特殊黑帮关系，而且千方百计要揪出

他这个“乌兰夫的别动队”，但一直没有成功，高的许多造反派战友，私下里也有人曾经怀疑高和力有某种特殊关系，但也仅仅局限于怀疑，从来没有抓到过任何真凭实据。直到高生命后期撰写回忆录，才透露了这段秘辛，再现了这一历史的真实。如果高树华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那恐怕这段历史悬案，将永无澄清的可能。

第三，共产党整人之没有原则和标准。从高的例子不难看出，中共整人手法灵活多变，为所欲为，从来不讲原则和逻辑。要按说，在乌兰夫家族倒霉的时候，你怀疑高树华和力沙克的关系，揪高树华有理。那么，乌兰夫平反之后，就应该承认当初揪高树华是错的，起码高树华没罪。但是，因为他是造反派的头头，必须斗倒斗臭，所以，倒打一耙，给高扣上“迫害反对乌兰夫”的罪名，不管原则逻辑，没有标准尺度。所以高树华自己写道：“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从高树华和力沙克私人关系的小事情，可以进而推展到中共治国安邦的大政策。例如五十年代的“化私为公”和九十年代的“化公为私”，本为性质上绝然相反的两件事。你要肯定前者，就得否定后者，反之亦然。但共产党就能耍赖，偏偏要把两者说成都对，都有理。对此，秦辉教授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转型国家先把老百姓的东西据为国有。假如如今在私有化过程中，用公正的办法解决还好。不但你现在的私有化让人觉得可以接受，当年的国有化也算是有了个交代——当年我是一片好心，为理想而搞的国有化。现在看看国有制效率不行，公平地还产于民，于前于后都不为一己之私嘛。但是，一旦国有财产被看守者悄悄瓜分了，问题就出来了。现在的私有化像是分赃，那么当年的国有化就像是抢劫了。”

总之，一味迷信权力，不讲任何规则、道德与逻辑，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从这方面看，文革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不让讲话，不许争论，只由官方一个声音发言，最终将导致悲剧重演和历史倒退。

文革中湖南“省无联”问题概述

陈益南

〔说明：本人所撰写的《文革中湖南的“省无联”问题概述》一文（刊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５日出版之《华夏文摘》增刊５１５期），因初稿有若干差错，现已修定，并撤消初稿；需参考本文者，请以此定稿为准。——陈益南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５日〕

湖南“省无联”，是文革中一个在全国都有很大名气的群众造反组织，它不仅曾引起毛泽东及中央最高当局的注意、并几次发话评说与批判，而且，至今也是国内外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所重视的一个课题。特别是由于文革中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张玉纲的《我们的纲领》等所谓“新思潮”的理论性文章，三十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所研究，因而，与这些文章密不可分的“省无联”问题，便常常为学界议论探究。

在文革发动４０周年之际，本文对“省无联”组织的情况，特作一个概述，以飨对文革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并供有关研究者参考。从中，也试着将人们对“省无联”情况的某些误解，予以澄清。

（一）目前对“省无联”问题的几点误解

很多年来，人们对“省无联”问题，因大多是凭不全面的、而且往往是历史某些表象的文字材料着眼，从而，致使对文革历史面貌背后的真实、对“省无联”的认识与研究，出现了某些误读。

这些误解主要有：

(1)以为“省无联”是一个严密的组织。

其实，它只是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的一个派系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而其对参入者并无任何约束力；它顶多只是一个力图实现某种相同观点的组织联合起来的临时联盟。“省无联”的另一个显著的组织特点是：它并不吸收、也从未吸收过个人成员参加。

(2)以为《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等文章是“省无联”的理论基础与行动纲领。

其实，杨曦光、张玉纲等人的文章，只是极少数大、中学生红卫兵的个人行为、或小圈子内的思想交流活动，而并不是“省无联”的组织性产物。

(3)以为“省无联”是文革中的一个具有强烈异端思想的社会组织。

其实，“省无联”的性质，基本上仍是与文革中其他的那些群众造反组织无异，也是文革特有的派性活动的产物。虽然，之中也有强烈地介入上层政治的欲望、倾向与行为（如有少数人进行反周恩来活动），也有少数学生产生出一些触及到了某些社会制度方面的激进思想，但是，所谓“路线斗争”观念及其地方化的派性争执，却仍是“省无联”性质的基本主流。

对这些情况，本文将在下面的论述中，予以解说。

（二）“省无联”机构的名称及其特点

“省无联”正确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其简称。这一简称的含义，是“省会”“无联”的意思，而不是“湖南省无联”，更不是“湖南”“省无联”——“省”字在此，是“省会”的地域标称，既不是“湖南省”的概念，更不是组织的冠名。但由于当时当事者说话作报告、写文章、写大字报、刷标语时图省事，就将“省会无联”四字——其实，在开始有一段时间，很多大字报还是这样落款署名四个字的——简缩为“省无联”三个字了。

由此，至后来的人，甚至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都是说湖南“省无联”（如他在１９６８年7月２８日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北师大》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而不知其含义，实应是湖南的“省会无联”。

虽然，作为湖南的省会，长沙市的文革造反运动，的确对全湖南省是有着重要的领导性影响。在１９６６年底成立的一些群众组织，开始还有些动不动就是冠以“湖南省ＸＸＸＸ（组织）司令部”名义，但是，自１９６７年发生中央文革“二·四”批示、镇压全省性的“湘江风雷”组织的事件后，长沙市包括后来“省无联”观点在内的各大型造反派组织，在召开什么大会，成立什么对全省有影响的机构组织时，基本都将自己的组织地位局限于“省会”，而不用或很少用全湖南省的名义了，以防中央对跨地区的全省性组织忌讳，再来个什么不利的批示。如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５日成立的拥有近二十万工人成员的一个最大的造反组织，也只称为“长沙工联”；又如几乎所有长沙市各大造反组织参入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制止武斗指挥部”、“省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六六惨案调查团”等，以及“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ＸＸＸ誓师大会”、“省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赴京汇报团”之类，都是避开了代表“全湖南省”的表面字义。

“省无联”即“省会无联”，也是这种忌讳下的名称，以向中央表明，这是湖南省会的组织机构，而不是全省性的组织机构。

不过，不将自己的组织与活动，冠以全湖南省的名义，这种做法，当时只是造反派们的一种预防性自我保护策略，却并不等于他们不想代表全省说话，或不想在全省范围的大舞台上活动。因此，一个既可预防中央发什么不利于自己的批示、却又能具有一定全省性影响的冠称“省会”，便被长沙市的造反派无师自通地广泛使用了。“省会”虽然就是长沙市，但偏偏不用长沙市冠称，而采用“省会”！这里

面的文章，也许，后来不了解那个环境氛围的人，是看不出其用心的。

当然，在事实上，省会长沙的运动形势必然会波及影响到下面地县，省会刮什么风，下面也就会跟着下什么雨，省会搞什么机构，地县也就会出现相同名称的组织。不过，这些相同名称的组织，当时，除了早期成立的湘江风雷，还稍稍保留了一点长沙总部与地县的组织联系之外（但“二•四”批示后，已没有了对下级组织成立及其负责人的批准权），其他组织，则基本上完全是靠一种共同观点，在维系省会与地县组织的关系了。省会长沙的组织，既不能对地县相同名称的组织发号施令，更没有权力干预地县相同名称组织的人事。

因此，虽然，在长沙的影响下，湖南有些地区，如株洲、邵阳等地也搞起了“无联”，也来人到长沙找过“省无联”的有关人员，但是，那株洲、邵阳等地的“无联”，却绝对不是由“省无联”批准，更不是“省无联”的下属。虽然，后来，这些地区的“无联”组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省无联”问题的牵连，也跟着倒霉，但这只是文革运动“路线　＋派性”斗争中的一般固有特征，而并不就是表明“省无联”与株洲“无联”、邵阳“无联”等是上下级的组织关系。

（三）“省无联”产生、发展的经过及其组织特点

“省无联”成立于何时？

“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即《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公告》）签署日期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１日，但实际上，１０月７日就被公布与公开贴上了街。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成立公告》是在１０月５日上午，在“东方红总部”举行的有２０个当时相同观点的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被确定同意的。因为，会上议定了到１０月１１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所以，《成立公告》便确立为那一天。然而，１０月６日，驻长沙的解放军工程兵学校即总字３４１部队内，持“省无联”观点的３４１部队“红色硬骨头”战斗兵团，与拥护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３４１部队“联委会”之间，发生了武斗，“红色硬骨头”战斗兵团的负责人李长元将这个情况到“东方红总部”通报后，持“省无联”观点的一些组织中人，包括“东方红总部”的“自卫团”，急欲到３４１部队大院内去支持“红色硬骨头”战斗兵团。大概为了以壮声威，以防坚决拥护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长沙工联”出动人马，结果，第二天即１０月７日，原定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１日才能发出的“省无联”《成立公告》传单，就被人提前贴上了大街，公之于众。

“省无联”正式成立的公告，虽然是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但是，其产生的缘由，则还须追朔到　5　个月前，即１９６７年　5　月间。

自当年２月，发生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要湖南省军区镇压了当时湖南全省性的、最大的、有百万之众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事件后，长沙的其他

造反组织，对此却是一直是不服的。因此，他们一方面设法（主要是通过北京的“首都三司”红卫兵）不断地向中央递送申诉材料，力争为“湘江风雷”问题翻案；一方面他们也在暗中不停地活动，反对省军区的镇压，反对省军区欲复活旧体制，重掀湖南的造反浪潮。

到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后，受此社论的鼓舞，长沙造反派的活动强度日益增大。4月7日，以“井冈山红卫兵”为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甚至一举将当时由省军区负责领导的《湖南日报》社给封闭了，不允许报纸出版。而且，省军区对此局面竟也无可奈何，不能贸然动作。

然而，此后不久，长沙市的造反派内部，却产生了策略上的分歧。

以大、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为主体的“高校风雷”、“井冈山”、“红中会”等组织，极力主张立即公开为“湘江风雷”翻案，并要将为“湘江风雷”翻案这一目标，作为当时的第一行动纲领。他们认为，在湖南若不能将“湘江风雷”问题平反，湖南的造反派就始终会直不起腰，因为，省军区给“湘江风雷”所定的罪名，同样也随时适用于、随时会降临到所有的造反派组织的头上。

而以“工联”（即“长沙工联”）为代表的、得到了原省委、市委机关很多干部支持的另一些造反组织负责人，虽然也肯定应该为“湘江风雷”翻案，但因为考虑到镇压“湘江风雷”的“二·四”批示，是由中央文革签署的，这斗争矛头，弄不好会指向中央文革，担心会由此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们主张先批判省军区的其他批压造反派的作为，待时机成熟后，再公开提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问题。

另外，鉴于“湘江风雷”被省军区镇压时，在指控“湘江风雷”的罪名中，有一条就是说它“组织成员复杂”，因此，以长沙市八家大工厂的造反组织为核心、拥有近二十万工人成员的“工联”，对社会上那些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便心存疑虑与戒心，故而对与社会上那些成员混杂的造反组织、特别是对与小造反组织的合作，并不热心，甚至取回避之态。当时，“工联”主要负责人胡勇，在参加了一次于省体委内举行的全市造反组织头头的联席会议后，他便对部下说：“发一个什么声明，开一个什么大会，署名的有七、八十个组织，而之中很多组织，不过十几个、几十个人，表决也算一票，我们‘工联’有十多万人，我们的意见在其中也只占一票，这有什么公平？而将来出了问题，我们都会不知怎么闹出来的，到时事情搞砸了，还不晓得是哪粒老鼠屎，搅坏了这锅汤！因此，今后，这类活动，我再不参加了，我们‘工联’也要少参加。”

“工联”组织的这种观念与态度，显然，也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与一些造反组织之间产生了隔阂。

这些原本非为根本分歧，而基本上是策略方法的差异，以及对群众组织建制与活动形式的不同意见等情况，却成了日后长沙的造反派势力中，分裂出一个“省无联”派的起始直接动因。

这种起始于策略上的分歧，随着湖南文革运动与群众组织派战的升温，并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随有种种个人与各自团体中包括追求名利等等其他因素，致使长沙市的造反派内部，到 7 月左右，在尚未获得正式平反的“湘江风雷”自行恢复了其组织与总部后，便逐渐形成了一个聚集在“湘江风雷”旗下的“湘派”，与另一个集合在“长沙工联”旗下的“工派”。不过，当时这个所谓“湘派”与“工派”，第一，只是事实上在形成与发展、但并无明显的公开旗号；第二，在与省军区及保守组织作斗争的方面，不论“湘派”，还是“工派”，所取立场却还是基本共同一致。

极力推动一批造反组织聚集到“湘江风雷”旗下的始作俑者，主要是大学红卫兵的“高校风雷”，与中学红卫兵的“红中会”和“井冈山”。这几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在向中央呼吁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活动中，曾经是急先锋，更是出过大气力。其中，“高校风雷”还是为表示铁心要为“湘江风雷”问题翻案，在５月时，由一批激进的大学造反派红卫兵特别组建的，所以在其组织名称上，公开套用了“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湘江风雷”组织的全称）的名称，自称“高校风雷挺进纵队”。

由于在对“工联”为“湘江风雷”翻案问题上所采取的稳妥策略不满，“高校风雷”、“红中会”、“井冈山”便经常串联一些其他组织，撇开“工联”为首的“工派”，而单独组织进行一些批判反对省军区及保守派的活动，如在７月间，成立了一个“反武斗指挥部”，就基本是由“湘派”组织搞的，“工派”方面没有介入。又如在８月３日，“湘派”有２３个组织在红色剧院开会，商议了一个“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成立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的问题。甚至有人提议，湖南所有的造反组织，包括“工联”，都集体参加“湘江风雷”，使全湖南省的造反派都统一到“湘江风雷”的旗帜下。

由于“工联”拥有近二十万工人成员，特别是主要的大型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基本都属“工联”旗下，势力强大，已成为了长沙市造反派力量的主要劲旅；而且，当时进行“支左”的解放军驻军，与省、市委机关造反派干部，大部分都倾向支持“工联”作为湖南造反派的旗帜。因为，他们认为，“工联”组织比较“纯”，而“湘江风雷”则因是由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下乡知青、社会街道居民等）混合组成，组织成份相对复杂些。所以，“工联”负责人对“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口号，自然很为反感。于是，长沙市主流造反派中的“湘派”与“工派”，双方矛盾日益扩大。

而到８月初，中央同意为“湘江风雷”平反后，在确定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小组）成员中的群众组织代表名单中，虽然考虑了将“工派”与“湘派”这两方面的头面人物均予纳入，但是，几个原来较有影响的造反组织的代表，如“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却都被排除在外了。省革筹小组的成立，便意味着文革以来湖南省权力的一次极重要的重新分配。然而，在这场权力重新分配的游戏中不能入局，这无疑会激起很多曾率先为“湘江风雷”平反出力、而自认为立有“大功”的“湘派”组织的不满与心理不平衡。而在进入省革筹小组的几名群众组织代表中，成员的代表性也很微妙，更让这些“湘派”组织起疑进而愤慨，加剧了“湘派”与“工派”的矛盾。

当时省革筹小组的群众代表全部成员共计６人，其中“工联”有二人，即胡勇与唐忠富；“湘江风雷”一人即叶卫东；另外是：“长沙工人”的张楚梗，“井冈山红卫兵”的谢若冰，“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朱顺祥。

“湘派”组织对这个名单愤慨的原因，除了因“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红中会”等都被排除在外这一点，还有对这６个人的代表构成情况的反感。因为，其一，在这个名单中，“工联”有二人，而受尽磨难的最早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却只有一人；第二，“长沙工人”与“井冈山红卫兵”前段原本是“湘派”阵营的组织，但他们在赴北京参加解决湖南文革问题的代表团、并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后，便明确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表态：“我们既不做‘工派’，也不做‘湘派’，而是做大联合派。”为此，受到周总理的赞赏。而现在这二个组织的头头虽进了省革筹小组，但却已不是“湘派”的代表了；其三，“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虽是湖南高校中成立较早的造反组织，但其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不过，他们却是属于支持“工联”的阵营。对此，“高校风雷”尤为愤慨，认为湖南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的首要代表，应非它莫属，但现在，其地位却被一个作用与影响都远比它小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替换，这显然使“高校风雷”组织的上上下下都不能服气。

由此，不满的矛头从指向“工联”头头、到指向进入省革筹的原省委书记即华国锋、章伯森等人，怀疑是这二个原省委领导在拉一派压一派，进而也发展到指向了他们认为是决定了这个名单中人员配置的周恩来总理。

因而，当这份名单公布后，“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红中会”、“省直联络站”等“文攻”力量，便立即在大街上张贴了反对这个省革筹小组成员名单的大字报，称这个名单是“中国赫鲁晓夫第二搞的”，是“二月镇反黑主帅一手炮制的黑货”，并攻击省革筹小组“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华国锋滚他妈的蛋！”等等。

紧接着，８月１２日，“红中会”下属组织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战斗队与“夺军权”战斗队，分别在大街上张贴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与《誓死揪出周恩来的严重声明》，配合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周活动。之中，“红中会”的负责人，也确与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头头张建旗有着联系与往来。

但是，“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反周行动，却受到了“工联”派的坚决反对。就是在“湘派”各组织内，虽然对周恩来在下达“二·四批示”一事中有没有责任，很多人都是有怀疑，但此时公开炮轰他，却也大多数是不同意，不支持的，如“湘江风雷”总部即刻发表了《关于不准炮轰周总理的严重声明》。而公开发声明支持“齐卫东”与“夺军权”反周行动的组织，则主要只有大学与中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数很少的小组织。

一直想着湖南造反派能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统一起来、并且对中央所确定的省革筹小组名单深深不满的“湘派”一些组织的头头，为了向中央显示其“湘派”

的力量，经过一番串联，８月１６日，以“湘江风雷”第二号负责人张家政为首，决定成立不隶属省革筹小组的所谓“民办”、即“湘派”组织的“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湘派”组织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后来并没有起过多大的统率作用，“湘派”组织的武装力量基本仍是各自行事，并多又归属于省革筹领导下的“官办”“文攻武卫指挥部”去了。因此，其成立，主要是体现了“湘派”中的激进分子渴求能将“湘派”组织统一的愿望，同时，实际上也是后来成立“省无联”的一次客观预演。

８月１９日，矛盾越来越大的“工派”与“湘派”，终于由“工联”与“东方红总部”为争夺几辆汽车的小事，引发了一场两派双方出动数千武装人员、为时长达三天、导致多人伤亡（包括一名制止武斗的４７军的解放军战士被打死）的大型武斗事件（解放路事件）。

８月３０日，由“高校风雷”、“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等组织的几个红卫兵起草了一个《八·三〇声明》，并串联了２５个“湘派”组织签名，公开发表了。《八·三〇声明》不仅批评了省革筹小组的人选名单，而且还提出了“誓死揪出‘二月镇反’的黑主帅”的口号，并且，公开地指责“工联”领导人是“修了”、是“右倾机会主义”。

不过，虽然随后发生的如对待中央的九·五交枪命令、对待中央要求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的态度、对待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等半官方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工派”与“湘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斗争不断，磨擦常生，但是，由于当时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派战尚未完全结束，这种矛盾，总体上仍是属于造反派内部争执与斗争的性质。而这种矛盾，也多只发生于各种会议中，以及两派组织上层的头头脑脑之间。而在基层单位，特别是工厂企业中，“工派”与“湘派”的矛盾却并不是很大，不是很明显，有的双方组织还合作得很好。因为，毕竟，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曾经要将他们都打成反革命的“走资派”及其保守派。

９月２９日，“湘派”主要组织“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孙大圣挺进军”、“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等，在“东方红总部”开了一天会，正式商议由“湘派”组织“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的问题。当晚，又通过了一份由２３个组织署名、展示“湘派”观点的《九·三〇》声明。

１０月５日，在“东方红总部”举行的有２０个“湘派”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并确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并议定了１０月１１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

但是，曾参加９月２９日会议的一些组织，如“孙大圣挺进军”、“长沙工人”等，却显然对成立“省无联”一事之提议有所保留，故“省无联”的《成立公告》上没有他们的签名。

这之中，“长沙工人”的头头张楚梗已是省革筹小组的成员，而“孙大圣挺进军”的头头邹定国，则在后来的１２月时，作为新增补的５名群众组织代表之一，也进入成为了省革筹小组的一个成员。

随后，由于周恩来总理于１０月９日，在武汉召见包括“工派”与“湘派”在内的湖南部分大造反组织的头头时，说了：“‘省无联’是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你们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〇》声明是错误的，你们不应再打内战了，分裂不利于长沙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

因此，不仅这个“省无联”成立大会没有能够召开，而且，此后整个“省无联”的组织，在事实上也没有得以严格的建立，而仅仅是将在此之前“湘派”组织召集的那一类会议与活动，从此挂上了一个“省无联”的标记与名义。并且，“湘派”中参加“省无联”的各组织，包括“高校风雷”、“红中会”等组织，直到三个多月后“省无联”被中央宣布“是反革命大杂烩”之前，也基本上依然是照以往那样各自行事，并不受“省无联”名义的组织节制。实际上，“省无联”对挂着它的名号的组织，都是无任何约束力的。

因此，可以说，“省无联”的确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而只是长沙市造反组织的“湘派”系统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顶多也只是部分“湘派”组织欲进行合并的临时联盟。

“省无联”的这种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

(1)属下各组织的影响与份量不相称，导致组织结构的基本无序。

从上述１０月５号签署了“省无联”《成立公告》的那２０个组织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省无联”组织机制的无序。

当时，在《成立公告》上署名名的２０个组织是：湘江风雷，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湖南红旗军，长沙农联，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湖南省红工会，省直联络站，长沙财联，长沙虎山行，体委红旗，北区工联，红导弹，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师院《永卫东》兵团，红中会，红专会，九中《重上井冈山》。

这之中，“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等，都是或成员人数众多、或影响较大的社会性群众造反组织，而“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长沙虎山行，矿冶井冈山公社，九中《重上井冈山》”等，却不过是一些工厂或学校内部的小小组织，在社会上并无多大声望，成员人数有的仅仅只几个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如此力量与影响都很不对称的一些组织，虽集合在一个观点与一个名义下，但他们互相之间的协调配合，显然是不会有多大的组织秩序与效率。

(2)"省无联”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总部，甚至没有一个专有的“办公”地方。它的“总部”性质的活动场所，并无定处，长期寄居于“东方红总部”内，后来又换到“湖南红旗军”总部内，而且，“省无联”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而都是由其他组织的总部人员兼任工作。

(3)其加入的组织，也常常变化不定。

例如，最初“湘派”各主要组织，几乎都参加了９月２９日的“省无联”筹备会议，并签署了“湘派”组织的《“九·三〇”声明》，同意搞“省无联”。但是，后来，“长沙工人”、“长沙农联”等组织却发表声明，并不承认签署了《九·三〇声明》，而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也在１１月２４日发声明，对“省无联”不予承认；“青年近卫军”则干脆又参加了省革筹小组领导的“工代会筹备小组”。

而还有一些组织，如“省教联”（省教师造反联合会）、“九·二四黑鬼战团”、“长勘院毛泽东主义小组”等，虽他们也经常在大字报与标语中，标榜自己是“省无联”的组织，尔后，也确被当作“省无联”的组织予以打击，但他们实际却并没有在“省无联”《成立公告》上签署。

虽然，后来经“湘江风雷”第二号负责人张家政等支持，“湘江风雷”下属一些分部战团，成立了“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仍然在参加“省无联”的活动；“青年近卫军”也发生了一些人宣布对其总部实行所谓“军管”，并成立了所谓“青年近卫军总部军管会”，而且宣称要重新参加“省无联”的活动。但实际上，“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头头的舆论宣传性活动，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去搞；而“青年近卫军总部军管会”，更仅仅是个别头头说说、贴几份虚张声势的大字报而已，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活动。

因而，这一切都表明，“省无联”组织结构，的确相当混乱，并无一个组织应有的章法。

(4)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

“省无联”并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导班子，它的很多行动，往往是在一些即兴召集的组织联席会议上提出的，而且，常常是不同的会议，各组织会来一些不同的代表参加。曾经有过的、由之中某些组织组成的“省无联”总部的“常委”，也只是一个空名义，并无真正的组织统率权力。因为，同意参加“省无联”的各组织，基本还是各行其事，并不受“省无联”的节制统领。所以，当后来“矿冶井冈山公社”的张玉纲等写出了《我们的纲领》、一中“夺军权”的杨曦光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并公布到社会上了时，“省无联”中大多数组织的头头们都还不知道。

就是所谓的“常委”状况，也常常变化不定。甚至连“省无联”的主要负责人周国辉，他都弄不清这“省无联”的“常委”有几个人，是哪些人？因为，这“常委会”，并不是由固定的人所组成，而是由有关组织的单位组成；并且，它实际上只是有关“湘派”组织头头的碰头会性质，会一散，大家就各搞各的去了，而对“常委会”并不需负什么实质的工作责任。

虽然，“省无联”的旗号终究在１０月１１日后，还是打了出来，虽然，二十来个组织有时在对外宣传时，于自己组织的前面，挂上了一个“省无联”的称号，

但是，一直到“省无联”最后完结，它始终也没能象一个真正的组织那样运转，而其实质，不过是以前的“湘派”泛泛名义，换上了“省无联”的徽标而已。

所以，“省无联”最多不过也就是文革中经常有的、进行派性争纷活动的、某些造反组织的一个联合会。而后来中央领导人之所以竟将它当作一个有反动纲领与反动理论的“反革命大杂烩”组织，予以摧毁，那实在是由一些激进的红卫兵们的理论文章，所引发的悲剧。而现在很多人又将“省无联”视为一个在文革中具有异端理论、并受那些理论指导的激进组织，也完全是一个误解。

（四）所谓“极左派”红卫兵与“省无联”的关系

湖南长沙的大、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在文革中有一个特点，即所谓“大学偏右、中学极左”。

几万名造反派大学生，大都集合在“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旗下，而在１９６７年初起，“高司”则站到了维持旧秩序的省军区一方，成为了造反派的“右翼”，或新保守派。

但是，长沙市三十多所中学及中专的造反派红卫兵，以长沙“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红专会”、“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等组织为主，却又大部分始终是造反活动的激进力量，特别是其中人数众多的“红中会”，更是突出。

“红中会”成立于１９６７年3月9日，在呼吁为“湘江风雷”翻案与批判省军区、反击“高司”的活动中，非常突出，影响也很大。而后，它的负责人及几乎所有的成员在推动筹组“省无联”、批判省革筹小组，直至它之中部分成员炮轰周恩来、提出一系列激进理论观点、撰写一系列被人们视为异端文章的所作所为，更是表明了这个组织强烈的非常思维。因此，他们便被上上下下一致都视为了“极左派”。时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曾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４日接见湖南驻军负责人时就说过“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在活动”。他说这番话的背景，就是因“红中会”成员发动了几次炮轰周恩来、反对省革筹小组的大行动。

“红中会”等“极左派”的活动，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炮轰周恩来与撰写发表异端理论文章。

当时湖南在文革中，之所以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活动，除了造反派中不少人，存在有对周恩来总理是否应对“二·四批示”负有责任的疑问这一思想基础外，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周恩来的思潮及组织，无疑更是湖南反周活动的直接动因（长沙“红中会”及其属下《齐卫东》、《夺军权》的一些学生，都与北京“五·一六”有联系）。当然，更重要的背景，应该是文革中出现的造反派不断炮轰、打倒中央领导人而“成功”的特有惯性思维，在起强大的作用。既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是在造反派的一顿“炮轰”后，倾刻能垮台，那么，再出现一次“炮轰”周恩来而又“成功”的可能，又如何不会在激进冒失的红卫兵头脑中产生呢？！象“红中会”这样全部是尚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红卫兵造反组织中，有些人踏上这条“反周”之路，几乎是“顺理成章”了。

不过，虽然当时几乎整个“红中会”的红卫兵，都或多或少有“反周”或怀疑周恩来的观念，特别是其领导人，“反周”意识更是强烈，但是，在１９６７年８月出面公开“炮轰”的，却只有“红中会”属下的两个“战斗队”——长沙市一中的“齐卫东”与“夺军权”。这之中的实质，显然是一种计划与策略。所以，当“工联”方面一旦出来反击“反周”活动时，“红中会”的其他组织便立即表示了对“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声援。

虽然，“反周”的活动，在省革筹小组与“工派”组织、甚至包括“湘派”在内的许多造反组织的指责下，很快就偃旗息鼓，没有能继续。但是，当时“齐卫东”与“夺军权”的行动却也安然无恙，并没有遭到什么灾难，“极左派”红卫兵仍然能继续将他们的一篇篇文章问世；以至，四个多月后，杨曦光还能撰写并流传出《中国向何处去》。

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湖南文革形势，是处于了一种各派政治力量趋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以及反映了毛泽东对湖南发生的“反周”活动，确也并不太放在心上，而没有象北京镇压“五·一六”红卫兵团那样，立马迅速来打击湖南的“极左派”红卫兵。

然而，“极左派”红卫兵所进行的另一方面的活动，却招来了一场严厉的打击。

如果说，参加“省无联”中的大多数组织与大多数人，还仅仅是将“省无联”视为不同派性观点的集合，甚至有些人对“齐卫东”与“夺军权”“炮轰周恩来”的行为，都还能宽容，但是，“红中会”的一些负责人及部分成员，却对“省无联”所赋于的意义，则已远远超出了文革派性组织所含有的内容。

这些中学红卫兵对文革意义的理解——

即一种认为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现实严重挑战的“新思潮”，它认为解放１７年来，中国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严重对立，造成了中国的不民主和不平等，它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即官僚特殊阶层）、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国家体制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让普选出来的干部成为真正的公仆，等等。

这些见解，不仅超越了“工联”与“湘江风雷”等绝大部分造反派的认识，尤其，他们更远远超越了当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与目的。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与文章中，仍口口声声在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如何如何，这些“极左派”红卫兵的思想武器，却已不仅仅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了，而是从合法的马列主义书籍中，搬来了许多他们认为已经理解了的东西，作为了他们思考与行动的指南。因此，一大批所谓“异端邪说”的理论文章，便从他们的手里写了出来，并悄悄地在大、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中流传。

与此相呼应的，也有极少数大学生红卫兵（如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与“红中会”的激进红卫兵一道，对文革形势与前途，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写下了他们独特的见解。

但是，就是这些现在看来其实还较稚嫩的理论与观点文章（如张玉纲的《我们的纲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等），后来，不仅给这些红卫兵作者带来了多年的苦难，而且，客观上也拖累了原本与此无什么关系的“省无联”组织及之中的很多造反派，使其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因为，１９６８年1月的中央高层（还有今天很多的人），以为这些“极左派”红卫兵的作为，就是“省无联”的作为与特征，所以，当时来自最高级别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就不仅砸到了杨曦光等中学生的头上，而且，也砸向了整个“省无联”。所以，不仅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厉声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而且，几乎整个中央高层的领导人都出了面，对“省无联”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由此，不仅撰写理论文章的红卫兵杨曦光、张玉纲等人被打入了地狱，就是参加“省无联”的“湘派”造反组织的大批负责人，也连同立即遭到批判，包括周国辉（高校风雷）、张家政（湘江风雷）、李仲昆（湘江风雷）、毕健（湖南红旗军）、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等在内的一批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均被逮捕判刑。襍

实际上，“极左派”红卫兵们所写的那些理论文章，当时并不为“省无联”的大多数人所知，更不是“省无联”所组织的行动，而基本上是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刘荣华（《高校风雷》）、杨曦光（《红中会》、《夺军权》）等少数人的个人行为。有些文章，仅仅是在极少数人的内部圈子中传阅（如《中国向何处去》尚是一个征求意稿，只印发３０份），有些文章，如《我们的纲领》，则是作者写就后，就很快自行散发出去，而并不须经哪个组织批准。

所以，不论这些理论文章是什么样的性质与水平，都只是极少数青年学生的思考与研究，而绝非正在派战犹酣的“省无联”的组织行为，更谈不上是“省无联”的纲领了。

有不少人以为，《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杨曦光是“省无联”的头头或高层骨干。其实，这也完全是个误会。杨曦光虽然是“省无联”的支持者与舆论上的鼓动家，但是，对“湘派”或“省无联”组织的头头会议，他尚是无资格参入的。因为，他当时的地位与身份，只不过是“红中会”属下的一中“夺军权”战斗队的负责人，而“夺军权”则只有七、八个成员。在中央高层集体出面批判“省无联”与《中国向何处去》之前，可以说，在“省无联”组织中，除“红中会”以外的其他造反组织，是没有几个人认识杨曦光的。所以，“省无联”负责人周国辉戏说：如果“省无联”搞选举，杨曦光顶多得三票。

然而，不幸，仅仅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站在了“省无联”名义的旗下，结果，他们所做的这些，便都成了需要由“省无联”来承负的罪责。

这，就是历史的一页真相。

（五）中央高层对“省无联”态度的演变

自从１９６７年８月间，长沙的造反派发生了“湘派”与“工派”的裂变，及其矛盾公开化、并日趋白热后，对此情况，不仅省革筹小组与驻湘支左的解放军４７军都清楚，而且，中央高层负责处理湖南文革运动的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戚本禹等人，也很快都知道了，并且表明了对这些矛盾性质的定位。

因而，在中央高层几次接见湖南赴京的造反派代表团时，周恩来与戚本禹都曾经多次调解“湘派”与“工派”的矛盾，说他们的矛盾“是观点之争，而不是路线之争”，“不应当打内战”，并希望“湘派”与“工派”的代表从北京“回长沙后，也能召开团结的大会”等等。

就是对于８月１２日长沙发生的《齐卫东》与《夺军权》“炮轰周恩来”的事件，周恩来在听到“工联”方面代表对这个情况的汇报后，也只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那他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就没有再予追究。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周总理在武汉召见湖南省革筹小组与驻军负责人与部分造反派头头时，听说一些“湘派”组织准备成立“省无联”，他便说：“省无联”又是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

１０月２４日，除毛泽东以外，林彪与周恩来等中央高层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接见了驻湖南的４７军军长兼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听取黎对湖南文革形势的汇报。其间，林彪虽然说了“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但是，林彪所指的，当时还只是说一些“湘派”组织反对省革筹小组的的“治”，而主张湖南继续要“乱”的问题，并且，将“极左派”活动的根源，归结于所谓“三条黑线”（都是湖南人的刘少奇陶铸，与彭德怀贺龙，以及在湖南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在起作用。而对于“极左派”的这些活动，林彪也不甚以为然，他指示说“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闹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了点事就大惊小怪。”

显然，中央高层当时对集合在“省无联”旗下的那些造反派的种种活动，尚是定位于可以容忍的文革造反运动性质的框架之内。

直到１９６８年元月２日，周恩来在对湖南赴京学习班的人员所作的指示中，也还只是说“‘省无联’是跨行业的组织，而跨行业组织是不符合现在中央的精神，不能存在。”

可见，截至此时，中央高层仍将“省无联”问题，视为湖南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之争，“省无联”仍是派性的群众组织。

但是，十多天后，１月１９日，形势却发生了急剧变化。当天在北京，中央高层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成员时，对“省无联”的态度与定性，却一下子转为异常

严厉的批判态度。而到１月２４日、２６日、２月１日，中央高层三次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驻湘部队、各大造反组织负责人的大会中，更是严厉地宣判了“省无联”组织的死刑，将整个“省无联”组织定义为“反革命的大杂烩”。

导致中央高层对“省无联”态度的严厉急变的直接原因，就是“极左派”红卫兵们撰写的那批理论文章。

在１９６７年底之前，湖南省革筹小组与支左的４７军军部，虽然经常将“省无联”方面组织的、包括反对省革筹小组中的华国锋、章伯森的种种活动，都及时汇报给了中央。但中央高层当时对这一切，显然并不很在意，认为这不过是象其他省的文革运动情况一样，无非是做好有影响的造反派们的工作。甚至，就是林彪也说“不要大惊小怪”。然而，当１９６８年１月初，４７军负责人将“极左派”红卫兵撰写的那理论文章，加上“省无联”主要负责人周国辉（“高校风雷”头头）所作的几次报告录音，带往北京，报送给中央后，态势便急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周恩来原来从没看到过这些材料，甚至，一些“湘派”组织最初对湖南文革形势所发表的、对省革筹小组极为不满的那份《八·三〇声明》，他都没有看过。而康生、陈伯达等人则更是在１月２日后，同周恩来一起收到了４７军军部报送来的有关“极左派”红卫兵撰写的理论文章等材料后，才发现了《我们的纲领》、《关于组织和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因而，他们立马将对“省无联”的认识，与在北京出现不久的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地下组织等同起来了。而且，他们认为，“省无联”比“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更危险，因为，从能言善辩的周国辉的录音报告中反映出，“省无联”的活动能量显然是很大的。显然，中央高层相信，如果真出现一个用所谓“新思潮”为理论指南的、而又有数达１０万以上成员的庞大组织，其对政权的威胁程度，无疑是远远要大于那个什么“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中央高层均以为“极左派”红卫兵所撰写的这些文章，就是“省无联”的理论基础与组织行动纲领，并且，又有象周国辉那样宣传鼓动能力非常强的头头，在到处为“省无联”的活动作辩护性报告，并已为参加“省无联”活动的很多群众接受。

加之，“高校风雷”成员郑某于１月初，给正在北京中央学习班“高校风雷”负责人红斗的一封谈形势的信，在北京被“工联”方面查获上交。因为那信中说到了要与一个“陈老师”多商量的事，由此，也扯出一个所谓学生背后有“黑手”问题。致使中央高层进一步认为，搞“省无联”的，已不仅仅是些造反派与“极左派”，而已有年纪较大、社会经验较丰富的“黑手”——从蔡爱卿、吴自立（均为退休的解放军少将）、彭德怀右倾分子杨第甫等，到刘凤祥（原《湖南农民报》右派分子）与“陈老师”（湖南大学教师陈光第）等这些对现实显然会不满的人们——在插手这个组织了。

殊不知，“极左派”红卫兵撰写的这些文章，其实，既与什么所谓“黑手”丝毫无关，同时，原来在湖南也并没有几个人能看到，而只是在极少数大学与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的某些小圈子内流传，而根本不为“省无联”的群众、甚至也不为“省

无联”的大多数头头所知道。同时，对这类与当时运动中的派性争执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文章，就是有公之于众的，大多数人也不怎么关心，阅读兴趣不浓。如杨曦光的《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曾被抄成大字报张贴于闹市区的中山路，但围观的人却不多，很少有人认真细读。甚至，据“工联”的主要头头、时为省革筹小组成员的胡勇称，他也是在中央高层接见时，才去看“极左派”红卫兵的这些理论文章的。

可以说，是两个主要因素——“极左派”红卫兵的那些理论文章，与代表“省无联”组织的周国辉，其所表露出的很强的社会活动家能力——的同时出现，最终导致了中央高层对整个“省无联”组织的严厉否定与重力摧毁。

（六）省革筹小组与支左的４７军军部对“省无联”所持态度的演变

对于“湘派”及后来成立的“省无联”，无论是省革筹小组，还是奉中央命令进湘来支持造反派的４７军军部，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采取一种不敢压制、而尽量做说服工作的态度。

甚至，在中央高层于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正式表态批判“省无联”后，省革筹小组与支左的４７军军部对“省无联”仍还是小心翼翼，没有趁势猛烈予以打击。

所以，使中央高层在此后的２月１日，于接见省革筹小组的原省委领导干部与４７军负责人时，严厉批评他们对“省无联”“太软弱无力了”。康生还当场拿出一张１月２５日出版的《新长沙报》，指责报上的批判文章，说连“省无联”的名都不敢提，而还是以“ＸＸ联”代替。康生还指责说：（对“省无联”的活动）“你们没有阶级仇恨，这怎么能行，为什么这样？”“你们总觉得‘省无联’是革命群众组织，是认识问题。他们那样恶毒地反对毛主席，这是认识问题吗？夺军权也是认识问题？要重新建党、重新建军也是认识问题？……你说是认识问题，实际是包庇他们。同‘省无联’作斗争，是派别斗争，还是阶级斗争？自己不明确怎么教育青年人？这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不是两个派别的问题，不是派别斗争。”

周恩来也批评省革筹小组的原省委领导干部与４７军负责人，说“（对“省无联”的问题）你们熟视无睹。在全国反革命公开出报纸的只有长沙和福州。福州还敢反对他、批判他，而湖南连反对他也没有。”

周恩来所说的“反革命公开出”的报纸，即指以“省无联”机关报名义出版的《湘江评论》，其实也就是几个“极左派”的大学生与中学生红卫兵办的，它于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初创刊，总共出了五期。

应该说，当时中央高层对省革筹小组与４７军负责人的批评，是很有根据的。

而省革筹小组与４７军负责人，之所以在中央高层明确表态批判“省无联”之前，一直都没有对“省无联”采取敌视，只是反对“湘派”再成立这个跨行业的、派别特色鲜明的“省无联”组织，而且始终坚持做说服争取工作，就是因为他们看

到参加“省无联”的，绝大多数都是老造反派组织。一则当时中央的大政策就是支持造反派，解放军的“支左”任务，实际就是要支持造反派。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省革筹小组与４７军负责人是都不敢轻易与“省无联”为敌的。第二，也因为前段省军区就犯了镇压“湘江风雷”造反组织的错误，被中央批评了，连已经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摧垮了的“湘江风雷”，最后竟也得到了平反。前车之鉴，记忆犹新，省革筹小组与４７军负责人又怎么敢对“省无联”进行打压呢？

不过，在１９６７年底、１９６８年初期间，省革筹小组在获得杨曦光等人写的理论文章，特别是看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代表原省委进入省革筹小组的副组长华国锋，则立马对杨曦光的文章作了严厉的评价：“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而且，他还很快将杨曦光的文章与“省无联”挂上了钩，说《中国向何处去》“这就是‘省无联’的黑纲领。”

无疑，华国锋是将杨曦光的文章与“省无联”的组织联系起来、并立即将杨曦光等人的理论文章报送中央的积极主张者。

自然，经过中央高层的批评，明白了中央确是坚决要摧毁“省无联”后，省革筹小组与４７军便对处理“省无联”不再心慈手软，对“省无联”的头头与“极左派”红卫兵动用了专政手段，将他们投入了监狱，并一一判处重刑。之中，张家政（湘江风雷第二号头头）被判２０年长刑，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判１５年，毕健（湖南红旗军）判１０年，杨曦光（红中会）判１０年，周国辉（高校风雷）判７年，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判３年。还有如李仲昆（湘江风雷）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各单位，一大批“省无联”旗号下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那些所谓的“黑手”，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押、判刑、批斗与打击。

（七）“省无联”问题的最终结局

自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打倒后，很多在文革中发生的案件，都被予以推倒平反。但是，对所有的“造反派”，却都被视为“四人帮”的力量，而扫入了“另册”，成为一种被严厉否定与批判的对象。参加“省无联”的，既都是造反派组织，因此，“省无联”问题自然也被列入到造反派的历史中。

但是，令周国辉、杨曦光、张玉纲等获刑的理由，却不是派性活动，也不是夺权、打砸抢之类，而是那些理论文章与大会报告，是被以文以言而治罪的。因此，当１９８０年代初，那个刚刚在开始强调民主与法制概念不久的时候，出狱几年后的这几名当年的大学生、中学生，就自己因文章因言论而被治罪的问题，便先后向省与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平反的申诉。

由于一系列的机会条件，特别是当年曾主持处理“省无联”问题的省革筹小组负责人、后来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正好下了台，而中央也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湖南进行机构改革调研，同时也处理有关文革遗留问题，加上杨曦光（时已改名杨小凯）的父亲，作为老资格的前湖南省委秘书长、时已平反并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第甫的个人影响，周国辉、杨曦光等人的申诉得以送到中央高层，并获得重视。

对于周国辉、杨曦光等人申诉的最后处理，上上下下都显露了某种智慧。

终于，由胡耀邦总书记予以批示：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这就意味着，不再将周国辉、杨曦光等人的问题当成政治问题看待，而是作为刑事案件，依照法律准绳来衡量复审。

依法就好办。因为，以文治罪、以言治罪，在共和国正常时期的哪一种法律中，都是不允许的，特别是１９８０年代初，中国更是一个正在大力宣讲法制观念的时候。

１９８１年，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省无联”有关人员的案件，复审的改判结果，是对“省无联”一案的当事人，不仅撤消了原来对他们扣以“反革命罪”的指控，而且，除个别人因要对某武斗事件负责而仍须获罪以外，大部分人都得到了“宣告无罪”的改判。

同时，湖南省委也作出了决定，认为文革中对“省无联”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却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　”，是错误的，是不实之词，因此，予以平反，撤消原定性结论。

由此，周国辉、杨曦光、张玉纲，以及张家政、宋绍文、李仲昆等人，便得以能以正常公民的身份，踏入了社会的各个工作岗位。

不过，杨曦光起初得到的改判，却只是“免于刑事处分”。

“免于刑事处分”本身仍是一种带有法律处分的意义，前提是罪名仍存。对此，杨曦光当然不服，于是继续申诉。当时湖南省委几位领导与中央赴湘工作组，也均认为应再次复查。因而，１９８３年，湖南高级法院再次复审，审判结论改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是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只是，省高级法院的这个改判，在报送省委后，却不知何故，始终没能批复下来。因此，这件终未能画上句号的事情，对当时已改名为杨小凯、并已是经济学年轻教师的杨曦光的工作与出国求学，曾带来过一些麻烦与周折。幸好，批准杨小凯出国的武汉大学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是热爱人才的明白人当家，认为：既然法院已作出了判决，那判决便是标尺。因此，一颗经济学的新星，由此，有机会向世人展示他那耀眼的天才。

终于，“省无联”静卧于历史了。

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

丁 东

1966 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冲击，“天下大乱”。一批原来不知名的人物突然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中有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她和其他 6 位同事于 5 月 25 日在校内联名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此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决定在 6 月 1 日向全国公开广播，并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因此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因为在“文革”初期批评工作组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评刘少奇以后，他们得以翻身，分别成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和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并且在 1967 年分别担任这 4 所大学的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1967 年初毛泽东将他们 5 人称为“五大领袖”[1]。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 5 位曾并称“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人物虽然在“文革”初期知名度很高，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其实很短暂。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 5 个人，当面称他们为“五大领袖”[2]。然而，这次召见意味着他们从此不得不退出历史前台。[3]

“五大领袖”都是“文革”的重要当事人，那时他们的许多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密切相关，与“文革”中的不少重大事件相联系。他们的回忆是还原“文革”领导层真实状况的重要参考。他们在“文革”中还担任过几所主要大学的负责人，了解当时大学“文革”运动和日常运行的状况[4]。他们又是“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讲述的群众组织的形成过程、活动方式以及与政权的关系，与周恩来、“中央文革”以及北京市革委会的关系，都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

笔者过去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 3 人有交往。最近，为了解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对“文革”的记忆，又分别与他们 3 人交谈。[5] 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感觉国内传媒对他们的描述和他们真实的经历相差甚远。而且国内公开媒体上有关他们的信息本来就十分有限，流传较广的“文革时五大学生‘领袖’今安在”等文章和《文革闯将封神榜》等书籍，都是一些记者在 80 年代撰写的，宣传意味很浓，谈不上客观真实。这 5 个人的命运本身就值得关心“文革”研究的人思考，而他们的“文革”记忆中则可以挖掘出很多有价值的分析素材。本文主要介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和他们现在对“文革”的看法，并讨论与“五大领袖”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与想法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文革”后均被逮捕。刑满释放后，聂元梓的生活困窘[6]，韩爱晶在深圳一家朋友的公司担任管理人员[7]，蒯大富 90 年代到深圳与朋友合伙办公司[8]，收入比聂、韩多一些。由于他们都是“文革”中的名人，所以不断有人

要采访，请他们口述自己的经历，撰写回忆录。但是，他们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隐形政治压力。[9]

聂元梓最早动手撰写“文革”回忆录，她在 90 年代就先后与两位作家、学者合作，想撰写个人回忆录。书稿在 20 世纪末完成，但出版过程颇费周折。有的出版者原想拿这本书赚钱，和她订了合同，一看无利可图，就无限期拖延。有的出版者认为她写的不到位，想让她修改，她又没有能力将内容深化。此书的电子文本早已在“文革”研究界流传，直到 2004 年才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推出。在此过程中，医生曾建议她动手术，并说，如果不动手术，脊椎神经受压迫可能导致全身瘫痪。但她表示，回忆录出不来，绝不动手术。此书出版后，读者对她的印象有很大改善。但也有一些行家认为，她的记忆偏重于洗刷个人的冤屈，对重大历史细节的回忆和揭示较为薄弱，有些情节不够真实。

韩爱晶近几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革”的回忆与研究中去。他每周上两天班，其余时间用于阅读、调查、搜集资料与思考。今年他已完成了一篇关于毛泽东 1968 年 7 月 28 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态度。他对细节是很认真的，记述也十分详细。目前他还写出一些手稿，何时发表、如何发表，还没考虑好。他表示要做一个“文革”的研究者。

我曾经对他说：你可以是历史的研究者，但首先是历史的当事人；建议你第一步先把自己亲历亲见的事写出来，第二步再调查其他的知情人、当事人，互相比较核实；你的回忆录发表以后，自然会有许多知情人和研究者要和你讨论，一些弄不清和不准确的事在讨论中可以澄清。但他对写作看得很重，不想轻易出手。他基本上还保留着 1966 年到 1968 年时代的一些认知，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接近于国内的“新左派”，对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极为反感，因此对现行政治保持距离。这可能是一些“文革”中群众组织领袖共同的心理特徵。

蒯大富这些年一直忙于生意。[10] 他也注意搜集和阅读海内外关于“文革”的材料，但当朋友们建议他写回忆录时，他总是说等退出商业再说。

蒯大富、韩爱晶现在并不回避他们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好感。事实上，其他历史时期的当事人往往也有类似的行为。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共同的愿望是厘清史实，澄清个人的责任。厘清史实不只关系到他们个人的形象，也关系到历史记载的完整。韩爱晶整理的毛泽东 1968 年 7 月 28 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就是一份很重要的史料。蒯大富曾对我介绍了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批斗结束后又由江青打电话让蒯大富放回王光美。这些情况至今还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

二、当年对聂、蒯、韩的审判

聂、蒯、韩希望澄清他们在“文革”中的责任，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要看 1983 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的审判定了哪些罪，另一方面要看这些审判是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聂、蒯、韩当时都拒绝接受审判的结果，后来也有过

一些自辩。这些自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参考。

下面以聂元梓为例，看看对她的刑事判决。

1982 年 10 月 15 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和 1983 年 3 月 10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有 5 条罪状：其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其二，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其三，煽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其四，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其五，诬陷、迫害北京大学的干部、学生。其中的前 3 项罪名显然站不住脚。所谓的上海市夺权即上海市“造反派”发动的“一月革命”，这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行动。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在 1966 年 5 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那时聂元梓并无名气，更无资格参与打击彭真的中央决策。最早批判朱德的事发生在 1966 年 5 月 23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会议纪录，林彪、陈毅、周恩来都作了批判发言[11]，而聂并无资格与会。就这 3 项罪名而言，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行为不过是追随当时的中央决策而已。至于聂案的后两项罪名，应当说聂元梓有一定的责任。1966 年 6 月 3 日她确实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校部办公楼前贴出大字报，批判时任该校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常 1964 年担任北大“社教运动”工作组负责人时曾打击过聂元梓。毫无疑问，批判常溪萍是聂元梓的错误。后来，常溪萍被华东师大的“造反派”打倒，1968 年 5 月 25 日在华东师大的化学系教学楼躲过监管人员的视线跳楼自杀身亡。聂案审判时，聂元梓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的死亡地点是在上海，死亡时间距聂元梓在华东师大贴出批常大字报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因是 1968 年上海市的迫害。显然，法庭对此辩护未予采信。聂的最后一项罪名是迫害北大师生，特别是邓小平最关注的邓朴方受迫害案。有多方材料证明，聂元梓对此案并无直接责任。

刘贯一在 1985 年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时间是聂刚判刑不久：

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

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十年吧。’但彭真却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什么依据，对彭真说：‘林、江主犯判十七年，这总是追随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

就这样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达政法委员会执行的。[12]

这位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虽然有待核实，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有关两案审判的信息可以确知，这些人的定罪量刑都由高层领导人自行决定。比如原来高层主

张判江青死刑，陈云不赞成，结果改成了缓期执行。显然，在“文革”主要案犯的审判中，判什么人、定什么罪，并不是由法官或合议庭决定，法院不过是执行高层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或妥协结果。当时审判了数百人，谁判刑、谁不判刑、判谁多少年，都是中央领导人决定的。

三、聂、蒯、韩的自辩

在这 3 人当中，聂元梓对审判中的罪由和量刑意见最大。她在 1986 年的申诉书里说：“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13]”她还再三说明，在“文革”初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她与江青和“中央文革”有分歧。

聂元梓 2005 年 11 月 6 日对我说：“文革”问题再严重也是路线性质，不属于触犯刑律。如果按刑律处理，那么 AB 团你们该枪毙多少次？政治斗争不应当刑事处理。她在别的场合还说：邓小平说，什么时候看见儿子就想起聂元梓。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就是报复。1966 年，政治局开会讨论“五·一六通知”，你是总书记，你没有反对，有没有责任？她又表示：一批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现在生活困难，二七厂的徐凯连退休金都没有。没有生活来源，怎么也得给一碗饭吃吧。河南有一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没犯死罪，总得给基本生活条件。

蒯大富的说法是：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法庭辩论时检察官、法官都被我驳倒了。我说《刑法》第 90 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当时是 1983 年开庭，审判 1966 年的案子。如果回到 1966 年，我那时才 21 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 10 岁，1966 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14] 审判结束后，蒯大富对法官表示了感谢，倒不是因为法官据实量刑，而是因为法官努力使他“文革”受审查的时间折抵了刑期；否则他可能要多关 8 年。

韩爱晶坦言，自己是卷入党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蒯大富在审判张春桥时出庭的证词，至今为韩爱晶否定。韩爱晶在去年 12 月 27 日对我说：当时就是要跟着毛主席反修防修。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给自己个人的人生目标的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为理想的未来社会献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思想非常明确、非常坚定，而且影响一生。“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一个过程，当时的想法就是好好跟着毛主席干。他是虔诚地相信毛泽东的理论信念的。现在，他除了为自己没有信守毛泽东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动手打了彭德怀的耳光而自责外，自认为在北航较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思想。他率先以民主的方式“复课闹革命”；他主政时期研制的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至今还在使用；他当革委会主任期间没有任何“多吃多占”，甚至没有拿过一分

钱公款，完全靠家里每月提供的 30 元钱生活；北航也没有分裂为两派。他认为，自己是跟着毛泽东革命，革命失败了，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小兵或者说是一个失败的将军。

四、如何评价“红卫兵领袖”的历史责任？

一些朋友听说我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有接触，往往会问我：他们对“文革”有没有反思和忏悔？

确实，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对“文革”有过一些反思。例如，聂元梓对我说：“形成‘文革’不是一天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文革’不可避免，除非五四时候彻底民主化，彻底反封建。不要怕讲‘文革’。形成‘文革’的因素每个人身上都有。发动者负主要责任，被发动者也有责任。彻底反思现代迷信，每个人都有责任，领导和群众都要反省。应当总结‘文革’教训，不应当回避。”但他们认为，自己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是不真实的，是被歪曲和丑化了的；对他们的刑罚与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不相符，既然司法正义要求罪罚对称，所以他们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我发现，和他们有直接交往的人多对他们抱同情的态度。这些同情者大多与“红卫兵领袖”没有利害关系，甚至在认识“红卫兵领袖”之前对他们已有不良印象，但接触之后都变为理解同情的态度。原因很简单，应对“文革”承担主要责任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名誉因当政者的需要而受到精心的保护，而“红卫兵领袖”这些毛泽东的追随者却承担了过度的责罚。他们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被抛弃，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都是审查对象，邓小平主政、彻底否定“文革”后他们又被判刑。“文革”时期在台上活跃了 2 年，后来却当了十几年的阶下囚，这无疑是命运的悲剧。他们现在是平民百姓，为人基本上是平和的，的确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鬼怪，有的还保持着一些当今稀缺的优点。比如，韩爱晶对某些人在管理国有资产时大肆洗钱、中饱私囊就十分气愤，他到深圳后本来有可能参与其中发财，但他出于信仰不肯与之合流。

评判“文革”中群众领袖的历史责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有如巨大的绞肉机，人要想同时保持自身的平安和清白是极其困难的。以人权为尺度，当时所有的人可以被区分为 4 种情况：一，整人者；二，挨整者；三，既没整人也没挨整者；四，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整人意味着不义，挨整意味着无辜。既没整人也没挨整的情况比较少见。既整过人也挨过整的情况十分普遍。

“五大领袖”都属于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当时他们的名气大，影响大，有些人在“文革”中受害，虽非他们直接所为，但与他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比如，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的大字报矛头所向本来是陆平等 3 人，聂元梓等 7 位签名者中的 6 人在“社教”中挨过整，写这份大字报乃事出有因。毛泽东把这张大字报抬得那么高，确实令聂元梓感到意外。这张大字报公开广播后，许多学校的干部挨批挨斗，这岂是聂元梓始料所及？

单正平在“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15]一文中讨论过“文革”中

的几种犯罪类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二是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的集体屠杀；三是在全国普遍施行的“造反”——冲击政府机关，抢夺武器，临时夺取政府权力等等；四是抄家或“打砸抢”，当时称为“破四旧、立四新”。此外，“文革”时期“造反派”之间武斗也打死了不少人，造成很大的经济和财产损失，单正平视此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犯罪。他把这 5 种情况都归结为国家罪错，认为最终责任人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比起把罪责推给“林彪、江青集团”和“造反派”，单正平的分析更接近历史真相。其实，中央和地方一些党政官员，包括后来被整死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都参与过对所谓“阶级敌人”的迫害，他们都是毛泽东、共产党“阶级斗争”主张的积极实施者。

“文革”时期，在“五大领袖”得势期间，他们在单正平所说的第三、第四、第五项犯罪类型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活动。至于是否应当对他们追究刑事责任，要看他们的具体行为。1983 年对“五大领袖”以“推翻政权、颠覆政府”来论罪，显然不符合事实。“文革”初期，他们是毛泽东在其执政的特殊阶段所依重的政治力量；当中央书记处的职能被“中央文革”及“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后，“五大领袖”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成员经常充当中央的特派员，他们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地执行着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因此，“五大领袖”在主观上是要维护这个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单正平指出：“表面上看党政机构似乎是受害者，但‘造反有理’的口号是毛泽东发出的，是他以党和国家领袖之尊动员‘红卫兵’在他的领导下造政府的反。当时，各级政府被毛泽东及其高层助手当作‘夺权’的对象，并不意味着这场夺权造反是平民反抗国家机器；事实上，在夺权的高潮时，毛泽东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最高权力，指挥着造反派为他夺取省以下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因此，夺省以下党政机关的权实际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表现。”[16]

“文革”期间，毛泽东采用了政治运动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级党组织掌控运动，而是利用群众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之争，甚至升级为武斗。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标达到以后，重建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目标。此时，聂元梓、蒯大富却无力控制北大、清华校内的两派对立和武斗，毛泽东抛弃他们是必然的。聂、蒯对武斗中的死亡事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则要看他们是否亲自发令、亲自动手。蒯大富在“工宣队”包围清华时说过“可以武力抵抗”的话，当然对校内“武斗”负有一定责任。不过，当时他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但对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校的决策却事先毫不知情。然而，1983 年给他定罪时，专门选择对他不利的证据，而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证据。

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整人的积极分子后来大多受到保护，只有“文革”后的情形例外。例如，“反右”运动后来基本上改正了，但当初的整人者却从来毋须承担责任，甚至不曾要求他们道歉，有官职的照样做官。而“造反派”这一批“文革”特殊阶段的积极分子却遇到了当局的特殊对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挨整，周恩来通过“清查五·一六”运动有意扩大了清查范围；“文革”结束后，从“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到“登记在册”，他们又一次挨整。毛泽东死后，最高权威变成了邓小平。由于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保护；“文革”前期邓小平曾经被批判，他自然要否定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两案审判”也好，“清理三种人”也好，其准绳无非是确立邓

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文革”初期参与过打人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其父辈与邓小平同沉浮，所以被视为可信任的子弟而受到保护。1982年、1983 年对“红卫兵领袖”的审判虽然标榜要实行法制，并且宣布只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其他问题，其实这次审判还是一次政治行为。

近几年，关于是否存在“人民文革”的话题引起了讨论。本文无意讨论当时一些“造反派”冲击“当权派”、甚至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感到失控的行为，是否可被称为“人民文革”。但我认为，就“五大领袖”在“文革”初期的“造反”活动来看，虽然具体情形各异，但他们都是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最初都是毛泽东政治主张的真诚信奉者和追随者。他们曾经为个人权利受损害而抗争，后来为适应毛泽东不同阶段“战略部署”的需要而成为政治新星。他们的“造反”活动并没有改变这个体制的意图，蒯大富和韩爱晶至今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仍给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就这“五大领袖”而言，称他们的“造反”行动为“人民文革”是不适宜的。

【注释】

[1] 余汝信，“1968：7.28 召见与运动的终结”（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4/06/）。
[2]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
[3] 出处同上。
[4] 虽然后来的文献对“文革”中大学里的斗争和冲突有一些记载，但对当时学校的日常运行状况却缺乏比较完整的记载。比如韩爱晶谈到，他担任北航革委会主任期间，组织“三结合班子”研制成功无人驾驶飞机的发动机，此事目前于史无载。
[5] 谭厚兰已于 1982 年去世。王大宾目前居住在四川都江堰，我还没有机会与他相识。
[6] 聂元梓生于 1921 年，1938 年加入中共，是“三八式”老干部。她从 1968 年起受隔离审查，1969 年出席中共“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后继续受审查。1978 年被逮捕，1983 年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判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1984 年保外就医，1986 年假释。自 1984 年以后，她一直要求政府按离休干部的标准解决她的生活来源。她经过多年申诉，并得到一些老关系的帮助，直到 1998 年北京市民政局才开始给她发生活费，当时每月 6 百元，现在提高到 1 千多元。后来又让她享受退休职工的医疗待遇，医药费报销 90%。2004 年给她安排了一套小三居住房，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7] 韩爱晶出生于 1946 年，1964 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三系（飞机设计系）。他在“五大领袖”中最后一个退出政治舞台。1969 年选择了湖南株洲的一个企业。1970 年“清查 516”时被押回学院受审查。1983 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8] 蒯大富生于 1945 年，1963 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68 年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1970 年“清查 516”时被押回清华受审查。1973 年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 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 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1987 年刑满释放后和一位山东籍女士结婚，移居山东。
[9] 比如，蒯大富住在深圳多年，但当地政府只准许其妻女在深圳落户口，而不让他

获得当地户籍。经过多年申请，他才在山东获准得到护照，允许他出国旅行。前年，他曾接受记者田炳信的采访，但嘱其不要发表。去年田炳信发表了他们对话的内容(田炳信，《采访今日蒯大富》， 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kuai)。官方为此找蒯大富谈话。大意是这些年我们对你不错，你为什么接受采访。蒯大富说，你看，对话里我说了：“朋友间聊聊天可以，任何媒体上都不要发表。”
[10] 蒯的公司业务比较忙，所从事的行业竞争激烈，他目前的主要精力用于实现挣钱计划。
[11] 见“内幕：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peacehall.com/forum/lishi/706)。
[12] 引自“刘贯一致胡耀邦的信”，《聂元梓回忆录》代序第 10 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1 月出版。
[13] “文革第一号造反派人物聂元梓：‘我不是反革命’（www.kanzhongguo.com/news/gb/articles)。
[14] 出处同上。
[15] 单正平，“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引自何清涟主编的《20 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237-248 页，博大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16] 出处同上

“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

——重新解读毛泽东１９６８年7月２８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

唐少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众所周知，鉴于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7月２７日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７月２８日凌晨３时半至上午８时半，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了时称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新北大公社领导人）、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航红旗战斗队领导人）、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领导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东方红公社领导人）和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领导人）。

参加召见的还有时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实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文革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另外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政委黄作珍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迄今还不知道的原因，当时作为该“司令部”成员的李作鹏、张春桥没有参加这次召见。参加这次召见谈话的共计２０人。

◇　韩爱晶的回忆文本

当年参加了这次召见的韩爱晶，近些年来，从事了力争比较完整地回忆和记述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的工作。据韩爱晶所言，他收集了当时经过流传的关于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的不同文本，多次请当时参加谈话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等人（谭厚兰已经病逝）事后追述、补充。特别珍贵的是，韩爱晶在当时所记录下来的谈话速记稿，据我所知，是目前已知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比较完整的文本。韩爱晶在自己所保管的这份速记稿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文本，写出了他自己的回忆文本。这个文本实际上已经以某种形式公开发表了，例如，据韩爱晶所言，已经出版发行的《聂元梓回忆录》〔１〕中转述的毛泽东“７·２８”谈话就是根据韩爱晶所提供的这个文本。〔２〕韩爱晶的这个署名文本题目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全文约三万字。这个文本写成后，在韩爱晶的部分同学、朋友以及少部分文革研究者中流传，现已在美国华人主办的网站“新世纪”上全文发表（也载于本刊ｚｋ０６０３ａ——编者注）。遗憾的是，这个文本也存在当时的记录者记录不清和事后的回忆者回忆不明的几个空白之处。

我对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文本重新解读就是根据韩爱晶撰写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下面引用的毛泽东谈话，皆引自该“谈话记”，——注）。我个人认为，除了至今还没有公布的当时毛泽东召见这五位领袖的谈话录音以及录音文字资料之外，韩爱晶的这个回忆文本是目前为止关于毛泽东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召见谈话的比较可靠的文本。它比当时由北京许多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广为传抄、印行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见红代会代表》一文（该文注有“

此稿经王大宾同另四位再去听录音而记成”，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证实）等，更为丰富和详细。在记录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几个公开发表的文本中，韩爱晶的这个文本作为文献的价值性、准确性和翔实性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其理由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在当时出现和流传的文本，主要是力图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制止和结束武斗的指示精神，对毛泽东在这次召见的全部谈话，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有所选择地公布或传达；而韩爱晶的回忆文本不存在这种局限；二是在韩爱晶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都有一个过于简单的特点，即对于毛泽东的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谈话，只是用几千字（最多的约一万字）来记述，不能展现出这次召见活动的全貌；三是当时流传的几个有关文本还经过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或造反派组织的加工甚至“取舍”，过分折射出当时这些组织各自对于这次召见谈话进行不同领会或不同解读的功利目的和实用手段。而韩爱晶的文本基于当时的速记稿和当事人的补充，在事后三十年的追述，凸显出它的相对客观、平和、细致。

◇　毛泽东召见的由来

毛泽东此次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的直接起因是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严重流血事件。这一流血事件源自于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即作为激进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总部”（以下简称“团派”）和作为相对温和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以下简称“四派”），主要基于关于文革的分歧和各自利益的分化，展开了持久的论战，并最终于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爆发了全校规模的大武斗。这场直至７月２７日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才结束的、史称“百日大武斗”　的事件，共造成清华师生员工１１人死亡，４００多人受伤，经济损失无法估计。〔３〕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由来自北京６１个工厂工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警卫团（８３４１部队）人员领导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遭到了团派的武力抵抗。而与此同时，四派采取了先是观望后是认可的态度。自中午时分至子夜，共计有５名工人被打死，７３１名工人、解放军官兵受伤。那一天，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和清华大学的所有人员都不知道这一工宣队进驻是由毛泽东本人直接决定的。即使蒯大富在那一天的下午赶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与吴德等人争吵，他都不知道工人这次进驻清华的内情，直至次日清晨见到毛泽东不久，才如梦初醒。

从韩爱晶在７月２７日午后才得知清华聚集了众多工人的消息而赶往清华的经历来看，他们这些红卫兵领袖（如韩爱晶、李冬民〔４〕等）和前来清华的工人都不知道调集数万工人来清华的内情。清华的团派喇叭还在广播，指责工人们受到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及其黑后台的操纵。韩爱晶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打电话，不得而知，给北京市领导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众多的事例表明，毛泽东决定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一事，在实施之前，仅限于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所知。毛泽东的这个决定的保密性以及实施的突然性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颇有意味的。

７月２８日凌晨２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严重的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

，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５〕毛泽东对于清华“七・二七事件”当下的反应，充分表明毛泽东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派出工宣队所带来的事态的严峻性。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

凌晨时分，韩爱晶接到电话，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活动。在这之前，韩爱晶等并不知道是毛泽东的召见。在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来到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之际，韩爱晶已经感觉气氛与以往多少有所不同。他们四人在等待时，议论起清华白天发生的事情，只是王大宾提起了清华学生开枪打死了工人，看来，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三人当时并不知道清华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他们在由谢富治领进会场时，才知道是毛泽东要召见他们。谢富治对韩爱晶、聂元梓等四人说，“今天是毛主席召见你们，还有中央首长参加。”谢富治又重复说：“是召见我们，不是接见啊。”〔６〕这次活动，正如谢富治所强调的，不是毛泽东接见，更不是会见，而是“召见”。“召见”一词的使用，即使在三十年后韩爱晶依然使用这个词，表明了毛泽东实际上迫不得已地举行这次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表明了红卫兵五位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所处的尴尬或窘境。这次毛泽东与红卫兵五位领袖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谈话，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也是在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红卫兵领袖的正式谈话。

从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清华发生流血事件的电话后赶往人民大会堂，到韩爱晶等人出现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召见这几位红卫兵领袖之前，已经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亦即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大多数成员有过商谈。韩爱晶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个商谈的内容至今没有透露。而这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地与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架势，非同一般，也从未有过。

蒯大富因为忙于清华流血事件后疏散团派人员以及到北京电报大楼紧急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等等事务，没有及时赶来。毛泽东在谈话刚开始时，还有点不满地问道：“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谢富治、韩爱晶分别作了解释。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暂时避难”，蒯大富是在７月２８日清晨六时左右，才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以及聂元梓的电话转告赶往召见会场的。在蒯大富进来时，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他们把蒯大富随身所带的刀子等加以收缴。〔７〕根据蒯大富与我的多次谈话记录，蒯大富一再强调，他没有携带任何刀子、手枪之类的武器。〔８〕今天看来，蒯大富的说法是可信的。

毛泽东在谈话一开始，就把向清华大学派驻制止武斗的队伍即工宣队的决定当成他个人的不容对抗的命令。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据事后作为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指挥部成员之一的迟群的回忆，在７月２６日，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住所里就派出制止武斗的队伍进驻清华问题，亲自做了决定，并在清华的地图前还对队伍的进驻路线作了具体的部署。

清华大学在“七・二七事件”之际，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直接关注和直接左右的文革单位，工宣队的领导人先是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张荣温，后是自１

９７０年之后，迟群、谢静宜，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人。不仅如此，迟群、谢静宜还被委以重任，负责兼管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市共青团以及北京市文教等工作。他们两人直接行使着来自毛泽东权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总管”职责。文革之际，毛泽东很少向某个单位或部门直接派出有关队伍或特殊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以“七·二七事件”为标志，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的关注和钳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更加深切，这一点也为１９７５年清华刘冰等四人给毛泽东写信而遭到毛泽东严加痛斥的事实所证明。无论怎样，清华大学在文革时期都不愧是毛泽东的“点”，即毛泽东的“基地”之一以及文革的“样板”之一。召见完后，谢富治在湖南厅门口对出来的五位领袖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一句话你们都不检讨。”〔９〕谢富治的意思是五位领袖尤其是蒯大富应该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对“七·二七事件”表示出某种自我批评的态度，但是处在困惑甚至迷惑中的五位领袖怎么能够表示清楚这种态度呢？谢富治在这次召见之后，立即让这五位领袖讨论并且由韩爱晶执笔起草关于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一个用于公布的文件，旨在立即有效地结束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高等院校的群众武斗。这个名为《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的文件，稍后得到周恩来等的认可，经上报毛泽东、林彪后，迅速地以布告、更多地是以传单的形式转发全国，而没有像以前以中共中央档的形式加以正式公布、传达。另外，还可能有一份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书面整理稿，这个整理稿没有公布。〔１０〕

肇始于清华大学武斗事件而来的这次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既是毛泽东在文革经历了两年多后最终决定“重整”文革的群众问题（即主要是群众组织和群众武斗）的契机，也是毛泽东首次通过面对面地同红卫兵五位元领袖的谈话方式，来总结和改变大学的文革运动的转机。今天，解读这个召见谈话记录文本，可以确定，它体现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其实践的重要取向。

◇　解读毛泽东召见的谈话

相比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几个著名的、通过不同方式传达到全国的讲话（例如，１９６７年夏季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讲话、１９７０年底毛泽东同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的谈话、１９７５年底的“打招呼”讲话等等），毛泽东１９６８年7月２８日的这次召见谈话，在当时，公布出来的信息量似乎不是很多，但是它对文革局势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对文革群众运动以及群众组织的影响，却非常重要，超过了我们提及的上述几个谈话。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还有许多事态并不明朗的特点，例如，是否把工宣队作为大学文革的领导力量，是否把大学的整个师生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初期给文革立下犬马之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学生列入文革的对象即“再教育”、“再改造”的对象，在７月２８日当天的召见谈话中并不明显、具体和确定。显然，经过这次召见谈话，毛泽东最终决定从整体上转换大学文革的局面，把他所派出的工宣队提升为一支文革的崭新角色，昔日被毛泽东所倚重的文革始作俑者的功能——造反及夺权功能转入到文革“斗（斗资本主义）、批（批修正主义）、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教育革命”的整治功能。例如，毛泽东８月５日把巴基斯坦朋友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清华工宣队以表示慰问，８月１５日接见了工宣队代表以表示更大的关怀，８月中、下旬指示姚文元写出有关指导性的

文章并从总体上概述由清华文革带来的新情况，以表示毛泽东的文革新策略的确定，等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在７月２８日的召见谈话与他８月之际的一系列措施之间具有强烈的互动，并且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那些直指文革全局愈益强硬的决断和愈益具体的措施。在我看来，至少是毛泽东在７月２８日之后，他对清华“七·二七事件”的进一步详细了解，加上根据他的通盘考虑，他把清华这次事件当作一个转机，来整合整个文革大局。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我认为可以从下几个重点来加以解读：

１、标志着文革群众运动的衰败和群众组织的终结

文革伊始，毛泽东依靠并利用群众运动掀起了文革的狂风暴雨。这种群众运动大致上包括了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前者主要是以中学生、大学生为骨干的推广和普及文革的群众运动，后者是旨在夺权（即夺取各省级以下地区、各基层单位的权力）的群众运动。例如，１９６６年7月底至8月，正是给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钦定”和鼓励，毛泽东有了一支把文革的运作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各个角落的突击队；又如，差不多与此同时，正是借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造反派，毛泽东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文革初期战胜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理解、所推行的那种沿袭过去政治运动模式的文革运作方式。１９６６年9月崛起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造反派是使文革矛头直指清华之外的文革最大的斗争对象的一支生力军。把清华大学作为文革初期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大造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反的斗争由北京推向全国，由中央推向基层，由清华推向各地。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屡屡得势并且成功的一大“法宝”。

到了１９６８年夏季，经过两年的文革群众运动，已经把文革最初的打倒走资派和进行“斗、批、改”这一文革主旨，转换成了群众运动的内讧直至内战。不同的群众派别围绕着权力之争，很有可能使得文革走向不归之路。经历了由“文斗”到“武斗”，群众组织本身也已是千疮百孔，群众组织自身的弊端和危机不亚于文革最高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和张力。

１９６７年夏秋，毛泽东一再主张，文革不同的群众派别应实行联合，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即使到了这次召见谈话前夕，毛泽东也从不公开表示对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的具体看法，至少在表面上，毛泽东对于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不赞成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武斗，殊不知正是他掀起的文革大潮冲开了群众的利益急剧分化和群众的派别四处对立的潘朵拉盒子，而一发不可收拾。

在蒯大富来到之前，毛泽东着重谈论怎样解决大学内的文革两派难于化解的武斗，对此，毛泽东在气头上说出的一些话，显得有些凌乱。在重复地提出的几种解决武斗问题的办法中，看来毛泽东最不满意大学文革的一点的就是：文革由最初确定的“斗、批、改”变为“斗、批、走”，这里的“走”既是指在武斗形势下广大群众对于自己所在单位的武斗的回避或出走，也是蕴涵着对于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题的游移或背离。

面对两年来以清华为代表的大学文革群众运动的弊端，毛泽东提出了四个具体解决办法（这四个办法又被林彪、姚文元各自归纳、强调了一遍）：一是军管，二是把武斗的学校一分为二，即让武斗的双方分离开来，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武斗并且大打。根据我的分析，第一种办法即军管在当时曾广泛应用于许多的工厂、机关和部门，但对于学校是否进行军事管制，毛泽东比较慎重，最终没有决定在全国所有的大学实行军事管制。这是颇为值得回味的。第二种办法把各个大学武斗的双方安置到不同的地方，这毕竟不太切实可行，毛泽东说此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正如毛泽东所言，就是在同一个群众组织内部也会有不断的分化，即使从空间和地理上把对立的群众组织分离开来，也是如此。第三种办法是把文革初衷的“斗、批、改”演变为“斗、批、走”，这里的“走”其实还进一步有可能显示出由于文革群众运动的内战而有可能带来文革的衰落或失败。第四个办法实际上也不可行，这更加显示出毛泽东说出气话之际的失望和焦虑。到了１９６８年仲夏，毛泽东再也不会放任群众运动自行其是了，尤其是不会容忍群众武斗继续下去了。

上述的四个办法实际上最后都没有采用。这四个办法其实只有第三个办法似乎有一定的可行性，恰如姚文元所说的：“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最后演变为由进驻大学制止武斗的工宣队来主管大学全部“文革”事务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即工宣队占领并主导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界。

当初，毛泽东向清华派出工宣队，他的打算是什么？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或最理想的结局又是什么？如前所述，毛泽东没有预料到清华出现的严重流血牺牲的结果，没有估计到团派对于工宣队的激烈反抗。这是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没有及时地、明确地、直接地传达到清华，尽管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过，向清华派出工宣队“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还是在毛泽东之外的什么人员或机构由于特定的理由而根本不传达、不公布毛泽东的决定呢？这些几乎已经成为历史的悬案，也成为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清华乃至整个文革发生转折的一个关键点。尽管现今人们无法完全复原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初衷，但是我个人推论，毛泽东当时是想以他的名义派出的数万名工人进驻清华，制止武斗，调和或结束群众两派的冲突，促成群众两派的大联合，最终成立并形成以团派为主体的清华文革权力机构。从毛泽东建议蒯大富当清华大学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的说法，可见其端。然而，工宣队进驻清华所遭到的严重的流血牺牲，给毛泽东改写文革初期历史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题目。

今天看来，毛泽东派出的工宣队及其结局还形成了同文革诸多事件或事态相类似的某种历史吊诡。虽然毛泽东当时派出工宣队引起的境况可能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但是毛泽东适时地利用这个境况，把它导向对于大学的文革运动乃至全国的文革运动的一次重整。在清华“七·二七事件”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初衷与毛泽东的应变之间的张力，毛泽东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手段之间的转换，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当然，在这些张力和转换中，毛泽东失去的或渐渐失去的是给文革爆发和文革得势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群众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在庆祝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

，公布了毛泽东第一次发表的“最新指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１１〕这是首次向全国公布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基于清华“七·二七事件”而来的文革策略的重大转换。这也再次表明，在７月２８日召见后，基于对当时大学文革情况的分析和对文革全局的推断，毛泽东采取了把最初派驻大学去制止武斗的工宣队“升格”为领导大学的政治力量。随后，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１２〕时，这一点就非常明确了。８月２２日，姚文元在把自己写就的题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送给毛泽东审阅。姚文元写道：“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１３〕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姚文元的文章，把原来的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８月２５日《红旗》杂志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经过毛泽东多处修改、补充的姚文元此文。毛泽东让文革的头号笔杆子姚文元而不是以文革时期著名的“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来宣讲文革的新策略，耐人寻味。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的初稿上加写进去的话语，则把由于清华“七·二七事件”所导致的文革策略的变化加以明确的概括：

一是确立以工人阶级身份出现的工人宣传队对大学文革的占领地位，“并且永远领导学校”。〔１４〕

二是所谓排斥工人阶级的“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公民们”不仅咎由自取，而且应当研究这类独立王国被摧毁的教训。〔１５〕

三是大学中所有的学生、知识份子，即使是那些在文革伊始造过“走资派”反的红卫兵小将，都不可能完成斗、批、改等任务。

四是在所有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和单位，要“打破知识份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只有如此，知识份子才“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１６〕

五是继续进行毛泽东所部署的斗、批、改任务，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等，〔１７〕言外之意，就是使文革沿着毛泽东指出的轨道进行，而不是陷于群众内讧和群众武斗之中。在１９６８年整个8月里，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认真搞好斗、批、改”，〔１８〕这就表明，“斗、批、改”这一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题，在经过了群众运动的演变、取代以及被群众武斗所异化之后，开始重新回到文革运动的中心地位。

８月２５日同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根据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宣传队的经验，决定向全国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领导各个学校文革的工宣队。〔１９〕自那时起，文革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实质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从１９６８年底，毛泽东号召广大中学红卫兵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同年底次年初，在大学的几届高年级学生一起毕业分配和几届

低年级学生几乎全部到军队、到农场接受训练和从事劳动，再到１９６９年４月随着中共“九大”　的召开而逐步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及干部管理体制，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经历了由中心走向边缘、由学校走向基层、由城市走向农村、由狂热走向冷寂的命运，最终走进了它那衰弱、消解的历史归宿，并由此而宣告了文革初期的结束。

正如毛泽东在这次召见时谈起北京大学文革的“斗、批、走”问题，显露出他对文革如何发展的困惑甚至被动。毛泽东说，从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大学原计划停课半年搞文革，到延长一年，再到延长两年，他不愿意继续延长下去了，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我说三年就三年嘛!”到了８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及大学文革等问题，毛泽东强调了文革有关任务的部署，并作了一个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２０〕“三年就三年嘛”和“是时候了”，短短几个字，既流露出毛泽东所期待的文革初期转变的将要来临，又表明了毛泽东再也不愿意让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进行下去了，再也不看好群众组织的角色了。因而，文革群众运动寿终正寝、文革群众组织偃旗息鼓，就不是置身于其中的群众及其领袖所能左右的了。

２、意味着红卫兵领袖和造反派领袖角色的衰竭

这次召见谈话之所以对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产生致命性的影响，还在于毛泽东对于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这五位领袖所表示出的不信任和所进行的指责，尽管毛泽东在当时再三地表示出对他们的关爱和惋惜。蒯大富、韩爱晶等五人兼有文革红卫兵领袖与造反派领袖之化身的集合，他们不仅在北京地区的文革初期群众运动中叱咤风云，而且在全国的文革初期形势中独领风骚。他们五人在当时被冠之为富有意味的“五大领袖”的称呼，而毛泽东称他们为“五大将”，就从诸多侧面显现出他们的文革角色及其“政治能量”。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的。”毛泽东在蒯大富还没有赶来之前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毛泽东由昔日对这五位领袖的重视到此时所具有的懊恼态度，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矛盾而复杂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已经体会到了，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或派别对于他本人的诸多指示、讲话等，加以唯己所需地利用所带来的后果，造成了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群众组织混战致使文革天下大乱的恶果。毛泽东力图纠正在他的文革麾下聚集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要求的文革群众对于整个文革大局的实用主义的目的和急功近利的做法，其途径之一就是经过这次召见谈话而使北京地区的这五位元领袖逐渐地淡出文革大局，而直接的影响也是自１９６８年底起，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红卫兵风云人物和造反派代表人物逐渐地游离或远离出文革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对于这些领袖的复杂态度还可以从下面这个情节中体现出来。晚来参加这次召见活动两个多小时的蒯大富，在清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北京航空学院等许多地方奔波了一天一夜之久，赶往人民大会堂时还不知道是毛泽东召见。当

蒯大富一进到会见场地，见到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时，悲喜交加之情，无以复加，放声大哭。毛泽东站了起来，其他人也都站立起来。蒯大富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像一个受到委屈的孙子见到自己慈祥的爷爷一样，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纵情哭诉："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毛泽东也落下眼泪，江青几乎是失声痛哭，其他人也泪盈眼堤。当蒯大富讲到由"黑后台"操纵几万工人打进清华园，清华"井冈山"群众被抓或被迫撤出时，毛泽东转过身来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蒯大富曾对笔者说过，他当时听到毛泽东的此话，情绪颇为激动，脱口而出："不可能！"〔２１〕蒯大富的理由是毛泽东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不抓人，而"这次却抓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人"。毛泽东听后有些恼怒，责问谢富治、温玉成，并命令把抓的人统统放了。蒯大富进来以后，气氛大变，因为蒯大富是"七·二七事件"的一个主角。经过安慰，蒯大富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他的谈话。毛泽东有些气愤地继续说道："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吧！""蒯大富，你真蠢呢，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问题在于蒯大富事先既不知道有这种"梯子"，又在事发之际根本不可能"下来"。

在７月２８日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对于五位红卫兵领袖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强调说："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都是护你们的"，他对这五位元领袖情况的了解似乎如数家珍。毛泽东对于五位领袖的态度还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他对聂元梓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过多，对蒯大富显得恨铁不成钢，对王大宾有些欣赏，对谭厚兰给了鼓励和希望，对韩爱晶则是给予了多次的肯定和赞扬。毛泽东还赞扬韩爱晶和王大宾各自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没有发生群众武斗。又如，在参见召见的这五位红卫兵领袖中，韩爱晶说话最多，在场的姚文元、陈伯达、江青、康生屡屡批评韩爱晶总是爱提出前途问题、信心不足、不懂马列主义等等时，毛泽东一再制止这些人对韩爱晶的批评。在韩爱晶当面请教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问题时，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韩爱晶在受到毛泽东一再表扬的同时，他希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给他以及他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派出解放军，以便对他进行监督。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夏季外出巡视时，对于全国性的文革激进群众运动达到狂热之际，曾说过类似的话。但那一次，毛泽东的此话似乎对于广大红卫兵小将以及造反派群众来说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在这次召见上述五位领袖时，毛泽东旧话重提，这就不是所谓的一般批评了，而是意味着即将对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做出历史性的扭转即终止，也即在毛泽东看来，红卫兵们和造反派们及其领袖在１９６７年与１９６８年所犯的所谓错误还是有所不同的，后一错误似乎是无法弥补的、无法原谅的。正如林彪给这次召见中毛泽东所说的一系列话语做出了画龙点睛式的总结以及对于五位元领袖的"错误"做出的一针见血的概括："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群众及其领袖在１９６８年所犯下的"错误"不但对于他们在政治上来说是致命的，而且给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带来了全局性的影响。

在当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没有明确地形成处置这些红卫兵领袖的具体意见或部署，至少，毛泽东在接见结束之后还有些出人意外地、颇为令人感动地重新回到召见会场，嘱咐在场的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负责人：“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不要又整他们。”这表明，毛泽东在那一天还不可能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措施来处置这些领袖人物，甚至还谈不上像后来几年那样从政治上用隔离、审查等方式惩治这些领袖人物。不过，到了８月８日，在接见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以及有关负责人时，毛泽东谈及大学问题，他说道：“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２２〕在这之后不久，在姚文元所写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对于那种所谓知识份子脱离实际、轻视工农的批评和对那些红卫兵学生搞所谓独立王国和“多中心”以及不搞文革斗、批、改的任务等等所作的声色俱厉的斥责，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对于红卫兵领袖们、造反派领袖们更加严厉的训斥，似乎与毛泽东在７月２８日召见中的批评不可同日而语。到了１９６８年年底１９６９年年初，毛泽东已经完全“冷落”了这些领袖。到了１９７５年年底１９７６年年初，在又一次缘起于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指示中，毛泽东提及这种大辩论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像过去那样受蒯大富、聂元梓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让来听“打招呼” 的老中青干部中，“青（年）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２３〕毛泽东在文革末期对于蒯大富、聂元梓的失望甚至绝望，由此可见一斑。

从由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而来的红卫兵领袖和造反派领袖角色的衰竭，可以展现出文革初期与文革中、后期在任务、主题、取向、群众功能以及群众领袖角色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差异，同时，也不难看出文革不同阶段的划分理由和不同阶段的方针、策略、矛盾的根据所在。

３、催生文革的“教育革命”

过去，人们对于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所忽视的一点就是毛泽东所谈及的“教育革命”问题。这次召见谈话，也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比较集中地谈及“教育革命”的“范文”之一。毛泽东从重整大学文革到论及大学的教育问题，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毛泽东所主导的文革战略在基本上结束群众运动之后对于将要到来的大规模的“教育革命”的大致勾勒。

毛泽东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用较长的时间谈论了包括教学方式、教材体系、文科教学等在内的教育问题，这些都是他５０年代“大跃进”时期许多言论和思想的重复，没有什么新意，例如，相比较于毛泽东１９５８年3月２２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２４〕和同年5月８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２５〕其主题论调，如出一辙，甚至所列举的人物、事例都非常雷同。但是，不同于１９５８年全国众多大学掀起的、为时几个月的“教育革命”，在１９６８年夏季之际，对于“教育革命”，毛泽东老调重谈，这不但成为开展文革“教育革命”的先声，再次充分

显示出毛泽东对于知识份子的轻蔑，例如他就文革中大学的武斗情况说："知识份子最不文明了。你说知识份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他对获得书本知识的轻视和对经验知识的重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在１９６８年之后逐步开展的文革"教育革命"　具体运作的基本准则。

由于文革头两年的群众造反运动以及夺权和武斗占据着文革的主流地位，文革意义上的"教育革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而这种造反运动的日趋衰落，则"促生"了"教育革命"逐渐由后台走上前台。从目前已公布出来的材料来看，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以及毛泽东这次召见之前，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7月１２日会见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的会议上，已经就教育问题以及大学办学方针和政策作了有关谈话。7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在提交给毛泽东一份关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问题的报告中，说明派出记者写出此调查报告，加写了编者按，并准备公布毛泽东7月１２日的那段谈话，即"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２６〕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２７〕7月２２日，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公布出来。我个人推论，毛泽东在7月２８日召见中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谈话与7月１２日的谈话和7月２２日的公布是有着前后关联的，即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打算整治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的文革局势，在文革群众运动大潮过去之后，具体地说，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之后，将适时地、大力地开展文革"教育革命"。

在这次召见中，仿佛陈伯达最为重视"教育革命"问题以及学校办学和复课问题。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陈伯达似乎意识到了文革对于大学教育的严重冲击使得大学已在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连续三年不但停止招生，而且几乎完全停学的严重性。当然，陈伯达不可能主张恢复文革前的教育运作模式，他只不过是想使被文革群众运动暂时阻断了的"教育革命"走上文革的议事日程。陈伯达的这一见解与他在稍后起草的关于在中共"九大"报告中强调促进生产力、恢复经济发展的见解是相辅相成的。〔２８〕

毛泽东接着陈伯达的话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用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从毛泽东的话来看，主要是由于大学里分成了群众两派及其对立，他似乎也拿不出完全有效的实施"教育革命"的解决办法。文革初期的两年多，不仅大学的教学活动几乎完全停滞，而且大学停止招生直到１９７０年才告结束。像中国文革时期这样一个全国停止大学招生长达四年之久的国度，恐怕在２０世纪教育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因而，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及群众武斗不停，"教育革命"就无法进行。这也就使得大学的本职工作究竟是以文革的群众之战为主，还是以办学、教学为主，愈益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文革最高领导层加以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

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文科还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毛泽东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大学人文学科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毛泽东认为，“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他还说，“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这与他同意在文革初期“砸烂公、检、法”有关；他强调不能拿学历来看待人才。毛泽东还一以贯之地主张，学校教育要取消考试，教材要删繁就简；强调学生自学；认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等还是要办的，等等。

这次召见谈话之后所带来的文革“教育革命”已经不同于以往“教育革命”还是由学校干部、师生来主导的，例如，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底还打算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来进行“教育革命”，那时他发出的号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２９〕由于清华“七·二七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文革“教育革命”仿佛已经成为来自学校之外、从天而降的事情了，学校的一切主要工作都是由工宣队主宰的，学校几乎所有的师生员工成为“教育革命”的对象或被改造者。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也担心，在办学方面，“我们可能犯错误。”是的，毛泽东所主导的文革“教育革命”从根本上讲不仅非常荒唐，而且彻底破产。长达六年之久的文革“教育革命”不仅成为文革整个历史上最大的“乌托邦”噩梦，而且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从教学体制到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成为不堪回首的教育史上的“怪胎”。〔３０〕毋庸置疑，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是使文革“教育革命”开始涌动和铺张起来的一个引子。

４、评说清华团派和四一四以及四一四思潮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给人印象最具体的是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两派群众组织——团派和四派（又称“四一四”）——的评说。由于一再主张群众派别的大联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于一个单位（或地区或部门）　对立的群众两派的直截了当的评论，极为少见。这仿佛是毛泽东对于聚集在他的文革“角斗场”中的不同群众派别的一种表面上不偏不倚的姿态。正是基于这种策略，再加上清华武斗给文革形势带来的特殊作用（主要是如何制止造反派群众日益严重的武斗），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之后公布的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的指示精神要点，删节掉了许多有关毛泽东谈及的对于清华四派的指责。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对于团派的偏爱，对于四派的不满，毫无掩饰，分外真切，这与他在文革以来一贯对待两派群众的所谓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大相径庭。毛泽东对于四派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十几个小时前在清华发生的流血事件看来颇为感叹：“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毛泽东对于团派抵抗而四派没有抵抗工宣队进驻清华，感到有些意外，痛斥团派的愚蠢。毛泽东恨铁不成钢地批评团派的策略：“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毛泽东的这个“四一四是反

对我们的”说法不啻是他个人以及以他为首的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四派的历史性结论，也正如江青所说的：“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毛泽东似乎对于清华整个四派的一系列行径了若指掌，愤愤不平地说：“他（指四一四，——注）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毛泽东对于清华两派的不同态度由此昭然若揭，只是当时出于文革大形势的需要，制止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性的武斗远远高于给清华一隅的群众派别做出结论，毛泽东的这番对于四派不啻为致命性的评判才没有得以公布。毛泽东对于四派和团派在“七·二七事件”各自所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做出的评价，看来有些惆怅和无奈，但他还是建议两派实行联合，并且这种联合是要以蒯大富为主的，“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对待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毛泽东不愧是一位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大师，他非常准确又十分细致地区分了团派与四派的根本不同，并且一针见血地意识到团派代表了他所推行的文革运动的正宗和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文革理论的真谛，而四派不过是他统率的文革群众中一部分人具有的偏执、“修正主义”甚至是异端的派别。毛泽东不看好四派，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非常合乎文革逻辑的。毛泽东对于清华四一四的评价堪称清华文革历史的一大“亮点”。在整个文革期间，几乎没有哪一个群众组织像四派这样受到了毛泽东如此明确、详细的评价。四派的群众当时不知道毛泽东的此番评论。可以想像，当时若是公布了毛泽东的评价，四派群众的失望、失落和失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即使在许多年后得知了毛泽东关于四派以及“四一四思潮”的评价，当年的四派领袖及其群众对于毛泽东把他们自己视为文革的“另类”，特别是对“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那句名言，一些人失望不已，叫苦不迭；一些人耿耿于怀，难于冰释；更有一些人自以为是，见怪不怪。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派领导人沈如槐的看法：“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四一四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在谈论四一四时他老人家的用字遣词、语调神情，跟谈论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的用字遣词、语调神情一模一样。在他老人家眼里的四一四完全是一个保守组织、右派组织，他之所以没有下令搞掉四一四，只不过是想保留四一四作为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而已。前不久，在与韩爱晶谈到毛主席７·２８讲话时，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他，韩爱晶说：‘你的感觉对极了’。”〔３１〕不过，说毛泽东想把四一四作为一个反面教员保留下来，值得商榷，因为在“七·二七事件”之后，不到二十天，团派与四派在清华大学似乎是“无疾而终”。显而易见，自１９６８年８月起，团派和四派都已失去了他们存在的理由，也完全失去了他们各自的功能和价值。到了８月中、下旬，团派和四派都停止了运作，都从文革政治的轮盘赌局中迅速消失。

在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中，对于清华文革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他对“四一四思潮”的具体评价。从这些评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本人对于清华文革的诸多具体问题的心态和视角，尤其是他本人对于像清华这样一个单位的文革运作的态度和策略。毛泽东说：“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指示北京卫戍区释放被关押的周泉缨。在蒯大富进来之后，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四一四问题：“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

，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于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毛泽东实际上在这次召见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部署，既没有让整体意义上的造反派也没有让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群众两派的任何一派“坐江山”，这同毛泽东开始把造反派从文革大局中逐出的策略有关。因而，毛泽东口头上对四派的批评与他实际上对四派主张的默认之间的矛盾、反差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不可能完全放手让造反派群众横行、恣意文革天下。即使四派自己没有“坐江山”，它也没有让团派“坐江山”的意图得逞，这些从更大的层面上都是来自毛泽东的作用。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自１９６７年初围绕着如何理解和如何进行文革、如何看待和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历史、如何评价和如何对待文革伊始被打倒或被迫“靠边站”的清华原中、基层干部等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进而围绕着如何建立和如何运转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由这些论战和冲突而走向旷日持久、无法调和的大规模武斗。在这一论战和冲突进行之际，四派所谓理论家周泉缨１９６７年７月写出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比较系统地概括和阐述了闻名遐迩的“四一四思潮”。“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文革中阶级关系及阶级阵线不变，即文革的对象不能因为包括了“走资派”而撇开了“地富反坏右”，文革的敌人是“两小撮”，而不是“一小撮”；二是造反派只能造反即“打江山”而不能掌权即“坐江山”；三是文革已经到了必须修正、巩固、妥协的阶段；四是应该对广大干部“平反平黑”并大胆解放和大胆使用他们；五是文革的主流应回归文革前十七年的河道。〔３２〕“四一四思潮”的提出和流行是文革初期来自群众运动的对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的一次重大的“修正”甚至解构。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十分准确地看到，四派及其“四一四思潮”是与他的文革主张和文革部署难以吻合的，甚至有可能是南辕北辙的。而毛泽东对于清华团派思潮和主张的肯定就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是对其武斗策略大为不满。

今天看来，“四一四思潮”的确是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或文革主张）和文革实践的“偏离”，即从毛泽东的文革“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分离出来的“修正主义”思潮，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有悖于毛泽东文革正统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潮。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潮对于文革的怀疑、批评和动摇实际上有可能演变为导致对于文革的否定！这一点在文革结束后，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即许多人士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控诉更多的是依据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情结和心怀来进行的。如果说，周泉缨在文革期间以对待十七年的看法来指责文革是相当有见地的话，那么文革结束后，过多地从文革前十七年的取向和价值角度来评判文革，就远远不够了。一个简单的反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文革十年的历史直接源自于何处？周泉缨本人在文革后的反思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一四思潮”既动摇了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在文革初期对文革造反派的思想一统局面，又加剧了文革广大群众的思想分化以及部分群众的怀疑倾向，更有效地削弱了以团派为代表的所谓文革群众组织的“正宗性”并瓦解了同样以团派为代表的文革群众主流思潮的“真谛性”。文革众多的思潮在文革结束之后，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一四思潮”是最为走红并且成为唯一胜者的文革群众性思潮。〔３３

〕

５、展望文革的前途

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认为，颇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对于文革前途的展望。

韩爱晶在这次召见快要结束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在他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换言之，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的前途问题，也包含文革的前途问题。韩爱晶向毛泽东和在座的人员一再提及蒯大富不能及时赶来参加召见的难处，并强调蒯大富"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这也意味着红卫兵领袖们的命运是同文革的前途息息相关的。韩爱晶直言提出的包括文革前途在内的中国的前途问题是与会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会场气氛变得严肃起来。韩爱晶提出的这个问题决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经过长期思考、孜孜以求的。例如，１９６７年７月初，在北京中南海西门形成的由学校、工厂、机关等七百余所单位、数十万人参加的"揪刘（少奇）火线"步入高潮时，身处文革漩涡中心的韩爱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文革的"隐患"。７月９日，韩爱晶、蒯大富从这一"火线"上"视察"后，搭乘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轿车返回清华。途中，韩爱晶向陈伯达提出了与其一年后向毛泽东提出的类似的问题，请陈伯达解答。韩爱晶的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会不会有像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那样的窃取文革成果的人物，中国会不会出现你说你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他说他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分裂、割据、混战的局面？等等。在下车分手之前，陈伯达告诫韩爱晶、蒯大富说，在文革前进的路上，不要"行百里者半九十"，并鼓励他们，文革有"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前途"。〔３４〕　以韩爱晶为代表的文革著名风云人物在１９６７年夏季至１９６８年夏季就已经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了文革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他们的底气不足和忧患意识预示了文革前途岌岌可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文革的前途就被历史地画上了沉重的休止符。

对于韩爱晶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文化大革命好"。包括文革前途在内的问题，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谈到要依靠人民，谈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一次次党内斗争而前进的。毛泽东有些信心不足地说："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差不多是在毛泽东回答了韩爱晶的上述提问后，这次召见谈话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这次召见谈话还表明，毛泽东对于文革确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计画或方案，往往是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穷于应付，显示出他的文革诸多策略具有迫不得已的内涵和特点。不过，毛泽东应付文革危机和转折的能力和对策无疑是独一无二的，这固然基于文革中亿万大众对他的爱戴、服从和迷信，但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什么人能够从大局上改变清华文革的武斗形势乃至清华文革的出路，也没有什么人能够由此而制约文革的全局。毛泽东的文革权威达到如日中天之际，也是它得过且过、四分五裂之时。

总之，毛泽东拿过去中国历史以及过去中共历史的斗争经验来“度量”中国的前途以及文革的前途，这并不能免除文革在他去世不久的彻底破产，并不能免除他的文革理念和文革实践随着他的生命的结束而出现全盘崩溃。

◇　曲终人散“魂”何在？

正如韩爱晶指出的，毛泽东的这次召见时间之长，远远超出了毛泽东会见其他人的时间，例如，毛泽东接见外宾一般也不过是在４０分钟左右，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召见谈话的良苦用心。在《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中，通过那亲身体验而维肖维妙的描写，韩爱晶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文革政治语义的画卷。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的神态、语气和举止，栩栩如生，而且毛泽东之外的其他人的音容神貌乃至心境，也跃然纸上。而所有这些给我们重新解读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同样提供了非常值得回味的佐证。

例如，在这次以毛泽东谈话为主的召见中，“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他成员各显特色，林彪的一言中的和老谋深算，姚文元的咄咄逼人的讲话，陈伯达的大大咧咧的插话，江青的大而无当的谈论，一些发言者之间的相互吹捧，陈伯达、江青和康生对韩爱晶、聂元梓等居高临下的训斥，吴法宪和汪东兴的一言不发，叶群吹捧江青而遭到毛泽东的白眼等。又如，军方人士除林彪之外，大都保持沈默，或者不主动参与话题的谈论。相比之下，文方人士，诸如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则显得夸夸其谈，喋喋不休。又如，黄永胜、温玉成在回答毛泽东的问话时，他们各自立即毕恭毕敬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回答（黄永胜还把自己的军帽拿下来，放在桌子上）。他们一个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个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对于他们自己的统帅兼领袖的敬畏之情，拂面扑来。

概言之，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作为文革的一首“断魂曲”，其意义主要在于：

一方面，毛泽东通过这次召见谈话，基本上成功地遏制了整个文革的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单位性的群众武斗。毛泽东承认，他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一些群众斗争方法被滥用到文革之中，但他认为这个无关文革大局，即使是打死了人，即使两派群众各自虐待武斗中的俘虏等，那也是策略和方法问题。尽管毛泽东口头上说，清华武斗造成数人死亡，众人受伤，实际损失最小、最小，然而，有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明确的，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群众武斗，并一再明令制止这类武斗，强调坚决镇压继续从事武斗的行为，甚至不惜以解放军的武力来加以歼灭。因此，遏制直至终止了武斗，文革群众运动的“气数”就由来自这一运动之上的毛泽东的断然干预而走到尽头。在毛泽东这位文革不同群众派别的同一个最高领袖的“强制性”的决断下，文革群众组织派别之间的分歧论战也好，则不休而休；文革群众派别之间的生死武斗也罢，则不败而败。从这次召见谈话之后，文革群众运动开始徐徐落下它那沉重的历史帷幕。以群众运动为主的文革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１９６８年年底）作为文革最为激烈、最为狂热和最为动荡的阶段，则趋于结束。无论是在深远性上还是在广泛性上，文革以后的阶段都无法企及文革的

第一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后期的七年历史只不过是为时近三年的文革第一阶段的“回声”或“综合后遗症”。

另一方面，毛泽东坚决反对在文革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或不同部门的群众组织搞横向联系，搞什么“全国时事形势讨论会”之类的串联会，他这里批评的是北京和外地一些群众组织及群众组织头头在１９６７年夏季文革群众运动高潮之际召开有关名目的讨论会。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以及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红卫兵领袖们的批评，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绝不容许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游离于该“司令部”控制之外的可能发生。毛泽东指责那些外地来京的群众造反派头头躲藏于北京个别红卫兵领袖的地盘，他认为，这些头头是“反对各省革委会和解放军”的。而这些群众造反派头头的作用已不是文革伊始的“开路机”，而是文革此时的“绊脚石”了。毛泽东还大力反对文革群众的所谓无政府主义现象，表明他１９６７年夏季就意识到外地群众组织头头来北京串联，搞所谓形势讨论会一类的活动大有离心于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之虞。而到了这次召见谈话之际和之后，这种无论是想像的还是潜在的危险都已化为泡影。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不能在文革中搞什么“多中心”，全国“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毛泽东的这番话，在８月２５日姚文元那篇对于这次召见谈话精神做出注解的文章里，得到了详细的阐释。进而，文革第一阶段的一大“主体”——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全面的失落、衰败、瓦解和消退，就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的了。

那么，什么是由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所折射出的文革“断魂曲”　呢？一句话，文革群众性的分崩离析和文革群众问题的全面异化。

注释：

１．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
２．唐少杰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与韩爱晶的谈话，北京。
３．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４．李冬民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代表。
５．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中卷，第１１３３－１１３４页。
６．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７．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中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１３４页。
８．唐少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唐少杰２００１年１月３０日与蒯大富的谈话，北京；唐少杰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７日与蒯大富的谈话，北京。
９．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

，第３１５页。
１０．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９页。
１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２０页。
１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３３页。
１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３３页。
１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３０页。
１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２９页。
１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３１页。
１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３１－５３２页。
１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２４页。
１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４０－５４１页。参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国防大学，１９８８年，第１６１页。
２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２６页。
２１．唐少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
２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２５页。
２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８９－４９０页。
２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８页；详文参见清华大学编印:《资料选编》，１９６７年1月，第２０９－２１３页。
２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４－１９５页、第２０８页；详文参见清华大学编印:《资料选编》，１９６７年1月，第２１３－２１８页。
２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０５页、第５０９页。
２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０９页。
２８．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修订版，第３０９－３１０页、第３６１页。
２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３５页。
３０．参见唐少杰:《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载《大学人文》第４辑，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４－１４２页。
３１．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２０页。
３２．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６５－４１６页。
３３．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２－２４４页。
３４．唐少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唐少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与韩爱晶的谈话，深圳；唐少杰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与韩爱晶的谈话，北京。

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韩爱晶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

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給尹聚平，让

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 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 10 分 20 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

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

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 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是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

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 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 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 分以上，80 分以下，70 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

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 XX。”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 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 x x x，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x x x 在南京军事学院，x x 学科，x x 学科，x x 学科都能考 5 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

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贵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 1966 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 • 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 • 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要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 63 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 40 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 63 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 38 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 63 军，你就该做 38 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 38 军工作，你们欢迎 38 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 38 军，去一半 63 军，38 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 16 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 200 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 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

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

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 88 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

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

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

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

李　逊

文革在许多工人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值得怀念的蜜月。那个时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赋予领导一切的地位。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始终称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而到了文革时期，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泽东那句被姚文元作为一篇文章题目的著名口号说，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与今天工人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中国的阶级论的划分，所谓工人阶级，其实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被称作“产业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户口在城市者，也被划作工人阶级，而农村人们公社管辖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则被划为农民。直至今天，户口在农村者，哪怕在城市工厂工作了十年，也还是被排斥在工人队伍之外，被称作“农民工”。而“工人阶级”的外延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始终游移不定。有时似乎是全体工薪阶层，包括现在被称为“白领”的阶层，有时白领阶层又被分了出去。不过，不管如何划分，全民所有制工厂的生产工人始终被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成员。文革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从所有的报刊文章、中央文件等来看，“工人阶级”显然只限于这部分基本成员。

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对全国文革局势影响之大，也是堪称领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阶层在文革中的地位。

一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党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历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被作为工人方面的代表，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领导。自１９４９年至文革前的１９６６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常委和委员的席位中，只有一个委员名额是留给工会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１９５０年，３３名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中，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有　４个名额，以后越来越少，到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市第五届人代会更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一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１〕。虽然以工会领导代表工人作为参政成员的做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例，但这些工会领导一则脱离工厂已经很长时间，二则不是工人选举产生，只是共产党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说，至少在上海，政权对工人的吸收是１９４９年以来最多的。许多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十七年。

在上层，从１９６７年初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后的文革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的比例都远比文革前高。在政府机构中，最初的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１９名“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工人代表占了４名，是占名额最多的〔２〕；１９７０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１０５名委员中，工人代表４３名，还是最多的。而在政党机构中，上海１９７１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７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１６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４名　〔３〕。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视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杰出代表。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进入了上海权力中心，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更是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在各工业局、公司和基层工厂，工人也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尤其１９６８年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达到顶点，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据上海市总工会１９７４年的统计：当时全市工宣队总人数１０７１３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数共４１４２人，其中进党委者１８９人〔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实职、掌握实权，许多人虽然只是副职，但权力往往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

在基层各级党和政府的委员会中安排工人代表，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文革前也这样做。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实权的工人干部，都是在长期的工作中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去的，长期的党或行政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党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再算作底层工人的代表。因此，每次党代会、人代会，都会安排一些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脱产，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担当任何领导实职，没有相应权力。

更与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党的权力虽然更为集中，但党的威信却因文革初期干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产党的干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神圣不可批评。文革中担任领导的工人就是因为造党政干部的反才得以被选拔进入党政机构的，因此他们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那样事事听命于党的干部，许多人甚至在整个文革中与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关系始终不融洽，尽管他们自己也担任了党的干部，这些新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工人干部而不是党的干部。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权威。分割党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权威。因此他们无时不刻地注意自己这个群体在党政机构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对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希望对党政机构施于尽可能大的影响，甚至左右党政机构的决策。

而在事实上，党的组织也从来没有象在文革中那样委屈求全于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的冲击干扰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这种现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虽然那时已再三强调恢复党的权威。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影响着整个上海的局势。从１９６７年的“一月革命”，直到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上海所有的风波都首先由他们掀起，各派力量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尊重，都想方设法与工人造反派稿好关系，工人

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的席位以及对他们意愿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待文革的态度。甚至连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也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曾有过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５〕。

不过，这一切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尽管在基层，参政的工人干部确实拥有比文革前大得多的权力，但在权力机构的上层，工人并没有多少话语权。文革的话语权一如文革前，只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一言九鼎，一句话决定整个中国命运，没有任何个人和阶层有这样的强势。其实，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也并不握有全部的话语权，他们所握有的只是阐释毛泽东的主意或思想的话语权。毛将执行政策的话语权交给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干部阶层，在文革前，诠注和执行权都集中在干部阶层手中，但后来毛越来越不满于干部阶层对自己的阐释，将阐释权转交张春桥等人，由此发动了文革。

制定政策方向的权力，始终只在毛泽东自己手中。这是毛的三权分立：自己制定政策方向，文革派阐释政策，干部执行政策。

工人造反派拥有的也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力。他们争夺席位，就是向干部阶层争夺更多的政策执行权。

干部阶层对工人造反派的渗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使工人造反派参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要参政，首先必须入党。而干部阶层能够制约他们参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们入党，因为入党必须由党员举手通过。许多工人造反派因此迟迟入不了党，因此也就进不了党的领导机构。直到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后，这个问题才有所突破。此外，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０年的“清队”和“一打三反”，给干部阶层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机。在上海，一机、纺织、轻工、化工、仪表、手工、二机、冶金、电业，九个工业局，到１９７３年，已经担任各级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被清洗者有１３７人，占九局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的３６％；而在上海１０个区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１３５名，占４３。５％〔６〕。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复出后，更是明确反对“直升飞机”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调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干部当权的领导班子。干部阶层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党政机构中的席位相对文革前虽然增加许多，但相比党政机构干部的绝对数，还是不高。

因此，尽管工人造反派占领了领导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生怕有朝一日时局复辟，那把“秋后算帐”的达摩克利特剑始终悬在他们头上。这其实是对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惧的延续，也是对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干部强势集团“永不翻案”之类保证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始终是认同的，对毛泽东文革的方向，始终　“坚决拥护”。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以工人的身份对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表示过怀疑，在关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他们与当政者没有任何分歧，而且还积极拥护。文革８年不加工资，取消计时或计件奖金，除了上海，大多数地区连基本的５元月奖金都被取消；

工人的起点工资下降许多，连上海都从每月４２元下降到３６元，严重损害工人经济利益。这些已经当权的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表示异议，而且跟着拥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涉及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政策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动员工人子女去农村。文革十年，看不到由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为工人说话或谋利的提议或政策。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普通工人。

工人造反派关心的是“走资派还在走”之类的政治斗争，参政的目的是为自己群体争取更多的党政席位，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他们比较多具有的是帮派意识，而不是所谓的阶级意识。虽然这一切的背后，可能是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对民主权利的诉求。

二

１９４９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１９６８年以后，党的权威重又恢复，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却始终守住自己的组织，在整合自己内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１９６６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旋即马上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队。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势力在上海从此不复以组织形式对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将被击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门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义重新聚合成组织，重又成为对抗造反派的强劲势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的成本。１９６７年８月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发动“砸联司”，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以王洪文为首的　“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１９６７年底，　“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１９６８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１９７２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国各地那样重起炉灶式的召开。１９７３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的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可以作为依托的组织平台；而作为文革初期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　“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总工会，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获得在党的权威恢复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动的合法资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

共产党执政后，对于工会与党的关系有过多次争议，每次都以试图维护工会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工会干部被批判调离或撤职而告终。各级工会干部是由党组织推派，还是由职工选举，有过多次争论。原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１９５１年遭到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的关系上的工团主义”，因为李立三反对由党组织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选工会干部，甚至提出“肃清委派制度”，主张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调离全总。李立三的后任赖若愚尽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会工作的固有本质还是使他将保护职工利益和权利作为基本任务，赖若愚同样遭到批判和离开工会的命运。工会从此实际成为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必须无条件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没有自主权。在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主席的任命方面，名为由工人自己选举，实际由党决定。党对工会干部不满随时可以撤换；即使撤换、选举或增补前与工会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会只能服从。工会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竞赛，即动员工人多干活，根本不敢再向党和政府为职工争取权益。

工会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动，１９７０年以后，工会活动又开始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上海工人造反派视工会为自己的组织，不许他人干涉过问。例如，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制定了审批局、区、县工会的规定，提出对这一级工会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调动，必须经由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和批准。１９７０年左右上海机电二局和上海城建局党委欲增加本单位工会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总工会商量，上海市总工会就公开声称不予承认，并要这两个局的党委检讨错误，向上海市总工会补办手续〔６〕。

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会干部的任命方面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不但对工会干部的任命，总工会还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进而对党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据文革中上海市总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回忆，当时的市总工会主要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施加影响：

其一是趁局、区、县重建工会之际，由市总工会直接委派或制定人员担任负责人；待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以工会输送工人新干部名义将这些人转入党政机构。市总工会这样做，下面的工会也层层仿效。许多工人造反派就是这样先担任工会干部，然后再以工人干部的名义“输送”进党政机构。

其二是强调党政机构中必须充实工人干部。市总工会认为哪一个局、区、县的党委或革委会里没有自己人，便以那里没有“文革中涌现的工人新干部”为由，由市总工会派去干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任王秀珍规定：“总工会可以向各区、县、局派干部，不仅派工会干部，也派党政干部。”主持上海市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１９７３年前还未入党，却可以推荐、指派人员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组室或办公室的核心，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以及其他党政成员〔７〕。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安排工人干部。为此，王洪文一再

强调工宣队应由总工会负责管理。

其四是让已经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会领导职务，扩大工会政治资源，提高工会办事力度。王洪文从１９６７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１９７１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间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王秀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市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人陈阿大，文革中都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总工会规定：在组建工会领导班子时，必须将担任党政负责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安排工会职务，增强他们对工会的认同；凡被准备培养提拔担任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会“过渡”，即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工会干部，培养对工会的感情，再去担任党政职务。靠着这样的政治资源，工会得以在党委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例如当“输送干部”等做法遭到党政干部抵制时，便由在市里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领导的名义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静安区、普陀区的负责人就是这样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职的〔７〕。

干部的任命，从来由党垄断。这一状况在文革中则被上海市总工会突破。总工会负责人叶昌明在１９７４年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１９７４年更是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５０％〔９〕。上海市总工会从１９７０年起，派出１００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　〔１０〕；此外，几次送往中央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

虽然，“工会是干部的学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宁提出，文革前党的组织部门也经常从工会选拔干部，但文革前工会的“输送干部”是被动的，即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唯独文革中的工会才有那么强的自主意识，不是等待被挑选，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输送，甚至主动向中央和国务院输送工人干部。

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通过以上办法，不但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严密体系，而且还把势力伸进了党政系统，通过各级工会影响甚至控制各级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从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１９６９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的状况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但在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地位，是１９４９年以后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

自从１９４９年以来，宪法保护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全部兑现。只有在文革发动群众时期，即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话语权才有所保留地释放。

从文革初期的１９６６年１２月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便有着自己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刚开始时发行时只有３万份，以后发行量不断增加，最多时６４万份，增刊最多时为１０５万份，超过当时上海党报《解放日报》的发行量。《工人造反报》上的许多文章，是当时上海基层必须学习的政治读物。更有不少文章被中共机关刊物《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转载。外省市造反派将《工人造反报》上的文章作为中央报刊的补充读物，以“学习上海经验”，揣摩中央文革“最新精神”〔１１〕。

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不到两年，１９６９年后，有限度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也被完全收回，全国各地的小报、传单相继停刊，舆论重又归于一律。唯独上海《工人造反报》继续出版发行，外地对此意见很大，张春桥于是多次指示停刊。王洪文一拖再拖，希望能保留这个舆论窗口。直到１９７１年４月，才不得不停刊。

１９６８年，工总司打报告给张春桥，要求创办综合性的月刊《上海工人》，但张春桥未同意，说工人造反派有一份《工人造反报》就够了。

《工人造反报》停刊后，总工会先后办过几份“内部刊物”：《简报增刊》、《批林批孔动态》、《内参》，等等。但毕竟都只是“内部刊物”，发行范围极小，只送王洪文等人，毫无社会影响。１９７５年王洪文回上海时，要求总工会办刊物。叶昌明即布置准备办两个刊物：《工人理论》与《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由上海工人政治学校与市总工会宣教组合办，以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的名义出版〔１２〕。

但是，总工会办自己刊物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先于《工人理论》出版的《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第一期被徐景贤看到，徐立即交张春桥的秘书转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张阅后立即批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随便出刊物。”王洪文只得逼着总工会的叶昌明等人作检讨，并停了刊物〔１３〕。

上海工人造反派希望能依托自己的刊物提高政策影响力，但根本不被允许。工人作为一种象征被抬得高高，但却进不了主流话语圈，尽管报纸上一再宣扬工人阶级的崇高地位。文革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中央，舆论都由张春桥、姚文元等掌管，上海的舆论则由徐景贤掌管。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连诠注权都没有，有的只是重复那些诠注，或阐释那些阐释。王洪文虽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副书记，但根本无法影响中央的报刊，连上海的报刊都影响不了，显示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口号下的某种真实。

四

文革中利益分配是倾斜于整个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虽然在经济领域没有出台明显面向他们的优惠政策，但工人阶级得到的政治资源却是最多的，这大大提升了工人的实际地位，加上工人职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工人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和良好福利，使工人成为最令人向往的职业。虽然知识含量高的其他职业的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不比工人差多少，而且文革前更受社会实际尊重，但对知识的贬低和对干部的冲击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职业不成首选。许多大中学毕业生以及军队

复员转业人员，青睐的是国营工厂，而不是如今热门的工商、税务、银行等职务。

工人所得到的政治资源很多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例如学生的毕业分配，或是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的上调回城，或是被推荐参军上大学，工人子女比其他阶层子女有着更大的优势，出身就是他们的政治资源。当然，同样有着优势的还有“贫下中农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女”。但“贫下中农子女”因受户口限制，在招工上调等方面敌不过工人子女；“革命干部子女”中相当大一部分父母成了走资派，在一个时期失去特权。此外，在福利分房、工资奖金分配、干部提拔等方面，工人阶级得到的实惠都是最多的。

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社会的价值和审美取向。文革中对人的尊称是“师傅”，这个原来在工厂内对有一定资历工人的尊称，随着工宣队进驻各领域而流行，一度代替了“同志”；报纸为显示革命性争相使用工人的日常语言；工作服成为继军装后的流行服饰。此外，在老百姓中，和工人结婚是婚嫁的首选。

结论

文革中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地位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高的，与今天他们一落千丈的地位对比更显出强烈落差。但是这种优势十分脆弱。因为优势的根源不是这些工人本身的素质，只是计划经济下的被动给予。工人的劳动价格与实际价值不对称，不是通过市场流通自然形成，而是被人为拔高。而且，文革中的社会机制与文革前在本质上没有丝毫不同，根本没有提供一个让各个利益集团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民主协商机制，工人造反派除了为自己在这个机制中争取更多席位，没有想到也不可能被允许对这个机制进行改革。于是一旦整个社会运作由阶级斗争逐步让位于经济规律，工人没有可以依托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操作平台。如今，官办工会在咄咄逼人的资本面前显得那样软弱，在更强势的外资企业，甚至连官办工会都无法组建。

“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相副相成的。１９４９年以后人为宣传“工人阶级”，执政产党取得执政合法性以维持“专政”的需要，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打击反对势力或“人造”反对势力的需要。并非真正看得起工人。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各个社会成员和阶层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领导阶级”而高于其他阶层，更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被打击对象。

社会的价值取向永远是势利的。在告别了阶级斗争后，经济收入成为社会地位的判断标志。国家在经济利益分配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小，原先依倚仗自己是国家企业职工而被钦定为领导阶级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因经济收入的降低以及就业的不稳定性，越来越被边缘化。昔日的老大哥，如今成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

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具有很强的帮派意识，但他们也具有很强的阶级认同感。在党和政府同时又是企业所有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革中的社会冲突主要只能表现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工人造反派的参政因此并没有为工人带来太多的实际利益。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权益的争取上。工人造反派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规章制度”、“管卡压”、“走资派”等的不断批判，使干

部对工人的管理比文革前松动许多。这种松动，有规章制度松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干部权威的下降。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自由度以及与管理他们干部的关系是１９４９年后最高最松弛的，这种松弛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再没能恢复到文革前的程度。文革时期是最让工人具有“主人翁”感觉，也是工人整体阶级意识最强的时期。但是，由于许多工人造反派文革前和初期形象不佳，加上他们一旦掌权，关心的只是自己帮派的利益而不是整体工人的实际利益，使得普通工人对他们缺乏认同感，换句话说，广大工人并不将他们作为代言人，他们也从未真正为工人代言，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

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党的关系文革后被批判为“派性”，“工会凌驾于党之上”。其实，工人造反派的这种派性实际是对自己利益集团的参政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诉求，具有民主成分。作为一个政权结构，本来就应该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协商和互动。但当时执政党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所有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出头为自己争取利益。文革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利益尚未分化，在别的阶级或阶层都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况下，工人造反派面对的不是其他利益团体，而是整个政权；加上没有制度层面的相关机制，于是显得非常孤单和突兀，也引起普遍反感。

工会的地位是工人地位的反映。文革中的工会地位虽然高，但仍然是虚假的。虽然这个时期的工会比任何时候都独立而有自主意识，但工会的权利不是来自宪法的“自由结社”，工会仍然依附于党。只不过文革前的工会是依附于整个党，文革中则依附于党中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势力大一些，工会的力量就强一些。工人不能通过自由结社选择当政者。而且工会的这种相对独立现象只在上海等少数地区才有，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地位也就不是上海工人的地位，更不是全国工人的地位。文革的经济体制毕竟仍与文革前一脉相承，党和政府仍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不满就是对党对政府的不满，工会的真正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掌握着工会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真心将整个工人阶级视作精英阶级、将工人造反派看作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这从他的一系列讲话中，以及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等做法中能够看出。但是工人造反派自身的政治素质使他们担当不了毛的重望，“直升飞机”式的被提拔，使得他们缺少从政经验。他们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比不过文革派中的文人班子，在政治经验上比不过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他们许多人身上所具有的江湖气、流氓气和帮派气，甚至使得文革派张春桥等也对他们存有戒心，这是工人造反派的又一悲哀。

注释：

〔１〕《上海市组织史》１９９１年征求意见稿（打字本），上海组织史编纂组编
〔２〕徐景贤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与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的谈话记录
〔３〕根据《经中央批准的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名单》１９７１年1月１３日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沪［７１］号统计
〔４〕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组１９７４年４－５月间的统计：《全市工宣队情况》
〔５〕上海市公检法《关于培养“工人大使”、“组阁”是否列入起诉书的几种意见》

〔６〕上海市工代会１９７２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新干部队伍和工代会的建设》（讨论稿）
〔７〕叶昌明１９７７年6月１４日
〔８〕叶昌明１９７７年4月5日：《交待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
〔９〕金祖敏１９７４年《关于选拔培养新干部和发展新党员的情况》，转引自中共上海组织部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整理：《四人帮在上海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言行初编》
〔１０〕王秀珍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５日
〔１１〕上海市总工会"清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运动领导小组"：《〈工人造反报〉调查情况》，１９７８年1月２５日。
〔１２〕　上海市总工会"清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运动领导小组"：《关于王秀珍、叶昌明利用工人理论队伍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清查情况》，１９７８年1月２５日。
〔１３〕　王秀珍１９７７年

参考文献：

《参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作者老田，转引自《多维博客》２００３年7月
《谈谈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落差》，作者老田　２００４年9月（在网上读到的，但是哪个网站，没记录）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作者杨小凯，转引自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７期
《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作者萧喜东，转引自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３７、１３８期
《文化革命中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作者刘国凯，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５、１６６期
《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文革史研究之三》，作者陈益南，转引自香港中文大学《世纪中国》网络文库２００４年6月
《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作者华林山，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６年8月号
《痞子与红卫兵：工厂造反派的两种类型》，作者萧功秦，网络《天涯社区》萧功秦专栏

武汉“七二〇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

徐海亮

1967 年 7 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试图就地解决湖北武汉文革的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共中央处理运动问题的精神，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化革命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〇事件”。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出严肃处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毛泽东、周恩来在世之时，尽管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系列重大人事变动，1972 年，一度靠边赋闲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钟汉华也被重新起用，但是中共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定性一直没有改变。

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以后，文革被全盘否定。1978 年 11 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彻底平反；该报告称：“‘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本文从历史的实际过程，记述 40 年前震惊中外的“武汉事件”。

1967 年 7 月 13 日下午，北京。

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电正在四川重庆的谢富治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力金，和随行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同行。周当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

此时，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并没有讨论和定性；13 日中央最高决策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的问题，更没做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查研究。会上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和人事安排。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从来没有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只是在 6 月发生激烈的武斗时，商议发一个文，制止极不正常的武斗，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了 6 月 26 日给军区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

在此之前，毛、周已经商议南巡和解决武汉问题；7 月 7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林

彪一起接见出席解放军会议的代表，在 6 日和 9 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周在 10 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周恩来电令谢富治到汉，除了他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外，也由于武汉地区驻军的一部分，原为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兵团的老班底。老陈、谢兵团的 9 纵，1949 年改编为第 15 军，也即 1967 年在应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降兵）15 军。

中央警卫团当事人今天回忆 ：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

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在含等一行 6 月底去云南时，并无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也没有做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王一行人 7 月 13 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 14 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

一、毛泽东和周恩来亲临武汉

14 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周恩来指定刘丰负责安全，从而，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又把东湖宾馆内梅岭一、二号的 8201（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这一举措本来属于规范惯例，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不满意，北京来人发现，他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

尽管中央在北京从未正式谈论武汉问题，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心中有数，抵汉之前，已经有一个基本倾向和态度。

14 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下午，周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晚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岭。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从东湖宾馆看，虽然警卫有所调整，但是整个宾馆大院仍由 8201 部队负责保卫，大门由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仅仅密切控制了毛泽东和 8341 驻扎的梅岭 1、2、3 号一片建筑和附近树林、要道。15 日，军区保卫科王振英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提出建议，即用 8199 部队（陆军第 29 师）来加强宾馆警卫，但钟汉华政委没有同意。

二、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7 月 15 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15 日后，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

16 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次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连日的汇报会议上，陈再道对于周恩来讲的基本意向十分不通，虽然周在 17 日已

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周恩来气得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揭露出当时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

陈再道自己在1967年12月的检查，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他后来回忆：“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

不过，18日总结会议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讲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也夸奖了钢工总在水利学院修筑的自卫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该会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 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

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三、武汉群众的反应和社会实况

15 日这天，武汉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大游行，队伍里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高等院校的喇叭，播放了《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越的歌曲。与此同时，“百万雄师”硚口区三分站等候总站命令，于 12 时，在武胜路电车公司埋伏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区站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工人李长亮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此外，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水利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会负责人。是日，“百万雄师”组织约 800 人横渡长江。

当晚，谢富治、王力到喻家山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王力接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在内部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个是“鹰派”——包括盲目主张武斗解决问题的人，和认真冷静分析了全国形势的人，他们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已经毫不乐观，失去信心（他们在中央来人之前就有报告分析了前途，警告了高层）。他们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7 月 16 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 3506 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的名单；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

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情况次日即传到“百万雄师”基层。

“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回忆 ：“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 3506 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不论回顾是否仍带有情绪，会见的结果是谢、王丢失了缓和其情绪的唯一机会；尽管此时群众还不知道周恩来 15、16 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王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按照毛、周意图，中央的代表充分听取各派意见，调查研究，做好“百万雄师”的思想转弯工作；“百万雄师”个别头头也设想改变中央印象。但 16 日深夜的初次会见，问题变化得更僵持，“百万雄师”下决心抵制谢、王，群体性的反抗势在必然，中央来人不得不再次面对“百万雄师”做疏导工作，已是兵临城下之时。

16 日，为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武汉造反派组织了大型的渡江活动，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从 17 日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长矛。

18 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 日凌晨，谢、王前往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欣喜若狂的一些造反派把大会录音拿到武汉三镇播放。省直造反派的头头郑军现在回忆：我们把录音拿到洪山路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这一下大概坏了事，当天晚上 8201 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人，就冲到东湖宾馆抓了王力……

四、部队对立情绪的酝酿形成

但是，在毛、周来到武汉前，思想上僵持对立的局面早已酝酿、形成。问题主要

在部队。

陈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7 月 9 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 月 10 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实际上，"工人总部"是否反革命组织，是否应该和必须平反翻案？是一个极其尖锐敏感的问题，造反派极为平白又刺激的政治口号"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是言简意赅的，军区主要领导、"百万雄师"的头头都认为"工总"一旦命运逆转，将是他们政治失败的标志。

省军区独立师深深卷入运动，他们对于公检法军管、逮捕造反派、顾问并支持"百万雄师"武斗，负有具体责任，对于即将到来的所谓"摊牌"——决定自己支左工作的路线是非和"政治命运"，精神十分紧张。其领导和军区的一些中层干部，也分析了全国情况，对于即将到来的情势，并不乐观。独立师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并讨论了三天，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思想上的冲突其实早在 5、6 月就已经形成与积聚，总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6 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不言而喻，"百万雄师"按照传统思维把谢、王看成脱离工农兵大众的"钦差大臣"，而造反派学生则是"臭知识分子"。

17 日，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个典型意见，已天才地预见了未来事变的端倪。

19 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 8 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

文革表示不信任”。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

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他们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各地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这些忧虑立即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甚至谣言表示出来。

五、7 月 18 日周恩来的总结讲话

1967 年的“武汉事件”前夕，最为关键的是周恩来在 7 月 18 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 17 日看过。

在军区的会议上，周恩来讲：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 ，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 ，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

“‘百万雄师’是 4?16 开始酝酿，5?16 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 。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 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 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 。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 。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按：这里点的“中间偏保派”）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从史实和本质看，当时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独立师主要领导，以及“百万雄师”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实际上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他们非得要谢、王确认和澄清的正是流传出的所谓“四点指示”（公正地说，“百万雄师”在宾馆最先是要求谢富治澄清这个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来 21 日在东湖边对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同学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25 日，他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应该说明，独立师的肇事者在 19 日开始抓住王力发难，并非王力自由散漫、“党性不高”——错误地在周恩来身后向群众透露了周的讲话精神；到军区和街上闹事人极端反感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周恩来 18 日讲话的核心实质。这是发生反弹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时值 40 年后的今天，“百万雄师”上层的朋友们是心知肚明

的。

六、周恩来讲话精神被泄露，群众情绪被挑动激化

按照军区会议的规定，周恩来对师级干部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

但是，讲话精神在 18 日当晚就被泄露了，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 这样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 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18 日晚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19 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部队听传达，并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从决定在 8201 部队团级干部传达，到武汉群众听说"四点指示"，不超过 20 小时。事实是：18 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第二天周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19 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蔡政委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言罢，群情激愤；牛怀龙师长、蔡政委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愤怒引向王力。

他们又向 8201 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对于周恩来 18 日在军区的讲话，军区擅自同意向下传达，一些部队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的愤激情绪，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有意掩盖的关键。毛、周辞世以后，主流舆论和众多的"文革研究"总是指责王力在水院泄露了所谓"四点指示"、造反群众宣传了所谓"四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搞清楚，王力在水利学院说了什么，造反派宣传了什么，对立面为什么被激怒？

实际上 7 月 18 日（已是 19 日凌晨），谢富治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所谓"四点指示"；而是具体提出这样的几个方面：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全部内容看，王力

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则范围里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讲话精神显然是支持、安抚与引导群众的；尽管头脑发热、不可一世的王力支持造反派的情绪和话语锋芒毕露，也实际上促使了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与对抗。就在王力还算是“武汉事件”的“英雄”的时候，周恩来就给文革小组人员说：王力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闯了大祸。本来是要先作陈再道的工作，再到群众中去，结果王力不听，去群众中讲话了。

文革以后，中纪委在审查谢富治问题的报告（中发[1980]77 号，1980 年 9 月）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赴武汉，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做了明确指示，交代谢富治、王力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要作倾向性的表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部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实行大联合。但是谢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汉以后，背着军区党委，私下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七月十八日深夜，他们到武汉水利学院，公开吹捧‘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宣称‘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当成‘保守派’，致使矛盾更加激化。这就酿成了所谓‘七. 二О事件’”。对于此，该报告文件的附件十一“谢富治参与制造武汉‘七. 二О事件’”里有王力自己在对中纪委的交代证言（1979-4-13），在审查中，他退而承认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谢富治和王力到水运（按，系‘利’之误）学院大讲支持与‘百万雄师’对立的‘钢工总’‘钢二司’……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都是支持一派，反对代表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另一派，激起了武汉爆发‘七. 二О’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在武汉问题上，我违背毛主席路线，谢富治和我是一个路线”。

19 日上午，除了造反派在武汉三镇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任何人在街上宣扬什么“四点指示”，两派群众都不知道什么具体“指示”。最先提出问题并发难者，就是独立师的人，是他们把中央精神有组织地传达到在汉干部、战士，再迅速散布到全社会：

军区秘书科揭发说 ：“19 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按：此时谢富治、王力正在传达中央的精神），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军区机关同志的证言是非常重要的。

此时，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 时左右，8201 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 时，又有 8201 的 49 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 120 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2 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了动员，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

今天访问“百万雄师”的领导骨干 ，回忆问题究竟如何爆发的，章迪杰如实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王少荣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

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当年“百万雄师”头头的这些反映和认识是相当客观的。

23 时半，8201 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经有 200 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独立师的宣传车大喊大叫，指责所谓“四点指示”，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当时就提出质疑和意见：19 日 24 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 日晚上，（师）370 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夜 12 点带领 3 个人到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竟遭到一些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这些都反映出了当时独立师机关和基层一些干部极端暴烈的情绪。

事件平息后，独立师干部分析、揭发说：“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

另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是 ：就在 19 日陈、钟军区首长已经按中央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去释放造反头头时，有人让“省直联司”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他们要找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亲自反映“百万雄师”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意见。不过后来他们没有直接去找寻毛、周，而是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这是事后调查和文革以后平反该事件时，外界并不知道的实际情况。“百万雄师”高层，在揪斗王力之前，业已知道毛泽东就在东湖。

到目前为止，人们并不清楚是何处的对弈高手，明知毛、周在指导处理武汉问题，却“项庄舞剑”、顾此言它，引导狂怒的军人和群众：绕开“士相”，拥“兵卒”、挟持“马”别“马脚”，狠狠地将了毛泽东主席一军。

实质上，东湖弄剑，意在毛公，用意旨在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七、事件发生的经过

策划揪斗王力，冲击东湖宾馆

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 8201 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 ：19 日晚上 10 点左右，“百万雄师”总站二号头头杨道安叫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汪次日在批斗现场录下了全过程。

和“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一起回忆事发经过 ，章迪杰（其常委、联络部长）说：“7 月 19 日晚，我们在 3506 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常委、作战部长）、余均才（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 273 辆，1 万 3 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政委、作战部长），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 8201 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显然，“专揪”行动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一些人组织策划的。

当时一个据说是 8201 部队的连指导员将一字条递交给“百万雄师”头头，字条书有“‘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 是叛军”，公然造中共中央的谣，欺骗、煽动群众。

俞文斌（“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 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

7 月 20 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 14 人，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阻拦。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 14 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 100 米处，双方对峙下来。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科长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 8199 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 3 点左右，8199 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 8201 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 8201 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按“专揪”统一策划，受命控制南山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随后，集结在武重一带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在谢、王指责下，有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有人叫“不出去”，“谢富治、王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扬言要揪王力去军区，要与谢、王拼到底。谢出来：“我就是谢富治”，又说“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 5、6 个仍在纠缠。

到四点多，谢富治叫军区曾秘书叫陈、钟来百花二号。陈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罗，我是无能力了”！继而，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穿好军装，主动提出接见这些人，独立师张守本带领警卫将冲进的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大厅后门在草坪上谈话，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二号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居然戴个大口罩。接着，又冲进来 8 车 8201、8199 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端着冲锋枪的 8201 军人，枪口直对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挥拳就殴打陈再道，陈被打倒在地。王力见势不好，跑回房里；钟汉华也忙跑到一个地下室。军人将王力抓了出来，激愤的军人和群众蜂拥谢、王，愤怒殴打王力。张根成、北航学生和他们讲理，遭到毒打。问题发生后，独立师负责警卫的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只好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汽车向军区大院开去。张根成紧跟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听张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军人把张也拉走；北航女红卫兵尹、胡被 8201 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王科长忙叫来了牛阻止事态发展，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 自己也随部队驱车赶到军区大院。

谢富治赶去搭救王力，路过消防队门口，消防队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其“武汉公安”人员居然说：“谢富治来了，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赶快拿刀

子……”！

军区大院批斗王力、全市游行

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了上千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播放起《造反有理》等语录歌曲。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进出出。在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

武汉测绘学院竟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九时，王力被汉阳区的“百万雄师”围在军区二号楼 3 楼 46 房，军人和群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众乱。牛怀龙师长忙喊“静一下，好录音”!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陪同王力，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到四楼楼梯边的阳台示众；8201 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群众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并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

钟汉华在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叶明、孔庆德让 8199 部队将王力从“百万雄师”手中解脱出来。

面对事态，钟汉华、叶明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百万雄师”指责他磕头作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

10 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 396，其中消防车 27 辆，空军军车 15 辆，打 8201、8216 旗帜的车 83 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

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不管周 XX 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在这个过程里，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军人将他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 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 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 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政委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一个头头拍桌子大喝一声：“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把这个不知情的师政委吓了一跳，专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得闻此情，急的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午后，孔庆德副司令指挥，军区警卫营将钟汉华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揪斗王力的头头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8201 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 8201 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孔庆德命 29 师政委，调 87 团四连、六连和师侦察连、军区警卫营相互配合，巧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进入 8199 驻地。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呼啸去追。

以 8201 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用的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百万雄师”还抛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按：指已退休的副省长）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上午,“园艺军”头头雷荣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谣言四传和武装扫荡

非常事件的发生往往依赖政治谣言，鼓惑欺骗民众。几天里，一些谣言迅速散布全武汉：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今天，章迪杰先生承认 :“‘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在独立师里，参谋长郝文德又奉命在部队继续传达这些谣传，甚至翻印一些传单。

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连日来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扫荡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余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200余人。在游行的街道和其他地方，马路边和单位里的普通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蛮横毒打、抓走，怕事的人纷纷躲避。“百万雄师”从20日凌晨2时开始对武钢围攻，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 33 街坊的新一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100多人。

大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乘车船疏散离开武汉，人们同车同船，竟面面相觑，不敢言谈！

坚持和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人，一直把武汉“七二零事件”，看成所谓“抵制林彪、‘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的盛大节日；而被公开扫荡、镇压的革命造反派群众和武汉市民，则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白色恐怖，是一次政治事变。

八、中央对于事件的反应

8341 的卫队长今天回忆说：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 8341 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得知消息，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放人，负责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 17 号封存的长矛、匕首。在声势浩大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武装示威和扫荡下，武汉造反派没有招架之力，集聚东湖一带学校区的造反派，在总指挥部、夏帮银等领导下，纷纷商议落实指示和最后的防守抵抗，其他地方零散的工人、学生，就走为上策了。

在北京，早晨传来武汉消息，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林、江写信给毛，要毛转移；周总理亲自作军事部署，并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 15 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邱到达汉口后，过不了江，信件于次日晨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面交毛泽东。

听说总理要来武汉，有百余 8201 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8201 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空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居然还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周恩来于四时前起飞离开北京，40 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人群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

丰电话问讯情况，联系已在汉口机场的邱会作（离北京前，周命令邱带上电台和医生，做了最坏的准备）；刘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周恩来再飞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周恩来抵达东湖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议转飞上海，并指挥安排转移、飞行等安全事宜。

空15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深夜2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空小车转移到汉口机场。21 日上午，毛泽东一行乘飞机飞上海。

周恩来安排毛离开东湖以后，鉴于陈再道严重失职的言论和行径，临时对他采取了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气愤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21日，周亲自组织平息事端，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控制局势。

周和三军领导调动部队，空15军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迅速调派入城。此间，周总理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早上，总理决定要刘丰去找到王力。刘带领空军司令部王惠民、叶锡洪出车去8199部队；的确，王力就在29师。于是，29师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的小车，穿科学院、武汉大学间，经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

刘丰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22 日凌晨 5 点，载有中央来人的专机从山坡飞到王家墩机场；周恩来马上召集军区、空军，和 8199 负责人开会，部署和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8 点多，周通知在上海的杨成武"我们都到了"；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他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毛泽东作了许多考虑，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武汉）好"。周恩来在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开会，明确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同时决定派空15军进驻造反派群众集聚的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学校和武钢。

当晚，支左的空15军部队迅速抵达几个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

22日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还专门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三人。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于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

深夜，持折叠式冲锋枪的百余空降兵战士进驻红水院，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等院校，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潸然泪下，热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21 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 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 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象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场面。

造反派在街头贴出大标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但联系到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议论“这不是兵变吗”？

周恩来临赴武汉前夕，又亲命中央文革记者站派 5 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事件，张春亭等去军区，郭昌琦、张广友于 21 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调查，并向北京紧急反映了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张春亭等在空军帮助下转移到部队安全处所，到军区和部队展开工作。

九、“武汉事件”的持续和平息

20 日当晚，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 20 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21 日上午，“百万雄师”在 3506 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独立师干部揭发 ：次日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和蔡政委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 8201 为核心。

独立师干部揭发 ：21 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已经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针对干部的怀疑，22 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 50 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连日来，“百万雄师”继续在全市游行，22 日全市“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 1500 辆。

形势的急速转折

23 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部分“百万雄师”汽车的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宣扬的舆论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吹嘘装备 60 万人抵抗；组织 10 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但是迫于形势突变，这些空口的计划没有实现；为扭转被动局面，24 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七二零事件”的一种变相、权宜的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就 24 日的变化情势，海外研究者王绍光先生曾经指出：“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 7 月 19 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22 日夜，周恩来与林彪商议，下半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代中央起草电报，召武汉部队和市人武部领导到京。

23 凌晨，陈、钟一行飞抵北京，在京西宾馆受到三军“无革派”冲击。三军“无革派”并在大街刷出反对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

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分头组织开会，商讨局势和对策。

8199 部队从“百万雄师”手里解救出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

测绘学院、武汉大学“钢二司”与“三司革联”学生，分别造反查抄了位于该校的“三司”总部。由于“三司”总部在事件中公开表态支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行径，一些学校“三司”单位参加示威游行，该群众组织在中央表态以后顿时自动解散消亡。

全国声讨事件

24 日，还有 18 车“百万雄师”包围体育学院大楼，驻测绘学院和华中工学院的战士前去制止武斗；次日凌晨 5 时，“百万雄师”出动 38 辆卡车、3 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一名参加围攻的体院学生头头被小口径步枪击毙。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 25 日上午 11 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连续两日来，一支又一支的空 15 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 8201 部队的行为，并接管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后者则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驻守东湖宾馆的 8201 战士，痛哭失声；按命令于 8 月 1 日将防务移交 15 军部队，离开武汉市，留下了枪支。必须指出，所有部队的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25 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 8201 战士横枪低头“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看到 8201 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 3 万余

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七二零事件”。

在北京这边，25 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山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林彪对蒯大富、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王力也默示蒯大富，去追在北京的“事件后台”。

25 日，周恩来为次日召开的中常委扩大会召集预备会；并接见河南的军队干部，讲述武汉情况和问题实质。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中共中央处理事件和武汉的变化

也在 25 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的复电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武汉部队草拟《公告》，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 “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 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会上批判了陈再道，周恩来主持会议，说“七二零事件”是“叛逆行为”；听到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谢富治则说“七二零事件”是陈再道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会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一些秘书批斗、殴打了陈再道。

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 与“百万雄师”。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

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27 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在武汉传达。称“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

中央继续召开揭批陈再道会议，连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群众和部队上街游行，谴责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行径，表示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武汉群众议论，中央通过对武汉事件的反映报道，集中地点名支持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确认的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

也在 27 日这天，8201 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 40 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 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事后，8201 部队被调出武汉市整训，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零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 8201 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 4 个团。

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钢二司”一号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讲话，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第一书记）参加接见。

也是 27 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最后解体。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因此，“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因此，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月底， 7、8 个“百万雄师”主要头头去“新华工”，想与造反派谈判下台阶，“新华工”负责人把公安局造反组织“公安联司”的人通知来，把他们全抓了起来。

“百万雄师”中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造反派报复，撤至郊区、东西湖，再逃避到地县。其他一般人员即回单位，向得胜回来的造反派认错“投降”了。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并决定：

“武汉由 15 军或 2 个师（指 44、45 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龄、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龄的通道要 15 军部队或 29 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7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红旗》第 12 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发表。

7 月 30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红旗》第 12 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发表。

毛泽东指示：宣布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宣布（按指免职）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 44 师、45 师、29 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清晨，周恩来电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 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 上午 9 时，周恩来在钓鱼台 5 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旋即接见刚刚赶到北京的曾思玉（和已在北京的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连日来，“两报一刊”和新华社通过各种媒介，集中报道全国军民支持武汉问题解决，并对全国的群众组织，作了革命或“保守”的倾向性表态。

武汉造反派的愿望和呼吁

此日，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布重要的《紧急通告》提出：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

臭。

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抗争的矛头实质指向毛泽东与中央

40 年过去了。

“七二零事件”的抵制和抗争行动，单纯是针对王力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吗？是“武汉军民反对林彪、江青”吗？从事实和问题的实质看，当然不是。在街上，有人针对说“百万雄师”受蒙蔽闹事，回答说：“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如果说街头上激愤的群众语言不足为凭，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交谈总还是理性思考的。市监委一个张姓副处长说：“毛主席受了蒙蔽，现在有人怀疑林彪和周总理有问题”；组织部韩姓处长说：“他（按：指毛泽东）还在稳坐钓鱼台哩”！农委书记冀

某说："中央现在已被几个笔杆子控制了"；李某说："揪王力当然是大快人心，但问题不要想的那么简单。据辛甫（按：市委书记）说，'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这一套是谢富治讲的，那就不是王力个人的意见，说明中央文革对武汉问题有框框"。

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在 20 日 15 点左右被抓进 8201 师部，有人问"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显然，在独立师的这个科长看来，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完全"他妈的"是一回事。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有针对性地追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稿和其他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还追问"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想"这不是造反了吗"？接着独立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指责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他在游街时，车上军人指责批判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 80 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对抗情绪十分激烈。

8201 部分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具体的个人，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有人已经明显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的斗争矛头业已指向中共中央。批斗王力时，军区叶明副政委要 29 师张政委让揪斗王力的头头放了王，并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现场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百万雄师"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他们只是反对王力，是抵制所谓"四人帮"。实际上绝不是如此。事后，周恩来对河南的部队干部讲"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并非一时的气愤之言。"七二零事件"中军民的反弹言行，实际针对的就是周恩来代表中央的讲话精神，这正是毛泽东在武汉亲自制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根本原则。

今天，"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也承认当时明知毛泽东就在武汉，还要这样做："我们实际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 为回顾历史真相，重访"百万雄师"主要头头 ，俞文斌仍然坚持认为："'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零'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帐要记在毛泽东身上"。

看来，他并非想在当今批判文革的浪潮里赶出风头。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对于事实和实质的认识，比我们好些"研究历史"的御用文人，要直白和坦荡得多！

8201 部队在直接触发"武汉事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至今"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还在埋怨他们把事情弄糟了。从层面上看，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原来是地方公安部队，习惯于按照传统思维定式看文化革命，将造党政秩序反的群众看成要实行无产阶

级专政的“牛鬼蛇神”，而他们的认识又始终得到军区主要领导的支持；在支左中，8201 的一些干部参与“百万雄师”的组织领导工作，甚至一些干部参与、组织了 6 月的一系列大型武斗，他们把部队的观点和命运与“百万雄师”结合在一起了。8201 部队深陷武汉和军区的文革政治纠葛。他们在“武汉事件”中的作为，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党纪和军纪，也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规矩和原则。独立师支持武装镇压群众，伙同“百万雄师”暴力冲击武汉军区、（中共中央领导人下榻）宾馆的行为，违背了现代政治学准则和法制、法理，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问题是 40 年之后，我们是沉重地全面总结教训，还是掩盖史实，甚至宏扬其精神？

鉴于事件发生在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情况纷繁、复杂，其后又有深沉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当年并没有把问题看得过重，毛泽东并没有把事件定性为“兵变”，对于陈、钟等人宽大处理；独立师的一些团队，后来编入 17 军建制，一些干部，提前转业到地方工作。

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没有估计到：就在他总结讲话、在他带领陈、钟去见毛泽东后几个小时，军区领导就擅自同意了在独立师上下传达讲话要点；没有估计到他刚刚离开武汉，王力就在没有做通军区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热情洋溢地在造反群众中显示了中央对他们一派的支持；更没有估计到他总结讲话后刚刚一天，就会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毛泽东就在东湖的秘密，要他们去宣示怀疑文化革命的愿望；甚至有人故意造谣生事，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去火中取栗。由文革的这层“败事有余”的领导干部的思维、行为模式，直接释放、催化了各派群众的行动力量。

诚然，在文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爆发这一事件，有更为宏观和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是我们全党、全民、全军的一个共同的历史教训，事件之后运动的变化和转折，超越了事件的本身意义，科学地全面认识和分析研究，业已超出记录武汉文革史实的篇幅。

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程映虹

文革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这个结论无论在４０年前还是在今天，也无论是在文革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看来都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文革的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向世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义者那里，这个目的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个判断之上，是具备了客观可能性的。因此，对文革的理解必须联系中共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文革时最常引用的一句马克思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口号所宣称的革命的普世性在６０年代其实表达了这样一个含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因此，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就像列宁当年利用第三国际输出革命一样，不但源于一国不可能或难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原理，而且也包含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在毛主义者看来，苏联集团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从而"变修"的历史经验更证明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正确。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表面上看来如此"离经叛道"（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的文革，在实质上却是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由于"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必要对本文探讨的范围作一些限制和说明。第一，本文的重点是从一些历史事实出发对文革在海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作一些述和概括，而不是对这种冲击和影响作深层次的思想和理论的剖析。这种冲击和影响的内容既包括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造反、破四旧、依靠"觉悟"和精神力量实现社会变革等等），也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的模式（党的领导、依靠农民的武装斗争、划分社会阶级明确斗争对象等等）在６０年代在文革所强调的世界革命的背景下向外输出。第二，本文将集中介绍文革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不涉及文革期间的西方左派和激进思潮，也不涉及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的反应。这不但是因为篇幅的限制，也是因为文革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并不很陌生，而文革在苏联东欧的影响又非常有限（苏联东欧集团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免疫力要强于西方国家，文革在他们看来是疯狂，没有任何浪漫色彩或者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输出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共的发展模式是以亚非拉国家为主要对象的，也只有在这些国家中共才不但在一般群众、而且在政治领导人和党派中具有相当的影响。第三，在内容上，本文所述"文革的冲击和影响"既包括向世界主动输出的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也包括亚非拉各种左派势力对这种输出的积极反馈，甚至以文革和更广泛意义上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自居。把这两个方面相区别是有意义的，因为到了文革高潮过后（进入７０年代），出于国际政治需要，中共约束了向世界强行输出毛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的努力，基本放弃了世界革命的路线，甚至和很多反革命政权打交道，但这正是亚非拉的一些地区在毛主义和文革薰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势力发挥影响的时候，毛主义撒下的"龙种"正在收获"跳蚤"。因此，文革的"世界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一、"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关系

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向世界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甚至输出革命就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扩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中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也是中共全力追求的目标。但到了６０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于是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以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在１９６５年8月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就是中共这个形势判断的公开表达。这篇文章是文革前期崛起的毛主义文人集团骨干之一王力起草的，文章的酝酿、起草和定稿过程一直受到毛本人的密切关注，是中共６０年代初的“九评”之后最重要的国际问题指导性档，其内容和输出革命直接相关。文章以纪念抗战胜利２０周年为名义，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所谓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６０年代的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在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文章也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革命的阶段性（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在谈到输出革命的问题时，文章说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概括而言，林彪这篇文章有三个要点：一，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二，亚非拉是发动革命的地区，是包围西方世界的农村；三，中国输出革命理所当然。

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这篇文章中的这些基本点很快就成为中共更正式的路线。１９６６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林彪文章的观点，认为国际形势“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１９６７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动节社论的题目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说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这样的形势判断下，中共的对外工作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早在文革前，１９６３到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就对一些访华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了他所认为的中共内部在国际方针上存在的“三和一少”路线（对帝、修、反和气一点，对世界革命少援助一点），这“三和一少”是和国内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关联的，和苏修的“三和两全”相呼应。毛泽东主张“三斗一多”。到了１９６６－６７年，刘邓“修正主义路线”被正式揭露，毛主义文革领导人进一步指控中共前１７年执行的是“三降一灭”（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方针，从而否定了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来，外交部的工作当然被否定，所有驻外使节都必须回国参加运动，接受批判，连主持党与党关系的中联部也受到冲击。

但是实际上，文革以前中共为输出革命和支持外国共产党作出了极大努力，尤其在东南亚和非洲，这些都是和刘邓为主导的党内“务实派”的推动分不开的。例如，根据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的回忆，１９６１年当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和平进程时，他们被召进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和他们会谈，要他们重新回到武装斗争的路线，中共许诺全力支持。邓小平用来说服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东南亚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马来亚共产党必须配合这个高潮。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马来亚共产党重新回到武装斗争，被认为对武装斗争信心不足的陈平留在北京，由长期在中国受教育的马共其他领导人回马来西亚去领导（马共的武斗一直到１９８９年才结束，原因主要是中共不再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１９８０年召见陈平要马共配合中共的“战略转移”的人也是邓小平。）〔１〕马共的这个事例说明，文革前中共即使是其“务实派”对世界革命也不但是充分支持，而且是有全盘考虑的，并且早在６０年代初就作出世界革命形势“正在高涨”的判断。文革中极左派对刘邓等人的攻击只是说明中共在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下要全力推动输出革命、为此不惜牺牲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已。

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高潮而必须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个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化大革命时期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这就是说，中共外交工作就是宣传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为了贯彻这个“批准”，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主席语录》。从两个“批准”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到次年１１月，根据新华社统计，毛著外文版２５种４６０万册发行到世界１４８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个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２〕在外事工作中宣传毛主义和文革的“主要任务”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９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官方外事场合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着作、语录、像章、文革档、图片，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在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印制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材料，甚至建立红卫兵。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二、中共和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一个主要方式。应该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一个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民族自然资源或者宗教等等的原因支持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在西方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中都不鲜见。但如前所述，中共在６０年－７０年代对很多国家共产党和左派激进势力的支持是在一个“世界革命”的总战略的指导下，

是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高潮，彻底改变世界的政治现状，同时为国内不断激化的“继续革命”创造一个外部环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并非出于和具体的受援国家或政治势力有什么特殊利益或利害关系，这是把中共的革命输出和一般意义上出于国家或政权利益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加以区别的关键。

中共当时以支援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遍及亚非拉，尤其是东南亚，因为这个地区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一个越南和老挝后来加上柬埔寨作为公开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上文所述中共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援就是一个事例。据陈平回忆，由于中马之间没有共同边界，中共在６０和７０年代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援主要采用金钱方式，让马共自己在泰国南部从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此外为了配合武装斗争，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秘密电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广播。印尼是当时中共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又一个主要对象。在当时国际共运阵营中，印尼共产党是亲华反苏派。６０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印尼领导人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统一战线发展势力，一时声势很大，结果重蹈中共１９２７年的覆辙，遭到右翼军事力量反击，在１９６５年被镇压。根据北京大学杨奎松的研究，毛泽东本来就对印尼共产党迟迟不愿开展武装斗争不满，所以当印尼党被镇压，数十万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杀害后，毛泽东反而高兴了，从他的“辨证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因为这下印尼党只好“上山”搞武斗了。“所以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杨奎松还说，此后毛“甚至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援泰国、马来亚、缅甸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３〕印尼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后，在１９６６年8月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主要思想上它几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并列，提出党的三面旗帜，把中共的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尼革命的道路，不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路线，把前一时期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受苏联路线的影响。１９７０年5月２２日，中共中央电贺印尼共成立５０周年，说印尼革命在１９６５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和议会道路的破产，印尼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一定能够夺得最后胜利”。

泰国和缅甸也是中共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重点，尽管在文革前，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中共的友好邻邦。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老挝党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说“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他对泰国共产党人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这就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对缅甸，中共曾达成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泽东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１７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受训的缅共人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斗，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到缅甸境内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利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把他们作为东南亚共产党扩大武装时的招募对象是当时中共的一个战略考虑，毛泽东很明确告诉老挝党和缅甸党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和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１９７０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让老挝

党到云南的老挝族去征兵，在座的周恩来和黄永胜说在西双班纳有老挝族，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象”，毛泽东说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说这些少数族人都很能打，还举出过去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４〕

在新加坡，６０年代初共产党人利用东南亚华裔社群中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模仿中共的行动方式，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同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因为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所以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后来在１９６３年的选举中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新共在１９６５年回应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控制的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值得一提的是，和新加坡共产党斗争的经验和成功后来成了李光耀政府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李光耀说共产党的威胁一直是他头顶上的“德摩克里斯之剑”，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决了这个红色威胁，新加坡就会成为另一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家，和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因素相比，那些所谓新加坡经济奇迹中“儒家伦理”和“东亚文化”的讨论多少有点像是玄谈。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左翼威胁的彻底解决是７０年代以后亚洲其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四小龙）所共用的历史经验，冷战以后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则是今天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李光耀一直视中共对马来亚和新加坡共产党的支持为威胁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族群和谐的心腹大患。１９７６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诺放弃对东南亚输出革命，１９７９年再次访华时他坚决要求邓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马共电台，以换取东盟国家对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地位的支持。邓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见马共领袖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６０－７０年代，李光耀对中共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的影响非常担心，这一方面由于文革的乌托邦色彩和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新加坡人口中基本是华裔，很多人对北京有“祖国”或“大中华”情结。１９７１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令李光耀感到震惊的是，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举行比赛时，球场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嘲笑自己国家的球队，并高呼赞美毛泽东的口号。李光耀说他后来“公开严厉”批评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为新加坡的“小毛泽东”。根据笔者对一些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新加坡人的交谈，即使到了７０年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也还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在李光耀的建议下，新加坡政府在６０－７０年代有一道法令，禁止３０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这个禁令直到１９７６年才取消。那年李光耀访华，他的女儿和他同行，她原来对遥远的“祖国”有亲近感，对毛的革命有神秘感，但在访华过程中她亲眼看见中国的封闭、落后，愚昧，对中国的印象大变。这个经历使李光耀感到如果让这些青年亲身观察现实的中国而不是被动接受宣传中的中国，文革就不会有吸引力，因此他回国后不但废除了禁令，而且觉得要让青年人放弃对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中国，逗留得越久越好。李光耀也注意到很多在５０年代回到中国的华校青年在十多年后“对中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彻底破灭，他们回国后可以成为我们对付毛泽东主义病毒的最好疫苗”，因此他反对新加坡保安

局不准这些人回国的禁令。〔５〕

在菲律宾，中共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在毛主义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很多成员来自菲律宾左派大本营菲律宾大学，在１９６９年建立了菲律宾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争取到中共的支持。当时，１９７２年一艘叫 Karagatan 的运送军火的船被菲律宾政府军截获，１９７４年另一艘叫 Andrea 的船在台湾南部海面对珊瑚礁上搁浅，是两起引起国际注意的新闻事件。为了介绍毛主义并把它和菲律宾实践相结合，西松撰写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菲律宾人民战争的特点》等著作。在１９６９年３月发表的《纠正错误和重建党》中西松宣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军已经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鲁卡为代表的以及其他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左’、‘右’倾错误”。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军的纪律。西松本人于文革早期在中国受过至少三个月的训练。１９７１年，为了迎接菲律宾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国路线”，派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里卡多·马来率领一个１４人的代表团连同他们的家属（这是当时派遣去中国受训练和建立联系时的通常做法，因为这些人往往要在中国呆很长时间）前往中国系统学习中国经验，这个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一，在中国代表菲律宾共产党；二，确保从中国获取物质援助；三，和其他共产党在中国的代表建立联系；四；领导在华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员；五，作为菲律宾革命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六，建立图书馆和档案库；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活动”。〔６〕马来在中国一直住到１９８１年，当邓小平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马科斯政府解除军管后，他离开中国去了荷兰，８年后再回到菲律宾，担任马尼拉纪事报的编辑。他在采访中说中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要的知识。但他在中国也了解到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之间的重大差别，不能照搬毛主义模式。

在印度，１９６９和１９７０年间出现的那夏里特（Naxalite，源于地名 Naxalbari）运动是印度共产党在农村发动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印共也在６０年代中期发生亲苏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查鲁·马祖达（Charu Mazumdar）为首，称“印共（马列）”。马祖达是毛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范围全面胜利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熟悉中共文革语言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就是林彪所谓毛泽东思想“顶峰论”。马祖达领导的印共（马列）模仿中共在１９４９年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把印度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农民，发动和激化农村阶级斗争。马祖达领导的印度农村革命是中共２０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土改）和６０年代的文革暴力的结合。在大吉岭地区的那夏巴里（Naxalbari），印共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那夏巴里运动中最重要的战略是残杀乡村精英：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用马祖达的话来说，“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在这种杀戮中，那夏里特运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双手和头颅，肢解肢体。就像当年中共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这种极端做法即使在那夏里特运动内部也引起了“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疑虑和争论。在那夏里特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他用来为这种暴

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下去。”马祖达甚至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７〕

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中杀人并不罕见，但如此鼓励滥杀和用原始手段去达到血腥的效果是不多见的。一些研究那夏里特运动的学者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提出这样一种解释。他们认为，那夏里特运动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徒手杀戮看成是培养一个“革命者”的过程。在旧的社会秩序下，杀人和被杀者是统治关系，农民被地主和乡村精英踩在脚下，心理上认为这些人高高在上，自己是低贱的。这种社会身份的差异日积月累根深蒂固，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消解。而现在，每向这个过去的主人砍一刀或打一棍，这种社会距离就消失一点，自己的身份就提高一点，直到最后把敌人消灭，自己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成为了“新人”。就是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中却被中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新发展。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7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篇社论很快就被拿夏里特运动拿去翻译过来，成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斯里兰卡（１９７２年以前叫锡兰），是中共长期的友好国家。早在１９５２年，当中共因介入朝鲜战争而被联合国制裁时，斯里兰卡就和中共签订了长期条约，向中共提供橡胶，这在当时打破了西方对中共的封锁，满足了中共的战争需要。１９５７年两国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斯里兰卡领导人班达拉奈克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赞比亚的卡翁达等人一样，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领导人。他担任总理后，改变了亲英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内实行国有化，把外国资本的橡胶园和茶园收归国有，撤除英国的军事基地。１９５９年他遇刺身亡后，他的夫人继任总理。班夫人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洋地区保持军事基地，她也反对苏联，谴责苏联入侵捷克。从各方面来看，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都是中共理想的国际统战对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计保持和这个印度洋岛国的关系，１９６１年还应斯政府的请求将中国珍藏的佛牙送去供佛教徒瞻仰，受到了斯里兰卡举国上下最隆重的迎接。

但文革期间，斯里兰卡成了毛主义极左派的攻击目标和输出革命的对象，因为斯里兰卡不但是个佛教国家，而且是君主国，有大地产制（茶园和橡胶园），又曾经是殖民地，和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文革中世界革命的多数对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中共和斯里兰卡文革前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在文革中成了极左派指控务实派“三降一灭”的证据。在斯里兰卡的外交官便用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当时斯里兰卡将毛像和毛著列为禁运品，但中共仍然设法偷运。１９６７年8月一艘中国船被拦截，搜出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称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两年来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的继续。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中共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邀请了斯政府高级官员，但大使馆门口却挂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大幅标语，又引起斯政府强烈反应。１９７１年，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发动反政府暴乱，纠结激进青年打砸抢，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他们扬言是呼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斯里兰卡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打下首都可伦坡，推翻现政权。据当时在可伦坡的中共外交官回忆，“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多次派出代表，

前往中共使馆，要求面见大使，要中共公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而大使在向国内紧急请示后拒绝了这个要求，同时严令使馆人员不得私下和这些斯里兰卡的造反派接触。不和反政府武装发生接触不但是大使的许可权和责任，更是“外交承认”的题中应有之义，大使向国内报告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向国内“请示”就耐人寻味了。１９７２年，斯里兰卡又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暴动。虽然并没有证据说中共支援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的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亲华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斯里兰卡政府对中共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拆封全部邮件，搜查新华社和中国工人的宿舍，连中共援助斯里兰卡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也不放过。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担心使馆会被关闭。为了保住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周恩来被迫接见斯里兰卡大使，不但不敢向斯政府提抗议，反而说班夫人很聪明，反复检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牵连，“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吗？”周恩来甚至还说中国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兰卡政府在搜查中国在斯机构中发现有这类人物，“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帮我们清理阶级队伍”。〔８〕虽然周的用意是要显示中共的清白，但这种表示所借用的方式和语言实在匪夷所思。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产党人６０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１９６７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其中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的女兵单位，叫作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些武装暴力斗争。此外，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１９６７－６８年左右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话语。玻利维亚毛派共产党６０年代中期的纲领和印尼共产党同一时期的文献一样反映了林彪文章的影响：“（一）在人民战争中坚持政治挂帅；（二）人民战争是群众争取解放的武装的政治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农民－－坚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装斗争分不开的，政治工作必须和武装斗争相始终；（三）人民战争要经过如下阶段：Ａ，和农民暴动相联系的游击战；Ｂ，运动战；Ｃ，阵地战，或者农村为依托夺取城市。”〔９〕中共的革命阶段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也充分反映在这些政党或组织的路线中，强调在拉美革命的现阶段主要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确定主要敌人，孤立或者中立其他敌对势力。当时在拉美革命中中共面临格瓦拉－－卡斯特罗主义主义的挑战，亲毛派共产党模仿中共的口吻，批判格瓦拉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不懂得发动农民和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智利共产党在档中这样总结毛派的“人民战争”路线和格瓦拉－卡斯特罗的“游击”路线之间的区别：“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游击战’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墨西哥，至少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材料说明直到１９７２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１９７２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在报刊披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使得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的仪式上就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向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问题。中共资深拉美外交官黄志良在回顾此事时并未否认这些游击队受中共支持，而是坦陈“这是中国文革混乱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７０

年代初调整外交路线时在拉美取得的一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墨西哥的关系，周恩来迅速邀请埃切维里亚访华，给予极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舆论表明中共无意支持反政府游击队。不但如此，毛泽东在和埃切维里亚谈话时还用开玩笑的口吻冲淡严肃话题，要埃切维里亚提防熊向晖（熊是情报官出身）在他的国家“捣乱”、“搞颠覆”。墨西哥不过是拉美国家对中共“颠覆”的担心的一个事例。１９７４年，拉美另一个大国委内瑞拉和北京建交，但黄志良说委政府宣布建交后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观察了一年多，确信北京没有“颠覆阴谋”才互派大使。〔１０〕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联系，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 Ian Greig 《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挑战》一书介绍，中国对非洲的支持有可能早于苏联。早在１９６１年，就有６个喀麦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为期１０周军事训练的情况。除了军事技术，这些非洲人还学习了中共革命的经验，“训练的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中国革命斗争,、’人民战争‘、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６个非洲人在１９５９年就被派回法属非洲展开武装斗争。据西方媒体报导，在６０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三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接受训练。一个叫作“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组织的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一个阿曼游击队员介绍了他１９６８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的情况。他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之后，他被送进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学习中，中共教员认为在非洲传播毛主义的一大障碍是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对这个宗教进行了批判。中共的教科书规定，在回答“同志们，什么是《可兰经》？谁是先知？”这个问题时，标准答案是“《可兰经》、先知和伊斯兰教的其他表现形式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英帝国主义的发明”。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人员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和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听上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类似。这些非洲人也实地观察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问题，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陪同人员告诉这些非洲人：“黑帮”是那些没有教育好的、自以为有知识胆敢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和教师。在最后结束训练时，每个受训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著作。〔１１〕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输出革命确实是中共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初对外政策的中心，但到了７０年代初，中共的对外战略发生了转变，从同时反对美苏和一切反动派（即所谓“全面出击”和“四处树敌”）转为重点反对苏联。这个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在国内，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世界革命的狂热也就相应地降温；在国际上，６０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响大大地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也不是有效的策略。因此在７０年代初，中共经历了对外政策的调整，世界革命的目标没有完全放弃，但其优先地位让给了联美反苏的战略。在７０年代上半期，全世界目睹了中共的对外政策从革命狂热到极端功利的突然转变，中共不但邀请２０多年的死敌的美国政治家访华，营造出友好气氛，而且很快就和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反动派”的政权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扎伊尔的大独裁者蒙博托曾经长期和中共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不但被称为是“非洲的蒋介石”，而且在６０年代国际题材的样板戏《赤

道战鼓》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恶棍。但到了７０年代初他却被视为中共在非洲对抗苏联的中坚，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４年两次访华，和毛泽东相谈甚欢，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个人友谊。毛泽东不但批准给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会见中和他商谈如何对付反政府游击队，即中共过去的同志。在拉美，中共原来和智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阿连德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建交，周恩来还多次向阿连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阿连德１９７３年被皮诺切特领导的右派军人用暴力推翻后，这起事件和印尼右派军人１９６５年政变并列，是两起国际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时期国际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行。当时全世界左派力量同声谴责，苏联东欧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和智利断交，和智利有外交关系的８０个国家中只有３８个表示承认军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智利军政府很快照会北京并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愿与中共保持关系。周恩来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衡量得失（主要是不愿给台湾以可乘之机）之后作出了所谓“冷而不断”的决定。在全世界同声谴责智利军人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浪潮中，中共的“见利忘义”受到了国际左派的强烈抨击。

三、文革行为方式在亚非拉的影响

除了输出革命和支持武装斗争的官方政策，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经由官方和个人渠道输出国门，也成了文革世界性影响的一部分。例如“破四旧”就在一些中国使领馆出现。中共驻埃及大使馆的花园里原来有十多尊精致的真人大小的女神塑像，还有背上带翅的天使雕像，这些是古罗马文化的遗迹，但在文革初期被使馆内的造反派连底座挖起，扔进垃圾箱，一些雕像就此断裂，再难修复。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在驻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领馆和外交官生活“革命化”是另一个方面。和国内一般甚至中高级干部当时相对简朴的生活比较，中共驻外机构被认为是在“外事特殊”的藉口下滋生特权之地。在文革刚开始时，１９６６年8月，坦桑尼亚和奥地利的毛左派人士写信给中共有关部门，指责中共驻外机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化，毛泽东于是在9月9日作了著名的“九九批示”，要外交机构“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九九批示”有如外交系统的“五一六”通知，后果之一是导致很多驻外机构的字画工艺品和体现传统艺术的陈设被列为“四旧”遭撤除，改挂毛泽东语录和图像。

但和“造反”——“造反有理”、“造一切权威的反”（当然毛本人的权威不但不能反，而且发展到被神化的地步）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派性”——这些文革初期的主要行为方式相比较，以砸塑像换陈设来“破四旧”和实现生活方式革命化就显得是小节了。文革初期中共外交机构也经历了内部的造反和夺权，很多派出人员在驻在国向大使和领事等当权派挑战，和驻在国的毛派或左派串连，他们内部往往又存在派性，这些都构成了文革在海外影响的一部分。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在坦桑尼亚引起的风波就是一例。

坦桑尼亚是中共６０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共也把对坦桑尼亚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对抗西方和苏联的基地，所以虽然自己经济在文革中几乎停顿，但对坦桑尼亚是有求必应。当时中共对坦桑尼亚有很多援助专案，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６０年代是最大的一个，有１３０多名专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的。上海是文革的发源地，纺织系统又是首当其冲（王洪文就是在纺织系统起家的），因此纺织专家组里很

有一些造反派，其英语翻译原来就是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的常委，因为在国内没有排上名次，１９６７年底来到海外“开辟第二战场”。他一到坦桑尼亚就拉起自己的造反人马，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五星红旗，竖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毛的语录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样板。他指控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和专家组领导都是走资派。不但如此，他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当时坦桑尼亚政府组织了“绿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和中共的“红卫兵”相应，也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启发，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但中方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到１９６８年初，这些人又开始在坦桑工人中大肆活动，要求他们不要听自己政府的话，起来造反。中方造反派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坦桑尼亚安全部门的注意，把情况上报给尼雷尔。

当时尼雷尔正在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不但在国际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共影响的议论，而且在国内也面临很多人的反对，尼雷尔本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尼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例证。在这两次政变中，军人的藉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政变的后果是中共在这些国家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对中共也是沉重打击。尼雷尔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共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对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发展非常忧虑，于是于１９６８年6月访华，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中方造反派的问题。根据中共外交官的回忆，在和毛泽东会见时，双方一开始由于对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虽然毛泽东后来也表示不允许造反派在坦桑尼亚活动，但他的理由和文革并无关系，而是说这些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根据这个逻辑，造反派反而成了应该被造反的对象。有了毛的圣旨，周恩来在和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共绝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开辟第二个造反战场的英文翻译，被使馆送回国后下放劳改。当时除了尼雷尔，中共在非洲的另一个盟友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也向中共直截了当地表示对中共外事和援赞人员在他的国家传播文革和毛主义的强烈不满。

中国为坦桑尼亚培养的杂技团是另一个文革在非洲影响的事例。１９６８年７月，坦桑尼亚杂技团学成归国，回国后一段时间内表现还不错，但很快这些团员之间就闹起了派性，动不动就向领导造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争名夺利。连中共外交官也说这是他们在中国培训时受了文革“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影响。结果是杂技团被派性分化，内部闹得不可开交，演员们无法再合作和表演，只好解散。一个在技术上很成功的文化交流项目就这样毁于文革的影响。〔１２〕

文革的学生造反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反响，上述印度的拿夏里特运动就是一个事例。除了在农村发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１９７０年春天这个运动的学生参与者在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发起了一场校园文革。在很多大学，学生们抵制考试，冲击学校办公室，砸毁家俱和设备，在墙上涂写毛泽东语录。他们还冲进书店，焚烧书籍，被烧的有甘地、尼赫鲁和泰戈尔等印度历史文化名人的著作，甘地诞辰百年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惨遭洗劫。学生还砸毁马路上和校园内的历史塑像，一时被砍下的塑像人头满地乱滚，后来政府不得不在每个塑像前都派员警站岗，这场学生造反由此被称

为“砸毁塑像”运动（Smashing Statue）。印度的报刊广泛谴责这些行动，印度《政治家报》当时题为“毛对抗甘地”的社论代表了一般社会舆论的看法，说这场“文革”“愚蠢而令人恶心”，它反文明，毫无建设性，甚至是“邪恶”的。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参与这场校园文革的学生很多都是拿夏里特运动的成员，但这场校园文革的最初发生却和运动的领导无关，马祖达虽然也号召学生离开校园，但却是为了“和工农相结合”，并没有想到让学生去冲击校园、烧书和砸毁塑像。因此这场运动基本上是这些学生在中国文革学生造反影响下的自发行为。但马祖达很快就就从毛主义的立场和逻辑出发看到了这场破坏背后的“建设性”并支持学生的行动。他说印度的教育制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任何信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人”都必须培养起对这个制度的“仇恨”。学生的行动是破坏也是建设，因为“不破坏这个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不砸毁那些由买办资产阶级树立的塑像，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就建立不起来”。〔１３〕没有别的比这番话更能体现马祖达和他的追随者和“不破旧就不能立新”这个毛主义文革逻辑之间的惊人一致了。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表现在圣像崇拜（戴毛像章、张贴毛画像和树立毛塑像）和传播阅读红色圣经（毛著作）等等－－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激烈，但却是最普遍和持久的文革行为方式，而且是传播文革意识形态如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等等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径，在海外有着最广泛的影响。这些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国官方推动的结果，因为毛像和毛著都是在中国国内印制后通过官方途径大量运输到驻外机构，驻外人员又把散发这些宣传品当作日常工作，尤其是在散发得越多就显示自己对毛越“忠”的文革环境下。当时处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原因，很多国家都把毛像毛著列为违禁品不许入关，但对于中共驻外人员来说，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正说明他们的工作的伟大意义。在东南亚，中共的友好邻邦柬埔寨有好几个省份在１９６７年受到在中共影响下的“造反”的困扰。１９６７年５月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驱逐了两名中国专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华侨学校开刀，限制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控制课程，不准散发毛泽东语录和像章，西哈努克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不是钦佩而是轻视。中共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每个中国人即包含华侨，因为他们持有中国国籍）。１９６７年８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华，要求中共放弃在柬埔寨的文革宣传，但中方却反过来要求西哈努克“允许在柬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爱社会主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惊，他的理解是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９月，西哈努克下令取消柬埔寨的所有和外国的友好协会，但其真正的目标在于解散宣传文革不遗余力的柬中友协，北京的中柬友协闻讯立即打电报给金边的被取消的柬中友协，要求和“反动派”斗争。西哈努克在气愤中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经周恩来的苦心劝阻而没有实行。〔１４〕在缅甸，中共大使馆和新华分社在１９６７年成了文革宣传中心，尤其是鼓励华侨学生佩戴毛章，携带毛著进入学校。这种文革宣传加深了缅中之间本来就有的北京支持共产党游击队问题上的矛盾，缅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章携毛著，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中缅矛盾的恶化使得缅甸国内１９６７年６月出现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武官处和使馆都受到冲击，１０多名华侨和一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共作出强烈反应，北京举行２０多万人游行示威，毛同意提“打倒奈温（缅甸领导人）”的口号，群众示威中随即打出“绞死奈温”、“油炸奈温”的标语。〔１５〕

在中国的北邻蒙古，文革爆发后很多中方人员要求在华侨学生中组织红卫兵，被

代办劝阻，但其他形式的文革行为非常激烈。中共人员除了在驻蒙建筑公司和友谊医院广为散发毛像和毛著，还把在乌兰巴托的华侨培才学校变成在蒙古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这个学校是当地华侨子弟小学，基本被中共人员控制，中共外交官回忆说："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蒙古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寻找藉口将三名华侨学校教师驱逐出境。中方人员要在车站为这三个人举行"欢送"仪式，要用"读毛语录，喊文革口号，唱《国际歌》"来表示抗议。蒙古政府得悉后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召见中国代办，提出根据蒙方规定，不得在车站举行这样的欢送仪式，中方一意孤行，结果和蒙古警方发生冲突，一些学生和中方人员受轻伤。中蒙关系就此事进一步恶化后北京发生了"八九"事件：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以蒙古驻华大使司机在友谊商店门口开车时不慎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头像的海报为由，围攻这位司机，焚毁了那辆汽车。这位司机随即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在途经二连浩特时又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从火车上揪下来，强迫站在高凳上为他破坏毛泽东圣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斗。〔１６〕

中国的西邻、喜马拉雅山麓的尼泊尔文革前也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在尼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修建公路和水电设施。文革中中方造反派在中尼边境树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员也积极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让中方限制出售毛语录和佩戴毛章，但中方人员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采取措施搜查尼中友协，没收文革宣传品，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图片展览橱窗，并和"捍卫"毛思想宣传阵地的中方人员在现场发生冲突。中方强烈抗议，指尼政府同美国勾结，结果尼政府要求中国撤走部分驻尼人员。在非洲，肯尼亚政府于１９６７年宣布中国代办李颉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肯尼亚，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大使馆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和抗议坚持散发毛章毛著。加纳甚至为同样的原因和中共断交。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外交史，１９６７年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４８个国家中有近３０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而和中共发生外交纠纷，但这些事件在当时都被中共官方说成是国际帝修反的反华行径，加剧了在国内制造的中国被帝修反所包围的恐惧症和革命歇斯底里。〔１７〕

早在文革之前，１９６６年，中共和古巴的关系也因为中共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破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党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毛主义和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有诸多共同点，都急于超越苏联，依靠革命觉悟和精神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国际政策上反对苏联主张的"三和"政策。但两国在１９６６年初由古巴方面首先发难，公开决裂，古方提出的原因一是中共削减大米援助，二是不顾古方长期的劝阻和告诫，通过各种途径向古巴党政干部和一般群众散发中方的宣传材料，甚至利用邮局设施直接把此类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庭地址。卡斯特罗在１９６５年九月曾经专门召见中共驻古巴临时代办，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传材料，提出强烈抗议，场面非常难堪，中共使馆立刻电告国内。虽然古巴和中共决裂有哈瓦那难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的深层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无忌惮的宣传无疑是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在古巴和中共翻脸后，中方说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由此可见，当时所谓的中国被"帝修反"等"国际阶级敌人"包围纯粹是自食其果。不过，古巴整个６０年代下半期国内的政治气氛和中国的文革非常类似，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间发起了"革命攻势"，是古巴版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１８〕

四、龙种与跳蚤——毛主义文革的余波

当文革在中国大陆画上句号后，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在６０年代世界革命高潮中播下的“龙种”却在一些国家收获了“跳蚤”。今天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就自命为毛主义，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也被国际舆论称为“毛主义叛乱”（泰米尔组织帮助训练了尼泊尔反政府武装）。这些毛主义组织固然和中共革命的世界性影响有关，但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和秘鲁的“光辉道路”相比，它们的意义局限于实践毛主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用暴力消除阶级差别，和文革作为用暴力和枪杆子夺取政权之后的“继续革命”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它们由于产生得比较晚，也没有受到中共的支持。而红色高棉和“光辉道路”的领导人都是６０年代人，深受文革影响，直接受中共支援（有些人文革时期就在中国）。作为共产党人，他们崇拜的不但是毛主义的一般理论，例如信奉枪杆子和用农村包围城市，更是毛主义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他们要继承和发展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毛主义，因为这些都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有待继承和发展的是６０年代毛主义关于继续革命，即文革的理论与实践。而正是中共对于这个意义上的毛主义的抛弃创造了让他们自命为毛主义的继承人，甚至要超越毛主义的历史机会。

中国读者对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并不陌生，但对这些政策的目的和与文革之间的联系则不一定有清楚的了解。笔者在１９９９年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的文章“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中提出，“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和印度那夏里特运动一样，红色高棉鼓励用原始手段杀人，甚至用镰刀、斧子和锄头。

那么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呢？红色高棉认为毛泽东用文革反修防修，但他不彻底，而没有经历文革的越南则变修了，红色高棉要吸取这个教训。一个高级干部对回国的知识份子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拿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在这个意义，红色高棉是吸取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经历了文革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中共６０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国际背景是认为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苏联变修，中国成了革命中心。红色高棉７０年代中期采取

的屠杀和清洗、废除货币、拆散家庭、解散学校、撤空城市等等极端措施的国际背景则是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越南变修，柬埔寨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这种相似性清楚地表明了文革和红色高棉之间的联系。

秘鲁的““光辉道路”” 和毛主义文革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笔者在《中国之春》２００１年九月号发表的文章“秘鲁的小毛泽东和他的‘“光辉道路”’”中分析了“光辉道路”和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光辉道路”的领袖古兹曼是大学哲学教授，文革时在中国受过毛泽东思想的薰陶，回国后被追随者称为秘鲁的“小毛泽东”和“安第斯山的红太阳”，绰号“香波博士”（指他善于用毛主义给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即“洗脑”）。他１９６８年回国后就造党内最高领导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责他是修正主义，走和平道路，说自己和他之间的斗争就是毛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之间的斗争。秘共原来有一份刊物叫《红旗》（其名称不知是否和中共的理论刊物《红旗》有关），由帕雷德斯控制，古兹曼于是办了一份《光辉道路》。秘共和秘鲁左翼势力就按照“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的分野站队。当时秘鲁左派主要集中在华曼戈等大学，而秘鲁的大学又继承了欧洲大学自治的传统，政府很少干预，因此这场“路线斗争”就在这些大学校园里肆无忌惮地展开，演变成了一场小型文化大革命，对立的两派在形形色色的辩论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上彼此指责对方是叛徒和修正主义，散发攻击性的传单和小册子，张贴诽谤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冗长的充满了领袖和导师语录的论战文章，最后发展到在会场外面拳脚相向，一派占领学生宿舍，另一派调兵遣将来围攻，展开了武斗。大学校园里涂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思想万岁！”“冈扎洛主席万岁！”“打倒一切修正主义！”之类的标语。“光辉道路”的组织和活动中渗透着毛主义文革的影响。例如，看一下它所张贴的宣传海报，人们会发现无论从图案设计到观念，都像是从文革宣传画的翻版，只不过把文字变成西班牙文，把毛泽东的头像换成古兹曼的。〔１９〕

今天人们都知道““光辉道路””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暴力组织，它扰乱秘鲁社会近２０年，杀人无数（被杀的不但有员警和政府一般职员，甚至连乡村教师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是为现政权服务，“光辉道路”还把一些参加选举和投票的农民的手指砍掉），毁坏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公共汽车、电站、邮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机构等等）的价值更是难以计算。但人们不太注意的是，古兹曼是在１９７８－７９年间策划、１９８０年正式发动武装斗争的。古兹曼作出武装斗争决定的背景正是中共结束文化大革命、清算毛的门徒四人帮。当中共逮捕四人帮时，秘鲁首都利马的街头出现了一些倒吊在树上的死狗，上面贴着写有“邓小平”的纸条，尽管邓小平与逮捕四人帮无关，但他的名字象征着对文革的“右倾翻案”。当四人帮被审判时，中共驻秘鲁大使馆受到暴力袭击，手榴弹甚至扔进了大使的卧室。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毛主义左派对中共结束文革最激烈的抗议。

象红色高棉一样，古兹曼总结中共变修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毛泽东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但他做得不彻底，所以他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文革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这个“光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的秘共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这个说法明显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一个比喻：苏联人把史达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正是在中共文革收场，“红

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毛以后的中共变修了，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当代的列宁和毛泽东。因此，““光辉道路””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尽管由于没有能够有机会掌管国家政权，我们无从知道这个“光辉思想”的细节，无缘领教这“第四把刀子”的锋芒，但想来如果“光辉道路”能铺到整个秘鲁，那么人们所能看到的恐怕离红色高棉的“伟大实践”相去不远，或许更有可能的是红色高棉的失败会刺激“光辉道路”走更激进、也更灭绝人性的道路。

结束语

文革对世界的影响是文革研究和中国革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２０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课题。虽然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有赖于中国大陆对有关历史资料和档案的解禁（例如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外交部人员、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已经发表了大量回忆录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文革在海外的影响，但以中联部人员的身份发表此类文字的还非常罕见），但在目前可以见到的公开发表的材料的基础上，我们也完全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

第一，文革期间（甚至在文革发动以前的数年间）中共无可否认地有一个世界革命的总体战略，以东南亚和中国的近邻为中心，辐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二，这个输出革命的战略是建立在对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帝修反的灭亡指日可待，中国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个判断的基础上的。输出革命和文革意识形态是中国成为这个中心的标志和需要。第三，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动也是国内强化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共不顾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与国之间起码的行为规范，向外输出革命和毛主义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使它处于空前的国际孤立状态，甚至连长期的友好邻邦也都翻脸，但这种自己制造的困境却被宣传成是“帝修反”包围和灭亡中国的阴谋，反过来更刺激了国内的政治紧张气氛。第四，文革期间向外输出革命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文革时期主宰大陆意识形态的毛主义理论和行为方式，也有“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毛主义模式，根据地区的不同各有侧重。第五，文革初期一定程度上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外交部在１９６７到１９６８年间一度的“失控”和很多驻外使领馆受造反派冲击或控制，国内很多涉外事件由造反派和红卫兵发起和主导）曾经使得文革意识形态的输出带有一定的自发性，打破了中共建政以来涉外事务的神秘性和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格局。但这种自发性并不能说明它们和文革时期的中共最高权力无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自发性正是文革意识形态对外输出的方便途经，是输出革命的特殊形式。

第二，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共官方在８０年代文革刚刚结束后痛定思痛、心有余悸时称文革是“浩劫”（相比之下今天官方在谈论文革时正尽可能地回避使用这样的辞汇）一样，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世界性影响也是灾难性的。本文所列举的受文革和毛主义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极为多元，文化、历史、宗教和政治传统更是纷繁复杂，但毛主义影响所及，造成的后果却是非常相似，只是程度的不同，都是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被颠覆，伦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毁，和平生活被破坏，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也不多见的原始屠戮的程度。毛主义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度产生如此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是利用和夸大了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阶级和阶层差别，更有性别、年龄和社会角色的差别，从而把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完全颠倒。例如，在红色高棉和“光辉道路”

中人们不但可以看到大量的女性追随者和女兵，更有大量的少年儿童，他们构成了“组织”的重要成员。他们在被“解放”的名义下从事和他们的性别、年龄和自然身份完全不符合的“革命工作”，甚至拿起武器，如果对方手无寸铁，他们肆意杀人，如果对方是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则被大量屠戮，成为“烈士”。此外少年和青年学生被煽动起来反叛社会和成人，把教师、教育制度和社会文明成果视为最直接的斗争对象，本来是接受教育、培养人格的社会成员却变成了引导社会“变革”的先锋。毛主义之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中有这样的追随者，不但不能说明毛主义革命的正当性，恰恰相反，说明了毛主义难以在正常状态下承担社会责任、具有成熟理性的社会群体中找到大量追随者，只能用“压迫”去曲解社会秩序、用“解放”来为自己寻求人力资源。这是我们今天不但回顾文革，而且回顾整个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历史时必须充分注意的。

追根寻源，文革的世界性影响中的这种灾难性来源于文革意识形态中包含的一种超越人类社会差别的恶，因此对人类社会具有的破坏性和对人性的摧残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这种恶是对文明和文化的拒绝，对原始和野蛮的推崇，对传统的否定，对肆意“创新”的迷恋，对秩序的厌恶，对破坏的喜好，对人性的否定，对兽性的赞美。应该指出的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要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对共产党革命之前的具体的文化成就和杰出的个人有怎样积极的评价（例如马克思等人对莎士比亚和歌德的欣赏），从整体上说一切产生于共产党以前的制度、文化、价值和道德都处于被否定和至多是“批判地吸收”的地位。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拒绝和批判在国际共运中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的国家其程度还是有极大的差别。在“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及其启示”一文中，程晓农通过对苏联三十年代“文化革命”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在对待人类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就乃至行为规范上，苏联和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别。苏联三十年代的文化革命虽然打击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但却没有导致否定整个人类文明和俄国文化传统，相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不放弃政治教育的前提下，对提高整个人口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质作了很大的努力，现代文明还是被追求的目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文化革命”多少还是名副其实的，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不折不扣地是“大革文化命”。这就导致了同样是共产党统治，苏联比中国的文明水准要相对高得多，对文化传统更容忍，对人性更为理解和尊重。〔２０〕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标志的是一场彻底反文明反文化反秩序反人性的社会运动，是中共自１９２７年湖南农民运动以来内部所积蓄的破坏性能量的大暴发。在２０世纪，世界范围记忆体在着这种对破坏和毁灭的原始性渴望，体现在对秩序和规范的否定和对打击甚至屠戮体现这种秩序和规范的社会阶层的冲动中，尤其是在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受挫折的国家和民族。这种对现代文明的反动不但是中国文革的本质，也为其他类似的社会动乱或“革命”所共用。

注释

１、陈平　《我方的历史》，新加坡 MEDIA MASTER PTE LTD，２００４年，第３８３－３８８页。
２、引自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３４。
３、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之那战争”，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之那战争》，香港天地

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第４７－４８页。
４、同上，４８。又见杜蒲、李丹慧译“中越等国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的谈话”，同上书，第３１９页。
５、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第６５９页。
６、EMERITA DIONISIO DISTOR， “MAOSI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IN ARIF DIRLIK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IES PRESS， １９９７，第３７１页。
７、SANJAY SETH， INDIAN MAOSIM： THE SIGNIFICANCE OF NAXALBARI，同上书，第２８９－３０２页。
８、王禹生《难忘的外交岁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３－６９页。
９、 WILLIAM RATLIFF， CASTROISM AND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１９５９－１９７６，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１９７６，第９３页。
１０、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１、１８４，２１８页。
１１、IAN GREIG， THE COMMUNIST CHALLENGE TO AFRICA， FOREIGN AFFAIR PUBLISHERING CO。 LED， 第１７１－１７３页。
１２、有关文革对坦桑尼亚的影响，见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０－２６；又见尹家民、张铁珊，“毛泽东周恩来与坦赞铁路”，李同成编《中国外交官在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０９－２１２页。
１３、有关印度校园文革，见 SANJAY SETH， “INDIAN MAOSIM： THE SIGNIFICANCE OF NAXALBAR”I，第３０１－３０４页。
１４、见马继森前引书，第１４９－１５１页。
１５、同上，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１６、孙一先《在大漠那边》，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８－６４页。
１７、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１１页。
１８、有关中古关系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６年的发展，见本文作者发表于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的文章“SINO－CUB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ASTROIST REGIME，２００６年秋季号
１９、MEGAN M FERRY 在“CHINA AS UTOPIA： VISION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１２， NO２ ２３６－２６９）中详细介绍了文革宣传画在拉美的影响，包括和“光辉道路”宣传材料之间的联系。
２０、程晓农的文章见本书。

西藏“文革”疑案之一：１９６９年尼木、边坝事件

唯色

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需要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 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 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摘自我的采访笔记。〔１〕

一，背景

自从１９５０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红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 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１９６６年5月１６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于是风起云涌，震荡无宁日。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于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 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 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造总”是当然的造反派，“大联指”被视为保守派，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亲不亲，派来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１９５０年之后由中共军队严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并非真空的军营。由于“造总”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是１９５０年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国华，支持“大 联指”的军人远远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甚至在军队内部的高层中也是这样。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 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中共规定，西藏７１个县当中的２５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 边防要点），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着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能够超然物外的很难做到。

从１９６７年５月起，西藏两派的武斗正式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为了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国家机器恢复运转，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 西藏也不例外，于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１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并且深入到广大农牧区， 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从许多事实来看，军事管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军队的推波助澜，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进入更为紧张和可 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２〕

二，疑问

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下发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 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 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面对面的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９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 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见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１９６９年３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５２０　 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 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 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６１３　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于这之前的武斗中死的只是平民。北京为之暴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９２５　　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 次“叛乱”），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的。所谓“再叛”，是相对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９年整个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那次“叛 乱”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随之出走。那么，十年之后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文革时期认定的“再 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１９５９年与 １９６９年。）“叛乱”与“暴乱”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２００１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据他披露，将 “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１９８０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改做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当时西藏 自治区共有７１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５２个（１８个县被定为“全叛”，２４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７４％以上，涉及 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叛”的军事行动在１９６９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的理由之一是：

“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５２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 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 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属于尼泊尔的仆从国，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那几百个人（１９５９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巴藏人），老弱 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６９年的事件根本无关。”

他的另一个根据是：

“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 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 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另外，某县气象台台长是‘造总’成员，虽然他是一个汉族，但也被定名为‘叛乱分子’遭到枪毙。这不仅说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 也说明了当时的派性冲突。”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经大大缩水：

“自治区的有关 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４６９３人，安多县是 ８００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 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 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那么，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还是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无论在当时还是至今都说 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造总”。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不过轰动一时的“尼木事件”的领导人主要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据说在单增朗结和 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一位在“文革”后离开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的说法是：

“他 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的，甚至他们中的积极 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们的思想水平太低。他们去哪里的话，一般由各村的代表从村里选人跟去。这些代表都是最早时候的造反派。我们村有尼玛次仁和格桑普卜。他们两个是我们村红卫兵的正副队长，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但后来斗争的性质变了以后也很积极，加上很多人在没有人 动员下自动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德朗这样描述：“阿尼（藏人对 尼姑的称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里。她当时好像是３０多岁的人，我自己没有见过阿尼。听说 １９５９年之前她就是尼姑，１９６２年组织学习班时，把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她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 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那时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这个阿尼带到两个喇嘛那里，这两个喇嘛给她开了气脉，于是阿尼开始降神。但那时候已经 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阿尼周

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她后都说她能讲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

在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德朗回忆：

“他 们去尼木县攻击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１９５９年由藏东康 巴人组织的反抗中共的游击队伍）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反正那天他们冲 进了县武装部。他们向县政府和武装部攻击了两次，第一天就是这么发生的。是先在尼木区政府里开会，然后去县政府的。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 ’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造反派攻击过县政府一次，那时他们获胜了。但这次打着民族的旗帜向 县政府进攻，后果大不一样。当时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 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是确布村的人。

“他们没有现代武器。‘文革’开始时，从拉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演出队，他 们给热群送了一把手枪，这是唯一的自动枪。还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另外，乡里的铁匠们打了很多长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里的农民起义一样。听说 他们到县里时，公安局的楼上架着一架机枪。后来汉人说是没有直接向人开枪，但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攻进去之后，我们达热村的一个叫次旺的人，他说是 他爬上墙把这个机枪夺过来的，枪管很热，把他的手都烫伤了。这个人后来被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但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活着，在达热村。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１２个人全被杀死了。听说当时武装部没有让他们带枪。”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镇压非常残酷，正如德朗所讲：

“这 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当时在那 里的主要人物中，只有一个人后来没枪毙，不知道是嘎单还是赤列。但到我们村时无人抵抗，因为那时敢于抵抗的人都已经死的死、抓的抓了。这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扎西次旦的人，大概２０多岁，他平时胆子比较大，据说攻县政府时，他是冲着机枪撞过去的，因为身上带着护身符所以没中弹，但最后子弹击中了护身符，他 就倒下了。

“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里等了三天还不见人，以为扎西次旦受伤躺在什么地方，就在背兜里装了一点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县 城时，县武装部的排长好像是姓高的，一个长着兔唇的汉人，他挡着玉珍不让走。阿加玉珍哭着吵着一定要进城去找

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几步后，那个排长从 她背后开了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女人被高排长打死的情景，很多人亲眼看见了。

“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 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 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 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３６个人。第一批在尼木枪毙十几个人时，在拉萨枪毙的人数要少一点，但第二批在拉萨杀的时候，尼木好像要少几个。

“在 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１８岁，年纪最 大的就是当年照顾阿尼的那个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 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 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 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藏族记者巴尚（化名），曾经跟随平息“尼木事件”的军人参与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动。２００１年夏天，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解放军围剿所谓“叛匪”的经过：

“……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后来进山沟围攻尼姑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尼木的一个区，羊八井往南）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 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 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０火箭筒对着房 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

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 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 打死了这么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后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抬起来埋了吧，于是就挖 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 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 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３０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 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 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 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 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 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今晚就算 了，明天再进攻吧。于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 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里 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 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 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４０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后枪毙的。她 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 以要“剿匪”，正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 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 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军人，当地的一些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如“剿匪”时在 赤列曲珍的住处发现：“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被砍了好几天

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 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 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

“这个尼姑３０多岁，个子 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 有她那伙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６２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 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么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 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 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 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后，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老百姓展示被杀的军宣队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以示 阶级教育。后来还建立了“烈士纪念馆”。西藏的藏族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图片讲解宣传员，２０出头的女军人。我在２００３年３月采访她时，提起这段往 事，她依然气愤难平，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

“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 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唉 呀很厉害。那些图片我全看了。那个杀害的场面相当吓人，有的人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拿石头砸，拿刀砍，惨不忍睹。

“当 时我心情很激动。看见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多的战士英勇地牺牲，我觉得义愤填膺。在作讲解的时候，我边讲边流泪，气愤得很。老百姓也是边看边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动的只是少数人。有不少喇嘛，还有些个别老百姓。大多数人不知道，结果一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 就被交出来了。尼姑跑到山里去了，怎么被抓着的呢？还不是老百姓给交出来的。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我记得据说她常年躲 在山洞里边。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还是一个有点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这样，还是她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同时跟西藏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有关。维护祖国统 一、反对分裂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

重来。对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 态度来对待，而且要用党的政策。对他们正常的信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那我们必须要识破。而这个 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纪倒不大，可能４０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 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 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当时这个尼 姑的行为震惊了整个西藏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离了她的教义。

“他们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那些跟随尼姑的人都是 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虽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动了的。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 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 ５９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５９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６９年能发生这样的 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巴尚的看法 也是，“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 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 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没有‘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不过巴尚还是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

“实 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 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 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 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 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 ５９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 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么，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 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 什么？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像那么多“翻身农奴”，竟能做到义无反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 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 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惨剧。那 么，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 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 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１９５７ 年－１９５９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 自于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当权 者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也是当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 陈列室里除了意外地看见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随者们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名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如同神 秘莫测却充满杀机但又深含当地文化的预言。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对立的现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宗教习俗中疯疯癫癫的神谕者的角 色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时，或许正是调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原始方式杀戮外魔的绝对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无疑是 一把钥匙，打开的是西藏民间的无数宗教信仰者怎样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至于其中出现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许正是出于将民族反抗混淆为派性冲 突的考虑：

宗旨：神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征服魔鬼这个敌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对于多财或者吞财的，对于这种人的裁判，是没有发言权的神。 住在属于自己房子里的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坚决自卫还击。旦增加措（指１４世达赖喇嘛）的国家被罪恶的喇嘛（指与中共 合作的活佛）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神界。过去因为没有发言权，肚里有火，嘴里不敢冒犯。求神从比如（指该县境内一个地方。）一带来了一千多 人，对他们说：“不要贪婪，不要忌妒，对厚恩的父母不要顶嘴，要与邻居亲近，要尊从党的话。”在求神的人当中，其中有

三十多个好人，其余的以后再详究。用 一个藏戛戛布（藏语，小银币）做一个渡母佛像，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 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整个的国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国家，而是我们神的国家，虽然你们不乐意，但是，从属羊的那年（指的是１９６７年）起，就 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内有好戏看。谢谢你们俗人叔叔们，你们已恩将仇报了，佛益西诺布和护法神神们可以慢慢地报答给你们。一千个僧众请来了尼姑，孔林加母 尼姑住在山上，过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我是按照伟大的毛主席指示前 来的。俗人叔叔们，你们的寿命好象烟囱里见到的光线。有的人心胸狭窄，对俗人叔叔们造成了灾难，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来细判。俗 人叔叔们，你们想得倒好，你们想用一个藏戛戛布做一个渡母佛像。神没有造过谣言，对于俗人叔叔们进行了教育，奉上来的哈达，也各自退还。尼姑孔林加姆对于 黑心的俗人感到愤怒，罪大恶极的九十个人已经到手了，还有有待于落到手里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 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四，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１９７３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向我讲述的：

“实 际上起因还是派性武斗。边坝县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分的有两大派系，从县机关发展到整个农牧区。边坝县虽然牧业不多，但也是农牧业并存，它有２４个乡，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文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么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有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戴 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份。总而言之，乡乡都是这么发 展起来的，都有造反组织。

“刚开始不是到处都在夺权嘛，拉萨夺权，昌都夺权，县里面也有小型的夺权活动。这一夺权就有争斗，先是文斗，然 后是武斗，连县里面也有很小的武斗。边坝县也是如此。那时候边坝县有一个群众代表，‘造总’的一个小头头，还是一个喇嘛，在拉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 被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被认为支持‘造总’）说成是‘红色喇嘛’，回去以后他大肆宣传，到处说曾司令、曾主任接见我啦， 这是对我们‘造总’的肯定等等，这就为边坝县‘造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久，县里的‘造总’通知下面的各个造反司令部，说是某月某日到加 日来参加群众大会，要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什么来着，这样那些乡里的司令、政委都来了，在大会上把那个王书记斗了几下，然后就打起来了。”

至于是不是“再叛”，普卜说：

“究 竟有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 人”，

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 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不过这里面，我想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是有的，比如说要杀“甲突日嘎嘎”。这个“突日嘎嘎”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扬 青稞的工具，分叉的，两个叉叉，被比喻成汉人，穿裤子的汉人。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 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 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 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 “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７年还是８年。这是真事。实际上当初的确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也借机混进去了个别的坏人，围攻了一些区，打死 了一些人，抢了一些东西。”

但是，无论这里面有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当时边坝县２４个乡，乡乡有“造总”，尤其是那个“红色喇嘛”的 宣传使“造总”的力量更加壮大。不过老百姓听他的话跟他是不是喇嘛应该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因为他是自治区“革委会”领导高度表扬的“造总”小头头。据说整 个边坝县都成了“造总”的天下，“造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被认为当众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个大会在日后成了一个分水岭，当天参加那个大会的２３个乡后 来均被划为“再叛”，只有一个在怒江边上的乡，乡长和书记没等大会结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无恙。但大多数被叫来开会的老百姓很听话，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对 那个大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明白，结果连怎么进的监狱也不清楚，可就因为参加过那么一个大会便有了“叛乱分子”的嫌疑。

于是，中央下 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内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普 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 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 “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 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平 叛”过程中发生的）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在“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 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几个女人勒死一个解 放军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真的是确有其事。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 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

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 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 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 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 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３０多人。"

１９７３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 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 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结果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 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 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自１９７３年之后，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

"可 这有什么用，杀都杀完了，包括那个'红色喇嘛'。除了杀错的，还有太多的关错了的，像边坝县县长就被关在监狱里，是巴塘藏族，叫向于华（音），后来当昌都 地委秘书长，党校校长，现在退休了。我一听就说他妈的，怎么会连县长都成了'叛乱分子'！他当时被说成是'叛乱'政委，其实他只是边坝'造总'的政委。更 好笑的是，被说成是'叛乱'司令的竟然还是一个汉族，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是邮电局的一个一般干部，边坝县'造总'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杀了。哈！一个 汉族搞什么'叛乱'！ ……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 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五，人民公社

就１９６９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新华社记者巴尚提出值得关注的因素——人民公

社：

“日 喀则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销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并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来，让群众富裕起来以后再说怎么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内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着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吃 了很多苦头。”

是的，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来说，“人民公社”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关系的象征。“人民公社”恶化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如“破四旧”粉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１９５９年之后，对西藏农村和牧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的一次革命，使“百万翻身农奴”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成立。然而，“人民公社 化”却颠覆了这一“翻身”成果。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１９６０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８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 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１９６５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１９６６年初，已经办起 了１３０个人民公社。１９６８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１９７５年，西藏９９％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１９２５个（《中共 西藏党史大事记》），这无疑是革委会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现了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来改造自然、把穷山恶水变成 人间良田的一个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从１９７０代初期开始，毛泽东一声号召——“农业学大寨”，使得全中国所有农村投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高潮中。西 藏也和中国内地的所有农村一样，要把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当年的农牧民们恐怕一生中最记得中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 就是大寨。

如何学大寨呢？除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一些并不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 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最适宜在高海拔地带 生长的农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这块绝对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西藏人并不喜欢吃小麦，而且在西藏种植出来的小麦品 质之差简直无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 却也并不轻松，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 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５０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２０万人生活相当困难。 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１８０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王力 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

与此同时，在公社化的进程中，还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精通藏语的美国藏学家 MC 戈德斯坦，在１９８０年代对西藏西部牧区为期１６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

“个 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 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论理的认同。”

为此，他的总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其实，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农村和牧区激起强烈的反响。当年在昌都一个区里当区干部的霍康强巴旦达说，当时农区已经完成了公社化，接着在牧区办公社。他所在区里的文书在大会上表示异议，说牧民们不愿意办公社，因为他们对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现在要把牲畜都交给生产队，他们的心里很难受。就因为这 句话，县公安局的员警连夜抓人，这位文书被关了整整３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１９６９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 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同上）。也就 是说，在１９６９年的一系列混杂着各种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 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曾经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事实上，反而是“尼木事件”被平息之后办起来的人民公社多少救助了当地的农民，正如介绍过“尼木事件”的尼木农民德朗所说：

“…… 记得造反派成立的那年（１９６８年），我们大都没有缴税（交公粮）。但第二年，也就是反抗的那年，尼木受灾，可是在镇压之后，县里逼着我们把两年的税（公粮）一起缴。这么一来，家家没有糌粑吃，生活非常困难。１９７０年开始在尼木大搞人民公社化。西藏很多地方的人说，人民公社建起来之后生活很困难，但是在 尼木，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话，可能很多人都饿死了。人民公社其实救了我们，至少公社建起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分到一点点粮食。”

因此，很多事 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元伴随着发生在西藏

的所有革命 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１９５９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 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说，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 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再叛”之名是成立的，至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

六，大开杀戒

的确如巴尚所说，“实际上这些事件很复杂”。而且，参与者“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以“叛乱分子”来处理。但在这一点上，巴尚的结论显然有 误。他说：“后来对‘尼木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触及到一般群众的，无论公审、枪毙和判刑，处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干分子。”事实上，军队在“平息再 叛”或者说“平息反革命暴乱”时，采取的是以一儆百、大开杀戒的手段。如“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所说：

“像６９年的事情，任荣（时任西藏军 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被认为支持‘大联指’）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 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１８０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这里面有大量很生动的材 料。当时军队要来了，有的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汉族，其中县委书记居多，下台了，没有权了，但是看到解放军来，群众说要跑，县委书记就大声疾呼，你们 不能跑啊，你们要跑的话，解放军真的会把你们统统都当成‘叛匪’来杀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么可能相信你一个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 跑，结果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所谓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 决。“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她是因为“再叛”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的１８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１９７０年2月，当天拉萨 人几乎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位于南郊一带的流沙河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 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２００５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 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 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么，她当时还 活着吗？”他说：“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被枪毙的人中没有“尼木事件”的另一个首领热群，他在军队“剿匪”时与几个“叛乱 分子”逃掉了。据说军队一直在追捕他们，还勒令热群的妻子背着孩子，满山遍野地边走边喊热群的名字，解放军则在暗地里跟着，但始终没有寻见他们的踪影。

人 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印度，可是流亡政府那边也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下落。或许，热群几人早在逃亡的路上丢了性命。

此时，“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已经蔓延全中国，正如后来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结论，实际上是搞残酷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可谓是“文革”时期所有运动中最为残酷的运动。 与中国各地的情况相仿，西藏也同样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其打击面之大，不但两派中的“造总”土崩瓦解，更导致许许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场 新的运动“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开始了，其残酷程度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除了枪毙“叛乱分子”，还要枪毙“叛国分子”，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而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其中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６６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 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 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 候他可能才２０岁的样子”。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而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有三人，两人被枪毙，一 个女孩被判二十年徒刑。曾因与中共合作而在１９５８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竟然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却救不得，内心不知是何感受。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却被一位名叫格桑强久的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 名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１６岁的东觉和１４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１８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１９５０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 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１６岁，被判刑２０年，后来获释之后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

据说有这么三个被枪毙的人算得上很荒唐。 一是河坝林居委会的一位疯了的尼姑，大概６０多岁，其罪名是因为将毛泽东的画像倒贴在墙上；二是在五六十年代担任拉萨市参事委员会委员的群觉，因于 １９４０年代期间，在当某个县里的秘书时，将当时担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手下的一个违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而这本属历史事件，却也被翻腾出来，莫名成为判 处死刑的理由；三是在１９６０年拉萨穆斯林要求划归外籍而举行的“拒粮事件”中，一位甚为活跃的回族穆斯林也被当作“叛乱分子”而遭处决。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便由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未到刑场就已被铁丝或绳索活活勒死。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 育”，

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沙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 已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草草挖就的乱坑中，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１９６９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２９５人。后来这２９５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２００元和８００元，对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２００元的时候也说‘突几切’，给他们８００元的时候还是说‘突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但在采访中，有很多人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光是边坝和丁青两个县，一次就枪毙过一百多人。由此可见，军队的镇压到了何种地步。然而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 所以８７年和８９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七，存疑的结论

１９８０年７月４　日，胡耀邦考察西 藏返回北京之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其中说，１９６９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 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在暴乱严重的尼 木、比如、边坝、丁青四县，也并非全县发生暴乱。因此，把暴乱的地方，划为“暴乱县”、“暴乱区”、“暴乱乡（社）”是错误的。特别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错 误行动定为“暴乱”或“预谋暴乱”更是错误的。因此，要公开向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讲明，凡是在文件或讲话中划某些地方为“暴乱”或“预谋暴乱”的地区， 都一律予以推倒。(《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同年８月１４日，西藏区党委否定１９６９年南木林等四县暴乱问题。认为冲击了人民公社和 互助组的所谓四县暴乱，是在“文革”中派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像当时说的有一套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能把少数坏人的乘机破坏、 阶级报复定为反革命暴乱，等等（同上）。

有意思的是，明明在这些事件中，正如巴尚所说，“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 人，也没有发现有５９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

奴’”，可是，在西藏区党委的“纠正”中，却认为“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这是 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把参与“暴乱”的“翻身农奴”都一概说成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显然也太缺乏说服力了。按照中共说法，那些“反动农牧主分子”都 是欺压他们的“三座大山”，他们何以会偏信偏从呢？“金珠玛米”既然是帮助他们获得解放的救命恩人，他们何以会恩将仇报呢？而这些疑点，又是不是应该值得 我们认真去思索呢？事实上，就这一系列事件由“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在西藏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要求彻底平反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据说班禅大师生前就曾 强烈呼吁平反，而西藏官方却从此放下不表。

２００３年３月，在与当年的军宣队队员久尼交谈时，她坚决否认这是派性之间的斗争，严厉地说：

“当 时我站在‘大联指’一边，但我不是那种极端分子，看什么问题都一边倒，没有自己的是非。正因为‘尼木事件’是我亲眼看到的，我至今不认为那是武斗。自治区 也从来没有反悔过这个事，它定了性的，就是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阶级报复。它不是两派之间的过节。如果是这样，那就两派之间斗嘛，它完全是冲着解放军来 的，把整个部队全给杀了。这里面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过去‘平叛’时候没有消灭掉的东西，它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

“‘尼木事件’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件，有的人到现在还把它说成是派性，那绝对不可能，这种角度就不对，倒不是一定说你有什么目的，至少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看到那样一个真实的情 况，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有一个公平的说法。这绝对不会是派性。不然的话，那些牺牲了的军人就成了冤魂。”

可是，只因为解放军军人 被杀，就是“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就是“阶级报复”吗？１９６８年７月，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发生了杀伤军人的事件，如广西柳州、桂林、南 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也发生了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 件，那么，这些事件又如何定性呢？也属于“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也出于“阶级报复”吗？

当然，１９６９年发生的一系列 事件的确暴力，若不是出于极大的“阶级仇”和“民族恨”甚至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驱魔行为，似乎很难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故而也似乎只能以“叛乱”而不是 “武斗”为此定性。可是，只要调查两派武斗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当时双方在武斗时，其暴烈与残酷都是彼此相当的。除了使用枪炮等武器致对方于死命，其他酷 刑如挖耳、割鼻、断肢也频频发生，甚至在拉萨帕廓街头出现了被另一派用铁钉活活钉死的两个“造总”成员的尸体。

再则，如果说平民杀死解放军军人是“叛乱”，那么，解放军军人杀死平民，又是什么性质呢？那些死在“金珠玛米”枪下的藏人，又是不是一个个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冤魂呢？

事过多年，就１９６９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言，尽管以赤列曲珍、热群为首的众多“叛乱分子”并不符合中共所塑造的“翻身农奴”的形象，但是若要“翻 案”，

恐怕会因此涉及更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毕竟这些事件的导火索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文革”特色的派性斗争，说到底其实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恰恰这一点是最 为敏感的。因此，久尼的说法无疑代表了至今西藏官方堂而皇之的意见：

“虽然作为革命群众，在当时参加哪一派都是回应毛主席的号召，都是积 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作为自己来讲，最后这些事态的发展，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就要取决于你的立场和态度。当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尖锐的地步，还认为是 派性，还认为‘造总’因此被打击了，那立场就站错了，显然是还站在派性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已 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刻，如果这样的事态发展下去的话，就不得了的事情啦。再说，解放军在西藏，究竟是办好事还是办坏事？我们究竟怎么样看待解放军的行为？这 是一个是非问题，决不能说因此就导致了另一派的一蹶不振。即使是一蹶不振，那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记得，那个尼姑她当时就是打着‘造总’的旗号，可我们 并没有说你‘造总’怎么啦，我们认为她利用‘造总’，利用两派斗争来达到自己阶级报复的目的，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可他们如果认为就因为这事我就起不来了， 这种看法就不对了。你因为什么起不来嘛？真理是不怕同谬误作斗争的。如果真理在你这边，那么经过若干这么些年，又该怎么着呢？错误毕竟是错误。这是翻不了 的！我觉得就是到现在来认识这个问题还是坚定不移的。我不认为当时是利用这个事件压了它或者给了什么不实之词，不是这样的。”

可是， 事实的确是，自从以“尼木事件”、“边坝事件”为代表的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几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结束了，“造总”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回天之 力。用当年的“大联指”成员普卜的话来说，“这些事件以后，‘造总’完全臭了”。而另一派则一统天下，甚至“文革”结束之后也未被撼动，至今依旧稳坐台 上，继续沿袭着当年“甯左勿右”的作风。颇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不共戴天的两派中的主要干将，而今却“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杯盏交错之时重新结盟，各取所 需。

即使在今天的西藏，每每提及“尼木事件”、“边坝事件”，那些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人们无不沈默，或十分惊讶。有这么三位曾在西 藏工作长达４０余年、如今皆已退休返回北京的汉人，当我在２００４年１月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与他们交谈，其中一人如此说，“不写也罢，自有历史去证明”。又 有一人说，“不能写，因为当年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台上”。又有一人说，“写什么写，不过是狗咬狗，当年军队内部一个团长和参谋长因为派别不同而反 目，参谋长被说成是‘叛乱分子’遭到枪毙，后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可笑，军队里竟然也会出‘叛乱分子’!”

可是，怎么能不写呢？如果现 在还不写，已经说不清楚的事实就会被彻底湮没，而历史是不可能自动去证明的，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怎么能不写呢？再不写，那些游荡在雪域大地上 的一个个冤魂，就会永永远远是无法安宁的冤魂了。包括藏人。包括汉人。怎么能不写呢？除了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６年，拉萨、北京

注释：

〔１〕文中所提到的西藏境内的藏人或在西藏工作过的汉人，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感谢西藏学者才旦旺秋先生，为我提供并翻译“美国之音”对“尼木事件”的亲历者德朗的访谈。

〔２〕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提供宝贵的记忆、记录或采访，修正文中的差错，深表感谢。

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

程光

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九大”确定了“团结胜利路线”，１９７０年８月就发生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其激烈之程度，被毛泽东说成“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１〕突然而来的变化令人始料不及，但正如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有着它的必然。以“九一三事件”为其后果的庐山会议绝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的结果”，我们只能从事实中探求历史的真相和发生原因。

◇　“九大”后中央工作的新格局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如何工作？５月初，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决定不设书记处，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处理中央日常事务。”〔２〕　这个改变了１９６７年反击“二月逆流”以后中央碰头会处理中央工作的决定，无疑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变化，却由于某些人为因素被“遗忘”了。然而，它正是理清那段历史、解开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

人们研究“九大”之后中国政局时多注意了林彪——这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忽视了周恩来。其实“九大”后周恩来的地位和权力变化要比林彪大得多，他从碰头会时期处处受掣肘、左右为难的“名义主持人”变成了中央日常工作的真正领导者。用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说，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总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大管家”。

我们只要看看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的处境，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变化。

吴法宪１９６７年夏参加了碰头会，他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３〕

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看到的周恩来，那时在碰头会上只能对中央文革一伙人谦卑地恭维说“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４〕

邱会作１９６７年参加军委办事组，多次列席碰头会，“九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把周恩来此前与以后的状况作了比较：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议，才真正由周恩来主持了。周因故不能到会，陈伯达、康生也主持过政治局会，但从来没有让江青主持过会议。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江青不到照

样开会。过去碰头会开始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答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周恩来仍习惯地问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吧！’不管江青回不回答，照样开会。周恩来这句话仅仅是形式上的礼仪了。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最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１９６７年反对‘二月逆流’后，江青不愿意在那儿开，于是周恩来迁就她，碰头会改在了钓鱼台开，会址固定在中央文革办公处十六号楼。那样对江青方便，对周恩来不方便，但周恩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九大’后江青几次提出，政治局会‘仍在十六楼举行，不能改变’。几经周折，政治局开会很快就离开了钓鱼台，并固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了。这对周恩来方便，对江青没有以前那么方便。江青提了几次回钓鱼台开，周恩来不理她。周恩来不再去迎合江青的口味。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逞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周恩来变成了真正的主持人，周恩来很尊重大家的意见，特别是提出问题的人的意见，只要多数人同意的事情，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来就拍板决定，从来不让江青专权。”〔５〕

“九大”后周恩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领导者，在毛泽东确定的路线内，周恩来又是执行中的决策人，成为了集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半个”国家主席权力于一身之人（董必武代国家主席，不问事，对国外交往用其名义)。有学者说，文化大革命“谋事在毛，成事在周。”〔６〕周恩来“成事”不能泛指文革十年，应当是他“九大”后真实情况的写照。

为什么周恩来有如此重大变化？除了毛泽东的信任之外，他有了组织基础，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又称政治局工作会议，简称政治局)。

同样作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此时的政治局工作会议和彼时的中央碰头会有什么不同呢？

一是名义地位不同。“九大”前的“中共中央”实际上是“碰头会”。这个没有组织委托、凭藉反击“二月逆流”后由毛泽东认可的机构很难说它“合法”，由它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悖中共组织原则，既没有法定的授权决议，也没有在八届十二中会会和“九大”上正式追认，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九大”后的政治局工作班子，是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组成的，符合“九大”党章第九条“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的规定。其成员均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它的合法性、权威性毋容置疑。

二是组织基础不同。中央文革是中央碰头会的主体，其成员占碰头会１２名成员中的８名（陈、康、江、张、姚、王、关、戚)，其他人是零散的。碰头会成员后来有所变化，王、关、戚等人垮台，黄、吴、叶、温进入，但是碰头会以中央文革为其组织基础没有改变。军委办事组是“九大”后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主体，其成员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１３名成员中的７名（黄、吴、叶、李、邱、李德生、谢富治）〔７〕，

其他人是零散的。后来成员略有变化，但是政治局工作会议以军委办事组为其组织基础没有改变。

“九大”后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绝非杨成武时期的军委“看守小组”或“办公机构”了。１９６８年3月黄永胜代替杨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之际，毛泽东宣布：“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８〕中共九届一中会会上通过了中央军委、军委办事组的组成〔９〕，既是新的任命，也是此前的追认。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包括了在“二月逆流”中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而遭受批判的几位元帅，四十九名中央军委委员中只有张春桥等极个别“文革派”骨干。中央文革的力量被排斥在军委领导机构之外，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力加强了。

对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态度非常明确，多次要求军委办事组参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志全力支援周恩来，说“你们要把总理（周恩来）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对军队的指示，一定要照办。”〔１０〕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信任、林彪为首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政治局工作班子大多数成员的协助下，开始了他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全面处理中国党、政、军日常事务的“执政”生涯。

◇　中央里“江青问题”突现

１９６６年以来江青“一鸣惊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不仅参与中国高层政治决策，很快又把持了中央碰头会，权力曾不可一世。“九大”后中央改变了日常工作方式，江青就成了“重要闲人”。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她在中央里经常惹事生非，“江青问题”突出了。

为什么江青不能以中央领导中普通一员的身份工作？因为她心中有气。

中央碰头会被取消了，江青没有了“称王称霸”、耍逞威风的“衙门”。

中央文革名存实亡了，江青“呕心沥血”搞文革的历史功绩被人忽视。

中央领导机构重建了，江青争取政治局常委的努力失败，反到为他人做“嫁衣裳”。军队领导干部各据要职，党内元老也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而造反派头面人物却很少有人占居高位，真是“白忙活”了一场。

江青和她中央文革的几位“战友”表示了对中央新的工作方式的不满。

其一，江青等人迟到、乱闹，让周恩来无法领导政治局正常办公。

据笔者向当时参加中央办公的人了解，政治局基本上每日开会办公，一般晚上九点开始，翌日凌晨三时结束。起初江青次次迟到，张春桥、姚文元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一起迟到两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更长的时间也有。过去碰头会江青不到不开会，现在周恩来是准时开会不等待。江青来了，周恩来顶多客气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已经开始了。”江青有时凶狠地冲撞一句“我是多余的”，然后就与周恩来纠缠、叫政治

局无法开会。有时她叫人弄饭来吃，工作人员为侍候她进进出出，江青一个人坐在会场中享受着美餐，叫大家不能办事。江青折腾了几次后，看周恩来忍让不理睬，有时索性就不来了，张春桥姚文元也效仿，使一些需要他们参与讨论和表决的事办不成。

过去江青称身体不好而滞压中央办公的档是常事，无人敢问，但有人敢对她说“不”，黄永胜很早就有过抵制，此时更是如此。有一次，江青推说身体不好，一个月没看档，黄永胜则在一份档上画了一个圈，写了“拟同意”。江青却骂道：“黄永胜有什么资格阅批我批的档，这是夺我的权，是政治野心!”〔１１〕江青骂也骂了，闹也闹了，却无可奈何。

其二，江青等人用各种繁琐杂事干扰政治局处理主要业务工作。

政治局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急需处理的大事。江青等人总是插进别的议题空谈，只要江青感兴趣的事，说上半天也不嫌烦。比如“样板戏”里的角色、台词、唱腔、服装、化妆、道具等琐事，也要在政治局会上探讨细微，至少说了几十次，每次都要有几小时，谈一个晚上的时候也有多次。周恩来有涵养从不去打断他们，就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很默契地“各自为战”，在会场上大家分别阅读处理自己分管的档和事情。大家虽然是在一起集体坐着，却是个人分别办公，以此对江青等人进行抗议。

久而久之，一些人对江青开始抵制。比如，江青搞样板戏常常在天桥剧场现场办公，为了方便，要在那儿安装一部军用直通电话。黄永胜不同意：“不是军营，怎么能装军用电话？”〔１２〕坚决不给江青办。江青曾在１９６６年底为她的“革命样板剧团”争取到了可以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并公开向外宣布，但事后却不了了之。江青的“革命文艺战士”只好和红卫兵小将一样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显得不伦不类。此时，江青又提出让“革命样板戏剧团”正式加入军队建制，却遭到军委办事组的坚决抵制。江青退了一步，至少让他们穿上文革中引为荣耀的配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解放军正式军装。邱会作反对江青的要求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１３〕硬是让江青碰了一鼻子灰。江青不时插手军队工作，黄永胜屡予抵制，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发生冲撞。〔１４〕

笔者所知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之事不胜枚举，为尊重当事人对史实述的优先，这里只从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简要摘录一二。

其三，江青等人仍想以中央文革名义发文件，维持他们固有的“领地”。

江青把持的中央碰头会停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名义上还在。江青想借中央文革这张牌“唱戏”，以中央文革名义办事。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陈伯达向毛泽东的一个请示让中央文革“寿终正寝”。陈伯达回忆道：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档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档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档，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

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的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１５〕

从那以后再没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中央文件。几经周折，“九大”后中央政治局呈报毛泽东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中排在党中央机关第一位的中央文革，并未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１６〕

陈伯达一直担任中央文革组长，为什么倒是他主动“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动？为什么江青等人对陈伯达有着近乎“刻骨”的恨？这些费解的事一经点破内幕，顿时令人恍然大悟。陈伯达即便作为“徒有虚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不能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挤打击，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的念头，都被林彪劝止。“九大”前很早的时候，林彪对想辞去中央文革组长一职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１７〕

“九大”之后，参与中央日常工作的任何人都回避不了受“江青问题”的影响，要么你反对她，要么你与她合流。

迄今为止中国史学界缺乏对江青的深入研究，多把她概念化成一个政治小丑。笔者认为，对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人为地美化，也不能刻意地丑化，只能科学地研究。对毛泽东、邓小平如此，对林彪、江青亦如此，对蒋介石、国民党也要如此。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只能把他们当成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哪怕是失败者）。他们是社会发展和矛盾冲突的关键人物，离开了他们的真实的活动和思想，就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审视过去，就像一部历史“剧”中的对手戏“主角”没了表演和台词一样，那不是历史，只是胜利者自己的声音。

“江青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一般的人认为江青是作风不好，有野心。而林彪认为她只不过是个“老婆”而已。林彪对江青的态度，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多有记载，无需赘述。且不说林彪对江青的蔑视出于什么心理，但他是对江青等文革派的一种政治制约。谁要是继续重用文革派，就得打破这种制约。

“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１８〕。

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将，是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是冲锋在前不回头效死力的“过河卒”。不仅江青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亦然。许多事看似张姚表演，实为江青所为，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有文革史的研究学者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夫妻店”里他和“文革女老板”的关系〔１９〕，此言有所夸张，却也形象生动。

周恩来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善于窥视毛的内心世界。“江青问题”的实质就

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很多人对此疑惑不清（至今亦然）。周恩来那时便有如此清醒头脑和见地，实属不易，何况他还认真落实于实践。对此，邱会作回忆到：

“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的过程中，终于形成了一个‘模式’，其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个人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会一班人的‘班长’。虽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但是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了，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那个时候，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他在参加毛主席接见外宾等活动时，有些事还当面请示，有时还约毛主席面谈。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会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２０〕

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极力“保持晚节”，遵循“顺守”之道，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使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取代碰头会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方式运转了起来。

◇　文化大革命的乱局得到扭转

“九大”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原来的碰头会相比，议行政事务多了，议国家的实际工作多了，议经济建设问题多了，对于那些仅仅是江青等人感兴趣的事，议得少了。如果你用心地翻阅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周之间那时的来往请示和批复，再细读《周恩来年谱》中他的工作记录，对此肯定会有深刻体会。

尽快把国家稳定下来，抓好经济建设，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大多数领导成员的想法，陈伯达为“九大”准备的题目为《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不仅和林彪商议了，也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２１〕。毛泽东没有采用它，另择张春桥等起草的报告，更多是从政治上考虑。讨论政治报告稿时，陈伯达坚持“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张春桥反驳说那是“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２２〕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常把经济建设当成中央的重要议题之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６９年9月中央政治局为庆祝国庆二十周年提出口号时，周恩来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五十年代大搞经济建设时的“总路线”列入其中。〔２３〕几天之后，周恩来在军委战备工作会议谈到“九大”后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时说：“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能再搞夺权。我们还应努力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２４〕周恩来强调的是那个没有被采用的政治报告里的思想，并大胆地进行了贯彻。

“九大”后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立即得到充实，其成员都是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如李先念、谢富治、李富春、余秋里、粟裕等〔２５〕，没有一个文革派“空谈客”。国家机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各项业务都在恢复。曾一度受到严重冲击而乱了的中央领导机构得到精简和重建。作为国家政治稳定重要象征的外交，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国支援下，开展“抗美战争”的越南等国于１９７０年４月在广州召开“三国四方会议”，中国的力量深入了东南亚。“九大”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来访修复了中断多时的两国之间的传统盟国关系。法国总统戴高乐正酝酿的访华将是中国打开西方大国围堵的一个缺口。中国和与之紧张军事对恃的苏联坐在了谈判桌上，边境武装冲突已经停止。中国和另一个为敌二十年的对手美国正通过秘密渠进行了联系，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实质性接触已经开始。

从１９６９年开始，中国扭转了１９６６年文革发动后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工农业生产全面开始回复和上升，钢铁、石油、煤炭、铁路建设、军工生产、科学技术多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１９６９年工业总产值创建国后的新高，农业获得了历史最好收成。9月２３日中国第一次地下核子试验成功，有了具有实战意义的核武器，１９７０年4月２４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几个月后第一艘核潜艇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上历史性的突破，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之后的又一个同时掌握核威慑力和能探索外太空的大国。那时中国可以说是工业发展、农业丰收、火箭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二十年后邓小平坦诚地回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２６〕

我们把中国文革十年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做一个图表，资料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２７〕。

从图中的曲线我们发现，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５年是十年文革里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阶段。１９６９增长为２３。８％，１９７０年达２５。７％，虽然这种增幅含有对前两年国民经济的负增长进行补偿和恢复的性质，但毕竟在快速增长。１９７２年中国经济又开始向下滑，跌到了４。５％，至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政时再次上升，达到了１４％，“批邓”以后又下跌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７％。文革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次高点与中间的低谷形成了一个“马鞍形”（Ｍ形）。如果怀疑那时统计“虚假”不足采信的话，可以再看一下《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的同时期的能源消耗变化，它的年增加情况和国民经济走势相同，１９７０和１９７５年也是“马鞍形”的“前鞍”和“后鞍”。

在这张经济增长速度图的背后我们能悟出什么吗？当然有！

凡是江青等文革派权力小、受制约时，中国经济就发展；凡是江青等人得势、干扰多时，中国经济就进入低谷。进而研究，凡是毛泽东器重文革派时，江青权势就大，文革就搞得欢；凡是毛泽东冷落他们时，江青的权势就小，国家就较为安定。这个人们不易看见的“政治图”也是“马鞍形”，只不过是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倒马鞍形”罢了（Ｗ形）。如此分析，就不难理解渴求经济发展、盼望过上美好生活的中国

人民在打倒“四人帮”时欢天喜地、举国欢腾的心情了。

中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使得一些重要问题急需解决。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后“革命委员会”成为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其形式多少有些“违宪”；大批造反派靠“四大”走上政治舞台，连个合法的“名分”都没有。毛泽东想到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对宪法的修改，国家机构的重建，新领导人的任命，以此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于是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摆在中央的议事日程之上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回升，多数人把它归结为社会安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果。１９６７年毛泽东曾说文革“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２８〕１９７０年来临之际，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实际是混乱结束）。或许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庐山会议斗争和“九一三事件”等，文化大革命也许会以进行三年之久而画上了它的句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看，至少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那么看，他就是掌握中国政治走向的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这个细微不易为人所察觉之处，邱会作有一个很好的回顾。他于１９７０年夏天陪同来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到上海去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之后毛泽东留住邱谈了一会儿，说“你（邱）到上海来了解一些社会情况吧！这样你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会多一些、深一些。上海文化大革命是好的，社会秩序比较好，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工总司’起到很大的作用。对造反派不加分析的看法是不对的。”“毛主席知道我们厌恶造反派，总是把造反和动乱视为一体，他就硬是要搞个‘革命造反促生产’的典型给我们看，以此教育我们提高认识，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２９〕

为何此时此刻毛泽东向林彪等人发出这样的“信号”？

重读张春桥主笔、受到毛泽东好评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一段话或许会有启发，那是对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观点的反驳，“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３０〕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忧虑和告诫居然成了对“九大”后中国形势的一次“成功预言”。

那时，中国曾有过一个经济发展的“春天”。然而，减少江青等人干扰而来的安定团结是脆弱的，用“革命”促成的经济发展不能持久，因为经济只能按着它自己的客观规律运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好形势”会带来什么，是光明美好的前程吗？历史昭示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凡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好了，其后必有一场政治风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经济上的进步带来的是“反右斗争”、“大跃进”及随后的“三年灾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好不容易从复苏达到繁荣，紧跟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七十年代初经济上的“春天”会带来什么呢？一场什么样的政治角逐正在酝酿之中呢？让我们从经济再回到政治中去看一看。

◇　“文革派”的政治势力逐渐缩小

“九大”后中央里一度体现了“团结”。其内因是“团结胜利路线”为民心所向，党心所求；其外因是大敌当前，苏军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军事压力巨大。中央内部两派摩擦不断，倒也相安无事，达到某种暂时的政治平衡。

随着全国局势的稳定、经济全面好转和国际环境的宽松，中央里两派之间矛盾斗争再次突显。也许一时还谈不上是“路线斗争”，却可以用一句文革流行语来描述，那就是“派性”。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发展史上派别斗争不断，常寓于“路线斗争”、“山头主义”之中，尤以毛泽东和“国际派”王明、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斗争最为激烈。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派别依然，至少有三个特殊理由：其一，中国没有政党轮替，不同政见多以派别形式在唯一的执政党里体现；其二，中国革命是从独立分散、各有其领袖的根据地逐渐走向统一，历史的惯性不可低估；其三，那时的中共高级干部多出身于落后地区的农民，封建农耕文化里的地域、族群和宗派思想深植于他们头脑之中。

在中国高层权力的复杂关系中，谁是帮，谁是派？谁是错，谁是对？在缺少法理观念的中国人心目中，常用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思想进行判定，那就是“名份”。“名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远非外人可以想像，通常是判别是非的首要标准。

如对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中央工作的人以“名份”而论，文革兴起之初，身居要职的元勋们参加碰头会是“名正言顺”，而初涉政坛的中央文革小伙计们是帮派。１９６７年反击“二月逆流”后，碰头会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当家“名正言顺”，其他人若不服从便是帮派。“九大”后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执政是“名正言顺”，如有人背后再搞活动应当是帮派。然而，中国那时还有个最大的“名份”，毛泽东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最终裁定者，他支持的才是“名正言顺”的革命派，而另一派迟早要垮台“败为寇”。

邓小平打破了这个法则，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把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拉下马，胡耀邦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无私无畏，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两个凡是”束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让任何思想禁锢在科学和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使我们今天能够把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当成历史科学研究的对像予以公开评论，各抒已见，百家争鸣。

为了阐述观点，请先看一下“九大”前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览表。〔３１〕，笔者在其中略加了附注：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览表（以成立时间为序，注军衔者为现役军人）〔军衔在文革前即已经取消，所注应为当初授衔时的军衔——编者〕

１，黑龙江潘复生　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２，山东王效禹　原青岛市副市长

３，上海张春桥　原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４，贵州李再含　贵州省军区副政委　大校
５，山西刘格平　原山西省副省长
６，北京谢富治　公安部部长　上将
７，青海刘贤权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少将
８，内蒙古滕海清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中将
９，天津解学恭　原天津市委书记
１０，江西程世清　福州军区副政委　少将
１１，甘肃冼恒汉　兰州军区政委　中将
１２，河南刘建勋　原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
１３，河北李雪峰　原华北局第一书记
１４，湖北曾思玉　武汉军区司令员　中将
１５，广东黄永胜　广州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１６，吉林王淮湘　陆军十六军政委　少将
１７，江苏许世友　南京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１８，浙江南萍　　浙江省军区政委　少将
１９，湖南黎原　陆军四十七军军长　少将
２０，宁夏康健民　宁夏省军区司令　少将
２１，安徽李德生　陆军十二军军长　少将
２２，陕西李瑞山　原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２３，辽宁陈锡联　渖阳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２４，四川张国华　成都军区政委　中将
２５，云南谭甫仁　昆明军区政委　中将
２６，福建韩先楚　福州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２７，广西韦国清　广州军区政委　上将
２８，西藏曾雍雅　西藏军区司令员　少将
２９，新疆龙书金　新疆军区司令员　少将
３０，台湾——

“一元化”领导的各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现役军人占了七成多，而各省的县级革委会由军人担任主任的多在８０％以上，最多的云南和湖北省居然占到了９７％。〔３２〕有人诟病那是军人参政，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表现。的确如此！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走“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之路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也是文革发起“天下大乱”后想稳定局面的无奈之举，更是毛泽东利用了承担捍卫独立主权职能的国家武装力量干预内政、保障文革的“创举”。若要评论军委办事组在文革中发挥的作用，借１９８１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的评价到也合适，“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三支两军”于１９７２年后迅速收缩、收尾，用以上论述评价此前的工作正当其实。

研究这份中国的“政治版图”会发现，“九大”之后不久有几个省的“第一把手”换了人：山东的王效禹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所取代，山西的刘格平为山西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所取代，贵州的李再含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所取代，黑龙江的潘复生为渖阳军区副司令员汪家道所取代。这些重大的人事调整，除黑龙江省稍晚些外，大多在九大结束后不到一年之内就完成了。

后来有人评论，“九大”后林彪急于向文革派“夺权”，因为这四个省份是１９６７年１月与上海造反派同时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而在全国成立的最早的五个“革命委员会”。何况自文革开始以来，王效禹、刘格平、李再含、潘复生都是较早领会和积极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在反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有过不凡的表现并率先在当地支持造反派夺权的领导干部。他们因而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几颗耀眼的“政治明星”。

王效禹等人下台主要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因为那四个省到彼时仍然混乱不止，工农业发展停滞，各派力量矛盾重重，地方和军队的关系紧张。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采取种种措施，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提名所在地的军队领导干部取代他们，请示毛泽东得到批准。

在那些敏感地区的敏感人事变动中，清一色地由军队干部主持一方政务，使那份全国“政治版图”更为偏激，难道不会“物极必反”？与其说林彪于此失策，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在对军队充分“利用”。利用过后如何限制和削弱，毛泽东心中自有谋略，从九届二中全会后要求军队“反骄破满”开始造舆论，或借有人去世更换（如谭甫仁、谢富治等），或因故进行撤职（如龙书金、程世清、兰亦农等），最后再突然来了那个有名的“八大军区司令调动”，那些军队的领导再也不担任地方的“第一把手”职务，从而改变了原来的那个“政治版图”。

然而在当初，要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林彪必然要有自己的组织准备。尽管林彪以悲剧告终，但并非不能对他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林彪至少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轻视了“江青问题”，以为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事情就会当真，犹如他的前任刘少奇一样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二是他不是用“团结”的方法，“韬晦”的谋略，而是极力压制文革派，想尽快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逐出政坛，太露锋芒。历史证明，像叶剑英、邓小平那样韬光养晦，把事情放到毛泽东身后去办才是大谋略的政治家。

为什么林彪那时会有如此表现，原因固然很多，笔者在这里提出三个过去少为人们注意、然而却十分关键的因素。

其一是周恩来的合作。

“九大”后周恩来和林彪良好关系加强了，这一点为很多史学家不愿说，或不敢说。林周关系远比现在人们所见深得多，不仅可以追溯历史的久远，文革中表现亦十分丰富。周恩来在“九大”全体大会上公开对林彪颂扬，把那个中国家喻户晓的“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故事演绎成林彪是领导部队走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可谓是歌颂林彪的一曲“绝唱”。

周恩来是如此地说，又是如何地作呢？对于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实际就是和林彪的关系），邱会作回忆道：

“周恩来与我们军队几个领导同志的关系非常融洽，对军队的工作非常支持。军委办事组向中央的报告一般有三种：１、例行报告；２、军事报告；３、特殊问题的

报告。前两种报告直接送汪东兴呈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第三种报告直送周恩来，周是能批的则批（周对此很肯担责任，与他办其他事大不一样），不能批的周恩来就请示毛主席批（送批本身已有了倾向态度），批回来再在政治局传阅，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传阅，因此军队内的许多事情文革派那一边不知道。周恩来给了军队最大限度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中，军委办事组能够开展很多方面的工作，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３３〕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受到林彪的支持，反过来，也给以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开展各项工作、抵制江青等人予以支持或配合。

其二是陈伯达向林彪的靠拢。

陈伯达在文革中的表现颇具戏剧性，身为中央文革组长却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林彪死党"，长期掌管中共思想理论战线的权威突然变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这是为何？

陈伯达１９３７年到延安开始与毛泽东合作，长达三十三年之久。文革开始之际，陈伯达紧跟毛泽东出了力，但是仍然被毛泽东感到有些"不配合"。我们略举几例说明。

文革酝酿之际，毛泽东对刘少奇已极为不满，陈伯达却想让他们和好，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３４〕文革伊始，陈伯达并不想当中央文革组长，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他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干，中央就没法安排你的工作了"。〔３５〕　陈被迫上了任。经历过文革的人会记得，陈伯达常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刘盆子"。人们对此很不理解，但是知道了中央文革和碰头会的"霸王"是江青，就能体谅陈伯达难于直言的苦衷了。然而人们又何曾想到，让"陈老夫子"担此要职，正是尽快给羽翼尚未丰满的江青等文革派以极大的权力和发展空间的好办法。伟人谋略之深，至今令人惊叹！

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陈伯达表示了反对，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要夺权。〔３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陈才改了口。1月２５日，为了防止军队混乱，林彪亲自口述制定的《军委命令》在中央文革那里过关，江青明显流露出不满。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回忆道，"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了，你快点走吧！'"〔３７〕防止了江青等人的阻拦。3月份，中央军委召开了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中央文革要集体到会一次，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对"刘少奇问题"的交底。陈伯达居然称有其他事不想参加，惹得毛泽东发出一声怒骂："不愿意干的人，给我统统滚！"〔８〕

至于后来陈伯达听从林彪的建议，不让江青取得中央文革组长位置；准备"九大"政治报告，强调要搞好经济建设；压制江青，不许再用中央文革名义发档等等，本文上面已经论述。下面还要谈到陈伯达几次与江青等人作对，直到庐山会议上发动"倒张"。如此种种，陈伯达已经成为林彪制约文革派的重要力量。

陈伯达为文化大革命出力时，颇受毛泽东器重；当他对文革消极时，则受到毛泽

东冷遇；而陈伯达不愿再和江青等人为伍时，则被毛泽东抛弃。他们三十三年合作中的如此最后三年，被毛泽东夸大说成是“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３９〕毛泽东这样待人，难怪周恩来文革之初就对老干部们提了醒，“晚节不忠，一笔勾销！”〔４０〕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江青等人中间传着毛泽东对陈伯达一句很重的话，“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头老鼠就跑走了！”〔４１〕毛泽东的“船”即“文化大革命”之船，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去世，人去船沉，文革结束。如果陈伯达还在那条“船”上的话，也逃脱不了政治“殉葬品”的命运。

其三是汪东兴成为林彪的亲信。

汪东兴投向林彪成为其心腹，是透析汪东兴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中表现的关键，为此颇需笔墨，这里举邱会作回忆的一件事便可让人信服。

“汪东兴１９６９年底１９７０年初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东北地区检查战备工作，汪东兴来往经过北京时，均邀请黄、吴、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长谈，每次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谈的核心话题就是反江青，反上海帮。汪东兴向我们交了毛主席那里的‘底’，主要是：１、主席对林彪是绝对信任的；２、主席对高级干部厌恶中央文革一伙人很清楚，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３、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当成政治上的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汪讲了毛、江的不少非常秘密的隐私）。可以说，汪东兴那两次和我们的聚会，是为庐山会议上我们打击上海帮进行思想准备的一次重要活动。”〔４２〕

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汪东兴等人的关系，加上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政治和组织力量，毛泽东绝不会忽视。他１９７０年8月在庐山上说的那个“军事俱乐部”，应当早就在他的政治视野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军事俱乐部”是被逼出来的，仅一例即可说明。１９６８年秋中央决定黄永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不许他去，毛泽东表态批准了，但周恩来还要带着黄永胜去向江青“赔罪”。周恩来再三叮嘱黄、吴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讲什么，你们都不能当面顶撞，要讲团结。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指着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说：你们带着红五星，两面红旗（指帽徽、领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红五星是老娘我给你们争来的！〔４３〕在毛泽东早年井冈山起家时就追随他的老将军尚且经常受江青如此欺辱，众多的军队老干部怎么能不聚在一起来抵抗她呢？

以前江青把持中央碰头会，周恩来不得不屈从忍辱，其他人更是怕她。“九大”之后情况截然不同。那时中央里老干部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已被中央文革打散了，只有军队没有乱，军队主要领导干部是唯一可以与江青等人抗衡的整体力量。林彪等人的抵制，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即使没有结伙，也会被毛泽东看成是和以前的彭德怀一样，是个以军人为主的“俱乐部”式的政治集团。

于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形成、在碰头会时期结帮的康生、江青等人在“九大”后并

没有“散伙”。有人说他们是在庐山会议上才形成四人帮〔４４〕，笔者认为要早得多，成员先后有异，帮派早已存在。只不过“九大”后江青等人的派别活动在林彪等人的压力下更加紧密罢了，因为他们不那样，就无法抗衡那个“军事俱乐部”。

中央里两个派别的争斗一开始就带有着政治色彩或是“路线”问题。在毛泽东领导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中它一度被掩饰，此时已经开始激化并逐渐清晰，让人一目了然。

江青等人不搞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政治前途，就不会被毛泽东器重，就不可能在中国高层保住其地位，而且一旦丢掉权势，还要承担“祸国”“乱党”的罪名。他们还要发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坚决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更多是他们表示拥戴毛泽东而经常要喊、不得不跟的政治口号。林彪对无休止的运动已经厌倦，而在考虑国家如何尽快转入正常的建设。那时林彪正为他在四届人大讲话做准备，先搞调查研究，题目是怎样抓革命促生产，〔４５〕并想促成和推动“九大”后中央的工作走入这个方向。然而，中国历史上因为没有政治力量而无所作为甚至死于非命的“接班人”比比皆是。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今后的接班人时“曾提到张春桥”〔４６〕林彪不愿意文革派强大而取代他，就不能让他们没完没了地搞文革而受宠。我们不应当过多地指责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江青等人在那场接班人角逐中的对与错，因为文革混乱中的中国没有法制化的、程式化的、民主公开的国家最高权力传递制度，才是事情的真正根源。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彼时，中央里的军队派和文革派已经失去了团结的基础。双方矛盾继续加深成为必然。那时江青等人多少有些害怕林彪，尤以张春桥、姚文元为甚，无论是听老人们说起，还是从那时的新闻电影和照片看，他们和林彪在一起的场合，很是拘束，甚至有些惧怕，有时连靠近林彪都不敢，离得远远的。

毛泽东宠爱的文革干将们这么害怕林彪，无疑是林彪的灾难。因为这是挑战毛泽东绝对权威的一个侧影。身居政治局委员高位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尚且如此，那么党内众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人心目中就有了另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主宰。这实为封建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历朝历代统治游戏规则的大忌！

然而，“九大”后已经被过分削弱的江青等人从中得到了一个“实惠”，他们成文化大革命众多象征人物中仅存的硕果，成了取得打倒刘少奇“伟大胜利”的光荣代表，成为毛泽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最可信赖的中坚力量。于是，对江青等人的态度最终演绎成了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演绎成了对待毛泽东的态度。

那时江青等人曾一度被制约，有人误以为文革派会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邓小平复出１９７５年执政时情况亦然）。持这样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毛泽东，忽视了治国者的权谋艺术——政治平衡。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党的干部队伍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他们在革命战争、经济建设、国务活动中有过非同凡响的出色表现。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大舞台”上，在中国革命“长剧”文革这“一幕”中，

“谋事在毛”！让哪些“角色”上台表演，哪些“角色”下台靠边，哪些“角色”谢幕离场，哪些“角色”坐冷板凳听候再次亮相……只有毛泽东才有权决定。而毛泽东运用这种权力时，常为人们不易察觉，难以琢磨。若是有人敢于搅了毛泽东的局，想以自己的好恶来干扰“角色”的进退，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迎头痛击。当那些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在扑朔迷离的“剧情”中发现毛泽东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文革派，反对任何可能的复辟和翻案时，已经为时晚矣，只能当个失败者的“角色”听从毛泽东的摆布了！

◇　江青向中央工作新格局挑战惹起争端

１９７０年来到了，在人们没有预料它是多事之秋时，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江青等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扶植起来的重要政治派别，难道就这样淡出政治舞台？他们再和陈伯达纠缠，和军委办事组去争斗难以改变局面，于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亲自上阵，矛头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江青在文革中多次整过周恩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多被重笔提及，为的是把周恩来和江青划分开来，把周恩来与文革的责任划分开来。可是“九大”后江青对周恩来的几次攻击，常常被人忽略。我们看到《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有这样的记载：“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４７〕

笔者从几位当事人那里得知，江青那天对周恩来的诽谤是前所未有的恶毒，从周恩来历史上的“罪行”说到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不仅乱说事，还诽谤周的人格和个人品质，实在令人发指。但《周恩来年谱》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为何如此？是江青诽谤周恩来不够厉害吗，是她整周恩来不够狠毒吗？

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对此深做研究，有助于了解那一段历史真相，好在有人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史料。邱会作回忆，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攻击周恩来，黄永胜当场于以反驳，带头中途退场抗议，并立即到林彪那儿作了汇报。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

“林彪说：‘最近以来，江青攻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汪东兴立即安排了黄永胜、吴法宪当日晚七点到毛泽东处，而我（邱）则到了周恩来那里。江青前几次谈话都涉及到周恩来。每次讲过之后，我都利用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机会，及时地向周恩来‘透风’。他听了以后总是表情凝重，压抑不语。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我很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你及时的通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都是老同志，历史上的事，你们虽然不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但是事情的内容，中央的结论，你们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

“晚上黄永胜说，他们大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江青的胡说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对江青没有太大的愤怒，仅仅有些‘小责备’，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毛主席说：‘对总理的问题，她（江青）是随便说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你们（黄、吴）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向她讲的，你们也不要说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们来我这里，讲过她的问题，那今后你们的日子就不好混了！’”〔４８〕

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迄今为止仍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禁区”之一。林彪在周恩来受到攻击的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怕得罪毛泽东和江青，可见林周关系之密切远非人们现在的想像。

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黄永胜到他那儿去告江青的状，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状。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几句后，又告诫黄永胜（也是对林彪），不要把与江青的矛盾扩大，也不要把事情公开，否则“黄永胜”们就会“混”不下去。

周恩来是闻名世界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政府总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为何敢向周恩来叫板？对此，邱会作记得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说了几句他印象很深的话。“‘我（江青）同主席的关系，你们能见到的当然就是夫妻关系了，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同样，主席同总理的关系，你们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邱）想过，江青如此胆大妄为，攻击周恩来，整周恩来，一点没有‘背景’是不可能的。”〔４９〕

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的攻击没有奏效，就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冲突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造反派冲击军队院校时就明显了，其发生和发展不在本文论述之中。但是要提请人们注意是，每到文革关键时刻，林彪和江青的冲突就会爆发一次。比如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夺权正是江青得势之时，２月初，林彪与来访的江青发生激烈冲突，林气得脸色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大叫“叶群！叶群！”并对闻声赶来的秘书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５０〕又如，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而林彪在讲话中却提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资产阶级的义大利的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江青认为这样讲有问题，在林彪的讲话稿上做了一些批示后送给林彪，说林彪如果同意，请把她对林彪讲话的批语转给毛主席。林彪一看就气炸了，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当着秘书的面说：“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５１〕为何江青挑衅林彪，而林彪又发如此大火，常人难于理解。原来林彪说“有人（江青）把文化问题当作自己的专利，别人不许解释。且不论我讲得对不对，我敢讲，就是对那个‘霸王’的否定！”〔５２〕

林彪是“九大”党章中写入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江青亲自出马对林彪攻击多有不便之处，于是上阵了另一个文革派人物——张春桥，他出手的头一拳就对准了林彪的“要害”，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权”。

１９７０年7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稿，张春桥修

改了执行多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准提法，插进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成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要按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办，张春桥则主张按着他的新提法写，互不相让。周恩来表示要请示。结果毛泽东让汪东兴代其圈掉了“毛主席和”四个字，〔５３〕暂时“平息”了双方的争论。

张春桥此次出手未成，另外打出重拳。８月份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稿时，对二处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一是“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二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都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战胜了刘少奇，不必再为自己“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了，大家修改讨论或是删去这些用词，本属正常。可是张春桥却用挑衅的口吻影射林彪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５４〕吴法宪说“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是这样，就是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５５〕

吴法宪和张春桥爆发了争吵，吴拍桌子大骂了张。在场的陈伯达回忆说，他们吵得“声震屋瓦”〔５６〕会后，吴到陈处详谈了争吵的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向周恩来也报告了此事。〔５７〕

四天之后的８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离开北京前往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前的最后一次会，对宪法修改问题可能的争吵并没有发生，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已经写进了宪法草案中。据宪法起草小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回忆，请示康生后加的，加在序言里。〔５８〕

毛泽东自己删去了“天才”的副词，为什么林彪还要提？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字推敲”了，林彪要对江青等人的一列活动进行批评，只不过这是他说话的“由头”。为什么林彪不能与毛当面一谈？１９７０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杭州住，林彪在北戴河，他们没有机会相见，只能靠秘书在电话上传话。他们久别后的面谈，是８月２１日林彪上了庐山后拜会毛泽东时。林彪说了他的想法，就是后来那篇含有不点名批评张春桥内容的开幕式讲话，事先告诉了毛泽东。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们，是前不久“八一”社论和十天前吴法宪和张春桥争吵的继续，是林彪直接对江青等人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对文革派在“九大”后抵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干扰和破坏团结的批评。事情是文革派挑起来的，对江青不便明着说，只好指向张春桥。庐山之争已成必然，只是以什么题目、用什么方式爆发出来而已！

然而，林彪有了失误，他没料到中央委员会里厌恶文革派的人居然那么多，一点火星就燃起“烈火”，群情激起要揪张春桥。形势使林彪多少有些盲目，忘掉了整那个“文革红人”会导致对张某近几年来所作所为的追问，难免要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敏感之处，从而会引起毛泽东的过激反应。

同样，毛泽东也有失误，他没有想到林彪想批评的“那些事”会引起大家如此共

鸣，同意了去讲，忽视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对付江青等人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形势使毛泽东警惕，敏锐地发现了庐山上大家群情激起“揪张”的背后是什么？那是隐藏在人们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情绪。

林彪盲目和毛泽东敏锐之处，正是庐山会议上斗争的焦点。它既不是通常所说的“设国家主席之争”，也非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他视为自己一生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他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九大”后中央里军队一派和文革一派的矛盾越演越烈，终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了出来。然而，中国那时的政治走向必须在一个人的左右之下运行，那就是已经被“神化了”的毛泽东。被尊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是那么地自信，那样地执着，虽然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给他来日已经不多，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心中是多么地重要呀！即使面对着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他也“要敢于反潮流”〔５９〕，倾其生命最后精力拼力一博，把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坚持到底。从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起，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批‘周公’”、１９７５年“反击右倾翻案‘批邓’”、１９７６年“天安门‘四五事件’”……中国现代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又一幕，无不在毛泽东股掌之中演绎着发展着，直到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巨人１９７６年9月去逝。中国历时十年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因为没有了亲自发动领导者和挚意坚持者而落下了它的帏幕。

从此，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翻开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新篇章。

（２００６年3月）

注释

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1月，　第十三册，第１１４页。
２．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
３．《吴法宪访谈》转引自《晚年周恩来》高文谦、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３４页。
４．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９８４页。
５．同注２。
６．张素华等编着，《说不尽的毛泽东》“访金冲及——毛泽东与周恩来来”，，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5月，第５２６页。
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组成人员的注1.，第３０５页。
８．同注７，第２２７页。
９．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３２５页。
１０．同注２。
１１．陶朱问，＜大起大落温玉成＞，《中华儿女》，２００３年7月。总第１９４期，

第４８页。

１２．同上。

１３．同上。

１４．迟泽厚，＜我所知道的温玉成＞，《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7月２８日。

１５．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４页。

１６．同注7，第３０７页。

１７．同注２。

１８．同上。

１９．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２６３页。

２０．同注２。

２１．同注１5，第１１４页。

２２．同上。

２３．同上，第３２３页。

２４．同上。

２５．同上，第３０７页。

２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0月，第２７９页。

２７．《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２》，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8月，第５５页。

２８．《毛泽东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４９０页。

２９．同注２。

３０．见林彪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１９６８年4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２００２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服务中心出版。

３１．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7月，第１８３页。

３２．《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６１页。

３３．同注２。

３４．同注４，第５７４页。

３５．同注１5，第８１页。

３６．同注４，第３７８页。

３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１0月，第８２８页。

３８．同注４，第３７７页。

３９．见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１９７１年8月３１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２００２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服务中心出版。

４０．见《周恩来5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２００２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服务中心出版。

４１．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年，第２１７页。

４２．同注２。

４３．同注３，第２６６页。

４４．同注４１，第２１８页。
４５．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7月，第３７５页。
４６．同注9，第３２５页。
４７．同注7，第３６7页。
４８．出处同注２。
４９．同上。
５０．出处同注４５，第１６３页。
５１．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5月，第２１１页。
５２．同注２。
５３．同注7，第３８１页。
５４．同注１９，第２８６页。
５５．《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共中央办公厅，１９７２年，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２００２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服务中心出版。
５６．同注１５，第９７页。
５７．同注7，第３６7页。
５８．杨福云，＜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的序幕＞，《中国人大》２００３年１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半月刊　２００３年6月，第４１页。
５９．同注１，第１３８页。

北大血与火的记忆

余杰

文革时期肆虐北大的暴力与死亡事件，是北大历史中一个永远的伤疤。如今，人们已经不愿或仍然不敢去触及它。即便在一九九七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有关北大历史的各种叙述中，这段历史都被有意地抹煞掉了。北大低年级的新生们，几乎对昔日北大在文革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导篡改历史的政治集团取得了某种“阶段性”的成功。

为什么要掩盖历史呢？因为许多身负罪孽的人正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们沾血的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他们重新成为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名流，重新掌握了叙述历史的权力。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北大，差不多所有六十岁以上的老北大人都与之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受害者和害人者如今和平共处了。如果处处都是有罪的人，那么罪孽也就无法得以彰显出来。

年轻的一代学子，有谁能料到美丽的湖光塔影之间，当年曾经充满血雨腥风，人不人、鬼不鬼？

年轻的一代学子，有谁知道自己的学生宿舍，曾经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红卫兵们刀剑相加的战场？

年轻的一代学子，有谁能料到那些自己无比尊重的、学富五车的老先生，当年犯下过若干严重的罪行？

没有多少人愿意着力呈现这段历史，没有多少人愿意就自身的罪恶进行忏悔，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每个人都在激情澎湃地控诉“四人帮”，而那些曾经施加暴力的人却像一股青烟般消失了。

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很少有人提及文革时期的北大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有的年轻博士在课堂上用后现代、后殖民的时髦理论来阐释文革样板戏。更年轻的一代学子更关心超级女声和博客，新东方和公务员考试，他们对逝去的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把文革这段历史看成是三皇五帝的传说，看成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他们甚至不相信昔日有学长倒在血泊之中。但是，我们能因此责怪他们吗？

对历史的规避、篡改，是又一次犯罪。这一罪行的恶劣，比起当年的罪行来，并无丝毫的逊色之处。

这无疑是一场悲剧，一场双重的悲剧：产生罪恶与忘却罪恶的悲剧。但悲剧何以发生、何以恰恰在这所学校里发生？

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值得所有老北大人和新北大人深思。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北大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北大

人的鲜血曾为自由和民主而流淌。然而，同一所大学，在短短半个多世纪以后，却成为暴力活动与血腥杀戮的重灾区，成为消灭自由和敌视民主的“先锋队”。

在一个社会里，大学理应是思想最为前卫的地方。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和谐性”。自从大学诞生之初，就具备了对社会现实进行强烈反抗的品质。仅就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学的历史而言，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许多大学都有一段时期在动荡不安之中度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趋于稳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中，也曾先后爆发诸多大规模学生运动。在欧美名牌大学的学生运动中，也屡有流血事件发生。但是，恐怕全世界都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流过这么多的血。北大短短一百年的历史，似乎大半都是用鲜血写成的。有的血流得光荣、流得骄傲，有的血却流得冤枉、流得残忍。在文革时代，北大流淌了无数血，北大燃烧了无数的火焰。而且，北大还把血痕向全国各地扩大，直到流淌血的海洋；北大还把火焰向全国蔓延，直到燃烧成火的王国。

毫无疑问，这是北大的耻辱，这是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参与文革的大学及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共同的耻辱。如果不承认这一耻辱并开始洗刷这一耻辱，它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　血迹、伤痕与忏悔

在我看来，文革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溃疡的整体性爆发，它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领袖的心血来潮。直到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贴出，人们这才恐惧地发现，潘多拉魔盒里的魔鬼放出来以后再也装不进去了。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那些血迹，那些灰烬，是无法长久掩盖下去的。在文革结束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对文革中的北大的历史展开观察和研究，理应成为文革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北大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学生们本来下午要去上课的，这样一来，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越来越多。”据聂元梓回忆，这张大字报是经由康生夫妇首肯之后才张贴出来的。换言之，这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因此，当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本业赶来北大，并对聂进行批评的时候，聂竟然敢于公然顶撞之。如果没有高层撑腰，这种情形在等级森严的党的体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

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张七人大字报，显示毛公开支持大字报的论点。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火力之猛烈，上纲上线之高，令大字报起草人也感到“振聋发聩”。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六·一八”事件。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一些人在三十八楼等处设立了“斗鬼台”，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严重侮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

氓行为。

六七月间，学校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在学校的会议上挨批斗，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这些官僚是最早的“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不同程度的拘禁，被关进了“牛棚”。

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企图控制北大的局面，并对造反者实施类似于“反右”的整肃。但在七月底，毛泽东以阻碍文化大革命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出。毛十分重视北大的一举一动，毛与北大之间具有不解之缘。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到北大呆过一段时间，他对被这所学校冷落的命运感到愤懑，此后多次在谈话中发泄此心情。同时，毛泽东也深昧这所学校的弱点，现在他该出击了——既要摧毁这所当年曾经蔑视过他的、作为“精神贵族”的大学，也要利用在学界具有崇高地位的北大来打击他本人要想打击的党政势力，这是一箭双雕的谋略。

工作组撤离时，留下出身好的学生作为运动的领袖。原有的党委和行政组织全部瘫痪，学生们发现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各种学生组织开始形成，他们的分歧发展成为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也形成了自己的派系，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保全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红卫兵组织中去，例如著名教授周培源、季羡林等人，在早期的造反活动中都十分活跃。

八月份，批判大会变得更加猛烈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依然进行，而且在批判的过程中，他们常常遭到殴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侮辱。妇女被强迫跪在洗衣板上数小时，头发被剃光。无节制的暴行一直延续到宣布军队进入学校才算告一个小的段落。这时，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此数字如今仍然秘而不宣。

血迹之中，有的是有形的、看得见的血迹，也有的是无形的、看不见的血迹。这两种血迹都被回避和遮盖了，尤其是后者。这是一个缺乏忏悔传统的民族，自然也就孕育出一所所缺乏忏悔意识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北大人牢牢记得北大的辉煌，但即便在北大内部，也很难见到对自己昔日的罪过进行忏悔的文字。在有关文革时期的北大的回忆录中，他人的苦难变得轻如鸿毛，人们往往喜欢描述自己被迫害的经历，而难于对自己所犯的错与罪反省。相对于战后德国各大学对纳粹时期的各种罪行的甄别、清理，北大的伤疤还远远没有被揭开。

在北大资格最老的教授、语言学家季羡林的新著《牛棚杂忆》中，关于自身的忏悔依然缺席。这本书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讲述当年如何受红卫兵的折磨和迫害的故事，本人则完完全全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季羡林早期曾积极参与文革的诸多活动，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多次对其他学者和作家毫不留情地“揭批”。这些细节统统都在回忆中消失了。就是这样一本经过自我保护的“记忆筛选”的著作，在九十年代中期，居然获得了读书界的极高评价。这一戏剧性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能力停留在一个多么低下的水准上。

另一位参加过“梁效”（谐音“两校”，即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的文革写作班子）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则用《毕竟是书生》作为回忆录的名字，他显然想以“书生不懂政治”来为自己当年的选择辩解。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我仅仅是一介书生，因此我受政客的欺骗是难免的。周一良还在一九九八年第八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回顾自己的一生包括文革时期的作为。此时，八十六岁高龄的周一良已卧病在床，是通过口述让学生阎步克教授执笔的。这些回忆既有谨慎的自我辩护，也有艰难的心灵反思：“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们之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上当受骗以后觉悟了，感到自己‘毕竟是书生’；红卫兵们也许所受毒害较深，觉悟比较晚。他们一旦觉悟，不是也会认为自己‘毕竟是个毛孩子’吗？”

在这里，周一良将自己与老一辈学者陈寅恪相比较，认为自己以及同代知识分子们，所缺少的正是陈氏身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是的，“毕竟是……”不能被任何人用来作为逃遁的方法。周一良的儿子后来写了一篇长篇回忆文章，对父亲一代人的人生歧路作了更为透彻的反思。独立的思想是怎样丧失的？自由是如何被剥夺的？大学是如何沉沦的？而杀戮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上演的？

◇　一张不完全的死亡名单

文革期间的大量的档案材料仍然处于被封存的状态，我甚至怀疑最关键的部分已经被有关人等授意销毁了。但是，即便从那些最常见的资料入手，我们也可以寻找到部分血迹、揭开部分伤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出版了一本《北京大学记事》，这是一本相对详尽的北大百年的编年史。这本书对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段已经作了相当成功的躲避和遮掩，但从这段不完整的历史叙述中，仍能发现北大文革时代的斑斑血迹。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九年底，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据《北京大学记事》中的不完全统计，在北大非正常死亡的教授、干部、学生和家属就有以下这些：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历史系副主任汪篯教授受批判后，服毒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语系教授俞大絪因被批斗于二十五日服毒，经抢救无效，于凌晨零点五分去世。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到北大承泽园造反，刺破居民孔海琨的右额，并在走前将老人拴在树上，致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遭批斗，服毒身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经济系遭批斗并被剥夺选举权的学生杨爱明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哲学系教授沈乃彰在家服毒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文系六二级学生沈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

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造反派头头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死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无线电系六二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四十四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地质系六一级学生刘伟，准备回校办理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抓住，关押在四十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员打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去世。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物理系著名教授饶毓泰上吊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

以上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北大在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已成为“不解之谜”，没有一个北大人和历史学家能够回答上来。在上面这张挂一漏万的名单上，有著名教授、各级干部、职工、学生以及师生家属……可以说，除了部分红五类和造反派之外，其他人随时都可能成为遭受灭顶之灾的“敌人”。这些无辜的冤魂，至今仍然游荡在北大的校园里，他们是正面叙述的历史上的“失踪者”。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与北大的若干死亡事件拉开了关系，她辩解说，当时几乎不知道那么多的北大师生被残害或自杀。她还将北大的死亡事件推到了自己失势之后执掌北大权柄的工、军宣队身上：“一九六八年八月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们是在北京市革委会及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是在队校内形势完全可以控制的情况下，而且是在他们亲自组织批斗的情况下，造成了多起自杀事件，翦伯赞夫妇就是在这时自杀的。我去参加‘九大’前，周总理和江青找我去谈话，孙蓬一等同志跟我讲，你去见总理，你可别光说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说说北大的情况，已经逼死了二十四个人了。我跟总理讲北大当时的情况，总理说别着急，很快会派人去的。”聂俨然成了反暴力的先驱。如此叙述，历史遂变成了“罗生门”的故事。

聂在这里提出了某段时期内北大的死亡数字为二十四人，更多的情况则语焉不详。显然，每一个死难者都需要被记忆，北大每一页可怕的历史都需要被彰显。北大学长、文革历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指出：“死亡于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斗争会’上或者死于‘隔离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挑选杀戮的对象，其标准除了其后天的思想、言论、文字之外，其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也是重要因素。大部分北大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因此而遭到虐待甚至杀害。在此意义上，他们死于一场精心策划

的、在国家权力机器的默许和鼓励之下的“谋杀”。这种谋杀完全可以同纳粹集中营的屠杀相提并论。

大部分杀人者并未受到法律的惩罚，文革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文革结束之后，被绳之以法的只是少数人。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参与暴力活动的人士了，他们大都逍遥法外。八十年代的当政者曾经试图调动党政部门的力量，列出一分文革期间施暴者的名单，但最终未能成功。后来，若干施暴者，如文革早期的联动分子，再次升迁获得高位。他们成为文革真相得以公布的巨大障碍。

如果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反西，在文革这场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中，某人是否真正出手打过人，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自称“红卫兵”这个词的发明者的张承志，后来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他就死死咬住自己并没有亲自动手打过人，因此拒绝向任何人忏悔，并且张扬当年理想的纯洁性。实际上，打人只是一种具体的形式，比这种具体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运动中，“我”的精神世界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许多人确实没有动手打人，但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却参与了“打人”的活动，比如对打人的行为表示认同或默许，比如为打人的行为制造舆论上的支持。这是更深层次的“打人”，例如康生就没有亲自打过人，但他比某一在武斗前线杀人的凶手更加可怕。这些人同样是“打手”——是思想、文化和精神的打手。在文革中，许多人充当了这种“隐形打手”的角色，运动刚一结束，他们便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在新时代里夺取新资源。

◇ 北大的“武斗”

上面是北大在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再来看看北大残酷的批斗及武斗的情况。北大的武斗虽然不是全国各单位中最厉害的，其规模和惨烈程度不仅比不上后来武汉、重庆、成都等地的武斗，也比不上清华的武斗。但是，北大的武斗对于全国来说却有一种表率的作用。一旦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大亦陷入武斗的泥沼，那么其他地方的武斗自然就会蜂拥而起。北大的批斗和武斗，有如下这些大事：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从六月初以来，各系各单位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戴高帽子、挂黑牌、揪头发、坐喷气式、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情况日益加剧。截至今日，被乱打的干部、教师、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其中有“黑帮”分子四十五人，有错误缺点的一百二十人，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七人，好人六人。（该报告对“坏人”、“好人”的分类值得深思。）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校文革筹委会发布《十条建议》，提出批斗干部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结合；大、中、小斗争会结合。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据校文革不完全统计，全校已成立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约九十二个，参加者约三千余人。红卫兵在校内外“横扫四旧”，这期间，校内被抄家者有五百三十六户。临湖轩被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被改名为“反修园”，俄语系也一度被改名为“反修系”。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聂元梓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举行成立大会。会上宣布，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

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并表示“要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夺权。”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校文革召开“彻底批倒刘少奇、邓小平”的万人誓师大会。陆定一、周扬、蒋南翔、吴子牧、宋硕、陆平、彭佩云、翦伯赞、冯友兰、朱光潜等被揪上台批斗，坐喷气式。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校文革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孙蓬一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对逆流”，“目前的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江山落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土必夺，寸土必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校文革和外校十八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王光英。李维汉、徐冰、陆平、彭佩云等被揪上台陪斗。孙蓬一发言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今天，是我们向刘少奇、王光英讨还血债的时候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聂元梓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数学系学生杨建铎任队长，生物系学生师春生为副队长。该兵团携“康生办公室”介绍信到全国二十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提审在押犯人，凭犯人的口供，搜集编造了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案，其中有所谓的“百人专案”。该战斗队逐步达到一百二十五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校文革在校内五四广场召开有全市五百多个单位参加的十万人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控诉他们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罪行”。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彭佩云等被揪上台坐喷气式陪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北大造反派头子高云鹏在汉中六五三分校参与汉中地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于是，发生了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二十九人死亡，三十余人受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新北大“调查组”在东北四平参加了抢武器库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打伤、打死五十七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时，北大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一百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三十六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这次武斗造成两百多人受伤。此后，聂元梓、孙蓬一、高云鹏等又下令攻占了二十五、二十七、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二十八、三十七、三十六等楼群的井冈山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政香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断水、断粮、断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下令成立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研究抓这三个组织中的“反动小集团”。专案组先后抓捕颜昌忠、韩琴英、徐运朴等十余名师生，进行演刑审讯和逼供，孕妇韩琴英被打流产。

一九六八年四月，校文革将一百三十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太平庄关押、劳动。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新北大》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谁反对江青就叫他人头落地”，“牛辉林攻击江青，必须坚决镇压”。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两百一十八名。监改大院设有监管人员二十多名，由国政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不少监管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阴风惨惨。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专案组负责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逼他们交待“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邓朴方被逼跳楼，高位截瘫，终身残疾。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二十八楼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送菜，高云鹏令武斗队员从东西两面包抄，双方发生一场武斗，砸坏了汽车，打伤了三场司机。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校文革在四十四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处及井冈山兵团在二十八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两大派系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许多群众伤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军队进驻北大后，新北大公社开始向宣传队上缴武斗工具。据校文革《情况简报》统计，有扎枪、长矛九百三十支，安全帽五百一十八顶，护身甲三百三十六件，铁棍两百根。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晨，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七百四十九支，铁棍七十一根，护身甲两百零八件，柳条帽四百三十二顶，弹弓八个，小口径子弹三十七枚。至此，北大的武斗才告一个段落。

综合而言，北大的武斗大部分局限于校内不同派别之间，少数有校外其他单位和团体介入。基本上还是处于“冷兵器”作战的状态，尚未动用大量重型枪炮。

◇　对聂元梓的个案研究

研究文革时期的北大历史，聂元梓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聂在文革初期便有“老佛爷”之称。“老佛爷”的名号来自于慈禧太后，在晚清政坛上慈禧太后堪称说一不二的铁碗人物，其政治手腕之巧妙，斗争方式之残酷，无人能及。聂元梓有此雅号，可见其在北大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了。

聂元梓根本不是北大“嫡系”出身，她是一名“三八式”（即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在中共北方局情报局工作，一九四五年出任哈尔滨郑家屯区委书记、市委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一九六零年调入北大，先后任经济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等职务。

聂元梓并未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也从未涉足学术和教育领域，但她拥有延安干部的“老资格”，在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受过短期培训，因此有关方面认为这样的老干部应当“充实”到北大去。聂最初在北大经济系担任副主任，职权却远在主任陈岱孙之上，聂在回忆录中说：“陈岱孙是党外人士，我们党那时候对党外人士是表面尊重，信任不足，不给人家实际工作做，我在系里做的就多一些，一方面准备兼一些课，一方面做行政工作。”寥寥数语，说出了六十年代初北大的真相：昔日一流的学者们因为“政治忠诚度”的问题，已经纷纷靠边站了。北大的学术传统也正在被斩断，蒙昧主义和政治决定一切的思潮开始在北大占据主流。

文革肇始，聂元梓由一张大字报一举成名，由一个系的负责人（且受到党委书记陆平压制）而一跃成为北大的最高掌权者。聂在北大实际掌权的时间不足两年，

却给北大带来巨大的伤害，其罪行罄竹难书。聂在回忆录中竭尽全力降低自己的罪恶：“我投身文革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个人野心，没有什么权力欲望……我因为觉醒得早，因此遭受的打击迫害多，江青、陈伯达都曾经严厉地斥责我，谢富治等就更不用说了。从工、军宣队进校到粉碎‘四人帮’，我长期地处于监禁和管制之中，吃了多少苦头！”她始终认为自己在文革之后被正式逮捕判刑是“冤案”。但是，那些在文革初期死于造反派暴力之下的北大师生，是否会因此而原谅她呢？

周一良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详细描写了自己得罪聂元梓的下场。周一良颇有政治热情，文革初期便积极参与校内的派系斗争，他选择参加了“井冈山”组织，而“井冈山”与聂元梓所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是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组织。周一良还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静坐示威。“这一下惹恼了‘老佛爷’，我由无足轻重的靠边站，变成了她的死敌，招来了一系列灾难，定要把我弄臭而后已。”

一九六七年秋天，一个萧瑟的夜晚，“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周一良家抄家，将全家人关进厕所，包括周一良有一条腿残疾的岳母。红卫兵翻箱倒柜，大事搜索，抄家过程中周的次子恰巧回家，被红卫兵逼到墙角树下，痛打一顿。

周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批斗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周与另一反聂的老教授侯仁之同台，还“荣幸”地有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来陪斗。“红卫兵揪住我把头往墙上撞，反复多次，撞得我两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当时心想，恰似打斗电影片中挨打角色的狼狈相，没料到自己年逾知命还亲身体验这般滋味。”

当最高统治者利用学生造反派打倒彭真、刘少奇等党内“走资派”之后，聂元梓等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便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多钟，毛紧急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关于聂元梓和北大的文革现状，毛在谈话中海阔天空地说：“事情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一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毛又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毛还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叫林彪同志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一席讲话已然决定了红卫兵领袖们被抛弃的命运。

当工、军宣传队进驻北大以后，聂元梓被迫靠边站，失去了昔日熏天的权势。《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聂元梓在全校“三忠于”讲用会上被迫承认，自己有“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断电、断粮，往二十八楼里灌水……还任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元梓还承认掌权期间，“在校文革中搞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护一派的利益，校文革变成了派文革。”在后来揭露的校文革搞的逼供信的事例中，如“把樊某抓去，将十个手指，十个脚趾都用钢针挑起来，膝盖骨上钉钉子，胳膊、小腿都打断了，造成了残废。硬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然而，这一切后来在聂的回忆录找不到蛛丝马迹。

随着形势的发展，聂元梓从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变成人人唾弃的人物。在一九六九年年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聂被定位为“反革命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北大的《内部通讯》刊登了《权迷心窍的野心家》等揭露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反军”、“夺权”、“武斗”、“杀人”等问题的文章。一九七一年二月，北大召开大会，揭发、批判聂元梓反军乱军问题以及反对“五七”指示的问题。各系也相继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和控诉、声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决定并宣布对聂元梓进行隔离审查。

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在该年五月的北大第六次党代会上，哲学系代表李中华、政工组代表郭宗林做了揭发、批判聂元梓的发言。揭发聂元梓的主要问题有：分裂群众组织，破坏革命大联合，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疯狂反军乱军；分裂党中央，阴谋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以及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权欲狂”等。北大党委书记杨德中在会上说：“聂元梓还要闹的，此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要继续审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北大的文革史上，聪明一世的聂元梓也成了一枚棋子：她曾经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人家也如法炮制，逼她承认自己反毛主席，这正应了“作茧自缚”这个成语。

聂元梓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这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自由。聂的回忆录重点讲述个人的革命历史，以及在狱中受到的种种虐待。聂认为自己被判重刑，是因为邓小平痛惜儿子邓朴方在北大被逼跳楼终生残疾，亦是因为当时复出负责司法工作的彭真的泄愤。聂还为自己出狱后的生活叫屈，并向胡温上书，但不可能获得任何回应。

聂在回忆录中仍然宣称自己忠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文革在她心目中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和挫折。对于北大来说，文革是北大的溃疡，是北大血液中“官学”传统的一次痉挛式的发作。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北大，以学问和教育为最高人生追求的“老北大”教职员工的边缘化，以政治运动及阶级斗争为喜好的“新北大”的政工干部的得势，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仇恨知识、敌视文化和泛政治化的氛围笼罩整个北大，最后北大被毛泽东选择作为文革的摇篮，乃是首当其冲。而聂元梓正是此过程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范本。

◇　洪子诚的反思：我们都是“打手”

谁是真正的无辜者呢，或者我们都是“打手”？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中文系学生刊物《启明星》的百年校庆纪念特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点往事》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在北大人的回忆文章中读到的，最真诚、最朴实、最深刻地直面当年罪孽的文章。它挖掘到了没有血迹的罪孽，是对北大传统的重新梳理和重新认识，也是对自我灵魂的没有退路的质问和反省。

洪子诚那时是一名年轻教师。一九六六年六月，学生来找洪子诚，让他去开会，没有想到是一次批判会。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使他陷于慌乱之中，脑子一片空白。学生说：“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学生们揭发说，第一、他这名班主任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第二

、他重用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一个同学揭露他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时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这个学生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原来，洪子诚在评讲写作的时候，曾经说到写国庆游行的例子，说每个人的发现都是不同的，不要千篇一律地写准备、出发，写见到毛主席，最后回到学校……没有想到这就是“对毛主席有不满”。

一年以后，洪子诚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临行前，他把一些日记烧毁了。在此过程中，他重读当年的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自己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也曾扮演过“批判者”的角色。一九五八年，北大正在进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文系受到冲击的是王力、高名凯、林庚、游国恩、吴组缃、王瑶等知名教授。

那时，洪子诚正在上二年级，他们班承担了批判王瑶先生的任务。他们找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用这个武器对王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批判，把王先生的文章定义为“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写出了锋芒毕露的长文《文艺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创作”。

临近毕业的时候，洪子诚去听王瑶先生讲课。先生在不久前刚刚批判过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地陈述个人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具有王瑶特色的爽朗的笑声。课后，王瑶先生又耐心回答学生的问题。洪子诚教授感叹说：“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该走的路。……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王先生道歉过，承认我们当时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我们的反省。”

反右已经为文革打下了基础。北大学风的毒化早已在慢慢蔓延。洪子诚意识到，自己当年对王瑶先生的批判与文革时期学生对自己的批判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历史长河中，自己并不完全是无辜者和受害者：“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其模式总是一批自以为纯洁的人去侮辱另一批被视为“不洁”的人。“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角色转变，瞬间便可以完成。此时此刻的“被批判者”，有没有责任为昔日自己作为“批判者”的所作所为而忏悔呢？

断裂在北大已经发生了。作为五四传人、作为西南联大的学子，王瑶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崇高、几乎不可复制的榜样，以之为起点，洪子诚追问道：“在王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

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八十年代，朱光潜、宗白华、吴组湘、王力、王瑶这一代大师完成了天鹅的绝唱。那是在文革的废墟之上的惊鸿一瞥。他们力图恢复蔡元培时代北大的精神本源，却未能如愿。文革对北大的伤害太大了，大得超过所有人的想象，迄今为止，这种伤害仍然像艾滋病病毒一样无法从北大的血液中得以根除。换言之，它亦成为北大传统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国，这就是我曾经求学的北大。如何去伪存真，如何驱恶存善，如何在这文革暴发四十周年的日子里为文革“立此存照”，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洪子诚教授在文章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于已经走过一百年的路的北大，我们每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

这是含着血泪的祝福。在毛泽东心中，北大仅仅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棋子；但在文革十年的历史中，北大确实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负面角色。文革时代的政治风云给当代北大的走向打下了深刻烙印，也成为北大历史传统中最具争议却最“鲜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曾经的北大人，我认为：反思文革，应当从反思文革期间的北大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横断面。

昔日，鲁迅在总结北大校格的时候曾说过：“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今天，北大不仅需要与外部的黑暗势力抗战，更需要与自身的黑暗势力抗战——那就是文革沉重的遗产。只有直面北大传统中的不健康因素、直面北大历史深处的血痕，北大才能走上一条真正的“现代大学”之路。

在文革开始四十周年的时刻，在北大迈进新纪元的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抗战。这样的“抗战”其实才刚刚开始。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改定

不应遗忘的六六至六七年之间的反孔运动

——文革反孔运动面面观〔１〕

周泽浩

一九六六年年十一月，一支由大约２００名的红卫兵组成的长征队伍从北京被派往山东省曲阜孔子的家乡。在这里他们亵渎和捣毁了大量与孔子有关的历史墓碑，文物和建筑。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孔运动。尽管这个事件对全面了解整个文化革命有明显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文革的学者以及专业文献中多年来对此一直忽略。几乎所有对文革期间的反孔活动研究都集中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然而，如果要完全理解整个文革的复杂性，对１９６６年底及１９６７年间第一期反孔运动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进行了解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旨在对此次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描绘、审视和分析。

与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大量历史档和学术研究形成明显的对照是，大多数对文革研究的最流行的主要学术着作对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７年的第一期反孔运动论述甚少。比如在严家其的综合性陈述文革期间的《文革十年史》中，〔２〕提及这场运动的只有一句话。费正清在他的 China: a new history 一书中甚至连一点都没有提到第一次或第二次反孔运动。〔３〕而最近几年出的中文版的较具综合性的文革文献中，比如杨建利主编的《红色革命和黑色造反》〔４〕 以及中共党史出版社在２０００出版的 《回首“文革”》〔５〕对这场运动在也没提及。

然而，随着国内学术界近年来逐渐的放开，对此运动以及对毛泽东“孔子情结”的评论也逐渐在部份国内刊物上出现。例如《历史的审判》（历史的审判编辑人员，２０００）一书简单地描绘了红卫摧毁孔子墓碑的历史史实。在《为毛泽东辩护》一书中，作者也分析了毛的孔子情结。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出版的有关第一期反孔运动的原始历史文档。其中主要的有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革命文库》〔６〕和收集到《新编红卫兵资料》中的《讨孔战报》。〔７〕这些最新发表的与１９６６－６７反孔运动有关的历史文献将作为本文的基本来源。

◇　在孔子家乡的骚乱和摧残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１９６６秋和１９６７年冬发生这场劫难，有必要对１９６６－６７年反孔运动提供一种按时间顺序的陈述。当此运动开始时，中国已陷入全面动乱。在１９６６年八月和九月，受到毛及中央文革组的鼓励和响应“破四旧”及“造反有理”的号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忙于任意毁掉任何他们认为与四旧有关的一切东西。离北京成百上千里路远的孔子家乡曲阜似乎也是在劫难逃。砸三孔（孔庙、孔府和孔林）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开始拉开了序幕。当时有些曲阜当地的学生自发地响应全国范围内的破四旧运动并试图毁掉他们家乡的孔子遗迹。然而，他们的努力遇到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抵制。当地红卫兵外出北京和济南寻求国务院和省

政府的支持但未能如愿。

对曲阜三孔的全面冲击要追溯到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７日，当时大约２００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战斗队” 的大学生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并宣誓要捣毁“孔家店”。在集会上谭厚兰（北京红卫兵五位主要领导人之一），表示“孔家店”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是“吃人的阎王殿”，“封建主义的象征”、“四旧势力的代表力量”、“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支柱”、“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以及“把毛泽东思想树为绝对权威的大障碍”。因此，他们将前往孔家店——“反动势力的老巢”去闹革命。在１１月９日，这些北京学生到达孔子家乡曲阜。在１１月１０日他们出版了第一期《讨孔战报》，其标题是：“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在同一刊物上，他们的檄文是“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此文章除了重申了一些陈辞滥调外，还开始批判一些孔子学说和儒教理念，如“畏天知命”、“反动的礼教”，以及“服服帖帖甘受奴役”，他们谴责“孔家店”是“大黑店”，等等。他们还攻击孔子轻视妇女、瞧不起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他们进一步抨击孔子的“中庸之道”，批判他提倡的“仁爱”以及他认为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他们也试图证明孔子思想是所有邪恶之源。

１１月１０日，一些北京红卫兵试图进入孔府，向当地保护孔府的地方干部挑战，并寻找隐藏在孔府内的“犯罪证据”。红卫兵的企图最初被当地官员以需要保护重要文化遗物为理由阻止了。然而，通过“激烈的斗争”，红卫兵们最后设法进入了大院，并看到了许多孔府内的东西。在这许多“犯罪证据”中，红卫兵找到了国民党党旗，蒋介石的图像和他的训导词、旧通货币、旧的封建书籍和图画、甚至“特务工具”……。

１１月１１日，北京红卫兵着手排除毁灭曲阜孔家历史遗迹的技术障碍，即：国务院１９６１年的决定，该决定中指明了孔庙、孔府和孔林为受政府保护的文化遗产。红卫兵们先是向国务院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他们要求政府取消“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如孔庙、孔府和孔林。他们谴责国务院保护“牛鬼蛇神”和孔子，要求国务院马上满足他们的要求，并“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这种“革命行为”包括在孔府内自由书写毛的语录，挂毛的像以及随意破坏孔府内的“反革命赃物”。

１１月１５日，也就是他们发出抗议信后的第四天，红卫兵们又改变了战术：从“文斗”——写信发展到了“武斗”——施加暴力。那天，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曲阜师范学院和国内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以及许多当地居民在孔府前举行了一场要“彻底打倒孔子”的誓师大会。他们谴责政府官员利用石匾上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牛鬼蛇神”。集会完毕后，气愤和激动的人群冲向孔府前的碑匾，大喊“砸了它”，重１，０００斤的匾马上被红卫兵拖倒，然后用锤子砸了个粉碎。他们然后去找周公庙，把其石匾同样砸了。有些红卫兵甚至进入孔庙，他们损坏和毁掉了更多的物品。捣毁行为持续６到７个小时后，红卫兵又进入孔林，他门毁掉保护匾及两只石狮。这天结束时他们还毁掉了至圣林牌楼。搬掉这些官方的保护匾并为下一轮暴力埋下了伏笔。

１１月２０日，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中提出了“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这封电报除了重复了一些旧的反孔言辞外，还宣布在１１月底，红卫兵将举行群众大会，“彻底打倒孔家店、破四旧”，把“反动学术权威”与一座孔子泥像一起游街示众，或烧孔像，刨平孔坟，捣毁各种神庙内的偶像。为了造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反孔运动他们还发了致全国公开电进一步要求各地宣传部门宣传他们的资讯。此电报甚至鼓励红卫兵和全国各地 “革命的教师和学生”参加步行的大串连，参加工农兵的讨孔活动。最后，电报提议建立全国联络委员会“团结国内所有讨孔革命组织”。

从１１月２８日到１１月２９日，数十万以上的红卫兵、工人和农民在曲阜师范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持续两天的集会，誓要“彻底捣毁孔家店”。许多人一大早开始出发，一些来自邻近地区的红卫兵甚至走了一通宵来到集会点。早上六点时，红卫兵和农民开始在集合处汇集在一起，“来自各个方面的红色象融化了的铁一样”，人们挥动着造反旗帜，手拿毛的语录，把曲阜师范学院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在集会期间，他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来批判所谓的“反动人物”，他们先批判孔子，再批判１９６２年孔子讨论会的参与者。每次集会后，与会人员就接着去破坏孔家遗迹和文物。他们配备了各种破坏工具，行动时像一股“大的红色波浪”。他们哄涌而入进孔庙、孔府和孔林。在去这些地方的路上，他们让县、区、省和学校官员站在卡车上或站在孔子泥雕旁边”陪斗”。

他们一到达孔林就不断焚烧孔子雕塑、铲平坟墓、挖出棺木、掘出尸体和取出棺木中的金银，并粉碎墓碑等等。在１１月２９日，参与者向毛泽东发了一份公开电宣誓要效忠毛，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并告知了毛他们对孔府遗迹的破坏战果。

尽管大多数的孔府遗迹在１１月２８至２９日已受到严重损坏或摧毁，但进一步的破坏行为还在持续着。事实上，１９６７年2月发表的来自“讨孔战报”中的“紧急通告”就表明了曲阜的公民还在孔林内肆意公开挖掘坟墓及陪葬的珠宝以及随意挖孔林中的树木。

根据此通告，有１，０００棵以上的松树从孔林中被挖出来。有一家曲阜银行购买了价值十壹万壹仟元人民币的黄金。这些卖主所卖的黄金就是从孔墓中获得的“战利品”。一些掠夺者甚至建议“分掉整个孔林”，而盗墓人还吹嘘“一晚一拖拉机”，其意思是：一个晚上掠夺的物品价值一辆拖拉机的价值。这在六十年代意味着一笔天文数字的钱。掠夺者之间甚至经常爆发暴力冲突，这种掠夺行为也波及到曲阜的其他地方。

伴随着对孔府遗迹物质上的摧毁的是对孔子理论上的批判和讨伐。此种批判来自这次运动的官方喉舌—《讨孔战报》，这是第一份也许也是唯一一份以反孔为办报宗旨的唯一的报纸。这份由“彻底捣毁孔家店建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红卫兵报设在曲阜师范学院。此站由赋有同一使命的七个红卫兵组织构成。

这份报纸从创刊到在１９６７年3月前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免费赠送。它的重要作用是把反孔活动的资讯传播到全国各地，它还为其他地方起了示范作用。

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底砸“三孔”后，此份报纸继续批孔。它在理论上探讨儒家学说并由曲阜地区农民和工人对“孔子的批判”，“揭露孔府内罪恶”，诋毁“１９６２年的孔子讨论会”。它也谴责刘少奇对孔子思想的认可以及所谓的山东党内的走资派。此报也报导了１９６７年初在曲阜举行的“孔子罪恶展览馆”。“讨孔战报”成为了此项运动的喉舌。１９６７年８月底官方停止了它的发行。当时编辑们引用的停刊理由是：“它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学生需要重返学校参加革命”。

应当注意到在这同一时期毁掉孔子石碑的行为不只是局限在曲阜。在上面提到的“彻底摧毁孔家店的十项建议中”，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批孔，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孔运动。这些建议通过在全国发行的“反孔宣言”到达了全国各个角落。

他们的建议随同他们大量毁掉孔子石碑的行为，激起了全国疯狂毁坏孔子遗迹的热潮。在南京，红卫兵把“文庙街”改成“人民街”。《纽约时报》有一篇名为“２５个世纪后红卫兵们辱骂的孔子”上这么写道：红卫兵最近几周在广东附近内陆城市的街上冲刺，拖拉着大师（孔子）画像，画像上标有 “我是牛鬼蛇神”……。游客们报告说：红卫兵作为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一直在谩骂和焚烧孔子作品，他们说这些是封建思想头号罪犯。甚至在甘肃东北省兰州这一遥远的城市也发生了此类事。在那里，孔子氏族一整套少有的几本家谱，共含有１０８卷，被兰州一以大学为基地的红卫兵组织烧掉了。

反孔运动后果简直无法描述。只在曲阜，大约６０００件文化遗物被毁掉；大约２７００卷古代书籍、９００件以上的书法和图画珍品，以及大约１０００块来自各个朝代的石碑均被烧的烧砸的砸了。在这些毁掉的物品中，有７0件被划为国家最具价值的受保护的文化遗物，有１０００本以上被毁的书籍为 “孤本”。孔子出生地，这一具有中国集体文化遗产的出生地，遭受了毁灭性的和永久性的破坏。这些文化遗产曾在秦始皇手中幸存下来；也曾在毁灭性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幸存了下来；又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幸存了下来；还在日本侵略者手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它在文化革命的蹂躏中没有幸存下来。曲阜再也不会是原样了。

◇ 后台教唆者们

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动乱自然向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人们可能想知道红卫兵这么做是否出于它们自己的意愿或是出于某些幕后操纵人的策划。尽管在文革期间许多自发的“革命行动”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８月２５日曲阜当地红卫兵企图要毁掉孔碑的意图），我们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即文革期间的许多混乱实际上是“受控的无政府状态”。

在许多情况下，文革中发生的暴力和混乱是有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默许，认可，甚至指使为前提或背景的；１９９６年夏天的“破四旧运动”就是一例。反之，

如果毛认为混乱对他的政治议程和权力斗争是有害的，他会毫不犹豫地制止它的，他在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使用军队制止全国范围内的派性武斗以便控制局面即为一例。由北京组织的长征红卫兵队进行的反孔活动和在曲阜进行的大面积破坏似乎不是即兴决定和自发行为。如果把“破四旧运动”与曲阜发生的事相比，人们可能会认为曲阜的毁灭性行为就是“破四旧运动”的一部分。毕竟在他们眼中，孔子是一位对中国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执牛耳者。

然而对这两次运动细细观察一番，就会看到在许多方不同点。第一，两次运动的时间不同。“破四旧运动”大部分爆发在１９６６年的8月和9月，但在１０月是高峰。１９６６－６７的反孔运动始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在那时毛已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这次运动的目标是毛的党内敌手——刘少奇和邓小平，而不是所谓的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第二，两次运动的参与者都不同。“破四旧运动”期间的大部分暴力是由中学红卫兵干的，在北京也叫做“老红卫兵”。但后来的这个“红卫兵讨孔远征队”是由叫做“造反派红卫兵”　的大学生组成的。他们由谭厚兰领导，这位学生领袖是毛和他的圈内人攻击政治对手的重要　“枪手”。在毁掉曲阜石碑时，“老红卫兵”已经失宠于毛，毛把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视为清洗目标。第三，两次运动所运作方式不同。“破四旧运动”主要是一种任意的想怎么毁就怎么毁的暴力。相比之下，这些来自北京的大学的红卫兵显示了高度纪律性和周密的计划性。在１１月７日，他们在北京宣誓集会，在１１月９日到达曲阜前，他们对即将进行的破坏活动提前两周通知，并花了时间来寻求支持。在１１月２８至２９日的毁灭行动开始前，他们还联络和组织了当地学生和居民。他们的操作持续到１９６７年８月。这些事情没有一件类似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的高潮时所做的那样。相反，在曲阜的反孔活动是计画周全管理得好的一次运作。

最后，两次运动发出的资讯不同。“破四旧运动”的特点是动手毁掉“四旧”，迫害甚至杀害黑七类份子，但红卫兵的破坏行为限制在中央文革小组规定的破四旧的范围。然而，在１９６６—６７年反孔运动前后十个月期间内，一些重大的政治资讯不断传来。反孔运动的支持者鼓吹并进行对儒教的理论批判，他们积极地批判资反路线，攻击刘少奇和当地官员并批评１９６２年孔子讨论会及参加者。简而言之，１９６６—１９６７的反孔运动迹象表明，这是一个特地安排的政治运动，它同毛计画的文化革命进展一致，而不只是随意的暴力行为。

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的行动表面上也与大串连发生的事相似。然而，仔细了解事实就会看出其他情况来。在大串连期间，许多来自北京的激进学生走到全国各地并激励当地红卫兵和造反分子起来反对当局并毁掉文化遗物，古董以及历史遗迹。所有这些事件似乎与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所干的事相似。然而，大串连起于１９６６年８月末，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末中央文革组发出中央文件禁止坐火车进行大串连时就已经渐近尾声。但北京红卫兵却在１１月初才坐火车到了曲阜，到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末才开始大规模砸孔碑。

在曲阜的反孔活动不仅与“破四旧”和大串连运动无关，而且所有的事实都是幕后主持者的杰作，他们插手一切，特地安排、鼓励和颂扬曲阜所发生的一切。戚本禹所扮演的角色就很说明问题。。戚是中央文革成员，负责文化事务。他反复向

红卫兵传达毛和文革领导成员的指示，讲那些毛和其圈内人想要排除和清洗的许多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例如：刘少奇、邓小平和彭德怀。比如在１９６７年３月，戚把江青的话传达给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要她攻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样谭厚兰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井岗山战斗队”的大约２００人也是通过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造反派头头林杰煽动和指使而去曲阜的。

除了戚本禹和林杰之外，他们的上司陈伯达也参与策划了这场１９６６—１９６７的反孔运动。陈当时是文革小组的组长并是毛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日，即曲阜孔林大量被毁后第两天，戚本禹就在北京故宫发表了讲话。他向听众们描绘了两天前在曲阜发生的事情——这也证明他对那里最新进展的密切了解和关注，他对红卫兵在曲阜的所做所为进行了赞扬并认为造反有理。在他得知曲阜红卫兵想挖掘孔子坟墓时他就进一步提出了建议，他特地请示陈伯达问红卫兵是否可以进一步这么做。以上这些在戚的下列讲话中就可体现出来：“小将们……想要去掘孔墓。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说他们可把它挖出来……。他还进一步指示孔庙应当变成展厅来教育人民知道阶级斗争。”

很清楚，红卫兵寻求并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允许在曲阜进行毁灭性的活动。后来他们甚至执行陈伯达的指示把孔府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教育大厅，他们树起“孔府罪恶展览”的牌子。此展览对外开放，“讨孔战报”分别发表了四篇文章描绘和赞美了这次阶级斗争教育的展览。

现在大家清楚知道戚不仅幕后指使红卫兵去曲阜制造一场浩劫，而且他也密切监视红卫兵到曲阜后的活动。显而易见戚起了信使的作用，但他不是最后的决策人。事实上，在１９８３年对戚审判时，戚还争执道：“文革中我的活动没有一件是我弄出来的。我是按照康生、江青和陈伯达的指示安排了这一切。”

戚的辩解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回避他的个人责任，但以上他在故宫所说的言辞似乎更支持了他在文革中仅起次要作用的论点。当时真正的权威似乎掌握在他的顶头上司陈伯达手中，因为陈对曲阜的事件是完全了解的，并能够决定在那里什么该发生或什么不该发生。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激进的红卫兵破坏历史文物，事实上却是毛和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所有这些都可从文革后１９８３年中国政府审判戚本禹时的情况得到部份证实。当时戚被宣判有罪，判处十八年监禁。根据裁决，他的部分罪行是指示谭厚兰和红卫兵毁掉曲阜孔子家乡的文物。

然而，作为文革小组的成员，早在１９６８年戚本人也受到了毛的清洗，戚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代人受过了，正像“四人帮”的许多犯罪事实实际上代毛受过一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文革期间的高度控制的政治气氛，这场重大且徐徐进行的反孔运动进行得这么长久而不为毛所知、也不为毛所批准是非常不可能的事。研究表明毛在文革期间的反孔活动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姚文元所说，毛当时告诉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代表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除孔子在人们生活中各方面的影响。”毛讲话后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支持红卫兵在曲阜所干的一切并反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即文化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根除孔子的影响。考虑到毛的批孔言论是在曲阜受到大规模破坏之后

不久发表的，以及毛在中国实质上的皇帝的地位，人们就不难推测谁会是其后的主要的教唆者。事实上，可以说没有毛就不会有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的反孔运动。

◇　毛和反孔运动

似乎有两个重要因素可帮助解释毛的反孔立场和行动，即：毛反孔的复杂性及他反复使用反孔作为肃清政治对立面和取得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

除了显然可见的孔子的学说与毛所赞同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在思想上的冲突外，冲突还至少表现为："博爱"对　"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庸"对"暴力革命"。毛自己的政治哲学已与孔子的学说相违背，他的政治生涯和生活经验更形成了他对孔子的学说的敌对。

毛出身和成长在孔子价值观的社会里，他经常从一种实用的角度引用孔子的话和作品，甚至他给他两个女儿取的名字"讷（犹豫)"和"敏（锐利)"都来自孔子的语录："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除此之外，毛还有许多理由不喜欢和不相信孔子和儒家学说，这主要是由于孔子的学说和毛思想之间、以及与毛认为已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存有不可调和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武力对协调原则，极端对中庸之道，强调教育对轻视教育和知识份子。换句话说，孔子的学说作为许多思想和学派的思想基础，它与毛的哲学和实践是不可比拟的。

毛的反孔立场在１９４９年他逐步取得地位后被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在中国历史上独尊于天下地位使他超出了最受欢迎或最有权力的皇帝所拥有的。

毛不像他之前的中国皇帝。以前的皇帝极个别除外，他们都紧抱孔孟之道，把它当成国家的宗教，并用它来和支持其统治，而毛在他的许多同志的帮助下，成功地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特别在文革期间把它作为中国的新的宗教。这样，他必须要摧毁旧宗教的统治地位。

有一段时间被他指定的继承人林彪还宣称他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远远超过马、恩、列、斯的当代"马列主义"的最高峰。作为国家和国家宗教的最高统帅，毛不仅不需要孔孟之道来支援他的统治和证明他的合法性，而且他有各种理由来用毛泽东思想清除儒家学说，因为它统治了中国人民的心灵并与毛泽东思想竞争。而中国人对孔子崇敬之深，可谓深入人心。仅就这一点，毛在１９４９年一掌权后就加强了反孔言论和对知识份子的迫害，　就一点也不意外了。因为不少有名的学者如梁漱明，就坚持孔孟之道而反对毛泽东思想。难怪中央文革嘱咐北京红卫兵去曲阜"打倒孔家店并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确实毛的著名语录提供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基础，并且为他的政治思想总结出了一个关键的一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敬让，革命是一种暴动，一种暴力行动，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暴力行动。"这些思想和孔孟之道精髓的一部分的讲究、悠闲等等的生活质量是完全相对立的。

毛不难找到反孔的理由，在此也没必要去追朔毛反孔的思想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毛巧妙地使用孔子作为其权力斗争的有效工具。毛成功地把反孔与党内的权

力斗争结合起来。他首先把孔孟之道变成万恶之源，例如先前所提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支柱”。他还收集完全是断章取义的他对手写的文章里的孔子语录，把他的对手们与“罪恶的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最后，他根据对手们与孔孟之道思想上的联系来进行政治上的清洗。

这一方式运作起来就像是毛的一道神奇的咒符，可以到处贴到他的政治对手头上。尽管大部分毛清洗的同志是共产党员，然而毛成功地把他们标榜为“孔子的崇拜者”，并毫不犹豫地清洗了他们。在毛的统治下，几乎毛认为的的每一个敌人都成为了孔子的崇拜者，他们中包括共产党内的毛的老同志，如王明、刘少奇、林彪和陈伯达以及和他缠斗了一生的国民党的敌手蒋介石，还有在苏联和日本的“有敌意的反革命外国人”。根据以上的事实和分析，似乎看来在１９６６—６７年曲阜的反孔活动仍是毛使用反孔道的一个例子来怀疑和清洗他的对手，并且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执行那个计画上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的反孔运动是按计划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绝不是简单的“破四旧”或是一场自发的反偶像崇拜的群众运动。相反，它是一场毛亲自所领导和策划的文化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要保证毛的思想的绝对权威，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中怀疑和清除掉毛已察觉到的对手。北京和曲阜的红卫兵被利用成为了一种工具，来有助于达到目的。国家资助的群众性的故意破坏文化以及在曲阜的暴力导致的结果是毁了孔林、亵渎了２０００年来中国哲学主流的诞生地。 这毫无疑问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造成了中国人民感情的和心理上的创伤。然而这些责备和犯罪应归属毛和他的助手们，因为是他们利用反孔来请洗毛的对手和敌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毛的助手们最后也受到了毛的清洗，例如戚本禺、陈伯达和谭厚兰。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被打成了“孔老二的信徒”， 如陈伯达。罪责还是可进一步归到１１月２８—２９日毁坏孔林期间１００，０００多强有力的在曲阜参与暴力的老百姓，这些人成了毛政权在毁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集体财产时的忠实工具。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比起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间的反孔运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两次运动尽管有明显相似之处，但是也有明显的各自的特点。例如，许多反孔标语和口号在第一次反孔运动期间就冒出来了，他们也广泛地用于第二次运动，例如：攻击孔子鼓吹人道观和仁爱运动。两次运动都由毛和他的亲信们发动，两次运动都是毛利用反孔来攻击并扫除政治对手的例子。在许多方面，１９６６—６７年的反孔运动有助于铺平了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之路。在另一方面，这两次运动在许多方法上非常不同。第一次运动造成了更多物体的灾害，而第二次运动则更广发深入，并涉及到了讨论和中国的第一任皇帝—秦始皇。第一场运动对大众来说更容易理解，而第二场运动在全国引起了新的混乱，几乎导致了另一轮全国范围的派别战斗和骚乱。当然毛的政府马上采取行动，终止了这些运动。文革期间的反孔运动的结果是严重的。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例如道德缺陷、精神腐败、金钱至上，笑贫不笑娼等等，这些问题至少部分上可追溯到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破坏，尤其是过去五十年中特别在文革期间，学校的传统道德教育被破坏殆尽了。

然而，儒家学说一直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民的意识里，不可能完全根除。事实

上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中他重新开始受人尊敬，甚至政府领导都在提倡传统的传统的儒家“以人为本”的“仁政”。有趣的是：现在他们在参考借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了。人们又一次次地蜂拥而至曲阜去拜见孔大师——“四旧”已经无可阻挡地回来了。中国人在重新提倡温良恭谨让。中国的第一任皇帝又被评价成暴君，暴力革命已成为了一个被批判的辞汇。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极“左”思想已被新的“三个代表”的理论所替代，甚至剥削阶级的成员也被鼓励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中来。成为“小资本家”便可得到千万人的羡慕，而成为贫穷的无产者则被人讥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场噩梦，反孔运动也不只是噩梦中的一部分，早已经鲜为人知……然而，中国人民仍有责任来把１９６６—６７年毁灭性的反孔运动的根源反映出来，努力防止它的再次发生。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不是偶然也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民主政府也是如此，文革期间的反孔运动是一种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缺少一些重要的能防止它发生这类事的因素，即民主体制，法规，权力的检查和平衡，公民的权利等等。离开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五十多年后，又突然要回到孔子和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毫无疑问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注释：

１．本文初稿为英文。此稿为中国温州经济学院蔡碧霞教授翻译为中文

２．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３．Fairbank, john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４．Yang, jian-li ed. Red revolution and black rebellion. Pleasant hill, ca: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1997.
５．《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革命文库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
７．Song, yongyi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volume 29 《讨孔战报》，１９６６－１９６７。reprint,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

——“毛泽东热”透视

陈小雅

当代“毛泽东热”，是在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下，由民间自发兴起的一股文化热潮。这股热潮有什么特点？它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方？它有什么象征意义，又行使着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功能？本文将从已有的资料出发，通过对毛泽东形象由真人到“品牌化”，再到“神化”，再由“神化”退化到“品牌化”，进而还原为其本人的历史脉络的分析，对当代毛热的性质与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

◇　上篇　历史上的真假“毛泽东崇拜”

在中国大陆，由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编撰的经典文献中，关于最近发生的“毛热”及其历史，曾有过这样一个描述：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毛泽东热’，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热’、建国初期的‘毛泽东热’、动乱时代的‘毛泽东热’和拨乱反正岁月的‘毛泽东热’。而最近一次出现的‘毛泽东热’则是从１９８８年下半年开始。这次‘毛泽东热’同以前几次有所不同，它是自发出现的，并且很快风糜全国，波及社会各阶层……”〔１〕

大体来说，这个分期法是以一定的事实为根据的。但细究起来，不同时期毛热的内容、形式和内在驱动力，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概括起来，这些差别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延安时期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其目的是打出中共的“品牌”人物；
（二）建国初期的毛热，可以分为民间和中共高层两个层次，民间的毛热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活动；在高层，却存在明显的“赎买”动机；
（三）文革的毛热，是毛泽东由“品牌人”走向“神”的过程，究其内在发动原因来说，既有毛泽东及其同党的阴谋元素，也有党群矛盾及社会压抑的借题发挥；
（四）最近这波发自民间的毛热，表达的是位于社会下层的人民大众对于现实的喜怒哀乐。

一、延安整风的“人谋”与毛的“品牌化”

首先，延安整风中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而这个“人谋”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毛泽东个人谋求夺取党内理论霸权，建立自己的“主义”，趁德寇兵临莫斯科城下之际，伺机自立门户，与斯大林比肩。

其二，是中共为夺取国家政权，赢得未来国共内战的军事胜利，整合党军势力，使毛泽东形象“品牌化”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这次所谓的“毛热”，主要以党内思想理论界为运力场所，其结局，则是毛的各个时期的“政敌”向毛输诚。

众所周知，毛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第一个无可争议的身份，是中共党的“创始人”。这个身份，是由于１９２１年７月参加了中共一大——这个事实所奠定的。只不过由于这些“创始人”后来都弃党、脱党和叛党，或被党打成各色“机会主义”分子，毛成了硕果仅存的人物。

在中共权力的阶梯上，毛跻身“领导人”的行列，始于１９２３年的中共“三大”。在这次会议上，他因赞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２〕，取代了张国焘的位置，“当选”为中央五委员之一，以后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和组织部长。这是毛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担任显要职务。此时的毛，仅以“文名”达于国共两党之间。

在１９２７年的中国统一战争中，这位“国共合作”战略的支持者，因领导权争夺失败，拥工农武装之力，割据一方，成为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创始人。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周旋中，因显示出高超的军事谋略，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在党内的军事领导权。此时的毛，除“文名”之外，也具有了一定的“武名”。

中共移都延安后，毛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在党内的政治核心地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还展开了一场争夺思想“制空权”的斗争，其间一度萌发了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梦想。

细究毛泽东的这一愿望，自然和其青年时代对“圣王”的理想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但他性格中“逆我者亡”的魔鬼，使他不可能通过正常手段达到这一目标。早在１９２８年，那位共产国际的宠儿王明，就针对毛泽东的实践说过：“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３〕之后，周恩来又当面向毛泽东谈到，张闻天是党的头号“理论家”，据称，毛终于沉不住气，反唇相讥道：“什么理论家，不过是从苏联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但是，当时毛知道，如果真刀真枪地比拼，就凭自己那点家底，要问鼎这第一把交椅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压抑了自己的愤怒和欲望，直到军事、政治大权到手以后，才开始借权势在这个领域大举反攻。在延安整风的一次讲话中，他终于一泄这口在胸中憋闷了多年的鸟气，对那些啃洋面包的理论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说：教条这个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连狗屎都不如。人屎可以给狗吃，狗屎可以肥田，而教条既不可以给狗吃，也不能够肥田……这种充满流氓气的生动语言，使那些被长篇大论的理论报告催得昏昏欲睡的流氓无产者军人心花怒放！

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说：毛泽东经营“理论家”的名号，多得力于一帮文人密友，其中几位，如陈伯达、和培源甚至就是他的秘书。从１９４０年始，这帮人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

上发表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

据王明说，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与他商量，如果自己要创立“主义”，王明是否可出让“统一战线”思想的发明权？而他在此期间大批量出笼的着作表明，他不仅收入了王明的专利，而且把由谢和庚〔４〕提出的“持久战”思想，陶铸、曾志总结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经验”，〔５〕周文、胡绩伟等实践的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思想，统统据为己有。后因苏德战场形势逆转，中共在国际战略地位中对苏联依赖的重新加强，他不得不暂时卷起了“毛主义”的旗号。〔６〕但通过“整风学习”之精神折磨，外加“抢救运动”的皮肉拷问之威慑，他确定无疑地夺得了在中共党内思想指导的地位。这个“山沟沟”里出来的人，被塑造成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而通过这个“政教合一”的“极权化”过程，在这个微型小朝廷中，毛泽东第一次实现了早年向往的“君师一体”夙愿。

１９４２年2月8日，延安举行了“毛泽东日”活动，有一千多群众倾听了毛新民学会时代的战友所作“毛泽东生平”的报告。随着整风运动的所向披靡和抗战形势逆转的时不我待，历史上与毛曾有过矛盾的朱德、陈毅、彭德怀、张闻天、博古、王明均先后表态输诚。〔７〕

何方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中说，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溯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打破了１９４０年以前，中共一直保持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有计划地掀起学习毛泽东的运动。

（二）通过编纂党史文献，篡改历史，树立毛“一贯正确”的形象。

（三）以活人正式命名思想或理论体系。

（四）对毛山呼万岁、人民大救星、红太阳等封建迷信行为，开始流行全党全国。

（五）开始了中共党内的衡量正确与错误“以人划线”的恶例。

（六）制定出违反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则。

（七）开始了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甚至反革命的恶例。

经过延安整风，作风武断、行事专横的毛，被塑造成“服从组织纪律”的典范；性格桀骜不驯、骄横跋扈的毛，被塑造成“谦虚和戒骄的模范”；在权力和个人理想面前向来轻视人的生命，漠视群众疾苦的毛，也变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和“倾听群众呼声”的模范；原来被群众诅咒应“被雷公劈死”的毛，成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就连被毛泽东当作重点打击对象的张闻天，也为自己参与塑造的这个“品牌”所折服，他宣称：

“毛泽东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 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８〕

在多年以后的庐山会议上，也就是他再次被毛列为假想敌，行将打倒之时，张闻

天坦白了当时的原因："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

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催生下，１９４５年，毛泽东思想被中共"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被毛称为"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对毛本人"歌颂的大会"和毛的政敌们的"检讨的大会"。依靠与毛的结盟窜升到党内第二把交椅的刘少奇，在新党章修改报告中还留下了一段"经典"的言论：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此后，这类言论不仅在中共党内司空见惯，还为林彪接过去，作为"造神运动"和文革击败刘少奇的凭据。

二、《雪》热：赢得与老蒋争锋〔９〕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致柳亚子一信，送上自己手书的《沁园春》咏雪旧作一阕，〔１０〕词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１１月１４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刊出毛泽东这首词和柳亚子步原韵所填的答词。柳词曰：

念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醉，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痛无双国士，绝代妖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可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意浓情细细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不久，重庆《大公报》也转载了两首词。同时，发表了王芸生的抨击性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对毛泽东的历史观进行批驳。随即，在国民党主办的《扫

荡报》首先刊出了署名易君左的一阕步毛泽东《雪》原韵的《沁园春》和作：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益高？神明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黄金难储阿娇，住冶态妖容学折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该词将毛泽东比作杀吏的黄巢，坑兵的白起，谴责其因“一念之差”断送了国家的统一，将大好河山付断叶飘蓬。同时，讥讽毛借乱世窃国，学曹操金屋藏娇；感叹国家不幸，诗人乃兴；更痛心中国，在好不容易迎来抗战胜利之际，又要面临自相残杀的内战！——由此，将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下的道义之争，引入了文学领域。此后，以《沁园春》为表达形式，各地文人不论左中右派，围绕战争与和平、统一与分裂、民主与专制、正统与邪门等焦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单是重庆一地，就有十余种报刊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与评论文章。据称，这场《雪》热，甚至越出了文化圈，引起了服务行业的注意。成都某酒店老板，适时挂出了“沁园春”的招牌，并在店壁上书写《沁园春》百阕，一时传为佳话。

随着国民党政府由陪都归朝，这股“《雪》热”也顺流而下，扩展到南京、上海。其中，著名文豪郭沫若，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一连步毛的原韵发表两首《沁园春》词。其一曰：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叹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遍野哀鸣，排空鸣鹏，海洋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鲜苛娆。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

在词中，词人公开指责美国仗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装扮成善意的和平使者，实际上以飞机大炮支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摧残民生的恶政。在第二首词中，他进一步驳斥了正统历史的观点，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是“朽木不可雕”的境遇：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道红船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嗟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１９４６年2月9日，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更是在 “《雪》热”中引进了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话题。中共从延安派往重庆慰问受伤人士的黄齐生，在沈钧儒住所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出示了一首自己步毛《雪》原韵《沁园春》词，传供众览。黄词云：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兮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只解妖娆。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狗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骄。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分嬗父，走马来朝。

词人将蒋介石比作黄袍加身的宋太祖，隐射其从孙中山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国民党权柄，挂民主的羊头，卖专制的狗肉，实行特务政治，并诅咒其必遭天谴……

自１９２７年国共反目以来，双方一直在军事领域较量。要不是国家内战，日寇入侵，中共早已命断山野。对此，毛泽东亦不讳言，是日本人救了自己的命。但到了１９４５年，国共双方的战争，已经不限于军事领域，或者说，更重要的战场已经不在军事领域，而在政治领域，这时，文化战线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战场。文人出身的毛泽东深知，所谓的政治战争，除了权术与技巧的争斗外，实际上是一个道义之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谁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谁就将在政治的战场上操赢家之左券。而所谓道义，其实就掌握在文人的手里。而在这个领域，拥有大知识份子支持的国民党，一直是轻视小知识份子为领袖的共产党的。所以，在此之前，国统区民众接触的，都是种种红军与毛泽东与“匪”相连的印象，如：说毛是一个“无知的农民”，一个半死的“痨病鬼”，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１１〕有谣传甚至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曾在茅台酒池里洗脚，在老乡的腌菜坛子里拉屎……而毛泽东《沁园春．雪》的问世，不啻是中共在文化战线的一支奇兵。经过这场“《雪》热”，国统区的人们在对毛的文才发出惊叹之时，更倾倒于其“博大的胸襟和宏伟的气魄”。于是，有人从这场风雅论战的高下，断言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的胜败，认为，就个人魅力而言，毛远胜于蒋。在儒道情结严重者看来，毛已经具备了“圣王一体”的“理想人格”!

据称，１９４５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出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１２〕

三、倾心与赎买：“红太阳”高处不胜寒

１９４９年中共建国。久经战乱、渴望和平的中国人，忘记了毛对１９２７年以来中国内战和日寇深入中华内地的首要责任，〔１３〕把和平的到来归功于毛泽东；在国民党专制下解放出来的文化人，尚没有机会了解毛泽东的统治手段，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毛泽东；翻身的工农不了解毛泽东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底牌，期待许诺中天堂般的共产主义早日降临……总之，天真的中国人误以为，通过“恶”，最终可以达到“善”，而毛，就是这个“善”的代表。于是，他们用毛的象征物覆盖了地球的四分之一表面；陕北民歌《东方红》成了第二国歌；毛泽东的——经过“品牌化”处理的——故事，被写进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于是，从那个时候出生的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文化思想专政条件下——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系列的品牌……

在五湖四海的山呼万岁声中，毛象所有喜欢在胜利面前玩弄“宿命论”的矫情的帝王一样，用一位算命先生的预言〔１４〕命名了中南海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他还像家中游戏似的，用自己的年龄规定了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礼炮声为“二十八双响”。〔１５〕据说，他还在这次会议的口号清单上，亲自写下了“毛主席万岁！”

然而，那些与他厮混打磨了二十八个春秋的党的高层人士，对这个有着“极权”倾向的“巨灵”并没有放松警惕。早在进入北京之前，１９４９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至迟在１９５３年，随着毛泽东的精

神病症的日益显露，〔１６〕一个“虚君共和”的不成文设想，已经在高层领导中形成。作为一种舆论准备，关于毛退休的问题，甚至被安排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讨论。〔１７〕１９５６年4月，借助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形势，中共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

“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影响的时候，就反转过来而影响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它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１８〕

作为对毛权力的一种赎买手段，八大通过的党章特地为他的退休增加了一个条款：“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作为一种赎买手段，还包括默许毛——当然是在警卫部队的严密监控下——搞女人。〔１９〕而作为一种约束，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强迫毛泽东穿上了一套公众道德楷模的“紧身衣”：他成了一个热爱劳动的孝子，一个仗义疏财的侠客，一个对妻子怀有深情的模范丈夫，一个虚怀若谷的君子，一个礼贤下士的圣王，一个百战百胜的天才，一个人民的儿子，一个民主的斗士，一个民族的英雄，……总之，是一个中华民族美德的化身！

此后，中国人所接触到的毛泽东形象，均是接受过“品牌化”处理的毛像。

对此，毛泽东也曾有暗示：

“国外有一种舞会，参加者都戴着个假面跳舞。我看他们不仅在舞会上跳，在家里，在社会上，也还是戴着假面跳。由于人家都跳，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观者习惯，跳者自然，谁都见怪不怪了。”“建立家庭都将将就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凑合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要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２０〕

四、文革，把毛泽东送上“神坛”

发生在文革时期的毛热，是毛亲自部署的党内斗争新战略催生的结果。〔２１〕其借重资源，则是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凭藉两次“反右”斗争——形成的极左青年知识份子队伍；其战略确定，则始于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

首先，在１９５８年夏，是康生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说法。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他又说：“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口号是不确切的。它没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人是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１９６０年，康生又把毛泽东思想称为马列主义的“最高最后的标准”。〔２

２〕林彪主政军委以后，也开始按照康生的口径，以大学毛著运动抵制军队“正规化”的呼声。在１９６２年中共党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吹捧毛的论调，还治刘少奇之身，宣示在政治上倒向毛的一边。１９６４年，他又在军内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了发挥毛思想精神原子弹的作用，继林彪在部队大学毛著的运动之后，贺龙把这个运动引进了体育界，从此，“学习毛泽东”的热潮进一步推向社会，推向全国。

文革开始后，在林彪“５１８” 讲话，以及周恩来、陈伯达等一系列讲话的煽动下，全国刮起了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除毛泽东本人和“黑七类”〔２３〕外，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佩戴毛像章，连外国友人也不能免俗。昔日以收藏、交换糖纸、剪纸、邮票、钱币为乐事的人们，此时以交换、收藏、赠送毛像章为乐事。其中，以叶群收藏的，由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一万枚像章为最。各地还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据陈小文的《文革词典》介绍，这股“像章热”，在１９６７年春至１９６９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期间演为高潮。在这前后五年的时间里，各地各单位制作出的各类毛像章约达一万种。有材料显示：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全国有两万多家工厂企业生产各种毛像章、语录章八十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胶六千吨以上。……其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二十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胶、有机玻璃、陶瓷、萤光（夜光）等二十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两枚一套“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一亿枚。

在当时的风气下，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都要制作、赠送毛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的格局，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２４〕

同时，《毛主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像基督徒必备的《圣经》一样，几乎人手一册。出门在外，人手必执“语录牌”；开口唱歌，必是“语录歌”和称颂毛的歌曲；作为男女老少咸宜的日常文体活动，人们到处跳起了“忠字舞”；毛的石膏塑像遍布各地，或供上神龛，或矗立街头，风餐露宿，据说连毛自己看了都觉辛酸……同样是模仿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有一段时间内，人们每日必须对毛像作“早请示、晚汇报”；受到批评的人，都必须向毛“请罪”；“向毛主席保证”变成了宣示信用的誓言；深情怀念毛的歌曲，代替了女青年的情歌……

在个人崇拜最狂热的时候，也是人们神经绷得最紧的时候，有的人往往因为错呼一句口号，无意中说错一句话，或者打碎一尊石膏像，扔掉带有毛头像的报纸，写错一个字，或被发现在污染字纸的地方（甚至背面）有毛的名字，就有可能遭到审查、批斗、逮捕、监禁，甚至“七斤半”落地……

毛泽东被千遍万遍地祝福“万寿无疆”过后，终于在１９７６年他行将满八十三岁的时候去世。全中国如丧考妣。在我所在的单位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当台上的发言人说到要继承毛的遗志，做党的优秀女儿时，会场上先后有两名女士“嘣咚”倒地，

被抬将出去……

从那时开始，我便怀疑：这种“热爱”和“痛苦”，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五、“毛泽东崇拜”的五种类型

毋庸否认的是，在中国，毛泽东无论作为帝王，还是作为解放者，他一直是工农大众阶级的代表。其中原因，我在《中国“牛仔”》一书中已经谈到。同时，他也是部分中小知识份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崇拜的对象：

在毛泽东的身上，确实有着浓重的“克利斯马气质”。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他的诗词中。诗品专家章立凡发现，毛泽东喜用夸张笔法，大规模数量的“人口”，经常被他的笔尖随意点来，成为呼风唤雨、抒发豪情的油彩。〔２５〕毛泽东的游戏，也颇不“俗气”，他喜欢玩弄政治，玩弄权术，玩弄人，玩弄人口；更喜欢直接面对人民大众，并有能力直接驾御这头“洪水猛兽”。他的“蔑视权威”的气概，很能迎合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好。从维护“小人物”的“权利”，到“鼓六亿人的劲”；从废除“师道尊严”、砸烂规章制度，到摧毁等级特权，包括学校停课和免除考试，都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年龄层中大受欢迎。

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２６〕

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害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

毛泽东的这些充满“牛仔”气概的讲话，使当时代多少“６０分万岁”的青年人心花怒放！毛泽东，简直是“自由之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烂熟的西方文明社会中，他也是青年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其行为有的还为“后工业社会”理论——反智主义——提供了依据。……

他反感现代国家“官僚科层制”的烦琐程式，更反感它们日益脱离群众的倾向。在文革中，他点名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确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文化、卫生和商品供应状况。在把那各级干部整得五痨七伤之后，他的要求似乎也很浅显：

“我只要求你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２７〕

但在这同时，却把城市生活几乎变成一片“荒漠”。他在鼓励工农兵上大学，尝试把农民变成科学家和诗人的时候，却废除了几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大脑，使其不能实施“价值判断功能”，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行“认识功能”。他在给乡村小学教师写信，给知识青年写信，批评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审讯犯人”的同时，却以革命的名义

掩蔽了更残酷的暴行，容忍着更大的社会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过土改、镇反、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最大的“人权欠债”运动。

因此，大体可以看出，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代表“反现代化”思路一致，在文化上的“反智主义”一致，他基本上代表的是这样一部分人民群众：

（１）在政治位势上，是处于社会底层；
（２）在智识上，处于中、小知识份子程度；
（３）在组织状态上，处于被整合程度较低的社群；
（４）在年龄上，处于较轻阶段的广大基层社会群众。

这一部分人群的特点是：

（１）他们是被封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而绝非“被统治”、“被团结”和“被专政”的阶级一分子；
（２）他们或因对“主人公”地位，对“自由”、“平等”概念抱有浪漫的期待；
（３）他们或因对“大工业”的现代社会缺乏心理准备；
（４）他们或因制度原因和各种际遇与先天因素，处于被压抑状态；
（5）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大救星”；是赠送“奇迹”的“圣诞老人”，是他们的宗教偶像……一句话，毛泽东是他们的“精神鸦片”!
（6）在这种“精神鸦片”的作用下，他们习惯了“依赖”别人的思考，依赖“大锅饭”的保障，不在意精神是否自由，或者被别人洗脑。〔２８〕

因此，细究文革中的“毛泽东崇拜”，当然存在各个方面的复杂原因，但简括而言，至少有五大种类：

其一，被迷惑、被欺骗。这其中有两类人：一类是芸芸众生，包括工农大众、军人、国家干部和普通党员乃至党的高级干部在内的大部分人，他们是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部门产品——“品牌毛”的直接、定点和基本受众。他们之沦为被迷惑和被欺骗的原理，大体在于单纯、天真和愚昧，有的甚至是对于权势的恐惧的转换。另一类是与毛有亲自接触者，他们可称作被毛泽东“魅力”击倒的人。心理学研究显示，一个人的所谓“魅力”，主要是由这个人的行为的“格式塔”造成的错觉。比如，一条圆弧和一条抛物线有什么不同？用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们“力的结构与样式”不同。来自圆形的弧线显得僵硬；来自抛物线的曲线显得柔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因为圆形具有不变的曲率，它的圆形轨迹上的所有点，离中心点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而抛物线的曲率是变化的。具有不同“格式塔”的人，就如同具有不同“曲率”的线条一样，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简洁完美的“格式塔”给人舒服的感受，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很透明，容易相处，容易赢得周围的信任感，但这类人也很可能因为缺乏丰富性和刺激力，令人感到乏味。而具有复杂曲率的“格式塔”的人，令人不安、紧张和不愉快；但也会因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诱发人的进取心、探索欲和追求的内在张力。其中蕴含的自然状态、丰富的情感与强大的生命冲击力，即世人所称“魅力”。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的人格，是藏在闪烁的目标，曲折的战略，圆滑的托词，跳宕的语言，奇诡的想像背后的。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干什么，是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且喜怒哀乐无常，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便使很多人，在初次接

触后，便被其迷惑或征服。

其二，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毛偶像的利用。这种利用，不一定是出于真心热爱和崇拜，而是理性地知道，它是当时最有效、最权威、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在自身面临危险时，它是一种“护身符”；在派性的斗争中，它是战略上的“制高点”……在各种利害关系驱动下，对偶像的忠心表白，或表白的攀比——如最后将毛像章别在自己的皮肉上，均带有“六经注我”的性质。

其三，集体无意识。在研究公众的毛崇拜现象中的“非理性”成分时，与一位心理学家的讨论颇具启发意义。她的话，可以解释我们周遭的许多同类而不同质的社会现象：

在民主社会，人们的感觉也同样被媒体和好莱坞所操控。当你看到越是难看的女人，就越是爱显露自己的肉体时；你不应嘲笑她们没有头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人们的意识、感觉都是后天从社会上学得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受潜意识和无意识操控的。

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下面的现象：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时，年轻人狂热的景象。网上有一段录像，是美国歌星麦当娜在演唱时突然“性奋”，一把撕下自己的乳罩，对着她的歌迷们摇啊摇。那些男性歌迷们也激动地一把扯下自已的短裤，对着麦当娜摇啊摇！这二个景象是专制式“集体性高潮”（受集体无意识操控）与民主式“集体性高潮”的经典代表。

她认为，崔建的歌曲，最好地表达了大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一块红布》，形象地描述了我们的感觉是如何被人操控的。人类的制度可以转变，文明可以进步，但人类的“集体性高潮”的表达方式虽然改变，但却不能被消灭。这是因为“集体无意识”的被操控方式和表达方式可以不断地变化。

作为一种思考练习，我认为，这大概与青春期的性压抑和性苦闷的变态反映有关，举凡中世纪的火烧“女巫”，纳粹的“排犹风潮”，以及文革中的集体暴行，均属此类。在物理学中，大概还可以用“场”和“共振”的原理来解释。

其四，确有极少数（一般是自命不凡者）真诚地崇拜过（或崇拜着）毛泽东，但不是“品牌毛”，而是那个有着毛的活生生灵魂的“牛仔”。他们崇拜毛的“狂气”——是那种蔑视自然、藐视上帝、君临天下，动辄以大地为棋盘，以“一万年”为视野，自视有资格“为民立极”的狂气；他们崇拜毛的“傲气”——是那种三千年文明一言以蔽之，敢以数亿人的生命为赌博筹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旦被披了逆鳞，就要“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傲气；他们还崇拜毛的“痞气”——是那种“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上去滚一滚”，在游泳池光着身子敢接见世界超级大国元首，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流氓气……总之，他们为毛的野心、气概、思维方式、帝王权术所倾倒，为芸芸众生向他的“折腰”所倾倒，为他的不惧神灵、不信来世、不怕被后人挖坟掘墓、暴骨扬灰的、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所倾倒。但却对毛的“政绩”，忽略不计！

——这后一种人，是真正的毛泽东崇拜者。

◇　下篇　当代“毛泽东热”透视

在当代“毛泽东热”发生之前，中国曾经历过一个“非毛化”过程。而所谓的“非毛化”，其实就是毛泽东“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过程。

一、中国的“非毛化”时代

毛泽东的“去神化”过程，是从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毛皇帝新衣的裁缝的逃跑——开始的。经此一役，毛泽东九死一生，已经神光蜕尽。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是毛泽东“去品牌化”的开始。经此一役，他身上的那件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多年制作和维护的“紧身衣”脱落。在皮肉乍现之际，毛的灵魂已先于肉体飞升而去。１９７８年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和次年1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以及同时在社会上发生的“民主墙”、民刊运动，开始了在中共党内及全国肃清毛的影响的进程。

作为该时代“捣毁圣像运动”的象征性行为，诗人黄翔一行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在北京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前刷下了一百多页的大字报，在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火神交响诗》后，领呼了“现代皇权应不应该打倒”“应该!”“精神长城应不应该撤除？”“应该!”的口号。自知“闯下大祸”以后，四条汉子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来到天安门广场，朝着毛像撒了泡尿。１１月２４日中午，他们又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刷下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２９〕

通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无可逆转的推进，“品牌毛”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败北，而且几乎被事实所摧垮。当时，杭州的一家大学生刊物上的一句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潮状况：“偶像纷落中，纷落也成了偶像”……

１９８１年，文革中提升至厅局级的韶山特区被撤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乡；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同居地清水塘——原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挂起了“长沙市博物馆”的招牌；〔３０〕各地红彤彤的标语牌，被五花八门的广告所取代。

１９８２年，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被改为“革命领袖纪念堂”，除毛泽东遗体和展室外，那里增设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生平展室。到１９８８年毛泽东９５岁诞辰之际，这里第一次举行了一个著名书画家展览。到场参观的只有华国锋、汪东兴和几名不在位老人，及毛身边工作人员。在毛的亲属中，李敏全家没有前往，李讷全家与瞻仰的观众一同进入〔３１〕……这些活动及有关宣传，不是被官方有意控制在谨慎低调的水平上，而是真正引不起多少人的兴趣。

１９８９年5月２３日中午，湖南浏阳三名青年〔３２〕用颜料涂污了天安门上的毛像，并在天安门洞内贴出大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到此为止，在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毛的思想和理论建构社会的地盘，仅剩下一个只有三万二千人口的南街村。〔３３〕人们清楚地感觉到，“神化毛”已悄悄退出公众的社会生活。“品牌毛”的利用价值，已经所剩无几。

但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品牌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得到了部分修复：

其一，权力到手的邓小平无心恋战。１９７９年的邓小平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一是党内集中在华国锋、汪东兴旗下的“毛派余党＋非邓同盟”的压力；其二，是来自社会上民主运动的压力。前者的压力不仅表现在当时由周恩来旧部熊复掌管的《红旗》杂志拒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还表现在邓积极促成的“理论务虚会”期间发生的一桩“恶攻”案。〔３４〕后者集中表现为魏京生公开写出《第五个现代化》和《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章尖锐批判了毛的独裁统治，并向邓敲响了警钟。为此，邓采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议，一方面赎买了党内“非邓同盟”，另一方面“杀鸡儆猴”，镇压了民主墙和全国的民刊运动。对此，１９８１年１０月，邓小平在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中曾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明：

意见不同的，主要是关于毛的功过，毛泽东思想如何估价，很重要。警卫师说了一下（读了意大利人谈话〔３５〕），干部战士都同意。部队各组接受估价。决议如军队不赞成，是个问题。如估价不当，老工人、贫下中农通不过，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旗子丢不得，如丢了，实际否定党的历史。我党还是一个光辉的历史。解放后工作中犯了很大错误、文革，……讨论中反复强调写毛的个人品质，值得慎重考虑。绝对不能把毛本人写过头了。写过了，也就是为党和国家抹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要坚持。去年所说西单墙，有一些人写大字报，只在提出四个坚持后，得到多数干部群众拥护，才把局势稳定。如决议搞得不妥，对稳定不利。

讨论中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大跃进、文革不但比斯大林严重，而且比任何剥削国家严重。如这样说，就会说不如勃列日涅夫、不如蒋介石。这个问题很大。对毛评价，不是个人问题，与党和国家分不开。要看到全局。……要引起我们考虑。已经讲过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外国朋友说要“非常恰当”。……

为了自圆其说，邓给毛思想作出了新的注解：毛思想不是属于毛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党的集体的，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思想。这就一方面修补了已经脱落的“品牌毛”形象，赢得了“非邓同盟”的谅解，另一方面也把毛思想的解释权从“毛派余党”手中拿了过来。这就是后人所说，邓与这个党，与“品牌毛”有共同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实依据。但从这些内容看来，邓对毛品牌的去留考虑，主要不是出于对于这个品牌的倾心，而是担心自己的权力不稳，统治基础不牢，以及对其在有生之年实现改革事业的干扰。因而，更多的是出于对于现实政治的利害权衡，所作出的策略性考虑。

对于这种状况，当年曾因此被推入监狱，坐牢十八年的魏京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有过一个评价：

亚衣：在文章中您对毛泽东独裁统治的批评非常直接和尖锐，提出“民主运动的目的”就是在否定毛泽东独裁专制的前提下推行社会变革，这就远远超过了文革后官方的“拨乱反正”对毛泽东羞羞答答的否定。我想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是否缺少一个类似前苏联非斯大林时期的“非毛时期”？

魏京生：实际上中国也有这样一个时期，只是与苏联不一样。邓小平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不砍倒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基本上放弃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和国家管理方面的路线。他之所以不放弃毛泽东旗帜的原因，是为了继续维持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对人民的政治压迫。邓小平很精明，两面手法作得很好，中国也有“非毛时代”，这就是邓小平时代。〔３６〕

其二，由于上述原因，加之国内研究机构、媒体的被垄断，思想文化界将“品牌毛”还原为“真人毛”的基础工作进展缓慢。在此期间，虽然有许多出版物已经按捺不住内在的冲动，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其中包括毛思想的研究著作、官方毛传和年谱、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但这种愿望受到了来自审稿制度的明显压抑，我们——企图寻找真相的人们——只能从字里行间去发掘其破绽。而大部分“看热闹”的人群，只能加深对“品牌毛”的印象。

这些，就是当代“毛泽东热”得以发生的大背景。

二、当代“毛泽东热”概述

当代“毛泽东热”，与历史上的毛热的不同之点在于，它是由民间自发兴起的。作为改革开放年代许多类似热潮的一个，在它的前面，有“邓丽君热”、“留学热”、“文化热”、“经商热”；与之同步或稍后的，有“琼瑶热”、“金庸热”、“气功热”、“武侠热”、“帝王戏热”、“炒股热”、“香港回归热”“奥运热”……直至最近以前发生的“超女热”和当前的“韩国片热”。就笔者个人的观察体验而言，与上述各种热潮相比，毛热干预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程度，不是更深更广，而是要小得多。

到目前为止，关于当代“毛热”的发生的时间，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１９８８年下半年。但据笔者的接触，它的萌发却早在这年的年初——在率先偿到改革甜头的中国南海之滨的羊城，公共汽车司机们的驾驶室里，悬挂吉祥物的地方出现了毛泽东像牌。也有人发现，这次“毛热”的另一个来源，表现在出版界。在当年热卖的毛泽东画像中，至少有一种版本是出自１９８７年的河南中原出版社。也许是这些风吹草动，使出版界人士预感到当年毛诞将出现的市场，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就不断有以毛为话题的新书上市，到当年底，已推出四十种以上品种。其内容广涉毛的思想研究、生平传记、轶闻趣事、日常生活、感情世界，以及斗争艺术、人生艺术、毛的书信、诗词、墨迹、毛的诗词颂歌专辑盒带等，发行量总计超过４５０万册（盒）。〔３７〕

据陈小文的《文革词典》介绍，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毛泽东像章热也重新回潮，成了一种有收藏价值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被搜集起来，甚至还有赝品被制造出来　，出售给外国旅游者；各地都有某某搜集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家的事迹、设立家庭毛泽东像章展览的消息，被陆续报导出来，甚至还出版了不止一种的毛泽东像章图册和专著。据旅居美国的桑晔９０年代初的报导，他个人收藏的像章就达７０００余种。在中国

大陆的四川、贵州、上海、陕西、北京、广东、江苏、江西，都出现了毛像章的收藏家。据上海市毛像章研究会主办的《收藏通讯》介绍：两组２０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１０００元；一组３０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一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毛像章系列，直径从８厘米到１８厘米，全套市场价达４０００元以上。〔３８〕

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亲密化，大陆的这股毛热，甚至刮到了台湾。２００５年９月香港《成报》一篇题为《台版〈毛主席语录〉卖断市》的报导称：最近在台湾的书店中，出现一本３００多页的繁体字版新书《毛泽东语录》，吸引不少读者买来一看究竟。由于隔年是毛逝世３０周年，这本书正掀起台湾另一波阅读话题。香港《明报》另一篇报导称：《毛主席语录》繁体字版首次在台湾正式出售，且一上架就掀起热潮，加上香港、新加坡亦反应热烈，出版商东观国际文化有限公司为因应市场需求已加印两次。据读者说，他们学习毛著，着眼点在于“知己知彼”——为了应付与大陆的商战。

在整个社会的“毛热”推动下。学术界的“毛热”也不断升温。除撰写专著外，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创办了研究毛思想的专业刊物在四种以上，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全国范围的毛思想研究会。到了胡温时代，随着民间“博客热”的兴起，还出现了不少纪念毛泽东的网站。有人再次提出了设立“毛泽东日”的倡议。

在普通民众中，“毛热”表现并未达到成瘾、成癖的非理性程度。他们的“热”表现为一种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如购买与阅读有关毛生平的书刊、毛画像及佩戴毛的纪念像章；或者到毛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瞻仰遗迹、遗物，或者到专题网站上一逞口舌之快……。

１９８９年的《海南纪实》，曾对当时的状况有过近距离观察，作者张京明记说：

当毛主席的老邻居汤瑞仁西装革履、当上“毛家饭店”老板的时候，她没有料到，毛主席竟又会悄悄“潜返人间”。

湖南省隆回县城，“群乐服装门市部”新添的白色横幅上写着八个红色的大字：“毛爷爷像章大展销”，再下面是两串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磁质的、钢质的、铝合金的，规格不一，品种齐全。低的每枚卖价２元，高的竟达２５元。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以中青年居多，渐渐“传染”了中小学生，也有极少数老年人不甘寂寞，赶此时髦。

成都市一居民王安廷几十年来收集了１３８７６枚毛泽东像章，几乎囊括了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军兵种所制的产品，据说这当中大多是他在外做木工时不要工钱而索取的“报酬”。经有关单位批准，今年初〔３９〕他在家中举办了一个家庭“小展览”，有人参观后愿出６万元购买展品，被断然拒绝。王安廷还收集了大量古钱币和邮票，他常常用来与别人交换毛泽东像章，而像章却决不舍得换出来。

也许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在街上流行像章前，种种迹象就出现在农村的一些

地方。农民们习惯将毛主席的标准像放在神龛内，每逢节日总要奉上供品。结婚、建房时要贴毛主席像，据说是可以消灾、填堂、冲喜。有的地方甚至还建起了毛泽东庙。

发生在城市的故事，则剔除了农村的那一层传统文化的色彩。

在邵阳市的中巴上，年方二十的售票姑娘深蓝色的西服上缀着一枚小巧的白底浅灰色像章。我购票时笑着问道："戴这个干吗？"
"好看啊，好耍啊!"她回答得很快活。

近年来，社会上曾流行过戴十字架、戴胸花、戴体育纪念章等等，时髦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人生乐趣，并无政治色彩。以戴像章为时髦的，有不少是中小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只是听大人说过，电视里看过。他们天真烂漫，满脸稚气，不仅不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反而认为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免费旅游好玩得很等等。如今，见到别人戴像章，　自己也就千方百计去搞一个戴上，甚至还进行像章比赛，看谁的像章大，色彩艳丽，从中得到莫大乐趣。

然而，仅仅用时髦二字是难以概括这股潜流的。

阵阵哀乐从副食品公司内飘到大街上，黑框照片上，豆蔻年华的姑娘抛却了尘世烦恼后永远地微笑着，她曾经历了许多她这个年龄本不该经历的事情，学财会专业的她被分配到商店当了售货员，好不容易有一天经理当众答应调她到公司当会计，不料，到了最后，接到调令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要是毛主席在，他们敢!"在她的灵柩前，有人指着胸前的毛主席像气愤地说。

令人惊奇的是，在邵阳市委招待所服务台，一幅毛主席像覆盖了原来的迎客松。旁边的对联上端正地写着："旭日东升山河秀，光辉思想照千秋"。我留心看了看，画像是河南中原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的。

我请教服务员个中奥秘，她以嫣然一笑作为回答，最后还是一位干部吐露了真情："这是一位老干部要求悬挂的。"他叹了口气又说："唉，也难怪，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怀念五十年代，那时生活虽然艰苦点，但大家都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社会风气也好，只要是毛主席说的，不管对不对，谁敢不听？！哪象现在啊，一盘散沙，一切朝钱看。"他主张重建权威。〔４０〕

在大学校园里，"毛泽东热"则表现为阅读有关毛的书籍、张贴毛的画像，业余以毛为谈论话题。一些大学生还成立了马列主义和毛思想研究小组或毛著读书会……

对于社会自发兴起的这股毛热，至少在头一个十年里，官方意识形态权威和政工部门，是对之保留看法、并给与了高度关注的。他们已经注意到，有些人"寻找毛泽东"，有欣赏毛的"造反意识"的倾向；有些人利用人们的怀旧心理，散布对官倒横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及造成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的现状的不满情绪；有些人通过"寻找毛泽东"来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造成与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４１〕１９９３年毛诞一百周年时，大概因为邓的在世，"江核心"依然需要用"邓思想"

巩固和宣示自己的“道统”，这个重要纪念日也并未出现高规格的官方活动。到２００３年毛诞１１０周年时，继登大宝的胡、温为聚集社会资源，在“三个代表”以外，加重对“弱势群体”的强调，公开在“邓思想”、“江核心”之外，重打毛的旗幡，造成一派“品牌毛”行将复辟的趋势。

三、三个浪潮：“毛热”的内在驱动力

据笔者观察，１９８８年开始发自民间的这场“毛热”，基本上是围绕“品牌毛”的核心价值展开的。虽然只是表达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但就已经经历的三波浪潮来说，仍是各具不同背景和内在驱动力的。

第一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以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为先锋。他们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神灵操控。而方今民众，好容易在“先富”政策的鼓励下，折冲商海，在官商巨轮的夹缝边拾得少许鱼虾，便心怀侥幸，患得患失，期待未来，有一个“守护神”来保佑他们发财。而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因此，他们对毛的“崇仰”，实质是下层既得利益人众，对现实感恩，但又不放心的一种情绪表达。

而作为对这种市场先机的敏锐的适应，出版商与被冷冻约达十年之久的党史、党文化工作者，终于也盼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可以与此相比较的是借助“毛家菜”之名崛起的湘菜系列，终于结束了改革开放前十年间，借邓小平之威，川菜横霸半个中国餐饮业的局面。而在那些“升学没准，出国没门，经商没本”，追赶西化潮流又没有方位感，眼看要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机缘的小商品生产者那里，这当然更是一次天外飞来的商机。——的确，这次发财机会，是“毛爷爷”给的。

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来到“瓶颈”部位，由于政府所采取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毛时代不曾有过的贫富不均；企业改革带来的大量国企职工下岗，使许多人失去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代替了“大锅饭”下的“一团和气”；而那些有幸仍在“资源优化”之内的人们则惊呼，自己突然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那些怀有“原教旨”情结的老干部则感叹：“出生入死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种种社会不满情绪的聚集，在改革操盘手赵紫阳那里曾化为一句感叹，叫做“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而这种“人心不古”的情势，最被动的表达方式，就是怀旧，集体的怀旧，用集体无意识表达的怀旧！正是在这种不满的积累，而又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方才出现了１９８９年的“积极宣泄”。

第二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较之此前的一波，性质有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出现，和同期出现的“武侠热”、“军事题材热”、“传统文化热”、“历史题材热”、“气功热”，都是由于同一个历史背景——“高烧”到９０度的八九民众情绪被外界力量强行镇压后，流入地下——的曲折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作为一种大众情绪的寄托，作为民间自发形成的“反主流”热潮，它们对于当时的“主旋律”——革命文化，既不反对也不配合。它们用“不作为”进行“消极抵抗”，以“面向过去而背对现在”，以怀念前朝为藉口，曲折发泄对当朝的不满。其目标虽然闪烁迷离，但意识指向，总是围绕着那个无论从感情、还是从理性上来说，都解不开的“六·四情结”。当时人提到毛，大多是因为毛是邓的克星。而且毛讲过：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因此，它们表现的对毛的“崇仰”，实质是广大民众与当朝者精神分离的象征。因为经过“品牌化”包装的毛的形象是家喻户晓的，毛的语录——经过林彪的筛选——是通俗易懂、很容易掌握人民群众的；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所以是当时唯一拥有号召力，可以用来与当局进行精神抗衡的力量。

第三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作为一种“对江泽民的派对”，〔４２〕　与第二波毛热不同的是，它不像前者那样确具有混沌不清的面目。它不是各种欲望混合的表达，和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有着更清晰的面目和更明确的诉求的。它基本上是社会两极分化形势严峻的产物；是利益失落者借用的旗帜。它与同期发生在知识界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具有相重迭的历史内涵。它们都是以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为背景，企图对急剧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作出回应。而如果说，理论上的争论是它的理性探索的话，那么，由大众文化呈现出来的图景，则是它的情感表达。此时的毛泽东，与历次运动——如“文革”、“八九”——扮演的“钟馗”形象毫无二致，不过这次反映的却是利益被损害阶层的呼声。

我认为，也正是因为它在民间已经形成气候，官方才会轻松地接过它的旗帜。

四、“毛热”的社会历史功能及气象预测

如果以上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所谓“毛热”，就不能简单的看作“毛泽东的文化复辟”。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它的爆发与这个社会的弊病，以及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状况的不适应，是密切相连的。就积极的方面而言，它至少具有如下四层功用：

第一，它提供了朝野政治家民意观察的“晴雨表”。
第二，在反腐化、反特权、声张平等方面，对执政党敲响警钟。
第三，通过民间文化热持续不断地对政治发生影响，结束历来只有“圣意”、“上意”，而没有“民意”的政治文化结构。
第四，通过民间自由研究和讨论，进一步深化对毛的反省，尤其是深化人们对“真人毛”的认识，为毛泽东作为“偶像”和“品牌”的彻底抛弃铺平道路。

但由于毛这个“品牌”的陈旧性和封闭性，这种毛热对于现时代的中国，也必然具有消极的一面，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导出反动的潮流。譬如：

第一，作为一种“革命文化”的内容，它的勃兴和市场占有，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潮流，必然起到一种阻遏的作用。〔４３〕这对于刚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自由民主人权与博爱的价值观在中国还非常幼弱的植株，将是

不幸的。

第二，作为一种“魅力型”偶像，毛对于那些期望“青天”政治的群众，有着严重的麻醉作用，也极易诱导政治家返回“人治”政治。

第三，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空想社会的产物，毛主义的核心价值具有鲜明的“反现代化”色彩。对中国当代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必然产生不利但并非完全消极的影响。

第四，作为造反成功的领袖，毛是运用旧式“民主”手段，排斥新式民主政治的实践者。毛的符号与行为方式，留给中国民间的记忆犹新。在民众没有掌握新式民主手段而政府也未作出相应改制之前，毛的行为方式将是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唯一方式，它的发展，将不利于宪政民主建设。

第五，作为一个东方帝国的巨灵，“品牌毛”具有抗衡西方霸权的号召力。一旦中国国际环境的压力加大，民众和政府中的“利益集团”，必将再次打出毛的旗幡，作为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前导。届时的中国，将重新对世界关闭，并变得焦躁不安……

五、如何对待“毛泽东热”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毛泽东崇拜”，是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文化与中共“革命文化”相结合的产儿。它的“产床”，是科学极不发达、统一宗教阙如而民间迷信浓厚，以及民主政治土壤瘠薄的、以小生产意识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其“助产士”，则是民族危机与革命战争背景下，围绕国家权力与中共党内权力而展开的斗争。作为革命文化的一个分支现象，毛泽东热在中国现、当代精神文化史中，既不是其来有自的，也不是持续不断的，自然也不会是永世长存的。随着其形成的条件的逐渐消除，它也将逐渐退化、变形，以致从历史中冰雪消融。

毛泽东式的专制，更是政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随着国家权威“去魅力，入法理”的进步，他的消解也是一个必然。

可以理解的是，在现阶段，如果说民众中还残存着毛崇拜的话，那么，绝大部分已不是对那个真实的、丑恶的毛的崇拜，而是对于被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和民众自己——根据党纪和传统道德——“品牌化”的毛的崇拜。换言之，作为崇拜者来说，绝大部分不属于上述第五类。他们的崇拜，有时甚至与毛这个人的思想、行为、经历毫无关系，而是崇拜者将自身理想“对象化”的结果。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经说过：“古来名将皆为神”。在他所处的时代，关羽、秦琼、尉迟敬德，就是这样的小神。民间神话研究的成果显示，中国民间神祇，如果将各民族的加在一起，可能上千：凡天地山川，风雨雷电，江河湖泽，四时节气，金木水火，飞禽走兽，桌椅板凳门窗灶台扫帚……甚至茅坑，都曾被赋予“神灵”。可见是“万物有灵”。在哲学家那里，这成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证明。人们塑造的这些“神”，和他们自身的福祉，其实只有心理上的关系。就像古罗马人喜欢将“一切荣誉归于恺撒”一样，人们喜欢将自己的幸福与灾祸与自己的这个创造物分享。他们塑造出一个高大的“神”，有时是为了体验创造的快乐，有时是为了给不那么高大的自己壮胆。就像“图腾”对于原始部落的意义。

作为一个从类似愚昧和崇拜中走过来的人，作为一个民主自由观念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同时，也作为一介政治文化的研究者，我致力于将毛“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工作，但也十分理解毛热的发生，以及毛崇拜的残余现象。并认为，为防毛的复辟，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仍将是艰苦而漫长的，战线是广大而层次是复杂的。因为它有赖于我们——每个从毛泽时代过来或受其影响的人的彻底“去毛化”——从理念到思想，从思维定势到行为方式，从语言到手段的彻底“脱毛”过程。并以这种“脱毛”后的新人类群体的行为示范于广大民众，让民众自己去自由抉择。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日，我曾目睹天安门广场的马恩列斯像悬挂最后一天的情景。作为一种象征性事物，那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政治生涯中的最后时刻。当时，我十分留意民间的反应。但我所得到的结果是，民间对此毫无反应！我意识到，这是人心已去、大势已去的结果；也是执政党多年来逐渐降温，思想界持续努力，以及最后处理这一事件的智慧手段的产物。因此，我认为，毛画像是否能从天安门城楼取缔，毛遗体是否能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并不是“去毛化”过程的开端，而是这一过程完成或基本完成的结果。

作为一种策略性选择，我曾提出过，毛遗体的去留，可由其家人提出要求，我相信，生活在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中，有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符合历史潮流的抉择。同时，我还提出，去除毛的象征物后，可以允许毛作为“小神”在民间留存。〔４４〕这是鉴于中国民间的文化传统，考虑到客观存在，基于对人民信仰自由的尊重，以及一种“软着陆”的愿望而提出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提倡”、“号召”和“呼吁”把这尊已打倒的偶像重新扶上神位，更不代表我个人对毛的好恶。

注释：

１．郑立新主编《国史通鉴》第四卷“毛泽东热”，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０２—３０３页。
２．迄今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还存有一份当时的纪录:《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在这份记录里，记载有毛泽东赞同、支援马林关于“国共合作战略”的谈话。参见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第九章“玩弄的代价”。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月版。
３．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４页。
４．谢和庚是中共打入国民党的地下党员，时任蒋介石行营的军事参谋，后来与中共地下党员、著名影星王莹结婚，成为胡宗南的心腹。
５．见曾志《一个革命幸存者的回忆》。
６．参见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第四章“毛泽东主义”。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６月版。
７．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６０５－６０６页。
８.《张闻天文集》(三)，第２５４页。
９．尹高潮编著《毛泽东的老师们》，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版。
１０．据毛泽东自称，此词作于１９３６年２月的东征途中，但原稿与发表稿差别很大，胡乔木曾声称最后定稿是他捉刀代斧。

１１．参见爱德格．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版，第１０４页。
１２．见陈小文《文革词典》（征求意见稿）“毛主席像章”条目。
１３．参见高伐林《陈小雅谈毛泽东研究及背景》，“绣花小袄与皇帝的新衣”。载陈小雅《中国“废片”》附录。
１４．据传，这位算命先生的预言是：活８３岁，执政４１年。如果以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算作毛泽东“执政”开始，到１９７６年毛去世，正好４１年。
１５．“２８双响”即５６响。１９４９年的毛泽东刚好５６岁。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重大庆典和迎接外国元首时，鸣放礼炮２１响；欢迎外国政府首脑时，鸣放礼炮１９响。毛泽东为什么要鸣放５６响呢？后来的秀才解释说，５６是２８的一倍，２８双响意味着１９２１年建党的中共，经过２８年的艰苦奋斗夺得了政权。如果这样，完全可以规定为１４双响或２８响。有人解释，５６响可能是代表中国有５６个民族。其实，当时中共尚未将西藏、海南和台湾并入版图，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尚无定论。１９５４年普选时，选民自报的民族多达数百个；１９５６年，国务院根据民族识别工作成果，公布了中国５１个少数民族名单；尔后经过民族研究工作者多年的研究和识别，直至１９８３年国务院才正式确定，中国除汉族外，共有５５个少数民族。
１６．参见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第十一章“医生的秘密”。香港共和出版公司，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版。
１７．参见刘英《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
１８．参见王瑞璞、孙启泰主编《国史通鉴》第三卷，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６７－６８页。
１９．参见陈小雅《中国“丈夫”》，第十一章“医生的秘密”。
２０．见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2月版，第９５、９６页。
２１．见毛泽东１９７０年与斯诺的谈话。
２２．参见王瑞璞、孙启泰主编《国史通鉴》第三卷，同上。
２３．“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
２４．见陈小文《文革词典》（征求意见稿）“毛主席像章”条目。
２５．见章立凡《毛诗闲品》。载“五柳村”网站。
２６．与毛远新的谈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２７．１９６７年10月3日，毛泽东同努马扎来谈话记录。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１５０８页。
２８．见陈小雅《中国“牛仔”》，第四章“毛泽东主义”，第八节“毛泽东‘精神鸦片’的吸食者”。
２９．见亚衣《火炬在心中燃烧——访员贵州“启蒙”社创办者、诗人黄翔》，载《流亡者访谈录》，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1月版，第２９８页。原载《北京之春》１９９８年4月号。
３０．张京明《毛泽东潜返人间》。载《海南纪实》１９８９年8月号。
３１．耿军《毛泽东９５诞辰见闻》。同上。
３２．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
３３．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据德国《世界报》刊登的约翰尼？埃尔林《富裕的毛主义者居住的地方》描述，这里的村庄，仍以一具毛泽东塑像为公共标志，并仍保留着马恩列斯肖像，农民声称仍信奉这些偶像。日本《读卖新闻》记者藤野彰报导，

该村至今仍沿袭文革时期每天早晨喇叭播放《东方红》叫村民起床、民兵晨练等制度，并仍实行集体经济，奉行平均主义的低工资和福利制。
３４．１９７８年末，当时的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现中央文献研究室）有人给《红旗》杂志送去一篇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名为批判彭德怀，但内中明显有“影射邓小平”的文字。此事在专案调查后不了了之。
３５．指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对义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邓在谈话中说，天安门上的毛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４４页。
３６．亚衣《自由是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访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魏京生》，载《流亡者访谈录》，第１５７—１５８页。原载《北京之春》１９９８年１月号。
３７．见郑立新主编《国史通鉴》第四卷，第３０２页。
３８．见陈小文《文革词典》（征求意见稿）“毛主席像章”条目。
３９．即１９８９年。
４０．张京明《毛泽东潜返人间》。
４１．见郑立新主编《国史通鉴》第四卷，第３０２页。
４２．见孙丰《毛泽东热是对江泽民的派对性发泄》，载徐水良主编《网路文摘》。
４３．参见陈小雅《未来思潮谁引领？——文化“三环”解析》、《从“一花独放”到“三分天下”——当代中国文化格局的嬗变》，载陈小雅《中国“废片”》附录。原载《民主论坛》。
４４．见张伟国《陈小雅关于〈中国“牛仔”〉的答问录》，载《中国“废片”》附录。原载《北京之春》２００５年９、１０月号。

上山下乡运动引起的争议

潘鸣啸

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把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活动早在 1955 年就开始了。自从 1962 年也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来负责这个工作。但是我认为文革前的运动与文革后的有很多不同的特征，而且规模不能比。从 1955 到 1966 年下乡知青不到 150 万人。从 1967 到 1980 年大约有 1660 万人。

因此研究这个题目要一分为二。至于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究竟有什么关系，这要看“文革”的定义。我认为严格来讲，文革是 1969 年 4 月份九大时毛泽东重新恢复政治体制而结束了。从这个狭义来看问题，1968 年底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开端就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青年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不存在了，就没什么“革命”可讲了。但是，另一方面，1968 年后的下乡运动是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毛泽东通过文革而成立的“教育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运动被当作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事物”，所以 1978 年前没有人敢公开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而且在 70 年代，这个运动也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所以我认为这个运动在文革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觉得历史学家对官方的“文革十年（1966-1976）”这个概念应该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要分清楚广义“文革”的两个阶段（群众积极参加的阶段和纯粹内部斗争的阶段），另一方面还要记得最深刻的历史转变不是在 1976 年发生而是在 1978 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它的最繁荣时期是从 1968 到 1977 年，而且最多知青在乡下的一年就是 1977 年。

应该重新评价的历史大实验

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上是个史无前例的改造一代人的大社会实验，也是个表面上凭“自愿”申请的大规模集体流放。现在城市里五十到快六十岁的人（一般来说是在他们的职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有一半左右是当过知青，受过这个运动很深刻的影响，所以可以模仿毛 1968 年著名的指示而说：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它接受中外专家的再评价，很有必要，也很有可能。虽然我们还缺少很多资料来做研究（有关政治决策的内部档案，对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具体与真实的报告等），但是比起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外国专家对这个题目所做的第一波的研究，现在有很多新资料可作参考：有关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大事典与统计数字（包括中央知青办的部分档案和当时知青办干部 1996 年出版的有关资料），还有自 80 年代末开始出版的省志及市志等。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完成了很认真的历史研究（刘小萌等），另一方面自从 70 年代末，一种集体记忆已经在民间开始形成，先是在文学作品和回忆录里，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对知青一代的比较有反思性的文本。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引起争议而且有待大家再反思的问题，比方说怎么评价运动的动机和功过，以什么面目让这个运动留在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怎么评价知青这一代等。

在这里祇能简单地提一些我认为比较值得议论的三个问题。

引起争议的三个问题

1，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

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知青父母，农民和地方干部之中引起了很深的不满。虽然如此，这个政策还是持续到 1980 年。看起来，领导人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是比较重要的。有些动机是公开的，而且不断地被宣传，有些很少被提级，甚至还有一些连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很多学者认为最主要而且是有决定性的动机是城市就业问题。其他的祇是次要的，甚至是假的（祇有宣传作用的）动机。我的看法则不一样。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分析从 50 年代到 1980 年下乡政策的演变，我觉得应该分清两个不同的逻辑：一个是管家人（负责实际工作领导人）的逻辑，另一个就是最高领导人，唯一意识形态的提供者（毛泽东）的逻辑。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逻辑的轻重就不同。文革前，特别是大跃进引起的经济灾难以后，主要的动机就是减轻城市负担。但是 68 年后，最主要的动机是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假如减少城市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动机，怎么解释从 1968 年到 1977 年当知青大规模地下放农村的时候，大约同样数字的农民在城市里得到了永久性的雇佣？当时政府靠户口制度可以制止这次城乡人口大交流。文革开始的时候，毛强调要政治挂帅。从 1960 年开始，他一直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变色”，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中国青年一代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他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年轻“知识份子”

要想挽救自己，就要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的权力是靠意识形态和政治，不是靠他对经济学的掌握。他越老就越担心他将来的历史地位。对他来说，改造新一代人是个重要的意图，把自己的伟大蓝图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上是无比重要的。

所以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与对毛政权的理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我认为不要用西方的或中国现在的经济理性主义来理解毛泽东的中国。

当然，毛也需要管家人（及一般的官员）来执行下乡政策。他们双方是互相需要的。

1973 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时候，为了给下乡运动新的活力，双方妥协。但是

到毛泽东去世为止，这种妥协一直是很脆弱的，经常发生动摇。在激进派和务实派之间，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冲突不断地出现。1978 底，当管家人和他们的经济逻辑正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的知青工作会议上领导层达成了新的共识：下乡政策终将取消，但为了避免给城市带来就业问题，这项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而且一部分在乡知青要一辈子留在那儿。但是，实际上下乡运动很快就结束，而且一场“回城风”很快就把知青带回城市里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终结也有不同的看法。

2，社会抵制的效果

下乡政策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特别是知青自己的不满情绪及各种形式的抵制。但是 1978 年以前，这种抵制祇能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祇有一个例外，就是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知青趁机回城闹革命。很多知青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要求批准他们回城，但是 1967 年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后，就不得不回乡下去。

1978 年底，全国工作会议还未结束，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以情愿书，游行，罢工及派代表到北京要求当局批准他们回城。全国其他地方的知青也公开表示要回城，有些地区的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地挤进火车打道回家。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称为“胜利大逃亡”。除了个别情况（主要是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和文革前下放到新疆的上海知青），政府终于同意他们回城。美国学者 Stanley Rosen 在 1981 年出版有关广州知青在文革中的角色的书里，认为两个时期（1966-1968 和 1978-1979）知青的呼吁与反抗很相似。我认为虽然有些形式相同，但是两个时期的情况和抵抗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反的。文革的时候，政治环境对要求回城的知青非常不利。因为当时的极端理想主义，他们的要求很容易被扣上“自私”的帽子。因为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很大，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不好”的，所以他们没法反抗当权者的意志。反而，1978-1979 年的时候，政治环境对知青很有利：为了取得新的合法性，中共改革派开始批评和改正文革很多政策。知青就可以自称为文革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在运动发动的十年以后，对这个政策有抵制情绪的人，主要是知青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当时，祇是在乡和已经回城的知青已占城市人口大约 15％的比例）。1979 年，中国政府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上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执行前面提过的工作会议的决定。他们知道就业情况特别紧张，因为 1962-1964 年出生的城市人口（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出生高潮）正在达到就业年龄。但是当局没法抵抗回城的潮流。从 1978 年底到 1980 年初，大约 600 万知青回城（这个高潮比十年前，即 1968 年底到 1970 年初大约 500 万知青下乡的那一个高潮还要巨大）。

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崩溃有几个历史意义。

第一，它表明在客观历史上，就业人口的变动没有决定这个运动的命运。反而，就业情况最紧张的时候，是大多数知青回城和下放政策停顿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每年下乡知青的数目与达到就业年龄的城市人口比较起来，就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第二，如前面已经说了，大转变的一年不是 1976 年（所谓“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而是 1978 年。那一年有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辩论和年底开始的“胜利大逃亡”标

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政治制度没有基本的变化，但是从 1978 年开始，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不可忽略的演变。领导人已放弃了制造“新人”和迈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他们把“四个现代化”放在首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阶层有一些基本利益，也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来发挥其经济活力。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还是很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动一场 1968 年那样的不顾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的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知识青年的积极抵抗可以强迫政府让步。这次社会抵抗的胜利反映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所以可以说 1970 年代末知青要求回城的运动是最近开始发展的维权运动的先驱。

3，知青一代是怎么样的一代？

按原来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标来看，除了 1968 年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秩序的短期目标达到了以外，这个运动在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研究这个运动的一个特别的成果：知青那一代，我们也发现毛完全失败了。他的政策确是对整整一代人有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他们具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像陈培华那样称他们为“毛的孩子们”。但毛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人是他的孩子，因为这一代没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也没有被改造成无私地为共产主义理想，或者是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反而，在整个七十年代的过程中，这一代对毛的思想和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反省，甚至开始持反叛的态度。毛还在的时候，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和 1974 年重阳节白云山事件与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毛死了以后，在改革派和凡是派的斗争中，这一代就支持了反对文革和毛泽东“既定政策”的改革派。可以提很多例子来证明红卫兵及知青这一代与代表“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的“战略联盟”：“民主墙”的活动分子（多数属于这代人）在关键时刻，即 1978 年底的三中全会时，对改革派的帮助；年轻专家参加拟订与毛一向的意志背道而驰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包产到户政策）；还有知青作家参加“伤痕文学”，等等。这一代不祇是在政治斗争中背叛了毛派，而且在思想价值方面叛离和超越了毛泽东。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及年轻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非正统创作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说这一代的自身经历对他们世界观的影响与毛最初的愿望大相径庭。李银河，属于这一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很清楚地概括了这一点。她说：“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

从七十年代末到 1989 年的民主运动，这一代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能力有了丰富的表现。

虽然六四镇压和邓小平南巡以后，这种精神受到了很重的打击，但是它没有消失。最近几年，它的一个有意义的表现就是这一代的一部分人为了建设和保存他们一代人的真实记忆而奋斗。

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对当局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革那么敏感，但这个题目还是受到监督和控制。虽然允许出版了一些半官方的书和文章，官方不鼓励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运动的记忆祇能是民间的。这一代人都同意要记忆他们的经历，但是在

怎么记忆的问题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记忆：一个怀旧的记忆和一个批评的记忆。六四镇压以后，官方批准（有时甚至是鼓励）了一些前知青举办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展览，出版回忆录和照片集，开“知青餐厅”或组织前知青集体旅行到当时接待他们的农村。

这场九十年代的怀旧潮一方面是有点儿荒谬的，因为它是对“蹉跎岁月”的怀念（当时大部分知青尽量找办法回城），但另一方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四五十岁的人怀念自己的青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比较刺激和特殊的历史事件的人会有更加强烈的怀旧情绪。“蹉跎的激情岁月”（丁帆一篇文章的题目）能概括这一代对自己青春的自相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因九十年代的经济社会变化特别地快，似乎把他们年轻时候的世界和他们现在的知识和才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所以公开地怀念自己的青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肯定自身价值的手段。但是这种可以理解的怀念，对那些不肯掩盖“文革”黑暗面的人，显得太不真实也太容易被官方歪曲历史的宣传所利用。他们批评怀旧派的口号：“青春无悔”。

双方就关于这个口号开启了激烈辩论。反对者提倡这一代不但要反省也要“忏悔”，甚至有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把“老三届”称为“丑陋的老三届”。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复杂。第一，老三届（即这一代的核心）在年轻的时候，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先是红卫兵，后是知青。当红卫兵的时候，他们经常害别人（虽然很多红卫兵也受过害），但是当知青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受害者（虽然有不少知青为了达到回城或得到别的好处的目的，而不惜害别人）。当然，他们现在宁愿回忆受苦的知青时代也不想回忆害人的红卫兵岁月。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相对来说，知青没有做太多“丑陋”的事情，哪怕祇是因为没有机会做。

第二个问题是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责任主要是谁的。鑒于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来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中国人民的统治方法，人们很难逃避参加毛和其他领袖为他们写好了的戏剧，也很难选择自己的角色：受害者、刽子手或者帮凶；而且还要经常交换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需要忏悔的人很多。但是有罪的人越多，他们要分担的罪责相对来说就越轻。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人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实在很小。我采访的一位知青告诉我，她的生产大队里的知青曾经抗拒当局把他们派到另一个地区的计画，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原来插队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受不了被当作一群鸭子的感觉。当时的中国人真是被领袖当作一群鸭子。

这个情况淡化了做真正的人的责任感和自尊意识。从这个意义上，“丑陋的老三届”这个称呼就显得太刻苦和太绝对。反而，“丑陋的毛泽东”比较适合。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的人不需要忏悔自己当时的盲从和帮凶的行为，而祇是想对历史责任有个比较公平的判断。

对“毛的孩子们”，“失落的一代”这个称呼似乎比较合适，因为他们失去了不少东西。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能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而中国的“失落的一代”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有一部分人失去了结婚成家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他们也可以说是“被牺牲的一代”，因为他们当时的“偶像”为了自己的权力欲和过时的理念，将他们当作祭品送上了圣坛。但是这个残酷的经历让这一代人受到启发。至少他们现在不肯再失去他们经历的记忆和对这段历史反省的权利。这件事不能再“耽误”了。假如又失去了记忆，这一代的命运实在太残酷了。

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１〕

杨国斌

◇　从红卫兵运动到民主墙

研究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有必要从民主墙运动说起。民主墙运动发生在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的冬天，时距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８年的红卫兵运动十年有余。本文要讨论的是红卫兵一代人在这十年中的认同转变。

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和民主墙运动中都曾出现很多宣言性的文章。比如当年在清华附中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有如下的誓言：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２〕

这类宣言性的文字，后来成立的各类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很多。虽说在文革的大气候下，人们常常言不由衷，但总的说来，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类文字，当作红卫兵一代在当时的认同意识的表达。当时各类红卫兵和造反派，虽然在派性斗争中打得不可开交，但他们所表达的认同意识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誓言就表达了这种认同意识。我们随便再看一个例子，是一个叫做“毛主席路线红卫兵”　组织的成立宣言，　发表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的　《湖北红卫报》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迅猛异常，毛泽东时代的红色造反者杀声震天。又一颗红色信号弹在天空闪烁，又一面造反的红旗在徐徐升起！…　毛主席路线红卫兵光荣诞生了！…我们的战斗任务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我们的每一跟血管、每一个细胞都渗透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景仰！

这个宣言，跟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誓言差不多。这类宣言，大体表达了对于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领袖人物的强烈认同，表达了捍卫这些认同对象的自我牺牲的决心，抹杀自我，使自我的意识与利益服从于政治集体的意识与利益。

把民主墙时期的话语和红卫兵时期的话语相对照，可以发现明显的变化。民主墙时期同样出现了很多大字报，大城市里都有民间刊物出现。这些刊物也多有宣言似的发刊辞。例如《四五论坛》的发刊词有如下的陈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四五论坛》的宗旨，就是为在我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安定团结不是一潭死水，不是不让人民讲话，不是不让人民讲真话。人人有话敢讲，任何污秽就没有藏身之地，人民的意志必然决定社会的命运，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３〕

《启蒙》的“发刊词”说：在那些精神和灵魂的灾难结束以后，我们开始用疑

惧的眼光去回顾我们的来路，那来路的很大一段上充满了眼泪和血。当我们用胆大的眼光去瞻顾未来，未来却在我们眼前展现一派迷茫…　。　严酷的事实已经使我们忘掉了　世界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们也不再日夜幻想着，那些苦难者会盼望我们去对他们进行解放。〔４〕

这些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没有抛弃红卫兵时代就表现出来的使命感，但使命的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是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言论自由，提倡民主和法制建设。民主墙时期的另一些作品，则透露着迷茫和疑惑。《启蒙》的发刊词，便摈弃了红卫兵时代所表达的那种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此外，民主墙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北岛的诗歌、魏京生论第五个民主的文章，王希哲论民主与法制的文章，都明确表达了对专治的怀疑和对民主与法制的向往。政论性文章中，开始肯定个人利益和物质生活的价值。而文学作品更是对自我、人性、个人情感、爱情等等，进行了强烈的表达。当年发表在《今天》上的作品，大都属于此类。北岛的“回答”表达了这种怀疑，而“履历”则描述了这个过程：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硷地似的
白纸上看见理想…

顾城发表在民间刊物《崛起的一代》的诗歌“红卫兵之墓，”有这样的句子：

谁都知道
是太阳把你们
领走的
乘着几只进行曲
去寻找天国
后来，在半路上
你们累了
被一张床绊倒
床头镶着弹洞和星星
你们好象
是参加了一场游戏
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５〕

这首献给红卫兵时代的挽歌，对红卫兵一代最初跟随红太阳的追求，给予了祭奠，同时表达了“重新开始”的希望。其实这种“重新开始”就在红卫兵运动期间就已现端昵。而在民主墙时期，则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这样，我们就提出了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从红卫兵时期到民主墙运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红卫兵一代认同的转变？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分析这种变化产生的前因后果。在方法上，本文侧重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着重研究见诸各种形式的话语和符号，不追究个人内心到底怎么想。比如，某人原是红卫兵或造反派，但他说他并没有经历认同转变。从话语的分析角度看，这不成问题。红卫兵一代，从红卫兵运动到民主墙运动，有一整套话语。这套话语，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这一代人的认同转变。

◇　红卫兵一代与认同

社会学意义上的代，是因共同的社会和历史经验而形成的，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代有所不同。因为共同的历史经历，一代人的思想便打上了共同的烙印，在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上表现出共同的特征，我们称之为代的意识，或者说代的认同。这种代的认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有交通条件和报刊媒体，给分散的人口及时传播信息，使他们能够产生共同的想象。从这一点看，代也象国家一样，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似乎最容易在年轻人中产生。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发现在西方人们常谈到的１９１８年一代，二战一代、６８年的一代，以及我们熟悉的“五四”一代，都是青年时期形成的。代的意识，在青年中似乎格外强烈。在中国，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觉得自己算不上哪个代，因此平白造出“新生代”之类的话语，反映了缺乏代的认同感的焦虑。

文革一代、知青一代和红卫兵一代，大体指同一个代。但红卫兵一代的说法，似乎比较精确些。如果说这代人是四九年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么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事件，应该是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的红卫兵运动。后来的上山下乡，当然对他们也有同样深刻的影响，但是代的意识的形成与表达，在红卫兵运动中表现最为强烈。

红卫兵一代，主要包括今天常说的“老三届”。当时分得很细各种，有老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又有关系错综复杂的组织，等等。我们把他们统称为红卫兵一代，不是抹杀当时的内在区别，而是强调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社会运动。派系斗争的背后，掩盖着一个重要的共性。如果我们把派系斗争比作一场游戏，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游戏，缺了哪一方都玩不成。而各方能在一起“玩”，是因为他们都认可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比如可以打倒当权派，但绝不能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

社会学意义上的代的意识，是一种集体意识，我们称之为集体认同。认同一词，是从英文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翻译而来，中文里原没有这个概念。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认同是一个关键词。其实社会学意义上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在英文中也是１９６０年代以后才开始普遍使用的。这方面最早发生较大影响的著作，是艾里克森（E. H. Erikson)发表于１９６８年的著作，《认同：青年与危机》。艾里克森目睹了六十年代西方青年表现出来的骚动不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青年一代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感觉社会和历史发生了断裂，内心失去平衡，

产生混乱，他称为认同危机。他所阐发的这种认同危机，与青年的关系格外密切。

认同的内容，很难严格界定。大体来说，它包括对自我和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与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moral frameworks)联系在一起，因此认同也包含了道德价值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认同危机，是因为社会的巨变，造成了自我认识与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条件下，新的认同意识的产生，同时意味着对原来的道德体系的怀疑甚至否定，以及对新的道德标准的探索与肯定。

认同是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教育、文化、家庭、等等，对认同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人们的社会行为，反映了他们的认同意识。此外，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一般情况下潜移默化的转变，不容易觉察。大变革的时代，容易引起认同的危机，进而产生认同的转变。

◇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形成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形成，是文革前１７年的革命化教育的结果。对文革前的青少年来说，这时期的教育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上至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下至青少年课外读物、连环画、小儿书、电影，全面渗透。其目的是造就“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教育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　即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一本题目为《造就共产党中国的模范公民》的英文著作，曾经对小学教科书的内容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做过研究，基本概况了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内容。其研究发现，小学语文课本的政治主题，以出现的频率来计算，依次为：１）对新社会的忠诚，　２）新社会的优越性，３）毛主席的伟大，４）国民党的罪恶，５）中国人民得到解放，６）人民曾经受过压迫，７）警惕特务和坏分子，８）热爱人民，９）热爱祖国，１０）旧社会的黑暗，等等。〔６〕归纳起来，这些内容就是培养学生对新政权和领导人的认同，及对国民党和旧中国的仇恨。

不论什么样的教育，都有个效果问题。总的说来，文革前的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是有效的，其结果是培养出认同教育的内容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投身到红卫兵运动和文革中的。〔７〕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和阶级斗争教育为什么如此有效呢？我主要分析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教育的形式。革命传统教育，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形式多种多样，不限于学校，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大凡新政权建立之后，都要建造一套创世纪类的神话，提高新政权的合法性，赢得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可和对新政权所代表的价值观的认同。建国后中央政府对革命传统的建设，就属于此类。其表现范围很广，学校教科书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儿童和青少年课外读物，这方面内容也很多，比如各种革命英雄的故事。５０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从其象征意义上讲，其实也是对革命传统的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这样一个象征符号。另外，建国伊始，当时的政务院就颁布政令，对各类节日、庆典做了规定。比如规定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建军节、国庆节等等。这类全国性的节日，便成为歌颂革命传统的盛典。以后每年的主要庆祝活动和公共集会，中共中央都要专门下发文件，对悬挂什么

领导人的头像，喊什么样的口号，做出明确的规定。北京是这类庆祝活动的中心，北京的青少年常常以革命传统的接班人的面目，被安排出现在庆祝活动中，在他们心中养成一种身在伟大首都的优越感，为全国青少年所艳羡。后来红卫兵首先在北京发端，而北京的红卫兵直接影响全国的红卫兵运动，都与北京学生特殊的社会地位有关系。

六十年代初期，革命接班人教育和阶级教育成为突出的话题。阶级教育着重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从１９６２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１９６４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贯穿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强调不仅存在地富反坏右和新生的资产阶级，而且有复辟的危险，因此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教育与接班人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反修防修的紧迫性，培养革命接班人也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培养出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才能避免江山变色。１９６４年开始，《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九篇社论，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论战。这所谓“九评”，在当时的年轻人心目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回忆录中，常常提到。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正是在这九评中的一篇中提出的。这篇社论还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８〕

文革前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和阶级斗争教育之有效，还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使然。这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建国以后，面临着很严峻的国际环境。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准备反攻大陆，中美处于对立状态，中印关系紧张，６０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援华的专家，中国似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防止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显得格外紧迫。另一方面，这样的国际环境给革命传统教育和接班人教育的话语，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面提到的“九评”，制造出这样一种话语，即中国革命的成果随时都会被断送，国内外的敌人时刻都在对革命政权进行颠覆。在这样的形势下，革命传统教育和接班人教育就更增添了紧迫性，在青少年心中，培养起沉重的历史使命感。

第三个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文化氛围的浸淫。我们常说，红卫兵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新中国” 和“红旗下” 的文化氛围， 对这一代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在上层政治方面，权力斗争一直不断，中央决策发生了象反右和大跃进这样的重大错误。但社会与文化氛围，基本上充满了乐观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其极端的表现，甚至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味道。这其中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成份。大凡革命胜利之后，新政权建立之初，因为胜利的喜悦，都会有一个欢乐的时期，象一段华彩的乐章。人为的因素也很多。比如１５年赶超英美的口号，使人民想象着不久的将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就要实现。 这种气氛，我们从当时的电影和文艺作品中都能感觉出来。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青少年，会培养出一种天之骄子的自我意识，会以为自己是时代的宠儿，身负历史重任，准备以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到达共产主义的彼岸。红卫兵一代，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踏如文革的。

◇ 认同转变的过程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转变，是逐步发生的，而且不断有起伏，呈曲线状。转变的过程，很难说始于某一时刻，但应该说，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也正是红卫兵认同转变的开始。这里有辩证法的成份，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其认同转变最初的表现，是认同的危机，具体表现在对原认同对象的怀疑和内心的困惑。由怀疑、困惑到思考，到各种形式的反叛和对新的认同对象的表达，构成了认同转变的全过程。

红卫兵运动是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开始。从转变的过程看，红卫兵运动的主要作用，是造成了这代人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的危机，一般表现为内心的矛盾、困惑和疑问，极端的表现则为异端和反叛。红卫兵运动初期，政治斗争的反复，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很多思想混乱，导致内心的困惑。最近出版的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对这种内心的困惑就有所记载。陈当时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在日记中对北大的文革过程，做了详细记录。我仅举一个例子。据陈记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贴出来以后，在校内受到广泛批判，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结果6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陈记载如下：

我听完广播，呆呆地坐在炕沿上，始终没有回过神来，我身为北大哲学系学生，学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水平和识别能力怎么竟然低到如此程度？怎么把聂元梓的革命大字报，错误地看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字报？〔９〕

这类困惑和矛盾的例子在当时很多，不一一列举。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进入大串连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两个新阶段。这期间的大小字报上出现了“异端”　的萌芽。比如在北京，出现了反对林彪和拥护刘少奇的大字报。〔１０〕１９６７年上半年，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及“新思潮”的出现，〔１１〕进一步将异端思潮推向社会。到１９６８年湖南省无联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的出现，提出共产党内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阶层，表达了红卫兵对现有体制的较为深刻的怀疑和批判。红卫兵运动时期的认同转变，到１９６８年上半年，以“省无联”的宣言类文章为标志，表现无遗。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红卫兵运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镇压，就在派性武斗持续不断的同时，中央文革开始了对异端人物的搜捕，杨曦光、遇罗克、鲁礼安等一批表达出异端思想的人物相继被捕人狱。直至１９６８年7月底，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工宣队进驻学校，红卫兵运动宣告终结。之后，大批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开始了他们这一代人生命航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

红卫兵运动结束，上山下乡开始，从此红卫兵一代开始了向知青的转变。这种转变，构成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另一个重要环节。从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既有其连续性，又有不同。从连续性方面看，投身到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年轻人，并不都是被迫下乡的。他们中间一批人，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高高兴兴启程，仍然抱着改天换地的胸怀大志。他们把农村当作是新的战场。也就是说，红卫兵一代人中，有一部份是到了农村才真正开始改变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认识。

从红卫兵一代的认同的转变这一角度看，上山下乡与红卫兵运动有一个重要区

别。红卫兵运动时期，是极少数人公开地正面表达了具有批判意义的新思潮。下乡时期，则是一大批共命运的知青亲身体验了异端思潮中所批判的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内，产生了对自我和社会的新的认识。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公开的现实批判减少了，隐晦的和地下的反思和批判增加了。对这种新的认识的表达，便是对新的认同意识的表达。我们从当年在知青中流传的歌曲、诗歌、手抄本、书信和日记等文献中，可以看出这种新的认同意识的脉络。概括地说，这是一种对乌托邦式的大革命的幻灭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意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物质利益的认可和追求。在红卫兵运动期间，甚至后来的政治大气候下，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视为资产阶级追求，得不到公开的承认。下乡期间，面对谋生的现实，追求物质利益不仅合理，而且必要。一位老三届知青回忆道，他下乡后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给知青讲话，劈头第一句话就是“种田为自己”。这对听惯了“读书为革命”的学生们，是极大的震撼。〔１２〕另一位老三届知青回忆道：“我们到底能对农村有多大作用？我们到底该不该坚持‘扎根农村一辈子？’在困惑中，在痛苦中，我们终于先后踏上了寻找自己利益的道路。”〔１３〕米鹤都的《红卫兵这一代》中，一位访谈对象这样说道：

许多人是在对现实社会目标丧失信心的前提下，开始注意到‘我’　的存在的。他们经营起自己的天地，从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遨游于书籍的浩海中，到设计前程，制定三年五年目标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从多挣公分多挣钱，到钻营门路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１４〕

在精神方面，自我意识的第二方面，是从宏大的革命理想转向对个人理想和个人情感的追求。当年风行一时的《知青之歌》，表达了对个人生活和人生意义的新认识。歌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１５〕

歌曲充满忧郁和对生活道路的困惑，这对红卫兵一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倾向，红卫兵运动期间的狂欢话语，并没有表达这样的情感。

那时的知青诗歌、歌曲等作品，常见的主题有友情、爱情、别离、思乡、乡村生活等，这些也都是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就在这种新的话语中，一种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开始在红卫兵一代中萌生。〔１６〕

自我意识的第三方面，是对中国社会的新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包括很广泛的内容。限于篇幅，仅谈一点，那就是对“人民”的认识。“人民”是新中国官方话语中的关键词。上至国家的名称、下到人民公社，从毛泽东语录里的“为人民服务”到报刊和文艺作品，人民的话语无处不在。但什么是人民，谁是人民，对于红卫兵一代，不过是个抽象的概念和政治口号。只有在下乡后，他们与人民生活在一起，自己成为人民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人民的内涵，才开始与人民认同。他们发现，人民中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人民很穷、很苦、却很勤劳而善良。人民有爱憎，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因为他们是有血肉的人。知青作品和民主墙期间的作品中，都表达出对人民的这种新的认识。王小妮的一首诗，“农

场的老人——　写在离别农场的那一天”，就表达了这样的认识。诗中描写了一位农场老人的辛劳和善良，结尾写道：

呵，模糊了，远去了，隐没了，
我没有机会问明你的姓名，
可“农民”　这两个字，
却一日日在我心上升腾…

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民的新的认识，民主墙时期对民主的呼唤，才有了具体而实在的内容，不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　认同转变的动因

从认同转变的动因来说，有三个重要原因，我称之为话语狂欢、个人经历、及政治形势的突变。

红卫兵运动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狂欢。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类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报小报应运而生，数不胜数。美国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从１９７５年就开始出版红卫兵报的复印资料，现在这套资料已多达到一百余卷。红卫兵报有两个特征。一方面，红卫兵报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方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虽然很多红卫兵报大量转载官方言论，但这类小报也登很多内部消息、小道消息、地方消息、本学校和各类红卫兵组织的消息，是研究文革及文革前１７年政治、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以至在当时成为国外研究机构苦心搜求的珍品，在香港甚至出现了赝品。红卫兵报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语言充满暴力和血腥，内容重复泛滥。但这种泛滥的革命话语，同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比如骂街的粗活，一般是见不了报的。国家机器严格控制下的报刊，有它的一套话语。红卫兵报既大量地使用官方话语，同时又把市井的粗活、脏话堂而皇之地印出来，这本身就是对霸权话语的一种亵渎。被尊为神圣的东西，总有一个圣洁的外表。把它弄脏，就是一种颠覆。因为有了这种泛滥的话语空间，颠覆性的“异端”话语也得到了发表的机会。红卫兵运动期间的所谓异端和新思潮，便是借这种空间得以发表和传播的。遇罗克的论战文章“血统论”，就是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红卫兵话语空间的产生，与文革大气候紧密相关。文革本身提供了从内部进行话语颠覆的机会。文革“十六条”，明确倡导大字报、大批判的运动形式，因此给各类红卫兵报和大字报提供了合法性。这样的条件，成了“异端邪说”　和“毒草”的温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文革后，大字报的形式虽然失去了合法性，但仍然在历次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跟文革期间形成的全民性的大字报文化有关。至今，我们对大字报文化，还缺乏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第二个原因是参与运动的经历。一般来说，集体行动都会对参与者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们，对六十年代学运的大量研究发现，学运的参与者，会发生人生观上转变，在日后的生活中，会比较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１７〕红卫兵运动的参与，对红卫兵一代有震撼作用。因为有了红卫兵运动，才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红卫兵一代。革命传统教育，在红卫兵一代人的心中，树起了无数英雄的形象，但战争年代过去了，他们无法象心中的英雄人物那样

，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红卫兵运动，使得生在和平时期的一代，终于有机会投身到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这也是红卫兵运动成为一场狂飙的原因之一。但参与之后，人们难免会发现，革命并不象想象的那么纯洁与神圣。大串连时期，很多人有机会到各地周游，第一次看到了现实中的中国社会落后而贫困，与书本上的情景迥异，促使他们开始对现实进行思考，也促使他们中间有些人，发愤读哲学和理论的书籍，寻找理论上的答案。〔１８〕这种情况，在红卫兵运动期间已经出现，后来下乡，更产生了一场地下的读书运动。〔１９〕同时，由于下乡，这一代人又有机会更长期更广泛地观察和体验中国下层社会生活，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体验，促进了认同的转变。这种来自亲身经历的认识，比之书本知识，要深刻得多。

第三个原因，是政治形势的突变，这属于外因。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上层斗争，在文革中暴露无遗。这促使年轻的一代，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从此上层政治不再那么神圣，与上层人物的认同随之减弱。红卫兵运动时期，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毛数次在天安门检阅总数达数千万人的红卫兵，对红卫兵恩宠有加。从最早的老红卫兵到后来的造反派，对毛都是无限崇拜，多少青少年梦想沿着青年毛泽东的足迹，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而到了１９６８年，毛却号召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沉重的打击。１９６８年郭路生创作的诗歌，记录了这种失落感，但同时也表达了沉沦中的希望。他的名篇，《相信未来》有这样的诗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２０〕

这种因上层政治变动，对红卫兵一代的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１９７１年的林彪事件。林彪是“副统帅”，毛的“亲密战友”，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上，　被正式定为毛的接班人，怎么突然成了反党集团，搞政变未遂，畏罪潜逃，飞机失事摔死在沙漠里？这是莫大的讽刺。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声讨林彪的罪行，中央下发的批判文件中，说林彪曾经诬蔑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样的话在知青中传播开，使他们有恍然大悟之感，人们仔细一想，林彪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这时内心之中发生的震动可想而知。徐有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林彪事件在破除红卫兵这一代人的政治迷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说，“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疏离‘文革’中官方政治教义的过程早在运动中期就已经开始。怀疑不断地增加，否定不断地产生，林彪事件使许多人完成了这一离经叛道的过程。”〔２１〕

◇　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社会意义

红卫兵认同的转变，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标志着文革结束的一些有社会影响的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代人的认同转变有关系。另外，这种认同的转变，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有重要作用，实际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社会和文化基础。

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是标志着文革时代结束的重要事件之一。“四五

运动”的实质，是对文革极左政策的反叛。“四五运动”后的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毛去世，江青等被抓，中国天崩地裂。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已经成为知青的红卫兵一代人，终于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去考大学。这是知青中的很多人多年的梦想，他们早在农村的务农之余，就在努力自学，准备这一天的到来。但７７、７８两届，也只接纳了极少数的知青。就在这种情况下，７８、７９年冬天，大批知青为了返城，在各地组织了抗议和上访活动。〔２２〕这些活动和同时发生的民主墙运动相交迭，树起了民主、人权、法制的旗帜。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话语。从此以后，直到今天，民主、人权、法制仍然是中国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核心话语。同时，这套话语，对改革初期的法制建设及对文革问题的清理，提供了合法性。

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对经济改革的开展，也提供了社会基础。本文提出，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主要体现在对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怀疑与否定，对个性的张扬，和对物质利益和个人幸福的追求。这并不是说他们原来是不计较物质利益的，但个人利益，不见容于官方的和公开的话语。从文革前到文革期间，都贯穿了对个人即所谓“小我”的否定。红卫兵一代个人主义话语的出现，对中国后来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初期，谁要去从事个体工商活动，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多年以来，社会主义的话语不仅鄙视私人利益，甚至把个人谋生的活动当作资本主义行为，将其妖魔化。“正当”而“体面”的工作，还是要有个单位，最好是国营单位。这时，那些刚回城的老知青，一方面因为安排正式工作困难，又因为经历了在农村为个人谋生的磨炼，对所谓正当与不正当、体面与不体面有他们自己的认识。他们中间很多人，就这样面对社会的压力，成为最初的个体户。他们是市场化的先行者。

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对文革后的思想和文化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文革后的新文学和文化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对这代人的新的认同意识的表达。从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到寻根文学、知青文学等等，都贯穿了对人性的新的探索，一反文革时期文艺作品的革命化基调。这种新的探索和表达，对整个文化氛围影响之深远，直到“六四”才充份地表现出来。“六四”时学生所抗争的，从大处讲是民主政治，但具体则表现为对个性、自由、和个人幸福的追求，以及无法实现这种渴望的焦灼。从１９６８年的《知青之歌》到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广场上崔健的《一无所有》，其间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思想脉络，那就是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直到九十年代市场化的洪水将个人主义浸泡得彻底膨胀的时候，红卫兵一代才回首过去，重新审视人生的社会意义。在物欲和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集体、社区、团结、友情，表现出新的价值。九十年代的知青怀旧思潮，正是这种新的思想转折的集中表现。〔２３〕从红卫兵运动，到民主墙，再到知青怀旧，一代人的认同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交互影响，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力。

注释：

１．本文是作者２０００年完成于纽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部份中文摘要。这次整理时参考了最近出版的有关资料。博士论文的原文见：Guobin yang,china's red guard generation: the ritual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ph.d 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2000).

２．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另见首都红代会部份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天翻地复慨而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２年9月至１９６７年１０月》，第２６页。
３．《四五论坛》（合刊第一期），１９７８年12月１６日。
４．《启蒙》，第一期，１９７９年1月２９日。
５．《崛起的一代》第２期，１９８０年１２月。
６．Charles p. Ridley, paul h. B. Godwin and dennis j. Doolin,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pp.103-104.
７．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利益驱动。但本文强调文化因素对集体行为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研究，忽略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关于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著作甚多。较近的成果，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Andrew g. Walder,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No. 2 (2002),Pp.437-472;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Ｋａｍ－Yee law (e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beyond purge and holocau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８．《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7月１４日。
９．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页
１０．宋永毅对这种异端思潮的出现做过详细的论述。见宋永毅、孙大进编《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１９９７年。
１１．见 Wang shaoguang,"'new trends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No. 21 (1999),Pp.197-217.
１２．见李君如，“个性的孵育与规范”，载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１７页。
１３．许惠英，“走向人生的真实，”载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３页。
１４．米鹤都著，《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第３１４页。
１５．任毅，《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１６页。
１６．杨健所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和《中国知青文学史》（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对这类作品有详尽讨论。
１７．这方面的代表作是 Doug mcadam, freedom sum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１８．关于大串连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见 Guobin yang,"the liminal effects of social movements: red guar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y",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5,No. 3 (2000),Pp.379-406.?
１９．见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２０．食指,《食指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页。
２１．徐有渔,“彻底转变——‘九一三’事件”。《华夏文摘增刊》第２３６期，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２２．见 Thomas b. Gold,"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s educated youth" china quarterly 84 (1980),pp.55-70. 另外，刘小萌近年出版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包括几篇关于知青会城抗争的详尽口述。见其《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３．关于知青怀旧，我已有另文论述。见 Guobin yang,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modern china vol. 29, No. 3(July 2003),pp.267-296.

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

丁凯文

文革爆发到今天已有整整４０年的历史。４０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文革，努力探究它的原委与过程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目前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作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许多书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文革这一课题有较为深入的推进。但是有关文革重要人物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到周恩来与林彪的研究，国内学者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换句话说，周恩来成为中共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伟大人物，在文革中与林彪和“四人帮”集团作了英勇的斗争，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伟人”；而林彪则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是个处心积虑大搞反革命活动的历史罪人。林彪与周恩来是文革开始后位列中共中央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他们都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他们身后却有如此天差地别的评论，实在值得人们深思。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组织文人班子，在１９８１年6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为对文革历史和毛泽东的定位，在提及周恩来时该决议说到：“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此后国内的学者们基本都遵循了这一定论，国内的党史学者们甚至指出：“《决议》的发表，一方面使人们冲破了认识禁区；另一方面也为进行这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课题的科学研究开辟了航道。”〔１〕从此“‘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的说法也就成为国内学者研究周恩来的共识。那么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周恩来对林彪作了哪些“坚持不懈的斗争”?《决议》的发表真的是冲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区开辟了新的研究航道吗？如果我们将周林二人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为作一番比较研究，人们应能得出另一种结论。

一．周恩来与林彪同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助手，而周起的作用更大

国内的学者们无论怎样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即周恩来的的确确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革”的发展。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许多设想最后都是通过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予以考察。

（１）罗瑞卿问题。现在所有中共官方的说辞与回忆等皆众口一词，即罗瑞卿事件是林彪恶意陷害，以倒罗为条件换取对毛发动文革的支持，而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开的解决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所有与会的人士除毛林几个人外都不知道开会的目的何在。似乎毛泽东在着手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前，手下的大员们全被蒙在鼓里。如果真如中共官方所言，这么多与会者又如何及时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又如何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项战略部署呢？毛泽东是这么一个要打无把握胜仗的人吗？而周恩来在倒罗的过程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最早参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一些玄机。王力说“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

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了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自由了。”〔２〕这里有几个问题很清楚，即倒罗是“中央”也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并安排好各地大员们“先稳住罗”，不仅如此，甚至还要“防止罗逃跑”，等上海方面一切部署妥当再通知罗赴上海与会，以顺利完成倒罗的部署。显然，罗瑞卿自己感到有些异样，否则就不会“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如果李井泉、阎红彦等地方大员们对倒罗一事毫不知情，他们又如何贯彻“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以稳住罗呢？事实上，据知情人士透露，毛泽东早就通过一些老帅向他们的部下打了招呼，所有与会的老帅和将军们除贺龙一人不知会议的真实意图外，其余皆知此会的目的何在。罗到昆明时，周恩来特地在电话中明确指示阎红彦要看住罗瑞卿。所以，毛泽东策划倒罗是为其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扫清前沿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倒罗问题上，周恩来不仅是知情的，而且行动上是积极配合的。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吹了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３〕罗到上海后，也是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出面与罗谈话，并告知“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４〕从这些情况来看，周恩来不仅事前参与了倒罗的各项准备活动，且事后作了大量工作，周在１９６６年5月２１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给罗瑞卿等人定性时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５〕

（２）5月政治局会议与防止反革命政变部署。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在谈及文革时，都将林彪的“５１８讲话”视为林彪个人别有用心利用文革，危言耸听要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的讲话开宗明义地讲“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显然，林彪的讲话是毛泽东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们一致同意下所讲，代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项重要部署。接着周恩来在5月２１日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讲话。周说“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周还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６〕在具体的部署方面，周恩来在5月１５日与叶剑英联名致函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７〕在林彪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关于北京卫戍部队，经过与杨成武同志与北京军区协商，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担任。２６

日周恩来参加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在会上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３１日周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议情况及增调部队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８〕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1月２７日接见公交口革命造反派时坦承：“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来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的工作组，由军委、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任务：１、保卫中南海安全。２、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３、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等。４、为保卫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５、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９〕

显而易见，在防止所谓的反革命政变一事上，周恩来不仅讲了话，还亲力亲为作了大量的实质性工作。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分析：“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１０〕这一分析应是十分中肯的。

（３）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勃发。文革初起时，毛泽东为了发动广大学生起来造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 反，大力支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使得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迅速展开。国内的一些党史论者大都将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归结为别有用心，如将林彪在１９６６年8月１８日的讲话作为其煽动文革的一项罪责，称“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１１〕且不说林彪这篇奉命而读的讲话出自陶铸的写作班子，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意图，〔１２〕毛泽东更在这个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赞赏性地对林彪讲“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１３〕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在８月８日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８月１２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和８月１３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均表示赞成。〔１４〕周恩来自己在９月２５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１５〕那么周恩来又是如何积极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呢？目前官方的《周恩来传》等都承认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在解释上大都将周的言行归结为“很不理解”、“违心”和“被动”，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１６〕

红卫兵搞大串联，要到北京见伟大领袖，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要安排好他们的食宿、交通以及安全等问题，但这却是毛泽东的设想。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１７〕。

周在８月５日清华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作为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１８〕８月２７日周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

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１９〕

在８月３１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２０〕

周恩来还精心安排了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从组织、安排、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严格把关，精心策划。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周对此抓得很紧，总结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都参加了。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１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１１月２５日和１１月２６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１１００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２５０万。〔２１〕

由此可见，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疯狂设想很难如此顺利实现。即使周在事前“不太理解”，但在行动上周则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

（４）关于造反派造反夺权问题。夺回被赫鲁晓夫式的人篡夺的党政大权是文革开始后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五一六通知》里就特别提及要揪出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的一项重要罪名就是“为了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煽动造反派强加给他们‘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周恩来“对于林彪、江青这种倒行逆施，周总理表示坚决反对。”〔２２〕那么，周恩来对待造反运动是“坚决反对”的吗？针对１９６７年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各大区及省委书记们存在的担心和疑惑，周恩来在１月１４日的讲话中说“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赶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２３〕对于是否夺权和如何夺权的问题，周恩来在１月１７日的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说“在上海，革命的工人、干部、职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控制的地方，要不要夺权？要夺权！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写得清楚，要夺权。需要夺权的，决不能迟疑。”“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政法系统，北京公安局就夺了权嘛！中央文革要帮助他们，条件成熟的先

夺权，条件不成熟的先监督，夺权！第一是领导权，就要管它，监督它，（江青插话说：业务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要靠你们的革命实践，经过你们实践，我们再总结，提高一点。"〔２４〕周随后在１月２１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呢？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过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２５〕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王力都认为"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这段话后果很严重"。由此而来，全国上下全面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紧跟而上，形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此后，各省市、各地区造反夺权不断，导致更大规模的动乱局面。这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设想和部署，是江青和"上海帮"冲锋陷阵的结果，但同时也与周恩来的作用密不可分。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对毛的步步紧跟，丝毫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坚决抵制"这一夺权运动的，更看不出周恩来与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不同之处。

二．周恩来与林彪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谈到林彪和江青时说"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因而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被定位于"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叶剑英后来则说"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２６〕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前期领导文革运动最重要的机构，考察周林二人对此小组的态度则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怪胎，它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管辖之下，但却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且具有极大的权力，负责指导全国的政治运动。中央文革小组虽然名义上是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副组长，但陈伯达很快就被边缘化，江青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等人对江无不礼让三分。有些人无视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意区分林彪与周恩来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似乎周恩来一直是坚决抵制，而林彪则是曲意逢迎。〔２７〕更有人撰文称林彪在文革中对江青进行了"集中吹捧"〔２８〕

由于文革疯狂的夺权运动，中共的党政系统，特别是国务院系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不少干部被关押、批斗，政府日常活动陷于瘫痪，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如日中天，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权力核心。面对江青等"上海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周恩来基本上采取了隐忍的顺守之道，从不敢公开反驳，更不要说"坚决抵制"了。由于"二月逆流"后毛泽东采取高压手段严厉批评了几位老帅，周恩来也被迫跟着检讨。江青趾高气扬，开始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公开向周恩来叫板夺权。１９６７年2月江青就曾指着周的鼻子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２９〕江青甚至说"主席已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象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总觉得周恩来做得不够，逼周恩来交权，周恩来对江青等人只好说"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３０〕

周恩来作为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此时竟然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吴法宪将军时任空军司令，曾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吴回忆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３１〕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所谓的文革不过就是毛氏夫妇的双簧表演，为了保持所谓的“晚节”，周恩来必须对毛江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周恩来此时已到了唾面自干的程度，周内心虽然极为苦闷，但却始终保持冷静，从不声辩，更不会拍案而起，周恩来知道，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步了刘少奇、陶铸等人的后尘，随时可能被毛江抛出予以打倒。此时的周恩来步步紧跟尤恐不及，何曾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私下的表白很能说明问题，当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提醒周恩来要提防江青时，周叹了一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义尽。１９４５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周还叮嘱李志绥不要同任何人讲此事。连李医生都看出“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３２〕周恩来此时只敢私下叹气，感慨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能见容于江青这些文革暴发户。王力则评论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的。〔３３〕

１９６８年3月２４日是毛泽东解决”杨余傅“的重要日子，当晚召开的军队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和林彪都不约而同地高调称赞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周说“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１９６４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１９６６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周还振臂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３４〕

林彪在会上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一位，也是我们党内女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位，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也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很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她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出她的作用，很大很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她始终树立了很多的功勋，始终站在革命的前线

上，捍卫江青同志的权威也就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司令部的权威，也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部署的权威，也就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３５〕

当时也在场的林办秘书张云生注意到林彪说到江青时故意压低了调子，看得出林彪当时讲得很勉强。张云生隐约地感到林彪这时的讲话东拉西扯，语无伦次，显得言不由衷、逢场作戏，很可能是政治形式所迫。周林等人讲完话后，《东方红》的乐曲突然响奏起来，毛泽东随即从主席台右边走了出来，全场立时欢声雷动。〔３６〕这充分显示出这次解决“杨余傅”的会议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又一个“伟大战略决策”。

周恩来和林彪在公众场合如此肉麻地吹捧江青，表面上看是向江青表忠心，但更重要的是作给当时隐身幕后的毛泽东看的，是在向毛泽东表忠心，江青不过就是在前台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已，毛泽东才是整个事件的真正决策人。整体来看，文革初期这段时间，周恩来心怀戒惧，诚惶诚恐，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的具体事务，是毛泽东、江青推动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体执行人。

林彪虽然贵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但从不介入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除了在毛泽东需要时出面讲讲话外，大都置身事外。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林彪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不大买账。据吴法宪回忆，江青等人在１９６７年1月１９日的中央军委扩大碰头会上指责总政主任萧华没有在军内搞起文革运动，声称“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并要求萧华当晚去工人体育馆参加群众大会。〔３７〕江青等人就是想通过打倒总政主任萧华，再弄倒军委前台的叶剑英，达到插手军权的目的。这一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很清楚。叶剑英在２０日上午赶到林彪处，向林彪汇报了晚上会议的情况和以后发生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大怒。为此，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在盛怒之下掀翻了身边的茶几，高声叫警卫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３８〕吴法宪说“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２１日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中央文革却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军队一些干部发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江青听了关锋的汇报后认为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的会议，要求主持会议的徐向前检讨，而徐却推给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让黄作检讨。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由于不满徐向前的态度，几次要求林彪再换他人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被林彪拒绝。林彪事后对吴法宪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

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说：以后果然如此，徐帅下来以后，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以后，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就销声匿迹了。〔３９〕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１９６７年２月军委颁布的八条命令实际上亦是针对造反派对军队的夺权运动，起到了抑制造反派的作用。

对于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事务，林彪则坚决予以抵制。林在１９６８年曾对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位将军说“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进来捣乱的。”〔４０〕军委办事组在黄永胜领导下坚决站在周恩来与林彪一方多次抵制了江青等“上海帮”的无理取闹，对维护政局的稳定，加强战备以及“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革开展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于这场运动，也不可能公开表示对文革的异议或反对，但对比周恩来与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显然，周恩来更像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媳妇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这对恶婆婆，而林彪则不大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账，对江青插手军队之事处处提防。

三．周恩来、林彪与“三支两军”的关系

自从１９６７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各省市地区、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以及单位部门等无不分成两派，造反夺权无日无之，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个个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派性的膨胀使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全国出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如何控制这一局面，毛泽东的策略是祭出解放军这一法宝，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军队从此深深地介入地方的事务。所谓“三支两军”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而“支左和军管”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周恩来与林彪也都卷进这一事件之中。

既然“三支两军”的主角是军队，按理说林彪作为当时军队的主管人物应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我们却发现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即林彪对这些具体的军务甚少过问，而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周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具体管得很深很细，尤其是“三支两军”的过程中，更体现了周氏对军队有很强的掌控能力。

毛泽东就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就南京军区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４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时说“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４２〕这实际上是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开端，而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

１９６７年1月２５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４３〕2月１７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４４〕同月２７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２８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４５〕

3月１３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４６〕１８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４７〕３月２３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４８〕5月１９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7月２８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４９〕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5月２７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ＸＸ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２８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５０〕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与“三支两军”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１９６７年3月２０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虽然到会讲话，但基本上是打些官腔，实质内容不多，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

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５１〕林彪讲话后，毛泽东与林彪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显示出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林彪有极为独到的见解，王力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５２〕

四．周恩来、林彪与“打倒老干部”问题

现在大陆官方给林彪定罪的一个重要罪名就是“疯狂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就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风”，而周恩来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历来的干部政策，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５３〕另外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研究述评》中也提到国内的研究者都用“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来形容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他们最常提及的就是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对陈毅、贺龙、彭德怀和宋庆龄等人的保护，以及文革后期对邓小平的支持和“解放”１７５位将军等事。〔５４〕这样一正一反衬托出周恩来对老干部是真心保护的，而林彪对老干部则是残酷迫害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然而，这场“革命”首先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然后却要广大老百姓自下而上造反夺权。既然文革是一场“革命”，是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是一场全民的“夺权”运动，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对广大上层领导阶层形成巨大的冲击，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委的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打倒或被夺权的范畴之内，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有时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要根据他们的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王力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中央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是专案组。……专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属中央常委，也就是对毛主席直接负责。”“专案组机构的成立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一个处理彭、陆、杨这几个人的机构，罗瑞卿除外，他由军委处理。另外加一个田家英。当时毛主席同江青不在北京，根据毛主席指示，由刘少奇主持，成立一个组，分别同四个人谈话，处理他们的问题。这个组少奇同志决定由周总理总负责。下面分四个分组。……一个是彭真的组，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一个组是康生负责，一个组是陈伯达负责。第四组安子文是组长，成员由王力、戚本禹，在周总理统一部署下工作”.〔５５〕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在后来有所增减，但大的格局基本未变。据知情人士透露，各专案组直接向周恩

来负责，负责的内容包括被审者的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可否家属探视等，周恩来可说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后来的很多老干部回忆文革文章中都看到这样的叙述（虽说大多数都是正面回忆)。海外著名学者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错案都逃不脱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高先生特别指出“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作者曾接触过其中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５６〕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党内的老干部的态度基本上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文革刚刚开始时，刘邓等人尚未彻底倒台时，毛泽东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党内斗争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彭罗陆杨”几个人身上。对于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来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时谈到彭真，周说“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５７〕１１月２８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谈及文艺团体时说“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７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陆定一时说陆“三二年就叛变了，也是叛徒。”〔５８〕陆定一随后被关进秦城监狱。陆定一后来曾痛苦地回忆了自己的这段经历，陆说“１９６７年１０月9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５９〕从陆定一的这段回忆，我们丝毫看不到周恩来“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光辉”形象。

随着文革按着毛泽东的思路不断深入开展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被抛了出来，周恩来也一改过去不许红卫兵批判刘邓的做法。１９６７年1月７日年周恩来、江青接见农林口造反派时说“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错了，要把方向指向刘、邓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更进一步指向反党集团。现在正在进行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个反党集团，以及环绕这个集团的许多人，比如计划经济战线上的反党集团是薄一波，而不应该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象安子文这些人是负有跟彭真一样的反党罪责的，你们这个时期在北京的许

多批判大会上，已经点了不少人的名，大家都弄清楚了。所以，斗争的矛头一定要指对。我们应当把批判反党集团的罪行，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斗、批、改这个斗争结合起来。”〔６０〕

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８年之间全国各省市地区的领导人有不少被点名批判打倒，周恩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１９６７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３月２８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６１〕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处理因夺权斗争而引发的各省和地区的矛盾，以及成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三支两军”后部队系统介入地方政治工作，一些领导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另一些人则重新进入新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造反派秉承中央文革的旨意疯狂夺权而迫害老干部时，一些老干部被整得死去活来。原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因为被毛泽东江青点名而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现在不少书籍谈及此事时都说周对此很悲愤，并说“这个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６２〕由此显示出周对老干部的惨死悲愤异常。然而，周还有他的另一面。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１９６７年1月１４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其他场合还不止一次说到阎红彦之死，在1月１４日的对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６３〕周恩来这种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的态度岂是用“大树参天护英华”一词就能加以掩盖呢？

文革中军队的一些老干部也相应倒台，大者如贺龙、杨勇、廖汉生等人。１９６７年1月２９日周恩来与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革命组织时说“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

挖得深，挖得透，再作结论。”〔６４〕实际上廖汉生１月８日即被抓，杨勇在一个多星期后也被关押，北京军区成为全军１２个大军区当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军区，也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被抓的一个军区。１９６７年８月１日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时说“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两个结论：贺龙不是一贯正确地，（一）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二）肃反扩大化。”８月２日周又说“贺龙要背靠背斗，这是最高指示。”〔６５〕不久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报送审查报告，毛则在９月１３日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贺龙随即被关押在国务院前指的西山象鼻子沟寓所，直至病危身亡。周在审查报告上亲笔写下了大段的批语，实为对贺的落井下石。高文谦先生说“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６６〕

那么林彪是如何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呢？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从内部的文电中得知阎红彦自杀的消息。林彪听后，身体颤抖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此前不久，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也由于经不住造反派的折磨，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致死。林彪听到那个消息后，身体也颤抖了一下。……这一期间，林彪的情绪相当坏。文件不爱听，‘转车’也少了，平时整天闷坐在沙发上……”〔６７〕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张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林彪得知张霖之的死讯非常震惊，当主管国防科委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将军向林彪汇报工作时谈及张霖之之死，林彪当场表态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６８〕林彪还托王秉璋将军向张霖之的遗属表示慰问，尔后又顶住江青的干扰接见了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并与周恩来一起促成了张霖之的女儿与邱会作的儿子的婚事。林彪对李蕴华说“他被毒打致死，说明他没有屈从造反派，没有屈从她（指江青）”赵尔陆将军过世后，林彪也接赵的夫人郭子瑞到毛家湾休息。王秉璋将军因被残酷批斗折磨向林彪求救。林彪对此极为愤怒，大骂“法西斯！惨无人道！他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搞死!。”林彪命令王秉璋说“你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不要出来，避避风潮。”〔６９〕赵尔陆和王秉璋都曾经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而张霖之却与林彪素无渊源，但林彪却是文革中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张霖之不幸去世的元凶，并毫不隐讳地说出“张霖之是个好同志”的中央领导人。以上的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林彪内心对打倒老干部的反感和其对文革的真实态度。

周恩来在打倒刘少奇一事上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文谦先生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极为详尽的论述，〔７０〕此处不再赘述。笔者这里想谈的另一件事是林彪与刘少奇一案的关系。文革期间林彪从未管过中央专案，也未直接负责过其中任何一个案子。但后来的“两案”审理过程中，特别给林彪加上了一条蓄意迫害刘少奇的罪名，中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中特别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车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林彪、叶群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７１〕这也是当局指控林彪参与迫害刘少奇的唯一证据。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既然雷英夫早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就积极投靠林彪集团蓄意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可是在两案审理时，特别法庭对以上指控并未进行过专门的庭审调查，雷英夫在审判后不仅没有因为这一罪行予以追究锒铛入狱，反而在后来还按

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先生曾专文辨析雷英夫的问题，予以详尽的分析，余先生对此特别提出疑问：“惟‘诬陷材料’为什么会出自雷英夫之手？令人好生疑惑。以现有材料来看，雷与刘勉强可以扯得上有些关系的，仅是１９４０年代中期雷在北平军调部，刘后来的夫人王光美亦在此时参加军调部中共方面工作，与雷短期共事过，而中共建国后雷与刘、王便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难道真的是叶群告诉他的那一句话起了刺激作用？况且，雷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高层的变动，以及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揣测得如此迅速、准确，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真是匪夷所思!”〔７２〕此外，以林彪的地位，怎么会找上总参二级部的一个副部长来诬陷刘少奇呢？笔者见过国内一位知情人士，此人曾与雷英夫多次详谈。据雷英夫本人讲，那个所谓林彪指使雷诬陷刘少奇一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两案”审理小组授意雷英夫如此交代承认，惟如此才能给林彪安上蓄意诬陷刘少奇的罪名。正由于这是出自“两案”审理小组的授意，雷英夫日后不仅不会被追究“诬陷罪”，反而属于“为党立新功”，自然也就可以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雷损失的无非就是个人的名声而已。所以，余汝信先生前面提出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见，所谓的林彪蓄意诬陷刘少奇不过就是中共当局的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林彪虽然在刘被打倒的材料上批了几句表态声明的话，但与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上的实际表现和作用相比较，林彪差周恩来何止十万八千里。

整体来看，文革中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并 不想彻底打倒的人，如邓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通融照顾。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７３〕其实反之也一样，毛泽东坚决打倒的人，周不会伸以援手予以保护。现在大陆党史学界有意用所谓周恩来保护了一些老干部来掩盖周恩来的确参与迫害老干部之事，这无非还是为尊者讳，将迫害老干部的罪名转嫁到林彪的头上，希图掩盖历史事实罢了。

五．文革之中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文革史研究者们研究文革历史无法回避的课题。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定位为“他（指周恩来——笔者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日后国内研究周恩来的文章和书籍大都遵循此说，笼统抽象地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解释为对立和斗争，但他们却举不出一件具体事例来说明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７４〕如果我们将这句话改写为，“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林彪关系融洽密切、互相尊重与支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见解相同”则更加贴近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目的在于着手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１９６６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手将林彪的名字从常委排列的第六名提升到第二名，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号人物，而周恩来依然是第三号人物不变，林彪这位曾长期居于周恩来下属的人一下子成为周的顶头上司，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项决定坚决拥护支持。一来，周恩来一向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二来，周恩来总是将自己摆在辅佐、帮手的位置，对接班人一职不做非份之想。这就注定了周恩来对林彪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就曾说：“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７５〕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周恩来长期位居中央领导地位，而林彪则在外领兵打仗，林彪很少参与以往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鲜有参与历次党内整人活动，这在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是很少有的。所以，林与周恩来没有个人芥蒂。自１９５９年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林彪对周恩来的国务院工作都给予大力支持，周林关系一直密切。

林彪在文革初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后，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称颂。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７６〕１９６７年1月２１日，周在人大会堂接见军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员同志时的讲话说：“我在十一中全会上说过，林彪同志确确实实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经过了几十年的考察，是心悦诚服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因为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是把我们解放军培养最好的一位领导同志。另一个是陈伯达同志，把毛泽东思想阐明的最好，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用理论的文章来宣传，我向全党推荐这两位同志”〔７７〕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再次全面长篇称颂林彪“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７８〕周恩来原本长期是林彪的顶头上司，现在却变成了林的下属，但周恩来为树立林彪的接班人形象而甘为人下的表态无疑成为全党的表率。

（２）周恩来对林彪极为尊重。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的讲话每当提到毛泽东时，必定还要加上林彪，将毛林二人并列提及。比如１９６６年9月２６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说“我现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林彪同志、林彪副主席、代表国务院以及我个人向你们问好。”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时，开头就说“我首先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７９〕周恩来在文革时期这样的讲话不胜枚举。

此外，周恩来的讲话中还大量引用林彪的讲话，以突出林彪的地位。在行动上，周恩来也自觉地将毛林二人放在首位，文革时毛林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必然是毛第一，林第二，周第三。周恩来除了事事向毛请示汇报外，同样也向林请示汇报。有时甚至当毛有意只向周交代的事，周也向林通气。１９６７年8月毛泽东要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京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个人的意旨，以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关戚”，并对杨说此事只向周一人汇报。但周对杨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说是我让您向林副主席通报的。”杨随后飞赴北戴河向林通报

此事。〔８０〕庐山会议后，毛对林已心生反感，毛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让李志绥医生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的研治工作，李医生说要与周恩来讲，以便得到国务院的大力支持，毛同意但强调不要告诉林彪。但是周实际上还是向林作了汇报。李志绥对此心存忐忑很长时间，但周对李医生说“这是我报告林副主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８１〕即使是在毛林明显交恶之后，周恩来仍然严守分际，在１９７１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城楼晚会上，周恩来为了摄影师是否拍到了毛林在一起的照片而焦虑不安。王力以自己的亲身观察说：“总理对林彪还是很尊重的。”〔８２〕事实上周恩来对林彪的的表现是一贯的，不能用“周脚踩两只船”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来予以解释，这些都表明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对林彪的尊重。

（３）周恩来对林彪的保护。文革初期，林彪长女林晓霖在所在学校哈尔滨军工学院积极参加造反派，林彪对此很不满，曾发有一信给哈军工声称林晓霖只代表她自己，后又将其转送他处隔离保护起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谈话时，周恩来为林彪作辩护说：“林副主席讲话我看过了，我证实是真的”。“这个问题你们不要去研究了，最伟大的人对自己子女也处理不好，封建社会里有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了。他们把它（林副主席指示）到处张贴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娃娃们不懂这些事情。这是林副主席和造反团随便的谈话，家务事也讲了”。〔８３〕九届二中全会上周为林彪修改讲话稿，并致信康生称：“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又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我亲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８４〕周恩来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保护林彪，不希望党内矛盾激化，周恩来用心良苦。

（４）周恩来对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到军队的战备工作、国防建设、对外军援等诸多方面，这样的事例有很多。中共九大后，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国防工业各口划归军队管理，生产和基建项目由军委办事组计划平衡，再由整个国家计划平衡。１９６８年9月周恩来就强调一定要把国防工业赶上去，我们已经耽误了两年，再不允许耽误了。１９６９年2月，周恩来召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部委军管会及部负责人会议，谈及国防工业的生产问题，强调抓紧常规武器的生产，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互相配合。3月份针对苏联可能对珍宝岛的进攻，周恩来与军队领导商量加强中方岸基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的作战部署。１９６９年9月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１１月下旬周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防工业问题，并接见国防工业系统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并指出：要把革命和备战结合起来，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用备战影响革命，以革命支持备战。〔８５〕中国的经济建设在那个时期开始逐步步入正轨，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研制成功等等。正是由于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工作的大力支持，军队投入“三支两军”的工作顺利展开，不仅起到了稳定全国局势的作用，且迅速恢复了由于文革运动造成停滞的生产，使国民经济得以在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得到较快的发展。

林彪在文革中与周恩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林彪与周恩来有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彼此尊重和信任。从黄埔军校到

北伐战争，从井冈山的斗争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林彪一直是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他们都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一同走过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周林二人的关系并不为过。文革期间周林的关系更显密切。在中共九大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称颂林彪，林彪听后极为感动和不安，当场即席发言说“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象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８６〕面对周恩来的赞颂，林彪可说是诚惶诚恐的，林彪的临时讲话显示出林的真实的心态和对周恩来的敬重。

（２）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系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动，而且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必然地联系。林彪曾对周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林彪还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８７〕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故意为难周恩来时，林彪都会通过军委办事组及时施以援手。１９７０年5月１７日，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人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８８〕面对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黄永胜等人当场与江青顶了起来，随即宣布退场。事后黄永胜、吴法宪在林彪的指示下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的言论，邱会作则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通报有关情况。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８９〕林彪十分了解周恩来的困难处境，所以林经常告诫军委办事组几位将军尊重周恩来，因为无论是毛还是林，无人可以像周恩来那样处理好全国的事务，林甚至警告吴法宪不要听江青和康生那些攻击周恩来的话，林相信康生有意取周而代之。〔９０〕林彪在文革中对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与维护恰恰是当今国内史学研究者有意忽略的。

（３）林彪与周恩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较为一致。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周林的看法基本一致。１９７１年万里和赵紫阳就是在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军队干部如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继解放。〔９１〕在九大前后，周林对中国政治走向的看法也较为一致，也就是文革已告一段落，应该开始抓紧国民经济的建设。正是由于陈伯达受林彪的委托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的这一想法自然就体现在陈伯达的笔下。陈伯达起草的报告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里的地位，不过就是中央的笔杆子，号称“老夫子”，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和支持，陈伯达不可能自己凭空想出这么一个报告题目。林彪的这一想法实际上与周恩来也是不谋而合的。

正由于周恩来与林彪相互尊重与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处于最佳时期。特别是中共九大之后，全国的混乱局面逐渐趋于平稳，国计民生也开始步入正轨。但毛泽东对此却产生了不满，随后“上海帮”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日

趋激烈，从而导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批判张春桥，而后遭到毛泽东的全面反击，最终引发了震惊中外的“９１３事件”。在庐山会议过程中，由于毛泽东不满林彪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想要将吴法宪与陈伯达一起批判，而周恩来则向毛进言，请毛泽东去掉《我的一点意见》之中对吴法宪的批判。毛泽东在庐山上权衡轻重后毅然将陈伯达拿来祭刀，拿掉这个越来越不听使唤的文人，作为打开批林的一个突破口。这之后周恩来一直暗中帮助吴法宪和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检讨过关，并设法缓和毛林之间的矛盾。周恩来为了保护林彪，不仅在庐山上恳请康生连夜修改林彪的讲话稿，还给吴法宪出主意，让吴主动写检讨过关。〔９２〕周恩来很清楚，保护了吴法宪实际上也就是保护了吴背后的林彪。周恩来与林彪的这层关系实际上一直持续倒“９１３事件”的前夜。当周恩来最终得到林彪确实死于蒙古温都尔汗的飞机坠毁消息后，周曾为此失声痛哭。这里包含了周内心深处对林彪的悲痛和惋惜，显示出周恩来对林彪的真实情感。

事实证明，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与支持，且持有基本一致的治国理念。现在中共将周恩来与林彪关系解释为周恩来与林彪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视事实和有意误导视听，无非就是想人为地区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方面拔高周恩来的伟人形象，另一方面则继续抹黑林彪，让林彪充当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六．如何评价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

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三个人，江青指挥造反派在前台的冲锋陷阵，周恩来不仅负责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保障文革得以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的角色，而林彪指挥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保驾护航。周恩来和林彪都是毛泽东文革当中必须利用的力量。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则看出林彪的作用还主要局限在军队内部，可周恩来的作用不仅涉及到全中国的各行各业，周对军队同样有极大的影响，军委高层的几位老帅老将军们，如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等人都听周恩来的，与周合作密切。整体而言，毛泽东是文革一切政治决策的决定者，而周恩来则是其执行者。文革当中没有毛泽东的决定什么事都不能办，而毛泽东的决策又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执行。正是由于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中坚定的拥护者和具体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一个无可轻易代替的力量，周在文革前期虽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化险为夷，这与毛泽东的使用与林彪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与林彪同属中共的老干部，他们都具有其他老干部相同的特点，也有与他们相同的弱点。那就是对毛泽东君臣般的关系。周恩来与林彪都不可能违逆毛泽东的意图，更不可能改变文革的大方向，他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小小的调整，所以周林二人本质上殊无二致。文革期间他们都秉持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忠君式思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句话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都曾说过多次。周恩来“保持晚节”的心态更加严重，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步上了刘少奇的后尘，一个“伍豪启示”一直压在周的心上，成为周的一块心病，以致１９７５年9月周临进手术室做手术之前还要再次对其订正处理，免得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倒台的一大罪状。在林彪倒台前，周恩来与林彪互为依靠，小心谨慎地与毛泽东一手扶持的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周旋，试图“抓革命促生产”维持全国的稳定，为毛泽东收拾文

革以来造成的烂摊子。可是林彪由于对“上海帮”的打击出手过早成为毛泽东清洗的对象，从此周林之间的密切关系解体，周一人孤立无援，成为日后“四人帮”集中攻击的目标。

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林彪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周恩来比林彪更早一些介入了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且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发挥了比林彪更重要的作用。

（２）周恩来介入文革的时间比林彪更长，林彪只趟了５年文革浑水，可周却趟了几近１０年。

（３）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军队内部，“三支两军”后军队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林彪涉及并不多，而周恩来在文革的作用则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

（４）周恩来在文革中从未提出过任何大政方针，也不敢公开抵制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而林彪则
敢于反“上海帮”，坚决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试图插手军权的企图。

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国内不少学者多有论述。笔者只想强调，周恩来最亮眼的表现是，在文革乱局中仍不忘国计民生，在紧跟毛泽东搞文革“抓革命”的同时，还尽力设法维护全国的生产，不使经济全面倒退。特别是周曾利用九大后政局的短暂平稳时期，大力恢复因文革运动造成的生产停滞，使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周在四届人大上提出要在二十世纪末将中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一符合民心的宏伟蓝图，使得周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方。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周去世后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怀念和敬仰。

林彪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有下列几点：

（１）在文革混乱的局面中保持了军队的稳定。林彪极为重视军队的稳定状态，不许地方式武斗夺权之事在军内发生，“军委八条命令”就是最好的一例。而军队的相对稳定使后来的“三支两军”能够顺利进行，对保证地方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２）林彪严防江青一伙染指军队事务，诸如搞掉“全军文革小组”使江青无法插手军队事务。即使后来林彪倒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无法迅速有效地填补军中出现的空白，更无法找到自己在军中的代理人，这实际上为日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文革期间，既使地方再乱，生产停滞，但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从未放松国防安全和建设，
文革前国防和“三线建设”在文革中是延续的，没有中断，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开
发有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巩固了国防，还顶住了前苏联的试探性进攻。

（４）林彪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江青“上海帮”的遏制，换句话说，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行为有所约束，包括林让黄永胜、吴法宪向毛反映江青对周恩来的恶意攻击等。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更是明显的一例，只是庐山会议的斗争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才招致林的失败。庐山会议前，江青等人虽有毛泽东的扶植，但毕竟还只是文革中的暴发户，在中央高层相对处于劣势，其政坛势力与军方相比还相去甚远。但林彪倒台后，“四人帮”在党内的势力大增，在中央高层也占了优势，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春桥不仅荣升政治局常委，还当上了解放军总政主任，“四人帮”开始染指军权。这在林彪在世时是不可能发生的。

周恩来与林彪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周恩来更能忍隐，更会小心处理好与毛泽东、江青的关系，对于来自毛泽东和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不会公开说“不”，周时时处处检讨自己以往的过错，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工具。王力回忆说“至于对周恩来在历史上的路线错误，周恩来自己从来不回避，从来是到处讲，讲得别人都不爱听了。毛泽东也不避讳，当着周恩来的面，不但对中国人，也对外国人公开讲。”〔９３〕与周恩来相比，林彪则更有自己的主见，且林彪从来不作自我作践式的检讨，特别是“９１３事件”前夕，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淫威和打压，敢于对毛硬顶，敢于对毛泽东说“不”，其不甘于作毛泽东的工具显示出林彪独有的性格。无论林彪最后是主动出走还是被动出走，事实上林都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林彪虽然身死大漠，但其对毛泽东的一击却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使毛泽东的神话彻底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败亡。华飞先生说得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９４〕

周恩来与林彪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对当今社会亦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皇权统治下，人民大众对正统当权者的倒行逆施习以为常，且逆来顺受，如非走投无路绝不会铤而走险，这种惯于作“奴才”的成王败寇心态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所以，不少人将林彪敢于对毛说“不”与毛决裂视为大逆不道，而对周恩来的忠心侍主、委屈求全和鞠躬尽瘁津津乐道。时至今日，我们也应有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周林二人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林彪在文革中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１）中共自七大起就将毛泽东定位于一尊，具有最高的权力，只是个人崇拜在战争年代还不那么显著突出。中共建国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都曾大力制造了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１９５９年9月9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表态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９５〕邓小平直接负责的与“苏修”论战的“九评”中，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频频肯定个人迷信，将个人迷信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中共中央的集体表态。周恩来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更是大吹特吹毛泽东，此后又将其拍成

电影全国放映，其影响至深且巨。在这个整体环境下，林彪也参与其中，大力鼓吹“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林彪大搞“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等。中共全党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得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祇”，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

（２）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泽东为了将林彪拉上文革的战车，１９６６年3月毛和江青一手操纵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５月７日毛给林的《五七指示》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公开赞扬“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动树立并利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威信，实际上是毛为文革大业所作的必要准备。而林彪也大树毛泽东的威信，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林彪称颂毛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毛泽东还发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毛林这种“互树权威”“互树威信”的做法，使毛林二人的声望和地位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空前高涨和巩固，而毛泽东对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关系，因此，林彪在树立毛泽东的威信和个人崇拜方面比周恩来走得更远。因此，林彪在这一点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３）文革前期，林彪支持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文革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其中的代价极为惨重其教训亦极为深刻，特别是运动中相当一批干部和普罗大众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甚至死于非命。虽然毛泽东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人，但其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林彪，在当时的那种体制和政治环境下，林彪不可能事事置身事外，一点责任没有，诸如罗瑞卿事件、贺龙事件和“杨余傅事件”等。林彪当然要负他的那份责任。然而由于大陆官方刻意掩盖那些不利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资料，将一切罪责归结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乃至许多历史事实被歪曲被篡改，全面厘清这段历史还需更多的材料和知情人士的披露。所以，我们在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要尽力追求事实真相，澄清史实，这样才能分清历史责任，而不是根据政治需要将所有责任推到某个人的头上。换句话说，既不要搞“为尊者讳”，也不要搞“妖魔化”。

结　论

１９８０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针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说过一番话：“‘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了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然而，邓小平在谈及林彪时却将林彪归结为“反革命集团”，声称“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９６〕

通过上文对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绝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说了违心的话”和“做了违心的事”这么简单，林彪更不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要“阴谋夺权”。周恩来与林彪都是毛泽东发起和推动文革的重要力量，周林二人又是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
的，而周恩来更是一心一意地积极参与和支持了文革的深入进行，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工具之一。认真比较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周氏在文革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保障了文革得以顺利进行，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任劳任怨和兢兢业业，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邓小平后来对毛泽东文革运动的否定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周恩来所作所为的否定。但是邓小平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心将周恩来送上新的“圣坛”，将林彪打进“十八层地狱”，罔顾事实地将周恩来与林彪和“四人帮”区分开来，力图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都是“违心的”，邓小平此举不仅不能“洗清”周恩来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得形象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这同样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篡改。

邓小平这种人为的二分法，以两种不同的标准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与功过，将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分成所谓“好人犯错”和“坏人犯罪”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毛泽东的祸国殃民作开脱。假使邓小平这段解释周恩来的话能说得通的话，那么它用在林彪身上也同样合适。林彪在文革中不也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吗？且林彪说的违心话比周恩来要少得多，违心事做的更比周恩来少得多。凭什么林彪就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而周恩来就是“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呢？更何况林彪最后敢于挺身而出打击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功臣”——张春桥，林彪以自己的行动显示出自己对文革的实际态度，可周恩来却只有相忍为“党”（实是为毛），俯首贴耳，逆来顺受。所以，林彪的倒台与文革中其他老干部的倒台是一样的，林彪事实上从毛泽东文革运动的助力变为阻力而被毛泽东所不容所打倒。仰天长啸先生分析得好：“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坚持文革中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是林彪最终要与毛决裂，所有有正气的老干部最终都会与毛分道扬镳的。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就是有力的证明。”〔９７〕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四人帮“实乃完成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未竟之业。

然而，正是由于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的这番似是而非的谈话将周恩来文革作用定性为“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位于“反革命集团”，一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照搬了邓的这一讲话精神，将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对立”与“斗争”，以后国内的党史研究者只能在这个圈子里打转，难得突破难得进展。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过就是一个新版的“两个凡是”，它不仅不是冲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区为文革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航道，反而是为文革史的研究设置了新的禁区和障碍，成为日后官方研究周恩来的定版模式，周恩来的形象也被脸谱化，变成“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为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坚决斗争的“中流砥柱”，这无疑与历史的真实相差太远。所以我们对周恩来与林彪的研究必须彻底抛弃《决议》给周林二人的脸谱型定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客观地梳理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当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这才是海内外史学研究者应该共同秉持的原则和立场。

注释：

〔１〕金春明、崔久恒《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研究述评》，载《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3月第一版，５４４页
〔２〕《王力反思录》下卷，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10月版　５７７－５７８页
〔３〕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　海南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1月版，１９０页
〔４〕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　１９５页
〔５〕《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５日)，参见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４７２期　２００４年10月15日
〔６〕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　枫华园》第４７２期　２００４年10月１5日
〔７〕《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4月版　６２８－６２９页
〔８〕《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６２９页
〔９〕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1月２７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１０〕余汝信《林彪“５·１８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４３６期　２００４年2月６日
〔１１〕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　１１４－１１５页
〔１２〕何蜀《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　参见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下卷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7月版　６１０－６１３页
〔１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1月版　１０7页
〔１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１０６页
〔１５〕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坐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６年9月２５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１６〕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5月版　１－7页
〔１７〕《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６４７页
〔１８〕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１９６６年8月５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１９〕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６年8月２７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０〕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６年8月３１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１〕舒云《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４７０期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7日
〔２２〕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１４页
〔２３〕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1月１４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４〕周恩来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1月１7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５〕《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８０８页
〔２６〕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版　３页
〔２７〕穆欣《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　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１５－３０页
〔２８〕温相《林彪对江青的集中吹捧揭密》　见互联网《文学城》的温相博客
http://blog.wenxuecity.com/archives.php?date=200406&blogID=12
〔２９〕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２７页
〔３０〕《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９８４页
〔３１〕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２３４页
〔３２〕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年版　４９０页
〔３３〕《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１１页
〔３４〕周恩来江青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８年3月２４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３５〕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３６〕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年7月版２７７－２７８页
〔３７〕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上卷　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6月版　１５
０－１５１页
〔３８〕《吳法憲回憶錄》下冊　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9月版　第６５４頁
〔３９〕《吳法憲回憶錄》下冊　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9月版　第６５６－６５７頁
〔４０〕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
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9月５－６日
〔４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１９７页
〔４２〕周恩来传达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1月２７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３〕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　１９６７年1月２５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４〕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１９６７年2月１７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５〕《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６４８页
〔４６〕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3月１３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７〕《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６５１页，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８〕《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６５３页
〔４９〕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５０〕《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６５７－６５８页
〔５１〕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５２〕《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１１页
〔５３〕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见《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安建设编　６０页
〔５４〕李海文《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3月版　５５１页
〔５５〕《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２６页
〔５６〕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１８４页
〔５７〕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５８〕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５９〕纪希晨《陆定一谈文革经历》　见《炎黄春秋》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６０〕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１〕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２〕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２7页
〔６３〕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４〕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５〕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６〕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１９１页
〔６７〕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７９－８０页
〔６８〕张光渝《拜访王秉璋叔叔》，载《老照片》第四十四辑，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一版
〔６９〕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9月５－６日
〔７０〕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２４５－２５２页
〔７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见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1月版　３８１－３８２页
〔７２〕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　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４４期　２００５年7月６日
〔７３〕《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９２３页
〔７４〕叶剑英对文革中周恩来的评价，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３
页
〔７５〕《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２４页
〔７６〕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７７〕见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一辑，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８１页
〔７８〕原文戴《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１９６９年5月7日
〔７９〕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８０〕《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8月版　３０３－３０５页
〔８１〕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５１６页

〔８２〕《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２５页
〔８３〕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８４〕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２９８页
〔８５〕《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６８４－７１２页
〔８６〕林彪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９．４．１４）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８７〕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２７８页
〔８８〕《周恩来年谱》　下卷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１９９７年5月版　３６７页
〔８９〕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9月５－６日
〔９０〕《吴法宪手稿》，转引自金秋《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　１１９页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ge 199)
〔９１〕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
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9月５－６日
〔９２〕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２９８－２９９页
〔９３〕《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１１０８页
〔９４〕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华夏文摘增刊　第３１４期，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８日
〔９５〕《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１９５８。6－１９６７。7》，人民出版社资料室，１９６７，１０３页。
〔９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二版　３４６－３４８页
〔９７〕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9月５－６日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

丁　抒

１９６６年５月，当“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１９６３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党内“路线斗争”频发的中共高层，叶剑英能安渡迭起的政治风波且最后起到如此作用，值得研究。“文革”前叶剑英不在中共核心权力圈内，他资历虽老，但长期担任参谋职务，从未实际主掌过一支军队，没有自己的“山头”。１９５５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仅叶剑英一人未担任过方面军或战略区的主要领导。然而，他的这种边缘地位恰恰使他免受“文革”的冲击。１９５９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１９６２年林彪告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由于贺、罗在“文革”前夕先后被毛泽东清洗，叶剑英得以在“文革”中崛起，逐渐成为军队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于权力之作用他自然一清二楚。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１〕“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２〕１２月间毛又对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说：“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就得学蔡锷，要造反哪!”〔３〕中共中央本来就在毛泽东的严密掌控之中，毛这么说，当然是隐指中央别的人可能会搞“政变”。１９６５年初，毛泽东曾当面讥讽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４〕毛之所以毫无顾忌地这么说，是因为他牢牢掌控着军队。而一旦他对军队高层的忠诚产生怀疑，走马换将立刻接踵而至。为了把军队掌握在绝对可靠的人手中，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主要部署之一，就是撤换主持军队工作的领导人罗瑞卿、贺龙，将军队日常事务的管理权移交叶剑英。

本文侧重分析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作用，同时辨析目前国内关于“文革”初期清洗罗瑞卿、贺龙等若干重要事件的流行说法之可靠性。

一、清除罗瑞卿：毛泽东的“文革”准备

“文革”前夕至“文革”初期，罗瑞卿和贺龙因忠诚度遭到毛泽东的怀疑而被清洗。当时罗瑞卿不仅是总参谋长，还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众多职务中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决定，林彪生病期间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则由罗瑞卿

负责，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５〕

罗瑞卿主持军队工作，作风强悍，与贺龙以外的其他军委领导人关系不甚融洽。连他的朋友陈丕显都说：罗很有能力，但“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有意见”。当时军队的重大事务往往由贺龙和罗瑞卿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毛决定后再通报林彪，而林彪则很少主动过问，仿佛置身度外。例如，１９６４年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贺、毛两人谈话中三言两语就决定取消军衔。在军队事务中如此重大的事情，决定过程中并未征求林彪这个名义上的国防部长的意见，而是由罗瑞卿回到北京后打电话向林彪通告该决定。１９６５年４月底，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到武昌向毛泽东请示有关５月初召开军委会议的有关重要事项，包括取消军衔以后的新军服、帽徽、领章的样式等。毛批准之后，罗瑞卿才向林彪汇报。〔６〕

在林彪与贺龙之间，罗瑞卿与贺龙的接触多，而与林彪接触较少。毛泽东曾多次对罗瑞卿说，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７〕由于罗、林之间关系不近，甚至冷漠而有隔阂，以致于有一次林彪与罗谈话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８〕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曾提醒罗：“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同旁的元帅接近的太少啊？”〔９〕然而，说林彪因此就打算搞掉罗瑞卿，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中共的事实际上完全是毛泽东一人当家。而且林的一个特点就是平素做事决不出头，哪怕决定取消军衔这样的大事时被搁置一边，他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毛的意见或暗示，林彪不会出头打罗瑞卿。

１９６５年5月初叶剑英的班子为一次军委会议准备了会议总结。因与会者要求由罗瑞卿做总结，罗便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的总结，改由自己来作，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有人撰文写道，叶剑英等人对罗瑞卿的做法不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与此同时，毛开始秘密安排叶剑英收集罗瑞卿的材料。〔１０〕此说尚无旁证，但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何林彪突然对罗瑞卿发出凌厉的批评。５月２５日，林彪突然口授指示，要秘书立即告诉罗瑞卿：“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１１〕就事论事地看，针对罗瑞卿取代叶剑英做总结这件小事，林彪的这个态度似乎与他平素的做法截然不同。若联系到毛指责林彪“不抓大事”“放权”，其中是否有毛准备从罗瑞卿手中收回军权的意味？事隔不久，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初，军委机关奉命开会批判罗瑞卿的副手萧向荣（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军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萧随即被“监护审查”，由杨成武兼其职务。当时罗瑞卿尚未被撤职，但基本上被架空了。这样重要的会议，是谁下的指令，谁主持，叶剑英、杨成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现在官方所有的文献均对此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官方强调这样一种说法：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底，林彪派夫人叶群向毛泽东递交亲笔信，大肆诬陷罗瑞卿，毛偏听偏信，结果冤枉了罗瑞卿。

林彪派叶群递交的那封所谓“诬陷罗瑞卿”的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１１月３０日〔１２〕

此信中提到的向林彪提议揭发罗瑞卿的“重要的负责同志”是谁？不会是刘少奇、邓小平，也不会是周恩来、贺龙，只可能是叶剑英或其他人。由于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中共迄今为止未披露任何材料加以说明。但是，叶剑英一生谨慎，如果他向林彪告罗瑞卿的状，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安排。

除掉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部署还是林彪利用毛整肃罗瑞卿？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承认：“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第一个问题是林彪夫妇何以敢于告罗瑞卿。林彪那么注意韬晦，难道不怕告不准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１３〕该书提供了一种猜测：“如果（毛）对林彪的告状不准，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毛需要林彪，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就认可了林彪的诬告。〔１４〕罗瑞卿的女儿亦持此见：“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１５〕林彪死后，毛泽东自己把此事全部栽到林彪头上：“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１６〕毛泽东说的是实话吗？他在事关重大的军权问题上是个可以轻易被骗的人吗？

林彪１１月３０号写的这封信会不会是林彪按照毛清除罗瑞卿的意图写的？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其他各大报均未转载，毛泽东相当愤怒。１１月２６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时告诉毛，他还没有读姚文元的文章，毛一笑了之，不予回答。当晚，江青与罗瑞卿见面时问罗：“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没有转载？”〔１７〕她还说，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因为“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于是罗瑞卿亲自给彭打电话，建议《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１８〕　当时彭真是毛泽东已决定要清除的目标。很可能毛泽东从其情报来源获知电话内容，所以后来罗瑞卿此举被指控为“给彭真通风报信”。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下旬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如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１１月３０日林彪写了那封“诬陷信”后，让叶群从苏州飞到杭州向毛告罗的状

。但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的回忆是：“叶群是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下旬来杭州的。”〔１９〕至于是哪一天，他没有说。有人指出，１１月２９日毛泽东办公室曾通知叶群到杭州向毛汇报，当时毛就５月军委会议总结发言一事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嘛！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２０〕“这位老帅”指的就是叶剑英。若此事确凿，那就是说，１１月２９日叶群在杭州毛泽东住处即已得知毛的意图，她汇报完之后当然会马上赶回苏州向林彪报告。

据张耀祠回忆，１１月３０日杨成武打电话给他，要他到杨的住处去一次。该日下午张到杨的会客室，随后叶群就来了。张写道：“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２１〕但叶群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自己面交。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罗瑞卿是毛泽东极为信赖的亲信。倘若不知道毛对罗瑞卿的真实态度，长于韬晦的林彪要密告罗瑞卿，一定会做得非常机密，绝不可能让叶群到杨成武的会客室里张扬此事。叶群之所以不避讳杨、张二人，很可能是因为她不仅知道毛对罗的态度，而且知道杨成武等也知情。张耀祠就说过，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除罗瑞卿时，除周恩来、林彪外，叶剑英、杨成武等人也知情。〔２２〕杨成武可能知情的另一个依据是：１１月１８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份关于第５５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记说，这是林彪“为告罗瑞卿的状作好铺垫”。〔２３〕向林彪递送这份报告的人就是杨成武。〔２４〕事实上，就在叶群向毛面呈递林彪信件的１１月３０日当天，北京的中央军委机关会议就已经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了。〔２５〕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５５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做了批示，不点名地批判了罗瑞卿：“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２６〕“（他）不愿意突出政治……（但）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２７〕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点名批判罗瑞卿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２８〕”

林彪向毛告罗瑞卿的状，既未涉及彭德怀，也没把罗瑞卿与高岗、饶漱石扯到一起。用高岗抹黑政敌向来是毛泽东的惯用招数。１９５９年他清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时就用过这样的手法。当时毛说：“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他们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２９〕

毛泽东作出批判罗瑞卿的批示后不到一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毛在上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这次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舞会当中，周

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身为广东人的叶剑英欣然从命，用苏州腔唱了一曲。〔３０〕罗瑞卿刚倒台，许多干部都非常紧张，周恩来为什么有如此好的兴致让叶剑英唱评弹？或许是因为他看到叶剑英紧跟、配合毛泽东，立了功？这可算是周的一种表态。

１９６６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能在“文革”期间逐步由一名中央委员被擢升到政治局委员、常委乃至副主席，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１９６６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对罗瑞卿面对面地批判斗争。为此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邓小平不能经常到会，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主持。他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

3月１８日，罗瑞卿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交待问题。罗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见毛泽东。周回答：“瑞卿，这个通知是经主席批准的嘛。”随即挂断电话。罗瑞卿在绝望之下，当天从自家的三楼平台跳楼，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并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３１〕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念了宋朝辛弃疾的一首“贺新郎”词，叶把原词中“将军百战身名裂”一句改了两个字，成为“将军一跳身名裂”，以讥笑罗瑞卿。〔３２〕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认为，叶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３３〕，罗点点此话或许言重了，但杨成武说叶剑英的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３４〕，就全然不顾事实了。

１９６６年5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３５〕是叶剑英主持写的。批罗会议结束时，叶剑英看到毛泽东又决定清除彭真，便马上紧跟，与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信，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３６〕，对彭真落井下石。

二、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代之

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也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打击的目标。

在高级领导人当中贺龙以不拘小节、说话放任著称。抗战时贺龙在山西，经常称毛为“毛大帅”，每当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会说，“嘿，毛大帅又来了一条命令。”５０年代初他任西南军区司令，邓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道：“为什么要取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杯酒释兵权。”贺龙家里，不管是客厅还是办公室，从没挂过一张毛泽东的像。全国掀起“学毛选”的热潮时，他却对自己的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１０分钟就走了。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露面。１９６４年毛泽东过生日举办家宴，席开3桌，罗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请并与毛

同桌，贺龙却称身体不好推脱未去，而是与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贺龙的外甥女婿〔３７〕）在贺家边谈边打扑克。在１９６６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当乐队奏《东方红》时，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他的夫人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３８〕

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甚好。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的军委机关会议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当时贺龙还叫会议主持人不要胡乱猜疑。１２月２号，也就是毛泽东说罗瑞卿"是野心家"的那天，军委机关会议主持人告诉贺龙，会议简报将要写上"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坚持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３９〕

４天后贺龙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到了上海他才知道，会议竟然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造访贺龙住处。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在座的李井泉也说事先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４０〕

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突然被打倒，贺龙却被蒙在鼓里。直到此时贺龙才感觉到，罗瑞卿的案子有可能牵连到他，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上海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会后，毛泽东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４１〕，贺龙被叶剑英取代了。随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毛泽东忽然交给他一个奇怪的任务，让贺龙到四川西部偏僻的攀枝花钢铁厂和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等地视察。就这样，毛泽东以"下去视察"为名把贺龙赶开，为叶剑英在北京主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打开方便之门。贺龙视察完毕４月９日才回到北京，而罗瑞卿则早在２０天前就于绝望中跳楼了。〔４２〕

此时贺龙被排除在军委领导层之外，却未向毛泽东靠拢、表忠心。"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及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开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越来越高，可是贺龙一直保持沉默。毛泽东问他："你发言了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４３〕贺龙"靠边"以后，毛曾说过，要对贺龙"一批二保"。〔４４〕但毛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于是贺龙的厄运降临了。

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但未通知贺龙。林彪在会上宣布，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贺龙有野心，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某些大军区有人想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讲话。〔４５〕后来，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示：林彪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军委会上的"打招呼"，表示"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４６〕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５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故意透露了一点玄机："（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４７〕周恩来的这种讲法，故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在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加上了当时仅仅是个连长的林彪。这种对贺龙的贬低在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年代里就是一种关于贺龙要垮台的暗示。

尽管大难在即，贺龙仍然拒绝低头。一位被指为“叛徒”、“走资派”的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把稿子给贺龙看。贺龙看到检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时问他：“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认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绝指称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４８〕

不久毛泽东就公开在外宾面前点名批判贺龙。１９６７年2月毛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４９〕当时汪东兴奉毛的指令负责主持中央专案组，专案组在关于贺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贺龙、罗瑞卿办的国防体育俱乐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５０〕中央为了给贺龙罗织罪名，还采用了逼供栽赃等种种手段。例如，１９６５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张经武，因长期在贺龙手下任职，结果和夫人杨岗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杨岗被斗得神经失常，专案组逼迫她写材料“揭发”张经武参与了贺龙的“二月兵变”，称“兵变”成功后，贺龙要当主席，张经武将当总理。张经武绝食抗议７天而死。〔５１〕

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取而代之，由叶主持军委工作，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贺龙的过程中，叶不仅紧跟毛的步调，而且对贺龙落井下石。１９６７年夏天，叶剑英曾对国防工业一次会议的代表这样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５２〕

三、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叶剑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养病”为名远离政治漩涡，躲在外地，所以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军队领导人实际上是叶剑英。因此叶剑英从“文革”前几乎投闲置散的角色变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１、从负责“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到进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因为罗瑞卿曾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对公安部队不放心。１９６６年2月２２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如此重要之事，毛并未通报林彪。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只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３人，林彪并未参与。应当说明的是，杨成武与萧华都参与倒罗活动，告过罗瑞卿的状。１９６６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批判罗瑞卿时，负责组织会议的就是这３位，叶剑英为会务组组长，萧华、杨成武为组员。

１９６６年5月１５日，“文革”的序幕拉开了，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发动对刘少奇的进攻之前，要确保对首都局势的控制。于是，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据此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就是直接对毛泽东本人负责，杨成武负责协调工作。当时叶剑英对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５３〕“首都工作组”指示北京军区调了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同时，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师。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建制便由１个师扩充成４个师。〔５４〕调进北京的这两个师正是杨成武的老部队。

１９６６年8月１日，毛泽东召开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４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的常用手段，需要谁为他出阵，他就将谁“扩大”进参会名单当中。在这次会上，叶剑英被“扩大”进来为毛助阵。毛在会上正式对刘少奇发难：“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５５〕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没出席这次全会。8月４日晚，他打电话给中央说，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投赞成票，却不打算到会。〔５６〕后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林彪于8月６日赶到北京参加了延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发起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将叶剑英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

２、在“揪军内一小撮”以及“杨勇事件”中的角色

１９６７年1月１３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次日，《解放军报》发布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并公开打出了“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叶剑英紧跟毛泽东的部署，主持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５７〕由于平时林彪不出席军委会议，所以通常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议。

现在的官史提到叶剑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说他当时“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５８〕叶剑英拍桌子拍断了手掌骨是事实，但那并不是笼统“反对江青一伙搞乱军队”、更不是因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叶剑英发怒一事发生在１９６７年1月，起因是与“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就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事发生争执。这场争执其实是个误会，因毛泽东对萧华的态度一变再变而造成了江青和叶剑英的分歧。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已先后被打倒，叶剑英并未出面保护这两位军队的老干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点名批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林彪拒绝。但是，１９６７年1月１９日毛泽东却批准了在军委会议上批判萧华。林彪知道毛的意见后采取消极态度，拒绝出席军委会议，只让夫人叶群去会场表个态。叶剑英心里或许对批判萧华有所不满，但他并未打算保护萧华，他参加了这次军委

会议，会上预定当晚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萧华。然而，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定批判萧华的想法。军委会议开到一半，毛把周恩来和叶剑英召去，结果军委会议只得暂时中断。周、叶见过毛之后回到军委会议的会场宣布，毛泽东指示说，对萧华还要保。

可是，就在军委会议中断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军区。由于杨勇不知道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所以在北京军区内部透露了刚才军委会议决定批判萧华的情况。恰巧当日军委会议后，有人偷看了参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于是会议曾经预定批评萧华一事外泄。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只听说毛同意批判萧华，却不知道毛后来又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他们“立功”心切，所以当天半夜抄了萧华的家。〔５９〕仓皇中萧华从后门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暂避，但徐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组织的人；于是萧华又跑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坐傅钟的车到了北京西山的叶剑英住处。叶剑英白天应召面见毛泽东时，已知毛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便收留了萧华。徐向前很快知道杨勇透露消息一事，于是便打电话给杨勇，杨勇立即认了错。

第二天军委继续开会。杨勇到会场时萧华还未来，江青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来后讲了昨夜被抄家之事，于是徐向前拍了桌子，叶剑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远端骨折。叶当时说：“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６０〕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反诬杨勇，声称是杨要“打倒萧华”。２月３日毛会见外宾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６１〕袁子钦也因被诬要“打倒萧华”而遭打击。叶剑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不为杨勇和袁子钦解释辩诬，而是与聂荣臻、徐向前一起，以“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逮捕了北京军区司令杨勇。〔６２〕又过了３个多月，毛泽东出尔反尔，又要打倒萧华了。〔６３〕，这一次叶剑英一声不吭，他不保萧华，但仍然把杨勇关在牢里。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说过，逮捕杨勇是叶剑英等人下的指示。１９７１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在一次座谈会上问道：“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装糊涂说：“当时我也不清楚。”毛便顺手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６４〕

３、１９６７年的“２月镇反”

１９６７年２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６５〕林彪将毛的批示转给叶剑英，叶剑英将毛的指示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许可。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了封公开信〔６６〕，要求他们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叶剑英修改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起草的镇压群众的传单，并用飞机大量散发。据周恩来说，“抓了１０万人，还说少。……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１７０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６７〕

紧接着青海省发生了军队屠杀群众的事件。２月２３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军管。由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动员其支持者守卫报社，赵永夫谎称“八一八”开枪，遂派军队进攻并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在此过程中军队打死平民１６９人、打伤１７８人。〔６８〕赵永夫当时还调去了一个喷火器班，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进攻报社的军队未使用喷火器，否则报社以及大楼内的１千余人都难幸免。事后赵永夫通过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６９〕有叶剑英的撑腰，赵的胆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动军队，武装镇压青海民族学院的师生，打死打伤１２人。〔７０〕在赵永夫“平定反革命暴乱”期间，青海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１０，１５７人，其中逮捕４，１３１人，拘留２，５２２人，看管和软禁３，５０４人”。〔７１〕由于毛泽东本人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态度”〔７２〕，叶剑英便把赵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吹嘘其“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７３〕叶剑英让赵永夫介绍“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造成了极大后果。这一波“镇压反革命”全国共逮捕数十万人，叶剑英应负首要责任。对此事周恩来后来是这样说的：“赵永夫……镇压群众……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２月开军以上干部会，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７４〕

４、老干部“大闹怀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谓的“二月逆流”，导因是毛泽东在陶铸问题上的出尔反尔。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初，毛泽东认为，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负责文教宣传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执行了“刘邓路线”，指示要开会批评陶铸。１２月下旬，毛泽东又指示召开名为“生活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陶铸。１２月２７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陶铸，指陶铸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但是，１２月２９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批评江青随便批判一个政治局常委，违反了组织原则。散会时，他又招呼陶铸留下，对陶铸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又要陶铸到外地去考察，毛拟定了一张２０多个各省市领导人的名单，要陶铸去“把他们保下来”。〔７５〕陶铸将毛的话告诉周恩来，周夸奖陶救了几十条人命。但林彪却看透了毛，知道陶铸是毛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当天他将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你呀，现在就被动。”见陶铸不解，林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７６〕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几天后毛泽东就决定打倒陶铸了。１９６７年1月４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７７〕当晚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了散发的“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到副总理陈毅家去询问。陈毅很纳闷地说：“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确实，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对陶铸讲的话并不算数。１９６７年1月８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７８〕“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得了

，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７９〕于是社会上呼喊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然而，一个月后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再次出尔反尔。１９６７年2月１０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被“扩大”的与会者又有叶剑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８０〕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增加叶剑英、徐向前。

叶剑英以为毛要以打倒陶铸一事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训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８１〕２月１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的意见：“主席的批评，对陈伯达是品质和路线的大问题；对江青只是作风问题，小节问题。”〔８２〕这时连陈伯达也以为毛真的转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陈觉得自己很冤，因为打倒陶铸的会议是江青组织的，是江青派人叫陈去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的。于是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杀了。〔８３〕在这种气候下发生了所谓的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事件。

１９６７年2月１６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生产、经济，江青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了会议，但是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一个人躲到了后边桌子角上，还是周恩来叫他坐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的。〔８４〕徐向前的回忆是：“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８５〕会议开始时，形势似乎对老干部们很有利。谭震林首先发难说：“老干部一个个被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他甚至点名说：“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８６〕叶剑英接着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８７〕

当时陈毅的发言把“文化革命”与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联系起来。陈毅说：“延安整风搞出了（意指抬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８８〕“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８９〕陈毅提到的这６个人都是“延安整风”时因坚决拥护毛泽东得到提升的，特别是刘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来之上成为党内的２号人物；在“文革”的第一波中，这６个人又全部被打倒。周恩来一听，就知道陈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断他说：“（延安整风时）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９０〕但是陈毅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毛泽东自然也就知道了。

其实，几天前毛泽东斥骂陈伯达、江青本来就是假意责备，以洗刷自己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几次出尔反尔的责任。怀仁堂会议上陈毅、谭震林的发言触到了毛的

痛处，毛便“龙颜大怒”。１９６７年2月１８日，毛召集紧急会议，这一次既非政治局会议，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他只通知了几个人参加，军队领导人中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按中共的制度来说，其实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会议，只是毛泽东对几个“廷臣”训话而已。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忠实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９１〕“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９２〕，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９３〕“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９４〕“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９５〕“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９６〕

毛泽东讲完话即扬长而去，留下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毛泽东发怒时，叶剑英自然不会给谭、陈、徐辩解，更谈不上与毛“抗争”了。其实，谭、陈、徐等几个老干部本来也没有胆量挑战毛泽东，他们不过是错会了“圣意”，以为毛泽东是真心斥骂陈伯达、江青，大概陈伯达快倒台了，这才放胆“大闹怀仁堂”的。应当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或者所谓的“二月抗争”。由于叶剑英在这一事件期间并没有出格的言行，所以毛放过了他。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上，叶剑英保留住了政治局委员的地位，而陈毅则被赶出了政治局。

１９７１年林彪死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１９７３年的中共“十大”上成为党的副主席，至此叶剑英在“文革”期间的崛起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在自己最后的时日里又想贬黜叶剑英。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之后，毛甚至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会议。但当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即便有心贬黜叶剑英，也已无力处置。１９７６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帮”时，叶剑英的位置与作用已别无他人可以替代。

注　释：

〔１〕《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２３１页。
〔２〕王昊、王纪一，《开国上将叶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第４７８页。
〔３〕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６年第1、2期，第４０页。
〔４〕“文革”结束后薄一波和安子文对刘少奇之子刘源的谈话，引自高晓岩“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华夏文摘》增刊第３４９期（２００３年7月２２日）。
〔５〕1966年5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
〔６〕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４），第２３１、２５２页。

〔７〕出处同上，第２０９页。
〔８〕１９２７年中共在南昌组织武装暴动时，林彪任连长，贺龙则是军长、总指挥。
〔９〕出处同注〔６〕，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１０〕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华夏文摘》增刊第３２４期（２００３年2月10日）。
〔１１〕出处同注〔６〕，第２５４页。
〔１２〕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亦可参见黄瑶的书，出处见注〔６〕。
〔１３〕出处同注〔６〕，第２８３页。
〔１４〕出处同注〔６〕，第２８４－２８５页。
〔１５〕《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９），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１６〕１９７３年12月２１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节录），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
〔１７〕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３５３页。
〔１８〕出处同注〔６〕，第２７８－２７９页。
〔１９〕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转引自《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９），第１８３页。
〔２０〕出处同注〔１０〕。
〔２１〕出处同注〔１９〕，第１８２页。
〔２２〕《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２９－３０页，转引自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载《华夏文摘》增刊第３２４期（２００３年1月２7日）。
〔２３〕出处同注〔６〕，第２８１页。
〔２４〕出处同注〔１０〕。
〔２５〕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北京），公益图书馆扫校（ｗｗｗ．ｎｐｏ．ｏｒｇ．ｔｗ）。
〔２６〕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５５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的批示，引自黄瑶的书，出处见注［６］，第２８３页。
〔２７〕《学习资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北京：清华大学，１９６７），第１９６－１９８页。
〔２８〕出处同上，第２０１页。
〔２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８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４３１页。
〔３０〕张佐良，“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跳楼致残　被人放入箩筐游斗”。张佐良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罗瑞卿跳楼后，张是第一个赶往罗瑞卿家中为其诊断的医生。
〔３１〕出处同上。
〔３２〕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２００５年第１０

期第９页。据陈虹的文章，杨成武透露叶剑英写的是“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长绝。”。《炎黄春秋》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第６２页刊登了任可的读者来信，指出陈虹的文章引用有误。任可写道：“当年我是坐在前排听了叶的传达。他说明是套用辛词，并非自己所填。辛弃疾的《贺新郎》原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叶引用时只将‘百战’改为‘一跳’。”

〔３３〕罗点点，“点点记忆（下）”，《当代》杂志，１９９８年第5期，第３９页。

〔３４〕出处同注〔３２〕陈虹的文章。

〔３５〕中共中发〔６６〕２６８号文件，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

〔３６〕“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６６］２６８号附件，１９６６年5月１6日发出，转引自余汝信的“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华夏文摘》增刊第４７１期（２００５年１2月１9日）。

〔３７〕廖的前妻是贺龙姐姐的女儿。出处同注〔１〕，第２８４页。

〔３８〕《打倒三反分子贺龙（第１集）》（北京：“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整理，“红代会国家体委运动系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翻印），第２－３页。

〔３９〕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ｗｗｗ．ｎｐｏ．ｏｒｇ．ｔｗ）。

〔４０〕出处同上。

〔４１〕出处同注〔３９〕。

〔４２〕出处同注〔３９〕。

〔４３〕出处同注〔３９〕。

〔４４〕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３５页。

〔４５〕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华夏文摘》增刊第３７２期（２００４年3月１5日）。

〔４６〕１９６８年１0月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

〔４７〕１９６６年9月２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见１９６６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等单位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革”参考资料（２）》。

〔４８〕出处同注〔３９〕。

〔４９〕１９６７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转引自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文章，出处同注〔４５〕。

〔５０〕１９６７年底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给康生的报告，《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　），第９１页。

〔５１〕董保存，《走进怀仁堂》（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任志伊，“驻藏代表张经武辉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５２〕１９６７年7月8日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原载第１0研究所《东方红》（３９期），１９６７年7月２0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１０１期转载。

〔５３〕吴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第5页。
〔５４〕《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２４7页。
〔５５〕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党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6期，第５8页。
〔５６〕出处同上，第５９页。
〔５７〕《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２９１－２９２页，转引自何蜀的《“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５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第４０７页。
〔５９〕出处同注〔４４〕，第６５－６８页；亦见徐向前的“在‘文革’中”，载吕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９），第7页。
〔６０〕吕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９）第7页；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３９页。
〔６１〕１９６７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学习资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北京：清华大学，１９６７），第２９０页。
〔６２〕出处同注〔４６〕。
〔６３〕后来毛泽东在“九大”期间（１９６９年4月１３日）说：“萧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
〔６４〕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４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中发［１９７１］１４８号文件。
〔６５〕出处同注〔４４〕，第８７页。
〔６６〕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４２页。
〔６７〕出处同注〔４６〕。
〔６８〕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４３５页。
〔６９〕出处同上；参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２０７页。
〔７０〕１９６７年4月１０日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２１页。
〔７１〕出处同上。
〔７２〕出处同注〔４４〕，第９６页。
〔７３〕１９６７年4月２０日安绍杰（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夫人）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４４页。
〔７４〕出处同注〔４６〕。
〔７５〕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４４２－４４４页。
〔７６〕曾志，“陶铸在最后的日子里”，《文汇》月刊１９８６年9月号；权延赤，《陶铸在“文革”中》，第１９６至２１５页。
〔７７〕１９６７年1月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

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见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等编印的《大字报汇编》，第４７页。
〔７８〕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１９２１－１９６７)》(１９６８)，第２４３页。
〔７９〕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３７６页。
〔８０〕王力，《现场历史：“文革”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２９－３０页。
〔８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２０８页。
〔８２〕出处同注〔８０〕，第３０页。
〔８３〕出处同注〔８０〕，第３０页。
〔８４〕出处同注〔８０〕，第３１页。
〔８５〕吕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９)，第１５页。
〔８６〕出处同上，第１４页。
〔８７〕《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２卷，第６８页。
〔８８〕出处同注〔８０〕，第３０页。
〔８９〕出处同注〔８１〕，第２１０页。
〔９０〕董保存，《谭震林外传》(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２)，第１１５页。
〔９１〕项南，“‘该我开炮了’——谭震林与‘２月抗争’”，《人物》双月刊，１９９２年第６期，第５８页。
〔９２〕当天林彪称病，让叶群代表他出席了这个会议。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９５页。
〔９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２１６页，此段文字引自赵峻防、纪希晨的《“２月逆流”》。
〔９４〕出处同上。
〔９５〕出处同注〔４６〕。
〔９６〕出处同注〔９０〕，第１２８页。

文革尾声天安门事件再探

——毛泽东晚年的中国精英政治危机应对〔１〕

孙万国

“天安门事件是主席亲自抓的……，开始北京民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当暴徒）搞反革命暴力时，我们就要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我们）拿起棍子（但没用坦克和机枪——作者注），中央（毛）明确交待，可以还手。”
——姚文元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６日谈天安门事件〔２〕

在某些方面来说，先前学界对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晚年的理解，要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共高层政治的现实。“文化大革命”的包袱确实让中央政治局乃至全党陷入尖锐的分裂与冲突之中。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角大体可分为三批人马：一是被称为“四人帮”的激进分子——这一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出自毛本人的误导。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为其杰出代表，尽管周与邓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像的复杂。〔３〕三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批人物，既是文革前中共体制中的骨干，又是文革受益者。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极其突出。但其突出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原先的革命资历甚低，而非由于特殊的政策走向或集体利益使然。这些人物之外，当然还有最为关键的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他一向超然于各派斗争之上，但也经常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忌反复地出面支一派，打一派。尽管到了晚年，重疾缠身，但他对形势的掌控与主导，其实要比人们想像的更加介入。即以这一时期为例，１９７５年温和政策的决策者毕竟是毛，而不是周和邓，正如他先前是发动天下大乱的文革始作俑者一样，“四人帮”不过是跟着起哄的追随者罢了。

虽然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解，大体不差，但就其研究细节来说，却与事实相去甚远。个相屡屡失真，总相必然偏离。在现存的党史中，便不乏以讹传讹，愈演愈烈的弊端。人们对于１９７６年４月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通俗认识就是一个例子。根据这些说法，极左的激进派要么是经过精心盘算，要么就是出于自身愚蠢，居然敢对尸骨未寒的周总理发动批判。他们又与华国锋及其它文革受益者勾结，共同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因为勾结的双方都体会到深得人心的邓小平的威胁，故不得不联手应付天安门危机，尽管极左派并不满意华的高升。这一勾结，直到镇压之后，“四人帮”还处于陶醉情绪时，双方的同盟关系才告破裂，这是由于华一心想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四人帮”又难与其他“文革”受益者和睦相处。对于这类说法，我们未敢苟同。鉴于现有史料诸多空白，又自相矛盾，要对天安门事件中高层决策的来龙去脉彻底清理，显然不可得。但也无妨我们在此尝试有别于前人之说的历史重建。

◇　引子：周恩来的葬礼，清明节来临，南京事件

４月初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的自发游行示威，无疑是中国百姓对中共当局的首度挑战。导致这一严重事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多城市居民感到他们所爱戴的总理

没有得到应有的哀荣，人们也觉察到上层对于周一生的功过评价存在着斗争。清明节本是祭奠先人的扫墓日，随着清明的临近，形势越加严峻。紧张局势始于一月初总理去世随后，当局限制人民的悼念活动。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有“五不准”：不准带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不准挂总理像。但民众对此置之不理。１月１５日，追悼大会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全面停止悼念活动，这就更加激化了群众的不满情绪。〔４〕

群众的不满又不免与１９７５年底展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他们的不满，不仅是“批邓”，也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乃至于对于毛泽东的信仰发生动摇。从上层到地方的极左派执意批邓，以捍卫毛的文化大革命，而群众则浸沉于他们丧失了代表温和和正义的周总理的悲痛之中。人民悼周，左派批邓，这就构成了尖锐冲突的局面。其实，极左的四人帮未必希望总理早逝。他们认为在此批邓的节骨眼上，周的不合时宜的弃世，必然冲击“批邓”的政治运动。当局急于结束悼周活动，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尽快开展批邓。总之，随着运动在２、３月份不断升级，人们很自然地把对于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搞整顿的批判，认为是对周总理的批判——尽管事实上周并未积极参与１９７５年的政策，而邓小平的整顿决策原本基于毛的授权，有些甚至是出于毛本人的授意。妙的是，最早把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右倾”联系一起的，反而是极左派。他们掌握官方媒体，偶尔对周进行不点名的批判。〔５〕人们对此，未必尽知个中原委，但总本能地感觉到官方批右倾必然会损及周恩来的身后之名。〔６〕引发天安门事件的初始原因，虽说是1月间对群众悼周的悲痛之举突遭打断，但此一情势很快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派系斗争纠缠起来。〔７〕许多地区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呼声。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其中一条就是关于如何开展“反右倾”运动，多数成员不主张采取当年红卫兵大串联的那套文革方法，而要把运动置于党委控制之下。３月２４日，毛主席批发了这一决议。〔８〕然而也就在这一天，南京事件爆发，对于稍后的天安门事件构成了重要影响。

２４日那天，南京医学院的学生在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献上了当地悼念总理的第一个花圈。这一行动本身并无独特之处，北京从３月中旬就开始了类似的悼念活动。问题在于，一位摄影师记者取走了花圈上的挽联。他未必出于恶意，但流言则说他是受了“上海帮”的指使。第二天，学生们为此在南京市区贴出了“誓死捍卫周总理”的标语。何其巧合，当天上海的左派《文汇报》也发表了头版文章，声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文章虽未点名，但读者心知肚明，这是影射周恩来。与此同时，当局又下令禁止人们前往雨花台，这无疑是火上加油。此后几天，学生不顾禁令，继续游行示威，并张贴批判《文汇报》的大字报，从３月２８日起，还点名批判张春桥和江青。这些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触发了其他地区类似的活动，特别是华东地区。〔９〕鉴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形势愈演愈烈，王洪文在观察了两天之后，于４月１日，代表中央下令江苏省委清除大字报，并制止反革命言论。按邓小平下台后，虽有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大约还是王洪文替代小平，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４月４日，部分原因是由于地方当局的敷衍，仍允许群众前往雨花台祭悼，这一地区的秩序大体恢复。但在北京，则事端迭起，形势反趋恶化。〔１０〕

虽然当局封锁新闻，但人们通过口头传播及开往各地火车和汽车车身上显目的标语，南京事件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北京和其他地区。由此揭开了天安门悲剧的序幕。值

得一问的是，4月初之前发生的这些事端到底意味着什么、谁应为之负责？学者都说这是《文汇报》惹的祸。它在3月２５日的文章里，明确把周总理与邓小平的政治错误拉扯一起，人们反因此误以为周邓关系密切，也误以为邓的复出是由于周的提携。〔１１〕我们在下文中会提到，在高层政治的漩涡中，邓小平当然是天安门事件的焦点，尽管他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干系。而在下层，邓岌岌可危的处境显然也是一个因素，但他对局势发展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不论是南京事件、或稍后的天安门事件，以及其他省市的类似示威活动中，邓的名字只见偶然提及。〔１２〕其原因当然是由于邓已挨批，群众的悲痛情绪反而集中在周身上，实质上是抗议毛和极左派对于周的不公正的待遇。“四人帮”对于周总理的敌视自然引起群众的愤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抨击极左派时，依然使用了极左的文革语言。南京反对张春桥和江青的标语远远超过了几个月前零星的批评。其严重程度连讨厌“四人帮”的其他中央领导也难袖手旁观。正如汪东兴在逮捕“四人帮”之后说的：“（天安门事件）攻击主席，攻击党中央，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是对四人帮不满，是有的，但那时也分不出，他们还在台上嘛!”〔１３〕

谁应对这种失控局面负责？迄今无论中西学者都把帐全算在江青一伙身上。根据此说，《文汇报》谤周的文章、先前对总理的种种大不敬，以及他们在天安门危机中的表现，都是“四人帮”有意制造政治分裂，藉机把邓小平赶下台。〔１４〕在某一程度上说，中央的极左派当然要对这种局面负责——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批邓”，调门甚至高过毛本人设定的界限，一方面又完全蔑视人民大众对周的感情。然而，尽管当时人们认为张春桥是《文汇报》的后台老板，但我们迄今并不甚清楚谁应对此挑衅的文章承担具体责任。换言之，这篇影射总理，引起众怒的文章到底是出于北京方面的策划，还是上海当地宣传干部头脑发热的自发产物？需知１９７３年邓小平复出时，上海就有此先例。当时上海的激进派领导仍按“文革”那一套思维，私下批评邓小平是走资派，以至于张春桥不得不出面制止。〔１５〕再说，当时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报纸并未转载。由此看来，这一闯来大祸的奇文恐怕是出自地方手笔，而非中央。

此外于4月初在杭州出现的活动，亦可旁证《文汇报》擅自诋毁总理的文章源自上海的当地领导。按杭州情势的严重程度大约仅次于北京和南京。杭州群众显然受到南京事件的感染，但似乎更关注邓小平的命运。他们张贴大字报呼吁邓小平不能下台，并赞扬他贯彻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政策。〔１６〕最堪注意者，是杭州群众在普遍反对极左时，其主要矛头却是指向地方领导人，特别是上海的第一把手马天水。他们要求打倒野心家马天水，追查他所散布的政治谣言——显然是指他在１９７５年6月向“四人帮”密报邓小平企图拉拢他的事。马天水既是《文汇报》的顶头上司，自然要为诋毁总理的举动负责。〔１７〕

当然，最终的责任毕竟还是人所熟知的源头——毛主席。简而言之，毛对于周，一向不大感冒，这就怂恿了那些批周的领导人。周在生前，屡遭毛的奚落；周在死后，也只见毛的冷漠。毛拒绝出席周的追悼会，就是这种冷淡的体现。他不但拒绝了４０名元帅和将军联名请求他在追悼会上露面的建议，还说，他们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１８〕犹有甚者，毛还反对在悼词中把周说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武断地认为周不但自己反对文革，还影响其他人也反对文革。他说，“总理是反对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一小批，还有老的，都

听他的；拥护我，高呼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这里真是明白不过地显示出毛泽东深重的文革情结。对毛来说，未来的政治比过去的恩怨更重要。之所以压制悼周活动者，未必是计较个人的恩怨， 而是考虑中国的未来。因此，他在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６个字，“悼念虚，复辟实”。为了让人明白无误，他还让其侄子兼联络员的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了这一指示。〔１９〕

◇　天安门广场事件

以上所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背景，大抵有此数端：群众执意悼周，而毛则设限低调。邓小平失势后，政局急剧左转，引起人民广泛的不安。毛泽东本人则在林彪事件后，威望日渐低落。而被视为总理对头的“四人帮”更招来积怨高涨。以下将首先回顾广场事件，然后转入我们分析的重点，即中共的高层政治，藉此以观当局如何应对天安门危机。

天安门事件的轮廓倒也清楚明白。在３月１９日，首先是一批小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献上了全国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也预示着清明节的临近。这只花圈，和随后送去的，很快就遭清除。北京市公安局还奉命要把上广场送花圈者都记录在案。显然，花圈触动了当局的神经。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就汇报说“这些花圈是阶级斗争的严重反映”。到了３月３０至３１日，“南京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花圈数量激增。天安门广场上张贴的诗词里充满了反对“四人帮”的情绪。涌入广场的人数也开始剧升，从３月底到清明节夕，共达到了一百多万。在这段时间里，当局的态度基本上可谓是谨慎从事。一方面，于４月２日在广场一隅设立了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并发布指令，谓清明节是旧习俗，要求各单位阻止职工上广场。同时又宣布南京事件是一场“反革命事件”。但另一方面，当局并没有对广场上的群众采取大规模打击行动，只除了审慎地逮捕了少数闹事者，并移走了若干花圈外，并无其他乱象。因此，４月３日那天，尽管是个情势紧张的星期六，广场上仍颇有秩序可言。〔２０〕

清明节这天恰逢周休日，大约一、二百万人涌进了广场。带来了更多的花圈、诗词、传单、小字报，以及即兴演说和喧哗。局面愈形紧张，人群中发生了零星的打斗，有些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受伤。走上广场的绝大多数只为表达他们对总理朴素的感情，但也有不少带有明显的政治气味，把周恩来和时下反击右倾翻风运动联系起来。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四人帮”的指斥，主要是针对后者反对总理的行径，而非针对具体的政策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广场上出现过数串“小瓶”，但公开提到“小平”的却很少，甚至比不上外地。这表明，尽管大伙拥护邓小平，但在此时情绪激昂的广场上，人们还是自觉地遵守政治上的界限，不敢公然反对当前的批邓运动。如在南京一样，广场上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举动，不外是或明或暗地攻击政治局里的极左人物，尤其是江青与张春桥，还有姚文元，但似乎无人针对王洪文。〔２１〕

当然更加敏感的问题，是对毛主席本人的不满。广场上的愤懑，不仅间接地触及当前的政治运动，还触动了毛生平最感自豪的文化大革命。个别少数的大字报与演说，尽管没有指名道姓，显然是冲着毛泽东而发。比如有一幅十分醒目的标语，即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怀念，对极左人物的痛恨，与对毛的大不敬。它说：“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意指毛泽东），更不要那拉氏（江青）。”当夜幕降临后，灯光之下，人们

放眼所见的是层层堆满于纪念碑前献给周总理的花圈，正对着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肖像。这就构成了一幅象征周、毛对抗的巨大画面。这种画面在周恩来生前，当然是不可想像的。对于这一严重的挑战，政治局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正如汪东兴七个月之后解释的：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没有错，但攻击政治局委员就成问题，攻击毛主席则更是大逆不道。〔２２〕

于是，政治局决定在清明午夜过后搬除花圈，清理广场。当晚滞留在广场上的少数人群也遭拘留。到了５日清晨，所有花圈和大字报果然都消失了。由于当局事先未加解释，丢失花圈的消息便迅速传播开来。早上８点，广场上聚集了近一万名激愤的人群，后来的人数更是成倍地增加，很快就发生了官民的对峙和摩擦。人们挤满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要求还我花圈，并掀翻了一辆高音喇叭广播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警车。下午５时许，群众又捣毁和点燃了联合指挥部。整个事件，根据现场目击者罗杰·嘉赛德的报导，直到此刻，员警和民兵都还非常克制，没有进行逮捕。到了灯光亮起时，群众已逐渐减少。６点３０分，北京市长吴德播放讲话，谓有一小撮坏人利用清明节制造政治事端，呼吁“革命群众立即离开，不要受到蒙蔽。”吴德的讲话反复播放后，人群进一步减少，只有数百人仍滞留纪念碑周围。晚间１１点左右，员警和民兵终于冲进了广场，对人群进行一阵短暂的毒打，并把受害者拖上卡车拉走。之后宣布广场戒严，但并未严格执行。次日至广场向周恩来表忠的人数仍达数千之众。他们照样献上一束花圈，但这回民兵并未干预。有些人也照样声讨江、张、姚（也还是未提王洪文），但气氛已较日前平静，当局亦未进一步的镇压。总之，大规模群众的抗议已遭瓦解，天安门及其周边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２３〕

在转入讨论党的高层如何回应及处理危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略考察一下，是哪些社会与政治力量实际推动了天安门事件。嘉赛德认为，其中有为周恩来鸣不平，有对毛泽东的反叛，有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以及对镇压者的抗议。嘉赛德和其他观察家都认为，几乎中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包括最贫穷无告者，都参预了这一抗议活动。而来自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三总部的花圈，乃至身着贵服的高干出现，也意味着高层势力的影响。〔２４〕的确，三周之后，４月２６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干部谈话时说：“为什么这时要爆发天安门事件？（即使）没有悼念总理为藉口，也要爆发……我看一是批邓深入了，打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痛处。一是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他继续说，尽管广场上工人阶级最多，但知识份子才是“最野蛮的”真正闹事者，尤其是科学院、七机部、外交部的那些人。他也特别提到了高干子弟。〔２５〕姑且不论其社会根源，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群众的组合，就像南京等地一样，既有对上层政治一无所知的老百姓，也有略闻上层内斗气味、却未必知其真正底细的人。但这两类人的共同之处，就是一致缅怀他们熟悉的总理，一致痛恨极左人物。

不管工人和知识份子在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姚文元所持天安门事件“总要爆发”的估计，在我们看来，未必站得住脚。试想，若无悼念总理这样名正言顺的藉口，若无当局压制悼周活动因而激起普遍的愤慨，那么，就算民众对文革日益不满，在寻常情况下，这种大规模情绪的大爆发，有可能说发就发么？更具体地说，正如我们下一节要探讨的，假若当局遵守北京市委与群众达成的默契，让花圈在原地保留数日，待得群众情绪平和之后，则流血事件未尝不可避免。再说，尽管不少人藉机发泄他们对时政不满，但绝大多数群众并未公然挑战当局的批邓运动，这说明民众本在自觉地克

制。如果当局稍安毋燥、妥善疏导，亦未必引爆天安门事件。毕竟引爆这一事件的导火线，是关于周的问题，而非邓的问题。至于中上层机关干部的作用，姚文元的说法亦有夸张之嫌。当时有一椿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参加追悼活动的单位逐渐升级，先是小学生上街，后有中学生，最后才是中央政府机关。这说明机关干部也在谨慎地解读当局的容忍程度。更关键的一条是，并无任何迹象表明高层领导曾在背后操纵事件。广场上的抗议活动，确实是来自基层民众，也许正如张春桥所说的“匈牙利事件”。但邓小平并非纳吉，其他高层领导亦未插手。身居高处不胜寒的当权人物从骨子里就明白，如果支持天安门前的民众，无异于政治上找死。邓小平对这一点比谁都清楚。他不但自己不去广场，还嘱咐子女也不要去。当江青等人指控邓小平曾至广场坐阵指挥时，华国锋和汪东兴都表示怀疑——毛泽东当然更不会相信。〔２６〕

◇　处理危机：４月１日至６日的政治局决策

由于现有材料存在许多漏洞与空白，即便可查的关键资料亦不可全信。一些当事者所提供的情况又带有误导性，更不用说各种臆想与编造。此外一些重要的史实（如出席政治局会议者名单，或若干重要情节发生的前后时序），也有相互矛盾的记载。当然还有一些恐怕永无答案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恐怕很难完全吃透当局在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的政治操作。多年来流行的说法，认为它是一个由“凡是派（即华国锋等文革受益者）和极左派合作联盟”　的决策过程。但在我们看来，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即当时在政治局中说得上话，办得了事的，确实只有这两拨人。〔２７〕在４月７日之前，依然健在的老革命家们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局会议，虽说邓小平（或许还有李先念）出席了４月５日的会，但当时他处于面对诘难的地位，会上只能保持沈默。〔２８〕上述流行之说，还意味着华国锋等人与极左派的利益是共同一致的，但实则不然。而且，双方成员的个人行为也当分别考察。此外，主要角色的相对权力也是个因素。比如说，江青气焰甚旺，几乎足以左右政治局。而王洪文则亲临广场，负责督导中央的部署，〔２９〕这或与他是全国民兵总指挥有关。但他的态度显然与极端的江青有别。诸多材料表明，他倒是发挥了某种缓和的作用。吴德作为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贯彻落实中央对广场的反应上甚至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尽管他在政治局中的影响力不大。华国锋则始终主持政治局会议，又兼公安部长，也是毛泽东即将选定的接班人。但是根据事件真相的现有证据，看不出他享有强有力的领导。最后则是毛泽东本人的问题。许多迹象显示，碍于重疾，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大受限制，只能做出被动性的反应。但至少就关键全局的决定而言，他仍然不改其发动者与主动者的本色。此外，犹有毛的侄子毛远新。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可惜易遭研究者的忽视。他是毛泽东的耳目，和主要资讯渠道，并负责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中央。

尽管我们要将事件的具体细节拼接起来困难重重〔３０〕，但有一点很清楚，政治局作为一个领导整体，面临着必须做出强硬果断决定的严峻挑战。这和１３年后的天安门事件差不多，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对下既要应付广场上风云突变后果难料的局势，对上又要应付一位其意志和感情都不容忤逆的至高领袖。虽说高层内部先前存在着矛盾，处理天安门危机时也有不同的主张，但谁都不希望——包括邓小平在内——任由广场上对毛泽东的有形挑战继续下去。

危机时期，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紧急会议一直开到４月１日深夜。会议集中讨论

了南京的事态，正确地认识到它的意义绝不限于地方，而会影响至全国。出席会议者只有六人：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和两位官史不愿点名的人物，但肯定没有张春桥。会议虽由华国锋主持〔３１〕，但出面召集会议并作会议记录者，却是毛远新。他是否根据主席的授意而召开，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不见他传达主席指示。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南京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全国性悼周与攻击江、张、姚的情况。会议又激烈地讨论一份在南京流传的“周恩来遗嘱”。这是一份伪造的档，大加张伐江青，大力赞扬邓小平。为此，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布正式通报，警告人民不可上当。此外会议还部署了五一劳动节的安排，确定邓小平不得参予，并向全党基层组织传达毛泽东从去年１０月至今年１月批邓的诸次讲话。2日凌晨，毛远新起草了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上呈主席。但毛泽东直到3日才表示认可。主席为何拖延，毛远新为何不亲口汇报，个中蹊跷，迄今是谜。其延迟认可者，或许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有关。也可能是他需要时间，好仔细斟酌有关五一节中央领导班子的公开亮相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详见下文)。〔３２〕

与其他几次稍后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相比，我们对4月1日会议的了解甚为有限。南京事件的处理虽说是极左派提出的，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取得了这次小型政治局会议出席成员的共识。再说，开会的情况看不出极左派有主导会议之势。理由是：一者，张春桥没有出席，而王洪文据说也始终未发一言；二者，华国锋主持会议。试想六天前（３月２６日）召开的批邓扩大会议时，王洪文仍是会议主持者。如今由华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权力正转向华国锋。这一转变在4月7日的危机结束之后才告正式完成。在危机出现之前，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并不明朗：华国锋虽跃居国务院代总理，但王洪文在党内的地位仍然高过华国锋，而且有可能仍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关于安排五一节活动的讨论，则进一步突显了这种暧昧状态：即与先前按高低排名集体露面的传统做法不同，这次会议却别开生面地将领导人分成三组，分别在不同的地点露面。这一微妙的变化为何始于4月1日，我们只能揣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多年来王洪文和张春桥负责华东地区，尤其是南京抗议活动主要对象为张春桥。他们或许考虑到与事件多少有些干系，所以不宜主持解决南京问题的会议。此亦或可解释何以张春桥索性避嫌不参加。另外一则原因，就是毛泽东对于党内团结的考虑。这是他自林彪事件以后最为关心的大事之一。正是基于这一心思，他看中了华国锋，〔３３〕认为华具备维护团结的素质，是激进派和老干部都能接受的人物。由于缺乏直接的材料，我们不敢断定五一节的安排就是毛的主意。但考虑到这次会议既由毛远新提议，则我们根据中国政治逻辑的推论，或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此外，这次紧急会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下令镇压南京事件，也没有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此一决策，若视为一个风向标的话，则意味着中共当局对于稍后的天安门事件也可能做出类似的处理，即不镇压、也不做反革命定性。但另一方面，这一克制很可能反而鼓舞了北京市民上街，造成事态的恶化，转而促成江青等人的铁腕对付，终于导致高压的流血悲剧。〔３４〕

清明节晚上，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的局势。王洪文在前一天，即4月3日黎明前，来到了广场，打着手电筒察看花圈和悼诗。四人帮垮台后的报导都说，王洪文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追查何以反动诗词还未清除。但王洪文去广场的直接效果却是：3日这天当局始终克制，而且这种克制态度以不同形式一直保持到5日晚上。在４月4日召开的会议上，又是毛远新作会议记录。如同4月1日一样，也未见他在会前传达主席的任何指示。会议的首项议程，是听取吴德汇报天安门的局势。身为北京

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吴德，肩负着直接应付局势的责任。历史也将把他同当日和次日发生的事件永远联系一起。他的政治生涯也必将受此牵连。在会上，吴德详细汇报了花圈的数量、参加的单位和广场上的群众类型。他不否认广场上出现了反动情绪，而且又拉扯上邓小平。但他主张对事态做进一步的调查，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关键是用软办法，多做群众的工作。至于花圈则可转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其实，吴德的手下先前已和广场上的"群众代表"达成默契，允许花圈保留到４月６日。吴德后来说，他的提议得到当时会上所有人的同意。这次会议虽说有人提到了天安门前的"反革命活动"，但和处理南京事件一样，谁也没说这是一场"反革命事件"。〔３５〕

不幸的是，大约夜里１０点钟，姚文元接到了广场上的《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报告，并在政治局会上传阅。这使得使气氛骤然突变。报告突出了反江情绪，引起江青的勃然大怒。她要求立刻捉拿冒犯者。其他人——据说包括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也赞成动手。江青还责吴德是老右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当然也就怒斥他打算把问题再搁置两三天的设想。吴德被迫自我批评，然后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商量，研究动手抓人的可能性。吴忠认为这么做只会激怒群众，局面反而更难收拾。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这个意见，但政治局却坚持逮捕。事已至此，会议便进一步讨论了预防措施中调动武力的问题。江青主张出动部队。这一主张得到军队最高领导人陈锡联的支援，但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反对动用军队，认为只应当使用员警，特别是以工人民兵为主力。华国锋则同意王洪文等三人的意见。〔３６〕

另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花圈。吴德继续坚持他的建议，希望多做两天群众工作，而江青则气愤地表示，这等于姑息反革命分子。会议进行到了午夜，江青突然要求在天亮前清除花圈，说清明节已过，没有理由再拖。吴德则拿出薄弱的藉口想拖，声称没有足够的卡车和工人完成这项任务。会议僵持了一阵，大家一言不发。最后华国锋只好要求吴德尽力而为，争取当晚解决。许多年后吴德回忆说，如果华国锋当时支援他，天安门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但在当晚吴德别无选择，他必须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对付这场他自己先前所谓的"邓小平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３７〕

华国锋和吴德在４月４日会议上的发言，后来都成了遭受批判的口实。以华为例，他在会上宣称"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很恶毒的。"这显然是他在《人民日报》记者的报告造成会议气氛急转直下后所做出的反应。如果考虑到当时政治危机的大环境和会议的特殊气氛，华国锋的这些话其实是情有可原的。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对天安门事件反思时，这似乎是批华者唯一能找出的一条罪状。即便在８０年代初华国锋遭受不公正的批判时，当道对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也说不出有任何实质性的错误。总的来看，我们不妨说，只要天安门前的事态允许，他就会倾向采取温和的立场。至于吴德，在天安门问题上，后来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的确，他在４月４日的发言要比华国锋走得更远。回顾起来，他最大的罪过便是直接诋毁邓小平，把广场事端与邓小平１９７４年以来的作为挂起钩来。这包括指控邓小平从事大量的舆论准备、宣传批林批孔是批周公，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张春桥）要夺总理的权等等。这就引导了后来政治局所作的决议。可是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他说了这些批邓的话之后，江青仍然指责他深受邓小平的毒害。我们只能猜想，鉴于广场上的局势，和高调的"批邓"运动、尤其是他深知毛泽东对邓的日益不满，吴德觉得必须扯上邓小平。因此他在会上宣称，天安门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为严重的逆流"——这一说法恰恰触动了毛的最大心病，即耽心有人反

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吴德这番批邓的过头话，再加上翌日发生的事情，最终只能落得一个灾难性的下场。〔３８〕

关于４月４日的政治局会议，还有一椿不同寻常的情况。根据现有可查的文献，政治局开会时，不仅没有接到毛泽东的任何指令，而且许多带有严重政治后果的决定，诸如清除花圈、标语和传单，向广场周围派出大量民兵（主要力量）和公安员警，以及动用卫戍区部队作为后备力量，都是在没有事先请示主席的情况下做出的。继４月１日之所为，毛远新在５日拂晓前，又给主席写了政治局会议的书面报告。其后毛泽东圈阅报告时，清除花圈的行动恐怕已告结束。而且王洪文没准也已经在早晨５点１０分去了广场，亲自指示联合的治安力量，应付即将来临的一天。〔３９〕

王洪文亲驾广场一事也值得分析。四人帮垮台后大多材料都说，王洪文和北京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的关系密切。马小六也因为在４月５日晚的暴力镇压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遭受到惩罚。这种说法似乎过分夸大了王洪文与马小六的交情，也夸大了马小六的罪责。马小六在５日晚不过是执行政治局的命令。关于王洪文的广场之行，我们可以找到完全不同的说法。他在检查清除花圈的工作后，便去了广场角落上的三联指挥部，下达了当天工作的指示。当看到夜里被抓的人受到虐待时，他还进行了干预，制止了殴打，指令民兵自我克制，故当天民兵的表现都比较约束。王洪文在指挥部训斥马小六等人时，还特别提醒他们毛泽东为民兵规定的政治作用，即“民兵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武装力量”。因此在对待群众时，首都民兵必须高标准地严守此律。〔４０〕

政治局决定立即清除花圈，也是个少有的举动。这可能是共和国史上第一椿未经主席点头就干的政治性决定。也许可以说，不论清除花圈的后果如何严重，在当时的政治局看来，似乎并非什么大不了的措施，非得惊动病重的主席不可。或许他们也认为，移走那些讨厌的花圈，起码也符合主席本人的最低愿望。然而政治局敢于拍板的能耐，也就到此为止了。下一步关于清理广场的重大决定，则又回到了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程式，即必须请毛主席定夺。据青野和方雷的记载，鉴于广场上的情势沸腾，华国锋便委托毛远新请示毛泽东。５日早上毛远新来到了“游泳池”，与主席讨论了广场上的局势。〔４１〕这里须附带说明：毛泽东由于过去一年来健康恶化，他掌握资讯的管道大受限制。临此关键时刻，在很大程度上，他只能通过自去年秋天以来兼任联络员的侄子毛远新，来了解中南海墙外发生的事情，以及政治局处理危机的情况。对此，高层有人怀疑过毛远新在传达主席指示时夹带个人私货，却无人敢于追查他传递消息的可靠性。〔４２〕

总之，毛远新在４月５日上午面见主席时，列数了邓小平的罪状，并报告说政治局对如何平息广场骚乱仍未取得一致意见。〔４３〕对于毛远新的指控，说邓小平一手策划和挑动了广场上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似乎不大相信。问有什么证据，并明言邓小平不是纳吉，尽管张春桥说过邓小平造成了一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话说回头，政治局的请求批示，才是这次会面的主题。为此，毛泽东批示了三条：（１）肯定天安门骚乱是一次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２）同意政治局使用必要的武力，但不能开枪，不能调用野战军；（３）鉴于邓小平对这次反革命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局“要让他写检查……总之，他要认错。”这几条批示虽然给采用武力的程度定了框，也使邓小平不至于立遭整肃，但也明显地允许使用武力。为明确这一点，

毛远新问主席是否同意动武，毛泽东回答："对，君子动口也动手。"青野和方雷认为，正是这句话把天安门事件推向了流血之途。毛远新在当天午后召开的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得到的反应不难想见：到会的全体成员，包括邓小平在内，一致支持。邓小平显然是被激进派叫来开会的，张春桥指责他要对广场上的骚乱负责。〔４４〕

可是，政治局在落实主席的批示时，在"动口"还是"动手"的问题上，还是发生了矛盾。负责过扩充上海民兵的王洪文刚听完主席指示，就主张动员十万民兵。吴德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北京民兵总指挥的倪志福则反对这个人数，说这可能造成混乱。理由是北京的民兵不像上海那样优秀。此外，吴德，似乎还有华国锋，仍然希望在出动民兵前，对群众的劝说工作能够奏效。张春桥支援了这一想法，更建议使用电台广播，劝说群众撤离广场。江青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尽管在会上她指责吴德害怕群众。她要吴德本人去广场承担这项任务。于是吴德起草了广播稿，经华国锋审查后，政治局一致通过。广播讲话使用了当时的极左语言，警告反革命破坏活动，号召捍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和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没有点邓小平的名〔４５〕)。这个广播稿是双刃剑，它既可能促人离开，也可能加倍众怒。它由吴德录音，从下午六点半开始不停地播放。〔４６〕

此后几个小时里，随着吴德讲话的反复播放，广场上的人群逐渐稀少。政治局决定进行广播时，还规定了从晚上８时整开始武力清场。吴德和倪志福又前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与吴忠磋商。三个负责人都害怕流血，决定尽可能延拖时间，让广场上的人群减至最少。吴忠随后前往广场一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那里协调清场的行动。８点刚过，华国锋和陈锡联便打电话询问为什么没有动静，但吴德等三人还是提出种种理由推迟行动。政治局有些不耐烦了，显然想着毛泽东说的："动口"不管用，就得"动手"。最后，大约１０点半左右，华国锋和陈锡联又来了电话，指示不能再拖了。吴忠还是使出最后一招：命令打开广场所有的灯光，并最后一次播放吴德讲话，希望能再吓走一批人群。当大多数人离开广场后，晚上１１时，暴力终于冲进了广场。暴力的场面，大约持续了１０到１５分钟，并且只使用了棍棒，没有致命的武器，造成的身体伤害也较有限。尽管传言甚多，但没有一个人死亡，遭到逮捕的人也相对较少（当场只逮捕了３８人)。然而广场上毕竟流了血。这一当局镇压百姓的绝不光彩的形象，终将成为毛泽东接班人大感头疼的问题，尽管主事者的初衷是尽力克制。〔４７〕

当然，被此事件抹黑最多者，莫过于吴德。上头说过，吴德所以走上前台镇压，实因他身在其位，不得不为的尴尬处境。但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他大体上一直主张采取温和的手段。他的确在４月４日——可能还有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站错了队，批判过邓小平。然而鉴于当时危机事件的压力、批邓运动的"必要"，以及他作为首都负责人不可能保持低调的事实，吴德的表现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未必可以宽恕。

在这件事上，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所撰其父亲的传记，或者便反映出邓氏一家对吴德的最新评价。毛毛特意不提吴德在４月４日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而在提及４月５日的广播讲话时，则突出"吴德奉命做广播讲话"一句。这意味着邓家理解吴德的身不由己。〔４８〕毛毛在书中也似乎有意隐去陈锡联不提，尽管后者长期是邓小平山头里的重要人物。〔４９〕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主导中国时，吴德、陈锡联以及其他所谓"新毛派"纷纷垮台。这一垮台的过程甚为复杂，在此不表。但

可说者，它涉及高层内部对于某些人物的错觉，以及摆平权力的考虑。为此，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吴、陈二人成了牺牲品，但此结果却未必与他们在天安门危机时期的反邓有关。

如果说吴德迫于形势的压力，只能批邓不能拥邓，极左派则是一直藉着广场事件压迫邓小平。最要命的例子就是５日傍晚，江青去见主席。当时事态正在向晚间的暴力发展。根据毛认为邓必要对广场“反革命暴乱”承担责任的结论，她提议把邓小平开除出党。毛泽东没有立即作答，但后来决定保留邓的党籍，并见之于４月７日的正式档。这一决定颇出邓小平意料之外，也令他万分感谢。此事一方面表明了江青对于邓的极端敌视，另一方面也点明毛处理邓时的复杂心态。对毛泽东来说，天安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林彪死后整个时期的问题，都关系到捍卫他的文化革命。如他不久后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冲着我的，总之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知道，邓小平无论在政治上或在个人上，对他都是完全忠诚的，就像过去的周恩来一样。但他也终于断定，邓小平不会在思想上忠实于“文化大革命”。以他之见，邓小平的问题不在于天安门（要是邓真的组织了广场上的抗议活动，自然必须开除党籍），而在于他１９７５年执行整顿政策时，背离了“文革”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第二天《人民日报》文章所说，“批邓”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化”，倒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５０〕

武力清场后，政治局在４月５日深夜至６日凌晨再度开会，听取了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对白天情况的汇报及防止新动乱的准备工作。刘传新汇报说，已准备好了９个营的卫戍区兵力，但又表示民兵和民警完全有能力应付局势，只要允许使用棍棒。这又可以看作是吴德领导的市政府有意克制、避免动枪的态度。政治局同意动员更多的民兵待命，以备不测，但又规定民兵不可草率出动。华国锋明确了会议的共同认识，谓“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已经发生，但又冷静地补充道，只要大家沈着冷静，正确观察形势，就不难取得胜利。最后，华国锋提议通告全国，解释前两天事件的性质，并把通告呈交主席批准。毛远新遂于凌晨３时，就这次会议白天情况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报告。６日那天，据说主席在看了毛远新的报告后高兴地批道：“士气大振，好！好！好!”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并通过起草的全国通告及北京市委的报告。次日上午，毛泽东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份通告和吴德讲话，但压下了北京市委的报告。这些事宜处理完毕后，４月７日余下来的工作就是改组中央领导，确立华国锋的接班地位了。〔５１〕

对于这一危急时期的政治上的驱动与互动，〔５２〕应当如何看待呢？在此我们必须再度强调，无论是基层百姓还是高高在上的主席，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与震动。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如邓小平的问题，当权者本有各自的成见，大约亦有腹案可循，容易取得共识。但面临火爆广场上的千变万化，他们的反应则必然难得一致，也难以逆料。即以当时付诸行动的高层决定而论，虽有４日夜至５日晨清除花圈的大败笔，但当局总的倾向还是力求克制。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如华国锋和吴德，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克制的政治倾向，尽管华国锋在移走花圈的问题上屈服，又逼吴德按时出动武力清场，表现出了立场上的不够坚定。〔５３〕至于政治局里的激进派，虽说他们都一致强调广场事件的反动性质，并试图藉机除邓。但在如何使用武力问题上，却意见不和。江青大喊出兵，主张霹雳手段，而张春桥、王洪文与姚文元则主张克制。据权威人士披露，江青和王洪文在４月５日上午的政治

局会上有一段对话，突出地点明了这一分歧：

王洪文：“民兵和部队可以多调点，但一律不能带武器。”
江青：“不带武器，你让我们的民兵和战士拿什么消灭反革命？”
王洪文：“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５４〕

这段对话虽然说的是军队，但它反映了王、张、姚三人在危机期间也一直倾向于缓和的立场。他们宁愿动用工人民兵，而不愿动用解放军。这或可以部分地归因于王洪文在发展上海民兵的角色，以及他基于文革经验的认识，深知军队与人民对着干的危险性。〔５５〕王洪文虽然在５日下午很快就提出动员大量民兵，但当天早上他也命令民兵保持克制。这天傍晚，局势急剧恶化时，张春桥又提议使用广播。这多少延缓和并削弱了动用武力镇压的不幸后果。

无论如何，从后毛时期的批判观点视之，造成天安门悲剧的责任在于“当时的政治局”。然而，正如青野和方雷不言而喻的质疑：“华国锋和政治局又执行了谁的决定呢？是毛泽东？是‘四人帮’？还是毛远新？这恐怕是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的。”〔５６〕我们或许可以说，江青在政治局里的压力和广场上混乱险峻的情势，以及毛远新给双方汇报时可能的歪曲，这些都是促成悲剧的因素。但归根揭底，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和武断，决定了事态的最终结局。亦即由原本可能在清明过后逐渐淡出的悼周活动，演变成全面开展的悲剧事件。这从短期看，它加剧了人们对于当局的忿怨。在此后几年中，它更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中共的高层政治。

◇　邓小平的命运和领导班子的调整

４月７日早晨８时，毛远新花了一个多钟头向他伯父汇报前两日的动态后，毛泽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其实也是周恩来死后他在１月末所未了结的问题：即处置邓小平，和明确权力和领导班子。如今天安门事发，问题也就更加刻不容缓了。原先毛泽东对毛远新指控邓小平组织天安门暴乱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夸大了广场群众对邓小平的支持。毛远新说“反革命……公然打出了邓小平的旗帜，狂妄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但现在毛泽东则认为情况不同了，也不再犹豫了。于是他批示“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之后又加上，“华国锋任总理。”（作者按，不再是代总理）。他指示毛远新找政治局开会传达，但点明邓小平、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和苏振华，不得出席。后来他又决定只把苏振华排除在外，令人不解。但总之，这意味着老革命家们在权力台上只能靠边站，直到他死后。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显然又觉得这一安排还不够明确。所以又送去了一道命令，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可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头衔，明白无误地把华国锋摆上了接班人的地位。政治局当然义不容辞地通过了毛的提议。晚上８时，两个决议通报全国，一是宣布华国锋担任的新职务，二是宣布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完全用了毛的原话。〔５７〕

一如既往，邓小平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这回，毛也再度给了邓一线宽容，允许保留党籍。尽管邓的定性已升格为敌我矛盾，只要保留党籍，邓小平便仍

有机会“改过自新”，东山再起。实者，毛的保邓尚不只此。４月７日政治局开会时，江青和张春桥揪住邓小平问题不放，指控他上了广场指挥暴乱，还说现在问题暴露了，群众可能揪走邓小平。华国锋大约也想保护邓小平，故意挡开了这一指控，说这事得问邓小平本人核实，弄清真相。当时不见有人自愿找邓小平查明，江青便指定汪东兴来办。汪东兴当年曾奉毛令，关照过放逐江西的邓小平。他还真担心有人会抓邓小平，便私下来到毛泽东住处，先直接向毛请示，汇报了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显然，毛泽东根本不信邓小平会在广场上活动，反而重提小平为刘冰转信的事。换言之，在毛本心，邓的问题不在天安门事件，而在于一九七五年秋后所为。当谈到邓小平可能受冲击的事，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问汪有无办法。汪东兴乃建议把邓小平转移至其他安全住处，毛泽东完全同意。〔５８〕

汪东兴马上执行了毛的指示。当然也趁机就江青等指控一事询问了邓小平，邓小平否认有此一举，说只到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理了一次发。汪东兴回到政治局后，向大家重复了邓小平的回答，但对转移之事则隐而不说。在后来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果然抱怨邓小平“不知跑哪去了”。第二天，４月８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当然是希望毛能看到的信），就保留党籍一事表示感谢，并说他完全拥护华国锋出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虽说在当时的条件，邓也只能表示拥护，别无他途，几十年之后，邓小平的女儿则补充说，邓小平当时的拥护华国锋是完全真诚的。毕竟这是个关系到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决策。此外，邓的态度也说明了老革命家和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在根本利益上是大体相通的。从这以后，邓小平滞居于北京，几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按，当时曾谣传邓小平逃亡广州，接受许世友保护〔５９〕），直到“四人帮”被捕前，再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了。在这一严密控制下，他的日常需求和人身安全唯有依赖汪东兴。〔６０〕

在邓小平免除一切职务并被保护起来的同时，华国锋明显跃升为“第一线”的头号领袖，而不再是先前那种模棱两可的地位。这的确是党内权力重新分配格局中的根本变化。这一加强华的地位的安排，不仅在名义上确认了华的接班人地位。作为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也首次在党内体制中，位居于副主席王洪文和常委张春桥之上。至于他是否开始（甚至先前已经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即便王洪文保留了日常行政权，他也必须从此听命于华。天安门事件随后，华国锋和王洪文两人联合具名向各地发电，解释中央的政策，并组织庆祝粉碎天安门动乱的“胜利”。这也是一把两面刀，刀的一面是华王两人之间的合作，另一面却是党务职责稍嫌不清，容易增加二人间的不信任，尤其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数日。〔６１〕

华国锋在政府系统中的升迁则比较直截了当。他不再是临时代总理了。这也意味着张春桥对总理一职原先可能怀有的期望落空了。（但并无迹象显示张春桥表现出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极度失望。）〔６２〕然则以党政军三头大权而论，华国锋唯一未能掌握实权的领域就是军队。事实上，尽管身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并无任何具体的军职或权威能对解放军发号施令。在这方面，华国锋大概只有依靠“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与陈锡联相互支援的个人关系，来指挥军队。陈锡联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是保证军队听命于新接班人的关键人物。〔６３〕最后，到了五月，华国锋还接管了外交事务。这个任务来得稍迟，大约是他的外交经验薄弱之故。奇怪的是，此前的三个月里，江青却主管过外交部的工作。〔６４〕

为了提高新接班人的威望，毛泽东还指示要多宣传华国锋。据言华受宠若惊，不敢接受这种荣耀的吹捧；他试图限制宣传，而姚文元则有意压缩报导。〔６５〕毛泽东本人对于华国锋则进一步肯定，他在４月３０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为华写下了几条批示，包括最为著名的“你办事，我放心”。〔６６〕华没有立即公开这一批示，直到“四人帮”被捕后才公布，藉以加强他在领导层及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但８０年代初华国锋被迫下台后，人们则说毛泽东这条批语仅仅是就华处理某一小事而发，无关宏旨。但这一说法似乎歪曲了当时的情况，盖华向毛汇报者，乃是当时的全国形势及有关全局的大问题——即批邓运动不平衡，“有几省不太好。”。总之，华国锋如今拥有了组织名分上的巨大权威，又加上毛泽东的极力呵护。毫无疑问，毛泽东临终前选定的接班人终于确立。〔６７〕

在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了华国锋。据披露，４月７日，毛主席在与汪东兴有一段谈话中，道出了他的各种考虑，包括华国锋的资历和激进派诸人物的弱点，这其实也反映出他在１月间提拔华国锋时的同样思考。〔６８〕毛泽东认为华国锋的实际经验丰富，不论是工业、农业或财政，又是一级一级锻炼出来的，先是地委，再是省委，最后至中央。华为人忠厚老实、不蠢、公道、忠于党、忠于人民。毛重申了自己在１月间的说法：“他不搞阴谋鬼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６９〕“人家都说他（理论）水平不高，我就要选这个自认水平低的。”这话或许是针对高层有人怀疑华的才干而发。（故有一说，谓毛之选华，无非是个过渡人物、权宜之计。）之后，毛泽东以蔑视的口吻谈到激进派人物。对当时党内排位仅次于他、先前选为接班人的王洪文，毛嘲笑说：“如果让王洪文来指挥，那么除了他，其他人都别吃饭了。”这当是有感而“发”，因有调查反映说，去年夏天王洪文在上海私自挥霍了两万人民币。毛又接着谈到了张春桥，说他从来不承担（具体）责任，“说得多，做得少”。主席也怀疑姚文元的实际工作能力。对江青更做了类似的评价：“喜欢整人，让人不好过”，不懂工业，也不懂农业。相比之下，华国锋就成了最好的人选。

除了这些针对个人素质的评价外，我们猜测，毛泽东大约还有其他方面的顾虑。小平出事，总理亡故之后，中央领导班子的确立，自然刻不容缓，为此毛泽东很可能早在１月间就选定了接班人，却故意模棱两可。正如他在林彪事发之后的习惯做法一样，他需要时间观察，以便最后定夺。从逻辑上说，如果前些日子是华国锋的试用期，那么，４月７日的决定，便反映了毛对他自２月批邓运动以来及天安门危机时期的表现感到满意。华国锋虽然也忠实地贯彻了毛的“批邓”运动，但他懂得掌握运动的尺度与节制，与江青等人的穷追猛打，大异其趣。他在处理天安门事件上亦体现出这一态度。这些大约是较符合毛意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危机之前和之后，都试图控制和避免事态不必要地恶化。比如３月２４日，他批准了党中央通知，把“批邓”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下，（而不搞大串连与战斗队之类的文革做法。）。４月１３日，他又拒绝了毛远新关于选印天安门反革命诗文的建议。理由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天下已定”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扩大事态。他在４月３０日写下的，大约也是他生前最后的文字：“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要着急。”也无非是对华国锋稳妥作风的认可与欣赏。〔７０〕

另外，如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华国锋的提升和中共权力格局的变化，则天安门危机显然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变数与转机。华国锋作为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整顿议程的主要副手，若非有周恩来的逝世及接踵而来的天安门事件，那么他在不断加剧的“批邓”

运动冲击中，也大有可能给人拉下马来。〔７１〕但如今周死，遗下了总理的空缺有待填补。当时，华国锋由于具备充分的行政经验，让毛看中了。但毛仍怀疑华的理论素养，也须继续观察他的表现。接着，天安门事件爆发了。这又必须重组中央领导班子。况且，通过事件的发生，毛也认识到“四人帮”之不得人心，不宜授之大印。华国锋遂成为天安门事件的最大赢家。

毛泽东拍板于４月７日的决议，确立了华国锋至高的组织地位和政治地位。那么，“四人帮”的权力分配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四人帮”在“胜利”地斗倒邓小平之后，中外论者皆以为“四人帮”的权力与气势大为高涨，他们掌握宣传工具，大吹天安门事件的官方版本，又继续大搞“批邓”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许多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中，他们的声音薄弱。在民间，许多社会阶层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更遑论军队的支持了。他们在媒体上打倒“党内资产阶级”的叫嚣，并未引起大规模的群众呼应。在上层，他们在政治局里也没有几个同道。试看江青在政治局会上屡屡追问邓小平的下落，却是不了了之。而张春桥连要求汪东兴写个证实邓小平未上广场的“谈话记录”，都不可得。这些迹象表明，尽管江青贵为主席夫人，众人不敢招惹，她在处理天安门问题上也施展出僭越过分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她和她的极左派同伙，充其量只是个少数派，尤其是在守护神毛泽东过世之后。〔７２〕

造成这一轮权力杠杆倾斜的，自然还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其他成员，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呢？他自１９７４年以来，对江青，便不乏若干为人所知的批评。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四人帮”处理实际问题的能耐并不惬意，乃至怀疑。但也同样无疑的，在毛看来，“四人帮”毕竟是坚持他的文革理想所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也只有他们才能提供华国锋所欠缺的理论支柱，才能为文革压阵。然亦有论者以为毛对激进派的期许，远不止此。这包括要把毛远新提拔为政治局常委，江青任党主席。〔７３〕总之，是在他死后由江青接替实权。这一说法，主要是根据１９８０年两案审理期间江青本人的证词。江青自称毛主席在临终那年４月３０日给华国锋的批示中（“你办事，我放心”），原本还有一句，“有事找江青”。但后来这句却给压下了。〔７４〕　对此，我们只能猜测地说，就算毛泽东曾经奉劝华国锋“有事找江青”，也未必意味着让江青接班。估毛本意，无非是叮嘱华国锋坚守“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与价值。总之，在此之前的４月７日，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变数，毛泽东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高层权力的组合。从此中国的高层政治，开始朝着不利于江青一伙的航向飘摇前进。

◇　结论

对天安门事件的上述分析表明，我们不但要修正对这场危机本身的认识，也需要改变对毛泽东时代尾声的中共高层政治的传统看法。首先是，这段时期仍处于整个“文革十年”以分化为主导的政治斗争之中，对清明节的活动也有紧张不安的预期。危机时刻，广场上事态变化的戏剧性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做出的反应必然是随机应变，乃至于临时起意。我们很难说天安门危机是出于“四人帮”明确的反周战略所造成的结果。虽说“四人帮”急于批邓，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视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这当然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已故总理的不满和他对追悼活动的压制，决定了天安门事件的大气候。随着危机在民众层上开展，领导层不

得不仓促应变。一者因须为此局面向毛交待，二者又因群众的言论已向毛泽东所宠爱的政治局成员和他的思想路线发起了挑战，在４月４日还甚至对他本人发起了挑战。政治局在此应变过程中，尽管不免章法反复，意见分歧，但其主流倾向大体是保持克制。只有江青一人比较一贯地主张铁腕手段。

在此境遇中，激进主义者与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之间，并不存在牢固的同盟关系，尽管这两个团体，甚至靠边站的老革命家，都不会容忍对毛泽东或共产党领导的任何挑战。〔７５〕毛泽东的批邓及除邓，对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而言，的确造成了一种尴尬暧昧的局面。他们也只得跟着批邓反邓。但多年来共事的经历表明了他们与老革命家之间，其实才有真正共同的利益。这可见之于以下诸端：一是政策执行上的表现。特别是华国锋、纪登奎等人，他们大力执行邓小平１９７５年的整顿措施。二是他们与老革命家都强调组织纪律和社会秩序，反对文化大革命式的无政府主义。三是他们看重革命资历和党内辈分。对于老革命，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敬重。〔７６〕１９７６年２月之后，邓已下台，在台上的只有华和江青的两拨人马（犹如毛先前所说的："政治局就这么多人"），面临政治危机，体制派与激进派不得不达成充满张力的临时妥协。然一旦毛泽东寿终正寝，这一妥协也就必然跟着寿终正寝了。〔７７〕

通过天安门危机事件和研究，乃至于从林彪事件之后整个高层政治的动态来看，"四人帮"这个概念或提法，显然难以成立。王、张、江、姚四人，原本只是中共体制中的边缘人物，但由于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提拔，先后攀上了权力的高峰，进入了政治局。四人之间，在核心的共同利益与激进的意识形态方面，诚然有其相通之处。然而，有关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恶、从未间断的猜疑，和各种鸡毛蒜皮的摩擦，也存在着大量的证据。甚至在毛泽东西归的当月，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守护神之后，还能见到这类现象。论者都说四人合谋串通，意图夺权抢班。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进行，也没有弄出一套协同合作、周密无间的政治行动方案。试看在天安门危机期间，江青为一头、王、张、姚为一头，单在如何动武对付广场群众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就没能说到一块去。此外，虽然"四人帮"在今日已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但在整个危机期间——先是周恩来去世后对极左派的零星抨击，然后是南京和天安门事件，直到４月５日镇压后的数天和数周内——群众的控诉显然只针对"三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不及王洪文。"四人帮"这一概念，原本不过是毛泽东在两个场合大约是随兴所抛的提法，后来竟成了圣谕，其目的不外是让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宫廷政变合法化（按，毛泽东另有随口说的"五人帮"的提法，包括了纪登奎）。可是实际上，无论是被召集到北京开会的中央机关、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还是上海当地的极左派，对此前的这一提法都毫不知情。即便在9月份部分政治局成员商量如何处理极左派时，纪登奎还主张有必要对王、江、张、姚四人加以区别对待。此外，在逮捕四人之后，上海的地方领导人虽然同意江青和王洪文有罪，却一直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类似邓小平那种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问题。〔７８〕

最后当说一点。尽管病魔缠身，毛泽东处理政务的能力大打折扣，但却无妨于他对大局的掌握。正如毛泽东晚年的整个时期一样，天安门危机的处理仍然是由他最终拍板定夺的。这一掌控，不见得非由他本人直接出面不可，政治局自会揣摩他的心思，实现他的意态。诸如４月４日搬走花圈这一关键性的决定。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需要保护主席的威望。而毛泽东本人在４月５日批准使用武力，则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决定。尽管这一决定禁用致命杀伤武器，它还是削弱了避免流血的努力。完全可以这么说，

毛泽东的“路线”在整个危机期间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不可违抗的。坚持这一路线，乃是任何政治局成员的第二天性。其实，自文革以来，及至毛的晚年，在不同的政治阶段里，无论是极端的文革岁月，还是１９７２年与１９７５年的温和政策，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的路线，正是中共高层政治的根本特征。

注释：

１．按本文原为与Fred　Teiwes合撰的英文稿，现由本作者修改后中译而成。
２．“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１９７６年4月26日），引自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引文中关于“不用坦克与机枪”之说，乃本文作者所加，因为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政治局曾讨论是否出动军队的问题，但遭到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烈反对，毛也否决了动用野战军之议。
３．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乃至屡屡批周。相形之下，毛则偏爱邓小平。对于主席这一厚此薄彼的态度，周邓二人当然心知肚明，这也使得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毛既有此不同的赏识与期许，周邓在政治上的举止应对，也必然有所不同。不过他们的思想观点却大体相近。
４．罗杰？加赛德:《复苏：毛后的中国》，纽约：１９８１年），第7—１３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夏威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８４—４８５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４１页。
５．当时国内报章对于周总理含沙射影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上海，而刻意要突出反周报导的学者，也最多只能举出６篇文章而已。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５８１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０５页。
６．然而，群众的情绪是复杂的。当时旅居北京的外国人士大卫•兹韦格在“北大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与邓小平的下台”（《中国季刊》，１９７８年第７３期，第１４６页）一文中，说及学生们反对周荣鑫列名于总理的治丧委员会。这说明周荣鑫尽管一向被视为周总理的心腹，学生们依然接受了“四人帮”对他右倾的指控。换言之，学生是根据当时官方的口径来维护周总理。不过，他们维护的只是周的身后声名，并不敢触及实质性的政策问题。当然，也有人藉机发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７．从2月开始，反对政治局中极左派的大字报和群众来信越来越多，矛头所向主要是张春桥，不是王洪文。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４５９页；李耐因:“从姚文元的札记看四人帮覆灭前的罪恶心态”,《炎黄春秋》，１９９７年第9期，第３６、３７页。
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１９６９年1月—１９７６年7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２９页。
９．虽然一些权威学者记载：华在担任代总理后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如马齐彬，见其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４０周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修订本，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９６页），但在关于新领导人任命的中央一号档中，未见有此安排。
１０．有关这些事件的述，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８９—４９２页；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册“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３４９—１３５０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上卷：天安门事件》，渖

阳：春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８—１３４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１０—１１４页。
１１．在邓小平复出一事上，毛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以邓代周。尽管毛去世后，人们极力把周和邓描述成兄弟关系，其实他们的关系未必密切。
１２．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第５９５—５９６页、６４９—６５１页，只报导了郑州、无锡、杭州、合肥和天津等地，出现拥护邓的标语或播放邓在总理追悼会上的悼词。陈东林、杜蒲主编的《实录》第３卷第１３５４—１３５５页、１３５８页中，则还提到杭州和西安。青野、方雷在《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３７页、１４３—１４４页中，更独家报导南京事件中群众明显拥邓的活动。但在北京，加赛德根据亲身的见闻，（见其《复苏》一书第１３６页），则说天安门广场上并未出现任何拥邓之举。不过，乔治？布莱克与罗宾　？孟罗二人合着《北京的黑手：中国民主运动家群传》，纽约：１９９３年，第２４页，根据现场抗议者提供的资讯，则说："有一批人公开支持邓小平"。陈东林、杜蒲主编的《实录》第１３５８—１３５９页，也提到４月４日，广场上播放邓致的悼词，并有人散发赞扬邓小平的传单。然而，也许最能说明邓小平当时刻意低姿态的，还是吴德４月４日在政治局会上的汇报。汇报里泛泛说及有人破坏了批邓大方向，甚至说到群众所为"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但却提不出广场上有任何拥邓的活动。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风雨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１３．"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汪的讲话特别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８９页。
１４．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８９页；麦克法夸尔："毛的继承人与毛时代的结束１９６９—１９８２"，见其所编《中国政治》（第二版）:《毛时代与邓时代》，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９９—３０１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０９页。
１５．见《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６月号第３９页。
１６．毛泽东在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提出的三项指示是：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政时则把这三项指示奉为"今后工作的总纲"。毛初时接受了邓的说法，但到了１９７５年秋则批评三项为纲之说，认为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１７．见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第１３５４—１３５５页。马天水所以要对《文汇报》的文章负责，因为他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他曾指示包括具体承担起草工作在内的中层干部，要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见苏东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下卷，第１５７０页。
１８．"张玉凤揭毛晚年秘密材料"，见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２日互联网：www. secretchina. com
１９．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６０１—６０４页。
２０．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９２－４９５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１５页，第１２３页，第１２８－１２９页;《吴德口述》第２０５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４８，１３５６，１３５８页。
２１．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９５页;《吴德口述》第２０６－２０７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１７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５８－１３６０页；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６６，４６９页；同注１２。

２２.《吴德口述》第２０７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２６－１２８页；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原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第２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４５页；“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３．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９５－５００页;《吴德口述》第２１６页；加赛德,《复活》，第１２８－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页；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３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３－１３６４页；许多文章指出暴力行动始于晚上９点３５分到９点４５分，但是根据吴德之说，则动手时间要更晚上一个多钟头。
２４．加赛德,《复活》，第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６页；Black and Munro 布莱克和孟罗，Black Hands《黑手》，第２３页，认为主要抗议者是普通市民，特别是工人，而大学生则“几乎看不见”。
２５．“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吴德口述》第２０７页。
２６．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６７－４６８，４７４－４７７页；关于邓小平４月３日微服至广场的传闻，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６３－１６９页。
２７.Richard Baum 里查•鲍姆,Burying Mao: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埋葬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４)，第３３页；引文特指４月４日政治局会议，但也可以用于概括整个危机时期。见 MacFarquhar 麦克法夸尔，“Succession,”《接班》，第３０３页。
２８．我们的结论主要根据《吴德口述》第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７页。4月17日毛泽东召集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却不通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和候补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后来，毛泽东修改了指令，故唯苏振华没有到会。
２９．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说,“重大布置都是副主席定的”。所谓副主席，当指王洪文，他是当时除叶剑英和邓小平之外的唯一副主席。但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已“生病”不再视事。姚文元讲的显然不是华国锋，因为他紧接着谈到华，称之为第一副主席。至于王洪文任全国民兵总指挥一事，正式的组织系统从未确认，但他后来却被指控热衷于这个职务。由此可知，若无毛泽东的同意，他绝不可能出任此职。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北京民兵副总指挥马小六在汇报广场事态时，以此头衔称呼王洪文（见下文）。
３０．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根据所见证据的可信度、上下文的语言分析，和当时的政治逻辑，来做推断。以青野、方雷的《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一书为例，某些内容简直难以置信，如报导邓小平于４月３日微服私访广场一事。但本文还是采纳了其中我们认为可信的材料，如该书所披露的毛远新笔记的档案。
３１．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４４页，我们推测，这两个“不便公开”的人物，当是陈锡联和纪登奎。
３２．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５３，１３５５－１３５６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４４－１４６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９１页。
３３.《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７５６页。
３４．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２３，１２５，１４４－１４６，２０７页；注９。
３５.《吴德口述》第２０６，２０８－２０９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

年》第１卷，第７０－７２，１７８－１７９，２２７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０页。与“反革命活动”相比，若把抗议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显然是指事态严重性的升级，意味着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措施。４月１日政治局处理南京事件时，尚未称之为反革命事件。至于王洪文把杭州的问题说成“反革命事件”，则是从４月７日才开始的，显然是在天安门事件已经定性之后。杭州问题可谓是这一时期中的第三樁严重的抗议事件。

３６．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６０，１７２－１７７页；《吴德口述》第２０９页；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１页。

３７．《吴德口述》第２０９－２１１页。

３８．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７８，１８０页；《吴德口述》第２０８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０页。

３９．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１－１３６３页；《吴德口述》第２０６－２１１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８０－１８３页。《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７５－１７７６页）。主席秘书张玉凤后来作证说，“（主席）病重，动不了，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根据此说，似乎毛泽东在天安门问题上了无责任，既然他当时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在我们看来，主席固然病重，却无妨他在处理天安门危机时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４０．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８４－１８７页。

４１．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４２．实际上在这些关键的几天里，华国锋也见不着毛泽东。１９７８年邓小平证实了这一点，见加赛德，《复活》，第　２０７页。按照张玉凤１９８０年的证词，江青在这几天里倒是见过毛泽东一次，可是江青和毛远新都禁止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离开中南海，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１９－２２０页。兼任御林军总管和政治局委员的汪东兴当然可以见毛。除了依赖这数人外，毛泽东的另一资讯来源，就是姚文元编的《人民日报》内参。但据说“内参”亦有欺君之嫌。见余焕春：“人民日报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载《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４４页。

４３．分歧主要集中在使用武力的程度上。江青要求使用机枪，但是华国锋，特别是王洪文和张春桥反对如此。见下述。

４４．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１５－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４页；《吴德口述》第２１２页。

４５．吴德的讲话稿是在剥夺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下达之后公开发表的（４月８日），也是这时才公开点了邓的名字，见《吴德口述》第２１４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４页。

４６．《吴德口述》第２１２－２１４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７页；李耐因，“姚文元的札记”第３８页。

４７．《吴德口述》第２１４－２１６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２７－２２８页；注２１。关于广场上的暴力程度，毛死后，彭真在审理两案时的复查中，肯定了吴德所说天安门没有死人的说法（第２９页），马齐彬的《执政四十年》（第４００页）则报导说只有３８人被捕，此前三天另有３９人被捕。总计，包括事变之后追查的人在内，共３８８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在“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便释放了。关于４月５日死人和捕人的数字更多的说法，见加赛德，《复活》，第１３２－１３３页注；鲍姆：《埋葬毛泽东》第４０２－４０３页注３０。

４８．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２页。
４９．陈锡联在危机期间的表现，不是一言可了。４日那天，他先是支持吴德暂缓移走花圈的建议，但后来却又支持江青立即清除花圈的意见。在是否动用部队镇压的问题上，他身为军人，唯当从命，但又似乎稍嫌过于积极，回应了江青派军的要求。５日晚上他在期限过后，也向吴德等人施压，要他们立即出动。见青野和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７２、１７５、１７７页。
５０.《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１７７６－１７７７页；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８２－４８４页；“张玉凤揭毛晚年秘密材料”；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７页。关于江青见主席，比较准确的时间（即４月５日傍晚），是我们根据张玉凤的证词（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２０页），分析其语境，和对照当时广场上的状况而推断出来的。张本人的记忆大约有误（张谓江青于“４月５日上午八点左右”见毛）。而其他各种材料所说的时间，不是不可信，就是不可能。
５１．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４－１３６７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２８－２３３页；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３页。根据“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一文，毛泽东批示“士气大振”前，正在看着民兵最后清场的记录片。
５２．译者按：此处英文原话为 “political dynamics”（政治动力学）。
５３．关于其他文革受益者，如指陈锡联，可见前注。此外尚有纪登奎，但青野、方雷在《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一书中则甚少提及。唯有一处说到，４月５日那天会上，纪登奎曾严厉指责邓小平“犯罪”的活动。
５４．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９７页。
５５．关于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动用军队和致命武器镇压的说法，可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１３２，１６０，１７７，１８７页。据言，１９７４年，张春桥回顾了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革命风暴”，说如果军队负责社会治安，“总有一天群众会不高兴”。《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１９８０）第三部分第１７卷第５９页。我们感谢 Elizabeth Perry（伊莉莎白·佩里）提供了这个资料。佩里即将出版的：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Worker Militias，Citizenship and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巡视革命：工人民兵，社会公民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详细论述了上海民兵的经验。
５６．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２８页。
５７．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８页；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３２－２３４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６８页。关于毛不许苏振华与会，吴德和汪东兴当时不能理解，我们迄今也难理解。虽说有人认为苏振华抵制“文革”，但他和毛的关系远久，长征路上曾负责毛的安全，又是林彪事件后第一批官复原职的老革命，而且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比谁都快。毛泽东还把整治与扩充海军的大权交给他，１９７５年也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卷第２９０、４３４页。或许毛泽东的这一安排未必意味着否定苏振华，而是这时另有军情任务在身，不便与会。
至于老革命家五一节露面以示党内团结的安排，并不说明他们在天安门事件后掌握了正式权力。７６年五一节领导人露面的排位，大体与上年国庆日雷同。不同的是缺了邓小平，华国锋如今排名第一，而王洪文也重新露面，排名第二，此因１９７５年国庆日时他被外放上海。陈锡联去年也缺席，因赴新疆之故。
５８．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４－４７５页。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刘冰通过邓小

平转的信，本在揭露清华大学领导人迟群与谢静宜。但是毛泽东则认为这是矛头对着他，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详见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５９．这一谣传，曾被西方学者误以为真，包括本文作者之一的Frederick C.Teiwes泰伟斯，见其 Leadership，Legitimacy，and Conflict in China：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领导层、合法性和中国政坛的冲突：从救星毛泽东至其接班人》一书 （Armonk：M. E. Sharpe，１９８４），p. ７５；及鲍姆，《埋葬毛泽东》，p. ３６。

６０．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５页。除了谣传所谓邓小平在保护之下去了南方之外，还有些着作说邓小平在主席逝世前后依然视事。我们认为这类说法没有根据。

６１．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２３７页。天安门危机前，究竟是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点似乎谁也闹不清楚。见上述，注９。４月７日之前，除了王洪文之外，至少还有８位政治局委员排名在华国锋之上。

６２．２月３日，华国锋出任代总理时，张春桥在日记中写到：“得志倡狂的人来得快，垮得也快”。党史界都把这段话解释为张春桥不满华国锋的明证。（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４８６页）然而细读张春桥的全话，可知他在此处指的是邓小平的倒台，与华无关。他所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当是庆祝批邓的“胜利”。此外，另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本有意辅佐新上任的华国锋。见“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２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６３．年初毛指令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军之后，陈或许仍对叶表示尊重。但叶剑英在毛死之前显然不再掌握人民解放军。此外，细察逮捕“四人帮”这段历史，亦表明尽管叶的“军师”作用甚大，陈锡联仍然是军队指挥系统中的关键人物。亦见下注。

６４．关于外交的安排，一向复杂。如华国锋初代理总理时，邓小平“仍管外事”，但实际上已难起作用。不久，毛泽东便指示外交部长乔冠华及夫人章含之，向江青汇报外交工作。但江青所抓的，大约是外交部内部的斗争与批邓反右倾运动，未必与总体的外交政策有关。见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４９页。

６５．“华国锋接见山东湖北和南京部队等领导同志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汪东兴宣传工作讲话”；《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３日。

６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卷第５３８页。毛泽东此时的批示，还有“慢慢来，不要着急”，“按过去的方针办”。这些显然也都是支持和鼓励华的意思。但根据《吴德口述》之说（第２１７页），毛远新曾在４月７日向政治局传达过主席关于“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

６７．见“华国锋接见领导同志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鲍姆，《埋葬毛泽东》第３８页；Andres Onate欧纳特，“Hua Kuo－feng and the Arrest of the ‘Gang of Four’”《华国锋和逮捕“四人帮”》，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no. ７５ （１９７８），第５５０页；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１３７４页；耿飙，《耿飙回忆录（１９４９－１９９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８页。关于华给毛的报告主要涉及批邓一事，见欧纳特根据一位元广东干部所提供的档。耿飙证实了华与毛的谈话与各省的形势有关，但未明指是批邓运动。

６８．关于毛泽东谈华国锋的情况，可参考毛死后汪东兴在华国锋讲话时的插话。见“华国锋接见领导同志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当然，汪东兴出于讨厌江

青和维护华国锋的考虑，也有可能曲解毛意。

６９．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第１卷，第４６页。

７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卷第５２７－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３－５３４页。

７１．例如，华国锋和其他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在１９７６年１月间，便遭受到了极左派的批判与攻击。他们都是在１９７５年协助邓小平贯彻整顿政策的主要副手。

７２．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５０９页；毛毛:《“文革”岁月》第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１页；加赛德，《复苏》，第１３７页。

７３．见“张玉凤揭毛晚年秘密材料”。

７４.John Gardner 加德尔,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uccession to Mao《中国政治与毛泽东的接班问题》 （London：Macmillan，１９８２），第１１２－１３页；辛子陵:《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１６－１７页。辛子陵在书中声称发现了可信的材料，谓毛泽东曾在１９７６年６月建议江青主持党的工作。引文如下：（毛泽东说）“江青今后怎样安排？我看还是抓党务。抓党务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摇摆的。这一点江青有资本，能管理好。但她和不少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和，要改。”欧纳特在《华国锋与逮捕“四人帮”》一文中（载 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no. ７５ （１９７８），第５４７－４８页），也披露了这一可疑的指示，即毛泽东指示政治局要“帮助江青扛红旗”。

７５．当然，这并不是说，靠边站的老革命没有怨言。王震对邓小平的免职便感到特别气愤。见《王震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下卷第１６７－１６９页。

７６．且举一个看重资历的实例。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逝世后，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联名向毛提议李先念任新总理，显然是李的资历最深之故。见陈东林、杜蒲：《实录》第３卷下册第１３２１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偏爱张春桥的上海地方激进派马天水，也支持李先念任总理。见“马天水的补充揭发交待”（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１日），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７７．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华国锋便急切对激进派动手。这表明了两派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一般习惯的说法都认为，是叶剑英促使了华国锋采取行动。我们则认为，解决“四人帮”问题，最主动的，却是华国锋。他在主席逝世不到４８小时之内便决意对付四人帮。参见程振声“一则重要考订——有关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两个关键时间”，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７３－７５页。

７８．见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载《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５６－５７页；“马天水的揭发交待”（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５日），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上海的领导人认为王洪文有罪，主要是涉及王的生活作风，如１９７５年下半年他在上海逗留时挥霍国家财产，未必是指他政治上的错误。

《朝霞》杂志研究

谢　泳

一、《朝霞》杂志研究状况

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本文研究的是一本文革时期的文学杂志，重新研究这本杂志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对文革时期一本文学杂志的分析和评价，深入认识中国知识份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在价值和现实处境中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清理这本文学杂志的历史时，从中发现它和中国１９７６年以后文学现状的关系，特别是在１９７６年后成名或者长期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主力作家中，许多人的文学生涯都开始于这本杂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１９７６年以后的文学源头，其实是从这本文学杂志开始的。

这本文学杂志就是广为人知的《朝霞》杂志。

目前关于《朝霞》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在众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着作中，虽然在叙述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时，会偶然提到《朝霞》，但基本是否定性评价。〔１〕这对于全面了解文革时期文学和作家活动情况，显然是不够的。王尧认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自己当年阅读《朝霞》时的情景。我自己关于文学的许多观念就萌芽在这种阅读之中，虽然我此后不断校正和抛弃'许多观念'中的种种，但其影响挥之不去。这常常提醒我：'文革'和'文革文学'曾经是我和我们成长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开了个玩笑，一个曾经是'正面'的资源终于成了'负面'。"〔２〕文革时期阅读这本杂志的人相当广泛，高华回忆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提到："在７０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都看。"〔３〕

近几年来，《朝霞》杂志常常被人提起，主要因为余秋雨的文革经历，在关于余秋雨文革经历的争论中，《朝霞》杂志依然是以负面出现的刊物。余秋雨自己都认为"《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４〕

另外一些早年曾是《朝霞》作者的作家如黄蓓佳、贾平凹、钱钢等人，也在回忆自己早年的文学经历中提到《朝霞》杂志，虽然不回避自己的文学经历，但没有正面评价这本文学杂志。许多研究者的评价，基本也是延续政治上对《朝霞》杂志的定性，很少从当时这本杂志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５〕

本文作者认为，对存在过的历史做完全简单的否定性评价，对于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并没有帮助，甚至可以误导人们对那一段历史产生先入为主的陈见，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清理《朝霞》杂志的基本历史。

二、《朝霞》杂志始末

本文所指的《朝霞》杂志，包括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丛刊和《朝霞》杂志三部分，凡参预过这三项文学工作的人（包括编辑、作者以及美术设计者如陈逸飞等），都被视为《朝霞》作者群。

“上海文艺丛刊”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７３年出版的一本丛刊。第一辑名为《朝霞》。这个名字来源于这本丛刊中史汉富一篇同名小说。

当时的体例是“丛刊名”取自丛刊中某一篇作品的篇名。从《朝霞》开始，加上随后出版的《金钟长鸣》、《珍泉》、《钢铁洪流》共四本，标明是“上海文艺丛刊”，３２开本，当时印数极高。

随后出版的另外八本丛刊，虽然延续了“丛刊名”的编辑体例，但不再标名“上海文艺丛刊”，而是标明为“《朝霞》丛刊”。也就是说，后来人们所谓的“《朝霞》丛刊”，其实包括了四本“上海文艺丛刊”。《珍泉》一书的“征稿启事”中说：〔６〕

“本刊１９７３年已出《朝霞》、《金钟长鸣》、《钢铁洪流》、《珍泉》四辑。１９７４年开始，改名为《朝霞》丛刊，仍为不定期出版，主要发表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选载）以及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等。

从１９７４年起，还将同时出版《朝霞》月刊，每月廿日出版，是综合性文艺刊物，内容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

《上海文艺丛刊》和《朝霞》丛刊，前后共出版了１３本，按先后顺序分别是

书　　名	出版时间
《朝霞》	１９７３年５月
《金钟长鸣》	１９７３年８月
《钢铁洪流》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
《珍泉》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
《青春颂》	１９７４年４月
《碧空万里》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
《战地春秋》	１９７５年３月
《序曲》	１９７５年６月
《不灭的篝火》	１９７５年８月
《闪光的工号》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
《千秋业》	１９７６年４月
《火，通红的火》	１９７６年６月

需要说明的是，从已有的材料判断，计画中的《朝霞》丛刊还有另外两本，分别是《无产者》和《铁肩谱》，据《朝霞》杂志１９７６年７月号任犊文章《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一文的注释，《无产者》将于当年九月出版（此文即是《无产者》一书的序言）。而《铁肩谱》一书，《全国总书目》中有记载，但很难见到实物。〔７〕

《朝霞》杂志１９７４年1月２０日出版，１６开本。它的出版情况是１９７４、

１９７５年完整出版，每年１２期，年终编有总目。１９７６年第９期出版后，因为政治发生变化，以后就不再出版，本年的第９期杂志，可以视为停刊，所以完整的《朝霞》杂志共有３３本。《朝霞》月刊出版后，《朝霞》丛刊还在出版，其中有些主要作品杂志和丛刊同时发表。

关于《朝霞》杂志的创办，本文作者认为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文艺工作的需要自然延伸出的一项工作，它的编辑方针和编辑实践完全服务和配合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全国在此前后创办的各种文艺杂志，编辑思想和编辑体例基本相同。

从已知的历史档和相关人士的回忆中，可以认为，《朝霞》的创办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有联系，但不能说它的出现是阴谋。从后来的历史判断，《朝霞》完全是以文艺形式配合和图解当时的政治，但杂志本身并不是阴谋集团，也不是阴谋的产物。徐景贤回忆文革经历，涉及他帮助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完成的几件事中，特别提到《朝霞》杂志创办的事，他说："在出版方面，重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图书。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编出版了《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还搞了《外国文艺摘译》等。"〔８〕

当时负责参与创办《朝霞》的施燕平晚年回忆说：〔９〕

"１９７４年，上海市决定要出一本书，开头不是书，开头叫丛书，出丛书，就是专门找一些新的工、农、兵作者，反映当前的，出一本书。当时写作组的领导，陈冀德跟萧木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把作家协会还没有完全打倒或者已经打倒了以后解放出来的，把这一批人开了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我记得有涵子、茹志娟、我，还有一个郭卓。

几个人召齐，召齐以后，当时市委写作组提出，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看现在是不是需要办一个刊物，是不是要重新议议，大家都不写了，是不是还应该写东西？我们都表示，办刊物都是很需要的，因为一个国家总要有一点刊物吧？读者也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这批人都不想搞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吃了苦头了，都不想搞了。结果呢，这个会散了以后呢，它就决定有两个人出来，要编书。一个是欧阳文彬，一个是我。两个人到出版社，不是属于出版社领导，属于市委写作组直接领导，就是编一本书，编一本丛刊。这个第一期的丛刊叫《朝霞》，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总的叫《文艺丛刊》。第一期的名字叫《朝霞》，第二期换成其他一个名字了。它是这一期上哪篇文章写得比较好的，就用这个题目作为丛刊的书名。实际上是一个刊物。

《文艺丛刊》以后出了大概靠十本，十本左右。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那个丛刊，当时只有两个人，就是我跟欧阳文彬两个人。

当时市委有个写作组，市委写作组下面有文艺组，这个文艺组大致相当于现在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文艺组的负责人叫陈冀德。

当时我们没有名义上说谁是主要负责，就是我和欧阳两个人共同负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到１９７５年开始正式办月刊，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月刊叫什么名字呢？大家想来想去，就叫《朝霞》。所以１９７５年开始，正式出了《朝霞》。出了《朝霞》以后，欧阳文彬跟我两个人，她是政治上负责，我是业务上负责。当时不叫主编，是编委。这个都是当时写作组决定的，这样子就办了《朝霞》了。

办了《朝霞》以后，到了１９７５年的１０月份，北京呢要办《人民文学》，这就插到《人民文学》了。北京要办《人民文学》呢，他们提出希望上海办《朝霞》的，

因为《朝霞》当时是‘四人帮’下面的一个直接的刊物，全国比较有影响，在这个里面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准备这个《人民文学》复刊。”

施燕平的回忆，虽然个别时间不准确，但大体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朝霞》创刊时，编者在“致读者”中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革命和生产都有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也正在蓬勃兴起。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推动创作队伍的发展，我们决定出版不定期的《上海文艺丛刊》。

现在出版的《丛刊》第一辑，以小说为主，作品绝大多数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写的，其中近半数作者还是刚开始写作的新手。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励他们拿起文艺武器，通过革命英雄形象的塑照，努力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风貌，热情歌颂毛主席路线的胜利。

《丛刊》将发表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除小说、散文、？事诗外，还准备发表话剧、电影剧本和报告文学以及文艺评论等。以后也可能出某一种文艺形式的专辑。热切希望得到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的支持。让我们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共同努力学习和实践，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争取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１０〕

《朝霞》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工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为当时的主流政治服务。《朝霞》创办前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创办了几种杂志，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摘译》等。〔１１〕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几十年后再观察，创办这些杂志比不创办要有益于社会，我们可以否定杂志的内容，但不能否定杂志存在本身，如果完全以政治关系的转换评价历史，那是不客观的。就以《朝霞》杂志的出现来观察，因为有了这本杂志，文学活动提前得以恢复，虽然文学创作本身仍然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但作为文学活动本身，《朝霞》的创办，使部分作家提前回到写作中，特别是随着大学的恢复和工农兵学员的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活动和相应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使文学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得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变态的方式展开。特别是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偏重于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选拔文学和学术精英，客观上为知识精英的上升提供了条件。

三、《朝霞》杂志作者群

《朝霞》杂志的风格，大体上延续了文革前十七年中国文学杂志的基本模式，只不过在贴近现实政治方面更为极端。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评价，这本杂志在文学本体方面提供的意义实在有限，特别是在各种艺术形式的探索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上，《朝霞》及其作品基本没有提供什么有创造意义的东西。但在培养文学青年和使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作家和学者恢复文字工作上，《朝霞》无疑还有它的作用，也就是说，因为杂志的创办，使新老作家开始恢复写作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作家能不能重操旧业和新作家能不能实现写作的理想。

在《朝霞》杂志上活跃的主要是文革前成名的工农兵作家，如胡万春、段荃法、张有德、李学鳌、仇学宝等，还有一部分在文革前就比较活跃的作家如李瑛、菡子、任大霖、孙友田等；学者方面主要有刘大杰、郭绍虞、林放、陈旭麓以及更年轻的一些作者如高义龙、陈思和、杜恂诚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朝霞》杂志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发表过署名文章，文革中最有影响的小说家浩然也没有作品在《朝霞》上发表。从这一点判断，本文作者更倾向于认为，《朝霞》杂志出现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主要原因是相对文革前期，整个社会生活有趋于恢复正常秩序的要求，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文学艺术自然会成为人们的追求。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当时政治的主导倾向是“以安定团结为好”。〔１２〕在这个倾向下，１９７５年7月前后，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时曾提到：“样板戏太少，……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１３〕几乎同时，和江青谈话时也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１４〕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电影《创业》《海霞》的批示，支持姚雪垠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以及对《鲁迅全集》的出版、《诗刊》复刊等许多批示，都比较有利于恢复文革前中国文学的格局。《朝霞》虽然创刊稍早，但大体上顺应了主流的政治要求，它后来的稳定出版也与当时的形势相关。〔１５〕

在《朝霞》创刊前后，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文学期刊在恢复，如湖南的《湘江文艺》、山西的《汾水》等。〔１６〕在这个意义，把《朝霞》及文革后期恢复和创办的各种刊物，放在常态的行政权力运作中来理解，比较符合实际。至于杂志的内容和风格，不要说文革时期，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各种刊物，大体也是同一个模式。〔１７〕《朝霞》出现后，作为文学活动，它吸引了相当多有志于文学写作的青年，从下面的统计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１９７６年后成名的部分中国作家在《朝霞》杂志发表作品情况（只统计真实姓名，笔名不算在内，如余秋雨用笔名发表的文章不做统计）：

作家姓名	篇名及体裁	发表处及时间
黄蓓佳	补　考（小说）	《朝霞》，１９７３年
陆天明	扬帆万里（三幕话剧）	《珍泉》，１９７３年
	樟树泉（四幕话剧）	《青春颂》，１９７４年
	火，通红的火（四幕话剧）	《序曲》，１９７５年
古　华	仰天湖传奇（小说）	《碧空万里》，１９７４年
叶蔚林	大草塘（小说）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8期
焦祖尧	矿山的春天（电影文学剧本）	《千秋业》，１９７６年
钱　钢	钢浇铁铸（小说）	《序曲》，１９７５年
	老首长的战友（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４年２期
	战士之歌（诗，与杨晓驯合作）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６期
	扫帚苗（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１期
	金环岛畅怀（诗，与赵宏元合作）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２期

作者	篇名	出处
	献给十年的诗篇（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６期
	指路的明灯　继续革命的动力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１期
孙绍振、刘登翰	狂飙颂歌（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期
	第一线上（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１期
袁和平	马背上的教师　（剧本）	《不灭的篝火》，１９７５年
	边塞新曲（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２期
李小雨	长征新曲（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１期
路　遥	江南春夜（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４年５期
孙　颙	长江后浪推前浪（小说）	《朝霞》月刊１９７４年６期
	老实人的故事（小说）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５期
	窗口（报告文学）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２期
贺国甫、黄荣彬	工厂的主人（剧本）	《朝霞》月刊１９７４年７期
王小鹰	花开灿烂（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４年１０期
徐　刚	涛声（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４年５期
	县委会上（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４年７期
	上海啊，你的未来——理想颂	《朝霞》月刊１９７４年１１期
	光明颂（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２期
	追乡音（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１期
	革命摇篮颂（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５期
	在历史的火车头上（散文）——献给我们伟大的党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７期
俞天白	高空的闪光（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２期
	爆竹声声（散文，与王锦园合作）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７期
	第一号档（小说，与王锦园合作）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５期
贾平凹	弹弓和南瓜的故事（儿童文学）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６期
	队委员（小说）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２期
余秋雨	记一位县委书记（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７期
罗达成	兴业路抒怀（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７期
	炮火篇（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５期
	古炮的壮歌（报告文学，吴振标合作）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２期
赵丽宏	胜利的渡口（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７期
	笛音缭绕（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０期
李　瑛	钻石及其它（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４期
	向二〇〇〇进军（诗）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１１期
刘绪源	女采购员（小说）	《朝霞》月刊１９７５年８期
	光明磊落（与蒋明德合作）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２期
	凌云篇（小说）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２期
	新生事物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６期
夏坚勇	掌印（小说）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２期
王周生	晨光从这里升起（散文）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３期
杜恂诚	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漫谈（评论）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４期
陈思和	且谈“黄绢之术”（评论）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６期
周　涛	送报的姑娘周涛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８期
陆建华	录时代风云塑一代新人（评论）	《朝霞》月刊１９７６年８期

四、简短结论

以《朝霞》杂志作者群为基本观察角度，我们可以发现，１９７６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关系的转变，《朝霞》作者群的写作方向并没有经过艰难的选择而是自然地转向了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尽管此次适应的新政治关系与原来有极大的差异。这个现象说明当时中国知识份子的知识系统和价值取向是以现实利害为唯一选择的，１９４９年以后形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基本没有培养起具有独立人格和超越功利目标的知识份子，这个特点决定了１９７６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品质和深度。

１９７６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１９８９年以前），从表面形态上观察与此前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个时期活跃的作家其实都与文革写作有密切关系，当时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语言方面只是以往写作的自然延续，发生变化的是当时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写作形态。〔１８〕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主要发生变化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和作家的评价立场，在文革写作中被否定的人物形象和事件，在１９７６年以后的写作中由负面简单转向了正面，作家的立场随着政治关系的现实利害选择自然倒向了和现实利害平衡的一面，这就是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作品何以不能令人尊敬的根本原因。因为１９７６年以后发生变化的只是表面的政治关系，直到今天，１９４９年以后形成的政治传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基本的道统没有改变，所以活跃在这个道统之下的中国知识份子，通常以适应现实利益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极少有作家能从内心产生深刻的痛苦和绝望的情绪。

我们可以从余秋雨的经历做一个简单分析。

余秋雨１９４６年出生，这个年龄决定了他的学校教育是在１９７０年前完成的。在特殊的年代里，他能在非正常的精英流动中被选拔出来，一则说明他有写作和学术才能，二则证明他是这个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好学生。因为这个教育背景是有问题的，而最能和这个教育背景相合的学生，也就是这种教育制度最理想的学生。

余秋雨是一个有写作才华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在任何时候都有对学术的渴望，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他们可以顺利走上学术道路。然而在余秋雨开始对学术生活具有强烈愿望的时候，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没有正常的学术了。对那些早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痛苦是以后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而对余秋雨这样的青年学术才俊来说，却是他们已没有可能再过真正的学者生活，和老一代学者比较起来，更痛苦的是余秋雨这一代人。他们的文革经历和他的学术经历是重叠的，在那样的时代，对一个想从事写作或者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余秋雨后来的道路是最正常的，也是那一个时代里还对学术存有愿望的人的唯一选择。

余秋雨的青年时代，对他的写作才能只有一种畸形的要求，除非一个人对写作丧失了最后一点愿望，否则他们就很难摆脱那个时代对他们的所有制约，余秋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保留了他的写作才能。在他同时代许多知识份子都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他总是在进行文字工作，从写作训练的角度说，余秋雨比他的同时代人还是先行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年写作组成员，后来多数能在文学或者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原

因。１９７６年以后，在上海新闻和出版界活跃的许多主要力量（特别是青年一代），基本是早年《朝霞》的作者如江曾培、林伟平、刘绪源、朱金晨、徐开垒、赵兰英等。

在《朝霞》时期，徐刚和钱钢是发表作品最多的两位作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两位当时在《朝霞》杂志社参预了编辑工作，但因为文革的原因，一般不愿意详细提起这一段经历。但这两位作家在１９７６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活动中，同样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直到今天也如此。

比起《学习与批判》来〔１９〕，《朝霞》作者群在１９７６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写作中更具有知名度，《学习与批判》作者群中（特别是青年一代作者）１９７６年后成为中国学术界知名学者的极少，这个事实说明文学写作相对学术研究而言，更容易发生价值和立场的简单转换，很多时候这个转换并不需要思考，观念转换比技术容易，立场转换比价值认同简单。或者说１９７６年以后的作家更多来自于《朝霞》作者，而学者却较少来自于《学习与批判》，比起《朝霞》杂志注重培养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作者来说，《学习与批判》更依赖于当时的写作组成员。

对《朝霞》杂志的研究，可以成为人们理解文革时中国知识份子生存方式的一个角度，不仅是文学，就是其他各类艺术如美术、音乐、电影甚至学术，参与其事的中国知识份子并不在少数，因为知识精英的总量在一定的时期是稳定的，任何政治集团都可能为自己的政治需求从这部分知识精英中选择自己需要的人。对中国知识份子来说，因为现实政治的压力过大，严酷的户藉制度和严密的单位制度导致个人在社会中没有任何退路，所以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中国知识份子来说，人生价值以及更为更远的理想极难成为他们人生的坚定目标，在现实利益中飘移，是他们的基本生存形态，所以用“激进”或者“保守”等西方概念来评价中国知识份子，总是稍嫌简单。

２００６年3月２１日完稿于太原

注释：

１．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１９９９年，北京。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北京。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上海。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北京。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２００５年。
２．王尧《迟到的批判》第２页，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郑州。
３．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７页。
４．余秋雨《借我一生》，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５３页。
５．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１９５６—１９７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２００６年，第４３８页。该书认为：“除《学习与批判》外，这个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自然辨证法杂志》等共八个刊物，这些刊物的编辑、审稿全由写作组一手包揽。它和“两校大批判组”南北呼应，几年里在它直接控制下发表的文章有１０００多篇，出版书籍几十种”。王家平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７８页。该书认为："文革后期《朝霞》丛刊的创办，是权力集团借助文艺形式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的主要尝试。"
６.《珍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３９６页。
７．董国和《"文革"期间出版的〈朝霞〉双刊》，《旧书信息报》第８期第７版，２００５年，石家庄。
８．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３页。
９．施燕平口述《我的工作简历》，吴俊等整理，《当代作家评论》第３期第１５０—１５１页，２００４年，渖阳。
１０.《朝霞》，上海人民出版，１９７３年，第３１９页。
１１．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０页。
１２．毛泽东当时有两个批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４０２页。
１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第４４３页。
１４．同上，第４４６页。
１５．参阅夏杏珍《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１９７５年文艺问题述论》，见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６页。张化《邓小平与１９７５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２５页。
１６．王尧《迟到的批判》一书中提到１９７６年后成名的作家中，基本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写作的如韩少功、陈建功、蒋子龙、成一、张抗抗、谌容、刘亚州、冯骥才等。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郑州。
１７．１９５７年反右刚开始，当时的《诗刊》杂志就出版了"反右派斗争特辑"，臧克家、袁水拍、田间、郭小川、沙鸥、邹荻帆、徐迟等都写了批判右派的诗歌。见《诗刊》１９５７年第１０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文艺报》１９５７年１—３８期几乎全部是反右派的文章，文艺报社，北京。
１８.参阅历届全国优秀作品获奖名单中获奖作品的题目和作者，可以说早期《朝霞》的重要作者几乎都又出现在这个名单上，无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还是话剧，无一例外。
１９.《学习与批判》杂志，１９７３年9月创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停刊，共出版３８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另外写有《〈学习与批判〉杂志研究》一文。

中国电影中的文革叙事

崔卫平

这个题目涉及中国电影中对于文化革命的理解和表述。这些理解及表述同时体现在文革时期（1966－1976）制作的那些影片中，如《春苗》、《战洪图》等。本文将视野限制在 1976 年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电影，主要是有关知青生活的那些影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战争”或权力斗争你死我活

官方宣布文革结束是 1977 年 8 月，峨眉电影制片厂制作于该年的影片《十月的风云》，表明自己的制作日期为“1977 年 9 月”，具体到某年的月份，这是很少见到的。与官方的正式宣布仅仅相差一个月。1977 年全国一共制作了 21 部影片，与文革有关的还有《希望》与《震》。

用当年的术语来讲，《十月的风云》讲述了一个与四人帮“爪牙”斗争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在毛泽东刚刚去世之后不久，人们仍然带着黑纱，年轻姑娘的胸前多了白花。某兵工厂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要赶制一批机枪部件，从北京来了一个女记者亲自督阵，工厂里不时传出零星的机枪声，它们是武器制作过程中的军事实验。刚从医院回来的老干部何凡发现这批机枪的型号早已经被淘汰，而且下达任务的途径很不正常，开始怀疑并起而反对。造反派出身的现任市委副书记马冲直接插手兵工厂，与这个厂的小爪牙一起，拟定了一份“第一批专政名单”，省委书记、老干部徐健与兵工厂何凡赫然在列，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当对方得知机枪部件的制造已经完全陷于停顿，他们的阴谋就要破产时，采用了一系列极端措施，密谋暗杀周凡，导致徐健开车的儿子牺牲，周凡轻微脑震荡。结尾是从北京来了电话通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徐健、周凡带人前往捉拿这一小撮人。对方正把机枪架在卡车上在工厂里急速行使，有人举着手枪在半空中晃动。徐健、周凡这边的队伍也是十分壮观，工厂的道路两旁站着列队的士兵，头戴钢盔，自动步枪上的刺刀发出寒光；男女民兵们整装肃立，不仅肩挎着枪，腰上的帆布子弹带也装得鼓鼓的。

这个故事所传达的信息十分丰富：第一、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战争，对峙的双方都处于战争状态，尽管没有大规模的正面战场，对抗被限制在某个小范围之内，但冲突属于你死我活的战争性质.不仅丝毫没有调和的余地，而且要从肉体上将对方消灭、制服或者隔离.影片中机枪、步枪、手枪、刺刀一起出动的场面，在审查制度十分严格的情况下，是被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可和鼓励的。从战争的角度理解社会中不同力量的对抗，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夺权”。这场“夺权”是从北京方面的高层开始的，影片中女记者是中央“王副主席”派来的，她执行的是来自这个高层“搞第二武装”的指令，那批机枪是为了配合夺权用来武装“民兵”的。与高层的夺权相配合，必然有不同层次的夺权活动。“联络站”的特派员对马冲明确“交底”：“全省夺权先从你们

西山市开刀。打他个回马枪，让他们措手不及。”“不抓班子，不坑掉这些大儒、小儒，是不行的。”志在攫取权力，这一点早已经被人识破。徐健的夫人理解丈夫的恶劣处境时说，“还不是那帮人要夺权？”她无可置疑的口气同时表明，“夺权”在她的理解中，是恶中之恶，是万恶中的首恶。

更能够说明这种战争性质的，是影片中全套的战争语言。这在冲突双方是高度一致的——反方：“用谁、斗谁、抓谁、杀谁，这个工作量太大啊。”

“何凡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造反派与走资派血战到底。如果让民主派、走资派上台，就是人头落地。”

“这次如果不成功，咱们就要上断头台啊。”

“首长什么指示？”“同意干掉，要策略点.”

正方：“真卑鄙，他们要下手啦。”

“咱们走，离开这儿，回太行山去。”

“战场就在这里.作为一个战士，祇要还有一口气，决不能离开战斗岗位。”“你不说，我也明白。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我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放下武器!”

运用战争的眼光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立场来描述当时社会矛盾和冲突，在 1977、1978 乃至 1979 年的影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从人数上来说，这场战争是不成比例的，“反方”祇有极少数几个人，但是他们却极有能量，不仅因为他们掌握着实权，而且在于他们与上层的要害人物有着紧密联系.同样制作于 1977 年的影片《希望》，故事发生在北方地区一个偏僻的海滨油田，但是其中的“反方”代表宫连才却时常被上面来的“联络员”找去谈话，于是他深得秘传：“整顿就是复辟”、“在权的问题上，不必谦虚，就是要夺.像打篮球一样，上场就要抢。”而要夺权，必然与“搞乱”联系在一起：“首先要搞乱，把他们的规章制度搞臭”。除了挑拨工人对于规章制度的不满，搞乱的做法还包括阻挠海边四口油井的开发，倒卖原油、弄假帐等等。斗争到了紧急关头，宫连才想出的阴谋破坏是：“要是井上如果能够起一把大火，那多好啊。油罐爆炸，那就等于原子弹了。”将这个油田“夺权”的斗争与投放“原子弹”联系起来，想像它具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规模，让人感到咋舌。当然，当火苗四起时，革命群众及时赶到，保住了井场与革命果实。其中有两个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前辈是这样对话的：“前些年我总觉得仗打完了，不对啊。”（宁奶奶，她曾经收养了革命烈士子女）“我们是老了，但还能闻出火药味啊”（萧一强）。

将破坏生产、阻挠科研作为“夺权”的主要途径，是这个期间涉及文革电影的主要对抗，影片中的“反方”总是不惜一切手段，从事身边的某一桩破坏，尽可能实现

天下大乱：有扣押地震警报的（《震》1977），有扣押油轮并绑架夫人的（《不平静的日子》1978）、有企图通过秘密手术令人永久丧失记忆的（失去记忆的人》1978），有点燃油罐车以制造爆炸的（《严峻的历程》1978）、有非法关押并企图烧死工程总指挥的（《峥嵘岁月》1979）等。如果仅仅从这些电影来了解当时中国，会以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地下抵抗运动，这些“不拿枪的敌人”如同“拿枪的敌人”一样，甚至还更有威胁.影片中“反方”的出场与表现与过去电影中的敌人如出一辙，这些人总是在缺少光线的地方交头接耳，神情邪恶，讳莫如深或自以为得计，他们的饭桌上往往都有吃不完的丰盛食物，酒肉齐全，烟雾缭绕，个别人脾气很怀，拍桌子、摔板凳，互相扇耳光。这类与四人帮爪牙斗争的影片中比较上乘的是《泪痕》（1979），李仁堂主演，著名女谢芳在文革后第一次出场，装扮成一个疯子，她的丈夫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影片的结尾“反方”（县办公室主任张伟）拔出手枪，终因罪行败露，以开枪自杀告终.该片获 1979 年文化部优秀电影奖。

这批影片还有这样一些共同的重要特点：正面主人公必然是一位老干部，“靠边站”若干年之后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他所执行的是周恩来在 1975 年四届人大制定的路线.而向他发动“夺权”进攻的人，其矛头从根本上说针对周恩来的，他们在北京的主子视周恩来为自己夺权道路上的障碍，于是“周恩来”的名字经常被提起，“保卫周总理”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向讳莫如深的中共高层权力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未有过地在电影中直接得到呈现，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1978 年戏剧舞台上有两场重要的话剧《于无声处》（1979）以及《丹心谱》（1980），后来都被转拍成电影。这两部作品更是围绕着周恩来与四届人大进行。《于无声处》影片一开始，大街上驶过一辆满载着工人民兵的卡车，车上人人手持梭标，头戴柳条帽，气氛紧张。继而是一对母子流落街头，母亲梅是当年上海地下党老干部，儿子欧阳因编天安门诗抄被追捕。当他们来到老战友的客厅，并不知道老战友本人已经卖身投靠。母亲被查出患有肝癌，儿子成为全国通缉的现行反革命，而负责抓捕儿子的，正是这家人的女儿小芸，她多年来爱着欧阳。小芸的父亲为了保官升官出卖了客人。前来抓捕欧阳的便衣们三三两两，穿着胶皮雨衣在雨地里徘徊等待。儿子离开前，母亲交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是重要的揭发材料及数额不小的党费.儿子问妈妈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妈妈坦诚是从生活费中一点点抠出来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用自己的生命交党费.”儿子不放心她的身体，她回答：“说不定，哪一天我还要回部队打仗呢。”母子俩分享着同样的关于战争的想像，将眼下的斗争看作是昨日的斗争的延续，儿子声称：“当初参加革命，是提着脑袋，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有这个决心吗？”“为了保卫老一辈打下的革命江山，保卫毛主席，保卫周总理，我愿意一滴滴撒尽全身热血。”

这批文革刚刚结束时所拍摄的影片，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其中的思维逻辑与当年文革如出一辙，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保留了当时人们关于文革的鲜活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夺权”的斗争，是战争的延续和它的一种形式，必然伴随着流血和“人头落地”。这符合 1938 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但是人们并没有守住政治是不流血的这个界限。

某种对抗接近战争还在于，当北京传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反方”就像经不起阳光的“鬼魅”一样，顿时原形毕露或者泄了气，作为少数人他们是与一个更大的看不见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是战争，此类电影缺少一个《纽伦堡审判》。

“入侵”和“被占领”

影片中出现 1966 年那些文革的场面，比人们想像得要晚。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文革重新作出评价，还要等到人们写出剧本、再加上一个拍摄周期，这就到了 1980 年。

《巴山夜雨》（1980）肯定是最早涉及 1966 年文革场面的电影之一。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是七十年代，在一艘从重庆沿江而下的轮船上，现行反革命分子诗人秋石被押送往某地，与他同舱的还有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为抵债被迫出嫁的女孩、中学女老师、儿子武斗致死的河南大娘等人。终于，年轻人有机会与被押送者单独说话，向他道出“那年我曾经抄过你们的家。”于是秋石陷入回忆之中。随着打碎玻璃的声音先出现，镜头闪回，诗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一把木棍狠狠砸在书桌玻璃板上，玻璃板被击碎。在书桌的右上角，站着一尊维纳斯石膏像，木棒接着打在它上面，石膏像应声碎裂，碎片洒落一地。石膏碎片与丢弃在地上的书籍混合在一起，有人匆匆在它们上面走来走去，毫无知觉地践踏着地面上的书籍。光线晦暗，一些有力晃动着的骼臂，红袖章闪来闪去，看不见人脸。又有人拿起一本书翻开，用力撕去其中几页。接著书架倒塌，书架上的书籍朝着观众倒落下来。诗人在自己家看到了这一切，气愤无奈的表情。跟随他的视线，玻璃板被打碎的书桌抽屉被打开，一摞诗稿赫然暴露。年轻人的转过来身来的面孔，诗稿躺在抽屉里，他发现了它们。

不妨做一个这样的假设：若干年之后，有关文革的书面资料不幸全部消失，人们衹能从这些电影画面上来理解文革，那么从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最有可能的是——这是一场“入侵者的入侵行为”。一些带着“红袖章”的人们如同“天兵天将”，一觉醒来之后来到了这个地方，冲进别人的家里随意翻腾，砸碎和拿走东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他们。在整个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房屋主人与“入侵者”互相之间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他们语言不通，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同样，在《带手铐的旅客》（1980，反特类型片）中，进入文革也是“哐当”一声，一只镜框被扔到了地上，镜框中的照片几位是在解放战争中的年轻战士，头上带着杨柳树叶做的伪装.接下来镜头才摇向在屋里转来转去的人们，他们工人模样，带着“红色造反派”袖章，于房间的各个角落四处搜寻，翻开一本杂志，看看里面有没有藏匿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期间也是没有对话，“入侵军”身体的语言就是他们的言语.当然，入侵者的权威首先是在大街上建立起来的。在大街上，这支军队是无限喧闹的，当他们突然出现时，外表上非常突出，与众不同：旧军装和军帽、腰扎皮带、肩戴臂章、脚穿胶底鞋，一般至少是一个小分队，学生与工人不等，行色匆匆，神情严肃，在批斗会上则近乎残忍。在高音喇叭、宣传卡车的配合下，他们大声喊叫，七嘴八舌传达的是仿佛同一个意思，无法将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区别开来。即使有某个声音盖过了其他人，语气十分紧迫，那一般是经过喇叭的扩音，并不出现具体的人脸，比如：“（女高音）紧急呼吁，紧急呼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是洛西市红色造反兵团，昨天 12 点 45 分，受到了一群暴徒的袭击……”此后声音的被大街上人头攒动的喧闹所淹没，画面上是一辆满载着工人的卡车经过，人人头戴柳条帽，卡车上大幅写着标语“文功武卫”。（《带手铐的旅客》）如果仅仅是喊叫并不能称之为语言，那么，这些人基本上是不会和不能说话的。而被置于这种喊叫的威胁之下的人们，则更加不能开口。

后人也许要问，这些“入侵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原先躲在哪里，是什么

样的人们？他们手中的武器（以及所操弄的语言逻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得而知。“文革爆发”了，就像“战争爆发”了或者“鬼子来了”一样。文革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断裂而出现的，文革之前的社会及生活与文革开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缝.《元帅之死》（1980）是一部反映上层领导人物在文革中不幸遭遇的影片，某种断裂显得越发尖锐.影片开始部分有两个在“胡子伯伯”关怀下长大的年轻人在相爱，当他们暂时分开时，年轻人沉浸在无限幸福的回忆之中，他深情地自言自语：“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来接你。”画面是一大群在阳光下飞翔的鸟儿，它们自由自在，像鱼群一样在光亮之中激情地涌动翻滚.接下来“不由分说”是这样一组有关文革的镜头，其间没有丝毫过渡。

镜头之一：两扇被砸碎的窗户，那上面有不规则的大窟窿。在破碎的窗户旁边，有人从楼上往下拉大幅标语“造反有理”。

镜头之二：几个人将绳子套在一只大石狮子上面，企图要把它拽倒。

镜头之三：地上一堆燃烧的火，有东西正在葬身火苗。火堆旁边一些人在围观.镜头之四：石狮子被拖倒在地。

镜头之五：大字报栏上新刷的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条标语的左侧，有人在看花花绿绿的大字报。

这些纷至沓来的画面没有现场的原声，唯一的声源是高音喇叭里传来的“拿起笔，做刀枪”那首歌。比较起来，反映下层人们生活的影片《如意》（1982）中文革开始的处理，则稍有不同，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比较别致。李仁堂（他几乎囊括了这个时期的所有重要影片的主角，2002 年去世）于其中扮演了一个学校的清洁工，还是个劳模。当他与前清格格结婚的要求被忽视和冷落，影片中出现了长长一组主要是空镜头，表达了不同凡响的时期的降临.镜头之一：雪地中的院落。

镜头之二：蓝黑色乌云的天空。

镜头之三：白塔和长满杂草的旧城墙。

镜头之四：李仁堂看着一无所有的天空，若有所思。清脆鸟叫的声音。

镜头之五：空无一人的校园.镜头之六：空寂无人的教堂正面。

镜头之七：挂在树上的学校的大钟，无人问津。

镜头之八：琉璃瓦建筑上的一只祇辟邪。雷声、风吹铜铃发出声响。

镜头之九：宫灯状的老式路灯。空无一人的教堂内部。

镜头之十：风吹动树叶、树枝，它们在风中摇晃。雷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

镜头之十一：远处是白塔，近处的旧城墙上，几只鸽子在觅食。一只野猫穿过，发出嗖嗖的声音。（镜头移动）一只院落中晒在外面的床单、衣服在风中飘荡。雷声越来越紧.镜头之十二：雨打在外墙上。（镜头摇近）学校大门迎面的照壁上，红颜色书写的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它也已经被雨冲刷过.至此，关于文革爆发的一段叙事结束。这个过程从头到尾，除了一些代表不安的自然声响，没有一点人声，安静得让人蹊跷，让人觉得要出事了。应该说它们都是主观镜头，是从李仁堂扮演的老清洁工的眼睛看过去和留下记忆的世界，它们体现了这位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工人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的迷惑不解和拒绝，他的落寞、惆怅与痛惜。那些没有声音的画面，隔开了他与这个社会，隔开了他与周围的冲突纷争。从此之后，对他来说以及对别人来说是一样，这个世界分为两半，他本人及与他熟悉的一些人们在这一半，而另一半在他的视野之外，是令他十分为难和感到疏异的。不管情愿与否，新划分的世界秩序由另外一半的人们所颁发和建立。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给人印象深刻的《小街》（1981），可以说是一部描写“被占领地区”生活的影片。由郭凯敏扮演的汽车修理工夏于无所事事的闲逛当中，倚着一扇半闭的木门，未料竟把门打开，人也就势摔倒。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惊恐未定的面孔（张瑜扮演），“他”手上的鸡蛋全被打碎。显然对于“他”来说，在自家门口，已经见到过不同的“闯入者”。“他”一边往后退缩，一边语气急切地对来者说“快走吧，我妈妈生病，她怕见生人。我求你快走吧。” 夏答应一定要陪“他”鸡蛋，离开时一肚子困惑：“为什么这样害怕？”一个星期后夏外出试车回来，带上 20 只鸡蛋前往赔偿时，看见“他”提个篮子在附近一个院子里为妈妈采草药。两个年轻人隔着铁栅栏尝试交流，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仿佛处于两重天地当中，更加突出“他”的生活是不自由的和被管制的。突然，恐怖的音乐声起，远处过来两个戴袖章的人，“他”像飞燕一样迅速翻过栅栏，逃命一样飞奔，夏在后面紧跟，接着得知“他”的“妈妈是音乐学院教授，现在成了黑帮分子，上医院都得写申请，还有人押送。”

夏决定帮助“他”。他们一同开车去郊区采药，祇是在暂时离开了这座“被入侵”的城市的时候，这对年轻人才舒心痛快，绽开欢快的笑容。他们做着儿时的游戏，将山芋切成高脚小酒杯，两人一起比赛翻跟头，结果翻到河里，暴露了“他”原来是一个女孩。她的头发在大街上是被强行剪掉的，手持剪刀的红卫兵不容分说地剪掉了她的秀发，并蛮横地将她推倒在地，她祇有无力地哭泣。夏下决心帮她找到一只辫子，还她女儿装束。结果是偷了一个样板戏的头套，遭到毒打，有人用皮带抽中他的眼睛，继而用脚践踏，夏的眼睛严重受损，渐渐双目失明。影片中的那些小巷几乎都是空无一人的。祇有大小不一的标语，表明这是一个有人出没其中但被占领的城市。

如果说这是一个“被驱逐”的人们的生活，那么《小巷名流》（1985）则是一个“被劫持”的人们的故事。这条小巷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传说当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井边当楼卖酒。如今的“名流”，除了这二位的后代司马寿仙与卓春玉，还有一位贩夫走卒之辈牛三。他们三人走到一起，是因为一同进学习班“同学”一场。当学习班的其他成员或者因为“被宽大回家”、或者“升级进了班房”或者“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了上帝”，他们三人被编为一个小组，继续“隔离”接受审查，不得回家。司马寿仙是开花圈店的，他店里的花圈挽联一概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检讨自己的“活思想”是：“心里总想着‘文功武卫’，多卖几个花圈”；卓女士曾经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如今开了一家旧衣服店，因不从造反司令的求婚，不得

过关；牛三则因为酗酒宰狗，扰乱社会秩序。卓女士被逼交代她与多少男人发生关系，“他们的政治面貌如何”，她一度想不开欲自杀，幸得其他二位相救相劝。司马想出的主意是不管多少先承认下来，于是胡编乱造，将县革委会副主任也算了进去。副主任查问下来，造反司令被撤职，三人得救。这部影片带有喜剧和戏谑的意思，但是戏谑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个人所采取的态度上，而非环境中的严酷。影片交代文革是从武斗队伍在街上示威游行开始，十分触目。走在前面是队列整齐的“步兵”，后面是三轮卡车上的“机械部队”，人们持枪（自动步枪）戴帽（柳条帽），斜挎子弹带，卡车边上站着两位的舞着手枪，前后共同一致呼喊的口号是：“还我战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故事的结局是卓女士的女儿进了样板戏团，但是当天就被“他们”强奸了。“他们”是这批电影中经常见到的一个词，衹要称对方为“他们”，便不需要追问到底是谁干下的事情，仿佛对方是许多个体附在一起的妖魔整体.用“伤痕电影”来称呼此类作品，并不是十分准确.“伤痕”涉及在“内心”或者“精神上”留下来的踪迹，涉及内心发生的变化、变动，是因为前面有了什么事情，内心获得了什么样的可怕经验，继而据此又做出什么。比如拍摄于 1994 年的俄罗斯电影《毒太阳》（又译《烈日灼身》），讲述了一个旧俄贵族青年如何一步步将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故事。当新政权、新秩序建立，他唯一的出路是离开祖国和心爱的姑娘，去巴黎以钢琴师为掩护出卖流亡在外的本阶级成员，为此内心陷入彻底黑暗。若干年后他精心炮制了一个报复计划，借 30 年代大清洗，他将送他踏上魔鬼道路的红军将领诬陷进了牢房，而全然不顾此举如何波及他的无辜家庭，主妇正是当年他深爱的姑娘，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她们同时受株连咣当入狱.在“了结”旧日恩怨之后，这个人也因此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割腕自杀。他灵魂的道路上一度降临的黑暗，使得他陷入永久的黑暗之中。再比如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上演的匈牙利影片《靡菲斯特》，讲述的是三十年代德国一位著名话剧演员因为不甘寂寞，一步步陷入与纳粹的合作的泥潭，这其中他并非没有意识，但是他的野心及虚荣心使得他无法停止下来，这是一个灵魂无法拒绝诱惑因而受囚禁的故事。

但是我们在这个单元里谈论的中国电影，并不是内心劫难的故事，它们主要表现的是人们在被占领情况下的屈辱，在被剥夺情况下的幽怨和怨愤。观众见到更多的是占领军如何为所欲为，如何以各种不可思议的名义，将人们加以隔离和监禁，将无辜的人们置于他们无处不在的威胁之下。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却没有得到恰当呈现：所有那些受害者否一定都是从一开始的不合作者？他们是否也曾经一同分享过那种仿佛从天而降的异族语言？是否也有过那么一刻想要参加“他们”的组织？受害的人们此前是否也认识那些迫害者？与他们一同吃过饭、打过招呼？在世界没有像现在这样划分之前，是否也有过一些另外的划分，而那同样是不公正的？甚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受害者当中的一员，最终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成了迫害者？或者反过来，迫害者成了受害者？因为毕竟不是外来民族的“入侵”行为，而是从身边的事情、身边的人们开始的。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稍前的那些影片（1977－1979），不管怎么说，是提供了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某种理解的，哪怕理解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观看这批影片，总体来说仿佛事情都在自己之外发生，是“他人的战争”、“他人的罪行”、“他人的恶”，是黑格尔说的“纯粹的恶”，在这种恶面前，所有智性的活动一概休止。一场触及每一个人的革命，因而成为完全不可理解的。

延展的理解

所谓“延展的理解”，是指不是择其一端，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受害者与迫害者，而是取得一个深入、内在的眼光，跟随事情的进展，做一些移步的理解。具有这样理解的影片为数少而又少。

郑义的小说《枫》发表在 1979 年 2 月《文汇报》上，后来由他本人担任编剧，80 年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这是唯一一部从红卫兵本身的视角完成的文革叙事，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理解文革的内在眼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影片不可取代的意义越发突出。因为出自当年投身文革的红卫兵之手，它有着一个与纪录片相对应的叙事结构，难能可贵地就近观察记录了红卫兵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那些举动，完整地保留了红卫兵初期文革的心路历程，富有层次展现了向往美好生活、拥有正常感情的年轻人，他们如何从互相爱慕到互相仇视、从满怀深情到十分冷酷、从天真纯洁到“双手沾满了鲜血”，从“为了明天”出发，却一步步走向昨天，走向“战争”的深渊.后来的人们尽可以对其中的提法做法作出自己的分析，但起码这是一份基本的原始材料，十分具有说服力。

首先，这部影片进入文革的切入点与其他所有影片不一样，它把起点放在当时报纸杂志上一系列重磅文章上面，以特写镜头推出的这些版面，正是文革的动员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学术研究》）、《评“三家村”——燕山夜话》、《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到反革命黑帮》（《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社论）。先是有了这些，然后才有广场接见、众人山呼万岁等。这显然是一个“过来人”的叙述视角，它体现了某种承认与承担的立场。

如果说吃狼奶，这些在战争结束之后出生、49 年之后识字念小学长大的一代，比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所吃进的狼奶要多，“吃水”要深。他们就像是新生政权的头生子，作为前排的长子长女，他们不仅意味着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分享这个政权的想像力、它的全部话语、合法性论证.祇有他们才有资格这样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卢丹枫）革命或“指点江山”是需要力量的，而较为年幼的弟妹们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出所需要的力气。除了书本上课本上，这批年轻人重要的思想来源还应该包括当时的革命电影，正是那些所谓战争、历史题材的影片，从道德、情感、想像力方面帮助完成了新政权的全部论证，缝合了从革命到日常生活的间隙。——斗争是残酷的，流血是难免的，牺牲是光荣的，观看这些影片长大的年轻人，十分容易期待把生活当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而自己能够成为这部电影的主人公：“让我们接受暴风雨的考验吧！”（卢丹枫）这样的表述要多“文艺腔”有多“文艺腔”，但是这正是那些以革命文艺为奶娘的年轻人的实际状况。研究红色电影与这批年轻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紧接着广场接见，分裂产生了。在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一对恋人已经无法坐在一起。李红刚所在的“红旗兵团”是夺权派，卢丹枫所在的“井冈山”，旗帜鲜明地认为“你们是被走资派操纵，是假夺权”。比在“在路线斗争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更加重要的，是这两派分别接受过文革首长江青同志的接见，分别受到伟大旗手的鼓励和支持，得到承认自己的“大方向”都是正确的。笔者目前无法就中央首长接见不同的群众组织，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全国动乱作出评论，但是有一点是显然的：即使不是因为中央首长的接见，“权力”这个东西肯定也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誓不两立，导致人们之间不可调和的深刻对立。而当“权力”被披上了“正义”、“革命”的色彩之后，更加成为不可让度和不可让步的。最终的胜利是要通过掌权来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不可能成功。不是因为缺少沟通的技巧，而是因为双方对于权力是什么、什么才是它的合法性一无所知。

卢丹枫所在的“井冈山”集结了“八个县的兵力”准备向红旗兵团发动“总攻”。而作为另一方“作战部长”的李红刚，他此时尤其需要证明自己如何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证明自己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心地是纯正的。悲剧变得无法避免，战斗完全像是从前电影里发生的一样：防御工事、炸药包、机枪、手榴弹、信号弹，火光冲天，房屋坍塌，人员伤亡。这部影片在剧作上安排得合情合理还有两条：一、促使卢丹枫拿起机枪朝向恋人的队伍猛烈扫射过去，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身边战友的倒下，尤其是一同外出执行任务的十来岁男孩小兔子的被枪杀，夺走了卢丹枫的理智；二、即使在战斗中，一对恋人也没有完全忘记对方，从本意上他们从没有想过要杀害对方个人，祇恨对方站错了路线.这一点，比起用个人私利、个人恩怨去解释文革事件的一些其他影片，显得更加真实可贵.“人在阵地在，至死不投降”，像在《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电影中所发生的那样，卢丹枫以跳楼的刚烈举动，完成了她对于心目中理想的祭献.两年以后，有人诬陷李红刚拿枪逼卢丹枫跳楼，李红刚被镇压。

今天观看这部影片，所引起的感受是复杂难言的。从电影方面来说，其制作水准并不高，不仅是人物的对话和行为，在影像方面也同样是“文艺腔”十足，从灯光到构图的任何一个设计，都是按照某个现成的概念或者结论，其含义都是被规定和阐释好了的。据说郑义本人对影片也比较不满，但是由虚假的影像所讲述的故事却是惊人的真实。同时还必须说一句，这种惊人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某个“模仿”：这些年轻人他们越模仿，对于他们本身来说就越真实。曾经是“真实的战争”已经演变为“有关战争的想像”。

影片《芙蓉镇》（1986）分为上、下两集，下集从 1966 年开始。就表达文革本身来说，这部影片大体上没有超出“坏人作恶、好人蒙难”的套路，尤其是“好人”的表现总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无辜被动地接受了一场与己无关的劫难.但是这部影片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从 1964 年“四清”开始的，某种紧张的气氛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当四清工作组进驻芙蓉镇，半人多高的大标语同时糊上了小镇的街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这部影片中，“四清运动”很像是文化革命的预演，祇是矛头稍有不同，它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但是弄得人人自危以及斗争的残酷性，就像是一个小文革，这是为许多人所不知道的。工作组长李国香算出开米豆腐店胡玉音夫妇的收入不亚于一个“省级干部”，由此对她的周围展开一系列调查：粮店经理谷燕山卖过一万多斤碎米给胡，于是他被认为与胡玉音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镇党支部书记黎满庚被迫交出胡玉音托他保管的 1200 元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良心；胡玉音本人不得不躲藏外地一个多月，回来时得知年轻的丈夫桂桂已经被逼身亡，他们家新盖的大房子也被没收。往前追溯，这部影片涉及“运动”的起点甚至更早，湘西的这个小小芙蓉镇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所继承的，是原县文化馆馆长、下放右派“秦癫子”。

这位李国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她原是国营食品点售货员，经过“四清运动”之后，她当上了县委常委、公社书记。在文革前期，她同样作为当权派被揪了出来，当街游行示众，与“五类分子”胡玉音、“秦癫子”一道，这是她决不情愿的，她本人得遭难并没有激发她对别人的同情。时间不长，她就被结合进文革领导班

子，重新当上了县委常委，公社革委会主任，坐着吉普车来到了芙蓉镇。这一笔有点狠，揭示了有人始终是“不倒翁”，一直处于“整人”的位置上。文革结束之后，她碰巧遇到劳改释放回来的“秦癫子”，此时她的“坐骑”已经改为一辆黑色轿车，正在准备赶往省城结婚，依然是“一马当先”的派头.这个角色的刻画不好的一面在于，她除了是满口阶级斗争词汇的极左女人，还是一个用当年的话来说是“作风不正派”的女人，暗示她之所以往上爬是因为作风问题，这就很落俗套了。假如她是恰恰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女性呢？

《蓝风筝》（1991）把某种触角伸得更长.这部影片追随女主角陈树娟前后嫁了三个丈夫的故事，以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新中国社会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初期的颠簸道路，一些普通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经受的风风雨雨。影片中胡同口第一次出现由公家打出的横幅是“改造私营商业”，第一次宣读的《人民日报》社论是“进一步做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街坊蓝太太在将自家的铺子交出去之后，仍然感到困惑和担心的是为什么她们家的成分永远也改变不了。小小四合院第一次组织起来的学习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表明日期是 1957 年 4 月 27 日，第一次出现的大喇叭声音是“整风运动”转向，宣布“有人借提意见向党发动攻击”，接着出现了第一次批斗会（批斗对象是学美术的学生陈树岩），第一次语气激烈、花花绿绿大字报是关于反右斗争。继而这个家庭一系列灾难就降临了。女主人公陈树娟的丈夫少龙因为开会时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所有人看他的眼光便有了异样，几分钟之内他被打成“右派”，不久去农场劳改，不到一年死在那里；学美术的弟弟树岩被发配去了遥远的农村；当空军大哥目睹了部队宣布清理人员名单时，有人当场拔枪自杀，浓浓的鲜血淌了一地；大哥的女朋友、部队文工团的“尖子”因为不喜欢陪首长跳舞，转业到了一家工厂在车间干活，后来以“反革命分子”批捕，她自己一直搞不清楚到底犯了哪一条.实际上，这个家庭诸多兄弟姐妹，在经历了反右之后，即男女老少拿铜锣到胡同口轰麻雀之前，各自的命运大致定型。树娟的第二任丈夫李国栋死于营养不良。文革前夕她嫁了第三任丈夫，他是一个住小楼的高级干部，风暴来临时他知道自己躲不过，烧毁有关文件之后，拿出存摺叫树娟娘儿俩离开他，不久在批斗中死去。树娟回来看望他，也被当作造反派团团围住揪着头发，年幼的儿子被推倒在地。

文革在这部影片中衹占了大约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但是从前面所有积累起来的内容来看，文革就便得不难理解和能够理解了。这部影片以一种此前电影少有的冷峻口吻讲述这些不幸故事，尽量把它们弄得平淡，如同在岁月中被打磨过的样子，在涉及历史运动的那些方面，基本上是中规中距的。不足的是，也许过于追求一种不动声色的态度，因而忽略了所有的磨难在人物内心留下的痕迹，吕丽萍扮演的女主角通情达理有余，内心咀嚼不够，看不出来所有这些磨难如何沉淀到她的性格或者精神气质中去，形成她看待世事人生的某种眼光。贯穿影片始终的那个童声，给沉重的历史无端添了一道不相称的稚气，以童心与历史对峙，以单纯驱散历史的浑浊，也是一种“文艺腔”。该影片从来没有在国内上演过，因为有香港和日本资金投入，曾经以日本影片的名义参加东京电影节，中国代表团为此退出该电影节，并在国内遭到全面封杀。该片获第六届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

与《蓝风筝》一样，《霸王别姬》（1993）也是以编年史的眼光，延伸到了文革时期。与所有其他影片不一样的是，这部影片作为切入点的，是“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画外

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表明这种灵魂革命的，是多年相濡以沫的人们之间互相揭发.在熊熊燃烧的火光面前，段小楼开始不顾一切地揭发虞姬程蝶衣，暗示程与大戏阀袁世卿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而他们从小一起学戏受苦，“成角”之后是扮演霸王和虞姬的多年搭档，而且后者始终深爱着前者；这给程蝶衣带来重创和巨大刺激，他继而失去理智地痛骂段小楼的妻子菊仙，把他对师兄多年的爱转变为对于这个女人的仇恨，导致菊仙自杀。而为什么要这么做，此前是有过铺垫的：最早段小楼受审，审问者为曾经是程蝶衣的徒弟小四，小四捏着段的妻子菊仙曾经是妓女这个疼处。但比这个更加刺激的，是从前戏园子老板那爷在一旁揭发段小楼，说他在解放军进城时说过不合适的话，这个举动暗示当前的现实是——不是革他人的命，就是被他人革命。因此，在这部影片中，“战争”不仅发生在大街上，尤其在心灵深处；不仅在批斗会上，而且在血肉相联的人们之间：“敌人”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早就睡在身边（小四也是被这些师兄们“捂大的”)，亲人反目，朋友成仇，这样的表述比较深刻地触及了文革的“精神面貌”，揭示了它的内在伤害。此前的影片中偶尔有过受蒙蔽的造反派经过一系列事件终于觉悟，如《巴山夜雨》中张瑜扮演的押送者、女造反派，《苦难的心》中那个马虎出事被坏人利用的护士，但是一个正常的人（好人）如何转变成一个面目狰狞的人，衹是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与《芙蓉镇》一样不能免俗的是，造反派小四是作为有着比较明显的个人道德、人格缺陷的人来表现的，他之所以要整掉师父程蝶衣，是出于想替代他的个人名利野心；同样，程蝶衣为什么要揭发菊仙，也是身为同性恋的他视这个女性为自己与师兄段小楼之间的障碍，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文革根置于一些个人原因乃至性的原因之中，是对于这场“革命”的严重缩减。不管是段小楼、程蝶衣还是菊仙，包括小四在内，他们对于革命话语始终一窍不通，他们始终既没有进入也没有弄懂革命词汇的含义，而衹是耿耿于怀于从前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在时代的剧烈变动面前，他们仿佛从来是无辜的（innocent)，这仍然取了一个比较外在的、旁观者的立场。

消解、时尚以及怀旧

1981 年由白桦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遭到公开批判，依据该剧本拍成的影片《太阳与人》（长春电影制片厂）被禁止，令人们触到了某个界限，本来雄心勃勃进行着的反思历史的脚步受挫，继而放慢。1983 年“反精神污染”，1984 年、1985 年分别衹有一部影片与文革有关（《爬满青藤的小屋》（1984）《小巷风流》（1985）。1986 年“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该年有一部影片涉及了文革，这便是由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残照》，农村题材的。同样，1987 年也衹有一部影片涉及了文革，而且衹是象征性地加以暗示，即黄蜀芹导演《人。鬼。情》，其中文革这一段主人公秋芸站在凳子上，一只手抓了一把红色油彩，另一只手抓了一把黑色油彩，在一个狭窄的小屋子里，站在椅子上尖锐地喊叫，将痛苦的身影投在灰暗的墙壁上。1988 年全年一共拍摄了 153 部影片，如果不算知青题材的《棋王》，那么可以说没有一部是与文革有关的，至少可以说没有一部影片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有关.1989 年有一部类型片《《黑楼孤魂》涉及了文革，但那完全不是反思性的，那段历史仅仅是其中的商业元素（恐怖)。90 年代之后，涉及文革的影片变得寥寥无几，已经不能期待一年中起码有一部与文革有关的影片出世。发生变化的不仅在数目上，而且对于文革的态度、立场也明显不同。总体上来说，反思的因素明显减弱，甚至荡然无存。

紧接着田壮壮、陈凯歌之后，张艺谋执导了影片《活着》（1994 年)，一般人们习

惯将这三部影片相提并论，但其实它们的志趣各异。在有关文革的叙事方面，比较起来，《蓝风筝》更宁愿采用历史的眼光，《霸王别姬》更宁愿采取内在的、精神的眼光，而《活着》则采取了所谓卑微的“小人物”的眼光。但是这里的“小人物”视点并不是如同俄罗斯作家眼中那种深切感人的立场，相反，《活着》中的“小人物”恰恰拒绝任何一种深切性的东西，努力避免拥有某种深度。尽管从拍摄手法上来说，《活着》试图接近一种纪录片的风格，但是基本叙事却更加接近一种叫做“剧”的东西，即其中的“悲欢离合”与其说接近历史事实，不如说接近一种剧情上的安排——意外、巧合、出人意表的起落，如同某种听上去琅琅上口的效果一样，这些剧情的安排主要也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挑逗人们的好奇心，而并不需要考虑历史事实，不需要对于历史有一种尊重和深切的心情。

当镇长来到主人公福贵家，对他说那些皮影戏保不住了需要烧掉时，同时引出给福贵的哑巴女儿说对象的话题，对方是“县城里拿工资的工人，在城里头，大小也是个组织的头子”。因此，这部影片中的文革，主要是与这位“组织的头子”有关，他叫王二喜，所谓戏剧性也集中在他身上。作为造反派，他生得既膀大腰圆，又松松垮垮；整日肩戴袖章，头顶旧军帽，却是个瘸子，当然“急起来也跑”。但他带领几位工友在“下定决心”的歌曲声中，横排行走在大街上时，你的确不知道他要去往何妨，那是一个未知数。万一是去武斗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当福贵夫妇在街上布店里听人说有造反派正在他们家“搭梯子上房”，他们有理由表示忧心忡忡。

但他其实给未来的丈母娘家粉刷墙壁去了。他给这个破旧小院的照壁上画了一张毛主席像，在院墙上新刷了几条标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一个革命中的美学家。“工厂里几百张毛主席像都是他画的”，干完活围住小桌吃茶的工友们补充介绍道，这些人衣服上还带有许多白色的油漆。造反派不去造反，带人来给自家丈母娘家干活，假公济私，这个带有放肆色彩的细节，同时也消解了文革的任何实质意义，包括它的严肃性和严酷性。

“好戏连台”还在于：当王二喜的妻子凤霞在医院里生孩子，医院已经被年轻的红卫兵护士接管，王二喜再次显示了他的灵活头脑：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借批斗为名，从牛棚里弄来了一个原妇产科主任王教授，将他挂着牌子从大街上一路押来，同时说服医院的造反派是为了让他在现场接受教育。但是发现他三天没有吃饭，饿得没有力气了，于是王二喜的丈人福贵上街买来了七个馒头，教授一口气全吃了，噎得喘不上起来，又给他喝水。等到凤霞孩子落地之后真的出事，这位教授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人们将歪着头的他拖进手术室，他完全不起任何作用，最终凤霞因为产后大出血而身亡。其间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安排，有惊有险，的确令观众大饱眼福，但是将凤霞的死亡与教授的滑稽表现相联系，大大减弱了前者的悲剧性，死亡因此也成了一桩可以被嘲弄的滑稽的事情（福贵在凤霞的坟上继续谈论七个馒头加了水就成了 49 个馒头可以作为旁证）；同时，以这样的方式表现教授，是将他进一步推进受屈辱的境地之中，不同于别人施加的羞辱，这回是教授本人自我羞辱。这样的做法称之为“文革遗风”也未尝不可。当年有过一部影片叫做《《苦恼人的笑》，其中一位教授在羞辱之中，将一只肛门用的温度计插进自己嘴中，拍摄于 1979 年的这部影片对于这个细节是持不能接受的批判态度的。

一般来说，文革中较少饿饭的事情。同样，在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的时候，身为镇长还能够前来替凤霞说亲并亲自主持凤霞的婚礼，而且他居然也带着“造反派”的袖章，这是不太可能的。县委书记春生也前来祝贺王二喜与凤霞，送来了带镜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像，这也不太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影片是第一次将有关文革的那些明显的标志，当作某种时尚或者影片中的商业元素来加以使用。王二喜相亲时带来的礼物是包在手绢里的几枚毛主席像章和一套毛选四卷。而表明凤霞春心萌动的，是她独自在屋里带上军帽和穿上军装、扎上皮带。他二人拍结婚照那场戏着实渲染了一番，新娘新郎一概红卫兵装束，祇是多了胸前的红花，哑女凤霞头戴军帽，身着褪了色军装（旧军装而不是新的，这在当时很不容易弄到），那上面别着毛主席像章。在自家院子里面，有人弄来了照像背景用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包括父母大人在内，四人都将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照了一张全家福。影片中用了一些最著名的文革歌曲，制造一种喧闹、喧哗的气氛，从“造反有理”、“下定决心”、“大海航行靠舵手”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毛主席的话儿要记在心”等，但是所有这些与整个情节、人物的精神状态没有内在关联，这些“小人物”在历史的沉浮中包括在文革中始终是各过各的小日子，各人算自己的进帐。对于他们来说，正如影片的片名所表明，“活着”便是一切，便是胜利，而不问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尊严与意义.《阳光灿烂的日子》（1993）涉及 70 年代初期某个青少年小圈子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个小圈子生活看作文革社会中的亚文化范围。在当时严密控制下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出现亚文化现象？祇有到当时严格的等级制社会制度中去寻找原因。在有人说错一句话就要人头落地的情况下，在任何涉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要被严格取消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被保护的小圈子，恰恰流行起用当时的眼光看来是“无聊”、“腐朽”、“堕落”的生活态度。当时是北师大女附中学生的叶维丽教授在她的回忆中谈及了她当时感到的惊讶：当 1966 年年底，最初造反的红卫兵串联回来，发现革命的目标已经转向自己的父母时，这些人变得改头换面：他们不再满足于朴素的旧军装，而开始“奇装异服”起来：女孩披上长长的羊毛围巾，男孩有着皮毛、质地很好的靴子和保养很好的军用羊毛大衣。叶维丽分析展示这些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东西，与他们的特权感受到威胁因而需要补偿有关，这些人中军队干部子女是突出的一群人。有一部 32 集的电视连续剧《血色黄昏》，表现了这批人的生活。《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王朔本人正是这种大院孩子，他的年龄比红卫兵略小一些。

主人公马小军除了上课之外，还要学习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造酒、做芝麻酱与小提琴，这在当时叫做“开门办学”。他本人更是把自己的“门”开得大大的，他经常与一些“坏孩子”在一起，以坏孩子自居，烦闷、无聊、四处闲逛、无所事事，他的母亲责骂他“搬进牢里好了”。“坏”是他的特权，他能“坏”正是他的力量所在。因为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开锁技术，他溜进各种各样的家庭，参观人们的内室，对许多人来说隐蔽在等级制度里面的神秘感，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他本来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洞悉这个阶层的内幕和它败絮的一面。他与朋友之间议论对方父亲的“作风”问题，与高级首长一起观看“毒性很大”的外国电影，目睹和身受因父亲常年不在家而造成母亲的极端孤独和歇斯底里，这些都给他打开了朝向放纵的天地，暴力举动永远是他最为手边的事情，而对女性的幻想和幻想式的占有，则是其中最为刺激的一部分，16 岁的他学着兄长们的样，在路上拦着女孩搭讪，用当时流行的话叫做“拍婆子”。当然，他也不会真的做出什么，在与女性的交往中他甚至显得漫不经心，祇有当他的位置被别人觊觎时他才感到事情严重。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坏孩子里面的一个

好孩子，仅此而已。他乱七八糟的头脑中（关于“中苏开战”、“保尔”与“冬尼娅”、“鬼子进村”）其实并没有一条算得上是真正的异见和具有什么危险，对他们来说，也许真正声势浩大的莫过于去“老莫”搓一顿，虚张声势、声厉内荏是这些人的共性。当他们这一小伙人与另一拨两军对阵、剑拔弩张，却一瞬间在几位“大人物”的握手言欢中变得烟消云散，所有的人对于这个被玩弄的处境感到无比欣喜若狂：“和了！”在象征着权势的场所，双方举行了盛大欢宴。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这样一个“亚文化”区域，看作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注释”，是处于这个等级制度上层的“内部装修”，它与主流文化之间有着拉康所说的“镜像关系”，它所提供的不仅是文革某个时期某个圈子的青年人的生活，甚至可以从中发掘我们这个社会主流文化的某些脉络乃至起源（军队文化），这部影片的导演姜文对于影像有着天才般的直觉，运用强烈有力的视觉形象完整地保留了当时的生活气息，但是总的来说，这部完成于二十年之后的影片与它的原小说作者一样，缺少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和状态的反思，马小军的精神特质在于他是一个无辜者，他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那是因为他神气活现地贴在所有现存事物的脊背之上，游弋于当下环境这个卵巢之中，寄生于现存秩序的蛋壳之内，浑水摸鱼，无忧无虑，自命不凡和自鸣得意，像这个社会腹腔中的一节盲肠.因而哪怕他自己的行为多么自相矛盾，古怪反常，漏洞百出，他始终露着婴儿般灿烂纯洁的微笑，这才是全部事情的真正可怕之处。那种天真无暇的笑容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坚持自己有理、拒绝反思的表现.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是“幽深的、没有阳光的日子”。但是由影片本身读不出这一点，影片中使用大量抒情音乐（包括抒情的文革歌曲，比如“远飞的大雁”），使得这种混乱、盲目得以“下载”落地，即加以肯定和接受下来。

由第五代摄影师顾长卫导演的《孔雀》（2004）获得了不少好评，包括赢得 2004 年嘎纳电影节银熊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后极权征兆”影片。故事发生的时期泛称“七十年代”，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信息，即影片制作者并不打算关心拥有这个年代的十个年头之间，怎样的变化和发展，所有凸凹不平的差别都被压缩成一个叫做“七十年代”的平面，它是一段往日的时光，是缅怀和追忆的对象。“我时常想起七十年代，那时候，父母身体还那么好，我们兄弟姐妹还那么年轻”，影片是这样通过剧中人物的怀念口吻开始的。

表明当年的政治气氛的，祇有影片开始最初的一点画外音：全家人围住一张小桌子吃饭，楼下响起并不很清晰的呼喊口号的声音，并伴有依稀可以辨认的锣鼓声，母亲将头伸出去张望了一眼，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吸引住她，于是她很快放弃了，回过头来吃饭。而其余四人除了小弟弟有一点动静，父亲及两个成年孩子，仿佛没有听见一样，一点也不曾为外界的声浪所干扰，始终埋头吃饭。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文革后期，人们对于政治已经厌倦了，他们不再关心周围环境发生了什么，认为它们都与自己无关.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部影片发生的年代，与本文开头分析的那些“你死我活”的影片正好处于同期，而因为后者是当年的同步产物，所以更令人相信那更加符合人们对于自己身处环境的认知。要想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即使是对于普通人，也要再过若干年之后，主要应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这之后如同哈维尔所指出的，不问政治是得到鼓励的。

将政治从日常生活中“掏空”、“流失”或者“蒸发”（罗兰.巴尔特语），将这种被

过滤过的现实变得如同“自然”本身一样，是这部电影的重要策略。如果沿着有关文革年代的影片一路看下来，观看这部影片会感觉明显的不安，会觉得什么地方有不对头.细想起来，主要是那些街道。这个中原小城的街道上居然没有任何标志，因为它既没有文革时期到处悬挂着的大标语、大字报或者张贴的口号，当然也没有改革开放之后铺天盖地出现的商业广告、各种商店的醒目招牌，一个没有文字的街道是一个彻底无声无息的街道，就像一个人瞎了眼睛或者有眼睛没有眉毛一样，这种情况有些令人惊怵和讶异，不免再度令人想起这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但这回不是被“他们”占领，而是出于人们自己的需要或者自律，是来自不同方向上的两只手扼住了某些东西的喉咙，紧紧地摁住它们不让它们出声。在打出字幕之前，影片有一个小城的全景镜头，在主要街道上挂着一条“消灭蚊蝇，人人有责”横幅标语，风雨飘摇似的，这是一个制造某种模糊和混乱的信息。

回到所谓“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后，人们做什么？在形容后极权“欢迎和支持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溢出”时，哈维尔用了一个法语词汇“小玩意”，即用各种看起来可爱的小东西装饰自己的生活，借用这个眼光，可以说这部影片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七十年代”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它有着不同于今天的当时的“时尚”玩意：在院子里做煤球、在屋里做皮蛋、在走廊上做西红柿酱（一地的盐水瓶），以及踩缝纫机、拉手风琴、缝被子、针灸（妈妈帮儿子）、缺少性知识、男女关系上的捕风捉影等等，都是那个年代的“标志”产品，当然更为突出的是人们的服装，风华正茂的“姐姐”永远是蓝色和灰色的哔叽布，灰色平绒鞋，弄得像是当年的时尚一样，对比着今天的时尚。应该说，这一点已经脱离真实，衹剩下蓝、灰色的说法，更像是写在当年《参考消息》上面发表的外国人写中国人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那是在北京或者知识程度比较高的人们之间.而所有这些“小玩意”越显得真实，它们所遮蔽的当时社会情况越甚。

导演谈过为什么挑选张静初扮演其中的“姐姐”，是因为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七十年代才有的“纯静”气质，这个不安于平庸生活的姐姐也被当作了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但是这是哪门子的“理想主义”！为了参军，小小年纪的她竟然准备了两瓶酒和两条香烟为了贿赂前来带兵的人，尽管没有得逞。如果说那是理想，那也衹是仅仅属于她个人逃离现有环境的“个人理想”，与那个年代与众人分享的宏伟理想根本不搭界，相反，正是所要摒弃的对象（个人奋斗），这衹有算是七十年代出身的人能够想像的“理想”了。（编剧李檣七十年代生人）。为了博得别人的同情，姐姐竟然把自己的骼臂抓出一道道红印，说那是自己家人打成那样，并主动提出要做人家的干女儿（这在当时是“四旧”）。她与干爸在一起也就是吃吃东西，看看电影，拉一点手风琴跳舞，他们之间并无精神交往，这个时期的年轻人再走偏锋，也犯不着跟一个老头吃吃喝喝，文革年代又不是饥荒年代。十分不真实还在于，这个“姐姐”自己用缝纫机做了一个巨大的降落伞，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她怎么会有那么多布票（一部 89 年在法国出品的叫做《牛棚》的影片，导演和编剧为从大陆出去的戴思杰（1954 年生），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一位被关押的年轻人进城之后吃了太多的东西撑死了，这更像是给法国人提供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因为那时候吃饭是需要粮票的。这部影片将“牛棚”所在地放在一个风景奇异优美的山区，看上去那更像是一个旅游度假或者休养的地方。）？而为了向别人要回降落伞，姐姐居然脱下自己的裤子，这更加不能想像，那个年代女孩子的贞节基本上是属于革命纯洁的一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欢迎这部影片，因为它无意之中符合在后极权情况下的人们重要的生存策略，提供了人们生活在被无声控制下的自我辩护.其中的“小玩意”越是看似真实，越能够吸引人们的眼光，越将它将做一种与自己生活的年代相比照的时尚或时髦，那个年代的真相就被遮蔽得越深，同时表明后极权的危机也越深和越甚。

拍摄于 2005 年的《芳香之旅》，其中文革景象中沉寂了若干年之后重新于电影中出现，占了影片大约五分之一的篇幅，这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那场涉及人的灵魂的革命，在该部影片中已经完全变成涉及肉体的革命：文革之前六十年代中期，主人公老崔已经是一个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劳模，但是在新婚之夜，与新娘做爱时不小心碰到了满屋的毛主席石膏像其中的一只，半夜里夫妻俩吓得到院里挖个坑将碎片深埋，从此之后老崔作为男人就不行了。即使这样，这部影片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宽广的道路可走，比如政治如何成了一种对人实行阉割的力量，或者一个人当了劳模之后，人性却被掏空异化了，但是影片偏偏选择了一条最窄的路径，它要老崔继续在精神上做一个男人，无视他已经遭受的损失，它要老崔在精神上做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他愿意亲自开车接妻子与前情人刘奋斗见上一面，结果车翻身残。春芬对此感慨不已，一劳永逸地原谅了性无能的丈夫，变得心满意足。丈夫去世之后，她从街市上买回一张新的毛主席像挂在墙上。影片的结尾是她给老崔上坟，坐在公共汽车里回想当年她与老崔以及刘奋斗在一起的情景，脸上露出了总结性的幸福笑容。2006 年 2 月份情人节那天这部影片在全国院线上映，导演章家瑞（50 年代末出生）有一个阐释：“我们是在对父母们做出的牺牲进行怀念，”这样，一对本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夫妇，他们昏迷不醒的精神状态以及“无性的婚姻”，变成了十分“自然”并需要讴歌的对象了。影片中有关文化革命的那些元素（红卫兵串连、露天电影、呼喊革命口号等），仅仅停留于“道听途说”的水平，它们主要是作为“奇观”而出现的，缺少与人物性格的任何内在关联。实际上，即使是身处文革大动荡中的老崔夫妇，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同样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与《孔雀》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有着天然的对于文革的免疫力或者屏蔽的能力。当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出现在老崔所开的公共汽车身上，老崔的反映是用手撕下它们，不知是出于有意识还是下意识.在这个劳模头脑中，文化革命这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整个被删掉了。影片中对于文革之前六十年代的浪漫描绘，尤其是反复使用那首“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明快歌曲来造成欢快气氛，基本上是脱离历史的。那是一个重新步入“阶级斗争”的时代，暴风骤雨的年代马上就要来临了。

可以预见，因为文革的话题在国内仍然是个禁区，对于文革的研究、讨论仍然处于封闭状态，电影中的文革叙事有可能越来越远离历史的真相，越走越远.不可否认，出现在银幕上（以及电视剧）中的文革景观，由于与最广大观众有着最为密切的接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比其他东西更加有力地形成和建构着观众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和想像，这是令人担忧的。

2006 年 3 月，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口述史与“文革”研究

邢小群

一、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
二、从当事人的观察看口诉史的价值
三、学会用口述史材料去把握历史的多面性
四、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

【注释】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 40 周年。由于官方以行政权力设阻，“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出版物受限制，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步履维艰。出于历史的使命感，民间的独立学者仍然坚持抢救性的“文革”学术研究。而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就成为目前条件下推动“文革”研究继续深入的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仅对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几个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一、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

之所以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开展“文革”研究，首先是出于时间的考虑。口述历史选择的采访对象首先应该是历史活动的当事人，比如“文革”时期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各类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重要事件的关键人物和知情者等；其次是经历了“文革”又具有历史记忆的普通人，他们在“文革”中也许不出名，但他们的讲述可以从个人独特的角度深化历史的认识，或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空白。有些人本身不是重要人物，但他们的口述中有重要的见闻，同样有重要价值。如果历史的某些环节被遗忘了，被遮蔽了，而普通人的记忆恰恰能弥补这个环节，那这些材料就可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总之，无论是历史重要人物，还是与重要事件有关的普通人物，留下他们共同的记忆才能复原历史的整体风貌。

“文革”的参与者包括当时十几岁的学生到 70、80 岁的老年人。40 年过去了，当年十几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 50 多岁；当时 40、50 岁的中年人现在已经 80、90 岁了；而当时 60 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去世了。所以，采访“文革”的重要当事人，从时间上讲已十分紧迫。如果现在抓紧进行，还可能采访到一些当时的中年人；如果再拖 20 年，就只能采访当时的年轻人了。就我自己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体会而言，我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采访过的吴祖光、温济泽、萧干、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文革”时都是中年人，采访时年龄在 70 岁到 80 多岁之间，他们最近几年已陆续去世了；有的采访对象正在约定当中就突然去世了，比如项南。所以，今天做口述史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和死神赛跑。

口述史的难度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当事人有心理压力，不愿意接受采访；二是他们不接受口述史的方式，要自己写回忆录。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开始都不愿意做口述史，一方面觉得自己就能写，还有时间，一方面总觉得别人的记录不如自己

写出来的准确、完备。我有一个朋友赵诚约黄万里做口述史，黄说要自己写，还没动笔，就去世了。也有少数“文革”中的重要当事人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晓农帮他做了口述回忆，出了书，因此就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线索和资料。王、张、江、姚已全部去世，想做口述史也不可能了。现在，口述历史一方面可以着重抢救来自老年的当事人的史料，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年的当事人，如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或重大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知情者、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

最近几年，以口述历史的方法研究“文革”，已经受到一些机构和个人的重视。据我了解，像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官方机构，早已着手对“文革”中的高层人士包括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或秘书人员进行采访。一些大学、民间机构和有志研究“文革”的学者，也开展了不同专题、不同层次的“文革”口述史研究。学者个人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但这还不是主要的障碍。更突出的问题是，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研究和出版严重不对称。一些口述史的成果，由于内容与官方历史解说的口径不一致，没有机会公开发表，只能由机构或学者藏之名山。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官方对出版的严控极大地限制了“文革”口述史已有成果的公器作用。

二、从当事人的观察看口诉史的价值

任何历史的现象层面都比文献更丰富，“文革”也是如此。口述历史在挖掘现象层面上具有特殊的优势。

以 1966 年 8 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为例。在中国已出版的“文革”史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被认为是较好的一种。该书第 2 章第 3 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提到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反应时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全会的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表示拥护，没有紧跟。这与许多人对大字报不理解有关，也与这张大字报的打击面相当大、许多人搞不通有关。实际上多数人对它有意见，不过不敢表态罢了。”他还写道：“出乎中央第一线和到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毛泽东突然提出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1] 中国流行的另一本“文革”史——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也说：“在原定全会要结束的 8 月 5 日，毛泽东突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 王年一、金春明没有说明他们关于“突然”的论断依据的是什么史料。

中共中央的这次会议决定，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取代刘，林的地位在党内上升到了第二位。如此重大的中央人事变动，到底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突然决定，还是早有打算？若是后者，他是一人独断，还是背着刘少奇与其他政治局常委事先商量安排过？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毛泽东召开这次全会，是有备而来，对刘少奇发难之前早已与周恩来等商量好了“去刘用林”的政治局人事调整方案。在毛宣读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8 月 4 日下午，他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

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3] 至于毛打算怎么处理这个“政治局常委里的牛鬼蛇神”，政治局常委将有什么变动，谁上谁下，以前所有的研究者只是提到周恩来草拟、经过毛泽东勾划的名单（即周恩来 1966 年 8 月 6 日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问题致毛泽东信的手稿），只补充了一点信息，如毛泽东采纳了江青的意见，把陶铸提到第四位。然而，谁也没讲清楚这次重大人事变动的决策经过。直到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出版，才大致厘清了这一重大人事变动的决定过程。

高除了引用周恩来 1966 年 8 月 6 日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的手稿之外，还使用了高本人 1983 年分别采访吴法宪和王力所获得的口述史料。高文谦发现，周恩来在实现毛的倒刘意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毛要换掉刘少奇，是周提议请林彪回来，又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为党的副主席，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名义。[4] 由此可见，在毛对刘少奇公开发难之前，毛、周已经主导安排好了高层的权力重组。

那么，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对这次重要人事变动的态度究竟如何，是象王年一书中描述的那样，不“表示拥护”吗？以前并未有文献记载过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和表现。聂元梓是这次会议的列席者，我对她作过一次采访。以下是采访中与此事相关的问答记录：

问：您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算是见证人，但讲的还是有些简单。比如，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谁通知你去的，是怎么个开法？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您在哪个组讨论，有没有作发言？

（聂）答：在会场上，大家精神非常集中，情绪也非常紧张。我也不知道他们上层之间是什么关系，也不会特别注意谁，不注意谁。我是分在华北的北京组。会议上的发言，大家都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都是这样表态的。

问：刘少奇、邓小平也表态了吗？

答：都表了态，都说拥护。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主席念他的大字报时的样子。

问：是毛泽东自己念的？

答：是啊！他坐在主席台中间，拿着徽胖骄湍敲茨睢Ｓ∠笞钌畹氖牵姙蕕的鄰几魉砨悄钦糯答直ǔ隼春螅姩鑔笆笨隙ǎ姹丫?0 天了，没有人来响应，冷冷清清，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压制革命群众不能起来。当时我理解是各个省市领导没有跟上。主席觉得大家没有积极起来响应他的号召，他意见很大。另一个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了刘邓司令部。我不能理解怎么还有一个黑司令部。不知道党内政治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问：您当时也很吃惊吧？

答：当然吃惊。觉得刘少奇就是毛主席的副手嘛，怎么会有一个刘邓司令部？但是也有些预感。因为前一天，江青不是请我吃饭了吗？饭桌上，她已经点了刘少奇。说了很多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坏话。还讲了彭真怎么对她不好。还讲到我们写的大字报是她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给我们送到毛主席手里。讲得活灵活现。

问：当时毛泽东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您能不能马上就听出是指的谁？

答：能听出来。但说到邓小平时，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问：按说，他没有点名，中央委员们不一定都能感觉出来，尤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座吗？

答：都在座。主席旁边就坐着周恩来、刘少奇。

问：刘少奇、邓小平当时是什么表情？

答：邓小平在哪坐着我都不知道。不光是刘少奇感到紧张，大家都非常紧张。出来一个黑司令部，这还了得！我是因为江青打了招呼，她说毛主席有重要问题要讲，明天你就知道了。心理还有点准备。他们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

问：谁主持会议呢？

答：周恩来。

问：主席念大字报时，你觉得周恩来知道吗？他觉得突然吗？

答：我觉得，周恩来知道，康生知道，江青知道。我接触几个大区的书记如李井泉，我当时感到他很愿意紧跟毛主席。有谁敢不拥护？反正我没听到谁发言站起来反对的。心里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问：您在华北北京组讨论，您感到他们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吗？

答：反正整个会议，我感到大家都非常紧张。都是积极拥护，积极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不管是各省市领导，还是北京市参加小组讨论的人，没有不同意见。

问：文化革命要搞什么，怎么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选成接班人，有没有讨论？

答：有讨论啊！但都是一致的意见：拥护。

问：但是谁先提出的林彪？讨论有怎么一个过程？

答：不知道怎么就提出来了。这个事先可能都有安排，我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

么人站出来提议。

问：会议讨论，您都在场吗？

答：我都在场，就表决时不在。

问：讨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林彪要上了？

答：是的。这些情况，当时也没有特别注意。我对领袖虽然忠诚，但不至于崇拜得一言一行都要观察记录。[5]

这次访谈中聂谈到的个别细节也许不一定很准确，但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前一天，江青请她吃饭、向她交底一节，应该是可信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上，她并未看到有谁出来对毛泽东的大字报和人事调整表示异议。这说明，不管与会者各人心里怎么想，至少他们表面上是积极拥护毛的“讲话”和大字报的。她描述的这一情节比较符合中共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习惯。关于这些事，聂元梓的回忆录其实语焉不详。我访谈时接连追问，她随口答问，这样才留下了上述材料。

除了帮助厘清这类重大历史事件之外，口述史还可以在一些细节方面为后人提供难得的现场观察。例如，人们都知道周恩来对毛泽东察言观色、惟命是从，在这方面聂元梓接受访谈时说到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她说：“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周恩来赶紧去搀扶。毛泽东要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你的身份了嘛。[6]”关于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的场面，如果不是亲历者的口述，从档案文献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我曾经采访郑惠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说，邓小平 1975 年 6 月出来主持工作时，让胡乔木出面成立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其中一个组负责编选整理毛泽东著作。当时这个组经常和邓小平一起读毛泽东的文章，邓时常也讲些话，并把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些什么情况和意见传达给这些人，每次谈话吴冷西都一一记下。到 1975 年 10 月邓小平被批判了，国务院研究室也组织批邓，同时还批胡乔木。别人的批判发言往往是明批暗保，吴冷西却不同。他是一条一条地揭发：几月几日邓小平讲了什么话。本来，胡乔木还想一般性地揭发一点，应付过去；但吴冷西这么一来，胡乔木绷不住了，因为邓小平讲话时胡乔木都在场。后来，胡也一条一条地揭发起来。他还写了一份详细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其中除了一些事实之外，还有他自己对邓小平的一些评价，比如郑惠记得有这样的话：“这个人（邓小平）顽固又虚伪”。这时，胡乔木的精神完全垮了。郑惠说：“记得有一次，他挨批斗完了，连走路都走不动了。我扶着他回办公室，我怕他心情太坏。我一直在想，他在党内生活这么多年，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看来个人的得失，还是他的根本考虑。毛主席是他依靠的支柱，这时毛主席对他不信任了，他觉得身败名裂，看不到前途了，认为他可能翻不过身来了。”[7] 象这样的细节，正式的文献是不会记载的。然而，亲历者的这种回忆和描述，对研究者来说，是把握胡乔木的性格、了解党内高层政治生态的不可多得的素材。在史学研究中，如果排斥这样的细节，历史可能就失去了血肉。这正是口述历史的长处之一。

三、学会用口述史材料去把握历史的多面性

在中国的舆论中，“红卫兵”、“造反派”已经成为一种宽泛的符号，往往与“批斗走资派”、“打砸抢”、“破四旧”、“武斗”等负面行为相联系。这两个群体已经被整体妖魔化了。其实，每一个参加过“红卫兵”、“造反派”或其他群众组织的人，都有具体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口述历史可以帮助当事人恢复对当年事件的记忆，研究者再把这些记忆经过鉴别后作比较分析，便能从当事人的观察中部分地复原当年的真实情境，从而避免对历史现象和社会群体作概念化的简单判断，学会作比较深入的剖析。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

例一涉及到对“老红卫兵”的认知。我曾经采访过《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前任主编李大同，请他谈谈他的“文革”经历。他是个干部子弟，而他的“文革”经历却不同于比较典型的“老红卫兵”。

李大同的父亲 1938 年到延安，属于“整风”中被“抢救过”的干部，曾是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时的助手，胡负责团中央工作时担任过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大同是 1967 届初中生。1966 年 7 月他参加了“老红卫兵”的组织，但他又很保守。他反对“血统论”，反感对老师的暴力行为，没有参加“打砸抢”之类的行动。“文革”初期的一天晚上，李大同向他父亲提了 10 个问题，对当时种种过火行为表示不能理解，把这张纸放在父亲的桌上。团中央得知后如获至宝，认为当时全国到处都在“造反”，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些保守看法存在！于是，李大同写的这些内容很快就刊登在 1966 年下半年团中央的内参《团的情况》上，其引语是：一个 14 岁的学生李大同向其父亲提出 10 个问题………。后来，李大同的父亲被“红卫兵”把腿打断了。

半年后，“老红卫兵”失势，多数“老红卫兵”已经没有“血统论”支持下的士气。在“红卫兵”的分化时期，李大同属于第一拨被分化出去的干部子弟。1968 年以后，中学“红卫兵”从整体上看已经边缘化、逍遥化了。一部分人无事可做，在街上打架斗殴、“拍婆子”，而李大同选择的是强身和读书。他与一些夥伴们跟着学校的军代表学习擒拿、格斗，和其他干部子弟交换禁书。他回忆说，要说我们干部子弟有什么特权，那就是信息特权。我想，他说的信息特权还不完全是指上层消息一类，更多的是指他们家能获得当时社会上公开及内部发行的各种书。李大同回忆说：“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消蚀着我们的想法。”但那时的“阅读特权”毕竟多少造就了这一批人的怀疑精神。今天反思的彻底性就与这种阅读有关系。对李大同来说，他既是“红卫兵”，又是思考者；他当年的思想逻辑和今天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例二是一位外交部老干部对“造反派”的看法。何方是早年到延安的老干部，曾经长时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1959 年被外交部定为“张闻天反党宗派”的重要成员。他在“文革”中支持过外交部的“造反派”，对抓“五 • 一六”持否定态度。

何方在口述史中谈到，“文革”一开始，外交部领导就指定了 35 个批判重点，这些人大多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挨过整或有什么历史问题的人。他的体会是：每次运动一来，从上到下的各单位领导常用的手段是，赶快找几个或者一批人当打击重点，

先抛出去，一方面表示自己积极推动了运动，一方面又保护了自己。

他说："'文革'初，以干部子弟和一些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干部组成的红卫兵如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李一氓的儿子李世滨等一批人，带着红箍，开到了我家。把我所有的书，往几个大木箱里装，加上封条。还把我的笔记本都收走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期间，我的倾向性很明显：第一，我支持'文化大革命'；第二，我支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我对革命队伍里的一些现象不满意，我真的以为毛主席要扫荡特权和官僚主义。例如，姬鹏飞、乔冠华凭什么一年到头抽'三五'烟？'三五'烟国内根本就没卖的，都是从国外搞来的，是大使们拿公款给部长们送的礼，我对这类现象极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确有错误。而且那时打倒是比较普遍和随便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真的打倒，主要含义还是批斗和拉下马的意思。后来外交部'造反派'上来了，以干部子弟为代表的红卫兵成了'保守派'。'造反派'闹腾了一两年曾得到'文革小组'支持，他们反对当权派，打击面太宽，犯了不少错误。但运动还比较文明，也一直没有夺外交权。随着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王力垮台，'造反派'在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中被彻底整垮，一些头目被抓了起来，很多人后来又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同陈、姬、乔和各级原领导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成了外交部'文化革命'的主流派，一直再没倒。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数有 2 千人，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个别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时又是找垫背的，把'文革'的罪过推到这些人的身上。邓小平、陈云在这些问题上有派性，处理得不好。至今没有给为时两年多、上千万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运动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这件事。"[8]

在"文革"的大部分岁月里，何方在外交部其实只是个旁观者，他早早被"专政"，连当"造反派"的资格都没有。但他的口述有助于我们对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更真切的了解。何方认为，周恩来在外交部打击"五·一六分子"，有报复之嫌。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被逼死、逼疯、打伤的不计其数，"造反派"就这样全被打下去了。这一点从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中也可得到证实。宋永毅提出，"造反派"和"三种人"的历史真相亟待澄清，此言甚是。

四、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

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史学界对口述历史的价值日益关注，但也有很大分歧。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往往使口述史的真实性程度受到怀疑。有些学者对口述史不仅抱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些鄙夷。这就引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口述整理的文本，在史学研究中能不能采信？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作者刘小萌是口述历史的实践者，他对口述历史的价值是肯定的，但对口述史的真实性程度有所保留。他认为："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戴着一副变色

眼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9]”

其实，口述史是不是可信，不可一概而论。它的历史真实性既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的态度，也取决于采访者对历史的态度。如果双方都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口述历史完全可以成为信史。如果口述者有误记和避讳，采访者通过追问和考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口述者的缺陷。但如果双方都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主观上对治史与传奇就不加区别，或者出于商业目的炒作，或者为了发泄私怨，当然不可能产生信史。同样，依靠文献治史，如果无意求真，也会让历史走样。

中国民间的学者独立修史很困难，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独立的立场写作、出版回忆录也很困难，但官方却不断地推出官修史书和回忆录，特别是那些前党政军要员近年来纷纷出版回忆录。他们有专人专款，组织了专门的写作班子，比如彭真的回忆录、传记的写作班子就多达 40 多人。这些官修史书和回忆录的作者按照中央定好的调子写；有时调子变了，回忆录的说法也跟着变。这些回忆录出版时虽然由个人署名，其实与官修史书并无二致，某些回忆录甚至是有组织的欺骗或有意识地造假。有些人的子女为利益驱动，也直接干涉写作班子的工作，提出“这些事可写、那些事不能写”之类的要求，不但按其需要取舍历史材料，甚至伪造史实。如此治史，即使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记载，也不一定可靠。何方先生是《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作者，深谙中共党史学界的内情。我与他探讨过当前出版的回忆录之可信度。何方说，他看过迄今为止不少高官要人的回忆录，对得起历史的资料不多；他们不但对自己不光彩的一面有所避讳，而且往往没有超越个人恩怨的眼光和胸怀。

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曾经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的金冲及说过：“我觉得口述历史往往讲得比较自由，假如让他写回忆录，有些情况可能不会写进去，比较谨慎。口述时，讲话脱口而出，把真的情况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周围的气氛都说出来了。[10]”高级干部都养成了保密的习惯，也深知人际关系的利害，所以越是要害处越要保密，下笔时越要回避；然而，访谈中脱口而出时反而会口吐真言。因此，与回忆录相比，口述史有更接近真实的可能。

口述史不仅具有史料意义，也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本身。当事人除了回忆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可以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史学的要素，不论是史述，还是史论，在口述历史中都可以体现。

唐德刚在谈自己的口述历史工作时，讲到胡适、顾维钧和李宗仁的不同情况。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对于言出无据的事十分慎重。顾维钧自己每天都有日记，他们的口述本身比较严谨。但李宗仁没有经过学术训练，讲话有信口开河的成分，唐德刚就要靠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加以校正。这几种不同的对象都有采访的价值。与胡适那样的口述者合作，固然容易达到信史的要求；与李宗仁这样口述者合作，经过认真努力的考证，也可以成为信史。退一步讲，有些往事的真相一时难以鉴别，或有歧义，可先以忠实于口述者原意的方式记录下来，供别人比较鉴别，不论证伪也好，证实也好，总是推动史学研究的契机。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口述历史》（第一辑）发表了傅光明关于老舍之死

的一组口述。3 个口述者都说自己给老舍收了尸，但他们又不承认别人给老舍收尸，这 3 个口述起码有两个是假的，甚至可能 3 个都不是真的。采访者傅光明没有其他资料来判断谁真谁假，只好将他们的说法同时展示给读者。这本身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一个环节。对这种一时不能定论的情况，我认为先发表出来也是一种办法。研究是一个环节，采信和定论属于另一个环节，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若遇到口述史文本有不确之处就求全责备，乃至否定口述史方法本身，就是把这两个环节合而为一了。由此想到余汝信的文章“口述史的局限：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为例”，他对此书的质疑颇见功力，但“文革”研究界仍然十分重视此书的价值，因为吴德是“文革”10 年始终处在高层领导圈内的历史当事人，书中披露的某些正史回避的重要细节具有填补史学空白的意义。

余汝信认为：“口述史的整理，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两种办法。其一是口述者怎么说，整理者就怎么记，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其二，是整理者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笔者赞同后一种办法，因前一种办法得到的往往并非是信史，而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所用的恰恰却是前一种办法。以本书的整理者所处的位置，其实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可以将口述素材与历史档案相互印证，即使如吴德自己坦言‘我的记忆不行’整理者也可用注释加以补救，使其口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阶段的真实，可惜，整理者没有这样做。而以前一种办法所得到的口述纪录，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11]”余先生希望口述史整理者用第二种方法，达到信史的目标，想法固然很好，但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下，前一种方法整理的口述史，发表出来进入公共视野，未尝不是好事。况且，据我了解，对吴德的口述采访者，并不是没有查阅文献史料，他们用很多史料才激活了吴德的记忆；吴德本人也保存了一些文字记录，他在口述的过程中经常要独自到里屋核对自己当时的笔记本。如果不是当时做了这项抢救性的工作，吴德去世后，他的笔记本就被中央有关部门收入档案了。

当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环境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呈现历史的线索。那怕一时做不到精确和完美，也是有比无好。这就是我对口述史在“文革”研究中的意义的基本理解。

【注释】

[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9 月版，第 43 至 45 页。
[2]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0 页。
[3] 出处同注 1。
[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出版，第 130 至 131 页。
[5] 邢小群，“高层会议亲历记——聂元梓访谈”，《往事回声》，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5 月出版，第 222 至 231 页。
[6] 出处同上。
[7] 邢小群，“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访谈”，《往事回声》，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5 月出版，第 30 至 31 页。
[8] 此段话录自笔者与何方 2006 年 2 月 25 日的交谈，文字已经何方核定。
[9]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3

页。

[10] “专家学者谈口述历史”,《文汇读书周报》，2005 年 10 月 7 日第 14 版。

[11] 引自 www.linbiao.org 网站上的“余汝信文集”。

怀旧物品和文革记

徐　贲

文革过去还不到四十年，但在文物市场上，文革物品已被列为“现代文物”。人们一般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品称作为文物。明代和清初，“前朝遗物”比较普遍的名称是“古董”或“骨董”。到乾隆年间（十八世纪）又开始使用“古玩”一词。１９３０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用古物一词概指“与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及其它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古董”和“古物”。１９３５年北平市政府编辑出版了《旧都文物略》，同年成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这里“文物”包括了不可移动的文物。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沿用“文物”一词，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关于文物的年代下限，目前国际的一般惯例是，“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１〕文革至今不过三十八年，远远够不上文物的时间下限，文革物品之被称作为“文物”，大约与“前朝遗物”的概念有关，但文革与今天却又并没有“前朝”的关系。文革物品在今天成了“文物”，主要是与人们的断代感有关。历史的久远是不能单单用实际的年数来衡量的，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是因为文革时代在感觉上已经离我们十分遥远。

一，地摊文化的另类空间

文革文物收藏现在主要是在民间，尚未成为正规博物馆认真收藏和陈列的物品。有一些很小的边缘性博物馆开始陈列一些文革时期的物品，但基本上是象征性的点缀。它的目的不是总结和反思历史，而只是最起码意义上的民俗展览，为的是给文革时期的日常表面生活作一些实物性的注释。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当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时期”作日常表面生活的实物注释，不然的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又何尝不都要有自己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是构建对群体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身份，这种构建通常在对“历史”的述中回答一些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什么是我们的好社会，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我们应当期待的未来，等等。正如哈贝玛斯所说，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的公共运用，……在公共领域中，联系着政治教育、博物馆和历史教育，以生产历史形象来为过去辩护，是一种政治行为。”〔２〕博物馆始终将是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争夺场所和公共政治运作空间。文革物品尚难以在现有的主流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有政治原因的。主流博物馆体制在文革物品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乃至冷落排斥，衬托出文革物品私人收藏的热络。这也反映了“文革”在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两重性，那就是，文革的政治和社会讨论仍是禁区，但文革物品却已纳入了官方认可的“现代文物”交易。政治和市场被人为地在表面上割裂开来，以双重政策区别对待，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状使得私人文物收藏成为一种有别于博物馆，并对它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另类文化活动。

私人收藏的另类文化性质可以从博物馆与珍品收藏的关系得到说明。博物馆是每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群体历史和群体身份构建设施，从十七世纪中叶算起，至今不过２５０年的历史。现代博物馆收藏的前身是古代的“珍品收藏”，十五世纪以前的珍

品收集是没有内在秩序的物品聚合，之后出现了为增进收藏为目的的收藏室，称作为“陈列室”、“学习室”或“工作室”，被收藏的物品集合开始有了内在秩序，这个秩序先是十六世纪的“神创世界”，后是十七世纪的“自然历史”，然后又在十九世纪充分发展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群体历史和身份。〔３〕今天，博物馆已经和珍品收藏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模式的文物收藏，前者是集体性的，后者是个人性的。前者追求的是理性秩序，后者崇尚的是灵感快意。前者在物品中营造历史、传统、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后者在文物中寄托情趣、品味、怀旧者的感伤或者投资者的贪婪。前者和后者之间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别，在公共空间为专制力量所把持的社会中，私人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有政治对抗的意义。

在博物馆和珍品收藏之间还存在着一道墨雷（David Murray）所说的“现代”和“前现代”的区分。早在上个世纪初墨雷就指出，现代博物馆的基本原则是“专门化和分门别类。”〔４〕从自然史、国家历史到艺术、军事、科技等等，各种门类的博物馆所精心汇总、陈列的物品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揭示某种具有真理意义的发展规律或过程。与此相比，前现代的珍品收藏则与这种真理使命无关，它给人带来的是意外的惊喜和好奇，“新、奇、特”是它的吸引人之处。它的展示效果与其说是教化性的，还不如说是情感性的，与其说是因为理性智慧揭示真理的秩序，还不如说是混沌无序的经验生活本来就有快乐。当今中国的文革文物收藏不仅具有墨雷所说的那种思想前现代性（非教化、非启蒙、非真理），还具有一种市场前现代性。文革文物绝大部分是在不同于现代商场的地摊上展示和交易的。文化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现代商场（百货公司和精品商店）和博物馆有相似的公共“教化”和“启蒙”作用。这两种设施都以提升大众的某些品味、向大众灌输某些价值、调教大众在公众场合的行为举止为己任。〔５〕从收藏意义和商业运作上说，作为地摊文化的文革物品都够不上现代的标准，因此在当今现代化中国社会中具有明显的边缘性。

不仅博物馆和珍品收藏的区别值得注意，博物馆和“市集”的区别也很重要。福柯指出，在后一个对比中，重要的不只是不同的物品秩序，而更是两种不同社会场所。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是一个把流动的时间积累并凝固于不变场所的设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现代场所的“现代的理念。”市集是一种与博物馆理念完全不同的场所。博物馆占据着城市的中心，高大的建筑象征着它的永恒，而市集则大多在城郊，有集时人头踊动，熙熙攘攘，“摔跤的、弄蛇的、算命的”，什么样的人都有，集无定市，集散市空。集市与时间的关系不在于积累，而在于“时间的流逝，瞬息万变、不可挽留和喜庆气氛。”〔６〕

托尼。贝奈特（Tony Bennett）把博物馆和市集的场所进一步充实为社会化空间的区别。博物馆不仅是一个知识的殿堂而且还是一个教化文明的设施。博物馆是一个大众行为的“表率之地。”〔７〕在博物馆里，访问者“不准随意吃喝，不准触摸展品，”当然，还必须穿戴整齐，不得大声喧哗，不得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等。〔８〕与博物馆相比，市集简直就是一个杂乱散漫的地方，穿汗衫的，穿拖鞋的，光膀的，大声吆喝的，吵架的，讨价还价的，趁机偷东西的，什么“不文明”的行为都有。博物馆的一处处展品是按一定的路线安排陈列的，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循着参观路线在作“经过组织的步行”（organized walking)。尽管访问者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他们的腿却并不自由。访问者“腿上的思想”实际上早已由博物馆预先设定。〔９〕市场却不一样，一个又一个的摊位构成了迷宫般的网路，每个人都可以信步走来，或走马

看花，或驻足细观，一切随意而为，悉听尊便。腿是自己的腿，思想也是自己的思想。在市场里，不存在将众人作单一社会化的统一空间。市场上的人乱得很，杂得很，野得很，他们拒绝被驯化，拒绝管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市集和博物馆的区别很能反映现今文革藏品和主流博物馆藏品的不同。现今的文革藏品主要集中在私人手上，主流博物馆尚未有容纳它们的历史事空间。谁要想领略文革藏品，谁就非得到文物市场去逛逛，当然，那不是正而八经的文物商场，而是市集式的古董文物摊。这些古董文物摊与博物馆的关系并不尽然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对立场所。古董文物摊和普通的市集不同，它们并不在郊外，而是往往寄生在现代都市相当固定而又颇为热闹的“文化场所”，如北京的潘家园和红桥，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孔庙等等。可以说，古董文物摊位所占据的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博物馆和市集的折衷场所，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大众市场。〔１０〕以苏州的情况为例，交易文革文物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在人民路三元坊以南的孔庙，另一处则是在不远处的苏州工人文化宫。孔庙那里有自由交易的文物市场，周日都是固定的大小柜台，周末才有“散摊”。固定的柜台出售的是常见的古玩、古董和收藏品，如玉器、瓷器、家俱、文房用具、钱币、电话卡等等，周日一般冷冷清清。到了周末，散摊都来了，孔庙才真正热闹起来。不过，固定柜台主对零散摊主还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苏州工人文化宫那一处交易柜台都设在一个用墙围着的地方，称作为“苏州市职工收藏品交换中心”。这里面有十几个常设的柜台，但只有两、三个陈列和出售一定数量的文革物品。在文革市场摊，文革物品的基本特征是杂、乱、零散。周六和周日两天，孔庙最为热闹，俨然成了昔日的市集。零散摊每摊交费１０元（２００５年6月调整到每１．５米摊位２０元）。交易文革文物的摊子一般是杂摊，除了卖文革物品，也卖别的，专卖文革物品的极少。文革物品收藏者到这里是真正来“淘宝”的。墨雷说珍品收藏的乐趣全在于意外发现和新鲜有趣，“淘宝”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他这个说法。

二，作为大众文化的文革物品收藏

文革物品虽然被称作为“文物”，但收藏这些物品却未必能算得上是“高雅文化”，称它为大众文化似乎更合适一些。说文革文物收藏是一种大众文化活动不是指参与其中的人群很广大，也不是指这种收藏已经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说它是大众文化是指它与精英式收藏，尤其是博物馆收藏，形成了近于两极的对比。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最重要的不是种类的区别（例如电影或小说，可以既是精英的，又是大众的），而是价值的区别。精英的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大众的则反之。大众文化是在与精英文化的对比中被区分出来的。这一点在文革文物收藏的物件物品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在同为私人收藏的不同物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按重要／不重要区分构建起来的优劣高下秩序。文革物品在文革期间都是些普通物件，现在虽然稀少了，但仍然是普通物件，与原本就贵重或尊贵的“真古董”相比，文革藏品明显处在“不重要”的那一端。

人们在评估物品时运用的不只是市场价格，而更是一种与社会高低、贵贱等级系统有关的　价值观，布迪厄（P. Bourdieu）称之为文化惯习，波德里亚（J. Baudrillard）称之为物品系统。〔１１〕这种文化价值观基本上是由多种可能的对立两分形成的，如真／伪、艺术／非艺术、重要／一般、有趣／无聊、杰作／劣作、贵重／平贱、精品／一般制品、真挚／造作等等。文化价值往往反映为市场价格，但并不总是如此。

与文化价值有关的种种对比关系可能互相结合，形成其他的重要价值对比。例如，同为过去某一历史时期的遗物，越与尊贵的人物有关，当时的价格越昂贵，当时和后来就越被看成是“重要”，越可能是“精品”、“杰作”、“艺术品”，越具收藏价值，等等。现今对文物价值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延续。越尊贵、越富有的人，越有能力得到高文化价值的物品。这样的物品也一直被看成是最值得收藏的物品，因此是高层价值的物品。高层价值物品有二贵的特征：由尊贵者使用，有昂贵价格。相反的，那些给普通人使用的、原本廉价的、成批制造的、没有个别特色的物品，便只有低层价值。

最能体现二贵原则的文革文物收藏品是所谓“主席瓷”。“主席瓷”是文革瓷中的一种，它的制作精良是因为它原定使用者地位的尊贵。在文革时代，这是一种至尊，其他的尊贵皆由它所赐予，是一些联带的尊贵。有行家指出，“‘主席瓷’是专为毛主席生产的瓷器，当年由景德镇瓷厂（一说是在湖南）成立专门班子制作，瓷质细腻，莹白发光，精美绝伦，图案多为梅花，这是因为毛主席喜欢梅花。为主席制作的专用瓷器包括餐具、茶具等，全部是配套，多达数十种。”物品以用者为贵，“从瓷土原料、制坯成型、烧窑制成，颜料选配都是在极其严格要求下由老师傅完成。‘主席瓷’由于要求高，制作成功一套需要数套数十套乃至更多的试验，那些稍有瑕疵的专用瓷，就流传到有关机构和人员手中，现在拍卖会上出现的这些专用瓷，大多都是当年流散的，只有极少数是主席用过的，这些极少数流散出来的，也大多数是一些省市专门接待毛主席的宾馆中当年为毛主席备用的，主席也只是偶尔用之。主席瓷被称为当代官窑，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成为有实力收藏家梦寐以求的宠物。……与毛主席有密切关联的收藏品都有极高的收藏价值。”〔１２〕

文革是一个反物质、灭人欲（包括物质欲）、生活用品极为匮乏的时代。制品一般都体现“艰苦朴素”的精神，制作粗陋，能用即可。价值昂贵的用品不仅不能给使用者带来社会地位、尊敬和荣耀，反而会招惹许多灾祸。只有政治地位所显示的那种尊贵才是社会所普遍认可和追求的。然而，即使在那个时代，最高等级的政治优越仍然必须以精良的物品来显示。“主席瓷”就是这样的物品。要是文革真能贯彻其艰苦朴素的革命理想，要是当时高位的领导真的只使用最粗陋的物品，那么哪里还会有今天的“主席瓷”呢？

绝大部分的文革文物收藏之所以形成一些自己的特征，正是由于文革物品大多太“平凡”，太缺乏精品价值的缘故。文革文物收藏大致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个是特殊情况造成的物以稀为贵。文物指的就是那些相对稀少，不再能产生的物品。然而，一般情况下，文物是在一个相当长时间过程中逐渐稀少下来的。这种稀少增加了物品的价值，是时间在给物品增值。文革藏品不同，文革藏品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突然稀少下来的。文革结束后，大量的文革物品便被当“废品”处理掉了。文革藏品的稀少可以说是全社会集体丢弃的结果，它的价值与其说是因为时间的积淀，还不如说是因为侥幸未被丢弃。文革文物因稀少而应市，有它自己的前史。这前史就是，人们曾对文革有过普遍强烈的厌恶。

现今文革文物市场价格上升，与其说是因为这些物品本身的优良品质（令人赏心悦目，勾起美好回忆，给人以知识教益，引发审美情趣，等等），还不如说是因为商业的操作。有介绍者称：“目前，‘文革’宣传画在国内外藏家的推动下，价格扶摇直

上，如‘文革’宣传画《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一开），发行数达３６０万份，是‘文革’宣传画中的珍品，３年前也不过８０００元，现市场价位在人民币２００００元左右；《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夺取更大胜利》宣传画在地摊上也能卖到近万元的价格。”〔１３〕且不论这个价格是否确实，或者是否有价有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宣传画的市场价格与它是不是艺术“珍品”无关。一幅当年发行３６０万份的宣传画，如果能有少许宣传效果，如果能少许打动人心，又何至于被众人当废物一起抛弃？何至于落得几十年后便所存无几的地步？

文革物品收藏的第二个特征是，革命图记大于物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物都带有文革图记。文革图记指的是文革图像或文字，如毛象、语录、样板戏人物、文革领导人、标语口号、革命英雄、运动号召等等。笔者在苏州文庙文物摊上看到一只锈迹斑驳的闹钟，钟面上是手提号志灯的李铁梅，给一位上海来客以１５元的价格买走了。在同处另一摊上，还看到一个布偶人，戴军帽、着军装，是文革时的文艺宣传道具，亦给一位上海来客以１５元买走。这两件东西之所以立刻可以被辨认为文革物品，乃是因为它们的图记标记。可以设想，要不是因为这些标记，卖主会不会把它们当作“收藏品”拿来出售，恐怕是个问题。一只没有文革图记的闹钟或者布偶，可能对关注钟表或玩具制作的人有收藏价值，但从这个角度所作的收藏，便成了钟表或玩具收藏，而不再是文革物品收藏。

文革物品收藏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特有的收藏类别。文革文物收藏的大类别是“文革”，下面的小类别有瓷器、邮票、纸品、用具等等。小类别下面还可以再接着分类，如纸品下可以有革命宣传画（也有把它与瓷器和邮票那样单独列为一个类别的）、报纸、档、连环画、毛选语录，甚至各种奖状、证书、工作证、票证等等。其中“升值空间”最大的据说是革命宣传画。〔１４〕艾尔索普（J．Alsop）曾说过，收藏就是把物品归拢到收藏者能设想出来的类别中去。〔１５〕文革藏品的收藏类别与实际收藏关系极大。人们按现有的类别收集和交易某些文革物品，但同时也因为现有类别限制而无法容纳许多对文革研究极具史料价值的东西，如私人的信件、日记、书写材料、没有革命图记的物件、日用品等等。纸品材料的收集对今后社会、政治、文化性的文革研究会具有特殊意义。现今的文革纸品收藏注重在它们的物品存在而非其内容分析上。这种局限本身就是单以文物看文革的局限，收藏文革文物和研究文革并保存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不完全是一回事。

文革藏品有它自己的类别系统。这个系统与一般收藏类别有貌似重迭的部分，但基本上是独立的，它的独立性由文革这一特类所概括。例如，文革瓷和文革邮票虽也可以归入一般瓷器收藏和邮票收藏，但很少有这么归类的。就邮票而言，文革中发行过各种各样的邮票，唯独以“文字”（文化革命邮票）备受收藏者青睐，这是因为这些邮票的文革图记最为明显。邮票本来就是一种热门收藏，“文”字更因为它们的特殊类属而身价不凡，甚至有专门的价格表来标明它们的“市场价格”。根据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出版的《“文字”邮票资料》，文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发行时间１９６７年4月２０日，１１枚，市场价格为１２０００元。〔１６〕

文革藏品的第四个特征是总体的低价位。文革文物除了象瓷器、邮票这些本来就相当热门的收藏品种，其他品种都大为相形见拙。诸如“主席瓷”、“文字”邮票或者

一些宣传画可能有颇高的价位，但一般文革物品的价格与它们所谓的“文物”挡次其实并不符合。绝大部分的文革物品都是大批量生产的，制作粗陋，没有个性特色。无个性特色成为它最突出的整体特色。所以除非是数量绝对稀少，一般都只具有低层价值。这在“淘宝网” 的拍卖页上是一眼可见的。以下是２００４年６月来自此网的一些例子。“文革名著”《艳阳天》（第三卷）和《麦苗返青》的叫价分别是８元和１０元，文革书刊《革命接班人》１９７３年第１１期也是８元，文革早期小册子《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新指示》和《毛泽东论文艺》都是４元，《毛主席诗词歌曲选》１０元。画册的价格要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画册的价格本来就高于一般书刊。《７３、７４年参加全国美展作品集》３５元，《１９７５年年画缩样》５０元。在今天的书籍市场上，一般的书籍价格在３０元左右，画册的平常价格也在百元以上，相比之下，文革“文物”书籍的拍卖价格顶多只能说是在“贱卖”旧货。〔１７〕

文革藏品最怕落单，特别追求成套，成系列。价值与其说来自单品本身，还不如说是来自收集的辛苦。有精于此道者写道：“‘文革’报刊资料收藏重点是在各个造反派组织印刷的小报，如《战旗红》等带有浓厚火药味的‘文革’小报。这些小报大多印制了很多期，如果从创刊号收藏到最后一期，在未来的拍卖市场上肯定能拍出好价钱。但收集齐全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位行家认为，毛像章收藏者也得从“系列”着眼：“普通单枚像章，只需几角钱便可购得，而难得的珍希品种和系列像章，售价特别可观。据上海《收藏通讯》介绍，两组２０枚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２万元；两组２０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１０００元。由于毛泽东像章制作材料各不相同，发行量也举世无双，投资收藏的首要原则应是尽可能多品种多枚数地收集拥有。待到凑成系列或看出珍品之后，炒卖便能增添价值实力。”〔１８〕

无论是从价值还是收藏性质来说，文革物品都远远比不上传统的“古董”收藏。在收藏中古董收藏才是“高雅文化”，文革文物收藏不过是“大众文化”。这两种收藏的主要差别在于难易不同。古董或精品收藏一向是富贵人家的事，显示出收藏者身份的优越。从古代的帝王到近代的权贵富豪，收藏是和优越的权力或财力联系在一起的。到了今天，收藏者也许不再有优越的权力，但仍需要有优越的财力和优越的知识。古董文物收藏的关键是“鉴赏”，也就是确定文物的年代、真伪和价值。这需要有专门的知识、长期的经验和频繁接触古董的实践。象钱币、铭刻、瓷器、玉器等等更是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其中的奥秘不是一般人一下子便能洞悉的。与古董收藏相比，文革文物收藏便形同一般走街串巷的收旧货，其中虽有一些门道，但实在算不得什么专门学问。现在的文革物件绝大部分是那些有文革图记的东西，极具直观性，极易辨认。伪造的文革文物也都以文革图记投买主之好。与文革有关之物几乎无须鉴别，购买和收藏自然也就失去了一层最精制的乐趣。

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后者远不如前者值得占有。古董被收藏一般是因为它们有艺术、玩赏、历史价值，是些谁见了都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一件件摆开就成了摆设，令主人赏心悦目，令访客心生羡慕。特纳（Gerard Turner）曾指出，那些放置在精品柜中的物件未必向所有的世人宣示主人的权力，但却一定会给对他近旁的人留下深刻印象。〔１９〕收藏家马未都谈到自己八十年代初收藏古董时的心情，也是一个“喜欢”。他当时买清代中期的瓷器帽筒，“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涨个什么价，当时就是喜欢。”〔２０〕对他来说，收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或

者是一种占有欲。”〔２１〕占有欲是在见到了好东西时才会产生的欲念。在许多收藏者那里，古董物件就是本身讨人喜欢的好东西。当然，在做古董生意的人那里，古董物件也会变成能挣钱的“好”东西。马未都先生后来做文物生意，自己察觉到心态变了，“过去买东西，前提是我喜欢，经营之后你有的东西并不喜欢，但你认为它可以赚钱。”〔２２〕

文革物品收藏者收藏文革物品，似乎很少是因为“喜欢”的原因。与艺术品的古董文物相比，绝大部分的文革文物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商品。要是这些物品值得把玩欣赏，值得长期占有，当初人们何至于将之弃如敝履？现今对文革文物的介绍几乎没有不是说它们现在或将来会如何如何值钱的。这些介绍也会强调文革物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但那只是为了说明这些物品的“升值潜力”，目的还是为了脱手而不是鼓励占有。这种赞美和打广告是一个性质。〔２３〕文革文物收藏有明显的商业谋利性质。这使得它和古董文物收藏的消费性质颇有差别。以保藏、自用、占有为目的的古董文物收藏是一种“奢侈浪费”，而以保值、囤积、营利为目的的文革文物收藏则成为一种投资消费。

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再一个区别是收藏目的。在收藏中，“喜欢”和“值钱”这两种不同取向决定着个人趣味在收藏行为中的不同作用。“喜欢”只要考虑到收藏者自己对某一物品的喜好，而“值钱”则要考虑到他人对这一物品的需要。同一个物品，需要的人越多，也就越值钱。随着资讯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古董收藏在内的收藏越来越多地受经济利益的支配。人们在收藏上的好恶往往是跟着经济指标去走：“过去资讯不发达，也没有拍卖行，有人花很高的钱去买东西的时候也不被人知道。现在的商业行为有很多是公开的，有点儿象股市挂牌交易，拍卖行的每一次拍卖纪录大家都看的见，这样会导致某一种东西，比如最近这个东西上涨得很快。以前买东西别人不知道，这都属于个人消费的魅力。而对于现在来说，社会的整体牵制很大，整体的导向很大。”〔２４〕

物品的审美价值越高，同时又越希罕，收藏者就越喜爱，越想自己占有。古董藏品中这样的物品相对就要多一些。相反，审美价值一般，而又并不那么太希罕的物品，只有大量囤积，才能刺激它的价格上涨，而且有了价格，仍然不等于又就有了价值。文革物品往往就属于这一种收藏。古董文物之所以招人喜欢，让人想要占有，是因为它又好看，又有用。有古董的，在家里摆上几件，既可赏心悦目，又有助于物主的人品形象。文革文物就很少有这种功能，用毛像章、毛语录、毛像、文革小报、语录歌等来装饰家居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收藏文革文物往往处于投资或赢利的考量。收集文革纸品和像章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可以达到几十上百，有人说这是一种专门研究。其实，文物收藏和历史研究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行为，前者是个人的获取，而后者则是公共的话语。前者导致排他性的占有（是我的就不是大家的），而后者则导致容他性的共同分享（研究结果是我们大家所有）。研究物品的条件并不是占有物品。

三，文革文物和怀旧

文革物品除了是投资或待价而估，确实还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怀旧心情。人们如何对待文革物品，记忆的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过去的人和事，我们不可能全都保存在记忆中。我们所记忆的往往是我们所选择记忆的。我们往往通过对物品的取舍规

划自己的记忆，事实上，这种取舍本身就是一种记忆。每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物件作一些清点，在搬迁时往往会很无奈地被迫彻底清点自己的物件。我们总是保存那些“有用”和虽“无用”但却有“保存价值”的东西。后一类东西往往就与我们意欲保存的记忆有关。我们保存这些东西，主要是因为我们“喜欢”。同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放弃我们所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出售、廉价处理或者乾脆丢弃。文革以后，绝大部分的文革物品就是被这样丢弃的。文革中，这类物品大量积存在人们家中，往往并不全是因为有用或喜欢，而是人们没有合适的方法去丢弃它们。你可以把旧报纸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但是象《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这样的印刷品就不能这么处置。凡是有毛画像的物品都得格外当心，意外毁损这些物品会给人带来麻烦或者甚至灾祸。在文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物品取舍与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是被扭曲了的。

由于文革后文革物品很少被当作有用或喜欢之物保留下来的缘故，它们才成为今天收藏的对象。收藏和保存是有区别的。保存是指继续拥有自己原先已拥有的。收藏则是指从别人那里获得，并占有自己原先并不拥有的。收藏比保存更需要积极地判断物品的价值。虽然收藏判断物品价值的原则仍然是“有用”和“喜欢”这两条，但“有用”这一条却更多是指“值钱”，而不是可以继续使用。收藏比保存更能体现选择的自由。你只能保存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但你却可以选择获取你以前并不拥有的东西。文物市场并不是一个纯自由选择的地方，它受金钱的左右。在文物市场上，文革物品从原先的政治秩序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被放进了一个由金钱左右的秩序之中。

在市场这个由金钱左右的秩序中，一切物品都是商品。文革物品和“四旧”物品曾经是对立的，现在却成了差不多同一类的物品。由于文革对“四旧”物品的极度破坏，许多原本十分平常的物品因现已稀少而变成了收藏的对象，如老式旧家俱，窗饰，铜器杂件，年画招贴，书本报刊。一切能从当年“破四旧”运动中残存下来的物品，一起都进入了文物市场。在文革中，文革用品原本是用来代替和破除这些“四旧”物品的，可是现在却和它们陈放在一起，同样成为文物。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这两种“文物”的历史差别，但是这两类不同文物的区别还是能从它们不同的怀旧作用上反映出来。

怀旧和喜怒哀乐一样，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感情需要。和其他形式的人之常情一样，怀旧是人对环境作出的反应。怀旧之情因人、因事、因地而变化，一首歌、一首诗、一本书或一件物都可以勾起人的怀旧之情。一般的古旧之物引起的怀旧是很空泛的，它并不把人们引向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文革物品所引起的怀旧却一定会把人们引向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人们往往会关心文革物品收藏内含的思想倾向问题。有人从中看出对“毛时代”的“复旧”意义上的“怀念”。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怀旧和复旧毕竟是有所区别的。“复旧”需要营造一个值得光复或发扬光大的传统、过去、文化或文明。为此，复旧需要借助一些具有公共意义的符号、象征或神话，以形成某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集体身份和目标。〔２５〕

和复旧相比，怀旧就要私人化得多，它主要是一些并不直接涉及集体过去和现在关系的“个别”记忆或回忆。这里的个别不一定指个人，也可以指有相似背景的实实在在的一群人。怀旧的代表形式是各种对“旧事”的回忆，如小说、回忆录、亲身经历记或故事，乃至旧友聚会聊天、信件交往、旧物的保藏和交换、收藏等等。怀旧是

一种回顾，是在调解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找寻一种面对过去的心态。复旧非常自以为是，怀旧则不同，“它可以是自嘲的、幽默的，在它那里，追怀和批判并不对立。回忆过去的苦难并不妨碍保持同情心，希望和批判性反思。”〔２６〕

现今的文革回忆往往带有明显的怀旧色彩，是一种个人“寻踪”式怀旧。说这种怀旧有私人性质，不是说它总表现为一个人的独思。事实上，私人性的文革怀旧总是在特定的人群中以许多公开形式出现的。私人回忆的公开出版就是一种。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在书店里一下子卖到脱销，就证明了她的个人回忆引起了极大的公众回响。老三届学生的各种聚会也是怀旧的一种公众形式。俄国作家扬克尔维奇（V. Yankelevitch）曾把怀旧称作是“与自己重逢”，用到老三届聚会是再贴切不过了。〔２７〕一起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老同学，下岗的下岗，退职的退职，常常在闲聊中对过去的蹉跎岁月嘘唏不已。在他们的怀旧中，没有什么可能恢复，也没有什么值得恢复，有的倒是许多自嘲和无奈。这种怀旧的情感在老三届之外的人群中也相当普遍。

文革怀旧的“与自己重逢”往往会超脱怀旧者的理性喜恶和是非判断，变成一种几乎是本能或非理性的冲动。越是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人，往往反倒越是会执意保存或收藏一些与文革有关的物件，越是不自觉地让文革继续左右他们的行为和思想。纽芮在她的自传小说《上帝吹动的羽毛》中生动地记了类似的情况。纽芮的父亲是二次大战时的美国军人（一位美籍华人）。他随盟军进入德国，认识了纽芮的母亲，一位德国姑娘。他们后来一起回美国，结为夫妻。纽芮的母亲强烈认同德国和德国文化，但是痛恨纳粹。母亲从小给纽芮念格林童话，教她哼唱德国歌曲。在纽芮十七岁刚上大学那年，有一次去一位教授家作客。纽芮记道：“我哼着曲调帮教授夫人洗碗。她狠狠瞧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教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哼什么曲调。我对他说，大概是一首德国老歌吧，我母亲做家务时常常哼它。教授说，‘这是一首叫 Horst　Wessel 的歌，是纳粹的党歌。”〔２８〕教授的话让纽芮回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往事。纽芮和她母亲去一家唱片商店。她母亲看到那儿有德国纳粹的进行曲出售，十分惊讶地说：“我简直不相信他们这儿还卖这个。”她母亲买了那唱片。纽芮描述她母亲听那唱片的神情：“（母亲）一脸的迷茫和感伤，只有那些看到故物回想往事的人才有这样的神情。”〔２９〕母亲告诉纽芮，“怀乡”、“怀旧”这样的词都表达不了她的心情，但纽芮却能从她母亲特有的哼唱中领会这种心情：“我母亲的声音很甜美，她老是唱歌－－都是德国歌。我特别喜欢一首叫 Lili　Marleen 的歌。母亲总是只哼曲不唱词。她总是很慢很慢地哼 Horst　Wessel 这首歌，听上去像是一首失恋忧伤的曲子，一点不象战斗进行曲，‘高举旗帜！团结坚强！冲锋队员迈开坚定的步伐.’我后来在书上读到了这首歌的歌词，跟我母亲那忧伤的曲调简直配不起来。”纽芮想起了英国作家（Virginia　Woolf）说过的一句话，“一片薄荷叶，一个戴蓝圈的杯子，带回了童年的回忆。”“母亲所知道的那个德国就是纳粹德国，她的整个青少年都是在（纳粹党徽）下度过的。母亲看到纳粹党徽，就想起了家。她没这么说，可我心里明白。”〔３０〕

和纽芮的母亲一样，文革一代人乃至稍微年青一代的人对文革的记忆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怀旧。在专制极权压迫下长大的人，连怀旧都是被扭曲的。不应该把这种扭曲的怀旧简单地理解为对文革的怀念。保留毛像章、红宝书或别的文革物品，经意不经意地哼唱语录歌或者样板戏，看一看新版革命作品的“红色经典”，都不过是一些

往日记忆跃动的征兆。对许多人来说，文革的中国是伴随他们长大的那个中国，除了载有文革符号的东西，他们的记忆再也没有其他的载体。这不是他们所能选择决定的，除非他们不唱歌，要唱就只有文革歌。

对文革真正的纪念和对文革的批判性反思都只能是通过公共讨论才能建立。它们也都将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在文革讨论仍是禁区的今天，不存在建立这种集体记忆共识的机制。代替它的是一些零散的个人记忆。个人记忆混杂着官方过去营造的象征符号和来自往昔个人经验的碎片："一行诗句，一个形象，一幅场景，一缕气味，一支曲调，一个声调，一个字词。"〔３１〕记忆的个人情感色彩往往不能用理性的分析语言充分剖析。在私人收藏中，"我们进入了一个神话和隐喻的诗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生活在混沌的经验之中，并将它转化为一种个人的意义，收藏所具有的正是这样一种转化力量。收藏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成一统的私人世界，就像是映照我们身心的镜子。（私人的）收藏成为我们人生旅程的外在现实，那些来自过去的个人纪念品和家传遗物曾一度属于我们某个重要时刻的生活。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有了那些重要的时刻。我们千方百计想要完整地保存这些收藏，把它们传给自己的子孙或送进博物馆里去。这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希望，不至在这世界上白活一场。"〔３２〕

然而，即使是最个人化的记忆，也必然发生在某个社会框架之中，这是别人理解这一记忆的根本条件。正如维高斯基（L. Vygotsky）所说，人之为人，不是因为人有"自然而然的记忆，"而是人必须通过文化符号方能记忆。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文化符号便能在人的头脑中触动有意义的思想，这就是记忆。〔３３〕我们今天正是通过社会性的文革文化符号去理解个人性质的文革怀旧。这些文革符号已经失去了控制人们思想的能力，但却仍然时时在触动许多人的记忆。就象 Horst Wessel 从冲锋队战歌变成了无词的哀伤曲调一样，毛像章和语录从革命宝物变成了八元十元的商品，语录歌和样板戏被摇滚起来，"红色经典"讲起了俗情故事。那些曾经是无比神圣威严的符号在市场上被拍卖，在大众娱乐中被戏谑，它们原先对人们思想的禁固和压迫作用反倒被忘却了，太轻易地忘却了。

四，物品文化、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公共运用

把发生在地摊上的文革物品交换称作为"文化"活动，是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说的："文化指的是代代相传的行为和信念，这些行为是自律的，共有的，以符号为表征的。并不只是受过精英教育的人，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人。人是文化的动物，但是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受不同的教育长大。……文化指的是人的习惯信念和行为，以及通过学习而内在化了的行为规则。"〔３４〕从这一文化观来看，无论是"买卖"或"收藏"文革物品都是文化行为。但是，这两种行为有各自的特征。在今天的中国，买卖和收藏文革用品，看上去只是买卖和收藏的习惯性行为，却包含着对文革的特殊记忆。买卖和收藏行为在一般社会中都包含着非强迫性的个人选择，但这种个体选择的自由恰恰是文革物品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所极度限制的。今天，买卖和收藏却在以自己的一般行为习惯把文革记忆化解为纯个人的消费和无思想的记忆。文革物品不仅仅是人们在文革时期所制造和使用的物品，而且还是那个时期政治、社会秩序的体现。文革物品是那个时代文化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帮助形成了那个时代人们与自由选择格格不入的习惯性信念和行为。文革物品从日常生活物品变成了地摊

上的商品，并没有就此完全退出日常生活，因为地摊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物品仍然联系着文革时期和今天这两个看似已经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这一联系首先应当使我们注意物质文化在构建、维持和再生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文革物品为我们重新认识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一把钥匙，而这种新的认识又将有助于我们反思今天的物质文化。文革这个看上去是禁欲主义的时代其实是极端的物质主义。文革物品兴废中包含着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深层联系。物质禁欲和纵欲都是因为公共生活无法形成关于“正当需要”的共识，因而只能任凭权力和金钱左右。

当今中国文化批评热衷于研究现代或者甚至后现代商品社会的物质文化的同时，却远未能重视文革物质文化的研究。从文革物质文化对中国社会曾经有过的全面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效果来看，这种忽视所表现的政治迟钝与文化批评应有的社会、政治使命形成了极具讽刺的对比。这种忽视甚至造就了文革“崇尚精神，抵制物质”的神话。从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的紧密关系来看，很难找出一个比文革更物质主义的时代。文革的所谓精神秩序，包括这个精神秩序所特有的权力压迫形式，恐惧和暴力的政治文化，屈从和奴役的生活方式，都是由体现为文革物品的物质来维持和再生的。今天文革物品可以向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日常生活秩序的实证。

文化研究所关心的一个特殊的问题领域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指的是普通人的经验、常规、态度和信念，他们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方式，他们的生存利益以及由此而进行的意义和价值判断活动等等。杰克。道格拉斯（J. Douglas）和其他日常生活研究者认为，研究日常生活着重在“体验、观察、描述、分析和交流在实际处境中相互作用的人们的情况。”〔３５〕如果我们把文革物品放到历史中去考查，把它们同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秩序联系起来，我们就不会片面地强调它们的审美价值，如“主席瓷”的精工细作、样板戏的“艺术价值”、宣传画的艺术成就，等等，我们就会把研究兴趣从审美问题转向生活中不断重复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的社会生存环境。这包括关注普通人生活中有意义的规律，他们反复的行为，他们购买、使用或收藏的物品，他们喜爱和关心的新闻、文化节目和娱乐消遣，并从中解读他们的需要、价值观、求变意向等等。

文革物品早已退出了今天的主流物品秩序。在今天的物质秩序中起着社会和权力等级符号作用的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革命意识形态，而是金钱财富和特权的结合。处在这个新秩序边缘的许多文革物品的确可能以其“朴实无华”衬托出当今中国物质生活的奢华无度，甚至成为对当今物欲横流、道德糜烂、官贪政贿的无言谴责。这是许多人对文革时代有所怀旧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人出于对现有的物质文化和由它生产、维持和再生的社会等级和特权秩序的不满，在想像中投射出一种与现今相反的文革物质文化。但是，这种对比也会忽视文革和文革后物质文化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代表一种等级秩序，在背后支撑这一等级秩序的都是一种权力政治或金钱。

文革物品，乃至文革日常生活“朴实无华”的印象，正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固定化为一种“史实记忆”。随着文革时代离我们远去，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有直接的文革亲身经历。人们对待文革的态度呈现出文革刚结束后几年所没有的复杂性。同样的情况也在二战结束几十年以后的德国发生过。八十年代末，针对将纳粹时期“平常化”的

思潮，哈贝玛斯就提出了“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历史地对待纳粹时期”的问题。当时的德国和现今的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一方面是一些德国人不愿生活在纳粹历史罪疚的阴影下，要求将“过去正常化”，另一方面是另一些德国人更加顽强地保持对大屠杀的记忆，为犹太人的苦难申诉。〔３６〕２００４年９月，德国上映了“人性化希特勒”的影片《灭亡》，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历史的公共运用”问题的争论。八十年代的德国已经和二战后雅士伯写《德国罪过问题》时有了很大的不同。〔３７〕一些曾为纳粹统治服务的艺术品在“真实历史”的名义下，被不加批判地公开展览，一些历史学家也开始以“平常心”回顾纳粹时期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哈贝玛斯坚持，雅士伯向德国人民提出的罪过问题仍然有效，在历史的公共运用问题上，每一个人都必须以“第一人称”来面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无法以不参与者”的身份置身事外。这和那种以“第三者”身份进行的科学、学术、艺术、审美、鉴赏等等旁观是完全不同的。〔３８〕

在今天的中国，对文革暴力、恐惧和极权罪恶的记忆继续受到压制。与此同时，这种记忆正在受到另一个方面的威胁，那就是对文革时期的种种“正常化”或“日常生活化”。文革文物收藏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对文革中那些曾充当极权统治的工具（从毛像章到样板戏），人们正在以第三者的态度去消费、欣赏或观察。官方权力在禁止文革批判的同时，允许文革物品作为现代文物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市场的力量协助官方权力完成了对文革物品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把它们变成了唯金钱是价的文物和藏品。今天，被日常生活化的文革藏品变成为只是具有“审美特征”、“艺术价值”和“民族传统特色”的历史物件。文革物品收藏正在抹掉文革物品身上的专制统治印记，将它们漂白美化，把它们纳入了对文革的无害记忆。

文革物品通过文物市场重新回到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尽管所涉范围不大，但确实能起到一些保持文革记忆的作用。应当看到，这种作用只是商业行为的副产品。这种有限的记忆保存作用依附于边缘性的地摊大众文化，还远远不是一种对历史的公共运用。文革物品的商品化有助于破除文革极权所营造的种种意识形态神话，如领袖的英明伟大、某某主义永得人心、某某理想传承万代等等。文革物件收藏可以帮助保存文革时期的历史证物，防止它们进一步地散失。保存历史证物是保存历史记忆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方面，这对今后社会、政治、文化性的历史研究是会有帮助的。但是，仅仅通过地摊式的文物市场来保存文革证物却可能造成一种关于文革的肤浅而有害的公共意识。深刻认识文革的公共意识，必须在对文革历史的公共运用中去形成，产生这种公共意识的公共空间必须包括自由而开放的讨论、研究、不受权力限制的历史教育、博物馆、公共论坛和各种反思、纪念形式。在这些公共空间中被展现的军用皮带将是一件残害过活生生受难者的凶器，而不再是文物地摊上的一件有价商品或者一件历史清白、意义平常的纪念品。

强调保存文革的苦难和创伤记忆，目的是为了避免类似文革的人道灾难再次在中国发生。对此有人会反驳道，文革记忆应当是多样的，既应包括苦难经历记忆，也应包括非苦难经历记忆，包括非道德判断的中立记忆，甚至包括“阳光灿烂的日子”式的怀念记忆。对后两种记忆者，我们要问，如果你们的亲人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死于非命，家破人亡，你们还会坚持无动于衷和积极赞美的文革回忆吗？他们中也许有的人会说，我的生活中事实上没有这些苦难经历，我为什么非要跟自己过不去，非要假设自己有这种苦难经历呢？我们的回答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你有道德义务为受难

者设身处地着想。哪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人人有同等的苦难经验，但是哪一个社会能因此而漠视他们共同的苦难经验呢？不同的社会之间之所以有区别，乃是因为一些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有同情心，而另一些社会则没有。没有直接苦难经历者对有此经历者持有深切的关心和同情，这是一个正义和正派社会的根本标志。

今天以公然的道德冷漠奢谈文革记忆的“多样性”，公然拒绝文革苦难记忆的特殊意义，这种冷漠和拒绝发生在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呢？即便在文革时期，也还有人冒着引火焚身的危险保护与己无关的受难者。难道今天的中国社会反倒连文革时都不如吗？没有一个社会是人人吃苦的，但没有一个社会是不需要同情的，是不需要强者关怀弱者的。社会正义和群体记忆向社会弱者（受难者）倾斜，为的是更多、更有效地保护弱者。这是任何一个正派社会存在的道德理由。人的社会存在并不只是因为相互有利用价值，而更是因为人的社会性可以使人在帮助弱者和保护弱者的过程中，提高共同的人性水准。阿伦特说过，人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人能够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比自然状态要高的高度，那就是人的高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有人性。”〔３９〕人的自私冷漠也许是一种“自然状态”，但是，人之为人，不在于他的所谓自然状态，而在于他那超越自己自然状态的能力。对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同情就是这样一种使人高尚于其他动物的能力。对文革的历史批判，它所针对的正是文革暴力、恐惧对人性的摧残和把人异化成为只具生存本能的冷血动物。

经济市场利益与对文革的历史批判是矛盾的。经济市场总是强调文革物品的所谓内在审美价值或奇货价值，用以抬高其商品价格。这就会有意无意地把文革物品展现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成就，并进而使文革时期本身得到美化和合理化。不加批判地接受文革物品，实际上也就是全盘接受文革政治权力给这些物品所规定的价值意义。现今的文革物品收藏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带有文革意识形态图记的物品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当时以毛神象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秩序，其实是在继续维持这种生活秩序整一和谐的神话。这实际上也是在否定文革时期异类物品和反抗文化的存在。文革中的异类物品，如与军装相异的个性型服装，拒绝革命图志的用品用具，暗中保藏的“四旧”物品，这些都目前的“文革物品”收藏所排斥的。

物品对于记录历史有重要的作用，但历史并不全然记录在物品之上。仅从物品本身来看，它们记录的只是一个表像的秩序。物品秩序的历史意义，尤其是那种具有批判价值的意义，往往要从表像秩序下去发掘。文革的真正意义并不记录在那个由革命图记所描绘的光明和谐图景之中，在这个光明和谐的表面之下，深藏着苦难、残暴、恐惧和压迫。不涉及这个层次，关于文革的公共意识定然不会完整。要涉及文革历史的深层意义，除了物品，还需要有另一种记录，那就是关于历史的“述”，尤其是那些关于“不能言说的真实”的见证述：历史事件的实情，受害当事人的实际遭遇，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恐惧和暴力，那些关于无数人肉体折磨、思想痛苦、人性扭曲和灵魂苦难的真实记忆。这类见证述现在还很难进入当今中国的公共言说空间，这是文革文物市场上的有心人应该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的中国生活现实。

注释：

１.《中国大百科全书》第４２卷，文物，博物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会，１９９３，第１－２页。

２．Jurgen Habermas, The New Conservati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0, p. 298。
３．Martin Prosler, "Museum and Globalization". In Sharon Macdonald and Gordon Fyfe, eds., Theorizing Museums. Oxford: Blackwell, 1996。
４．David Murry, Museum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Use. Glasgow, UK: James MacLehose & Sons, 1904, p. 231。
５．Neil Harris, Museums, Merchandising and Popular Taste: The Struggle for Influence. In I. M. G. Quimby, ed.,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Michael B. Miller, The Bon Marche: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 1869-192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６．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Spring 1986), 批判。２６。
７．８．９．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28, 100, 6.
１０．Tony Bennett 也很重视这种折衷性的场所，他所举的例子是有固定地点的游乐园，ibid., p.4。
１１．P.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in Prac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J. Baudrillard, Le systeme des objets. Paris: Gallimard, 1968。
１２．沈泓：《文革瓷》，节录于《中国文物报》http://www.china-culture.com.cn/ww/js/10.htm，０４／６／１８。
１３．廖国柱:《革命宣传画升值空间有多大》，www.homewat.com.cn，２００４／５／１３。
１４．报导者就此写道，“文革”宣传画当年数不胜数，但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当年售价不超过２角钱的宣传画现叫价高达七八百元，２０多年间升值４０００多倍。一张一开、半开带毛泽东头像的宣传画价格分别为２００元、１００元左右。“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有如此高的升值潜力，被许多收藏家看重。” 廖国柱:《革命宣传画升值空间有多大》。
１５．J. Alsop, The Rare Art Traditions: A History of Collecting and Its Linked Phenomen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6。
１６．《“文字”邮票资料》，出版者不详。
１７．see www.taobao.com
１８．《文革文物，火爆收藏界》，www.china-shaoshan.com/shop/wgww.htm. 原载《四川经济日报》，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日。
１９．Gerard Turner, "The Cabinet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 Olive Impey and Arthur MacGregor, eds.,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5, p.214。
２０．２１．２３．２４．姜丰:《艺术品的收藏与经营》（上、下），姜丰主编:《凝视：走进〈文化视角〉》，渖阳：渖阳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７－２６８页。
２２．例如，据《四川经济日报》介绍，“新加坡着名心理医生杨新发，数年来珍藏过千，卓然成为中国‘文革’瓷器专家。……杨医生举办了一个‘火红的年代’展览，

他将展出的２００件收藏品，归纳为１３个主题。杨医生的收藏说明了‘文革’瓷器的增值之快。１９９４年，他以９，０００元购得毛泽东笔筒，４年后市场价值９万元。这是因为“文革”艺术品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水平很高，因此很多陶瓷的价格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就上涨１０倍。１９９５年，他在本地的一个拍卖会上，又以５０００元买了个特制给毛泽东欣赏的芙蓉碗，３年后，这个碗的身价高达５０，０００元。”《文革文物，火爆收藏界》，《四川经济日报》，２００３年7月２０日。

２５．我这里所说的复旧和怀旧的区别大致可以用波茵姆（Svelata Boym）所说的“恢复型怀旧”和“回顾型怀旧”的区别来加以说明，因为复旧其实也是一种怀旧。恢复型怀旧是一种表演和表现型的怀旧，它追寻和演示的不仅是原初，而且是完美的原初，这样怀念过去才有纯洁感，才能给人带来骄傲。它本能地排斥一切不完美、不美好的东西，诸如历史的荒诞和失误、失败和挫折、破坏和自我作贱等等。文革就是恢复型怀旧很想从历史这本大书里撕去的一页。恢复型怀旧要把文革中破坏掉的许多毁坏的古迹“恢复如初”，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不仅如此，它还要营造各种分明是假古迹的“主题公园”。在它那里，只要有演示传统的符号价值，文物的真伪是不重要的。回顾型怀旧则明白一个道理，即修复的过去已经不再是真的东西。它知道“似真”和“真”的区别，所以它往往对记载过去遗址和往事的旧影集会情有独钟，这些影集向人们展示的断垣残壁和生活痕迹早已经从人们眼前消逝，它们的遥远和陌生留给每个读者的是他个人的或与他有共同生活经历者独自回味的空间。这个空间和热烈亢奋的恢复型怀旧表演戏台是完全不同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恢复型怀旧表现为各种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这种怀旧的基础是某种虽失落但仍可复元的具有本质特征或群体凝聚力的传统、文化或文明。恢复型怀旧会形成文化主张（如“新儒学”）、政治或经济理论（如“亚洲价值”）或者知识话语立场（如“后殖民”、“本土主义”等等）。见 Svelat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p. 41-48, 49-56。

２６．Svelat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pp. 49-50。

２７．Vladimir Yankelevitch, L'Irreversible et la nostalgie. Paris: Glammarion, 1974, p.302。

２８．２９．３０．Sigrid Nunez, A Feather on the Breath of Go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5, pp. 55,56,57。

３１．Svelat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p.32。

３２．Susan Pearce, "Collecting as Medium and Message". In Eilean Hooper-Greenhill, ed., Museum, Media, Messag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21。

３３．Lev Vygotsky, Mind i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３４．Conrad Phillip Kottak, Cultural Anthropology, 4th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35。

３５．Jack D. Douglas, et al.,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Boston: Allyn & Bacon, 1980, p.1。

３６．３８．Jurgen Habermas, The New Conservatism. pp.230,237。

３７．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New York: Capricorn Book, 1947。见徐贲：“国人之过和公民责任：也谈文革忏悔”，《二十一世纪》网路版，第９期，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号。

３９．Hannah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7, p.455。

遇罗克、文革和中国当前的维权运动

遇罗文

在“文革”四十周年前夕，最近我接受了德国第二电视台。英国 BBC 广播电台，和香港有线电视台的采访。尽管他们对“文革”的关注点不一样，但是都提出同样一个问题——需要不需要纪念“文革”，不纪念它有什么危害？恐怕这也是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首先想到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低智商——“文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不纪念那还有什么可纪念的吗，这不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吗？

之所以对常识有了疑问，根源在于中共当局最近公开宣布禁止有关“文革”的纪念活动。禁止就够荒唐的了，禁止的理由更是荒唐可笑，居然是为了安定团结。

到底想让谁和谁团结呢？要让“文革”的受害者与杀人打人的凶手们去团结吗？如果这个逻辑能成立，那么南京大屠杀甚至抗日战争也不用纪念了，以免影响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与被残害的中国人的团结；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也不用再开办了，以免影响希特勒之流的纳粹分子与犹太人的团结……

禁止纪念“文革”无非是强迫人们去遗忘，这是可能的吗？我在调查北京大兴县大屠杀事件时遇到这么一件事：

有一位女士（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在那次事件中她的亲人都被杀害了，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后来她虽然有较好的工作，但是始终没有结婚。许多亲戚朋友帮她说媒，劝说她，也无法把她从痛苦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她解释说，一想到死去的亲人们，她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如果成立了家庭，这种情绪能给别人带来幸福吗？

不去追讨肇事的元凶，不给受害人满意的说法，想让人忘掉这段历史，可能吗？也许有人会天真的想：不是有“落实政策”这么一说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把这种所谓的“落实政策”刻画清楚了。

五年前我采访了揽杆市事件的受害人李文波亲属——李文波的小儿子李玉海先生。经历过文革的北京人都知道崇文区榄杆市事件，那时正是红卫兵抄家打人刚刚兴起的时候。突然传说李文波用菜刀报复了红卫兵，中共政权立刻演绎成阶级敌人行凶反攻的事例，于是红卫兵大开杀戒就有了借口。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不算，几天以后周恩来主持的公审大会上，又把已死的李文波和还没被打死的李太太宣判了死刑。

事实真相是李文波根本就没伤害任何人，红卫兵打了他半天他都没有反抗，只是他太太刘文秀想去上厕所红卫兵不允许还打他太太，他才急了，想去保护她。

李文波夫妇冤死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平反”，李玉海先生得到的无非是

法院打印的一页纸，除了一通废话以外有用的只是“无罪”两字。李文波以前是东北军主管财务的官员，家中资产不可谓不多，红卫兵抄走了的古玩字画存折全天下落，可笑的是一个花旗银行存折，内瓤全没了，只剩个空壳还给了李玉海。人白死了不算、连财产也没要回来——这就是落实。

李玉海先生现在在一所区办大学教书，妻子又有病，生活十分困难。而残害李文波的大小凶手们，无论是宣判的周恩来还是诬陷李的女红卫兵，还是动手打死人的红卫兵这些群体灭绝罪的凶手们，至今没有一人受到惩罚，哪怕仅仅是官方文字上的谴责！

让受害者忘掉“文革”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不想，忘掉文革对谁有利？毫无疑问，施害者最希望受害者得健忘症。傻子都能明白，希特勒和他的党卫军们，就希望犹太人不记得大屠杀这回事；东条英机和军国主义分子，也希望没人提南京大屠杀。如果他们还掌着权，如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给受害人平反的话，恐怕受害者也就和李玉海先生得到的差不多。禁止受害人对受害经历的纪念，就正如王友琴女士所说的，那是“不正义的延续”。

我的哥哥遇罗克仅仅因为一篇提倡平等的文章被判了死刑。二十七岁的年轻生命就被活活剥夺了，所谓“补偿”也就给了两年的学生工资约三千块人民币。抄家时公安局拿走的日记，我家多次索要至今不还。

众所周知，遇罗克是反对血统论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血统论所以那么猖獗，除了毛泽东及其官僚们长期推行的效果以外，文革时闹腾最凶的是个叫谭立夫的大学生，他极力鼓吹血统论，以至那些杀人打人的红卫兵凶手们，常以谭立夫讲话当行事准则。到了二十世纪末，谭立夫又成了共产党的高官，不过是改了名换了处，成了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还写了书，依然得意“文革”时的辉煌。

我在调查大兴屠杀事件时也发现，那些屠杀事件的策划者们，现在活得都挺滋润，原先在公社任职的，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这些人和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不喜欢谈“文革”。他们有资格让受害人忘掉文革吗？正如纳粹分子让犹太人忘掉死亡集中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让中国人忘掉南京大屠杀，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

既然明白了禁止纪念“文革”对谁有利，自然也让人想到对谁有害。

对“文革”时期的受害者有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起码有悖于公正的原则。但是更多的受害者则是那些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人。由于禁止纪念“文革”，与“文革”有关的纪实文学、记录片、小说、电影、教科书就无缘于人见面了，“文革”后出生的人对“文革”的知情权被剥夺了，他们就无从吸取文革的反面教训，一旦再卷人类似“文革”的狂热反常事件中就会毫不察觉。尤其是毒害人们已久而又易于接受的暴民意识会滋长蔓延。

也许有人会乐观地认为，类似“文革”时期的残暴行为可能不会发生了，毕竟今

天已是物质文明极大提高了，外部环境的精神文明也有了极大的进步。我只能遗憾的说，这是您的一厢情愿。就看看当前人们对野蛮行径的麻木不仁，我们感觉不到比“文革”时期的愚昧强了多少；看看最近震惊中外的苏家屯事件，我简直就感到又回到了“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文明国度难以想象的事件，其中主要原因是，犯了群体灭绝罪的人在中国从来没得到过制裁，丧失人性的凶手们就会有恃无恐。今天他们对付的是法轮功学员，明天也许对付的就是你或我，找个借口太容易了，文革时这种例子还少吗？结果还不是人人自危，多数人都成了受害者！

几年前我写了本小说。名字是《复仇者》。说的是一个小孩，经历了“文革”时的恐怖，全家人都被杀害了，后来他变成了复仇者，靠知识陆续杀了二十几个残害过人的凶手。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这个小说，他们认为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其实正相反，如果靠不健全的法律不能维持社会的公正，起码也应该有另一种途径可能维持这种公正，这样的好处是坏人会有所顾忌，从长远上说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可悲的是由于没有在国内进行过对“文革”的仔细认真地探讨，当局匆匆忙忙下了结论，接着连讨论、纪念、回忆一切与文革有关的活动都被逐步禁止了，许多人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这种“害”不仅是物质和精神的，也应该包括道义和名誉的。

从更广泛的意义说，禁止纪念“文革”有害于全体中国人民或者说中华民族。这种不正义的延续，最终受害的还是整个民族。

有句俗话叫“以小比大”。我在调查大兴事件时还发现，屠杀最残暴的两个大村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其中一个村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别的村庄引进外资很容易，外商到了我们村一听说以前发生过的事，人家扭头就走了，至今也没有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建立在这个村。

幸好有今天这样的纪念活动，还能让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中国人不是都那么麻木不仁，都对野蛮行径无动于衷，换句话说不是都那么没出息，从而能让其它民族对中国人瞧得起。既然咱们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个伟大文明的民族，起码应懂得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正义不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都对“文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其它民族能尊重我们吗？

至到今天，我依然十分敬佩我的哥哥遇罗克，在血统论横行中国的时候，不幸的是只有他一个人写出了一篇文章，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除了为虎作伥的全处于失语状态。罗克为整个民族争了光。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脚踏实地的维权运动，尽管他们没有被枪毙的危险，但是我还是十分敬佩他们，因为他们也要顶风冒险，需要大智大勇，同时我也知道他们的工作是艰难的，有人为此受到了酷刑。由于有了他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才不辱没文明古国的称号。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文革”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遗憾的是不能来参加这次会议，这又是一次中国人民的不幸。在此我用罗克的一首诗来结束我的发言并与他们共勉——

千里雪原泛月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夜亦迢迢路亦长。

（遇罗文，发明家，北美中文作家和独立文革研究者。遇罗克、遇罗锦胞弟，1948 年生。童年时，赶上家庭遭遇磨难；文革初期，为宣传遇罗克写的《出身论》，创办《中学文本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 6 年。先后在陕北、东北插队落户，当过木匠、会计，盖过医院，办过工厂。1979 年平反回京，才有机会从事心爱的发明创造。近年与其弟遇罗勉合作研制的高压水切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

评毛泽东热——写在文革四十周年

胡平

一、毛泽东热貌似民间自发，实为官方诱发

毛泽东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二十世纪的三大暴君。虽说今日中国的毛泽东热到底有多热不无争议，但是，既然在第三帝国覆灭后的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俄国没有斯大林热，而直到毛泽东死去三十年后中国却还有毛泽东热，可见毛热确实是独特现象，是需要我们分析和解释的。

其实，我上面的叙述就已经暗含了答案的线索。第三帝国是被盟军打垮的，希特勒战败自杀，德国被盟国占领，纳粹的罪恶受到彻底的清算。赫鲁晓夫代表苏共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的尸体被迁出红场火化，斯大林的错误受到虽然不彻底但也十分猛烈的批判。而在中国，毛泽东却被中共当局作决议七三开，继续奉为伟大领袖，对毛的公开批评刚启动就减速就刹车，此后就是对毛的颂扬（尽管调门有所调整）。毛的画像至今仍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俯视众生，毛的遗体至今仍安放于天安门广场中央供人瞻仰。中、德、俄三个国家的政治气候是如此不同，无怪乎有毛泽东热无希特勒热无斯大林热。

不错，正如陈小雅指出的那样："在毛去世以后的，最早把毛泽东再次请上'神坛'的，并非他的'家臣'，而是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他们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操控的命运。"

但必须补充的是，这里的"命硬"，是要把毛死后的命运也包括进去的。斯大林也横行霸道，也寿终正寝，但死后却被焚尸扬灰，于是威风扫地，神光褪尽。按说，邓小平是被毛两次打倒的人，理当比赫鲁晓夫更赫鲁晓夫；事实上，邓小平在许多政策上（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的非毛化要比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走得更远，可是邓小平们却还是要继续供奉着毛的神主牌位不敢动，这岂不更加证明了毛的"命硬"？设想，假如毛死后的命运和斯大林一样，也被斥为暴君全盘否定，也被焚尸扬灰，举国上下深揭狠批，再加上老婆被抓，侄子被囚，毛该受到何等的嘲笑啊！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还会有多少人叹服毛的"命硬"，把毛视为天下无敌的神灵呢？

由此可见，毛热的兴起，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却是被官方诱发的。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毛热不是官方有意制造的，它并不是官方有意图行为的产物，但确实是其副产物。

二、对毛的崇拜是对权力的崇拜

公车司机把毛视为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这说来实在荒唐透顶。普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人比毛更见不得老百姓平安过日子发财致富的了。为什么他们不拜别人要拜毛呢？就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不是比毛泽东更有理由被视为他们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吗？其实，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受到这些人的崇拜，不是因为他生前最保护人民的平安与财富，而是因为他拥有最大的权力，君临天下，作威作福（按：“作威作福”一词的本意是，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毛独揽生杀予夺的大权，人民的安危祸福全仰仗他老人家的意愿，所以必须顶礼膜拜。

公车司机挂毛象这件事反映了中国一种传统的迷信方式。在这种迷信里，一个人或一个神被崇拜不是因为他善良与公正，而是因为他强大，因为他厉害。崇拜实际上是巴结，是谄媚，是行贿。例如过去的拜龙王。在中国神话里，龙王从来不是善良或公正的化身。神话里的龙王多半是凶暴的，任性的。只因为它掌握着既能造福又能为祸的水资源，所以老百姓才不得不求它拜它。

为什么有毛热而无邓热？那当然不是因为毛比邓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为毛比邓更厉害，因为邓只是毛的下属，因为在权力斗争中，邓是毛的手下败将。对毛的崇拜无非是对权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纯粹的权力崇拜。这和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对毛的崇拜还有所不同。毛时代对毛的崇拜毕竟还包含有对毛思想的认同。那时，人们不但挂毛像，唱毛的颂歌，而且还读毛着读毛语录，表示要用毛思想武装头脑，照毛的指示办事，做毛的好战士。而上述公车司机挂毛像这一类毛热则无此内涵。他们之崇拜毛，仅仅是因为毛的赫赫权势而已。

在权力崇拜的迷信者的心目中，那些在人间显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死后会成神成仙，他们生前支配人们命运，死后仍然能够支配人们的命运。这和宗教信仰大不相同。宗教信仰大都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毛泽东生前作恶多端，那么，不论毛死后在人间还受到如何的尊崇，但是在信徒们心中，毛一定已被罚入地狱饱受无尽的煎熬。宗教信仰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矫正，而上述那种迷信却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继续与延长。

只要中共官方还在继续崇奉毛，迷信者们就会继续视毛为神化的偶像。李志绥写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后不久突然死于家中，就有流言说李志绥是遭了报应。这个报应可不是宗教信仰的因果报应，因为它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恰恰相反，它相信的是那个主宰中国人生死命运的暴君在死后依然拥有这样的力量，暴君生前不可冒犯，死后也不可冒犯。

三、要消除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

因为权力崇拜是以权力为转移的，所以要消除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象现在这样，对毛的清算与批判还只能在海外进行，在国内则只能零星地出现在非主流媒体，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毛的崇拜是对权势的崇拜，这种崇拜是不问善恶是非的，只要死去的毛还被后来的权势者们继续尊崇有加，我们对他的批判就不大可能动摇毛在那些崇拜者心中的地位，有时说不定还会引出相反的效果（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批判毛）。那些崇拜毛的人会想：毛真是

太厉害了。他干了这么多坏事，死了这么多年，别人还是拿他没办法，不管你们怎么揭露批判，还是不能撼动他的神主牌位。不服行吗？

在八九民运中，三个湖南人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鸡蛋，六四后被判刑（不是以损坏公物罪，而是以反革命罪），刑期竟比那些民运领袖还长。这表明在中共当局心目中，亵渎神像是头等严重之事。如今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暴君，生前不可一世，人莫予毒，为所欲为，可是死后不久，甚至死后多年，被反叛者掘墓鞭尸，那以后，围绕着暴君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就烟消云散了。由此可见，为了消除那些迷信，我们常常需要消除那些象征物。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呼吁将毛遗体迁出天安门毛纪念堂，摘除天安门毛像。当然，仅仅是消除象征物还不够，重要的是要消除被象征物所象征的那种权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消除由毛泽东所开创的共产党专制政权。

四、恶的致命吸引力

不错，在今日中国，大多数崇毛者恐怕未必象上述公车司机那样迷信，以为死后的毛仍然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们对毛的崇拜也同样是出于对权力的崇拜。

在《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一文里，我曾对崇毛心理略加分析。其中写道：“人生一世，谁不愿意给社会、给历史留下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在毛的罪行已被日益揭露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毛崇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从毛身上看到了人追求不朽的强大冲动。至于说毛的作用是好是坏，那对于他们倒是第二位的事情。更何况，大奸若忠，大恶似善。现代暴君都穿有一件理想主义的斑斓外衣，崇拜者总可以从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确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他不把善恶之分列于首位，如果他不珍视自己也不珍视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对暴君的罪行没有愤慨以及对暴政下牺牲者的苦难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辉煌成功弄得眼花缭乱，转而向暴君认同，并从这种认同中自视高人一等。”

眼下正好有一个例子，简直像是为我上面这段话作图解。王安忆小说《遍地枭雄》里的“大王”就是这样一个毛的崇拜者。《遍地枭雄》写到三个劫匪，为首者大王爱读书，肯思考，出口成章，颇具性格魅力，对人生对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虽然干的不过是拦路劫车的小勾当，手下只有两个小喽罗，却心雄万夫，豪情万丈，指点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艺术家，说那是雕虫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只须玩泥巴（修长城，挖运河），就在地球上画下了沟壑。大王感慨道：中国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国，国和民讲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崇尚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指气象。美国也很大，可是总统是选出来的，一点王气也没有了。四面八方谈判，讨论，分选票，再数选票，国不国，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经地义。大王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毛一身霸气，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从山沟沟里巴掌大一块地方打出个红色江山。这就是气象。大王带领兄弟们驱车北上，最后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泽东纪念堂。

历史学家高华在谈到毛热时指出：“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

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森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其实，英雄崇拜，伟人崇拜，对王者气象或霸气的崇拜，都并非中国人或中国农民所独有。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泽东的话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类之间的战争绝非只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乾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正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所问到的：“为什么为追求象征价值、声名或认知而乐于杀人或被人杀的人，比那些接受挑战也愿意让步，并将自己的要求提请和平仲裁或审判的人，更有人情味呢？”就因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体现出人克服其动物性生存本能的伟大力量；就因为前者追求的是称王称霸，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实现。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则的民主社会里，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个人追求声名或权力无需再冒生命危险，但因此也就使争斗少了你死我活的惊心动魄，不复有赢家通吃的血色辉煌，个人意志无从尽情任意发挥，那岂不是很不够劲很不过瘾吗？

五、我们是怎么转变的？

如前所说，甘冒生命危险，追求不朽，追求承认，这本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它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它超乎善恶之外，就像那句老话——“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它可为大善，也可为大恶。问题在于，那种你死我活的追求独霸天下的斗争的结果每每导致专制独裁，导致一个人君临天下而亿万人沦为奴仆。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对独裁者表示崇拜是出于怎样一种可笑的角色认同：你崇拜独裁者，是因为你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为什么不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之下的牺牲者呢？成为后者的可能性不是要大得多得多吗？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时代过来人——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一代——的教训刻骨铭心。想当年，我们也曾热烈地崇拜过毛泽东。一来是崇拜他的伟大，二来是以为在如此伟大的时代，人生的价值将获得更充分的实现。文革狂飙突起，毛鼓励青年学生造反，一大批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突然被放在政治舞台的中心受到万众瞩目。这就极大地激发起年轻人的野心或曰雄心，激发起他们的表现欲亦即要求得到承认的冲动。当红卫兵们宣誓“沿着毛主席的足迹前进”，高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那既表明他们对毛的追随，又表明他们以毛为榜样的自我期许，同时也表明他们自以为生逢其时，已经得到历史承认并将得到更大承认的骄傲与展望。可是没过多久，这一代就从飘飘欲仙的云端上重重地栽了下来。我们终于意识到，毛的随意挥洒的巨人气象，是以他人不得随意挥洒为前提

的；毛成为巨人，是必然要以把我们都压缩成侏儒为代价的。梁启超批判君主专制时说：在君主专制下，一夫刚而万夫柔。黑格尔也说过，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毛时代则把这一点发展到登峰造极。毛泽东君临天下凡二十七年，七亿人只准有一个头脑。毛泽东一个人霸占着中国这块大舞台把戏唱足唱够，害得其他人都枉过一生而轮不上任何独立表演的机会。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该彻底否定毛泽东。

就这样，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崇拜就转变为对专制暴君的无比痛恨。１９７６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这一转变的最确切的证明。在四五运动中，最振聋发聩的一个口号莫过于那句“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知道，秦始皇是一个多义的符号，他常常被当作暴君的代表，但也一直有人称之为伟人，称之为“千古一帝”。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在四五运动的那个口号里，秦皇无疑是被当作暴君、当作大独裁者的符号。这表明一种根本性的立场转变：当人们提到毛泽东或秦始皇这类大独裁者时，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认同于大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而是把自己认同于暴政下的牺牲者。在１９７９年全国１３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写道：“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只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可见，这一代痛恨毛泽东的最大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遭到抹煞（“一张只代表耻辱的白卷”）。

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理解了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胜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才可能最大可能地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负，它只否定专制独裁，也就是说，它防止个别人意志的无限扩张从而堵死了其他人伸张意志的机会。它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这就为其他人施展野心和抱负保留下足够的空间。毛一度被称作伟大的诗人。其实，毛诗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气魄大。民主的政治领袖中也不乏文采飞扬之士，如伯利克里、杰弗逊、邱吉尔，但是你从他们那里读不到象毛诗词一样的大气魄。正如同民主政治领袖常常做不出专制暴君所能作出的那种大手笔的功业。但是，那对于我们大家不是更好得多吗？

毛时代的过来人，经历了从对毛的狂热崇拜到对毛的深切痛恨的转变过程。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经验充分地传授出来，至少可以使得以后的几代中国人产生免疫力，不至于再为独裁者的巨大身影而倾倒。可惜的是，由于中共当局压制对毛的彻底批判，继续维护毛的伟大领袖地位，顽固地拒绝民主改革；九十年代以来，中共还通过多种方式宣扬毛的所谓丰功伟绩，再加上文学和影视中大张旗鼓的帝王故事，这就引诱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年轻人——重蹈覆辙。

六、借钟馗打鬼

有一幅广为流传的照片：东北地区的国企工人游行请愿，高举毛泽东的画像。

我们知道，今日中国的毛泽东热主要是普通人搞起来的。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农民从来不是毛泽东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特别是工人，他们是毛

泽东政策的受益者。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又沦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所谓毛热，就反映了他们对毛时代的怀念和对现状的不满与抗议。这种解释不是没有根据，但不完整，不深入。

本来，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挨个得罪了个遍，以至于到头来居然找不出哪一种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历史上倒真是很少见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庆。全国人民——不分种族，不分阶层，不分职业——都欢欣鼓舞地告别文革，可见文革之不得人心，可见普通人也不喜欢文革。

再者，一般人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并非仅仅根据一己之得失，那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他们就不大好意思炫耀自己的幸福。我并不想夸大人性中的公正倾向。我只是说，除非人们能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予以合理化，否则，他们就很难仅仅因为自己是受益者这一点就去理直气壮地维护那种运动或体制。希特勒搞政治迫害，发动世界大战，其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和外国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并不是受害者，其中不少还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却并没有多少德国人公开表示对希特勒的怀念。原因就在于，德国人承认希特勒犯下了严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们认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受益者，也不应该为之唱颂歌。

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于建嵘提到他和安源工人的几次深入交谈。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确实怀念毛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谁要提到自己是工人，都有一种自豪感，现在呢？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老工人说：现在的生活确实好一些，但是社会不公平，我们工人没地位。一般年轻工人并不愿意回到毛时代。其实，那些老工人也未必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对于他们，毛是表达不满的符号。

现在有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在文革期间工人的日子过得很好。事实并非如此。连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讲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文革期间，股市全面下跌，工人股也不例外。只不过相比之下，工人股跌幅最小而已。

老工人对现状的不满是不难理解的。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保障。毛时代实行低工资制，这等于强迫大家买高额保险，后来搞改革却轻易地把工人解雇，这等于吞掉人家的保险金。许多工人至今仍不肯抛弃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主人翁的神话，不愿意把自己仅仅视为雇佣劳动者。这看上去是对市场经济的抵触，其实有它的道理。因为当年共产党搞公有制计划经济，企业属于集体或属于全民。然而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共产党官员们却利用手中权力把公产据为自己私有，形同抢劫，工人当然不接受。工人们有理由质问：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如果我们工人成了打工仔，你们厂长书记的凭什么就成了资本家？在今日中国，工人没有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他们进行集体抗争要冒很大风险。他们抬出毛的画像无非是借钟馗打鬼。

七、怀旧情绪与商业品牌

前些年，《红太阳颂》的歌曲磁带一度风靡大陆。这不足为奇，就连海外民运人士开会联欢唱卡拉ＯＫ，许多人也是唱的革命歌曲样板戏。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歌可唱。因为那些歌曲陪伴他们走过了青春岁月，因此当他们回顾过去的时光时就免不了要想起这些歌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变动不居，其变化的规模之大，令人身不由己；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由于变化来得太猛烈、太频繁，它使得昨天都显得极为遥远和毫不相干，而人又是那样地不愿意失掉过去，所以在中国，怀旧之风就很盛。当年毛泽东运用政权的力量，采用各种方式，从文字到音像，给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使之成为国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所以当人们回顾以往的时候很难摆脱它们。这种怀旧又因商业化的力量而如虎添翼，但是它未必说明多少政治问题，因为这种怀旧只是出于情绪。它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当毛时代的人过去了，那种带有毛时代特征的的怀旧情绪也就过去了。

应该说，当今中国的毛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化的产物。商业讲究品牌，讲究知名度。当今中国，还有比毛更出名，更适合做招牌或品牌，更便于广泛吸引顾客的的么？韶山的农民说得很明白。他们说：以前，谁知道我们韶山呢？如果不是毛主席，特别不是因为文革韶山走红，我们今天的韶山还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我们这里的农民平均一人四分地，如果我们不利用毛老乡搞旅游商业，我们韶山的农民就要受穷的呀。陕西的农民说，翻身全靠共产党，发财全靠秦始皇。我们韶山不也这样么，翻身全靠共产党，发财全靠毛泽东嘛。希特勒比毛泽东更出名，用希特勒作商标，把希特勒的故乡或故居开辟为旅游景点，想来一定很赚钱。但是没人把希特勒做品牌招徕生意，因为那样做势必会引发强烈抗议，甚至会遭到禁止或取缔。这再次证明，诱发毛热的主因还在于中共当局，在于中共当局对毛的维护和对批毛的压制。

八、小结

把希特勒和毛泽东作比较颇有启发意义。希特勒和毛泽东都是魅力型领袖，他们都曾经赢得人们的狂热崇拜。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方面，在建立强大国家一雪历史耻辱方面，他们都曾经取得过惊人的成就（在这些方面，毛不如希，甚至远不如希——想想大饥荒就够了）。他们的名字一度都成为国家和时代的象征。他们都是暴君，杀人无数，害人无数。但不同的是，希特勒杀的害的主要是外族人外国人，毛泽东杀的害的主要是本族人本国人。毛泽东一生杀死害死了至少六千万以上的无辜苍生，其中本族人本国人起码占９５％以上；还不是在战争时期，而是在和平时期，不是在打天下的时期，而是在坐天下的时期，不是对荷枪实弹的反叛者，而是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包括自己的革命战友。既然在德国都没有希特勒热，在中国更不应该有毛泽东热。其实，德国人并不是没有崇拜希特勒的，也许还不止一小撮，但他们多半在暗中，不会太张扬。在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中国却有毛泽东热（注意：中国的毛热产生于九十年代，也就是六四之后）。于是我们又回到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论断。是的，对德国无希特勒热而中国有毛泽东热这一点来说，除了用中德两国政治气候的不同来解释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

李劼

绪论：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式的领袖？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有许多谜语般的历史课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没完没了地琢磨和猜谜。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谜语也许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最终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且不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资历相当，即便是手腕、心机、个人魅力等等许多成为领袖的个人条件，都不下于毛泽东。尤其是在人缘和人脉上、在早年所据的领导地位上，周恩来还远远地优先于毛泽东，但周恩来最后却俯首贴耳地臣服在毛泽东的帝王宝座之下。乍一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对此，假如仅仅用毛泽东比周恩来更有帝王气之类的说法来解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也许举出两个相近的历史人物作比较，可能更有助于看出其中的奥妙。比如，曹操和诸葛亮。

尽管《三国演义》对曹操和诸葛亮分别作了褒贬分明的丑化和美化，但从他们本人留下的诗文当中，后人还是可以看出彼此之间在气质和秉赋上的真实面目。毕竟文如其人，诗也如其人。

从诸葛亮的两份出师表上，人们读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神机妙算的领袖人物，而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儒相。尤其是“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类的言辞，全然一个儒家教义熏陶而成的贤臣形象。假如是面对一个李世民般的帝王，诸葛亮如此上奏，会让人觉得温柔敦厚，谦恭有加；可是，一想到事实上他如此诚惶诚恐地俯伏朝拜的不过是一个扶不起的小毛孩子刘阿斗，尊敬其为人为臣之余，难免令人莞尔。被《三国演义》所神化了的诸葛孔明，在为相治国上的成就是可信的，但在军事上的超人智慧却是演义小说的加油添醋。且不说别的，仅以他六出祁山无所建树、最后死于征途为例，就足见他出师的失当和在军事天份上的欠缺。至于其政治眼光和历史视野，也并非如同演义所杜撰的“隆中对策”那么神奇，不过是“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见《后出师表》) 言词之间，无奈极了。更有意思的是讲到其敌手曹操，他毫不讳言地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这种赞语后来在《三国演义》里是被作者用来形容他诸葛亮的，而诸葛亮本人却在其《出师表》里老老实实地承认，真正用兵如神的乃是曹操。由此可见，假如诸葛亮当年不是被刘备请出隆中，而是被曹操收到帐下，那么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故事就有了典型的历史先例。

被演义一再奸雄化了的曹操，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十分罕见的领袖人物。且不说其雄才大略和政治业绩，仅是读其诗歌，就可以看出一种领袖群伦的心胸和视野。曹操在诗歌里所体现的气派和风度，是以后的李白、乃至再后来的毛泽东都难以企及的。无论是“步出夏门行”组诗里对生命对宇宙的感悟，还是“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路下之八邦”那样在想象世界里的遨游，或是“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

一类诗歌里的悲凉感怀，其意境之深远，其视野之开阔，鲜有比肩者。尤其是在那两首著名的“短歌行”里，其“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度，领袖风范，赫然在目。人说曹操的诗歌颇具古风，更确切地说，其实是极其富有生命的底气和文化的元气。中国诗歌里最具这种底气和元气的当然首推《诗经》，而曹操的诗歌尤其是其四言诗，恰好在意境和风格上最为接近《诗经》。曹诗高远的气度，连毛泽东都不无倾倒，感叹道，“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其实魏武岂止挥鞭？且不说曹操后来的经世大业，仅以他年轻时几次三番要为汉末党锢领袖陈蕃李膺们翻案一事上，就足以使后来的毛泽东相形见拙。一个是要为被枉杀的士林精英翻案昭雪，一个是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千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当然，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曹操不说自许、至少也是心仪的。要不然，见风使舵的郭沫若就不会写那篇不伦不类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了。顺便说一句，郭沫若何曾真正懂得曹操，不过拍马溜须而已。

比较了曹操和诸葛亮，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人物，就可大致了然。周恩来并不是不想做领袖，事实上他也当过领袖。当他带着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介绍信回国之后，马上平步青云，年纪轻轻的便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在蒋介石的清党分共之后，周恩来更是一跃而成为当年中共最为核心的领袖人物。但他与诸葛亮一样，有相国之才而无领袖之能。与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败绩相仿，周恩来在上海和南昌先后二度指挥城市暴动，屡战屡败。然而，与诸葛亮被刘备的托孤一举弄得不得不为刘家天下鞠躬尽瘁有所不同的是，周恩来最后意识到了，他骨子里并不是叱咤风云最后一统天下的那种人物，从而在遵义会议上心甘情愿地让贤，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周恩来的称臣，对于毛泽东的逐步“称王”、“称帝”乃是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在党内军内握有过半实力，他的转向对于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乃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心理上的这种下意识现象，通常经由许多表面的细节仿佛十分偶然地形成。人们尽可以对周毛之间的最高权力转让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当时周恩来为情势所迫，或者那是毛泽东在私下里做了许多小动作的结果。就好比人们解释当年希特勒上台时，也可以找出许多偶然的历史细节，证明希特勒的成功不过是侥幸罢了，而不是德国民众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选择所致。当然，更干脆更简单的做法是将历史现象归结为命运。谁也无法否认命运，一如谁也无法说清楚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就好比一个人的性格与其命运有着对称性，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通常与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相关。或者说，从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可以找出其历史命运的种种迹象。

也许周恩来当时的让位确实有着种种具体的原因，也许他当时确实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毛泽东和他之间的那种君臣定位；但从他后来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相处来看，那种君臣定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假如周恩来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话，比如马克思在《论普鲁士书报检令》中有关精神自由论述中的那种自由意识，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甚至忍受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定位的。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在其潜意识里，只有一个解释，乃是其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起了作用。这不仅是解读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秘密所在，也是解读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相应的这段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所谓的马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件令人也令他们自己眼花缭乱的意识形态外衣。在其集体无意识里，真正左右毛泽东、左右周恩来、乃至左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恰好就是他们在意识层面上反对和批判的传统文化和因袭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就好比岛屿和大海的关系；在岛屿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再强大，也敌不过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跟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即便是抢银行，也得有个说法，更何况夺江山？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在于他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话语和现代"水浒"话语。毛泽东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中国共产党，然后率领着他的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这个民众的愚昧在于，明明是被人强奸了，竟然反过来说是人家救了她。其实毛泽东救的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所有领袖们，尤其是周恩来那样的核心人物，全都心知肚明。否则周恩来怎么可能对毛泽东如同诸葛亮对刘阿斗那样的忠诚不腻呢？假如《三国演义》能够按照《出师表》来如实地塑造诸葛亮的话，那么周恩来可能是与诸葛亮最为相像的历史人物。按照儒教三纲五常的伦理标准，臣子必须对主君尽忠，不管主君是如同刘阿斗那样的混账孩子，还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乱世枭雄。只是比之于诸葛亮式的愚忠，周恩来的忠诚倒是忠得明明白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确实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弄清楚毛泽东的挽救中国共产党，先得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会落入困境的。

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脱胎于马列主义，而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的学说经由苏联的十月革命传入中国，早已成了阿凡提那只兔子的汤的汤。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列宁主义时，马克思早年那种自由主义精神已经被列宁的政党理论和专政理论完全挥发掉了。因此苏联人教给中国人的那个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列宁主义。而且，被苏联人最早教会搞列宁主义的中国人，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造反者孙中山。孙中山对列宁主义的服膺，体现在他后来对三民主义作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解释里，也落实在他遵循苏联方式的一统天下的种种努力上，尤其是那场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历史后果的北伐战争。按说，孙中山心目中的榜样应该是洪秀全，只是由于使用拜上帝会那样的法子太过时，不再具有任何号召力，他才到处求助，最后找到了苏联人的怀抱里，受到了列宁的热烈称赞。就其革命背后有无文化底气而言，孙中山不要说无法与有文化头脑的毛泽东相比，甚至连落弟秀才洪秀全都不如。孙中山从来没有弄懂中国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是怎么回事，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可以就一部《红楼梦》说出他的一套想法，孙中山要是面对那部小说，可能唯有张口结舌。与毛泽东后来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反，孙中山除了一心要圆他的大总统梦，其实也就是皇帝梦，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此公的革命逻辑是，有奶便是娘。当年为了让日本人支持他而不支持袁世凯，他向日本人断然许诺东三省。后来投靠了苏联人之后，孙中山全然唯苏联顾问是从，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从建党到建军校，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列宁主义模式。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说穿了乃是难兄难弟，在许多地方彼此彼此。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换句话说，毛泽东称赞孙中山在依靠苏联人打江山上，比他先走了一步。毛泽东的共产党与陈独秀时代的

共产党只是表面上有承继性，实质上却相去不止以道里计。

中国共产党在起步的时候，在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时候，不仅不是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而且跟孙中山那种江湖帮会式的革命党也并非同类。陈独秀的共产党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与来自广东乡村和海外唐人街的孙中山毫无文化底蕴不同，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背景的陈独秀，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陈独秀缔造的早期中国共产党，脱胎于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孙氏国民党、又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最大特点。这与共产主义的教义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中国文化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正因如此，信奉共产主义学说的陈独秀，并不全然认同苏联人的种种主张，尤其不认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式。因为在陈独秀背后站立着的历史身影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而是从汉末党锢到明末东林党人再到戊戌变法诸君再到清末明初的革命志士最后到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不管陈独秀在倡言白话文时如何激进如何偏激，但他对于草莽气十足的暴力革命，却始终持有保留态度。陈独秀是个既独立不羁但内心深处又只认书生文化传统而不喜流氓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激进起来颇有当年陈蕃李膺式的大刀阔斧，但温和起来却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中国式的绅士，很容易认同伯恩斯坦那样的理论主张，倾向于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议会党，以合法的议会方式，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方式，作为党的宗旨。

陈独秀的这种文化立场，与苏联顾问尤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显然是相当不协调的。苏联人需要的是像孙中山那样没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但有着切实的利益需求的江湖合作者，而不是像陈独秀这类文化领袖出身的政治伙伴。换句话说，苏联人只要求中国共产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不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想。但陈独秀恰好是这么一个有自己头脑有自己思想的领袖人物，并且其思想与苏共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斯大林的专制人格又是那么的不相容，因此，他被苏联人想方设法的排挤和清洗，乃是势在必然。

陈独秀的出局，使中国共产党完全被共产国际所控制。几乎是共产国际叫做什么，他们就乖乖地做什么。比如叫他们搞城市暴动，哪怕条件不成熟，他们也得照办。而这期间最忠实的执行者，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虽然从没身居总书记的要职，但他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中共的党史编造者们把后来历次的所谓路线错误纷纷归咎于瞿秋白、李立三诸君，殊不知，其真正的执行者却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相比，周恩来除了执行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主张。可以说，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领袖转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没有灵魂，没有头脑的政党。无数的革命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说是死得其所，但也实在是死得太稀里糊涂了一些。这其中的辛酸，周恩来应该最为清楚。假如没有后来的种种转折，没有后来毛泽东的入主，中国共产党被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葬送掉，是完全可能的。蒋介石的屠杀非但没有使中国共产党削弱，反而使之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使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梦想经由血的祭奠而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动人，更加有魅力。可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瞎指挥，却把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送入了有类于当年太平天国造反领袖石达开那样的绝境。

一次次的失败，无数同志的鲜血，使周恩来即便意识不到中国共产党急需一个灵魂人物，也已经发现一味地跟着别人指挥棒瞎转的危险性了。虽然毅然抛弃共产国际特使转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乃是几位当时的中共核心人物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作出的决定，但周恩来的转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最后投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转折。撇开周恩来与毛泽东当年在所谓路线斗争中的恩恩怨怨，周恩来的倒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也使后来的中国历史行程，基本定局。当然，周恩来不会意识到，那时候的毛泽东早已不是当年向陈独秀高喊“陈君万岁”的热血青年。也即是说，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历史身影，已经不是历代士林精英，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

毋庸置疑，就个人的秉赋和才能而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无出其右的。与许多中共的领袖、包括周恩来在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不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连同因此而来的战略眼光。在那个中共最没有头脑的年代里，恰好唯独毛泽东的头脑最为清楚。从他当时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过人之处。诸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根据地之所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人们尽可以挑剔说，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形势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棋手，不能保证其每一着都十全十美，但至少他从来不曾丧失过对全局的了然于胸。毛泽东的这种能力不啻在中共党内无以伦比，更是为当年诸如孙中山之类的江湖革命家所无以望其项背的。遵义会议上，中共当时的诸巨头们之所以推举毛泽东，不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能力达成共识，至少也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尽可以说，毛泽东的入主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或者说是权力角力的平衡，甚至还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核心人物当中的游说使然，但在权力相逐背后，毛泽东的把握全局能力不可能不是举足重轻的因素。

毛泽东的成功当然还在于他的话语能力(参见拙著《论毛泽东现象》第六章)。毛泽东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文的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数毛泽东首屈一指。假如毛泽东仅仅具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而没有生动形象的话语表达，本事再大，也难以被人所认识，被党内群雄所接受。但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象了，真正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而且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和功夫，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文章所言，即便不是真理，也很有真理的气势，很有真理的那种煞有介事模样。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草莽背景，更不敢把江湖原则写成冠冕堂皇的文章。但毛泽东却毫不讳言地公开声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帮会原则经由毛泽东一说，变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样的人物不做首领，谁做首领？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还不是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的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其表层的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由于历史的表层结构总是将其深层原因掩埋得严严实实，从而使人们总是把目光停留在种种偶然性上，忽视了国民文化心理下意识的历史认同。就像当年希特勒的上台，人们喜欢从那个著名的啤酒馆事件，或者兴登堡从中起的作用等等上寻找原因，而忽略了在其登台时的那个火炬游行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其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

的历史效应。像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对历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着一定的覆盖效应的历史人物，其出现不管具有多少偶然性，背后总也有其所属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不知不觉的认同悄悄地起了作用的。假如希特勒形象与德国神话《尼伯龙根指环》中的英雄人物齐格飞(尤其是经过瓦格纳的歌剧塑造之后)之间没有一种吻合性，不管他具有多少煽动力，也不会被德国人奉若神明(请参见拙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风景》第八章)。同样道理，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大小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就像当年中共建党时党内一致推举象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总书记一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中共领袖们，都不知不觉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毛泽东身上。在早先的中共一大会议上，不管毛泽东如何能说会道，人们也不会把希望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但在遵义会议期间，他们却除了选择毛泽东，绝对不可能再把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找来做领袖。当初推举陈独秀，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领袖。而此刻选择毛泽东，乃是他们下意识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担当中国共产党这个业已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党”的山大王。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舞台，经由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搬到黄埔军校、再从黄埔军校扩展到农村里的农民运动和城市里的工人罢工、最后经由一场场的暴动，已经在崇山峻岭里找到了归宿，落草为生。与此相应，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从汉末党锢的陈蕃李膺或者明末的东林党人，戊戌变法的七君子，清末民初的徐锡麟、秋瑾，甚至从毛泽东早年倾心的曾国藩之辈，变成了陈胜吴广式的草莽，以及这类草莽一旦成事马上就翻脸演变成帝王的朱元璋、洪秀全。很难说这究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悲剧，还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但历史，确实这么发生，这么被谱写了。

历史的秘密，说穿了就这么简单。由于大家一直说着现代白话文的马列主义，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历史选择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谁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中共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中共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要紧的是，毛泽东说的话，通俗明了，生动形象，没人听不懂。相比之下，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之类，跟穿着草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弟兄们，距离实在是太远太远了。即便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们，跑到矿上去启蒙或者说煽动造反，也得从“工人”的汉字结构上着手。说什么“工人”两字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天”字云云。那些工运领袖再笨也不会笨到去跟工人们讲说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似乎是一场悲剧，但其实又是一场喜剧，骨子里还是一场闹剧。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习得话语方式的毛泽东，最后征服他的同志们时，已经悄悄地把白话文变成了毛泽东式的帝王话语。这种帝王话语以行云流水、诡异多变的现代白话汉语，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动声色地作了《水浒传》那样的翻译。诸如打家劫舍，叫做“打土豪、分田地”；打到京城去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叫做“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此等等。当然，反过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仅仅在民众并且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层面上作了一次启蒙，并没有深入到整个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类小说对于

中国民众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个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上只是划了一道浅浅的印痕；饶是如此，其科学民主的宗旨，后来还被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堂而皇之地偷换成了所谓的“反帝反封建”，听上去好像是外来的所谓帝国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者们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好像是遥远的古代君王而不是当时做着形形色色的现代皇帝梦的革命领袖们在抢夺江山。

行文至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了帝王般的领袖，因为毛泽东来自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虽然是其创伤而不是其始源)，而周恩来由于在文化视野上的短浅和话语能力上的贫乏，最后只能扮演类似于诸葛亮在刘阿斗面前扮演过的臣子角色。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有文化。这与其说是周恩来不懂文化，不如说周恩来没能像毛泽东那样深谙“五四”白话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要义。于是，那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落实到周恩来身上，便成了像诸葛亮那样躬身退居于臣子的地位。而从来不以孔子儒教为然的毛泽东，堂而皇之地挟《水浒传》之风，怀《三国演义》之技，以一手诡谲多变、翻云覆雨的白话文，夺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力，从而成功地填补了在“孔家店”被打倒之后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空白。他那几句兴头上的狂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空话，也不妄言。

上篇：从“五四党”到“山党”的文化心理嬗变

应该说，毛泽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想好自己的历史角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毛泽东早年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他的思想之激进，他洞察历史的眼光之独倒，他对历史脉搏把握之精湛，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令人惊叹。他从一开始就尊奉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笔工笔正地抄写曾氏日记。他热情洋溢地在《湘江评论》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以天下为己任。他大声疾呼中国走联邦制当时叫做联省自治道路，并且将湖南独立的重要性及其联省自治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思想高度，不仅是他后来终其一生都没能再次抵达过，即便是他的同时代人甚至他的后来者们，至今都不曾企及。

“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也许谁也不曾想到过，在他们那个时代最具文化历史洞察力的人物，竟然是一个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湖南青年。那些领袖人物可能不太明白文化的定义并不定义在书本里，或者说对文字记载的阅读上，而定义在个体生命对于文化的领悟和对于历史的洞悉。要说家世学历之类的个人文化背景，胡适显然远高于陈独秀。但要说个人之于文化和历史的生命体验、由此引发的激情、号召力等等，胡适比之于陈独秀相差甚远。假如白话文运动仅止于胡适四平八稳的“文学改良刍议”，而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那么这场语言上的变革就很可能局限在一小圈知识分子当中，难以成为轰轰烈烈地普及天下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由个体生命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张力、这种文化能量，通常是历史最富创造力的源泉。这样的创造力，赋予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空前的活力。尽管按照个体生命的文化能量来标画的话，成为其文化座标的历史标志，只有二个人物，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毛泽东；但这二个人物的文化历史能量，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具有一般文化人所无以企及的覆盖力。同时，也正是这二个人物，标志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质地。

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文化的具体建构上，恰好是以现代白话汉语为话语形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并且以陈独秀和毛泽东为标记，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文化心理构建。一次是以陈独秀为标记的“五四”式塑造，一次是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占山为王”。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心路历程其实很简单，先是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五四”党，然后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井冈山党，或曰“山党”，最后是后毛时代的空心党，或曰“空党”。假如可以划出一条历史曲线的话，那么从“五四”党到“山党”，是其上升时期；而从“山党”到“空党”则是其没落时期。

从“五四”发轫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学说，显然是相当陌生的。毛泽东后来在描述中国人寻找真理时，大笔一挥，有道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实在是又夸张，又肤浅。由暴力革命送来的主义，只是一种激发因素，或者说一种导致革命狂热的心理激素，就像某种外用的药膏一样。真正在精神上推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那么的奋不顾身、那么的赴汤蹈火的，不是主义，而是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里的中国文化最为始源的人文传统。这种人文传统不见经传，不见诸二十四史，更不可能在各种演义中读到，而是蛰伏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里。无论是夸父精神，是刑天气概，还是精卫风采，或是女娲气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精神气质。经史演义，全都是意识层面上的写作，意识层面上的话语，唯有不知作者为何人的神话故事，才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生动显示。从经史演义中至多只能读出历史，并且还是为臭男人所写，为胜利者所写，唯有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里，人们才能读出整个民族的灵魂。就像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样，神话乃是民族之梦，并且比任何文学作品还要本真。由于神话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性质，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都无法覆盖之。当孔子配合当年建立了集权专制体制的周公，建立起了周—孔历史话语和话语权力之后，其专制话语最无法覆盖的，就是诸如《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及其人文传统。不管儒家教义如何侵占人们的意识，甚至侵蚀或者伤害到人们的无意识领域，制造出一种被斯宾格勒称之为伪型文化的历史假像，但也不可能替代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正因如此，从集体无意识里爆发出来的文化能量，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汉末党锢也罢，东林党人也罢，戊戌诸君子也罢，清末民初革命志士也罢，早期共产党人也罢，不管他们宣称自己信奉的是什么，骨子里所承继的，恰好就是《山海经》神话里的那种文化血统。在他们身上，人们总能看到诸如夸父、刑天那样的影子。在他们身上，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味到了中国文化的元气，体味到了中国文化那种最为自由、最为阳刚、最富激情、最具生命创造力的始源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为何经久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和最大秘密。正是由于这样的始源精神，而绝对不是因为孔孟之道及其儒家教义，中国文化才得以在漫漫的专制长夜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相比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始源性和本真性，孔儒不过是整个民族文化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可以说，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这段插曲就已经因为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而黯然失色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留待另文细说。

明白了“五四”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所承继的这种文化血脉，人们可以发现，以前的学术研究过多地集中在了意识层面上的探讨，把大量的思考投入到分辨各种主义的异同上，忽略了在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所做的历史文化研究，从而导致有关“五四”、有关中国共产党等等历史话题难以在文化层面上展开。诊治个人的精神病案，需要弗洛伊德的释梦和精神分析。诊断整个民族的神经是

否出了毛病，得深入到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面去，深入到折射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神话故事和文学经典中去。所谓的毛泽东现象，实际上乃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病理现象，其病根在于中华民族自宋、明以降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当中的许多主义之争，都是过眼烟云而已。真正在文化心理深处左右了历史的，乃是彼此共同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共同遭受的心理创伤。

由于共同的文化血统，当年“五四”诸领袖人物之间在主义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摆脱因袭的孔儒传统上的共识，并不影响他们对自由的共同渴望和齐心协力的追求。由意识和理性所制作的主义通常只能成为面具，成为或者漂亮或者时髦的外衣，从集体无意识中萌生出来的生命能量和文化精神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和血脉，才是文化创造和历史生成的真正原动力。当然，这种意识层面上的主义和无意识层面上的内在精神，经常会形成同构性的反差，或者不同构的相似。陈独秀和胡适信奉的是不同的主义，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具有同样的文化指向。毛泽东和陈独秀说起来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主义，但他们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

与陈独秀缔造的“五四”式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毛泽东入主之后，把他的共产党逐步改造成了梁山好汉党，井冈山党，从而把陈独秀的“五四”党变成了毛式的“山党”。从表面上看，“山党”在信奉的主义上和在话语方式与“五四党”并没什么不同，但在骨子里，在其文化心理层面上、在其集体无意识层面上，两者已经迥然相异。

毛式“山党”的文化心理基础，既不是来自陈独秀那样的中国士大夫精英传统，更不是出自于《山海经》那样的文化始源精神，而是来自于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演义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类小说大都在话本的基础上形成，有着相当的听众和读者。或者说，这类小说本身就是来自听众的心理需要。从这类小说形成的年代、亦即宋、元、明三个朝代来看，不要说《山海经》那样神话早已成了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就连汉末党锢精英的气概、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那样的风骨、《世说新语》里的人文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迈激情，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一方面是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比一次野蛮的入侵、征服和占领，一方面是越来越沉溺于日常世俗生活和儿女缠绵之情的风气，二者形成十分古怪但又极其强烈的对照。从皇宫到村野，从庙堂到江湖，汉唐时期的阳刚之气，已被宋明年代的阴柔之情所替代。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应该去当兵，而是理当去恋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成了历史的回声，“杨柳岸、晓风残月”才是从皇帝到书生大家共同追求的时尚。这种英雄气息的衰退，一方面造成了世风以言情为主，显得更具人性和人情味，一方面也导致越来越不愿打仗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鼓励他人做英雄，鼓励他人抵御强敌，简而言之，鼓励他人去爱国去打仗(参见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绪论部分)。所谓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明显的啦啦队色彩。写爱国诗的人不需要在战场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而在战场上打仗的人们又未必有功夫用诗歌来抒发爱国热情。爱国话语和爱国行为日渐分离，爱国最后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激情表演。这种啦啦队式的爱国主义心理和爱国主义文学，又反过来使人变得越来越胆怯，越来越阴暗。再加上针对世俗风气应运而生的宋明理学在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越来越专制、越来越专横，对人们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心理压抑，致使整个集体无意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这种创伤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说书和听书，双向交流，互相反馈，变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演义小说。诸如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封神榜故事、尤其是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这些故事近乎病

态的不断讲说和反复聆听，相当于长年累月的精神手淫和心理放纵，致使人们的精神越来越萎琐，心理越来越病态。而这些演义小说一旦成形之后，又反过来一遍又一遍地塑造着整个民族尤其是二、三流的中国城乡知识分子。过去《山海经》里的那种强健和强壮，到了《水浒传》里变成了强横和强暴；《山海经》里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那样的优美，在《三国演义》中全然被阴暗的心机和阴狠的权谋所取代。用《红楼梦》的说法，女儿的水性、女儿的灵气，在演义中是绝对看不见的。一部部演义小说里狼籍着的，全然是男人的泥污和男人的污浊。女人不是如同在《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里那样被妖魔化妖精化，就是在《水浒传》里那样被男人杀个痛快，一刀挥作两段。然而，又正是如此肮脏下作的小说，竟然成了数百年经久不衰的畅销读物，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整个民族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沦落和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互为因果，彼此恶性循环；即便是《红楼梦》那样的旷世之作问世，也已经于事无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产生，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创伤发作的一种历史病症。从演义小说里流露的阴暗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几乎全都经由毛泽东的白话文演变成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语文化，或者用过去的说法，叫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以其无以伦比的白话文能力，将弥漫在所有演义小说里的那种建立在嫉妒之上的仇恨、因那种仇恨而产生的暴力以及包括复仇、杀戮、抢劫等等在内的所有暴行，上升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公然声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与以往所有的草莽造反不同，毛泽东的造反借用了西方的共产主义理论，盗用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成果，十分成功地整合出了一整套从演义小说里总结出来的流氓话语和痞子文化。

演义小说所张扬的痞子文化的核心乃是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以欲望为动因，以美人和江山为争夺的目标，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特征。《山海经》传统里的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三国演义》按照这样的权力崇拜和无毒不丈夫原则，塑造了曹操式的乱世奸雄。与历史上的曹操以及曹操本人诗歌里的曹操形象全然不同的演义“曹操”，集野心家阴谋家于一身，为了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十分好笑的是，后来的毛泽东又恰好就是按照这样的形象，完成了他那伟大领袖的形象塑造。毛泽东不仅在其诗歌里直抒胸臆，把江山比作美人，毫不知耻地高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且把权力崇拜上升为其争夺江山的三大法宝中的第一法宝，即以“党的领导”为名的领袖专制。因为所谓“党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既可解释为由党来领导，又可解释为由党的领袖来领导。假如没有具体的领袖和组织，党不过是个空泛的概念。真正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乃是权力高于一切的集权专制，是权力话语高于一切的权力崇拜。

毛泽东三大法宝的第二个法宝，“武装斗争”，乃是演义小说的另一个特征，暴力解决一切，拳头底下出真理，毛语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都离不开对暴力的宣扬和崇尚。诸如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武松打虎杀嫂，杨雄杀妻杀丫环，李逵更是挥动板斧“排头砍去“。总之，谁强横谁英雄，谁柔弱谁倒霉。暴力能力的高下，成为英雄与否的衡量准则。这类英雄与《山海经》里的夸父、刑天哪怕是共工，都已经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山海经》里的英雄是不畏强暴，而演义小说里的英雄却是争相成为强暴。这样的强暴，到了毛泽东的话语里，除了强调暴力夺取政权之外，还在夺取政权之后，把对弱者的欺负和凌辱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施暴有理的强权逻辑。毛泽东以此在空

前强化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的同时，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美化成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并且逼着全体中国人见识和领教空前残暴的阶级斗争大风雨大世面。这可真是流氓一旦玩大了，什么话说出来都十分形象生动。

演义小说里还有一个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在毛泽东话语的词典里，经由他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理论，直接化作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个法宝，可说是既总结了江湖帮会的种种组合原则又集中国历史上阴谋家和纵横家之大成。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捭阖，到《三国演义》里的桃园结义，再到《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各种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诸如挑拨离间、互相利用之类，全都被毛泽东的统战理论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在于，除了对团伙利益负责之外，其余的怎么做都是合乎义气、合乎道德的。比如，水泊梁山里的李逵，除了他那一百零八个弟兄，其他人的生命都可以视为草芥，尽管排头砍去就是。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还在于，在权力斗争和江山争夺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利用，没有其他关系可言。所谓统一战线，无非就是江湖上的拉帮结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革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段话的要义在于，过去的江湖草莽为什么成功者寥寥，就因为不懂得使用诸如拉进来、打出去或者掺沙子、甩石头之类拉帮结派的阴谋诡计。按照毛泽东的统战理论，所有的间谍手法、特务手段，诸如离间计、美人计、伪造强奸案、伪造自焚案等等，通通获得了冠冕堂皇的说法。有的被称为白区工作经验，有的叫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甚至对自己的同志同伙，也以这种手段互相监视。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无非是更有效地打败对手消灭对手，叫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许多本来是在阶级斗争或者专政范围之外的非党人士，或者所谓的民主人士，就因为中了统战圈套的缘故，一个个变得面目全非。这些人通常不是有钱有势，就是有名望有影响，但在中共的统战之下，他们不是变成待价而沽的"期货"，就是变成骚兮兮地等着被勾引被诱奸的"骚货"。期货也罢，骚货也罢，全都在下意识里期盼着与专制者上床，美其名曰：政治协商(亦即混个政协委员当当)。这与其说是被诱者太幼稚，不如说是引诱者太老练。中共的统战专家，太知道如何寻找引诱对象的人性弱点，太知道如何利用人家的人性弱点了，简直是百发百中，鲜有失手。被引诱者通常要在跟专制者同床共被之后，才知道自己失节上当，并且后悔莫及，发现原来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总之，毛泽东发明的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术和帮会术谱写了全新的篇章。就此而言，数风流人物，确实应该还看今朝。

毛泽东所继承的传统，假如也可以说是传统的话，既不是所谓的法家，当然也不是所谓的儒家，而是自宋、明演义小说里的那套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演义小说里的各种"英雄"，不仅在《三国演义》里比赛谁比谁更流氓，同样也在《水浒传》里比赛谁比谁更痞子。宋江不过是想回到书生立场，回到儒家传统，结果却弄得里外不是人，在小说里被人毒死不算，千年之后还要被毛泽东定性为投降派。毛泽东的看不起宋江，与他的蔑视孔子是一回事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么征服，要么被人征服，没有调和或者妥协之类的中间道路。因为妥协通常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经由和谈达成的。毛泽东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谈，也是暴力解决的另一种手段，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和谈，妥协，通常是君子之间的互相理解，这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流氓人格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全部悲哀恰好也就在于，人们总是不相信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务实者，而崇拜孙中山、毛泽东

那样的牛皮哄哄人物。在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背后，蛰伏着一个中国历史的秘密，那就是，中国人确实喜欢“造反有理”，而从来不懂得“改革有利”。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改革的领袖，最后都不仅失败，而且身败名裂。相反，凡是造反的枭雄，哪怕粗鄙不堪，也照样英雄。中国人仿佛天性不相信一步一步的改革，而是喜欢痛痛快快的造反。所以毛泽东总结说，造反有理。这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是中国民众的心理秘密。毛泽东的狡诘在于，他其实知道“造反有理”是中国民众喜欢听的话，是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但他故意将此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这不仅因为马克思在天之灵就算听见了也拿他没办法，而且还因为他同时又可以借助马克思的亡灵，唬一唬他的“山党”和他所治下的中国民众。

当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号称凭着《国际歌》可以找到自己人的时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上，人们凭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宋、明之际形成的那些演义小说，几乎成了中国式的《圣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照不宣地信奉这类演义所宣扬的种种权谋和种种为人，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也算是中国人之间不言而喻的一种默契。就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入主中国共产党；也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被其同党同志同伙们逐步捧上神坛。在那首充满着被强奸之后的快感的“东方红、太阳升”颂歌背后潜伏着的，无非是那种找到真命天子的共识。这是不言而喻的，是不需要明说大家都能明白的。假如有谁不明白，看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就明白了。想想看吧，武松不过打死过一只老虎，就被捧为英雄，可以随意杀死妇女儿童。李逵因为知道如何忠于宋江、如何向宋江负荆请罪之类，更是成了榜样式的英雄，哪怕是把无辜的小孩子脑袋一劈两半也照样英雄。按照这种逻辑，救过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当然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了。至于《三国演义》中刘皇叔那样的皇统，在毛泽东的革命当中被改成了马列学说的理统。谁是汉家的正宗后裔，演化成谁是马列主义的正宗传人。因此，以继承人兼发展者双重身份自居的毛泽东自然而然成了比刘备还刘备的真命天子。中国历史上的江湖草莽运动，折腾到毛泽东，终于折腾出了一个最牛皮的说法，致使在这个说法之下的所有暴行所有阴谋诡计全都有了冠冕堂皇的话语装饰。

有关演义小说和毛语文化的这种文化心理对称和历史嬗变方式，可以成为一个专题研究。比如其另一个特征，牌坊文化，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演义小说立的古人牌坊，诸如关公、张飞，武松、李逵，岳飞，杨家将，姜太公，等等；还是毛语文化立的今人牌坊，诸如早年的张思德，白求恩，后来的雷锋，欧阳海等等；背后都蛰伏着相应的集体无意识创伤的病灶，在此暂且不作进一步的展开。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继承和发扬的这种流氓文化、与陈独秀所基于的书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传统。虽然宋、明演义小说形成的流氓文化，既与儒家话语权力的压抑有关，又带有宋儒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印记，但与源自孔子的儒家传统毕竟有个书生和流氓的区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孔儒文化的时候，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笼统地称之为封建主义，没有注意到那其中的区别。“五四”的文化领袖们没有发现孔儒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虽然已近未日，但毕竟还是书生文化。他们没有发现在传统当中还有一种比孔儒文化更加可怕的“妖孽”，即演义小说所传播的流氓文化。这种流氓文化虽然有其产生的种种历史渊源，种种所谓的历史合理性，或者说“造反有理”的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但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却有着比孔儒文化更加负

面的破坏性效应。当西方人发现人是一种文化动物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人的动物性也同样会构成一种低劣的但照样具有极大能量的文化。假如说，孔儒文化乃是头脑层面意识层面的文化建构的话，那么演义小说中的流氓文化全然是身体层面感官层面欲望层面的心理渲泄。就个人和历史的互相作用而言，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这种文化，还是毛泽东本人也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能够确认的只是，借助这种流氓文化登台坐大的历史人物，不管怎么说都是丑陋的。无论此人叫做洪秀全，还是叫做孙中山，或者叫做毛泽东。

当然，从历史的整合作用和群体的心理认同效应来说，毛泽东借助中国文化当中最为阴暗最为糟粕的演义传统把中国共产党从陈独秀的“五四党”整合为毛式的“山党”，也不全然是毛泽东的过错。没有他的同志同伙乃至许多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的配合和齐心协力，毛泽东的话语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比如毛泽东这样的人物要是出现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他的所有言论都会被视作是胡言乱语，就算不送他去精神病院，至少也要请他去找心理医生治疗一下。因此，撇开毛泽东现象的种种偶然性，毛泽东的崛起也可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沦落本身所导致的必然历史结果。纵观毛泽东一生，并非是天生的刘备、天生的刘邦、天生的秦始皇，也不是天生的朱元璋、天生的洪秀全，而是经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毒害的中国民众集体无意识创伤的心理反射所逐渐领悟、后天习得的草班帝王。假如这个帝王在江山到手之后的所做所为犹如魔鬼，那么这个魔鬼也是被中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就的。并不是毛泽东想做魔鬼就成了魔鬼，而是民众心理深处的魔鬼说要有毛泽东，于是才有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上去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实际上却是处处在投民众所好。就像希特勒非常知道德国人民需要听什么一样，毛泽东十分清楚什么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

下篇：毛泽东从曾国藩转向洪秀全的历史秘密

平心而论，毛泽东早年向往的，不是他后来做成的。毛泽东早年向往的那种曾国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经世楷模，与他后来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正好截然相反。毛泽东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相当富有戏剧性，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个文化嬗变当中的历史成因。

就他的个人案例而言，他的专制习性和流氓人格的形成，主要与他父亲的暴虐和他在北大受到的冷落有关(请参见拙作《论毛泽东现象》第三章)。数千年的专制文化和专制话语，使中国人的家庭教育相当愚昧极为黑暗。毛泽东在给斯诺所讲说的他幼时跟他父亲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家庭里没完没了地重复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这样的冲突甚至都可以在《红楼梦》里读到，亦即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势如冰炭、形同水火。周公和孔子先后定下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使中国人习惯于在人与人之间作出高下左右的区分，而不懂得彼此的平等相待和平等相处。左右本当是平等的概念，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要分出先后、或者高下。做父亲的不懂得跟儿子平等对话，同样，京城里的大学者不懂得尊重外省来的师范生，就算表示了一些礼貌，也要被称作“礼贤下士”。礼是礼了，上下高低可一点不含糊。如此等等。

中国式的父亲，并非是如同鲁迅所说的经常为年轻一代肩住黑暗闸门的那类英雄，

而是习惯于以暴虐的方式把暴虐的心理和暴虐的基因强行播种到下一代的下意识里那类家长。中国人很少能够避免他们的父辈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毛泽东也同样如此，从暴虐的父亲身上继承了暴虐的专制习性；然后又从京城大学者的势利和傲慢上(至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饱尝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那种等级岐视的滋味。毛泽东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不管对方是如何的不经意，却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而且，那种歧视作为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创伤所造成的反弹，在他坐定江山之后，又以极其暴虐的方式回敬给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

早年的毛泽东曾经以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后来又向往过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章里向陈独秀大声高呼“陈君万岁！”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恰好在“五四”前后，因为与杨开慧的婚姻前往岳父也是其老师杨昌济在北京的寓所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在毛泽东可谓刻骨铭心。且不说其他，仅以他后来在延安接见梁漱溟时回忆当初为造访他岳父的梁漱溟开门的细节来看，就可见出他的回忆里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感慨。更不用说，他拜见许多“五四”风云人物尤其是胡适那样的大人物时所受到的种种不经意的冷落，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多么强烈的烙印。

写到这里，有必要稍稍提一提胡适的文化内涵。就胡适的文化气质而言，无论是他的首倡白话文，还是他的将杜威实用主义介绍到中国，都是他在意识层面上的努力和用功。胡适在骨子里是个中庸的儒生，拥有常人的智力，并非是个创造的天才。胡适的民主意识和他的精英地位是分不开的。也即是说，他的民主乃是精英之间的民主。他偶尔会在半文半白的诗歌里同情一下人力车夫，但他绝对不能忍受一个砍柴出身的小和尚成为禅宗六祖。他为此不惜下功夫考据禅宗的真伪，以此维护他所倡言的科学的尊严。他的认真和迂腐、他的可爱和可笑，十分古怪地掺和在一起。他终其一生都没读懂过《红楼梦》，但他却是红学研究的开山学者之一，当然是考据学意义上的研究。他的“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听上去十分保守，实际上倒是不折不扣的实用理性立场。胡适的精彩包括他强烈的西方民主意识，通常来自他的这种立场。或者说，胡适实在起来，不仅实在到了不信禅宗那样的神明，就连时行的各种主义，他也一概不信。听到陈独秀大谈帝国主义如何如何可恨，他忍不住叫嚷起来：“仲甫，哪来的帝国主义，哪来的帝国主义呀！”

以胡适这样的文化内涵和个人资质，要他听懂长沙师范毕业的一口湖南腔的毛泽东究竟在对他说些什么，实在是勉为其难。相反，要不是毛泽东江山到手之后、大批胡适唯心主义以报当年北大遭受冷落的一箭之仇的话，胡适倒是毛泽东的一个很合适的统战对象。毛泽东的统战人员只要下点功夫，叫胡适说出诸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大陆的领土之类的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假如他能活到二十一世纪的话。说不定胡适还会认真考据一番，拿出大量的证据证明台湾之于大陆的领土地位。但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实是，由于胡适等“五四”新文化精英们对湖南青年毛泽东的冷落，致使当时最具历史洞察力、最富历史创造性的一个天才人物，放弃了与文化人为伍的努力，放弃了以曾国藩为师的人生定向，转向他小时候就已经烂熟于心的“水浒”人物及其水泊梁山。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可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孤独到了不知壮志如何以酬的心境写照。虽然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闲着，但他还没能明确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努力方向。直到那年回家乡看到了湖南

农民运动，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小时候看《水浒传》的时候就知道了的草莽造反，江湖暴动，此刻在他下意识里飞快地发酵起来。毛泽东由此“激扬文字”，写出了那篇个人宣言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将农民的暴力行为作了诗意十足的美化和歌颂的宣言，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说是向胡适那样的绅士和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的挑战。在毛泽东的下意识里，胡适当年从他那里没有听懂的那些湖南话，此刻似乎全都由湖南农民运动说出来了。农民们拖着土豪劣绅四处游街的情景，让毛泽东看在眼里就像他本人在朝胡适那样的绅士吐痰一样，又解气又解恨，浑身上下充满快感。读读这样的文字，该知道这样的快感让毛泽东亢奋到了什么程度。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这二个“一切”里面，当然也包括胡适那样以高等华人自居的知识权威。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笔工笔整地抄写曾国藩日记的，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疾呼“湖南独立”、“联省自治”的，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朝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喊“陈君万岁”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在意识层面上说的是马列主义的现代白话汉语，在下意识层面上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被当年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洪秀全们的立场上。虽然他作出这样的文化转向时，并不知道将来能否获得成功，这就好比赌博，一个赌注押下去时，并不知道究竟是输还是赢。但毛泽东就这么选择了。

毛泽东后来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历史原因，其中包括毛泽东后来对日本侵略者那番真诚道谢。因为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在客观上确实使毛泽东及其溃不成军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地逢生，从生存空间上创造了绝妙的转机。不过，毛泽东最应该感谢的，当数他称之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这种称呼听上去不无搞笑，仿佛孙中山是在前面开路的孙悟空、而毛泽东则是孙悟空的师父兼主人唐僧一样。

虽然毛泽东从曾国藩立场转向洪秀全立场是轻而易举的，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但要让整个历史环境从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暴乱之后的改良格局，重新转化为适合于洪秀全式的人物进行江湖作乱的以暴易暴环境，却不是当时的毛泽东力所能及的。这样的历史转折，确实是那个“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给后来的毛泽东提供的。

无论是智力、能力还是个人野心和活动能量都介于洪秀全和毛泽东之间的孙中山，是将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李鸿章们好不容易开创的改良时代推回到经由造反完成王朝更迭的那种黑暗的历史轮回中的首要作孽者。假如将来要作历史审判的话，那假如毛泽东是主要被告的话，那么孙中山理当是首要被告。

历史不能假设。但有时假设一下历史，也有助于看清历史。假设当年没有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推行列宁主义，发动统一全中国的那场所谓的北伐战争，那么不

仅不会发生毛泽东所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而且整个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依然会朝着从曾国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轨迹发展，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依然是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在那样的文化政治格局里，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即便在北大没能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其他地方也可能一圆其扮演文化英雄的梦想。比如上海(章太炎和邹容的“苏报”案就发生在上海)，或者广州(当时的广州在陈炯明当政时，相当看重文化人，陈独秀就被邀请去当了教育秘书长)。因为满清王朝垮台之后、被中共教科书里称之为的所谓军阀割据状态，其实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最为松懈的时期，更不用说，当时的各路诸侯正在纷纷形成联省自治的共识。在中国社会，建立民主政体绝对离不开地方相对独立的联邦体制。仅从地理上看，中国就是一个以板块结构为特征的天然的联邦国家。周以前的夏商乃至更早的中国原始民主政体，就是与诸侯联盟共生的。周武王的那场战争将诸侯联盟变成了君主分封，而周公的建制又完全与“洪范九畴”中的原始民主原则背道而驰，建立了以等级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后来的孔子又进一步建立起与之相应的儒家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周—孔专制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这一中国社会难以摆脱的相当封闭的以原地循环为实质的历史传统。满清王朝的终结，尽管并不意味着终结了中国社会再度回到专制时代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就此消除了中国人的专制情结，但毕竟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重建民主联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历史机会。而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性，也正是在于人们普遍意识到了这么一个历史机会，不容任何人开倒车。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预示了这个机会的历史可能性，并且从语言、文化和心理意识上为将来的民主联邦政治作了准备。然而，这个机会被孙中山以引狼入室的方式联合苏联人给葬送了。

撇开苏联人的干预以及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假如没有中国人的接受，苏联人再干预也无法奏效，就像后来的蒋介石与苏联人一刀两断，人家也拿他没办法；历史的主要症结，在于孙中山的君临天下情结。

中国政治领袖的帝王情结，可能是中国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历史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晚近历史上，除了曾国藩之外，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怀有这样的帝王情结。洪秀全当然不用说了，即便是康有为，也大有一种做不成帝王也要做一把帝王师的劲头，或者说，得不到权力话语，也得抓一把话语权力，更何况孙中山这样一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野心家？袁世凯上演的称帝喜剧，其喜剧性不是在于他依然想做皇帝，而是在于在满清王朝终结之后，即便想做皇帝也已经不能再公开称作皇帝了，而应该叫做大总统，或者像后来那样叫做什么什么主席，什么什么书记，甚至效法慈禧太后退居幕后，也照样可以过足帝王瘾。反正无论把个皇帝怎么个做法怎么个叫法，都不能再公然宣称自己是皇帝了。这可能是孙中山要比袁世凯与时俱进的地方，他懂得应该将皇帝的辫子藏起来，套上大总统的头套。不管他所号称的大总统是临时的，还是是非常的，重要的是骨子里依然是皇帝。他还懂得，除了戴上大总统的头套之外，嘴里还得附加一些有关民主民生之类的说法。他心下很明白，除了愚昧的民众，谁也不会把那些说法当回事。只是作为领袖人物，理当把牛皮尽可能吹大。洪秀全弄出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会，孙中山则提出一个煞有介事的三民主义。当然了，他们二个在吹牛皮上谁也吹不过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且还一再放话要“解放全人类”。把个牛皮吹到那样的份上，即便没说自己的皇帝，受其荼毒的民众也发现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原来是个土皇帝了。不过，孙中山的牛皮虽然吹不到毛泽东那般宏大，再加上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其帝王野心倒是一直没有

被充分揭露过。

然而，与孙中山同时代的人们，也并非毫无觉察其帝王情结。当孙中山在东京重组革命党、强令党员们按手印向他表示效忠时，黄兴、、陈炯明、李烈钧等领袖们就非常反感，并且当场抵制。当孙中山在广州坚持要称非常大总统、并且执意要发动那场统一战争时，坚持“联省自治”立场的章太炎拂袖而去，与他断然分道扬镳(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

不管孙中山表面上如何作出军政宪政之类的许诺，但他骨子里既不喜欢民主制，也不喜欢联邦制。当初宋教仁在国会里进行议会民主努力时，曾经恳求他留下来一起工作，并且还愿意照样奉他为首席领袖，他却理都不理地把宋教仁扔在北京，听凭人家独力面对如狼似虎的袁世凯，结果导致袁世凯肆无忌惮地杀害了宋教仁。在袁世凯称帝喜剧落幕之后，广东追随过孙中山的开明革命领袖陈炯明，苦口婆心地劝过孙中山，在广东搞联省自治即符合广东本地的经济文化需要，也符合全国上下联省自治的历史潮流，孙中山非但听不进去，彼此决裂之后，他还一翻脸把陈炯明打成了反革命(参见《陈炯明与孙中山是如何决裂的》一文，刊登于《南方周末》)。明明是自己理屈，却反诬他人。这场冤案与后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的彭德怀一案，十分相像，只是具体的内容和具体的方式不同而已。有关孙中山的文化人格和政治人品，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袁伟时教授在《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一文中，特意引用了宋教仁、陶成章、章太炎等与孙共事过的六位革命领袖和亲密朋友对孙的评说，然后总结道：

以上六人无不认为，孙文作为政治家，在品德上有不少重大缺陷。同时，他们的评论虽有差异，但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点：1，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2，轻率，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3，权欲、领袖欲很强；4，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

--《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有意思的是，假如这样的评语用到诸如洪秀全或者毛泽东那样的人物身上，几乎也是同样合适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凡为江山折腰的政治领袖，不外乎这类性格特征：只知道坐江山却不懂治理国家，满足个人野心远甚于对关切民众疾苦。洪秀全到手南京定都为天京之后，天下还没有摆平，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在如云的嫔妃堆里腐烂发臭(参见刊于《炎黄春秋》上的文章，《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凡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应该全都领教过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不是让中国的人口越死越多，就是让国人的人心越变越坏，几乎没做出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幸亏孙中山没有等到坐上江山就撒手人世，要不从他高谈阔论如何在地图上建设一条从内地通到西藏的铁路的空口大话腔调来看(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并不比毛泽东高明到哪里去；显然也是个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不懂得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懂得如何建设国家、如何治理天下的乱世枭雄。

再对比一下曾国藩，孙中山那场北伐战争的实质就更加清楚了。要说武力统一全中国，曾国藩是最有条件的，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有条件。毛泽东提出打过长江去的时候，还有许多反对声音，甚至连他身后那个苏联独裁者都希望中国划江而治；但当年

曾国藩平定洪秀全作乱之后，不仅没有人反对他继续用兵，而且还有不少人纷纷劝他北上，一举推翻满清王朝做皇帝。但曾国藩最后用“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作答，不仅拒绝北上，而且解散湘军。这样的举动，只有当年的周武王姬发做出来过，叫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曾国藩以此换得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中国从战乱暴乱的历史黑暗转向和平改良时代、从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转向相对独立运作的、既松散却活跃的地方分权，然后为推动此后整个中国社会经由历史上的东南自保、转入联省自治的历史进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不同，曾国藩看重的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如何到手一个江山。可惜的只是，曾国藩当年所做的一切，都没能形成明确的文字，都没有被总结成历史经验，更没能被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话语。

相比于曾国藩当年的拒绝北上，孙中山却是在最没有条件最不应该发动统一战争的历史环境里，硬是依仗着苏联的支持，建立军校，招兵买马。孙中山由此将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从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转移到了突然崛起于南方的黄埔军校，以致就连郭沫若那样的天狗诗人，都人模狗样地穿起了军装。军校一起，原先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文化氛围马上被冲淡，军装比学生装立即变得更加令人瞩目。不要说像胡适、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就连孔夫子那样的老学究，在人们下意识里都被他们从《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里读来的关公、张飞、武松、李逵等等给取代了。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因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地位，一下子成了远比北大《新青年》诸君更为耀眼的时代明星。从北大到黄埔军校、从文化启蒙到统一战争，历史就这样被转向了：从当年曾国藩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局面，转回到洪秀全方式再加列宁主义暴动的北上作乱。

弄清了历史的这种转向，那么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王国维在这场战争开始后会断然自尽。王国维从这场战争里预见了即将来临的历史灾难，叫他的说法叫做：“先共和、后共产”。后来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位先知学者的预感，叫做：先孙中山，后毛泽东。孙中山也罢，毛泽东也罢，无论是谁坐了江山，文化人和中国民众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相比之下，用后来的文化人储安平的著名描述叫做，一个是自由多少的问题，一个是自由有无的问题。拖着辫子的王国维，似乎十分清楚地看见了身著中山装、假装斯文的那个孙中山脑后的辫子，甚至还似乎看见了后来在天门城楼上尖声高喊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泽东脑后的那根辫子。所谓先知先觉，在中国就是指一些能够看见那些没有辫子的领袖人物脑后依然有根剪不去、理还乱的辫子的人物。这样的先知先觉式人物，在王国维之后有陈寅恪，在王国维之前则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王国维的历史洞察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其深湛的文化底蕴。说到王国维的这种文化根底，不得不提及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中国文艺复兴。

宋、明之际的人情世风和文化嬗变可能是最为值得玩味的。一方面出现了宋明理学尤其是如同朱熹那样的十分极端和僵化生硬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王阳明心学另当别论)，这种道德伦理上的偏执同时又表现在所谓的爱国主义的强横和霸道上；另一方面，话语权力的这种空前强化，同时又压抑出了演义小说中的那种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这是与宋明理学相反相成的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演变。然而，就在文化如此沦落的情形之下，好比从淤泥中开出的莲花，中国文化在一堆污泥当中出现了一线生机，

这就是从禅宗到《红楼梦》的文艺复兴。

禅宗的出现，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心灵自由和创造可能乃是空前的。无论是《沧浪诗话》中的诗学倾向，是苏东坡诗文中的放浪不羁，是明末散文中的情性和空灵，或者是明清诸如“三言两拍”之类小说中的人情味，甚至包括王阳明的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尤其是最后《红楼梦》的横空出世，都源自于禅宗带给人们的那种心灵的解放和人文意识的觉醒。禅宗的出现，使源自《山海经》的中国最为始源的文化精神，重新复活，并且绽放出了另一种人文景观。

假如可以用古希腊悲剧中的两种悲剧精神来作参照的话，源自《山海经》的中国文化精神，起先以埃斯库罗斯式的形式呈现，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特征。夸父的追日与普罗米修士的盗火，几乎是异曲同工。就历史而言，从汉末党锢到徐锡麟、秋瑾乃至到为“五四”所感召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精神可谓绵绵不绝。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悲剧景观，或者说，一种埃斯库罗斯式的、不无浪漫的、极为英雄主义的人文景观。

另外一种景观，可以称之为欧里庇德斯式的悲剧精神。相比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和阳刚，欧里庇德斯式的悲剧精神所注重的是弱者的权利和弱者的心声。普罗米修士式的盗火，到了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或者《美狄亚》里面，变成了对妇女儿童及其命运的空前关注，变成了面对战争、面对历史时的绝对人道主义立场，变成了对男人在战场上的所有荣光、对战胜者任何历史主义式的骄傲的深深质疑。这样的景观，在一个专制的文化传统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直到禅宗所激发的那种自由精神开始觉醒，直到这样的觉醒经由一段历史时期的精神酝酿，才慢慢地孕育出《红楼梦》这么一部融和了索福克勒斯那种命运观念的欧里庇德斯式那种悲剧精神的伟大小说。一部《红楼梦》，几同于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

《红楼梦》开篇从《山海经》里的女娲补天起笔，以其空前的苍茫恢宏、以其一般作家无以企及的精致细腻，写出了与周孔传统全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展现出了与演义小说截然不同的美学境界。黑暗的专制文化空间里，由此出现了从最始源的《山海经》(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散文等等)到禅宗、再由禅宗到《红楼梦》的一线光明，或者说一脉清晰可见、清香隽永的文化香火，一种在整个人类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文化的精神标高。仅以诗歌传统为例，无论是曹操的恢宏，还是陶渊明的清高，或者是李白的放浪和李商隐的雅致，在林黛玉的《葬花辞》、《桃花行》、《五美吟》或者薛宝琴的咏史诗跟前，全都黯然失色。即便是屈原那首千古名作《离骚》，都被贾宝玉重新改写为更加令人动容的《芙蓉女儿诔》。正如英语文学的人文传统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一样，中国的现代人文精神，直接发轫于曹雪芹的《红楼梦》。

这就是王国维的人文背景。王国维的文化定位，不在于夸父式的志士仁人，也不在于曾国藩式的修齐治平，而在于对《红楼梦》以降的那种人文精神的承继上。《红楼梦》的现代性与曾国藩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她不在于时间向度上的历史进取，不在于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在于确立起一种现代的人文精神，一种不以历史意志、更不以任何帝王的权力为转移的文化标高。英国人声称，他们宁可没有印度那样一个国家作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同样道理，中国人应该声称的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历代专制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即便是出一百个毛泽东也抵

不上一部《红楼梦》的问世。为实现野心和欲望、为江山而折腰的所谓历史伟人，在文化的精神标高跟前，再伟大也是渺小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与曾国藩相比尚且要矮一大截，更不用说站到《红楼梦》跟前。他唯一还可以引以为骄傲的是，他毕竟年轻时抄过曾国藩的日记，他毕竟认真读过《红楼梦》，不管他有没有读懂。相比之下，他的党内同志们，没有一个像他这么认真读过。至于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更是无从谈起。

王国维的历史眼光之所以会具有那么深邃的穿透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拥有这样的文化高度。王国维是自《红楼梦》问世之后、极其鲜有的几个真正读懂者之一，并且还是最早的读懂者。他不仅从悲剧精神的角度评论了《红楼梦》，而且在他的《人间词话》里，显示了与《红楼梦》十分相近的美学立场和人文高度。更不用说他的那篇《殷周制度论》乃是解开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之谜的经典论文(参见作者长篇历史小说《商周春秋》及其“自序”和“代后记”中的有关论述)。王国维以其一生的著述，最后以他的生命，承接了《红楼梦》点燃的文化香火。而且，当他把他已经看见了的那段越来越沦落的历史从他的生命当中断然扬弃、就像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陈寅恪突然大彻大悟，毅然接过了王国维遗留下来的那柱精神之香(参见拙作《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以及拙文《悲悼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基于、也唯有基于这样的精神标高，人们才可以看清中国晚近历史上的基本文化格局、以及各个历史人物在这格局中的历史位置。

在纷纭复杂的中国晚近文化历史格局里，其主要的历史线索在于三个不同的文化群落，或者说三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一者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人文精神标高，一者是从曾国藩到变法维新、到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再到“五四”文化领袖及其早期共产党人的前赴后继、或者精励图治或者赴汤蹈火，再有一者便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最后到毛泽东的江湖草莽们为江山美人竞折腰的历史循环。这三种文化都有各自的象征人物和历史标记。不仅那线精神性的文化气脉隐隐可见，即便是从曾国藩到“五四”的那一代代事功性的文化精英，其一步一步努力的历史轨迹也是清晰可辨的：先是技术上的引进、经济上的振兴(曾国藩、李鸿章们的努力)，然后上升到政治上的诉求、不管希望立宪还是要求民主(百日维新或者宋教仁那样的议会民主)，最后再上升到由语言的更新而导引出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与其说是一步步的历史进程，不如说是一层层的逻辑开展。

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通通被孙中山酝酿和发动的那场以谋求孙氏大一统的北伐战争给打断了。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曾国藩出师之前的那个洪秀全脚下，只是此刻的洪秀全分别先由孙中山出演，后来又换作了由毛泽东扮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不说看出了、至少也已经感觉到了这样的历史转向。因为他不是不知道湖南农民运动跟他早年师从的曾国藩乃是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他不是不知道以暴易暴是与曾国藩的修齐治平原则格格不入的经世之道，他不是不知道在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一个是书生，一个是流氓。但他断然放弃了书生意气，他断然选择了流氓生涯。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准备要以“为江山竞折腰”的方式来主宰一下中国历史的沉浮了。这也许是他下意识里的精神创伤起了作用，也许是他觉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除非他甘愿默默无闻地度过此生。但不管怎么说，他作出了那样的选择，从湖南农民运动，走向所谓的秋收暴动，最后走向井冈山落草。说来令人感叹，历史的转折，有时就在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人生选择上。

这段历史论说到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换位：当毛泽东从书生走向流氓的时候，继孙中山而起的蒋介石却十分有趣地试图从流氓变成书生。蒋介石在孙中山身后坐上国民党的委员长宝座、假借孙中山号令天下的时候，他悄悄地引以为楷模和精神导师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曾国藩。也就是说，当毛泽东把曾国藩日记家书什么的通通扔到地上时，弯腰从地上捡起这些书籍的不是他的同党同志，而是血腥地屠杀了他的同党同志的冤家对头蒋介石。这个历史插曲是如此的意味深长，简直可以说是解读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所在。

从青红帮中出道的蒋介石，骨子里却十分向往做个“激扬文字”的书生。中国的江湖帮会演变到蒋介石出道的时候，已经从农村进入了城市。别小看这么个变化，其中奥妙无穷。同样的江湖帮会背景，从上海滩上混出来的蒋介石与从唐人街走出来的孙中山(孙 13 岁之前乃是在“前现代”的广东农村里—按照袁伟时教授的说法—长大的)截然不同。在西方城市里出现的唐人街虽然在表面上也算是城市一景，但骨子里没有丝毫城市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全然是中国农民在西方城市里的移民结果，只具生存意味，没有存在取向。因此，从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孙中山，无论怎么个折腾，也不会想到去研习曾国藩。虽然他当年给李鸿章写过信，但其信犹如石沉大海(不知被李鸿章扔到哪里去了)。此后，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再也不敢奢望跟那类宋明理学出身的文化政治精英沾边，因为彼此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取向实在是太不相同了，孙中山在他们面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

但从上海滩帮会里混将出来的蒋介石却正好相反。虽然蒋介石的文化根基并不比孙中山好到哪里去，就像其传记作者所说的，其“幼年时期教育很少”，但他却对精英文化有一种莫名的羡慕和向往。就此而言，他确实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去世之后，他不仅向章太炎示好，而且对一度被捕后来又被释放的陈独秀也怀有相当的敬意，虽然他的表示友好不外乎诉诸悄悄地托人送钱之类的江湖方式。他所示好的这两个人物，尽管一个是传统的学界泰斗，一个是新文化的首席领袖；一个与孙中山有过合作，一个从来不愿跟孙中山合作；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即在骨子里谁都不认同孙中山。当然，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最大背叛，则是不以洪秀全为然，而是改成以曾国藩为师。蒋介石后来的反苏清共，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利益需求之外，他的这个文化取向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的这种文化取向其实也是对他自己的背叛。这样的自我背叛，可能是解读蒋介石的关键所在。蒋介石虽然想学曾国藩，但他骨子里并不是曾国藩；他虽然一再向章太炎或者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表示他的一点点敬意，但他骨子里并不真正把文化人当回事。这里的喜剧性在于，毛泽东再流氓，骨子里依然文化犹在；而蒋介石再文化，骨子里就是改不掉他的流氓气。这就好比上海滩的杜月笙对章太炎敬重有加，但杜月笙永远也做不了章太炎的学生，哪怕是学生的学生也做不了。蒋介石与杜月笙、或者与孙中山可能是一百步和五十步，或者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但蒋介石和曾国藩之别却是黄土之于高山。再打一个比方，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英雄，曹操是一个标高。除了曾国藩，历史上无人超过曹操。文化的底气，不是想学就能学成的。

蒋介石的这种尴尬，导致了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捉襟见肘。且不说他后来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半法西斯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党”为根底

和推动，被其传记作者讥为“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参见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且不说他在面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时的不知道如何向中国民众解释他的抗战决心和以弱胜强的困难，最终导致在“西安事变”中受人挟制；就以他上台时的分党清共血腥手段为例，就可以看出他再向往曾国藩也难改其流氓本性的文化人格。

蒋介石以上海“四。一二”血案为标记的分党清共，与曾国藩的平定太平天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当年曾国藩是基于士大夫的文化立场讨伐洪秀全的草莽暴动，这在其《讨粤匪檄文》中表达得再也清楚不过，而蒋介石却是借助帮会势力在扑灭苏联十月革命式城市暴动的同时屠杀了众多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追随共产党的热血青年。在这个历史事变当中，蒋介石除了显示出他身上那种青红帮式的霸气和宁波生意人的精明(相当于毛泽东喜欢说的虎气和猴气)之外，没有丝毫曾国藩式的文化心胸和文化气度。一心想学习曾国藩的蒋介石，一旦面临大事，却本能地效法了孙中山。宋教仁在国会里从事民主政治的艰巨努力时，孙中山甩手而去。等到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之后，孙中山非但没有接过宋教仁所高举的民主旗帜抓住时机推进民主政治、让中国民众获得一次学习如何从事民主政治的绝好机会，反而以按手印的强横向革命党同仁摆出他的帮主腔调，同时又以所谓“二次革命“的暴力方式，向世人表明他孙中山与宋教仁并非站在同一立场上。孙中山虽然与宋教仁同为革命党，但孙中山的文化立场和历史取向却是袁世凯式的，而不是宋教仁式的。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样的没有文化，一样的帮会气十足，虽然他毅然否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路线。蒋介石结束孙中山的列宁主义路线在于他本能地不喜欢洪秀全式的暴动，真诚地向往曾国藩式的修齐治平。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惨杀无数卷入那场大革命的青年男女，却又跟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茫然无知有关。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有一万个不是，也不该遭到如此屠戮，更何况他们在精神上和历史意识上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产物。本来孙中山基于其江湖出身和帮会意识对于“五四”已经天然隔膜天然无知了，而蒋介石的这场大屠杀更是把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与“五四”永远隔离了开来。“五四”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资源，充满历史创造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谁占有了“五四”的文化资源，谁就将成为逐鹿中原的赢家。在后来四十年代的那场内战中，为什么是毛泽东取得胜利了而不是蒋介石获得成功，其根本的历史文化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以他生动形象的白话文写作占有了“五四”资源。无知的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与苏联顾问分手的时候，却一点不懂得“五四”资源的重要性。当年陈炯明在广东做领袖的时候，还曾经邀请过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仅此区别，便可见出蒋介石文化素质之差，也可见出孙中山在选择追随者时，其眼光里的文化含量是多么的贫乏。当然，也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失败是从他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的。

因此，毛泽东第二个应该感谢的，乃是蒋介石。孙中山的北伐，仅仅给毛泽东创造了走向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蒋介石的大屠杀才给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进一步带来了历史的合理性。蒋介石大屠杀的愚昧在于，本来手中就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结果还要以血洗陈独秀的“五四”式中国共产党来清算由孙中山勾结苏联暴动专家所犯下的历史罪孽。由于没有文化头脑，蒋介石不懂得面对苏联列宁主义式暴动时，应该区分暴力犯罪和理想主义盲从。就算没有文化头脑，假如蒋介石懂一点毛泽东的统战谋略，他也不致于疯狂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那般地步。本着上海青红帮脾气

外加宁波生意人的小精明从事政治毕竟太狭隘，不要说不懂得在斩断苏联人的魔爪、剔除列宁主义的同时争取“五四”文化资源，就连分化瓦解当时内部四分五裂的中国共产党人，他都不懂；甚至连玩弄一下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之类的政治手腕，他也不会。蒋介石到手了北伐成果，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文化资源拱手相送给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从陈独秀的手里转送到后来的毛泽东手里。苏联人还仅仅是剥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权，而蒋介石的屠杀却在把历史合理性奉送给毛泽东那样的暴力革命者的同时，将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最终逼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就像一场魔术表演，一边是陈独秀的黯然退场，一边是毛泽东的赫然登台；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屠刀不知不觉地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从陈独秀那里挑落到毛泽东头上，致使“五四”话语最后完全变成了毛泽东话语。而且其时，“五四”新文化经由血的奠祭，已经变得如同基督一般神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神圣后来竟然又错位成了毛泽东神话产生的历史前提。

历史就是这么的阴差阳错！假如曾国藩在黄泉之下有知，不知会老泪纵横成什么模样。须知，不管蒋介石如何努力学习曾国藩，不管毛泽东如何彻底遗忘曾国藩，曾国藩还是难以被请回到中国历史舞台上来。蒋介石的文化根底实在太浅了，他的文言文写得再像样，也写不过毛泽东的白话文。不说其它，光是比较一下蒋介石煞费苦心写成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随手挥就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可以明白，流氓再文化也依然流氓，文化人再流氓也依然文化。

没有文化的蒋介石，走不出同样不文化的孙中山给他设定了的历史阴影。虽然蒋介石推翻了孙中山当年定下的联俄联共，但他在政治上的一切还是来自孙中山。他登上权力顶峰之后，不得不将孙中山尊为国父，以此保持权力继承的合法性；不得不继续打着孙中山的旗号，煞有介事地让国人整天背诵所谓的“总理遗训”，以此作为他少得可怜的话语资源。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结，在蒋介石却是没有孙中山就没有他蒋介石。就文化头脑和历史胸而言，蒋介石比陈炯明相差太远太远；就治国能力而言，蒋介石又比不上阎锡山；其行军打仗不如李宗仁、白崇禧之流，其传统文化根底上又难以与吴佩孚、段琪瑞之辈相较，就算是比匪气比强横，他也没有东北的张作霖敢作敢为，既坚决反共反苏联，又绝不向日本人低头。孙中山的历史阴影对于蒋介石来说，乃是他的先天不足。这个一心想学曾国藩的委员长，其政治资本和历史合理性等等，全都是从他那个洪秀全式的前辈孙中山那里来的。孙中山所赏赐的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成为蒋介石日后成事的全部资本和走上历史舞台的基本铺垫。既然历史已经被孙中山从曾国藩划出的轨迹转回到洪秀全的脚下，蒋介石当然除了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外，别无选择。而他的最后落败退向台湾，也是他的别无选择。或者说，是他那样的文化人格和政治品性的必然结果。蒋介石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克罗泽十分搞笑地总结蒋介石的一生说：“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真不明白这位传记作者究竟是没有看过希腊悲剧，还是不懂蒋介石其人，竟然会得出如此离谱的结论。

由于蒋介石的这些先天不足，毛泽东自然十分蔑视这样的对手。不管身处如何艰难的境地，毛泽东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把胜利看作是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一个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婴儿。因为同样信奉暴力解决一切，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在蒋介石是不成章法的，而在毛泽东却是自成体系的。也即是说，蒋介石的暴力没有相应的暴力话语，而毛泽东的暴力却有他一整套暴力革命的话语作底。且不说曾国藩

的改革不崇尚暴力，即便是他的那篇《讨粤匪檄文》，蒋介石也没有能力整合成像毛泽东那么完整的套装式话语。毛泽东十分罕见地将马列主义的现代汉语版和中国演义小说中的暴民意识天然浑成为一套革命话语。其中不仅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方针，而且还有如何取胜的“三大法宝”，再加上一套套如何改造和控制人们思想的精神奴役术，连同漂亮宏伟的理想主义包装，从解放一个村庄，到解放一个城市，再到解放一个国家，最后还有解放全人类。其气派，其精致，简直是美仑美奂。最野蛮的行为、最黑暗的心理、最无耻的方式，最牛皮的吹嘘，十分奇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座宏伟精致而又简单明了的话语迷宫。不要说会讲现代汉语的中国人被骗得晕头转向，就连不懂现代汉语的西方人，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法国政客，也都被唬得两眼昏花，不说五体投地，至少觉得神秘莫测。

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绝对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毛泽东凭借其话语构建能力所玩弄的那套帝王术，说穿了也是很简单的。比如，他擅长于对着文化人耍流氓，然后反过来又对着赳赳武夫扮演文化人。当知识分子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时候，毛泽东用“不开饭”、或者赶到工厂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而他一转身面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绿林武夫，又会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去阅读一下《红楼梦》，还煞有介事地一再问道，看过几遍了？两遍？不够，至少五遍。如此等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们，应该都知道这种手法的。

毛泽东确实太应该感谢蒋介石了。假如没有蒋介石那场屠杀，“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资源没有经由那样一次血的奠祭，那么毛泽东再有语言能力也很难把他的的暴力话语和帝王话语与“五四”做出顺理成章的联接。当孙中山在搞黄埔军校的时候，陈独秀并没有因此将“五四”话语作了黄埔军校式的阐说，直到蒋介石屠杀了许多因为受了“五四”新文化影响而信奉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男女之后，暴力革命才上升到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话语的历史地位上。且不说其他，即便是传统而古老的复仇心理，就足以使所谓的“武装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足以使坚持非暴力立场的陈独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向来相信所谓的“以毒攻毒”，既然蒋介石可以如此狠毒，那么毛泽东再狠毒也是合情合理的。要不中国民众怎么会那么欣赏杀了人家一家大小的武松，在墙上醮血而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要不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怎么会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道县大屠杀呢？这不都是源自一种革命有理、杀人无罪的暴力逻辑么？用电视剧《水浒传》里的一名歌词，叫做“该出手时就出手”，意思就是，该杀人时就杀人。那部电视剧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二十年之后拍摄的，暴力崇拜和暴民心理不见丝毫改变。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历史合理性，就近而言，是蒋介石的大屠杀给出的；而就长远而言，乃是全体中国民众共同造成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成功，除了他在语言上的个人才能之外，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也就在于，当他在完成他的现代暴力话语的时候，整个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还没能来得及完成系统的现代改良话语，没有完成一整套具有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现代民主联邦政治话语；而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现代人文精神话语，又由于暴虐的历史和历史的暴虐而被长期悬置，致使蛮横粗鄙的毛泽东话语恢恢乎游刃有余。

被孙中山的北伐战争所中断的“五四”文化启蒙，后来是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又被重新继起，然而还不足十年，又被一场血案所中断。中国历史的悲哀，总是在于

刚刚走上政治改良或者文化建设的轨道，旋即就被一场暴力推回到黑暗的历史循环里。

有人说，“五四”之所以难以为继，乃是救亡压倒启蒙所致。殊不知，以北大为标记的“五四”启蒙，早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之前，就已经被以黄埔军校为标记的列宁主义暴动给粗暴地打断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都不以“五四”启蒙为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着非常致命的历史局限性。“五四”启蒙运动既没有建立起现代精神话语，也没有找到现代改良话语，更没有意识到宋明之际的演义小说里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成的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扭曲，比快日薄西山的孔儒文化还要黑暗。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领袖们，只知道“孔家店”需要推翻，不知道《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文化心理积习比孔学儒教更加反科学反民主。也许唯有鲁迅意识到了这样的心理扭曲，提出了国民性批判。但鲁迅并没有将此继续上升为一种明确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相比之下，周作人对欧里庇德斯悲剧的重视和将“五四”与明末小品作精神组接的努力，可能更加具有人文精神上的建设性。但由于毛泽东话语的崛起，周氏兄弟的这种洞察和这种努力，最后都成了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毛泽东以一种现代帝王话语极其随意地强奸了“五四”精神，同时又把鲁迅信口说成“民族英雄”，听上去像岳飞、文天祥那类人物一样。毛泽东以此挫掉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历史锋芒，扼杀了知识分子基于“五四”精神质疑演义小说里那种民族心理创伤的可能性。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令人遗憾的，在于没有从文学改良的文化话语上升到政治改良社会改良的历史话语。历史在被做出来之前，往往需要首先被说出来。尤其是从专制大一统转向民主联邦制的历史进程，是绝对不可能闪烁其词地“摸着石子过河”的。假如周公当年没有颁布那么多的诰令，其专制集权体系又如何能够逐步确立？就像毛泽东假如没有建立起他的一整套话语，凭什么征服其党征服天下？历史的意识总是通过历史性的话语，最后成为历史的事实。

曾国藩留下的最大历史遗憾，在于没有建立起与他的事功相应的文化理论和政治话语(参见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第三章，“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法将宋明理学作为他的社会改革话语的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确实已经在精神上作古了。曾国藩虽然留下了许多书信和奏折，但他写不出系统的改革话语。甚至他的扑灭洪秀全暴乱，都无法形成完整的“讨匪”理论。比起后来毛泽东那么的能说会道，曾国藩实在是太敏于行而讷于言了。

这样的历史遗憾引出的另一个遗憾，乃是等到后来的康有为试图建立一套改革话语的时候，又十分错误地回到孔儒话语里，试图从儒教伦理当中求得“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康有为的乌托邦是虚幻的，但康有为的野心却是实在的。空洞的大话总是和渴望话语权力的野心相辅相成，就像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一样，翻过去是理想，翻过来是野心。戊戌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跟被康有为野心的误导有关。一场重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改革，是绝对不能诉诸大话和空话的。

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国藩当年没能建立的社会改革话语好不容易等到了重建的时机，却又被苏联的十月暴乱所影响。苏联的十月暴乱不仅影响到“五四”话语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指向，而且通过孙中山直接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

史进程。苏联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激发的不是中国人早先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创造精神，而是弥漫在后来的演义小说当中的暴力崇拜、暴动快感和暴民意识。由此，先后催生的三个历史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比一个流氓，一个比一个阴狠。最后是最流氓、最阴狠的那一个胜出。或者说，最《水浒传》、最《三国演义》的那一个，成为大赢家。

现代改良话语，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联邦话语，在中国致今依然一片空白，依然停留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的探讨中，而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现代汉语，尤其是简体字版的现代汉语。这除了孙中山的胡闹和毛泽东的崛起等等历史原因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比如胡适对禅宗的无知，对《红楼梦》的一知半解，陈独秀在倡导其“文学革命”主张时的三个“推倒”，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其极端犹如后来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胡适、陈独秀等人在“五四”启蒙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方式，有时也是相当“水浒”的，就像李逵那样，“排头砍去”。胡适的精彩是在他面对蒋介石没有文化的专制时，始终坚持着自己崇尚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文化立场。而陈独秀的出类拔萃则在于，当他经历过了苏联列宁主义暴动的残酷现实，经历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或者说同志同伙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之后，幡然醒悟。陈独秀在其晚年不仅拒绝去延安，而且不屈不挠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和反省共产主义革命的暴力原则。假如拂去种种人为的重重迭迭的历史尘埃和话语尘埃，人们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放弃“五四”的文化立场转向草莽式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的时候，陈独秀恰好回到了他当年的“五四”文化立场，并且对苏联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专制，进行了痛定思痛式的批判。陈独秀顶着“陈托取消派”的政治帽子，将他的“五四”文化立场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陈独秀一生最为精彩的是，他早年不认孙中山，后来不认蒋介石，最后又不认毛泽东。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三个大流氓，他一个都不认。他早年拒绝认同孙中山的大总统野心和大一统战争，在陈炯明跟孙中山闹翻之后，十分认真地邀请陈炯明参加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参见《陈炯明是如何与孙中山决裂的》一文)。他后来身系牢狱，蒋介石几度向他表示友好，他都冷冷地拒绝。表面的理由是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彼此信仰不同，但骨子里乃是一个文化领袖对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枭雄的蔑视以及“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予认同。陈独秀后来出狱后，曾有人为他和延安之间频频传话，但陈独秀拒绝去延安，更拒绝以毛泽东要求的那种写检讨的方式去重新入伙。当年孙中山要陈炯明写悔过书，陈炯明都拒绝了，陈独秀以一个文化领袖之尊，更加不可能受制于毛泽东要求他检讨的要挟。再说，毛泽东已经在延安称王，就从江湖规则来说，一山岂容两虎？

人们尽可以为陈独秀对这三个人的不认同找出种种理由，但其原因归根结底乃是在于，陈独秀不管早年如何激进，但他在文化取向上却与曾国藩们相近，与洪秀全们天然相克。

当然，历史的荒唐又在于，不管毛泽东如何的给中国共产党灌输他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却又被他牢牢地套在他的“山党”头上，从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资源，始终为他所占有。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最后到手江山的一个决定性的文化历史原因。

脱胎于“五四”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五四”的象征性带到哪里。当年许多热血青年的投奔延安，与其说是投奔毛泽东，投奔共产党，不如说是投奔他们心目中神明般的“五四”文化。可以说，当时热血青年们的投奔延安，其中没有几个人是读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大多是读了“五四”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诸如鲁迅的，郭沫若的，乃至于巴金的，老舍的，等等的。至于有些青年诸如王实味等等，后来对延安的失望，也正是失望在于，他们发现延安跟“五四”的科学民主理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不要说当时，就是后来的人们，也很难分清楚在陈独秀“五四”党和毛泽东“山党”之间，究竟有着多么实质性的不同。也许当时只有陈独秀是清楚的，他知道这之间的区别，所以他宁可穷死江津，也不愿去延安入伙。

但从另一方面说，不管毛泽东如何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草莽党，江湖帮会党，但依然还有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难以忘怀“五四”精神。这不仅在延安时期出现了王实味等人对延安“山党”作风的质疑和批评，而且即便毛泽东坐定了江山之后，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轮又一轮的发难之后，依然有坚持“五四”立场的共产党人对此毛泽东话语表示存疑，比如顾准等人。更不用说，到了八十年代，对“五四”精神的缅怀不仅推动了整个知识界的重新回到启蒙时代，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党内民主派，或者说，党内改革派。正是由于“五四”启蒙文化这种精神力量和历史影响，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既相同又相异的所指，不是空泛的，而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派人士，虽然没有太多的话语资源，但他们用很有限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历经沧桑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经验。那样的体验和经验，是许多八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哪怕达到了学贯中西的饱学程度，都无以望其项背的。顺便说一句，中国八十年代的许多留学生，其文化立场的飘忽不定，其为人处世的圆滑取巧，其见利忘义的市侩人格，在中国的留学生历史上乃是史无前例的。这可能也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历史效应吧。流氓的文化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流氓人格。在这样的文化空前沦落的历史背景之下，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省和批判，以及他们为推进政治改革而坚持立场的勇气和不妥协精神，显得尤其可贵，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五四”启蒙运动不管结果如何悲剧，但绝对没有过时，只是在话语方式和精神内涵上需要重新构建罢了。

在毛泽东的专制之下，不被毛泽东的话语所覆盖比不被毛泽东的专制所压倒更加不容易。抵抗毛泽东专制的不在少数，就连彭德怀那样的将军都曾拍案而起过。但很少有人不为毛泽东的话语所动，能够例举的，也许就数陈寅恪那样的文化守灵人。

从陈寅恪的家世背景和家学渊源上说，其承继的是曾国藩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意指其祖父陈宝箴当年乃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代的改革家，而且陈寅格本人早先的文化志向，也并不是王国维式的精神守护，而是当年隋唐学人王通那种讲学式的“河汾之志”。他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然而，王国维的自沉，使他突然醒悟，他的位置不在于教导人们如何修齐治平，而在于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这是研究陈寅恪最为关键的解读之处。许多陈寅恪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他如何通晓中国历史，甚至热衷于了解他掌握了多少种语言，茫然无知于陈寅恪的这种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历史担当。

当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时代转回到洪秀全脚下的时候，其他人也许稀里糊涂，但这样的变化瞒不过王国维那样的先知学者，也骗不过陈寅恪那样的历史学家。这两位《红楼梦》所展示的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直接承继者，于历史进程洞如观火。倘若说，王国维说出“先共和、后共产”时还仅仅是一种预感，那么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则完全是有的放矢了。

历史有时确实惊人地相像。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争夺江山的时候，稍许有点历史眼光的人，就不难看出其时与明末清初的历史局面是多么的相近。毛泽东以全新的话语方式扮演了当年的李自成，蒋介石正好处在崇祯的位置上；日本法西斯的入侵重演了当年的清兵入关，而那个吴三桂则由汪精卫扮演。整个历史与其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不如说因为各方的勾心斗角并且竞相押宝而变成了一张政治赌桌。毛泽东手中握有“五四”资源和抗日话语，蒋介石坐庄，汪精卫做不成岳飞只好选择秦桧角色，日本侵略者准备抢台面；如此等等。坐在赌桌上的各家，不过是个输家和赢家的区别，最倒霉的乃是坐在赌桌旁边的文化人。按照鲁迅的说法，每每碰上强敌入侵，文人和女人总要为敌不过人家的武夫和打了败仗的男人承担罪责。于是，有一些精明的文人，索性扮演话语英雄，在距离侵略者上千公里的地方成立“文抗”一类的组织，鼓励他人去打仗。

等到一曲终了，尘埃落定，有的为了奉承毛泽东而高唱《李自成》颂歌，有的找到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蒋介石是如何一个民族英雄，有的则为吴三桂的曲线救国或者体察其苦衷，或者寻找其理由，更多的则是探讨明末的知识分子是如何选择如何定位的，致使《桃花扇》之类的故事变得脍炙人口起来。这类把男女情事和家国兴亡掺和在一起的故事，虽然不见得如何深刻，但至少比郭沫若的《屈原》、或者《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街头剧，要有意思得多。因为这类故事写了文人和女人这两类最尴尬的人物。只是《桃花扇》的作者，无论是文化底气还是审美眼光，都显得不足和浅显，一如王国维所言，仅止于家国兴亡，而不具备《红楼梦》那样的人类性的甚至是宇宙性的悲剧气度。

从明末清初那样的历史格局里写文人和女人、并且写出《红楼梦》那种悲剧气度的作品，乃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落笔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审视的目光既不落在那张历史的赌桌上，也不落在赌桌的周围，而是将所有的笔墨和激情倾注在对一个妓女的命运的关切上。就好比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根本不以胜利者的意志和光荣为然，而是以失去了父亲和丈夫的妇女们为中心。男人之间的战争、男人之间的赌博、男人之间的江山争夺跟妇女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在整个历史当中，最为精彩的并不是在赌桌上赌得汗流夹背的男人们，而是一个在远离赌桌的地方默默地忠实着自己的情爱的女人。即便以家国兴亡而言，这个女人的心胸也绝对不下于任何男人，不下于她深爱着的名士文豪。陈寅恪那部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由此使得柳如是形象如同《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一样光彩夺目。

相比于同时代的历史小说《李自成》，陈寅恪以《柳如是别传》无论是对那张历史赌桌上的大赢家还是大输家，全都表示了空前的轻蔑。行事为人十分低调、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陈寅恪，通常要么不说话，一说就会让专制者感到难堪。读完他的《柳如是别传》，再迟钝的人也应该明白，他当年为何选择广东定居，既不愿去北京高就，也不愿去台湾依附国民党(参见拙文《悲悼“柳如是别传”》和《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

的抱残守阙》)。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陈寅恪，却有着最具洞察力的历史眼光和最不为专制话语所动的人文观照力量。

自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的声音被专制话语所淹没。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那些孙中山的异见者们，无论是陶成章、是宋教仁或者是陈炯明、或者是章太炎，通通因为孙中山的缘故而被打入冷宫。及至毛泽东登上金銮殿，历史更是成了一部空前的谎言。不要说愚夫愚妇们通通在毛泽东话语面前屈膝下跪，就是那些历史学家们也纷纷朝着现代专制帝王磕头礼拜。唯独陈寅恪依然恪守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文精神，不肯退让半步。并非是所有的人文学者，都能具备这样的人格力量的。且不说其他，仅以研究唯识宗出名的新儒家先驱熊十力为例，这类现象的悲哀，便可见其一斑。文化大革命当中，熊十力就因为被拖上去与妓女同台批斗过后，觉得深受其辱，痛苦得要死要活。从熊十力的这种痛苦当中，再反观其对毛泽东的诚惶诚恐，也就一目了然了。羞于与妓女为伍的文人，通常乐于与暴君为友。唯有敢于蔑视任何暴君的陈寅恪(无论对方披着什么样的外衣，诸如革命先行者、或者伟大领袖等等)，才同样敢于选择一个妓女，作为八十万字传奇故事的女主人公。陈寅恪高于其他中国学者之处，首先不在于会讲别人讲不出的许多种语言，而在于具有一般人难以抵达的洞若观火，而在于具有不为任何神话兮兮的专制话语所动的人文立场。陈寅恪由此写出了一部与《红楼梦》遥遥相应的伟大作品，由此承接了王国维留下的文化香火，使得欧里庇德斯式的中国人文精神绵绵不绝。

专制暴虐如毛泽东者，对付诸如熊十力、梁漱溟那样的文化人，简直是玩弄于股掌之间，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一旦面对陈寅恪那样的人文学者，却只能永远自卑，永远抬不起他那个强横的头来。当然，这也是毛泽东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区别所在。毛泽东至少还知道《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假如毛泽东读过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他也会知道，那样的作者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反观历史，毛泽东已经成了往事，但毛泽东现象并没有结束，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情结。这不是毛泽东太伟大，而是这个民族太卑微。这个民族总在遗忘和欺骗中过活，用谎言取代真相，用演义取代历史。他们喜欢被拯救，他们总是期待被拯救。这样的卑微，导致他们一会儿将下流坯子洪秀全奉为英雄，一会儿将把中国推入灾难性的历史循环的孙中山视为圣人，一会儿又对把十几亿中国民众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毛泽东敬若神明。过度扭曲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得这个民族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自省和净化，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诊治和拯救。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条高速公路，盖了多少幢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变态的心理是否得到了医治，其扭曲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拯救。只要这个民族继续崇拜孙中山、毛泽东一类的流氓帝王，那么就只能在地狱里永远挣扎，万劫不复。

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就得反省历史，比如把所有因为孙中山而打入历史冷宫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志士请出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

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中国人必须忏悔，尤其所有曾经为毛泽东专制作伥的人们，得向世人忏悔自己的罪孽；至于所有被毛泽东专制扭曲了的人性，也应该有所反省；唯其如此，民族的心灵才能得以诊治，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灵魂最终走出由毛泽东专制和毛泽东话语构成的毛泽东现象的历史阴影。

二00四年三月八日

写于纽约

主要参考书目：

《红楼梦》， 曹雪芹
《王国维文集》
《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著
《曾国藩文集》
《曾国藩》，唐浩明著
《胡适文存》
《陈独秀传》，唐宝林·著
《毛泽东全集》
《孙中山年谱长编》
《蒋介石传》，布赖恩。克罗泽著。
“The Greek Way”， Edith Hamilton
《前出师表》、《后出师表》， 诸葛亮
《三曹诗选》， 余冠英选编
《三国演义》， 罗贯中
《水许传》， 施耐庵
《李劼思想文化文集》 :
第一卷:《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风景》
第二卷:《论“红楼梦”》
第三卷:《论中国晚近历史》
第五卷:《论毛泽东现象》

论造反派

何　蜀

“造反派”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历史现象。但对它至今缺乏专门的、深入的研究。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中，“造反派”一词是被使用得最混乱不堪的。许多作者对“造反派”到底是指的什么人，并无准确、清晰的了解，就随意使用这个历史名词，常常把一些并不是造反派，而是“文革”初期的党政机关、工作组、保守派红卫兵或“文革”中、后期的军管会、革委会、专案组、工宣队、军宣队等等所干的坏事统统归罪于“造反派”。“造反派”成了一个筐，所有坏人坏事都可以往里装。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年的造反派，即使是最年轻的，也大多接近了退休的年龄。除去少数在不同领域通过自己的奋斗做出成绩的佼佼者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甚至不知道当今世界上有关“文革”的著述中对他们有着多么不同的描绘和评价——

有人说造反派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打手；

有人说造反派是“奉旨造反”的当代“义和团”；

有人说造反派是法西斯的“党卫军”、“冲锋队”；

有人说造反派是举行“反共起义”的“反共义士”；

有人说造反派是“社会渣滓”；

有人说造反派是当代中国的“民主先驱”、“人权斗士”；

……

造反派到底是些什么人？

◇　大前提：毛泽东号召“造反”

“造反”一词，古已有之，但那时主要是用作贬义，指“犯上作乱”。古代的造反者一般都不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造反”二字，而只写些“替天行道”之类的褒义语，不会像“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那样自称为“造反队”、“造反团”、“造反军”、“造反司令部”……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特别是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是没有谁敢宣称自己要“造反”的，那时“造反”是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人们往往会发出这样的质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想造反？！”

在“文化大革命”中走红的“造反”一词，出自毛泽东的那段“造反有理”语录，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语录是毛泽东１９３９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说的，１

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新华社在“毛主席在十年前所作的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论文和演说”的总标题下重新播发此文，《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但是，这篇“毛主席著作”此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宣传，也没有被编入《毛泽东选集》或《毛泽东著作选读》。因此一般人并不知道有这样一篇东西和这样一段“造反有理”语录。显然，共产党已经不是在“打江山”而是在“坐江山”了，再鼓吹“造反有理”，已经不合时宜了。

不过，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却又重新鼓吹起了“造反”。他在高级干部中多次提到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虽然这类讲话当时还没有公开，但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已经开始对“造反”一词有了新的认识，这对那些出生于高干家庭的青少年学生是否有所影响，尚不清楚。另据“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回忆，毛泽东的这条“造反有理”语录，“文革”前已经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选进其编辑的《毛泽东言论专题摘录》（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一书中，党政军高级干部能得到此书，高干子弟也有可能看到。〔１〕

在“打江山”时鼓吹“造反有理”是一回事，在“坐江山”多年之后再重新鼓吹“造反有理”，就是另一回事了。毛泽东的本意，当然不会是想鼓动民众向他或他领导的共产党造反，否则他就不会在１９５７年打“右派”，也不会在１９５９年整彭德怀了。他这时反复强调的造反，是向“修正主义”造反。

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当时主要指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赫鲁晓夫。在毛泽东领导的“反修”大论战中，中共中央写有著名的“九评”，在第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五条标准被编入了《毛主席语录》，其中每一条都以“他们必须是……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句式，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参照，作为“修正主义”的样板。随后，在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都充分表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警觉、恐惧之深。

为什么毛泽东会对赫鲁晓夫怀有这样强烈的警觉与恐惧？可以作出多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林彪在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之后的“五一八”讲话中，用通俗的语言点明道破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这个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说要印发，“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２〕也就是说，认可了林彪这一通俗化的诠释。中共中央于９月２２日批转林彪这一讲话的批语中高度评价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

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刘少奇在对民主人士通报中共处理“彭、罗、陆、杨”事件时也说：“一年多前毛主席对地方上、军队的一些同志说，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修正主义在中央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问题，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不好回答。毛主席说，中央实行马列主义政策，应当拥护，如果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你们可以造反。”〔３〕刘少奇当时一点也不可能想到，他自己会被当成这个中央的“修正主义头子”、“中国的赫鲁晓夫”。

对毛泽东担心在他身后有人会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个心病，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般都心领神会。所以周恩来在林彪“五一八”讲话之后的５月２１日会上表态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４〕陈毅在歌颂“文化大革命”时说：“假如斯大林晚年也搞这样一个大革命，彻底革命，就完全可能把赫鲁晓夫揪出来。”〔５〕

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是争权夺利，但是缺乏足够的证据和说服力。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６〕事实确是如此，仅仅为了打倒刘少奇，并不需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前的哪一个“机会主义头子”是靠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来打倒的？何况，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夜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两点要求：由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毛泽东不置可否，“王顾左右而言它”，还故弄玄虚地建议刘少奇读法国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狄德罗的《机械人》和中国古代的《淮南子》。〔７〕要说打倒，那时候刘少奇实际上已经被打倒了。为什么毛泽东仍不结束“文化大革命”？还要把刘少奇当作一个活靶子揪住不放？还要号召夺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坚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显然不可能是单一的，在他的复杂动机当中，笔者认为，有一个动机（是否是主导动机另当别论）是：通过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群众”，来造成一种政治环境，造成一种社会气氛，甚至通过“触及人们灵魂”来造成一种社会心理和思维习惯，使任何一个在他身后的“接班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像赫鲁晓夫那样作重新评价他历史功过的“秘密报告”，一旦出现此类情况，就会引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从“文革”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两个凡是”思潮占据统治地位，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此举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著名青年思想家王申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反毛”的罪名遭到杀害的。

◇　特殊的造反派——早期红卫兵

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文革”刚开始时的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人民日报

》的一篇国际问题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重新公开引用了毛泽东那段讲“造反有理”的语录。于是，这段在《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中都找不到的语录，就被初期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用到了他们７月４日写的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里。７月２８日，他们将此文与前面一篇《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一起交江青审阅，并请其转送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大为赞赏。于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以“革命小将的大字报”为题公开发表（《人民日报》８月２４日转载）此二文和另一篇《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原题目中“革命的造反精神”均被改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８〕，同时配发《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人民日报》并从此日起，连续几天反复刊登这段“造反有理”语录，使之家喻户晓，中央乐团随即奉命将其谱成歌曲，从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前夕开始，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全国传唱。这段语录也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造反，就这样“史无前例”地得到最高执政者的赞赏而成为时髦。造反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最早运用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语录，最早把“造反有理”作为口号公开提出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一类组织，多是青年学生中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家庭背景，能得风气之先，又自恃“根红苗正”后台硬，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向当时一般人还认为是“党的化身”、“代表党”的校党委、党支部或工作组造反。尽管他们的造反与毛泽东设想的目标差距很大，但他们毕竟起到了开创性、启示性的作用，他们的代表作“三论”的头一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开头就公开提出：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９〕

这样的宣言得到毛泽东“热烈的支持”〔１０〕，由官方媒体传播，一时间脍炙人口，成为最时髦的“时代主旋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了最为经典的造反理论，激励了许多人起来造反，为后来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打开了局面。笔者曾于“文革”后期（７０年代中期）在重庆市中心看到过一张造反派人士写出的大字报《入党申请书》，即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宣称自己从投身“文革”参加造反之日起就已经具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当然成员，要求上级党委为其“补办入党手续”。可见早期红卫兵有关“造反精神”宣传的影响之深。

不过，这批主要由干部子弟组成的早期红卫兵，只能算是初始的造反派，他们造反的矛头所向，还不是毛泽东所要求重点打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而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打击、压制的弱势群体，诸如：长期被管制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财产的前工商业者，被视为“反动派”的前执政党成员或前政权公职人员，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人员，被上级党委定性为“反动学

术权威”的业务干部，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文艺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及以上人群的家属子女等等。

这些早期红卫兵，在他们当权的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马上就成了“保爹保妈派”，并因此而把斗争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了。因此，他们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有的人坐了几天共产党的班房。他们“昙花一现”的“造反”生涯也就结束了。不久，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出的《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这些早期红卫兵威风一时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连同其他几个组织一起被定性为“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１１〕，而且被称之为“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这样，他们只得彻底退出了“文革”历史舞台。

这批早期红卫兵，是较为特殊的造反派，他们的人员构成、造反要达到的目标、造反所打击对象等等，与后来的造反派有很大不同。因此，有一些人拒绝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不过，他们毕竟在鼓动造反这方面起到了开创性的、启示性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更是起到了为造反“煽风点火”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后官方的基本态度也是不把他们当成造反派对待的，在清查“三种人”（“打砸抢分子”即为“三种人”之一）运动中，就基本上不触及这些早期红卫兵。比如，“文革”中最早开始毒打老师和学生并打死校外居民多人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早期红卫兵，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早期红卫兵，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市第六中学自设监狱中打死人的早期红卫兵等等，都没有受到清查和追究〔１２〕。这些在“文革”中掀起第一波打砸抢狂潮的高干子弟，也不受“三种人不得提拔”的限制，照常升官。

在“八一八”（即毛泽东８月１８日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建立起来的各种红卫兵，则大多是在党政领导部署下成立起来的“官办”组织，有的虽也有一个“自发”的形式，但根本称不上是自发的群众组织。比如，“上海市委为控制局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１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湖北省委领导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两个月。”〔１４〕９月７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各学校发出筹建乌鲁木齐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通知。〔１５〕在中共四川省委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发出的《关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还有这样的指示：“认真加强对红卫兵组织的领导，积极发展壮大，但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及农村不成立红卫兵组织。”〔１６〕从要求“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壮大”，到哪些单位不成立红卫兵都有规定，可见当时一些地方党委对红卫兵所起到的组织、领导作用。

各地摹仿北京而进行的“破四旧”，基本上也是由这些官办红卫兵在当地党政

领导直接部署或授意下进行的，以“破四旧”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抄家行动（“文革”中最早出现的有组织的打砸抢），即所谓“红八月”（在许多省、市发生在８月底至９月间）的“红色恐怖”，许多都是由各地基层党委研究布置或指示公安派出所提供的查抄名单，斗争矛头完全指向社会弱势群体。这当然更说不上是什么“造反”了。后来清算“打砸抢分子”，也基本上没有清算这些率先进行打砸抢的人。

◇　造反派形成的背景

一般所说的造反派，主要是指出现于１９６６年秋冬至１９６８年秋冬期间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这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时期。本文所论述的，也主要是这一时期的造反派。

在这一时期，造反派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有那么多人起来造反并形成“派”，会出现遍及全国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研究造反派形成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通常都可以注意到如下几点：

（一）干群矛盾（或官民矛盾）

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十七年。共产党人从“解放者”变成了“统治者”。社会地位的转换，特别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的腐蚀，使不少执政官员发生了蜕变，“人民的儿子”变成了“家长”，“人民的公仆”变成了“老爷”。尽管最高当局不时会提出一些“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之类小修小补的新招，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执政官员与民众的关系日益疏远甚至对立，矛盾日深。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对国务院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的蹲点报告的批示中就以惊人的尖锐语句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１７〕这样的描述，与号召推翻国民党政权时的一些提法已经十分接近了（但毛泽东并不号召推翻自己缔造的这个政权，而是要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历史积怨

十七年来接连不断开展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使不同阶层、不同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被相继打入“专政对象”一边，“一小撮”迅速变成了“一大撮”、“一大片”，而且有越来多的家属子女亲友同事受到株连。树敌越多，“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紧，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紧，则又反过来树敌更多，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使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数巨增，民众日常生活陷于空前艰难的境地（以至闹出这样的笑话：在“文革”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时，老农往往说着说着就诉说起了三年大饥荒的苦）。到“文革”前两三年，物资生活稍有改善，而民众的文化、精神生活却又在越来越“革命”的高调和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中变得空前枯燥、压抑甚至令人窒息。

（三）“狼奶”教育

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等等，使全民族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日益扭曲，日益畸形。公民意识、法制观念几乎成为空白，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则深入人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铁定的原则，而这个“无产阶级政治”的内涵又是由“党”来解释的，今天可以是“又红又专”，明天就可以变成“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回忆“文革”前所受的教育时说：“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１８〕

（四）个人迷信

在“反修防修”教育中为斯大林时代的个人迷信翻了案，反对个人迷信成了“修正主义”，坚持个人迷信则成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学雷锋”运动使全民陷于“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的狂热之中，《毛主席语录》开始成为圣经式的小红书。各个领域争相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广播里每天播放的都是“毛泽东思想闪金光”、“战士爱读老三篇”之类流行歌曲。周恩来亲任“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以艺术形式推向了高潮。据陈凯歌回忆：在他就读的北京第四中学，“记得一次讨论会上，班里一位同学说到‘毛主席也是人’，便受到全体的批判，连老师也指其有‘阶级立场问题’。这位１３岁的同学毫不示弱，竟有干部子弟同学扬言要‘揍他’。‘人’的称谓竟然成为亵渎，斯复何言。”〔１９〕

对这方面的背景情况还可以作出更详细更深入的研究。这些当然都为“文革”造反派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

但是，这些都难以说明：为什么在“文革”前的其他年代没有出现奋起造反的造反派？

这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允许和支持。

众所周知，自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民众基本上已失去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连对执政者及普通的执政党党员提出批评的权利都遭到实质上的剥夺，当然更不能合法地以游行、示威、罢工等方式来表达诉求，任何自由结社都会被视为“非法组织”和“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遭到无情的镇压。

正是由于“反右派”以来形成的政治空气，在“文革”初期，民众很难真正发动起来。全国各地自发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一般还只是一些“小组”），几乎无

一例外地遭到当地党政领导的打击、压制。

◇　始终在毛泽东控制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貌似自由结社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始终处于毛泽东的控制之中。从兴起、发展到消亡都是如此。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历史条件，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新理论，两个大动作”。“一个新理论”，即“反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组织不等于反党”，“两个大动作”，即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和１９６７年４月掀起的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而一旦毛泽东认为不再需要造反派群众组织了，什么理论也不能挽救它们消亡的命运。毛泽东可以说是放鬼捉鬼，收放自如。

（一）破天荒提出的“新理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是一个转折点：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明确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这里的“群众所创造的……等组织形式”和“新事物”的提法，给群众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政策依据。政治敏感性极强的大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了。

８月７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成立。
８月１０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成立。
８月１２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成立。
８月１３日，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成立并徒步进京告状。
８月１７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震惊世人的“八一八”到来了。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公开检阅红卫兵，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得到官方肯定，登上“文革”历史舞台，此举给民众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和冲击是空前的，是没有亲历那个时代的人们难以体会和想象的。须知，就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公布的“十六条”中，也只规定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谁也没想到，短短十天之后，另一个“新组织形式”红卫兵竟会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检阅和官方媒体的狂热炒作。

于是，从８月中、下旬开始，受到启发和刺激的各地学生中的群众性造反派组织便雨后春笋般诞生了：

８月１８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
２０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成立。
２１日，河南第一个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联委”（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正式成立。
２３日，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战斗队成立（其负责人之一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

永生）。

２６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成立。

同日，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成立。

３０日，云南大学反修战斗队成立（是后来组成云南“炮兵团”的第一个战斗队）……

这批造反派组织从成立时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和上级党委。

几乎在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出现的同时，工人中的造反派组织也已经开始出现，但为数极少。其中多是与红卫兵年龄相仿，因为在本单位受到工作组或党委的压制、打击而被“逼上梁山”的青年。

从１９６６年8月下旬开始出现的造反派组织，除去受到早期红卫兵的启发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这个“理论”通过《人民日报》８月２３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传达出来，这篇社论说：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社论破天荒地提出：

“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这显然只是一个权宜性的、随时可以作废的“理论”。如果真正贯彻这个“理论”，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间被打成“右派”的人几乎全部都应该平反，因为他们大多是批评了或得罪了本地区、本单位的领导人（甚至并非领导人的中共党员），而被以“反党”罪名划为“右派”的。“反右派”运动后，无人再敢批评或得罪本地区、本单位的领导人或中共党员（这也是导致出现假话成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在“文革”造反运动初起时，《人民日报》社论的这个全新“理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多年的顾虑，也算是一次“思想解放”吧。

（二）至关重要的第一次大规模平反运动

更大数量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形成“造反派”这样一大政治派别的情况，出现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准于１０月５日下达了《中央军委紧急

指示》，要求各地为前一阶段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不少有关“文革”的论著在提到这个文件时，都只强调其取消了“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一方面（即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不注意研究其得到广大群众欢呼、拥护的核心内容：平反。

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通常只是在运动结束之后才会有小范围的、不事张扬的甄别和平反工作，而这次为了进一步把民众发动起来，仅仅有了“反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组织不等于反党”的理论还不行，还得让民众得到实际的好处。于是，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一时间平反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这一权谋手段或曰“战略部署”，确实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打消了许多人担心遭遇第二次“反右派”运动的顾虑，有了这样的背景，就开始出现了各地民众上京告状的高潮和工人、城市居民、机关干部等各阶层人士中造反派组织的大量涌现。“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在回忆录《蓦然回首》中写到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传达后带来的震动：“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许多人真正认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了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感到站在群众一边的党，而不是压制群众的党，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２０〕

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就不会有造反派在全国范围的涌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造反派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的产物。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的瘫痪。因为要平反，就涉及一个如何处理“黑材料”的问题。只要看一看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前后的那些“中央首长讲话”，就会发现，几乎每次讲话的一个中心内容都是关于如何处理“黑材料”问题。为此，毛泽东又批准在１１月１６日专门发出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提出：“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并严格规定：“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并且在文件最后规定：“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２１〕这样的措施，在中共执政期间是绝无仅有的。

根据历来的社会经验，民众仍然担心在今后遭到报复，担心被“秋后算账”，因此对各地党政领导人有关“黑材料”的解释、检讨、承诺都不会满意，不敢相信，造反派一定要彻底查抄“黑材料”，党政领导机关纷纷遭到冲击，相继陷于瘫痪。这就自然引出了此后全面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和不得不下令人民解放军介入“文革”的“三支两军”。

（三）造反派遭到打击的“二、三月镇反”

在１９６７年1月开始的夺权中，因对实施夺权的具体作法有不同意见，或对准备“解放”、“结合”的领导干部有不同评价，或对夺权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各群众组织代表席位的分配有争议，或对当地驻军的“支左”工作有不同看法，许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分裂成为两大派，比如，在黑龙江有决心捍卫省革命委员会权威的“捍联总”和坚决对省革委某些领导人进行“炮轰”的“炮轰派”，在山西有“红总站”和“红联站”，在江苏南京有认定1月２６日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和认定那次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在安徽有“Ｇ派”（“好”的英文ｇｏｏｄ的字头）和“Ｐ派”（“好个屁”的“屁”字的汉语拼音字头），在浙江有“红暴会”和“省联总”，在湖南有长沙“高司”和“湘江风雷”、“工联”，在云南有“八二三”和“炮兵团”，在福建福州有“革造会”和“八二九”，在四川重庆有夺权建立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后改称“反到底”派），在徐州地区有支持3月１８日建立的“徐州市革委会”的“支派”和决心要“踢开徐革会彻底闹革命”的“踢派”，等等。

在各地的造反派两大派中，往往是一派坚持或抢先进行夺权，建立起了临时权力机构，另一派则因意见不合而退出夺权或一开始就抱反对态度。两派争执中，又因为“一月夺权”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被宣传为“新生红色政权”、“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两派斗争就成为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敌我矛盾”。同时，因为各地驻军从1月下旬开始奉命“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介入“文革”后，普遍都根据各自的理解支持了自认为是“左派”的一派（有的是保守派，有的是造反派中的一派；有的是夺权的一派，有的是反对夺权的一派），压制、打击了另一派，而遭到一些造反派的抗议和冲击……

“一月夺权”并未建立起“革命新秩序”，并未带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面貌，反而加剧了社会大动乱和导致生产急剧下降，这必然使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警惕有“阶级敌人”在趁机破坏，尽管这时毛泽东强调的是“路线斗争”，但其“斗争哲学”中的核心理论始终是“阶级斗争”。因此在1月以后毛泽东的有关批示、中央文件和报刊社论、文章中就频繁出现了“镇压反革命”的提法。

１９６７年1月１３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这个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家喻户晓的“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镇反”的信号。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对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及“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有的地方将其简称为“二十一种人”）“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明令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

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其打击面之广，堪称“史无前例”。

１９６７年1月３０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至今没有公开，因此其内容无法得知）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２２〕这实际上是发出了开展“镇反运动”的号召。

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更以大量篇幅专门谈到“镇反”问题，明确指出：“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２月４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提出“对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所有群众组织及其行为”，等等。

同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２３〕中央文革小组这个“二四批示”，率先在湖南掀起了针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反运动”。

２月１６日，新华社播发新闻电讯：《决不容许把斗争矛头指向英雄的解放军和真正的革命左派／福建革命力量粉碎了反革命逆流》；１７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１８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拼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这些重要社论及报道，均由新华社向全国各大媒体播发，各大报刊登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那些杀气腾腾的语句，当时的人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在这样强有力的“战略部署”和“舆论导向”下，“镇压反革命”运动便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了。这场“镇反”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特别是那些“造反精神”强、闹出的乱子大、与支左部队发生冲突（如许多地方的围攻军区）、组织成份复杂的群众组织。不过，这并不是对造反派的全面镇压，而只相当于毛泽东当年在苏区搞的红军内部肃反、杀ＡＢ团。

以往的宣传和许多论著中，都把“二月镇反”与“二月逆流”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逆流”，指的是１９６７年2月（后来这一概念被往前延伸到了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国务院的一些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如1月１９至２０日的京西宾馆中央军委碰头会，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２月１１、１６日的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即所谓“大闹怀仁堂”），对“文化大革命”不符合以往政治运动“常规”的一些做法（如“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大批老干部、搞乱军队等）提出强烈批评，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面对面争执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后官方史学界已改称其为“二月抗争”；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则是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间发生在许多地方的大批逮捕造反派、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事件，其高潮在2月中旬（“大闹怀仁堂”事件之后）至３月上旬期间，因此实际上是“二、三月镇反”。与“二月逆流”虽有思想上的联系（“大闹怀仁堂”的高级领导人和各地镇压造反派的军队干部都是想要维持社会稳定，让“文革”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健康发展”），但从内容看并不是一回事，而且，参与者也并不完全相同，比如，中央文革小组在“二月逆流”中站在支持造反派的立场上，却又在“二月镇反”中率先下令镇压了湖南的造反派，开了“镇反”的先例。

要证实“二、三月镇反”与“二月逆流”并非一回事，还可以再来看看所谓“二月逆流”结束之后的情况（２月１８日深夜，毛泽东召开会议对“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干部进行了严厉斥责，并责令其检讨。“二月逆流”到此已被毛泽东“击溃”）——

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全体干部的信》发出。信中说：“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２月２５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刊登《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指责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索子地大队支持了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２７日，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毛泽东于２８日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２４〕

３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称：“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要“分期分批地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３月１０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要求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联，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联。所有外出人员一律返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

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联。”

３月１２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的通知》。

３月１８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发出。信中明确要求：“你们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你们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的以外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２５〕……

这些文件，全都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文革”走向收尾，造反运动结束。特别是毛泽东于２月２８日（即狠批“二月逆流”十天之后）对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的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表明了他在所谓“二月逆流”已经被“击溃”之后还在继续要求“从上至下各级”都要注意“镇压反革命”的明确态度，这充分说明“二、三月镇反”不能与“二月逆流”混为一谈。

因此，把这一段时间里造反派遭到的打击归之于“二月逆流”，是不符合客观史实的。尽管一贯善于文过饰非的毛泽东当时凭借其如日中天的威望屏蔽了历史真相，后来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继续屏蔽历史真相，但仅从上述公开的史料即可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间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打压，即“二、三月镇反”运动，实际上是在毛泽东部署下进行的。

（四）第二次大规模平反运动与“全民造反”

但是，各地狠抓“阶级斗争”、镇压“反革命”所造成的结束“文革”、恢复旧秩序的趋势，又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因为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尚未达到，为了重新发动或曰“运动”群众，他又“转舵”发起了“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并把前一段打压造反派的罪责轻而易举地全部推到“二月逆流”身上。前一段的一些造反派行动曾被认定为“反革命复辟逆流”，而这一次又反过来把打击造反派的行动认定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毛泽东的政治游戏中常常伴随着类似的文字游戏。为此，毛泽东再一次发起了大规模平反运动。

１９６７年3月２４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为被打成“反革命”并遭到开枪镇压的青海“八一八”公开平反。

４月１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即著名的中发（６７）１１７号文件，明确宣布：“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

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毛泽东还在审批这个文件时亲笔加上了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２６〕

接着，毛泽东于4月6日批准发出《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重申了上述精神。

４月１３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宣布“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

４月３０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指出此前把造反派冲击福州部队的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文件中还引用了福州部队司令员韩先楚向驻福建部队发出的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

５月７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称“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求新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５月１６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宣布“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２７〕……

在这样反复重申的“最高指示”和中央号令推动下，又一场大规模平反运动席卷全国，各地监狱纷纷往外放人，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民众围在监狱外等候放人，一有人被放出来便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的场面。当时广西工人造反总部的发起人和负责人熊一军（南宁市橡胶厂工人），自１９６７年3月1日被批斗并“扭送公安机关”后，迟迟得不到平反，８月１８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联合发表关于广西局势的紧急声明，坚决为工总翻案，彻底为熊一军平反，要求立即释放熊一军；

８月２４日清华《井冈山》报、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四二二战报》联合版发表《“工总”要翻身，熊一军要平反》和熊一军的《壮志凌云主义真，长镣难锁钢铁心》。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９月２８日，根据８月２４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讲话的要求，广西军区被迫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熊一军得到平反。更为突出的是，福建日报革命职工造反队的队长姜观（中共《福建日报》社农村版支部副书记），因写的几篇批判解放军福州部队司令员韩先楚的文章被台湾当局广播，“二、三月镇反”中姜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监狱，在１９６７年4月大规模平反时，连周恩来对他是否可以平反都犹豫不决〔２８〕，而福建造反派竟可以大张旗鼓发起组织姜观问题辩论团、探牢团，广泛征集给姜观的慰问信、慰劳品送往监牢，最后公安机关被迫放人，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被迫发布《关于姜观同志平反的决定》——这些，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确实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的。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的平反运动，是为被各级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处以停职检查、隔离审查或监督劳动的群众平反，１９６７年4月开始的平反运动，则是为被各地驻军及公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的群众平反。前一次平反运动，直接导致了各级党政机关的瘫痪。后一次平反运动，则直接导致了各地掀起“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的狂潮。

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是对自己的威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具有高度自信的毛泽东走出的两步险棋，确实蒙蔽了广大群众，使他们真心相信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诚意，无不感恩戴德甚至感激涕零，欢呼“毛主席第二次解放了我们”，“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尽管“二、三月镇反”使一部分前期的造反派在惊魂甫定之后激流勇退变成了逍遥派，但仍有相当多的人继续留在造反派队伍中，另一些原处于观望、犹疑状态的民众则又毫无顾忌地加入到造反派队伍中来，因此才出现了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７、８、９月视察大江南北时了解到的那种“全民造反”情景：“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２９〕

假如没有这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广大民众不可能敢于起来造反，各地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也不可能允许民众起来造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造反派的形成，除去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之外，毛泽东的允许、鼓励和“运动群众”，是一个重要原因和前提条件。

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甚至发生“人相食”惨剧的情况下，没有民众起来造反并形成遍布各地的造反派，为什么在１９６８年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清”甚至主要打击造反派骨干成员的“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运动制造出那么多冤案，打击迫害了那么多人的情况下，也没有形成大规模奋起造反的造反派。因此，那种把造反派说成是“反共起义”的论调，是缺乏史实依据的，不

负责任的。

（五）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终结

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间，各地造反派队伍有过不同的分化、重组。其中最为极端的例子，是首都三军（实际上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的各总部机关，各军、兵种机关，北京军区机关及其下属的文工团、体工队、军事院校等）的造反派，有过前后两段阵线分明的变化，在１９６７年5月１３日“五一三”事件之前，以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为代表的“三军革命造反派”是响当当的左派，与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但是在“五一三”之后，“三军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冲派”、“打砸抢派”、“反革命”，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遗弃，很快被压垮，曾被他们打击的所谓“保守派”，即以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为代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迅速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宠，并一跃而成为左右首都局势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个变化，是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干预下出现的，也是毛泽东“运动群众”、将造反派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一个典型例证。

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文革”舞台上大约活跃了两年左右，而这其中又有一年多时间是在打“内战”。１９６８年7月２７日毛泽东下令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２８日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是宣布将造反派赶下“文革”舞台的转折点。紧接着，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文章不再号召民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继续“炮打司令部”，而是强调：“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许多人当时都不明白到底有谁在何时何地提出了这个“多中心论”，不知道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为解散造反派群众组织而想出的一个理由。

9月5日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大陆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全部建立起了“新生红色政权”，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结束了各地长达近两年的半无政府状态。接着，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全会“一致通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此前后，各地群众组织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陆续宣告“完成历史使命”，撤销总部，解散组织，“平山（即‘铲平山头’）倒旗”。此举各地有先有后，但大多在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较早的如湖南造反派组织“工联”、“湘江风雷”于１９６８年2月２１日就宣布撤销总部；黑龙江省“捍联总”于3月9日宣布撤销各市区总部）：

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组织（红革会、二总部、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联合成立于1月２６日的“长春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于7月２３日发出公告，决

定结束自己的工作；

河南省于８月１０日宣布解散“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南造总”三个全省性跨行业群众组织；

广州工革联（红旗派）、工革会（东风派）、工交红旗（所谓“第三势力”）三大群众组织代表于８月１５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广州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大会”，宣布铲平山头，按系统、按行业实现归口闹革命；

北京大学两大派“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分别于８月２８日、２９日宣布“解散各级组织”和“撤销兵团总部”；

湖北省革委会于９月６日作出决定，规定所有群众组织立即铲平山头，其总部、分部立即撤销，停止活动，所属人员立即回原单位生产或上课；

重庆两大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于１０月１５日隆重集会宣告撤销各大总部、解散组织；

福建两大派：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于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５日撤销，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稍后于１９６９年１月宣布解散……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时称“七二三布告”），对山西两派群众组织仍在进行的武斗提出严厉谴责，称之为“反革命罪行”，在布告作出的八条决定中指出：“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接着，８月２８日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命令》（时称“八二八命令”），其中提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３０〕

这样，自１９６９年之后，大多数地区不再存在造反派群众组织（极个别地区迟至１９７０年还有小股造反派组织活动，但无关大局）。

全国造反派群众组织纷纷宣布“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自行解散（有的群众组织甚至在建立善后工作组时还自动减少人员编制），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造反派当初的“揭竿而起”，绝非什么“反共起义”。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说得好：造反派“在冲击大大小小的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但极易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根本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３１〕这话说得有些不大中听，但却是事实。

在各地群众组织解散之后，原造反派骨干成员普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清算和打击。一些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及另一些原来的造反派或原来不是造反派的人员，继续以群众组织造反时期的一些作法向革命委员会和重建的党委中的某些领导干部进行造反。但是，毕竟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不再走这步棋了，因此，无论那些造反风云人物或“后起之秀”有多大能耐，也不可能再像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８年那样拉起庞大的群众性造反队伍而形成“派”了。尽管一般还是习惯于称呼他们为造反派，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不成其为“派”。这些领头活动的主要人物，后来基本上都被定为“帮派骨干”——把他们算成是跟“四人帮”一派。在清查“四人帮”、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原造反派骨干成员

（包括早已被江青集团成员打下去的人，如上海工总司原负责人潘国平），遭到了最后一次总清算。

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没有最高执政者毛泽东和中共领导核心的允许，造反派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　造反派的人员构成

造反派群众组织派系林立，名目繁多，大的往往号称数十万、上百万之众，小的则可以小到只有一人（如著名诗人白桦就以“武汉部队文工团‘造反有理’联合总部‘独立寒秋’战士”的名义在武汉钢二司小报上发表诗歌；新华社重庆记者站记者袁光厚以“只把春来报战斗者”名义写大字报和文章）。当年的“造反司令”犹如今天的“公司经理”一样随处可见。

造反派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主要成员，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理想主义者

他们的“理想”，是十多年乃至数十年所受教育而形成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革命”理想，他们真正相信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正相信“修正主义”上台会出现“千百万人头落地”、工人和农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悲剧，真正相信中国负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他们在中共执政十七年来所受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渴望着在阶级大搏斗的战场上去建功立业，并甘愿为之洒血献身，“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他们看到了这个机会。这类人最主要的是青少年，包括大、中学生，青年工人及青年干部等。正如“十六条”说的：“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可以说是一批手拿“红宝书”的“堂·吉诃德”。

这些理想主义者跟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一样，“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当年武汉钢铁公司最早起来造反的工人杨玉珍（女，后成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即“钢九一三”负责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不久前回忆了在造反初期“抓革命促生产”中不幸早逝的武钢最早起来造反的五人中的青年工人、中共党员龙克发。他们一起扒火车去北京告状，在１１月初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她就送龙克发回武汉，“当时龙克发支气管扩张大量吐血。后来要在厂前那里开大会，为了在会前抢先完成生产指标，龙克发推迟了婚期，在车间加班加点干”，不幸出触电事故去世了。〔３２〕

理想主义的冲动不仅仅限于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或“出身好”的人，也包括“出身不好”的人在内。作家胡发云在回忆录《红鲁艺》一文中就谈到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因为“出身不好”而在造反初起时处于旁观者地位，但是，“我希望参与，希望在这一场神圣浩大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寻求青春的价值青春的证明，那是我１７年以来全部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想，对于当时绝大多数都经受过这种极端统一的教育的少男少女来说，不论其当时的境况如何，这种内心的冲动是相同的。”〔３３〕

当然，除去青少年外，其他年龄段的人们也有不少是出于理想主义的激情而投身到“文革”之中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年曾在首都“文革”舞台上活跃一时的外国专家造反派，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放弃了自己在发达国家优厚的物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来到中国，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旗帜下来的。在“文革”中由阳早、寒春等外国专家写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大字报提出：“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为此，他们提出要求：“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并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３４〕

以往提到造反派，较多讲到的是他们如何“揪叛徒”，斗“走资派”，打击迫害干部。其实，那只是一个方面。在“文革”中，造反派批斗一部分干部的同时，也勇敢地保护了另一些干部，或为一些蒙冤受屈的干部仗义执言，鸣冤翻案。最有名的就是首都三司的发起单位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他们不但大胆保了学院的一些领导干部，还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收容、保护了各地来京上访的大批干部。

武汉钢二司和三司革联的一些红卫兵，组成了“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串连会”，派出人员作了大量调查，为“文革”初期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诬陷为“三家村黑帮”、“地主分子”的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哲学家李达平反搜集材料，并为此创办了专为李达鸣冤翻案造舆论的《李达问题》小报。

“文革”时为中共河南省安阳地委书记、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红旗渠”工程总指挥的杨贵，被河南省委及安阳地委某些领导人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撤职并交群众批斗，而支持杨贵的一派造反派则以“揪斗”之名将其冒险救出，辗转护送到北京，帮助他向中央申诉。

“文革”时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在《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一书中写到了北京大学学生“惊雷”和新疆第八中学学生们对他的保护，当时他在新疆已经被诬为“叛徒”、“特务”，成了打倒对象，自治区还成立了“批斗武光办公室”，在这种形势下，北大学生惊雷和新疆八中的学生们顶着天大的压力，将武光保护起来并对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全面调查，然后公开站出来为他鸣冤翻案。武光感慨地写道：“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和惊雷素不相识，‘文革’开始后，他来新疆串连，只是我代表自治区党委负责接待群众时，见过他一两次，他为什么要保护我呢？是革命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是对革命领导干部的尊敬和爱戴。”〔３５〕

重庆的老干部廖伯康（后在四川省政协主席任上离休），因为在“文革”前的１９６２年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了对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李井泉的意见，１９６３年与另外两位干部萧泽宽、李止舟一起遭到打击报复，被打成“反党”分子，“文革”初期又被抛出来作为“黑帮”批判，他在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回忆了他们在“文革”中得到一些造反派红卫兵支持，到北京上访，要求平反的经过，其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派出曾昭贵，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纵队派出何亚ｕ等学生，组成“专案组”，为他们平反冤案辛劳奔走，廖伯康深情地回忆道：“尽管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他们对我们很负责，有始有终。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３６〕

对参加武斗的造反派，人们一般都以为只是些嗜杀亡命之徒，不知道他们中也有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重庆电视台编剧张鲁（“文革”时为重庆第二十九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中回忆了他的一个１８岁的中学同学，外号“少帅”，在武斗初期的一次棍棒钢钎厮杀中，被步步追杀，退到三楼阳台，“少帅”一人在楼梯口拼死抵挡，掩护其他同学撤退后，自己高呼“毛主席万岁”跳下阳台，幸好被墙上的大批判专栏遮雨檐栏了一下，活出来了……张鲁感慨地称之为“我于书本之外见到的第一个英雄”〔３７〕。像这类武斗中的“英雄壮举”，各地都有。在四川省宜宾市的翠屏山，当年曾建有许多“红旗”派的“烈士墓”，其中就有“燕子岩六壮士”之墓，据说他们是在武斗中被围困无路可逃时，“宁死不屈”，学抗日战争中“狼牙山五壮士”的样子，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跳岩自杀。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武斗中死了二十多个学生，其中相当一些人是胸怀“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理想的热血青年，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校外武斗队三〇一野战队的一个成员，无线电系二年级学生董继平，在武斗中不幸头部中弹，脑浆迸出，经抢救脱险，当年的小报真实记载了他在医院里单纯幼稚的表现：“当他精神好时，常用唯一能动的左手给来看望他的战友、同学、亲人写‘毛主席万岁’！‘８１５，３０１’，他性格无比坚韧刚强，一次西交大一同学写给他的一封慰问信，他固执地用他自己的左手去拿出来看，而不许人帮忙。为了早日返回战斗岗位，他忍痛进行着顽强的锻炼，他常常用唯一能动的左手去帮助瘫痪的右手活动，”“……当我们去看他，喊‘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时，他万分激动地举起创伤的手并翘起大拇指，当我们讲到刘少奇、王光美时，他马上比起小指拇。”〔３８〕现在的人会觉得这十分可笑，但在当时一些同学的心目中他却是“麦贤得式的英雄”。

（二）“文革”初期的“反革命”

这是些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和基层党委打击或压制的人。在那时，各级领导干部对这场“运动”都很不理解，根据批“三家村”时的宣传调子，都以为这是又一场“反右派”运动，因此按照“反右派”时的惯例，把一些平时较有独立思

想，或写过一些诗文（即使是歌颂性的也可以被说成是“别有用心”），或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群众打成“小三家村”、“小邓拓”、“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游鱼”、“伸手派”、“黑鬼”等等，从而把一些人“逼上梁山”成为造反派。“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这类人在造反派中往往起骨干和领导作用。

众所周知的蒯大富，“文革”时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九〇二班学生，共青团员，在批判被中央决定“罢官”的“蒋南翔黑帮”时表现突出，选为班文革组长，却因批评了工作组的一些作法而被打成“反革命”，并遭到与“蒋南翔黑帮”同样规模的批斗。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平反后脱颖而出成为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中共预备党员。因遭工作组打击迫害，被打被斗，绝望中服毒自杀，经抢救脱险。起来造反后任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得到毛泽东多次接见。１９６７年4月２３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２１日《快报》１９４０号上《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作批示，在“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一句旁批注：“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３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陈永康，中共预备党员，地地道道的好学生。“文革”中因工作组将校党委打成“黑帮”并打击大多数教师，愤而写大字报反对工作组，被工作组和“左派”学生（包括刘少奇之女刘平平）打成“彭真黑市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现行反革命”，限制人身自由，批斗迫害，曾在全校批斗大会上被打得口鼻流血。起来造反后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

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高三学生李冬民，“文革”初期为首组织的“东风战斗组”因反对工作组而遭到打击迫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曾被连续批斗２０小时。后为首于１９６６年9月6日组建了中学生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著名青年钢琴家刘诗昆，“文革”初期因给工作组写大字报而被学院革委会抓进“黑帮劳改队”，在中央音乐学院早期红卫兵揪斗院长马思聪、党委书记赵ｈ等领导干部时，刘诗昆被抓去陪斗并被毒打致左臂骨裂。后奋起造反，一度成为音乐学院造反派领袖。

还有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党言川。“文革”初，郑州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团支部书记王相海等同学给校党委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后被打成“小邓拓”、“反革命”，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党言川因支持他们的大字报而被工作组批斗，后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的巨幅标语并上京告状。起来造反后成为郑州大学“联委”（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和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朱鸿霞，时为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厂文艺创作组成员，“文革”刚开始时还发表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却被工作组打成小“三家村”，于１１月上京告状参加造反，后任武汉“工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

地区工人总部）负责人。

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的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被湖南省委打成“右派”、“黑鬼”、“现行反革命”的人。

“文革”中有一个因救火而牺牲的郭嘉宏，时为江苏省镇江市象山园艺场蚕桑工区生产队长、耕读学校代理副校长。因被市委工作组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关押了四个多月。后到北京告状，参加造反。１９６７年1月５日作为镇江市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第二次到北京上访、串连，１月１９日奋不顾身参加北京某工地救火时不幸牺牲。3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战士——记在某工地灭火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郭嘉宏》和社论《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他可能是唯一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承认为烈士的造反派。

（三）“文革”前“四清”中受到打击或积极参加过“四清”的人

“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在许多地方是与“文革”紧紧相连的，有的“四清”工作团（队）就直接领导了当地的初期“文革”运动。因此“四清”中的矛盾往往与“文革”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的聂元梓，“文革”时为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总支书记，因为在“社教”运动中卷入了北大的是非漩涡，给校党委书记陆平提意见后遭到打击，被停职、隔离、下放。“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她从彭真的垮台看到了把北大问题澄清的希望，看到了“在社教运动中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决”〔４０〕，于是和其他几人一起写了那张有名的大字报……

大名鼎鼎的农业劳动模范、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也受到打击、压制，进驻大寨大队的工作队千方百计要找出这面“红旗”旗杆上的虫子，竟一度逼得大寨党支部的五个支委想要自杀。接着，地委又把长期支持陈永贵的原县委书记张怀英等人打成了“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分子，搞出昔阳县一桩大案，９５人被定为“反党成员”，２７８人被列为“消毒对象”，张怀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是当时昔阳政界大地震的“十月事件”……〔４１〕陈永贵在“文革”中就是因此怀着对地、县委不满的情绪起来造反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他到太原，与李顺达、解悦等著名劳动模范一起在《山西日报》发表了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联合声明。同时，昔阳“十月事件”挨整的干部成立了“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陈永贵和“十月事件受害者”一起召开大会，控诉“黑帮”罪行，并夺了县委、县人委一切大权，陈永贵当上了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3月５日《人民日报》作了重点报道，报道主题是“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副题是“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

后来曾被安排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姚连蔚，“文革”时为西安昆仑机械厂工人（４级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中共党员。文革前

“四清”运动中曾因所谓“书写反动诗词”受过批判。“文革”中造反后任西安“工联”派负责人。

上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有名的“潘司令”潘国平，“文革”时为上海玻璃机械厂木模工（借调到厂工会工作），复员军人，因给“四清”工作队提意见，被打成“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四清”重点对象。以后起来造反。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当时积极参加过“四清”的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干部，都在“四清”中得到了“锻炼”和“教育”，有的还在“四清”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实际上成为他们参加“文革”的一次预演。“文革”中曾任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８·１５战报》主编的重大学生周孜仁回忆说：“文革前大学高年级学生普遍参加了农村四清，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和具体实践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东西，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和十六条完全一致）。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认识，在云南，我曾问过‘八二三’的一把手黄兆琪，他文革初期也完全因此而投入运动，根本不认为这是五七年的重演。”〔４２〕

（四）早就对本地区本部门某些领导干部不满的人

这类人为数也不少。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中也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其实毛泽东这样的轻描淡写，只说到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表面上的、很小的一部分。相对于毛泽东１９６４年对陈正人那条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来看，毛泽东这时对干部、群众矛盾的判断反而倒退了。实际上，许多地方群众起来造反，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导干部“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之类作风问题，而是如强行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连续三年大饥荒，大量饿死人，以及“吸工人血”这样更严重的问题。只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文革”时已经达到顶点，一般民众和干部都不会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恶果看作是毛泽东的罪责，而只认为是当地官员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甚至认为是当地官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政策，“违背毛主席指示”、“反对三面红旗”而造成的。

１９６６年8月在郑州大学贴出的一份转抄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称前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已调离河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

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为此，郑州大学“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罪行，因而得到多数群众支持，队伍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４３〕

四川省也有类似情况。四川省的广大群众和干部，认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应对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负责。加上李井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四川干部特别是原地下党干部的打击迫害，积怨甚多，“文革”一来，四川的干部、群众很快就在“打倒李井泉”这一点上形成了可以说是“同仇敌忾”的共识。原四川省泸州（后并入宜宾地区）地委书记邓自力，因率先解散了祸国殃民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被当时的四川省委领导人李井泉打成“最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晚年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一书中回忆了他１９６７年在造反派学习班里写大字报揭发李井泉的情况：“１９５９年李井泉斗我，我始终未低头，也未写出一份使他满意的悔过书，弄得他骑虎难下。而今可以系统地揭发他在农村政策上的错误了，我为了那些被推向死亡线上的农民，也要将他所犯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翻阅了当年处理我的文件，回忆了当年受批判处理的经历，写成了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揭发李井泉在农业方面大刮共产风，脱离实际和违背群众意愿地大搞公共食堂，不根据经济规律搞乱生产，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大减产。在中央已明文规定调整某些农村政策时，李井泉仍不调整，说什么四川要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大队），而不是中央说的生产队。这张大字报近三万字。除用铅印印了十万余份外，还用墨笔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宜宾大街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人们说看了我的大字报很痛快，揭发实事求是。我知道农村造成的灾难比我所叙述的严重不知多少。”〔４４〕

（五）纯粹是响应毛泽东号召、“跟党走”的人

这类人相当多。因为长期以来的宣传和教育，人们普遍形成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迷信，“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听话要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这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成为道德准则和思维习惯。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从另一方面教育了人们，在政治运动中不跟共产党走，就有可能被划到“阶级敌人”一边去，受到严厉的“专政”。

２００５年出版的《胡耀邦传》，写到“文革”初期共青团中央被宣布“改组”后：“团中央工作人员从被改组的惊愕和疑虑中缓过神来，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在红卫兵浪潮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是出于‘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诚愿望，也赶紧行动起来，对书记处特别是胡耀邦用大字报展开了声讨批判。”〔４５〕

“文革”初期四川著名的３２１１１英雄钻井队，因在一场天然气井井喷事故中“血战火海”的事迹被媒体加工炒作后得到极大荣誉，全队到北京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其代表在１９６６年国庆节上天安门与毛泽东合影并代表全国工人阶级讲话。这些石油工人根本不懂政治，但在北京接触到的情况使他们发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支持造反派的，因而回到四川后便参加了造反，其副队长、石油工业

部五好标兵彭家治还被推选为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清华大学教职工造反派组织“红教工”的发起人陶德坚，时为清华大学建筑学系讲师，中共党员。在回忆录中她坦率地谈到了当时起来造反的思想动机：“我是不应回避这文化大革命的。……我们此时对毛的崇敬与信任都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他正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怎能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呢!”〔４６〕

还有的是在“文革”初期跟着基层党组织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人，也因为对“党”的绝对信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在碧峡所写的《波澜乍起——武汉水电学院的１９６６》一文中，就写到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们班的团支书，是院文革的委员，那时与我谈心，说他心里很沉重，没想到自己刚刚参加政治斗争，就犯了错误，而且是反动的错误。他后来一直与造反派站在了一边。”原驻水电学院工作队的李组长，也“心悦诚服地认为自己作错了”，“他从１９６７年初开始支持水院造反派，后来被打成黑手……”〔４７〕

（六）力图改变“政治贱民”地位的人

这类人“文革”前社会地位低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家庭出身”问题，本人“政治历史”问题，或本人“现实表现”问题而遭到压制、打击，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其中有被强迫“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释放后的人员（在当时社会上通常仍称之为“劳教释放犯”、“劳改释放犯”，仍以罪犯视之），有被单位开除、降职、降级或下放的人员，有长期不予安排正式工作或难以找到正式职业的人员，有因农村遭遇大饥荒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有长期受到歧视、压制的“反属”（“反革命”等各种“专政对象”的家属）等等。

在遇罗克之弟遇罗文所著《我家》一书中，就写到了当时一度占据着北京市人委大楼的一些无家可归的“遣返人员”（撵回农村的“黑五类”又被农民撵回来，原来城里的住房已被别人占了），“起初他们常遭‘红卫兵’洗劫、毒打，求生本能使他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十六条捍卫团’，专门对付野蛮的‘红卫兵’。”〔４８〕

在四川省１９６７年的“二、三月镇反”中，在成都首先遭到打击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在重庆首先遭到打击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临江门街道）支队，其成员中就有不少这类人员。这些人一般在１９６７年的“二、三月镇反”之后就已明白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是难以改变的，“公安六条”列出的“二十一种人”已经把他们大多网罗于内，因而他们大多退出了“文革”舞台。

（七）想要争取一些自身权益的人

这类人与前面一类人有些交叉，同属社会弱势群体。不过，这类人更多的是想从经济角度解决一些自身权益问题。如感到待遇不平等的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文革”前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被精简下放的城镇职工或被遣送到农

村的城镇居民，“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支援内地建设职工等。

他们在“文革”中的造反，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主要是进行经济斗争，要求得到平等的经济待遇，或要求转正（转为正式工），要求复工、复职，要求返城（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等等，表面上的政治口号只是一个适应形势的合法手段。因此他们在整个造反派阵营中显得十分“另类”，特别被一般理想主义型的造反派看不起。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有在北京建立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有上海的临时工、外包工组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还有打着“全国”旗号的全国上山下乡革命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他们的造反在１９６７年1月达到高潮，但也迅速被压垮，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很快便发现不能容许这样的“造反”，而以“反革命经济主义”等罪名将这类组织予以取缔。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对“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接着，２月１７日一天之内，中央就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等文件，将这一股以经济目的为主的造反风强压下去。而首都三司等号称是“中央文革铁拳头”的主流造反派，则在打击这些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组织时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八）以造反为好玩者

对这类人和这种纯为“好玩”而参加政治运动的社会现象，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其实这也是大量存在的事实。相当一些人，特别是不少政治意识淡漠的青少年，参加政治运动并非出于理想、信仰或挨整后的报复欲望，而仅仅是为了“好玩”。因为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正常的健康的娱乐条件和机会，从小就只知道玩“捉特务”、“打仗”、“抓俘虏”之类游戏，到“文革”爆发之前，社会生活的枯燥乏味已经达到了极点，稍微好看一点的书和电影、戏剧、美术作品，好听一点的音乐，都遭到了批判、查禁。“文革”造反风起，社会陷入半无政府状态，他们可以“自由”地玩耍了，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玩耍，只会仿照以往从“革命教育”中获得的那点“知识”来满足自己玩耍的天性，于是，他们快活地参加批斗会，快活地参加武斗，甚至快活地参加虐囚、虐俘，甚至“打活靶”（以路上行走的活人为靶子比赛枪法取乐）……

重庆电视台编剧张鲁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一文中回忆了他亲见的一次虐俘活动。这些俘虏并不是武斗中抓到的对立派人员，而是当时一伙“社会上的”（不在任何群众组织派别中的）打架斗殴者。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红卫兵武斗队以重庆市中心区的治安警察自居，得到群众举报后持枪跑去把那伙正在斗殴的人抓到了学校，然后，“也不审也不问，就说，你们不是喜欢打么？就打嘛。于是命那两拨人就在大操场扯开架势打。哪还敢打？就说，不打？老子好久没打了，今天

倒要看下子你们是咋样一个打法的，也算过个瘾。那帮人还是不敢打。就又说，好嘛，不打群架，那就单练。就将两拨人一边喊出一个来，发了刀刀棒棒，单练。还是不敢。就喊其一趴下，令另一举棒打去。这一位不敢打重了，看起没劲，学生中就有一人悠悠从观战者一群中走出，伸出两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从此人手中要过棒棒，拉开过去衙门打板子的架势照趴着那位一顿痛打，打毕，把棒棒交回站着的人手上，伸出两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悠悠回到观战者一群，活像体育课被老师叫出队列投了一回篮又回到队列。就问那人，这下学会没有？那人连连应声，会了会了。举起棒棒要打。但有人说，打学会了，该学挨了。于是就换了趴着的那位起来，命这位趴下，趴着的那位自然将这顿痛打的怨气全发泄在这位身上，棒棒舞得比眼镜更圆。于是这两拨人打了又挨挨了又打，直把个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大操场打得来噼噼啪啪妈啊娘的响声连天。这还不算，又有人想出点余兴来，叫这两拨人‘大联合’合二为一列成方阵表演当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流行歌舞《车水忙》。直到此时我才觉得这伙五大三粗的汉子真正可怜，他们五大三粗五音不全身带棒伤还要学女学生扭腰摆臀载歌载舞：‘车水忙，车水忙，脚踏水车喜洋洋，水过清渠哗啦啦响……’”〔４９〕

笔者也曾于１９６７年秋听一个从重庆跑到成都的反到底派武斗人员，一个中学生，讲他们如何逼八一五派的俘虏跳《车水忙》的事：不跳的，或者说跳不来的，就用棍子打脚，逼得其非跳不可，俘虏中有一人是跛脚残疾人，“自报节目”说跛脚不好跳，唱一个歌给你们听要不要得？获准后，那跛脚俘虏便临时根据“文革”前的流行歌曲《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编了个讨好的歌曲《反到底人民要解放》唱起来：“反到底人民要解放，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烧得那个伪革联心惊胆战。从军工井冈山到西师八三一，从造反军到财贸九二一……”把反到底派的知名组织都编进了歌里。于是得到赞赏，免遭“触及皮肉”。我至今还能记得那中学生讲述这一虐俘活动时乐不可支的样子。

（九）趁火打劫者

这类人，在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动乱或政治运动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就像阿Ｑ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便想跑到赵太爷等大户人家里去“革命”发财，抢一点“元宝，洋钱，洋纱衫”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居然认为阿Ｑ的这种行为也叫“革命”（这与毛泽东充分肯定并热情赞颂湖南农民“痞子运动”是一个道理），毛泽东曾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的事，“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准许别人革命”〔５０〕。因为毛泽东反复使用这个不伦不类的例子，一般人也就习惯于认定阿Ｑ抢东西也是“革命”，“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是不对的。

“文革”中，１９６７年1月２０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上海《文汇报》１月１４日社论《沉舟侧畔千帆过》中，就以此为例说：“那种相信没有他们就不行了的人，除了自己不敢造反外，还不准别人造反。这是《阿Ｑ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作风。在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开展的今天，新假洋鬼子们可以休矣!”

《人民日报》也在多篇文章、社论中以此为例来教育造反派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如《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6月２１日发表的《团结——批评——团

结》中就说：“在那篇《阿Ｑ正传》里，鲁迅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有个留过东洋的地主少爷叫假洋鬼子，他不准阿Ｑ革命。阿Ｑ想到假洋鬼子那里参加‘革命党’，却被他扬起哭丧棒赶了出来。其实，阿Ｑ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难道能够像假洋鬼子那样吗？”

既然毛泽东都认为像阿Ｑ这样的“抢点东西”也叫“革命”，那么在“文革”中这种人也就自然不会缺少了，进城参加武斗的农民中这类人较多，为了得几个工分，得几块钱，或是在打砸抢中顺手牵羊发点小财，他们有的人就把命丢在了城里。

重庆市文联当时的业务组组长杨世元（后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离休干部）回忆，１９６７年２月，在重庆市文联造反、夺权的作家罗广斌被对立的八一五派绑架后，一伙“文革”前的业余作者和业余文艺活动骨干打着“四川省工农兵文艺兵团重庆团”的旗号到文联来进行第三次夺权（第一次是市委工作组夺文联党组的权，第二次是罗广斌、杨益言为首的文联造反派夺权）。来的人当中，就有人主要是想找“禁书”，而且主要是想找原版《金瓶梅》，甚至在私下里声言：“要骚大家骚!”〔５１〕

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当时占造反派主体的几种较为常见的类型。这些类型也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常有交叉，有的人同时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身份，在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中，此一类型人物占主导地位，而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则可能是彼一类型人物占主导地位。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不同部门或地区的造反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不可一概而论。此外，对于在那样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历史人群，必定还有其他一些千奇百怪的类型混杂其间，也还有一些作为造反派基本群众的“随大流者”，但是他们都不可能在造反派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　造反派的时代烙印

造反派这个出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的特殊群体，虽然其组成人员形形色色，加上因“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而显得全国各地千差万别，但是毕竟同属一“派”，而且生活、成长于同一时代，不能不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烙印。不正视这些时代烙印，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评价造反派。

（一）“怀疑一切”与个人迷信

“怀疑一切”是对“文革”前日益强化的思想禁锢的反弹，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听话要听党的话”突然变成“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转折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怀疑一切”思潮在造反派形成之初达到顶点，当时造反派最常引用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就是：“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因此，造反派敢于对许多权威进行怀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几乎都遭到造反派的怀疑和“炮轰”，甚至连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连周恩来都难逃被怀疑

、被“炮轰”的命运。

但是，造反派的“怀疑一切”并不是什么都不相信，并不是真正的“反权威”，因为他们同时又非常迷信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所写的《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１９６６年9月７日）一文中说：“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论“怀疑一切”》（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中也说：“‘怀疑一切’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检查一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相信、就拥护、就支持；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批判、就斗争、就坚决打倒!!”〔５２　〕

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表现？造反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迷信。造反派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更是在个人迷信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方面的思想烙印更深。因此，造反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为己任。而且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往往在个人迷信方面表现得比一般民众更加狂热，更加极端。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八一五派一开始就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后来分裂出去的反到底派，也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反到底派还专门设有一个影响极大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学生领袖江海云，在１９６７年“二月镇反”中被抓进监狱后，她在向公安当局抗议时宣称：“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在狱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出狱后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说是“毛主席救了我”，要大家“一千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５３〕。

从当时不少造反派新改的名字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卫东”、“卫红”、“永红”、“继红”、“红兵”、“文革”、“造反”、“反修”……都是当年红卫兵、造反派甚至普通民众中常见的名字。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的领袖叶卫东，原名叶冬初，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员，共青团员，为表示“保卫毛泽东”的决心改名叶卫东（后曾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学生领袖杨道远，原名杨树贵，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学生，“四清”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因受那段流传甚广的有关这一代青年人“任重而道远”的“毛主席语录”影响，改名杨道远（后曾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西有位工人造反派、柳州铁路局“工机联”的负责人王某，为表示“紧跟毛主席反修防修”而改名王反修，在１９６８年7月２５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时，周恩来曾质问他：“你叫王反修？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５４〕

（二）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

因为在“文革”前长期生活在不讲法制、《宪法》形同虚设的社会环境中，造反派与当时的官员和民众一样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在这方面，造反派与１９５７年的许多右派相比，思想上矮了一大截，首都三司著名的口号“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扫帚”，就跟“文革

”前宣传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有异曲同工之妙。造反派普遍的行为准则是毛泽东讲的话，《毛主席语录》，以及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首长讲话”。本来造反派都反对“血统论”，但只要中央文革小组一宣布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大毒草”，造反派马上就群起而攻之，积极查封发表《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零星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５５〕本来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组织与其他造反派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但中央文革小组一宣布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是在搞“反革命经济主义”，首都三司马上出动人马对“全红总”进行围攻、抄砸。几乎没有什么造反派把《宪法》当作行为准则。即使是在建立群众组织方面，也不是依据宪法而只是依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一旦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让群众组织存在了，造反派无不纷纷表示拥护，自动撤销总部，解散组织，还自认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是舵手，造反派跟着走”。

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女学生的思想。一个是“反右派”时期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一个是“文革”时期的四川大学数学系学生江海云。冯元春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她对中共党内的“高饶事件”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冯元春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冯元春的观点是，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５６〕比冯元春晚将近十年的川大校友江海云，“文革”中著名的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的“政委”，在１９６７年“二月镇反”中因“冲击成都军区”等罪名被公安机关抓捕，４月里获释后，她在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控诉说：“在狱中，他们对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甚至没有学习毛主席语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由！”“我原来就想不通，为啥子要抓我呢？现在才搞通了，因为我要革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们就要镇压。这些道理都是毛主席早就告诉了我们的，我也饱饱地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深深地懂得了，如果不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５７〕冯元春能站在公民的立场来看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作为是否合法。而江海云则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灌输的那些教条在看待社会。

（三）“大民主”与不民主

“文化大革命”中宣称实行的是“大民主”，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民所不可能享有的最大的民主。其实这只是一种“民主”的假象，所谓的“大民主”是没有法制保障的虚假民主，只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长期接受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影响，长期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被灌输的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反对折中、公允、调和”等思想，造反派普遍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因此在大字报、传单、小报和广播中经常出现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或对批判对象进行人身攻击、乱加罪名无限上纲的内容，在批判时总是要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辩护权，甚至施以武斗或私刑，随意抓人、抄家。有人认为造反派进行的是“争人权”的斗争，实际上当时的造反派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的人权意识。造反

派大多在“文革”前或“文革”初期遭受过迫害，但在起来造反后往往会对批斗对象进行变本加厉的打击迫害，丝毫不会认为对方也有“人权”。比如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斗争王光美（逼其穿上旗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丑化），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斗争彭德怀（先后七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致使其前额被打破，胸部两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首都军事院校造反派斗争罗瑞卿（将跳楼自杀摔折了腿的罗瑞卿用箩筐抬进会场），以及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山西省省长卫恒等被批斗整死……造反派普遍不懂得宽容，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对“保守派”批判当权派，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批判真包庇”，对当权派的检查，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检查真反扑”。也正因为如此，造反派内部往往因一点小小的意见分歧就会上纲为“原则斗争”，就要“炮轰总部”，甚至拉出人马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别。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除去早期的基层组织外，也大多不是真正通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后来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群众代表，更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些头头们的重大决策，也经常不通过民主程序讨论表决。一些重大行动往往就是一两个或几个头头作出决定后便调动人马付诸实施。重庆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回忆了当年他们两个负责人秘密决定搞一次卧轨抗议行动后，就把成百上千的群众用汽车拉到预定地点去，而这些群众对去干什么毫不知情……他还回忆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在四川两大派为省革筹小组的两位干部刘结挺和张西挺应该打倒还是保卫（“打刘张”和“保刘张”）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重庆反到底派举行“保刘张”的大游行，他所在工厂有老工人不辞辛苦走很长的路跟着参加了游行，但事后有人问起刘、张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５８〕这类事例在派性冲突中数不胜数。

（四）暴力倾向

因为长期接受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造反派信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因此在语言和行为上都带有强烈的暴力倾向。“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都是当年造反派的流行口号。很少有哪个造反派组织没有参与过打、砸、抢活动，虽然打砸抢不是造反派的发明，而是从土改时的“贫农团”，三反、五反时的“打彪队”直到１９６６年“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的早期红卫兵之类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那儿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但却被造反派毫不含糊地学到了，用上了。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发展为暴力冲突，甚至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在武斗中，都把对方称作“匪”（就像国内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互称为“匪”一样），而把自己的武斗行为说成是“剿匪”，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在武斗中许多地方都有虐俘、杀俘之类事件发生。电影导演陈凯歌还对这种暴力倾向作出了另一种反思，他认为当时许多人使用暴力是出于恐惧：“‘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他还坦率地回忆了一次在游泳池参与中学同学对一个“流氓”进行群殴的事，“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５９〕

当然，造反派的这些时代烙印，有的（如个人迷信、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民主、暴力倾向等）在“保守派”以及当权派那里都可以看到。只是表现形式

及内容各有不同特点。时代的烙印决不会仅仅青睐同时代人中的一部分。此外，这些时代烙印也并非“文革”时期的赐予，而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对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作另一些探讨。

通过上述回顾与分析可知，把造反派这个复杂的历史概念简单化，无论是称之为“社会渣滓”还是“人权斗士”，都是不科学、不准确、有违历史事实的。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如，对各省、各大城市、各大地区主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消亡，对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两大派或三派的头头，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中共九大、十大的代表，出席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的个人情况，对各地重大的造反事件的发生背景和来龙去脉等等，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更进一步，还可以深入调查造反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年龄、性别、民族、籍贯、文化程度分别是什么，他们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多少共青团员，多少转业军人，多少劳动模范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们中不同年龄层次的各占多大比例，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间加入的，什么人介绍的（比如，湖南省著名的工联负责人胡勇，就是由华国锋和支左部队一位领导人介绍在“九大”前夕“突击入党”的〔６０〕），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就已被判刑入狱，有多少人在“文革”后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政职务，有多少人被判刑入狱，有多少人被定为“三种人”，他们的具体罪名是些什么，他们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被定的罪名有哪些不同，这些罪名涉及的史实如何，他们中有多少人后来在新的领域做出了成绩，等等，等等。

总之，对造反派，还需要有更多、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不会像盲人摸象那样，只摸到一根象尾巴或象鼻子，甚至可能只是象腿上的一团烂泥，就急着下结论说：这就是大象！

注释：

１．王年一２００６年1月７日致笔者信。
２．《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一版５９２—５９３页
３．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6月２７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
４．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
５．陈毅对外事口运动的指示，１９６６年6月２５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1月版１１８页。
７．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一版２８３—２８４页。
８．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1月第一版８８页注释３
９．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１９６６年8月２４日《人民日报》

１０．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1月第一版８７页
１１．这句话是毛泽东亲自“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之一。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1月第一版２１２页。
１２．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上册，开放杂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１８—２１页
１３．安文江《我不忏悔》，见《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９３页
１４．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１９１９—１９８７）》，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一版３２３页
１５．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１９６６・５—１９９１・１２）》下册，新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6月第一版7页
１６．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２９８页
１７．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第一版３７８页。
１８．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7月第一版１４０页
１９．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7月第一版１３９页
２０．徐友渔《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2月第一版９０页
２１．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1月第一版２０９页
２３．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1月第一版２４７页
２５．以上中央文件当年均公开发布，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２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1月第一版３０５页）
２７．以上中央文件当年均公开发布，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２８．１９６７年4月３０日周恩来、陈伯达等接见福建群众代表时，周恩来讲话中说：“对姜观有很多材料说明确实比较严重，所以不要马上作结论。台湾的报纸喜欢他的东西，说明他是在被敌人利用，他的问题还待查明，一般应立即释放。”“姜观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将继续研究，将来还派人去，再把意见提供给军管会。”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２９．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1月第一版３８５页
３０．“七二三布告”与“八二八命令”当年均在全国公开张贴、宣传，家喻户晓。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３１．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１７４页
３２．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２００５年5月第一版１３０页
３３．《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10月第一版２１０页。原文中“那是我１７年以来全部的教育……”里的“１７年”为“１７岁”，应为排版错误。
３４．见《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１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教学批改组、外国留学生工作批改联络站、首都红代会北京语言学院红旗兵团编印，１９６７年6月。
３５．武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0月第一版６１页
３６．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第一版２０９页
３７．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杂志１９９５年第一期
３８．《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凯歌／记我们身边的麦贤得——董继平同志》，载《８。１５战报》第４２期，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主编，１９６７年10月1日出版。
３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1月第一版３１９页
４０．《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1月第一版１１５页
４１．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2月第一版８９—９８页
４２．周孜仁２００６年1月２日致笔者信。
４３．一丁《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载华夏文摘增刊３５５期・文革博物馆通讯１７２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２００３年4月8日出版
４４．邓自力《坎坷人生》，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4月第一版２３６—２３７页
４５．《胡耀邦传》第一卷（１９１５—１９７６），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唐非撰，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第一版３９８页
４６．《陶德坚回忆录》，见《五柳村》（陶世龙个人主页）
４７．《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10月第一版２０１页
４８．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5月第一版８１页
４９．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杂志１９９５年第一期
５０．徐中远《读鲁迅著作》，载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9月第一版１８８页
５１．杨世元回忆、何蜀整理《“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未刊稿
５２．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
５３．《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江海云同志在热烈欢迎我非法被拘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１９６７年4月１４日出版。
５４．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５５．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第一版９８页。
５６．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载《谢泳居》网页。
５７.《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江海云同志在热烈欢迎我非法被拘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１９６７年4月１４日出版。
５８．李木森《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未刊稿
５９．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7月第一版１５７—１５８页
６０．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网站。

写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前夕
２００6年3月１６日第二次改定
２００6年3月３１日第三次改定

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

刘国凯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忆和意向

1、文革对共产党有利还是不利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日至今已三十九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想沉淀，按说同属民众阶层的人们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最基本的评判上应凝结出起码的共识。然而，令我极感不可思议的是：民众阶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对文革竟有着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意向。在表现形态上，一种意向多以文字运载。另一种意向只以口头相传。

见诸文字的意向是，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了，但又担心文革会再次发生。因为持有这一意向的人士认为文革对共产党有利。“中共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和利益，必将……再次发动文革。”(见“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黄花岗>杂志 04年第二期)这种文字经常可以在各种报章杂志中看到。

另一种不以文字运载，而只以口头形式在社会底层中辗转相传的意向是，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各地工人抗议活动中都可听到表达这种意向的耳语。再来一次文革干什么？四十好几、五十来岁的工人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当权派那么简单，而是要把共产党的那班贪官污吏彻底干掉，要让共产党彻底完旦。很明显，这种意向是基于与前一种恰恰相反的判断：文革对共产党不利。

2、对于文革的自发记忆与灌输记忆

民众阶层中为什么会对文革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判断，并导致差别如此巨大的意向呢？追索原因，是由于对文革有着不同的记忆。稍加区分，这记忆还可分成自发记忆和灌输记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大约只占当今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他们的记忆是自发记忆，其余没有经历过文革者的记忆就是灌输记忆了。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自发记忆并不都全面、甚至并不都真实。细心地加以考察，可知自发记忆还会产生片面性或扭曲性。通常因某个人乃至某个社会群体的视觉、感觉、经历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向性，从而使之对文革中的某些情况留有较深的印象，对另一些则较淡薄，形成片面记忆。不过片面记忆尽管不能反映事物全貌，但它所反映出的那部分与事实还是基本相符的，只是不够全面而已。故此片面记忆还属于自发记忆的范畴。许许多多带有片面性的自发记忆“积分”起来，就大致可以真实地反映事物的全貌了。而扭曲记忆则大相径庭。它常常源于记忆者某种变态心理，或者是在某种外力的胁迫或诱导下产生。扭曲记忆往往是对事实作蓄意的选择记忆、甚至是歪曲记忆。其所反映的非但不全面，甚至还与事实不符。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至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严格地说，扭曲记忆并不是货真价实的自发记忆。

3、中共制造、文人配合，催生了扭曲记忆

对文革的扭曲记忆在当今中国已占主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扭曲记忆有利于中共，中共使出浑身解数来制造、催生、扩张中国社会对文革的扭曲记忆。中共对文革评判定下它所属意的基调，并通过其豢养的御用文人制作文字标本，向其它文人作示范。中共利用其掌握的文字放行权，只允许对它有利的文革记忆刊于报章、载于著述。这不但是一种只为中共所认可的、需要的记忆才能以文字记载下来选择记忆，而且在选择中还会蓄意地对事实予以切削改制。中共以其政权力量制造了筛孔特别的筛子，并操作筛子筛选其属意的产品。

扭曲记忆的兴盛固然与中共的主导关系极大，但文人们的配合作用亦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若只有中共的主导而无文人的配合，扭曲记忆不可能横行于世。当然这种配合亦可分成自觉配合与不自觉配合。

纯粹的御用文人食中共之佳肴、住中共之美宅，其媚上的行为取向自不待言。而似较有独立身份的知识者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大多其实亦不能完全摆脱受雇于中共的状态，或受制于中共的处境。其所言所论难以置中共之好恶于不顾。何况不符合中共胃口的文字难以付梓。有时为刊出计便甘削足适履了。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老一代的文人在文革后得到中共的特别优待。感激涕零之余，他们往往主动按照中共的明示或暗示去“记述”文革，去詈骂中共想要咒骂的人，而不管这些挨骂者是否应该遭到那样的谩骂。由中共自己来进行谩骂未必能取得其所需要的社会效果，而由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来操办则成效斐然。当扭曲记忆已成泓然大势之时，它就可于无形中操纵社会的集体思维。不但未经历文革的人们接受的是以扭曲记忆为蓝本的灌输记忆，即使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在扭曲记忆的汪洋大海中，久而久之亦都迷失了自己的原有正确记忆而去附和声势浩大的扭曲记忆。这种情况在海内外民主文人中都有清晰的表现。其最鲜明的表现是，一提起文革就不加分析地、情绪化地大骂文革浩劫。仿佛文革中除了浩劫就没有其它。

考察中国社会的现实可知，片面记忆大多存在于底层民众之中，以口头相传，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很有限。而扭曲记忆多载于报刊书籍，故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无远弗届。当今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文革所知来源于报刊书籍。而这上面所载的几乎都为扭曲记忆。他们被灌输的这些扭曲记忆在灌输过程中还会有偏离加大效应，使之愈来愈远离实情。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浸泡在这种灌输记忆之中，后果十分堪虑。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当有一天中国社会全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所组成，底层民众中的口头记忆逐渐飘散湮没之时，一段文革史就面目全非了。

“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一文的作者据说是一位大陆青年。既是青年，当在文革后才出生，那么他对文革的了解无疑是来源于那种扭曲的灌输记忆。由此，他得出了文革有利于中共，中共必将再次发动文革的荒谬结论。

4、扭曲记忆的卖点在于对造反派进行栽赃

在中共主导和某些文人配合下得以充斥社会的文革扭曲记忆集中表现为文革浩劫论。其核心观点是：浩劫是文革造反派制造的。遭受浩劫的是中华文化；是知识分子；

是党的好干部。

共产党自暴力取得政权以来，它一直在糟蹋中华文化，在整治知识分子。这一次情况截然相反了。中共把自己与中华文化、知识分子绑在一起，都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既然大家都在文革中遭受劫难，那么就该冰释前嫌、惺惺相惜，一起去憎恨施行浩劫者的文革造反派。共产党心目中的造反派主要是些什么人？是底层民众，又以体力工薪者为主体。

文革中是否存在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回答是肯定的。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即所谓“破四旧”--主要发生在 1966 年 7 月的文革最初期。这是一部分大、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的胡闹，理应予以责备，但却与文革时期的群众造反运动毫不相干。因群众造反运动至 1966 年 11 月才发生。1966 年 7 月之时，它还来不及在场，没有“作案”时间。对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名人的虐待主要发生在 1966 年 8 月至 9 月。施虐者主要是由中共高干子弟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造反派同样来不及到场，没有“作案”时间。可是在许多文人学士的笔下--回忆录或小说--这一切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身上。这类文字也是泛滥到可以信受捡来的地步。如北美<世界日报>04 年 11 月“今古上下”版上连载署名罗思义的题为“陈寅恪之死”一文，竟栽赃说陈寅恪先生是中山大学造反派迫害死的。其实即使是按照该文所述，陈寅恪最遭冲击的时日也是在 1966 年 7、8 月间，与造反派毫无关系。这使我深深感到有这样一种社会现像，凡是指陈造反派迫害著名知识分子的文章，都会被如获至宝地登载传播。这种以讹传讹乃至随心所欲的移花接木、栽赃诬陷发展下去，以后，即使有人说老舍、储安平等都是造反派迫害死的，也不会有人出来澄清了。於是更年轻的一代就获知造反派竟可恶到迫害死老舍、储安平的地步，使之对造反派更深恶痛绝。

5、中共栽赃造反派是为了离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阶层

中共政权扭曲文革记忆，栽赃造反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使用这个手段要达到的初级目的是把水搞混，让真正在文化革命中疯狂肆虐、草菅人命的贵族(高军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让首先使用暴力打杀“四类分子”和造反派的保皇派(保党派)；让大规模动用军队残酷屠杀造反群众的各地军头；让文化革命一切罪孽的祸首元凶毛泽东蒙混过关，逃脱社会正义和历史的谴责。其高级目的是要用以离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阶层。务必使这两个社会群体不会结合起来。否则，大不利于中共政权的巩固。

八十年代以后，中共与民众阶层矛盾的焦点，已从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转变到中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1957 年反右，中共是蛊惑体力劳动者去践踏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是蛊惑知识分子去践踏体力劳动者。尽管八九民运以学生为主体，但镇压行动与其后的收买措施相结合，使中国知识分子就其整体而言已与当局妥协，有的甚至还充当了共产党的说客、辩护士。

中共政权的超高消费耗费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北京之春>05 年十月号有篇题为“最昂贵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 为了保持政权，它选择了与知识分子结盟的手段。故拨出一部分财力来收买知识分子，或默许知识分子用各种方法去搞钱敛财。中共不可能收买体力劳动者阶层。因这个阶层的基数太大。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另一方面是由它的本质决定。即使它又多搜刮了一些钱财也不作此用，而继续投入到党政超高消费和官知联姻之中。

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活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底层民众。而知识分子阶层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愈来愈温暖。这使中共深感，极少数不接受收买的知识分子的抗议语言不足为虑，真正有可能倾覆其政权的强力来自于体力劳动者阶层。同时，那些群众反抗活动使中共很自然地联想起文革中群众造反运动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中共政权最忌讳的文革记忆是什么？是文革中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这些冲击曾使头顶神圣光环的共产党高官威风扫地；使运转效率极高的政权机器一度瘫痪；使许多共产党高官曾恐惧自己乃至整个共产党体制都面临灭顶之灾。故此，中共视文革为浩劫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共产党照此按实表述文革浩劫，那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底层民众会由此受到鼓舞。而知识分子则认为这与我何干？共产党明白它必须避免这两种倾向。

同时，中共心知肚明，它与底层民众的矛盾既难以化解，那也就只能是严加防范之、压制之。共产党为使其对群众反抗运动的剿平能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拥护，便把社会上的群众反抗运动抹黑为格调低劣的动乱。但是，这“动乱”并没有伤及知识分子阶层。为能挑起知识分子对这“动乱”的反感，使之与共产党同仇敌忾，共产党找到一个巧妙的配方。就是淡化文革中群众对中共统治的冲击，强忍下对此的切齿痛恨，而着力把文革浩劫渲染为知识分子的遭难。把文革中群众冲击中共统治秩序的反抗运动歪曲涂污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动乱，再把当今的群众反抗运动与文革时期的等同。利用知识分子对文革的扭曲记忆，诱导其对当今群众反抗运动抱以恐惧憎恶。

共产党这一套已产生作用。这表现为当今知识分子阶层就其整体而言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和反抗基本采取袖手傍观的态度。

6、请听江泽民的心声

但是，尽管共产党成功地导演了这个戏目，它心里还是明白，即便如此，当今群众反抗运动还是会随时发生。为了保持镇压势能，最重要的是镇压机器自身的运转不能紊乱。文革时期的群众反抗运动之所以能骤然发展到规模极为巨大的程度，就是因为共产党自己首先乱了阵脚。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阵脚不乱？就是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了。自己内部无论有多么大的矛盾分歧，都务必内部解决。不要闹到社会上去，不能让那些不满、敌视共产党的人群有可乘之机。这一心态在 1999 年江泽民视察山西时对省委一班人的所言中有了最清晰的表露。江说：“同志们，我们都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要是船翻了，大家都完了，不是我一个人。”这句真言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抗议工人的耳语是多么尖锐地刺向中共政权的神经。“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再来一次文革就要共产党完蛋。”

二、官方文革引发人民文革

1、放弃人民线索论，接受人民文革论

1996 年，文革三十周年时，我撰写了一篇题为“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的文章，发表在北美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上。星移斗转，文革四十周年又在即了。经过近十年的思索，我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我愈来愈感到文革评判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不应把它限制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三年文革的分期我基本予以保持，而两条线索之说，虽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有着较多的回旋余地，但它的政治触角则太软钝。在文革中群众反抗运动被掩盖、被抹黑、被歪曲诬蔑的今天，有必要更旗帜鲜明、更针锋相对地高扬我们的观点。故此我决意放弃“文革人民线索”之说，而择取政治意向更鲜明的人民文革论。

在我之前，已有王希哲、郑义两人取人民文革一说。郑义所指的是始自 1966 年 10 月批“资反线”后，至 1968 年夏季镇压前的群众反抗运动，(见郑文“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载于 1996 年杨建利编辑的文革史论文集<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我的分析论定与之完全重合。王希哲的“人民文革论” 则与我略有区别，但原则上仍基本一致。王将 1966 年秋冬以后的群众反抗运动看着是一种持续的积累和铺垫。而这积累的反抗势能在 1976 年丙辰清明中得到总爆发，并且将“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2、何谓官方文革、何谓人民文革

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 。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至于毛搞文革清洗的原动力是意识形态、治国方略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抑或以不同比率兼而有之，则仁智互见。但这并不在我们的关切之中。我们--人民文革论的持有者关注的是，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之间的关系。当然更首要的则是人民文革的界定。其后还有对人民文革的评判，以及研究人民文革的现实意义。

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 1966 年深秋到 1968 年夏。关于这些，我在“论文革期间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斗争”等文章中都有十分具体的陈述，此处不再重复。人民文革的界定比人民线索更加清晰简练。并不是文革中所有的群众活动都可纳入人民文革的范畴。如文革保守派的活动就不纳入。又如 1967 年初就掌权并迅速蜕化为新保守派的上海工总司一类群众组织的活动亦不应纳入。浙江、四川等一些原始保皇派垮台较早的地方，不再受压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互斗，这些活动也不属人民文革的范畴。北京某些大学生组织对刘少奇等共产党“黑帮”的批斗同样都不是人民文革。至于 1966 年 8 月的“红色恐怖运动”，其凶残的肆虐者是由共产党的衙内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故更是与人民文革风马牛不相及了。

官方文革的施行者是共产党的整个国家机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党内异己势力均属其中。这个机器的延伸物--保守派(这是个历史名词。更贴切的称谓应是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定统治秩序派) 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但是，分裂蜕化后的造反派组织则作另论。

3、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

--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引发。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

这次毛泽东清洗党内高层异己，没有采取过往中共党内斗争的惯用模式。他是把自己与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矛盾公之于众，把异己势力指控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实施者，和“复辟资本主义”、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走资派”。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当权派”--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并夺取他们窃据的权力，把权力夺回到革命人民手中来。於是，毛泽东搞的这场清洗党内高层异己的斗争似乎就不再是格调低下的纯权力之争、宫廷之争，而是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要“找到一个形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要实现“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於是毛的清洗行动就涂上了一道冠冕堂皇的油采。仿佛这场清洗毛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去进行的。他出以公心、用心良苦，实值得民众千秋万代永世赞颂。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已永远封存在那玻璃棺材之中。后世最有洞悉力的学者也只是分析而已。我们不必去凑这份热闹。而我们关注到的是，正是由于毛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方式来进行这场清洗，才给群众反抗运动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或者说，人民文革的产生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人民文革遭到某些人士尖锐的抨击。他们说既然文革群众造反运动是在毛泽东的恩准下进行的，那么它就是跪着造反，其实只是充当了毛政治清洗的工具，乏善可陈。

这里有个最简单明了的逻辑：如果人民文革真的完全是毛泽东掌中应心得手的清洗工具，与毛的官方文革配合无间，那么它就会一直得到毛的嘉许，并以封赏告终。可是，情况并不如此。人民文革尽管曾得到毛某一程度的支持，但最终在 1968 年夏被毛伙同各地军方和重新“站出来”的干部严厉乃至残酷镇压。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民文革并非如那些人士所抨击的那样。

4、造反派奉旨造反、乘机造反

比保皇派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百倍

人民文革最受诟病的焦点之一是所谓“奉旨造反”。“奉旨造反”的提法系于九十年代首见于著名作家郑义先生。那时的社会情势是对文革造反派呈一边倒的彻底否定。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反对共产党的民主分子都同声谴责它，构成一大历史奇观。经历过文革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八九反思--为造反派平反”的文章，竟招致一片伐挞。在这种情势下，郑义提出“奉旨造反”已需要很大的勇气。郑义的意思是，尽管这个造反是“奉旨”的，但它仍然具有进步意义。因为这“造反”在“表达群众自身权利要求”，“无疑具有某种民主色彩”。尽管在我

看来“奉旨造反”之说已降低了对文革造反的评价，应评为“乘机造反”更为符合实际，但是，“奉旨造反”论竟仍不见容于许多评论家。在他们看来，既是“奉旨”，那就毫无进步意义可言。

其实，道理是很明确的。不妨打一个这样的比喻。

有一伙抢劫集团，其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发生矛盾。第一号头目欲将第二号头目及其势力铲除，於是他对被抢劫的人们说，这次你们可以反抗他们。并把反抗的棍子递给被抢劫者。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的人们应不应该乘此机会，接过第一号头目递过来的棍子去进行反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面对这一历史事实，还要对被抢劫者横加贬责是极为荒谬的。难道有机会都不去反抗，一定要束手待抢才算有意义吗？

当然，这些人士还会有这样一说。你们这样搞掉了第二号头目，但第一号头目还在。今后你们还不是要继续受第一号头目的抢劫？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话实在肤浅。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其实都是一丘之貉。第一号头目此举虽然冠冕堂皇地铲除了第二号头目及其亲信，但是，整个抢劫团伙的元气亦因此而大伤。从长远来看，被抢劫者的反抗行动不但直接打击了第二号头目，也间接地打击了第一号头目和整个抢劫团伙。这难道不是有利于良民百姓的好事？

至于后来有人为第二号头目“平反昭雪”，认为第一号头目同室操戈的作法太损，尤其是鼓动被抢劫者进行反抗的作法，使之从此不再驯服，实在大大不利于抢劫团伙今后的运作。这毫无疑问是纯粹站在抢劫团伙的立场上探讨问题。让他们探讨去吧。我们被抢劫的人们就没有必要参与其中了。不过，这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了我们：当年的反抗确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今，民主阵营中亦有人坚持对文革造反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理由是文革造反反来反去又能反出什么名堂？文革之后还不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此我要问，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从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算起也有二十几年了。足足一代人的时间，并没搞出什么名堂。中国还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那有该作何评价？是否七九民运、八九民运就因此而毫无意义？

指责文革造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各级“当权派”不反毛泽东、不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制度。(毛泽东与共产党制度是合一的，都可解释为“皇帝”) 是十分粗暴地脱离历史条件去进行评判。囿于历史条件所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依靠皇帝去反贪官，总比什么都不反、只是一味作顺民要好。当然更比保皇派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百倍。

深究一层，其实以皇帝与贪官的关系类比毛与共产党官僚并不贴切。封建时代的某些农民起义的确会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官吏虽由皇帝任命并效忠于皇帝，但皇帝与官吏的血脉并不绝对相通。君权神授，皇帝的帝位并不绝对需封建官吏拱卫。百姓有可能在打倒许多官吏之后而在皇权面前却步。皇帝也可以百姓

利益的代表者去严厉惩罚官吏。但是，共产党的领袖毛则大相径庭。他与共产党官僚的血脉是相通的。他的权力并不神授，而需由共产党各级官僚们去拱卫。毛尽管搞党内高层清洗，但毛与一般的、大量的共产党官僚其实有着唇齿关系。如果共产党官僚大量倒台，毛的绝对权力就会流失。非但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会成为空话，毛本身的座席都会发生动摇。故此，毛从 1967 年夏末起就极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严厉斥责造反派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所以，文革时期的造反群众即使只尽力去打击中共官僚而不反毛，其实都在打击共产党体制，因而有其进步意义。

如果再从历史纵向后作延伸比较，可知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活动于国内的民主战士们也不直言推倒中共政权，而采取较策略维权的诉求。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要去苛求近四十年前的文革造反者呢？应该明白的是，在专制体制下，能较快形成声势的反抗运动很难完全是自发产生的。如 1957 年的“右派向党进攻”。 若不是毛故作姿态搞开门整风，那股令共产党瞠目结舌的风潮就难以掀起。又如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如果不是法皇为筹款同意举行三级会议，历史进程恐怕会有另一番记录。

人民文革论还受到这样的质疑：你们说有人民文革，那请问人民文革是谁发动的？谁领导的？其实，一个骤然勃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往往不会有明确的发动者、领导者。比如 1789 的法国大革命，你能说得出具体是哪个人发动领导的吗？同样，整整两百年后的中国 1989 民主运动，你又能断定具体是谁发动领导的吗？没有具体的发动者、领导者照样会有这类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至于人民文革，它没有明确的领导者，但可以说它是间接由毛泽东发动的。然而，这丝毫不会改变它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本质。

三、毛泽东一连串的失算与人民文革不断地越轨

1、毛泽东并不英明

毛在世时其英明神武曾被吹捧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吹捧者到头来被毛列入清洗对象)。但实际上，毛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运作中都失误连连。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把国家经济推入灾难的深渊，三千万人因此饿病而亡。他对现实状况失察；对事情的预测屡屡失算。其政治洞悉力亦相当薄弱。1957 年春他提出要搞开门整风，请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他以为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都会是他可以接受的。他大可借机表演一番闻过则喜、虚心纳谏的漂亮戏目。效果是既校正了治国措施中的某些具体疏漏，又赢得了豁然大度、睿智开明的好评，真是皆大欢喜、何不美哉。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竟埋藏有对他的党、他的政府那么多的不满乃至憎恶。从罗隆基的政治设计院到钱居平的新阶级论，无不刺向他的党和政府的根本。震怒之下他把“开门整风”骤然转向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为了掩饰他起初的失察、失算，他干脆说当时的“开门整风”其实是要引蛇出洞。毛泽东是宁愿被人评为阴狠也不愿被人视为低能。这其实是很合乎他性格的逻辑的，因为他一向以秦始皇自况。

文化大革命中，毛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一连串的失察、失算，说明他对社会的真情非常缺乏了解。洞悉力十分薄弱。这就如他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对业已崩溃的社会

经济缺乏起码的知晓那样。

人民文革虽由官方文革引发，但它绝非消极地附属于官方文革、为毛的官方文革服务，而是时时力图越出毛设定的界线、轨道，成为自主自为的群众运动。毛间接地发动了人民文革，但却不能应心得手地领导人民文革。这正是人民文革终究被毛镇压的根本原因。

毛不但对人民文革的自主自为性缺乏预见洞悉，而且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反应、动作亦缺乏预见和洞察。无论是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还是对统治集团的统率，毛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耐。

2、人民文革越轨的两个层次

与军方对毛意图的误解和违抗

三年文革中，更精确地说是从 1966 年深秋到 1968 年夏，人民文革从发韧到被镇压的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它究竟是怎样越轨的呢？人民文革的越轨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浅度越轨，另一个是深度越轨。浅度越轨波及面广，一波接一波。深度越轨触角尖锐，由于官方迅即予以扑灭，使之如划过夜空的流星，虽耀眼但瞬息即逝。

人民文革的浅度越轨从它萌动之时就产生了。人民文革的第一波越轨行动借着助毛的批“资反线”展开。

1966 年 10 月为了把刘少奇、邓小平搞的在群众中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第二次反右扭转到对党内高层的清洗上来，毛指责刘、邓搞的第二次反右是迫害无辜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号召群众起来批判之。他没有想到被他发动起来的群众，并不把“批判”内容停留于他所划定的“资反线”范围内，而波及到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中遭过殃的人们出来喊冤，说他们亦是遭到“资反线”的迫害。於是掀起一股翻四清运动已定案件的风潮。由于此风大有蔓延趋激之势，毛在意外之余，不得不发了一个“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中央文件予以遏制之。此外，群众批“资反线”的烈度也是超出毛的意料。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人们冲进人事、保卫部门，砸烂保险箱，抢走档案材料。这种情况先发生在学校，后蔓延至工厂甚至机关，令中共当局极为震惊，但又不便仅因这单一情况发中央文件，故懊恼万分。

1967 年“一月夺权”后，毛指示军队介入地方文革运动，要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在毛的心目中夺省委、市委权的那一派就是“左派”，军队应予支持之。可是，事情远远不象毛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全国大多数省市，起初对毛的意图还不大理解的群众组织此时都迅速省悟过来。他们从保省市委很快也转变为造“走资派”的反，他们也去夺省市委的权。如果行动迅速的一派群众组织把它们撇开，抢先夺了权，它们会进行再夺权。这类组织的成员政治质量大多较“高”。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劳模先进多、人保政工干部多。在广州，这类组织聚合成总派，又自称东风派。总派被排除省市夺权之外。它没有搞再夺权，但是对夺省市委权的一派群众组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无论有没有搞再夺权，各地军方都无一例外地认定政治质量较“高”的那一派(保守派)是“左派”。军方的这一识别尺度是合乎共产党的正常鉴别标准的，也是文革前共产党政治伦理的自然延伸。於是各地军方在 1967 年早春都无一例外地支持保守派，压制乃至镇压造反派。最极端的例子是青海省军区二月下旬对造反派的大屠杀。

毛泽东没有料到军队会如此行事，又足说明他十分缺乏洞察力和预见性。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明明是毛泽东的看家术，政治等级观其实也是他搞起来的。各地军方如此判定“左”、“右”派正是在贯彻他多年的教导。军方对他的意图的误解其实均在情理之中。但是毛泽东此时的眼睛只盯在派系清洗的牌局上，忘却了自己的一向所言。如果他能预先对地方军头讲，这次判别左、右派不以过去一向的政治质量鉴别法作划分，代之新的标准。即敢于迅速起来夺省市委权的为之“左派”，那么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刚愎自用而又轻率颟顸的毛泽东只讲佛祖道宗式的只言片语，要军方去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结果就促成了 1967 年初遍及全国的早春镇反。

毛不能认可军方的镇压。因为他的政治清洗还没有完成。他还需要冲击力较强的那一派群众组织--造反派--为之火中取栗。於是他批评了军方，指示军方应给被军方打成反动、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平反。可是局势并没因此而缓和下来。毛再一次没有料到军方的态度是如此的倔强，竟软磨硬顶地违抗他的指示。亦没有料到从军方镇压的血泊中爬起来的造反派组织会如此勇悍地向军方反扑过去。

毛虽不认可军方的早春镇压，但也不赞成暮春之后造反派如此激烈地找军方算账。可是局势他已无法控制。多数省市的军方都拒不承认早春镇反的错误，更有甚者，他们还支持、唆使保守派挑起武斗，首先使用暴力袭击乃至屠杀造反派。造反派奋起反击，这就产生了 1967 年夏季的大武斗。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鲁莽行动使毛不得不责罚他。但他又没有料到这一有限责罚会被中央文革中的少壮派利用来向军方开刀。而且这一开刀得到林彪的暗中支持。中央文革少壮派企图通过打倒更多的军头以扩张自己的地盘，提高自己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的段位。林彪也想以此使自己的嫡系取代其它派系，在军中建立他的一统天下。造反派则激奋万分，到处冲击军区，要揪斗本地的陈再道，要打倒军队里的“走资派”。毛震惊、震怒了。地方军头不在他的清洗目标之列。何况把军头逼急了是很危险的。他对中央文革怒斥“还我长城”。同时他省悟过来。各地所有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保守组织虽然一时没有跟上自己的部署，但从根本上来看其实是自己的社会基础。造反派虽一时可有所用，但其思想情绪和行为方式其实是令人难以放心的。

为了笼络军方，毛严厉惩处了中央文革少壮派；为了约束造反派、安抚保守派，毛重新调整了他的群众组织政策。再也不划分造反派、保守派，而强调两派都是群众组织。都应斗私批修，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熬过了军方的早春镇压，又顶住了保皇派挑起的武斗，拥有广泛的社会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优势的造反派变得愈来愈不听招呼了。早在批“资反线”后，一个叫做“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在造反派组织中就开始出现；在“一月夺权”中愈加响亮；暮春平反后更是盛极一时，令毛泽东感到很不是滋味。不错，是毛指令党组织暂停运作；

是毛鼓动群众去夺省市委的权。但是，毛的体系亦是共产党。毛搞文革清洗是要搞掉刘少奇的党委，重建自己的党委。“踢开党委闹革命”则有一种离经叛道意味。不加区分地“踢开党委”，岂非连毛的党委也一样照踢？毛对此是十分恼火的，但他的文革清洗方兴未艾，他需要造反群众为他冲开局面，故只得暂时忍一忍。到 1967 年夏天以后，他就对这个口号严加斥责了。在斥责这个口号的同时，毛还严厉批评造反派在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唯我独革、唯我独左“。

1967 年夏末，遍及全国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武斗基本结束之后，各地造反派的情况复杂化了。其活动并不都再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但是在广东、广西、江西等少数原始保守派依然存在并愈加得势的省份，造反派仍然受着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它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统治秩序的势态。人民文革的性质鲜明地保持着。换言之，它越轨的迹象愈来愈明显。造反群众在一个大事务上不听毛的部署。那时旧省市委基本都被冲垮了，毛着手组建他所属意的新领导班子--所谓“三结合”(地方军头、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毛的文革清洗得以完成的重要标志。但这个工作受到造反派的阻绕干扰。因为很多省市的军方头目和重新“站出来”的地方干部都是支持保守派的，造反派寻找种种藉口理由力图阻止他们出任革命委员会里领导职务。常用的有：犯过“资反线”错误，或犯有“走资派”错误没有认真改正；是刘邓黑线上的成员；有严重政治问题，历史上曾叛变变节等等。从造反派主观上去考察，这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怕遭到打击抱负的自保防卫心理，但客观上则使毛的重建计划被延宕。在劝戒不果之后，毛将造反派的这些作法斥责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令其迅速改正。造反派从整体上来说是共产党体制外的社会势力。无论是从获取社会权力还只是为了防卫自保，造反派都有力求更多地打倒“当权派”的倾向。如果说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体以获取权力的意向大於自保防卫意向，那么基层单位里就刚好调过来。但不管哪种意向为多，都使人民文革必然要在“干部政策”问题上与毛产生冲突。毛在 1967 年初号召“夺权”时并未划定夺权的范围，以至从省市级党政机关到各基层单位的当权派大都被夺了权。可是到 1967 年秋，毛又强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意味着他们都可以出来重握权柄。毛转向了，但造反派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意向，还是出于前阶段行为的惯性，都要按原来的势头往前冲。故此人民文革不可避免地要越出毛的轨道。

在跟保守派的关系上，造反派也与毛的意向发生龃龉。在造反派看来，保守派背靠军方，不但一直是耀武扬威，还首先使用暴力，突袭杀伤造反派群众，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黑打手。怎么他们一下都变成了革命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自己一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批“资反线”、“夺权”、反抗“资反线”的镇压反扑。经过艰难卓绝的斗争，总算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社会同情和舆论上占尽优势，怎么到头来只是跟保守派打个平手，双方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的组建中，强调自己的造反功绩，力求使自己的代表名额多于保守派的。或者，在群众组织代表只能有一个任革委会副主任时，造反派就要求由自己的代表担任。但是这一企图遭到支持保守派的军头和地方干部的抵制。争执不下之时，官方就会指责造反派“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对于文革清洗基本完成的毛来说，此时的造反派不但愈来愈失去使用价值，而且愈来愈碍手碍脚，於是他放手让各地军头压制之。这就使造反派无可避免地心怀怨气。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反派曾以毛号召的响应者、毛路线的捍卫者自居。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人民文革不断地、持

续地出轨，造反派的角色转化了。它变成了毛战略部署的干扰者。毛中央不断发出“要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号召就是在批评和警告造反派。

1968 年春季之后，造反派与毛的摩擦愈加尖锐起来。这是因为各地省市级革委会大都相继成立。刘少奇的铁案也已搞定。毛的文革清洗大体完成。造反派面临“鸟尽弓藏”。毛通过地方大员向造反派传递他的这样一个意向：造反派组织应予解散。当时是用了一个较婉转的说法：“铲山头”。毛的喉舌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形势下，保持派性组织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在作怪。在这种批评的力度太弱而不能奏效时，当局就进一步严厉地威胁道：“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早铲主动；迟铲被动；不铲反动”。保守派很顺当地解散了他们的组织。保守派属于共产党体制内势力。共产党的政治体系就是他们最大的组织，所以他们完全不在乎自己这在文革非常时期的临时组织形式。可是，造反派则非常在乎他们的组织。没有组织他们就没有一切；就只是孤立面对庞大社会机器的一粒沙砾；就会在面临秋后算账时一点反抗力量都没有了，故此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种种藉口不铲山头，起码是尽可能地拖延。这无疑与毛的部署和地方大员的意向正面冲突起来。莫说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即使是三十几年后的今天，共产党都不允许有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存在。当时，只是出于毛搞文革清洗的特殊需要，在这巨大的历史缝隙中，民众才一时拥有了组建政治组织的权利。到毛的文革清洗完成后，毛就要收回这曾一度给出的东西。造反派不肯顺从就范，亦即人民文革坚持其出轨的势态，这就势不可免地为其灭顶埋下动因。

在某些原始保守派垮台的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造反派掌了权，但随之又分裂成两派互斗。由于垮了台的保守派往往会在分裂了的两派造反派组织中，选择其中政治质量较高的一派加入，不动声色地把这一派改造成新的保守派，军方亦会在其中发挥作用，竭力催生新的保守派，(如湖南“工联”就有这种迹象) 致使这里面仍然有造反与保守的浅度区别。但是这些省份的人民文革色彩则毕竟因此淡薄下来。至于在浙江那样一类原始保守派垮得很早，“一月夺权”的纷争已经发生在造反派之间的省份，由于两派都有军方的支持(军方亦分成两派)，故两派都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造反派。人民文革就在社会大环境中已难寻踪迹，只是在基层单位中还会保持一些色彩。

尽管这些省份人民文革色彩已淡，但由于仍然有群众组织争革委会名额的斗争，使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或成立后在纷扰争斗中革委会不具权威，运转不灵，致使局势不能稳定，共产党的统治秩序难以有效重建。毛对此同样很感恼火。这与人民文革的出轨都成为毛最后决心以铁腕结束文革的原因。

1967 年秋季以后，毛对人民文革浅度出轨的压制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受压的造反派普遍怀有怨气。怨气之下许多人灰心失望情绪消极。造反派阵营渐趋涣散。这正是毛所希望的。但是，其中少数人产生了抵触情绪。他们喊出了“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并没有正面针对毛，但却表达了一种反抗情绪。在一次又一次的翻云覆雨之中，一些造反者感到有一股股势力在愚弄自己、在力图操纵自己去为之效力。他们不甘作这样的角色。他们希企有独立的意向和行动，他们要竭力从罗网中挣扎出来，为自己的权益作斗争。人民文革的浅度出轨至此达到高潮。高潮之中有个明显的浪花，就是北京、广东、广西、青海、黑龙江、辽宁等省市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量成立联络组织，及时交流情况，以便互通消息，互

相支持。毛中央获知此情况后，大为恼怒。因毛中央是决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早在 1967 年 1 月，毛中央就取缔了全农造、全红总等九个全国性组织。北京与数省造反派组织的这个联络行动犯了毛的大忌，亦是人民文革出轨的又一明显表现。造反派不但拒不铲掉已有的山头，竟还要组建全国性的更大山头，其凶险的结局确实是无可避免了。

3、文革新思潮--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在浅度出轨走向高潮的基础上产生。极少数造反派精英分子已不满足于“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抗议呼喊。他们在思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会变成了运动群众。他们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怎样才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说人民文革的浅度出轨主要表现在一连串的行为上，那么其深度出轨就是主要表现于思想意识上。浅度出轨之所以能一波又一波，在相当时间里存在，是由于其思想意识基本还在毛理论的框架之内。批“资反线”、斗“走资派”、“揪叛徒特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无论是否为其真实思想，它都成为人民文革的保护色。鉴此，毛对于浅度出轨都只是处以批评指责，而暂没施以铁腕镇压。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未能表现于行动上。因为深度出轨已越出了毛的理论框架，成了无可遮掩的异端邪说。毛中央初称之为“极左思潮”，后定性为极右、反革命。从民众的角度观测评判则应称之为文革新思潮。文革新思潮若付诸现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动。(这是按照共产党的语汇表述)。事实上，即使它还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其最尖端部分就立即遭到毛泽东和整个官僚集团的联手迅即掐灭。

这最尖端部分的代表作就是湖南在野造反派“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掌权的造反派“工联”已转化为新保守派) 它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已产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高干所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应以罢免个别当权派的官职为满足，而应推翻整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实行民选行政长官的巴黎公社原则。

“省无联”政治纲领的出现令毛震惊万分。他感到造反派的出轨已达到决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步。虽然立即逮捕了“省无联”的一班头头，并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大毒草来批判，但是“极左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仍不胫而走，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许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思潮甚至组织。虽然在“省无联”已被严厉惩处的情况下已无人再敢效尤，但类似北京“四.三”派和广州“八.五公社”那样，宣扬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理论都仍是极为可虑的。他们说：共产党的干部“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逐渐形成特权人物。”“现在需要重新划分阶级”。“现在的矛盾是在底层受苦最深的组劳人员、支农青年、合同工、临时工和那些爬上了权力宝座者之间的矛盾。”

毛的官方文革揭开了镇妖石，放出了人民文革这个妖怪。毛放它出来本是想要它

为自己效力。但终究由于无力驾驭这日益自把自为的妖怪，而决心重新把它压在镇妖洞中。在各地实力派人物和整个共产党体系的通力合作下，毛实现了这一决心。

四、现在还需要人民文革的“那一套”

1、文革不止一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二十年后，即 1989 年，中国发生了八九民主运动。当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发出怒吼，抗议“四.二六”社论，继而要求惩办贪官污吏时，共产党的高官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们又想搞文革那一套吗？”学生们听了，十分惶恐，忙不迭地说：“不、不，我们不是搞文革那一套。”

文革那一套？文革哪一套？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文革不止一套，而是有很多套。最根本来区分有官方文革的一套和人民文革的一套。官方文革还可再细分为毛蛊惑、利用、抛弃、镇压人民的“那一套”；各地实力派(军方和站出来的地方干部)支持、唆使、操纵保守派暴力攻击造反派的“那一套”；还有军方直接镇压造反派的“那一套”；以及共产党贵族红卫兵搞“红色恐怖运动”任意殴打杀死“四类分子”的“那一套”，等等。八九民主运动时共产党高官所呵斥的“那一套”，所指必定不是这些。那么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呢？是人民文革，是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集体绝食、游行示威、冲击党政军机关等方式所进行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生存权利的斗争。这么多年来，共产党对此刻骨铭心、切齿痛恨。只要民众中有类似的行动再发生，他们就立即予以联想，精神极为紧张暴怒。可奇怪的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些斗争不是正义的吗？怎么学生们要赶紧表白自己不会搞文革那一套呢？

这就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某些独立文人乃至少数民主文人的功劳了。人民文革在他们的笔下被歪曲、被妖魔化了。当然，他们根本不承认有人民文革。他们向民族后代讲述的文革是一片昏乱、混乱。造反派乱冲乱撞、胡作非为，斗死共产党里的好干部，如刘少奇、陶铸等；整死高级知识分子。(罗思义的“陈寅格之死”即为代表作。)总之青面獠牙、坏事干尽。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文革后才出生，年纪较大的文革时期亦在襁褓之中。他们所获得的灌输记忆来源于共产党空洞的文革浩劫论和罗思义们的具体描述。於是在他们的认知中，文革造反是暴民运动；是不要法制、无法无天、专门迫害无辜，故此他们在共产党高官的呵斥面前惶恐不已，连连表白撇清自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可见，关于人民文革的评判已完全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极具民主斗争的现实政治意义。

2、官方和底层民众都记住了人民文革

当今，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摆在面前，就是中共专制政权拒绝民主改革。不属政权机构的村官直选曾被一厢情愿的好心人认为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而大加赞扬。可是这第一步走了二十多年，再也迈不开第二步。(最近的广东番禺县大石村村民自发罢免村官而遭镇压事件，说明这第一步也是虚假的) 作为政权体系中最低的一级--乡镇级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共产党就是坚持不予开放，遑论其它？中国共产党

垄断了社会公权力，自行黑箱运作，钦定各级行政长官和司法长官。这不但使其政权完全失去民意基础及合法性，也使之贪渎极度泛滥的吏治成为无可根除的制度性腐败。

在中国共产党拒绝主动地、自上而下地实施民主改革的情况下，又力求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不必通过极端激烈的方式，那么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正义压力就是迫使共产党不得不逐渐开放政权的有力杠杆。这个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大规模的绝食静坐、游行示威。而这正是当年人民文革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的中国需要人民文革。说得更准确些，是需要以当年人民文革的表现形式，去运载新的思想内容和政治诉求。

九十年代在中、老年工人里边处处有这样的耳语，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这些工人所怀念、呼唤的文革当然不是毛泽东和各地军方、地方干部，以及保守派、“联动”类红卫兵的那个官方文革，而是人民文革。在这里，某些中、老年工人的记忆亦有片面性。他们显然只是深刻地记住了人民文革的内容，而忽略了文革大波中还有官方文革的内容。当然，或许他们并不是片面记忆，而只是不善于表达。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的这种观点在客观上混淆了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而会被攻击他们的人抓到把柄。他们的耳语是上不了文字台面的。假设上了的话，就一定会遭到共产党御用文人和某些独立文人，乃至少数民主文人的联合围剿。他们会大声疾呼地说：文化革命是那等地毁灭文化、迫害知识分子、滥杀无辜、互残互斗。你们还希望再来一次文化革命真是反动之至、恶毒之至。不知就里的年轻一代，如八九的学生们也会跟着去大加伐挞谴责。

必须告诉这些文人，不论你们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们的伐挞都是找错了目标。工人们所企望的绝不是全版文革，而是其中一部分--人民文革。由此看来，现在是到了把人民文革与官方文革这两个纠缠在一起，而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剥离开来的最后时刻了。工人们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耳语不久将飘散空中。文人们的谬语则可沉淀下来。文革时期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平均年龄五十岁出头，还保留着些许力量感，故喊出了再来一次文革就叫共产党完蛋的心声。至今十年又过去了。这一呼喊业已消沉。他们都年逾花甲，正在社会底层惶惶然地度过着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可信照此下去，不久这一呼喊就会在世上消声匿迹。剩下的就是文人们对文化革命不加区分的一片伐挞。这伐挞一代一代传下去，人民文革固然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留给子孙万代的也就是一部残缺不全的、甚至扭曲走样的文革史了。

确立人民文革论，就可使共产党高官的呵斥和工人们的耳语都得到完满的解释。这两个地位、利益都尖锐对立着的社会群体对文革持有截然相反的意向，是因为它们都把关注目光投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同一个侧面--人民文革。所不同的是，共产党高官极端憎恶仇视这个侧面，而工人们却非常怀念这个侧面。

共产党高官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来得相当深刻。他们不但认识到人民文革对共产党体制的冲击性，还认识到人民文革由官方文革引发。即没有官方文革人民文革就不会发生。故此共产党已取得共识：绝对不能再搞毛式文革清洗。党内有什么问题党内解决，决不可象毛泽东那样借助民众的力量来打倒意见分歧者或权力争夺者。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毛的那个做法使民众中的狂妄分子乘机作乱，共产党的天下几乎被推到

倾覆的边缘。

当今许多文士们在担心共产党要再次发动文革既是杞人忧天，亦反映出他们对文革史实缺乏起码的了解，分析力、洞察了极为肤浅薄弱和对文革评判的迷思谬误。

工人们的耳语其实只是底层民众在受尽共产党贪官污吏的压榨后忿然之情的渲泄而已，根本无法实现。由于中共再也不会搞毛式文革清洗，故人民文革也就再没有乘机爆发的机会了。

3、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但是，中国当今确实需要再来一次人民文革。这就象十年前常听到的工人耳语那样，再来一次就叫共产党彻底完蛋。共产党不搞官方文革，引不出人民文革，那怎么办？共产党不搞官方文革，人民群众难道就不能自己独创出一个人民文革吗？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人民文革需要由官方文革引发，难道当今或今后的人民文革也非要由官方文革引发吗？有人会说，不由官方文革引发的就不算人民文革。这话说得有几分道理。近四十年前，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有着绝对的统治力，不乘毛文革清洗之机人民反抗运动就不能发生，而且这反抗运动尽管声势浩大，冲击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官僚，却绝不能冲击毛泽东、甚至也不能冲击林彪、周恩来。当然也不能正面否定共产党统治秩序和毛式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要立即遭到最严酷的镇压。鉴此，人民文革尽管以不断的浅度出轨和耀眼的深度出轨显示其光辉，但始终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星移斗转，三十几个春秋过去了。不但毛泽东、周恩来等早已率先作古，邓小平、陈云等也接踵而去，而且，共产党参与打江山的那两代人大都已逝，为数不多的在世者亦近耄耋。共产党里再也没有毛那种绝对权威了。如果说近四十年前的群众反抗运动非得凭藉毛的权威才能萌动并使之带有局限性的话，那么，在根本没有绝对权威存在的现今，群众反抗运动也就应该而且可以自主地产生，自为地发展。

历史不会简单地复制重演。工人们的思想其实也在发展之中。三十几年前的人民文革，即使是最激进的派别也没有喊出要共产党彻底完蛋的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人民文革的典型口号，但它与“要共产党彻底完蛋”毕竟还有很远的距离。九十年代中、后期工人们的那个耳语说明了他们思想的升华。

九十年代工人的抗争活动中，曾出现扛起毛巨副画像的场面。那不是工人抗争活动的主流，其思素是颇为复杂的。它可能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既然你共产党始终还是顶着毛泽东的招牌，那么我们就扛起毛的画像，看你怎么出手镇压我们。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斗争方式，是人民文革最直接的继承。它还可能是一些工人对当今社会现实的一种自然情绪式否定。毛时代普遍贫穷，工人当然贫穷。当今则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工人仍然贫穷。“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自己一向都这么穷，那么大家都穷比你们富得滴油而我们穷得干瘪要好接受些。

4、今后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知识化的工人阶层

岁月的流逝使经历过文革的两代工人逐渐淡出了社会舞台。比他们年轻一代、甚至年轻两代的完全没有经历文革的中、青年工人构成了当今劳工阶层的主体。而且在知识文化水准上也有了相当的区别。在知识阶层就其整体而言被共产党收买了的社会情势下，中国将来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知识化的工人阶层。如果说，将来有一天中国爆发了“人民文革”的话，那绝对不是昔日的那种思想层次人民文革。

文革前工人的教育水平多为小学，初中不多，高中甚少。现今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已相当普及。文化水平的提升必然伴随着思想的丰富和对生活质素更高的企望。而这必将与中共当今养肥官僚、收买知识分子、薄待劳工阶层的基本国策产生冲突。更何况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上还会出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

1998 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连年大幅度扩招。在这盛大的高教扩招美宴中，共产党官僚和某些被其收买的大学、高中教师们都美不甚收。共产党政府以之向世界显示其治国的丰功伟绩。教师们则在高考拜物教中赚足了风光和金钱。美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二十足足走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而中国只在几年中就走完了。现今，当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八倍时，其大学在校学生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中国社会唯有读书高的民族精神遗产使许多贫穷阶层的家长们忍受着高学费的重压，把孩子送入大学校园。他们怀着一份期盼：大学毕业的孩子将会找到薪资丰厚的工作。可是，在城市青年百分之五、六十都能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情况下，社会绝对提供不了那么多白领高薪工作机会。其结果必然是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将走入低薪劳工阶层。这种情况将随扩招的继续而普遍。

当中国的劳工阶层以中学毕业者为主并渗有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者时，中国的社会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维护自身的应有权益，到对美好社会制度的体认、向往、追求，使知识化的中国工人阶级必将从六十年代末“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和九十年代“要共产党彻底完蛋”的耳语，再升华至一种更清晰、系统的理性追求。

但是这理性的追求若要得到实现，绝不是文质彬彬的语言磋商可以奏效的，它必有赖于坚毅持久地对专制统治者施于激烈的正义压力。这就是造反。处于被压迫剥削境地的人们起来反抗剥削压迫谓之造反。这真正意义上的造反当然是有理的、正义的。它并不因毛泽东说过一句“造反有理”就要成为笑柄，就要成为被否定的东西。更不因毛说过“造反有理”就要反过来判定为“造反无理”。毛是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总代表。他根本没有资格奢谈“造反”。因为真正的、彻底的造反就应是造他的反。文革初期率先高叫“造反有理”的贵族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亦根本没有资格奢谈造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毛的所谓造反只是一种欺骗和虚幻。毛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总代表，以统率人民去攻击他的党内异己势力。而当他所发动的“造反”萌动真正的造反迹象时他就要予以镇压。共产党高干子弟红卫兵的造反是伪造反，它其实是“高衙内”们血统高贵情绪的疯狂渲泄，和对贱民阶层乃至平民阶层的肆意践踏乃至狂暴虐杀。而当真正的造反--人民文革兴起后他们就恢复其保皇派的真实面目，坚决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秩序，仇视和对抗、打击平民阶级的造反行动。

由于人民文革虽藉响应毛的“造反”号召而起，但实际上与毛的伪造反有着本质的区别，乃至截然对立，才使之有了生命力。人民文革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性，但反压迫、反迫害是它的基音。这基音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这基音理应得到肯定并被继承下来。在参与过群众造反运动的文革时期的中年人大都已辞世，青年人也渐入老年之际，把这一基音保存下来传予下一代，不但是让他们了解历史，而且也是让反抗精神薪火相传的义举。

今后有一天，当共产党高官向声势浩大的工人游行示威队伍呵斥“你们又想搞文革那一套吗？”的时候，工人们应该大义凛然地回答：对，我们就是要搞人民文革那一套！造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反是有理的、正义的。我们反压迫的意念与文革造反一脉相承，都是被压迫者进行反抗的那一套。我们群情激奋的庞大队伍也可与人民文革的浩然大波媲美。只是，我们要比我们的先辈自主、自为。我们这一套完全发源于我们自己，不再需要从你们共产党的内斗中引发。我们的理念也比我们的先辈先进、系统、完备。我们的目标再不止是冲击单个单个的共产党官僚--所谓“当权派”，而是要从根本上终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

2005 年 10 月 19 日于纽约。

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

魏楚雄

毛泽东通过群众运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斗争，它对中国及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象刘少奇、陶铸、贺龙等都未能忍受文革残忍的政治斗争而在文革结束之前就早早率先去世。许多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象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在文革中存活下来，但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式的看法已经非同昔日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受文革影响较少，因为在文革开始时他们要么刚刚在政治仕途上起步，要么还在较低的政治梯阶上努力攀登。然而，文革对这些年轻一代、特别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应该更加受到重视，因为他们已经统治了并将要更长时间地统治中国。对文革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进行系统整体地分析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更不要说文革对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影响了。但是，通过重点分析文革对当前中共第一号领导人胡锦涛的影响，本文将力图描绘出文革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影响的程度与方式，从而判断中国共产党现金及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

一、中共领导人的代层界定

通常学者们习惯于把自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四代。〔１〕这一划分是单单根据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和任期来决定的：毛泽东年代、邓小平年代、江泽民年代和胡锦涛年代。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对领导人资历和提升的审核是不一样。在毛时代和毛时代后，所有所谓的“干部”是指那些在政府和政党机构、组织及国家企业工作并领受国家工资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教师、技术员、公务员等等。〔２〕在地方和地区层面的中共干部将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中所谓的“中共领导”是指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如果把参加革命及提升到中央政府或中共中央职务的年份和年龄作为标准，中共领导人实际上可以被分为以下四组—早期领导人、长征干部、抗战和解放战争干部和新中国干部：

第一代：１９００　年以前生，１９２７年以前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１９９７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第二代（８２　岁以上）：１９１５年以前生，１９３７年以前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１９９７年）：杨尚昆，９０岁；薄一波，８９岁；宋任穷，８８岁；张震，８３岁；洪学智，８４岁；习仲勋，８４岁；张爱萍，８７岁；叶飞，８３岁；萧克，８９岁；谷牧，８３岁；王鹤寿，８８岁；（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乔木，余秋里）

第三代（７１－８１岁）：１９１５－１９３６年生，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１９９７年）：刘华清，８１岁；万里，８１岁；宋平，８０岁；杨白冰，７７岁；吴学谦，７６岁；陈慕华，７６岁；杨德中，７４岁；赵紫阳，

７８岁（胡耀邦，姚依林）

后期：江泽民，７１岁；乔石，７３岁；邹家华，７１岁；王汉斌，７２岁；任建新，７２岁；叶选平，７３岁；李鹏，６９岁；李瑞环，６３岁；朱熔基，６９岁；丁关根，６８岁；田纪云，６８岁；钱其深，６９岁；李岚清，６５岁；姜春云，６７岁；李铁映，６１岁；尉建行，６６岁；黄菊，５９岁；谢非，６５岁；张万年，６９岁；迟浩田，６８岁；傅全有，６７岁；于永波，６６岁；王瑞林，６８岁；王克，６６岁

第四代（５４－７０岁）：１９２７－１９４３年生，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１９９７年）：胡锦涛，５５岁；吴邦国，５６岁；温家宝，５５岁；王兆国，５６岁；李铁林，５４岁；刘淇，５４岁；李继耐，５５岁；徐才厚，５４岁；姜福堂，５６岁；高严，５５岁；陈奎元５６岁

有些学者如 Joseph fewsmith 宁愿把中共领导人划为两组：革命年代领导人和非革命年代领导人。〔３〕本文将使用传统的划分法以便方便讨论，但也将在分析中运用Ｆｅｗｓｍｉｔｈ 的划分法，因为他的划分反映了中共领导人代与代之之间特点的实质性不同。

二、文革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构成的影响

文革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中共领导阶层。首先，它大大加速了中共领导权从第一、二代向第三、四代的过渡。文革打断了中共内部正常的权力过渡。刘少奇和林彪等许多中共资深领导人的过早死亡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继承危机。毛泽东的恋权及其对“四人帮”和周恩来等人的不信任又延长了权力的过渡，这导致了中共领导人的年龄老化。及至文革结束，许多第一、二代的中共领导人要么过世了，要么已太老，不能在政府和党内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为第三、四代领导人打开了提升的方便之门，为他们快速获取权力而让路。

而且，毛时代刚结束后的权力斗争也造成了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快速崛起。在与华国锋即所谓“凡是派”的权力斗争过程中，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把第三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提升到该处。同时，由于文革因忽略经济而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巨大失败，中国共产党内部达成共识，决定把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而非政治运动作为党务的新方向。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来担任各阶层的领导职务。中共中央通过的让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决定使得邓小平能够加速把权力从第一、二代过渡到第三、四代的过程。权力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到第二代领导人的转换用了三十年左右，而从第二代领导人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权力转换只用了几年。结果，至１９８５年，第三代中共领导人构成了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大多数及多半的地方省市的官员。

文革还改变了“太子党”即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们的命运。他们的政治前途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他们垄断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如果文革没有发生，“太子党”很容易就会构成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的主体。然而，文革破坏了他们轻而易举的发展，使得他们中间很多人不能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野心和仕途

。在文革中，他们要么一落千丈地变成了“狗仔子”并遭受巨大的折磨，要么对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及革命家庭的生活变得及其失望。他们中不少人没有被文革的种种折磨所压倒，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在如何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的问题上已经产生了新的看法，他们的观念与毛泽东思想及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已迥然不同。“太子党”中还有许多人因为父母的政治错误而完全失去了政治前途。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其父母于文革后官复原职后而恢复了政治地位，但他们已失去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兴趣和信仰，并对政治生活产生反感。他们中不少人下海经商，变得相当腐败。结果，“太子党”中作为在省级和中央级政权继承者的合格者急剧减少。这样一来就为提升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官员铺平了道路。

三、文革及其对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特点的影响

joseph fewsmith 把中共第一、二代领导人归为一类，称其为革命的一代。这一归类是比较准确的。Ｆｅｗｓｍｉｔｈ 指出，“无论是毛泽东领导的还是邓小平领导的革命的一代具有非凡的自信。这种自信产生于他们多年参与所有各种问题的政治活动以及广泛的认同即革命胜利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４〕确实，这些革命老手是叛逆者和斗士。他们大都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革命活动的训练。他们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关注政治理想和原则胜于其他一切，并为此追逐一生、投入毕生经历。他们是为思想意识形态所驱使，愿意为其信念而甘冒风险。他们清廉、自律、道德观念强。他们有激情、有领导魅力。他们目标明确、政治性强。他们本身是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产儿、所以喜欢大规模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毛认为必要的话，他就能把整个国家投入文革的大混乱中。这也是为什么邓能斗胆发起离经叛道的经济改革、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革命的一代是通过军事和政治斗争获取政权，他们不必担忧他们统治的合法性。除了利用公开露面释放一种政治信号以外，他们很少化时间在提高自己的公共形象上面。他们的革命经历就是他们的政治资产。他们的集体领导是由他们的革命经历和革命贡献自然发展起来的。

而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则大都受到自然科学的教育及和平时期管理体制的训练。邓路线的对以思想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四人帮及凡是派的胜利决定了技术官僚将治理中国。技术官僚们具有经济技术知识和行政管理经验，但他们通常没有胆量采取大胆行动和寻求轰动效果。他们也没有了不起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小心翼翼、努力工作来获取提升。正如 joseph fewsmith 所指出，“文革的教训之一是匆忙推行的庞大思想会导致灾难。”这一教训使技术官僚对任何导致剧烈变化的政策望而生畏，更不用说“工程师们是被解决具体问题的技巧而培养出来的”，“他们倾向于怀疑思想意识形态式的、博大的生活态度。”〔５〕他们意识到经济必须是首要党务。要不然，他们会失去统治的合法性。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缺乏政治资本但富有管理工业和经济的经验。他们相信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喜欢使用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来保持社会稳定和进步。文革生动地向他们显示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在政治上保持谨慎的必要性，以及政治生存比政治正直更重要。因此，他们通常不会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显示很大热情。他们的政治立场经常是出自于对政治安全性和政治正确性的考虑而非出自于他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原则。更何况，他们长期在基层管理领域工作的经验教会了他们中共政权的政治文化以及通过

团体共识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们是教少思想意识形态倾向的、更灵活善变、更实际、更富有弹性的。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突然地退出政治舞台造成了一种在党政中央机构没有魅力型领袖和总司令的局面，这样就导致了“社团领导，”即权力被分散到更多人的手里。结果，第三、四代的中共领导人中没人能够单枪匹马地发起任何巨大变动。正如Ｆｅｗｓｍｉｔｈ　所描述的，中共非革命领导人　“经由官僚途径和不得罪人的方法得到提升，”他们有限的经历和私人关系迫使他们“采取更加谨慎的、更注重培养共识的政治风格。”〔６〕不象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对群众运动既敏感又反感，因为他们个人的仕途几乎被文革的群众运动所葬送。虽然从李鹏的强硬保守派到胡锦涛的温和派对群众运动的反应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不喜欢群众运动。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给他们个人生活和国家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会用任何方法来管束群众，预防和制止群众运动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威。

“太子党”　对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特点的形成关系密切。由于对政治仕途不顺及父母事业的失望，他们竭力设法弥补他们在文革中的损失。他们中许多人滥用了他们轻而易举得来的政治权力和特权，充分利用了由邓小平经济改革而带来的的各种史无前例的经济机会。他们开始相信经济权力甚于相信政治权力。跟来自于普通家庭的、因缺乏政治保护而谨小慎微的的干部不同，“太子党”在冒险利用新展现的经济机会时即野心勃勃又毫无顾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初级性给他们提供了充分利用这一不成熟体制的机会。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经济行为影响广泛而且感染性极大，最终导致了一种很快风靡全国的商业哲学和商业行为，即政治权力等于金钱。当这种商业哲学和商业行为主导了中国时，腐败变成了社会上无法控制的病毒及共产党内部的主要问题，它对中共权力、改革和经济发展是一种严重威胁。在广义的意义上说，“太子党”的腐败是党内外普遍腐败的根源，这种腐败极大地削弱了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的权威并成为国家的瘟疫。

四、文革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胡锦涛

文革开始时，胡锦涛刚刚从中国数一数二的科技类高校清华大学毕业一年。毕业后，他留校在水利工程系当政治辅导员。〔７〕作为负责大学生政治教育和辅导大学生政治思想行为的高校党政机构的基层干部，文革使胡锦涛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场面。他必须亲手对付无法控制的、难以预测的和有暴力倾向的清华红卫兵，同时他又可能成为源自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的首冲目标。他将如何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生存下来呢？

胡锦涛在１９４２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至胡锦涛父亲胡静之这一辈，胡家因为１９３０年后期的抗日战争而开始衰落。最初，胡静之从胡锦涛祖父那里继承了一个小茶铺，是个小业主，但他的小茶铺在１９５０年代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没收了，于是胡静之成了一个小店员。可是，胡家的衰败对胡锦涛是一种运气，因为要不然的话，胡锦涛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带着他资本家家庭成分入党的。胡锦涛的幼年是蛮不幸的。当他在六岁开始懂事时，淮海战役在离他家乡安徽泰县北部不远的淮海平原上打响了。大约有５５０，０００　名国民党官兵在这场战役中丧生，其中不少人是泰县人。幼小的胡锦涛不可能不听说这些关于内战厮杀和死亡的悲惨恐怖的故事。小胡七岁时，他母亲去世了。〔８〕国家与家庭的悲剧肯定对

胡锦涛的幼小心灵投下阴影，在他心里播下缺乏安全感的种子，使他渴望温暖而憎恨暴力和人类冲突。幸运的是，胡锦涛幼年生活中的损失被他父亲及姨婆刘秉霞给他带来的无限的爱所抵偿。他父亲胡静之是一个温和友善的人。根据刘秉霞所描绘，胡锦涛从小就是一个行为端正、敏感自觉的人。她说，胡锦涛从小很懂事，从不顽皮，“从不同人斗嘴，不同人吵架。”有时贪玩一点，大人在旁边稍微“哼”一下，他就马上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很快改过来。刘秉霞的描述可能出于对自己孩子的爱会有所夸张，但她很可能大体上没错。刘秉霞还说，胡锦涛象他父亲一样是个谦逊低调的孩子，不爱宣扬。有一次他被选为班主席，他也没有告诉家里人，最后还是他同学说出来的。〔９〕

因此，如果不是天生的话，那？就是童年的生活、家庭和社会环境把胡锦涛造就成为一个谨慎细心、安全感强、不爱冲突、自觉自律、勤勉上进、温和周到和举止得体的人。不利的家庭背景迫使胡锦涛为前途发展而脚踏实地地付出双倍努力。他从不炫耀自己，从无侥幸心理，并且有些早熟和牺牲精神。在大跃进时代，当他的中学同学纷纷抱怨打石子的活儿艰苦时，胡锦涛则说：“发牢骚没有好处，先干好了再说。”如果是两人抬东西，胡锦涛会把重物往自己这边挪一挪。开饭时，正在长身体的学生们会争先恐后地往饭桌前拥，而胡锦涛则总是走在后头。胡锦涛实际小心的态度也在他填报大学和专业的过程中反映出来。他很想上清华大学，但是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虽然填报了清华大学，但却填写了很少人向往的水利工程系，因为水利工程师必须放弃诱人的城市生活。多年以后，胡锦涛成了党的领导人，在１９９２年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但他仍然很低调，对亲戚家人一概拒绝关照。他很少在公众场合提到他的出生地和家乡，并拒绝了当地政府在重新改造他老家周围建筑时保持他老家原貌、以供参观瞻仰的建议。〔１０〕

胡锦涛谨慎和讨人喜欢的性格很快受到共产党组织的欣赏，他在１９６５年年仅２３岁时就被吸收入党。胡锦涛的谨慎恭谦的性格能帮助他躲过后来的政治考验和政治运动吗？对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千万不能过高估计性格对命运的影响。国家政治力量和社会大环境常常远胜于个人的政治能力和灵活性。例如，在文革初期，作为一名清华大学　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无论怎样小心谨慎，都不可能躲避红卫兵的锋芒，他可以轻易被红卫兵疯狂的行动所扫荡。事实上，有的大字报已经把他提名，要他公认追随错误政治路线的罪过。〔１１〕就在这紧要关头，北京市委组织派遣了一个５２８人的庞大工作组到清华大学，接管了该校上到校长和校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政治辅导员的全部权力，这就把胡锦涛从许多即将来临的政治麻烦中解救了出来。〔１２〕

不过，尽管胡锦涛可以尽量小心谨慎、察情行事，当学生们都积极投入到文革中时，作为政治辅导员的他不可能袖手旁观、无所事事。年轻而又积极上进的胡锦涛投入了文革并参加了清华　“四·一四”派。〔１３〕清华“四·一四”是清华红卫兵的保守派，他们捍卫作为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文革前十七年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自１９４９年以来阶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动，大多数共产党党员是好的。由于他们的不同观点，清华“四·一四”从激进的　清华井冈山兵团即团派中分裂出来。团派认为自１９４９年以来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文革的目标就是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从中国共产党内部清除出去。〔１４〕胡锦涛选择加入“四·一四”派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共产党的大多

数，是中共十七年路线的产物。他的信仰、经历和努力全都跟这条路线密切相关。这事实上也是邓小平的立场，难怪邓小平后来一手提拔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的经历对他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一名学生干部和共产党基层领导——清华学生艺术团团委书记和系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在基层工作中学会和发展了他的社交能力、组织能力和政治能力。他的清华经历奠定了他的政治哲学和人生方向。胡锦涛参与清华“四·一四”　这一事实表明，到了文革期间，胡锦涛的政治思想和风格已基本形成：他是追随刘少奇和邓小平路线的典型的技术官僚。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把１９７８年邓小平上台以来的政策说成是改革，其实这是一种误导。邓小平时代的基本政策只是试图恢复刘少奇路线，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去。他的政策实质是复兴共产党的旧政策而不是改革共产党的体制。胡锦涛的政策弄不好也是如此。唐少杰认为，在文革中，毛泽东所煽动和利用的“造反派”们要否定“十七年”，而“十七年”期间在政治和生活上受益受惠的广大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则恰恰相反，他们以“十七年”之“盾”抵挡毛泽东的“文革”之“矛”。而无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还是反文革的十七年路线，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１５〕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再左进，也没有让四人帮接班；邓小平再右进，也没有向六四要求民主的学生让步。胡锦涛参加清华“四·一四”的事实表明，他的基本政治思想是跟十七年一致的。他任期内的“改革”政策恐怕就是努力恢复到共产党的十七年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的施政纲领发挥到它的极致效应而已，绝不会超越这个限度。

五、文革及其对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的影响：文革期间及文革后的胡锦涛

当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后期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失控时，胡锦涛就没有怎么参与在文革中了。他成了逍遥派。没有现有的档案档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胡锦涛在想些什？，但我们可以想像，作为有头脑有上进心的中共党员，胡锦涛一定会密切关注文革的动向，竭力弄清楚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实质性问题。文革很可能从下述几方面对他的思想和前途产生影响。

首先，如同他的前辈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亲眼目睹了群众运动的后果及文革带来的浩劫和社会动乱。他是一个谨慎守法的人，是共产党十七年既定路线的捍卫者。他不会喜欢毛泽东阶级斗争政策和文革的激进性，也不会喜欢红卫兵造成社会动乱的好斗风格。他一定被激进主义破坏性力量而威胁并产生反感。但另一方面，文革、群众运动和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操纵又充分显示了普通老百姓和公众舆论的力量，它教会了胡锦涛巧妙引导和驾驭民众思想的必要。胡锦涛是一个低调的人，但他对民众的意见和反应十分敏感。他在文革期间耳闻目睹了民众和大众民主的力量，这对他日后执政影响非浅。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水利工程师，他一定知道群众力量就象水库里的水一样：它既不能突然释放而造成洪水，也不能一味阻拦以至最终水势升高越坝成灾。

其次，文革间复杂而不可预测的、导致中共领导人纷纷下台的政治斗争向胡锦涛充分显示了中央政治生活的危险性以及韬光诲略的重要性。出生于平民家庭而资历平平，胡锦涛清楚知道他没有如何政治资本可以赌博。既然连象彭德怀、贺龙和林彪这样具有光荣历史和生涯的革命英雄老干部都会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更何况他胡锦涛这样一个平凡小辈？因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胡锦涛只会接受上级想付予

他的而不会要求上级付予他所想要的。他没有政治资本，但他有政治智慧和耐心。

再者，在文革后期，胡锦涛象所有高校生一样，被派遣到落后地区去接受劳动锻炼和改造。他在１９６８年来到甘肃刘家峡水利电力工程枢纽工地，后来又随工作组到永登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在那里，他不仅亲眼看到而且亲身体验了中国贫苦地区农民老百姓的艰苦生活。〔１６〕虽然刘家峡水利电力工程枢纽工地离甘肃省会兰州不远，但那里的生活工作条件在１９６０－１９７０期间是非常简陋，与北京和安徽是没法比的。如同文革中许多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样，胡锦涛肯定会被甘肃难以想像的恶劣的生活条件所震惊，然而这一段在社会基层简短的生活工作经历对他今后的执政是非常关键的。它使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使他确切了解了被边缘化和被遗忘了的地区和人民，也使他产生了对普通民众的感情和联系。如果没有这一段在社会最底层与最普通的工人农民一起工作的经历，胡锦涛今天也许不会充分重视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以及发展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最后，就是在甘肃，胡锦涛遇到了宋平和李登瀛，这两人在胡锦涛政治生涯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宋平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妻子陈舜瑶当时是清华大学党委付书记兼付教务长，对胡锦涛很了解。李登瀛是甘肃省委书记，是胡锦涛妻子刘永清叔叔的老战友。这两个人成了胡锦涛的政治恩师。由于他们的推荐，胡锦涛被提拔到甘肃省建设委员会，然后又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通常这是被进一步提拔到省级或中央党政机构的必经之路。〔１７〕虽然胡锦涛跟宋平和李登瀛相遇工作的机会可能是纯属运气，但他被提升的时机却不是。由于文革在中共内部上上下下造成了接班危机，当时中共迫切需要把年轻而有知识有能力的干部作为新鲜血液吸取进来，于是胡锦涛正奉其时。而且，文革中许多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厚颜无耻地丑陋表演使得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非常小心，他们对性格张扬、咄咄逼人的人比较反感，而对胡锦涛那种有凝聚力、亲和力的性格比较喜欢。他们还意识到“太子党”的问题，大都认为要把平民家庭出生的党员纳入中央，以平衡“太子党”的力量，平息社会舆论。以其普通家庭出身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背景以及温和、谨慎、低调和亲切的性格，胡锦涛无疑在中共许多高层领导人的眼中看好。他既在个人性格上又在党的利益层次上符合了各种标准。

六、结论

总之，“时势造英雄”的说法有其道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胡锦涛是文革的产物。文革对中共的影响可以从他的政治发展中清楚看到。如果没有文革，胡锦涛很可能不得不经过漫长而缓慢的途径而获得提升，他也许在退休之前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省市地区干部或一个中央部级干部。如果没有文革把“太子党”力量大大削弱的话，胡锦涛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与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竞争，走进中南海的大门。如果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没有被文革中释放出来的难以驾驭的群众力量以及许多野心家的丑陋行径所吓倒，也许胡锦涛温和谨慎的性格不会被看得很重，而一个更有魄力和胆略的人也许会放在他今天的位置上。接下来的问题是：胡锦涛是否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最佳选择？对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提问人如何看待今天中国改革的性质与需要。假如提问人认为后江泽民时代的中国需要大刀阔斧地实行激烈改革以解决中国自毛邓时代以来日积月累的制度性问题，那么胡锦涛可能不是一个最佳选择，因为他的政策风格是谨慎、温和与避免对抗的。假如提问人认为中国

应该继续通过循序渐进和逐步转化而非激烈变动的方法来达到其改革的目标，那么胡锦涛可能是完成该使命的最佳人选。在中国外交领域中，情况也是一样。无论如何，胡锦涛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到中国第一号人物的成功发展之路一定会对中共各阶层干部有所启蒙和激励。胡锦涛温和友善、谨慎低调的性格会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范例和学习榜样。具有宏观思想、历史眼光和超人胆略的伟人领袖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具有非凡管理能力和处事技巧、人缘性格良好、善于化解冲突的人将主导今后的中共领导层次。

注释：

１．例如，Lan seckington 的 “中国的新领导：‘第四代’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领导风格”（Ｃｈｉｎａ’Ｓ new leadership:the ‘fourth generation’ bring their own style of leadership")《共产主义和过渡政治研究》(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第１９卷第４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december 2003);zheng yongnian &lye liang fook:"精英政治和中共第四代领导人”(“elite politics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中国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第８卷第１、２期，２００３年秋。

２．例如，在１９９１年，这些人的总数是三千四百万。加上由工资由农民的税收来支付的六百万农村干部，全部干部的总数在１９９１年是四千四百万左右。

３．Joseph fewsmith:"中国的领导代层转换”(“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2 年秋，第２５卷第４期 第２３－３５ 页。

４．Joseph fewsmith:"中国的领导代层转换，”第２３页。

５．同上，第２５、３０页。

６．同前。

７．文思咏和任知初:《胡锦涛》，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９０页。

８．同上，第２６－４１页。

９．同前，第 ４６－４７ 页。

１０．同前，第４９－５６页。

１１．同前，第９０－９１页。

１２．唐少杰:“毛泽东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载“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一七)《华夏文摘》２００４年7月。

１３．文思咏和任知初在《胡锦涛》中写道，胡锦涛后来成了逍遥派并脱离了文革运动的主流。(第９０－９１页）可是，有一位学者访问过胡锦涛的校友和清华“四？一四”的成员，他们都肯定胡锦涛是清华“四？一四”的成员。

１４．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二期。

１５．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当代中国研究》，第１２ 卷，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７４－７６页。

１６．文思咏和任知初:《胡锦涛》，第９３－１１２页。

１７．同上，第１１８－１２６页。

“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苏阳

一、有关本研究的背景陈述

研究“文革”的人都十分熟悉“文革”期间的暴力现象，如各地对教师、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殴打拷问〔１〕，以及群众派别街头武斗造成的伤亡。〔２〕然而，一种性质十分不同的集体屠杀现象，即系统地成批处决手无寸铁的平民，虽然零星散见于“文革”时期的一些报导，但却不为世人了解。一位老干部关于北京郊区大兴县这种事件的回忆录即是这类报告之一：从１９６６年8月２７日到9月１日的５天内，共有３２５名“阶级敌人”被杀，年龄从刚出生３８天到８０岁不等。〔３〕最著名、大概也是最令人发指的事件发生在湖南省道县。据香港一份杂志的文章说，１９６７年末，集体屠杀之风肆虐该县，两个月内共有４，９５０人遇害。〔４〕郑义有关广西大屠杀的有争议的著作大概最为西方所熟悉，一是因为它有了英译本，二是它关于吃人的记述骇人听闻。〔５〕２００２年由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里，又为集体屠杀提供了有关云南、青海、内蒙古和北京的案例。〔6〕

这些报告令人关注。那么这类事件在“文革”中是否普遍？笔者查阅县志着手研究“文革”时，心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上述案件也许属于格外严重的一类，但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９年，类似的集体屠杀在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相当普遍，相关的证据十分充分。而且这些县志是由地方政府编写的出版物，所以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它们夸大了政治暴行，相反应当推测有可能低报数字。〔７〕

本文将根据3个省的县志如实讲述这些集体屠杀，其中广西和广东两省十分普遍，而湖北省则相对较少。

为了让读者理解这些暴行风潮的缘起，此处先介绍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大多数集体屠杀发生在“文革”时期中共政府着手建立新的地方政府、解散群众组织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在１９６７年底号召“革命大联合”时，“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已开展了一年有余。地方政府已经解体，群众可以随意成立组织参与夺权斗争，群众组织的街头武斗遍地开花。在此情形下，建立“革命委员会”（新的政权机构），让群众组织服从命令，尤其是解散群众组织并解除其武装，是一项难乎其难的任务。在毛治下的中国，碰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流行的是所谓“阶级斗争”手段，即消灭一切公开的反抗，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但是，与其他时期所不同的是，在本文所涉及的时期，国家的地方代表把“阶级斗争”变成了恐怖统治，所以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

二、县志中有关集体屠杀的记载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为“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受害

人平反。〔８〕这项政策促成调查“文革”期间各地发生的恐怖事件，对受害的范围和严重程度留下了很多宝贵信息，其中的大多数后来被写入县志公诸于世。新的县志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有“大事记”的内容，记录了本县包括“文革”期间的大事在内的历史事件。这些记录还包括“文革”期间死伤人数的统计以及人口、党员和县级领导的背景。

１９６６年的中国大约有２，２５０个县。〔９〕　我在这项研究中选取广东、广西和湖北３省共计２３５个县作深入研究。〔１０〕广西自治区所辖县共计８３个，我选取了样本县６５个，样本县所占比重为７８．３％；广东省所辖县共计８０个，选取样本县５７个，样本县所占比重为７１．３％；湖北省所辖县共计７２个，选取样本县６５个，样本县所占比重为９０．２％。

编写这些县志时，由于编写者可能自我审查或材料搜集不全，这些已公布的“文革”记录在详略程度上有很大差别。本文所说的死亡人数是指县志中记载的人数。因此，据此得出的统计数字应被视为最低数字。〔１１〕持此谨慎做法旨在确定集体屠杀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并非估算死亡人数。

我按照 Valentino 的观点，把集体屠杀（Mass Killing）定义为“故意成批杀害任何一个非战斗团体的成员（施害人所认定的团体及其人员）”。〔１２〕对这个定义中的几个要素应做进一步的说明。首先，在确认受害人时，是根据他属于某个团体的“成员”，而不是根据他是否对施害人构成直接威胁。就“文革”而言，这种身份的依据是所谓“政治罪行”或“家庭成分”不好。其次，施害人的行动中含有杀人意图。这使集体屠杀有别于“文革”期间的其他死亡原因，如批斗会上的残暴殴打（本意是为了象征性的羞辱而非消灭肉体）或审讯中的酷刑（主要是为了逼供）。第三，死亡不是群众派系的武斗造成的。但是，假如受害人是武斗之后被解除武装关押起来的被俘人员，我把他们也视为非战斗人员，因为他们对施害人已不构成威胁，因此“集体屠杀”不同于武斗中的杀戮，后者在“文革”早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最后，“成批”的标准是指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在确定一个事件是否属于“集体”屠杀时，我以一次死亡１０人作为基准。

广西省全州县的记载是县志中用明确语言记述集体屠杀的一个典型：“（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３日，东山公社三江大队，以民兵营长黄天辉为首，将该大队地、富、分子及其子女７６人，集体坑杀于蛇形黄瓜弄。……７月至１２月各公社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法庭’。全县枪杀８５９名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１３〕

这是集体屠杀最残酷的个案之一。但是从人口、政治结构和现代史看，全州是个很普通的县。该县１９６６年时人口为４８５，０００人，其中农业人口占９３％，由县、公社（乡镇）和大队（村）三级机构管辖。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的“土改”中，有１０，１１０个农户划为地主，３，２７９个农户划为富农。〔１４〕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这个“阶级敌人”的阵营又有所扩大，增加了所谓的“反革命”和“坏分子”。这部分人口包括其家庭成员，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四类分子”。只要中国当局一祭出“阶级斗争”法宝，他们便是受折磨受迫害的直接对象。

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在“文革”中达到顶点。当“文革”最残酷的时期于１９７１年结束时，全州县共有２，１５６名男女和儿童，象在上面提到的事件中那样“非自然死亡”。〔１５〕

这类记录提供了时间、地点及受害人和施害人身份的信息以及导致死亡的方式，是集体屠杀的主要类型之一，我称之为“对四类分子的屠杀”（pogrom）。

还有一些县志提供的有关杀人方式的信息不太明确，但从记录的具体时间和大量死亡的数字看，显然也发生过集体屠杀。在下述另一个县——广西临桂县——的例子中，大多数受害人都是“四类分子”，这说明那里可能也有与全州县相似的集体屠杀，但受害人中还包括刚被扣上所谓“阴谋分子”帽子的人员。这意味着还有另一种类型，我称之为“政治迫害型屠杀”。临桂县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群众专政”的名义下，全县出现乱杀人的现象。从6月中旬至8月底，被扣上“暗杀团”、“反共救国军”、“ＸＸＸ黑班子”等莫须有罪名而遭杀害的达１，９９１人，其中国家干部３２６人，工人７９人，学生５３人，城镇居民６８人，农民５４７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子女９１８人。全县１６１个大队，只有会仙的文全和宛田的东江两个大队没有乱捕、乱杀人。〔１６〕不同于针对“四类分子”的屠杀，政治迫害型屠杀中的受害人的身份是被杀害前不久才罗织的罪名，其根据是他们被控参与所谓的“阴谋集团”，如“暗杀队”和“反共救国团”。临桂县的受害人当中有９１８名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但相当多的人显然不属于这4种人，例如那些被称为干部、工人、普通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人。

第三类集体屠杀是“被俘人员的集体处决”。这些受害人在派系武斗之后被解除了武装，已经不再是武装的战斗人员。这种杀戮发生在一派打败另一派之时。以下事例生动反映了这类事件的性质：１９６８年8月１８日，几个县的公安干部参加了联席会议，“东兰会议结束后，各县人武部坚决执行‘命令’，组织带领各县（厂）联指武装人员（人数超过原来规定，达到4，４００多人）到风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１０３，１３８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1，０１６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１，３３１人的７０％强。……经过武装围歼扫荡后，风山县革委会终于在２５日宣告成立。”〔１７〕

这里还要就那些我无法确定是否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稍做说明：假如报导的死亡数字不足１０人，该事件就不算作集体屠杀。即使县志中提到了大量死亡数字的县，若是属于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我也不视为该县发生过集体屠杀：１、大量死亡只有暗示，缺少明确的记录；２、记录在案的死亡原因是武斗，而不是解除了武装的平民；３、记录在案的死亡数字是整个“文革”期间的合计数，不清楚死亡原因。有三部县志中的记录分别代表着这三种情况：“（１９６８年）3月２０日晚，新联公社黄桥生产队民兵以镇压‘平民党’为由而乱杀人。此后，全县相继出现乱杀现象，尤以文平等地为甚。”〔１８〕“（１９６８年）3月3日，两派在连塘发生武斗，造成１４４人死亡。”〔１９〕“‘文革’十年期间，共有２，０５３名干部和群众遭到批斗，２０６人被殴打致死；５４１受伤或致残。”〔２０〕在第一段引文中，蒙山县志记录了１９６８年3月２０日及随后发生的“滥杀无辜”，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推测死人肯定不少，但它没有提供具体数字，所以无法把它算

作一次集体屠杀。在引自横县县志的第二段文字中，仅１９６８年３月３日一天就死了１４４人，但这是武斗的结果，所以我没有把它算作集体屠杀。引自田林县志的第三段引文称２０６人遇害，但死因不明，所以我也没把它视为集体屠杀。

三、集体屠杀：对广东、广西及湖北三省的分析

1.规模

广西是发生集体屠杀最严重的地方。在我所掌握的６５部县志中，有４３部（占６６％）记录了该县发生过集体屠杀。其中有１５个县的情况非常严重，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２１〕其中又以武鸣县为最，死亡总数高达２，４６３人，仅在１９６８年６月中旬到７月初的一次运动中，就有１，５４６人被杀。〔２２〕广西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５２６人。前面描述的所有３种类型的集体屠杀，即针对“四类分子”的屠杀、政治迫害型屠杀、被俘人员的集体处决，在广西省均有发生。

广东省的情况与此相似。在５７个县中有２８个县（４９。１％）发生过集体屠杀，其中有６个县的被害人数超过一千。〔２３〕情况最严重的是阳春县，从１９６８年８月到１０月共死亡２，６００人。广东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２７８人。广东的集体屠杀属于两类，即针对“四类分子”的屠杀和政治迫害型屠杀。县志中没有关于第三种类型“就地集体处决”的记载。

比较而言，湖北省有关集体屠杀的记载寥寥无几，６５个县中只有４个县有相关记载。然而这４个县的记载所涉及的屠杀属于政治迫害高潮期间打人导致的大量死亡。未见针对四类分子的屠杀计划或集体处决的报导。

上述资料清楚地显示，集体屠杀在两广是一种普遍现象，湖北的情况似乎不然，如果该省县志中的统计数字如实反映了历史的话。〔２４〕

广西和广东到处发生集体屠杀时，湖北各县也正在经历迫害各类新老“阶级敌人”的高潮期。湖北省有３８个县（在我的湖北省样本县中占６０％）报导了受迫害期间挨过打的人数过千，其中很多人落下了终生残疾。但是不同于两广，大规模的打人多数时候并未导致集体屠杀。下面便是一例。“（１９６７年）9月6日，县城发生了‘九·六’武斗事件。一群‘造反派’白天游斗‘走资派’、‘老保’２２人，晚上打伤３２人，其中８人终身残疾。接着向区乡发展，１，０１５人遭毒打，４４人造成重伤或残废，１人打死亡，９人逼死。恐怖气氛笼罩全县。”〔２５〕

湖北省发生过这种大规模打人现象的大多数县，记录的死亡总数都不足１０人。就这里引用的具体事例而言，虽然迫害高峰期的死亡人数达到了１０人，但我并未把它算作集体屠杀，因为其中９人的死亡不是有意为之所导致（但有致伤致残的意图）。在湖北的６５个县中，我根据当时到处蔓延的打人行为导致的死亡人数，只认定４个县发生过集体屠杀，它们是宜昌（死１０人、自杀１０５人、落下终生残疾者６０人），恩施（２，３５０人被打、致死５１人、３１４人永久残疾），

秭归（２，５００人被打、死４０人、重伤４４０人、３５人落下终生残疾）和郧西（该县的何家渠公社死３２人，该县另有５１２人被打，２７６人‘被打死或致残’）。

2.屠杀时间

已知最早的集体屠杀发生在１９６６年8月北京郊区的大兴县〔２６〕，但在本文考察的3个省里，直到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或１９６８年，即“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或之后不久，才发生了集体屠杀。

粤桂两省的集体屠杀在１９６８年７月达到高峰，恰好发生在大多数县革委会成立之后。该月中央发出禁止武斗和解散群众组织的两条指示，并且大力加以宣传。〔２７〕此时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反对派组成的群众联盟，即著名的“四·二二”组织在所有的主要城市里带头闹事。省当局便利用中央的两条指示镇压这些反对派，迫使其中一部分人逃到了下面的县里；同时，它还要求刚成立不久的基层革委会“坚决打击阶级敌人”。〔２８〕有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公社，在执行这项要求时似乎热情很高。广东省在2月份就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但是以“红旗”派为主的有组织的抵抗仍在继续，就像广西“四·二二”派的抵抗一样。“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也把中央的两条指示作为对付“红旗”派的武器。和广西一样，北京和省会针对有组织的抵抗发布的政策在下级辖区（县、公社和大队）酿成了一种恐怖气氛，无论当地是否存在普遍的有组织的抵抗，在基层都大力贯彻这些政策，集体屠杀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生的。

与两广不同，湖北的集体屠杀的少数事例不是发生在７月，而是发生此前两个月。北京针对群众组织发布的指示影响湖北的方式似乎十分不同于两广。这也许意味着当时群众派别的格局有助于解释各省集体屠杀的差别。与两广不同，湖北的造反派被吸收进了新成立的革委会（相关讨论见后）。

三省的集体屠杀均集中发生在７月左右的两三个月之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把集体屠杀与成立“革命委员会”及解散群众组织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资料显示，大多数屠杀都紧随“革委会”的成立而发生，但目前仍不清楚造成这种状况的具体机制。有学者把它归因于后来的运动，尤其是“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２９〕

数据显示，这些全国范围的运动不一定会导致地方上的严重迫害。县志表明，各县在有选择地落实某些政策内容，并非对全国性的所有运动都如数照办。同样重要的是，执行政策的时间各省和各县也大不相同。在我考察的三个省中，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运动高潮，它们分别影响着省内各县的迫害行为。

3.集体屠杀发生地的政治地理特点

集体屠杀往往发生县级以下的辖区，通常是发生在公社或大队。本文前述引文提到了发生集体屠杀的公社或村庄的具体名称。例如，在广西全州县将７６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推入山坑的集体屠杀事件中，就具体指明是三江大队。广西

临桂县的县志具体记述了１６１个大队中只有两个未发生过集体屠杀。在广东有集体屠杀记录的２８个县中，６部县志中含有辖区具体名称的信息。例如《曲江县志》写道："（１９６８年）１月，樟市公社发生严重的非法杀人。全公社有１３个大队出现乱捕乱杀行为，先后共有１４９人被杀害"。〔３０〕另一些例子包括："池洞、镇隆和北界三个公社发生了大量打人杀人的现象，死２９人。"〔３１〕"群众专政是由各公社的公安人员执行的……。"〔３２〕"新安公社梨垌大队活活烧死５６名'　四类分子'及其家属。"〔３３〕城市里没有集体屠杀，而农村则大量存在，这种反差也许反映着基层和上级政府之间的脱节，这意味着国家控制力在地方一级的削弱。

资料显示，集体屠杀多发生于国家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地方，这一事实还得到了地理因素的支持。比较发生集体屠杀的县和未发生集体屠杀的县的政治、地理情况后〔３４〕，可发现以下三点差异：第一，集体屠杀较多发生在离地区政治中心如省会较远的农村地区。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与省会的平均距离是２１２公里，而未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与省会的平均距离是１７９公里。第二，集体屠杀多发生于人口密度较低地区。发生集体屠杀的县的人口较为稀少，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１３９。７人；而未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人口密度则高达每平方公里２１９。１人。第三，集体屠杀多发生于县财政收入较低地区。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人均财政收入为１５。１元人民币，未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人均财政收入为２０。８元。

4.受害人的身份

多数县志未提供有关受害人身份的细节。在提供了这种信息的县志中，提到最多的是所谓"四类分子"，即过去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有些县志列举了受害人的具体身份。例如前面引用的广西临桂县县志列出了受害人按身份分类的统计数字，其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总数的４６．１％，农民占２７．５％，干部占１６．４％，市民占３．４％，工人占４．０％，学生占２．７％。〔３５〕广西宾阳县共有３，６８１个受害者，其中农民３４４１人，占被害人总数的８８．７％，干部５１人，占１．４％，教师８７人，占２．５％，工人１０２人，占３．０％。〔３６〕与这两个县的受害者身份相对比，湖南省零陵地区共有９，０９３个受害人，其中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占总数的３９．３％，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占４４．６％，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占１１．５％，其他家庭成分４１１人，占４．５％。〔３７〕

从上述受害人的身份可以总结出几个特点。首先，受害人中最多的是"四类分子"。这清楚地表明集体屠杀的目标是弱者，而不是那些真正对权力构成威胁的人（如所谓的"阴谋分子"）。其次，多数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也就是说，集体屠杀大多发生在县城以外的地方。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它说明集体屠杀是发生在国家控制力特别薄弱的下级政府的辖区。第三，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不属于"四类分子"的人遇害。这或许反映着"政治迫害型"或"集体处决俘虏型"的集体屠杀。如果集体屠杀是为了消灭对立派系的人员，遇害人中"四类分子"以外的人会占相当大的比例。例如在上述凤山县的例子中，围剿结束以后遇害的１，３３１人中，有２４６人是干部或工人（都是城市居民）。〔３８〕

一个醒目的事实是，受害人中有很多“四类分子”的子女。有报告称，这是因为施害人害怕他们人长大后寻求报复。〔３９〕在某些情况下，这似乎是一种事后推测。在道县，施害人杀了成年“四类分子”后，又把他们的孩子抓来杀死。〔４０〕但在某些情况下，子女是与父母一起遇害的。在全州事件中，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和的贫农出身的妻子有两个分别为1岁和3岁的孩子，刘在被逼跳下坑去之前向民兵头子黄天辉求情：“天辉，我有两个仔。政府能不能把一个判给我老婆？我抱一个跳下坑，留下一个给我老婆。”黄天辉说：“那不行！”〔４１〕

5.施害者

集体屠杀并不是由一些乌合之众自发实施的。在有据可查的案件中，我发现施害人皆有政府的人从中组织，他们通常是民兵、群众组织的成员或新的志愿者。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凤山县的具体材料中都记录了屠杀之前无一例外地开过认真的组织会议。在章成对道县事件的讲述中，与会者投票表决该杀何人；会上一个接一个念出可能的受害人姓名并点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小时。〔４２〕在道县的另一个地方，据章成说，“从管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一个群众派系的组织）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４３〕

显然，杀人过程是有组织的。受害人通常被捆绑起来，带到无人的地方处死。有时也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死多人，即所谓的公审大会。〔４４〕多年后对施害人的访谈表明，他们大多数人在杀人时是在执行政治任务。〔４５〕有证据显示，这类行动还会得到政治奖励。在１９６８年底和１９６９年初，省县两级都开展了清理和重建党组织的运动，有很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一些官方统计数字表明，施暴的热情和政治奖励之间有着令人齿寒的关联。据广西省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在“文革”期间的广西，有9千多名杀人者被吸收入党；在“文革”初期“火线入党”的2万人后来杀过人，另有１７，０００名党员对杀人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４６〕

四、全国集体屠杀概况分析

1.各省间的差别

在我所考察的湖北和两广之间，集体屠杀的规模大不相同。这意味着暴力的程度既有全国政治的影响，也跟地方状况有关。如何解释这种差别呢？我打算在这里提出一些尝试性的假设。

基本的假设是，各省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编写《县志》时遵行的政策所导致的人为后果。县志的编写和出版是由一个实行等级制的政府部门负责。一个省的各县所执行的一套政策方针也许不同于另一个省。其中便有这样的原则：在记述”文革”历史时“宜粗不宜细”。〔４７〕

与两广的同行相比，湖北省的编纂者可能更加谨慎，因此略去了更多史料。事实上，湖北省志中有关“文革”的篇幅（２，３６１字）还不到广东省志（５，１

９８字）和广西省志（５，１１７字）的一半。〔４８〕另一方面，湖北县志记录的集体屠杀虽然很少，但它们并没有回避有大量人员被打和受伤。事实上，它们比广东的地方志记录了更多的受伤者。所以有理由推测，记录在案的被害人数量的差异，确实反映着三省政治局势之间的实际区别。

有理由把死亡人数的差别与“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冲突方式的差别联系在一起。据徐友渔对全国省一级的冲突的总结，湖北和两广代表着了两种不同的过程。〔４９〕

在成立“革委会”之前，三个省会都经历过派系的群众动员和数次政府重组，都出现了对立的两大派。通常有一派试图推翻“文革”前的政府，另一派的要求则较为温和，甚至事实上为保护政府而战。１９６７年的上海“一月风暴”过后，权力经常在两派之间换来换去，但是在这一年7月份的“武汉事件”之后，湖北以及其他许多省份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有更多武斗派别策略性地支持或表面上拥护中央，被划为“革命派”。政府被彻底改组，温和派失宠。较多的武斗派系的成员被大量吸收进新政府。〔５０〕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例外，其中就包括两广。徐友渔认为，中央考虑到国家安全，对内蒙、新疆、西藏和两广这类边远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５１〕在这些省和自治区，更支持地方政府的派别被划为“革命派”，在“革命委员会”中担任要职；“革命委员会”则镇压敌对的造反派，这两类省份的群众冲突都很严重。表面上看，对与错的界线是在亲政府和反政府的派别之间；然而，在湖北这类省份（我称为类型１），“革委会”吸收了许多坚决反对“文革”前政府的人，新的划线标准是在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与它们受到排挤的前盟友之间。另一方面，在广东和广西这类省份（类型２），“革委会”结合了前政府的干部和温和派的领袖，然后利用他们的力量打击对立的“造反派”。

我根据徐友渔的分析，把各省（自治区）分为两种类型。“类型１”是指那些政治演变过程与湖北相似的省份，“类型２”是那些情况类似于两广的省份。在总结了来自全国１，５３０个样本县的材料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出：“类型１”的县共计１，２７１个，平均死亡人数是４５．２人；属于“类型２”的省份有两种情况，一是两广之外的其余5省，共计１３５个县，平均死亡人数为７０．３人，二是包括两广在内的5省，共计２５９个县，平均死亡人数是４５１人，其死亡总数为“类型１”的１０倍。即使我们排除暴力行为特别严重的两广，“类型２”的县的死亡人数仍高出５０％。因此可以断定，湖北和两广之间的差别也许代表着一种全国性的现象。我们不清楚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些差别。有人认为，两广发生的严重暴力现象可归因于“保守派”对反对派的报复，例如有政府作后台的民兵对反对派的打击。这种解释有一定的根据。例如，广西集体处决俘虏看来就是一个报复的例子。另外，广西的反对派“四·二二”也在不断对广西的集体屠杀进行有组织的抗议。〔５２〕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多数受害人是“四类分子”，按当时的政治标准，这类人没有资格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在发生集体屠杀最多的偏远的乡村，我们不清楚在集体屠杀之前是否发生过派系的组织活动。

根据种族灭绝的文献，也许可以从政策角度提出另一种假设。受害者大多是“四类分子”及其家人，这意味着集体屠杀是消灭阶级这一党的长期政策演变为集体灭绝的过激表现。从比较的视角研究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学者认为，代表性更广的政权可以缓解暴力。〔５３〕或许可以说，湖北的“革委会”较之两广的“革委会”更能代表反对派。

2.全国的状况

中国其他省份集体屠杀的规模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两广也许是集体屠杀特别严重的省份，湖北也许代表着处于温和的另一端的省份。大多数省份可能处在它们之间，但更接近两广而不是湖北。

根据两广和湖北的县志统计：广西省各县受迫害人数为１２，６１６人，其中各县死亡人数平均为５７４人，受伤人数平均为２６６．４人；广东省各县受迫害人数为6，７８８．６人，其中各县死亡人数平均为３１１．６人，受伤人数平均为２８．１人；湖北省各县受迫害人数为2，３１７．５人，其中各县死亡人数平均为１０．８人，受伤人数平均为４４．５人。

而根据全国１，５３０个县的县志，“文革”期间全国各县的平均死亡人数是８０人。显然两广的平均数（分别为５７４人和３１１人）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数，而湖北的数字（１０．８人）要低得多。受伤和受迫害的人数也显示出类似的格局。

3.政治大环境

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类极端暴力现象挑战着我们的良知和理智。不对此做出解释是说不过去的。“文革”的集体屠杀模式其实提供了一些线索。它们看来具有政治性：发生的时间、施害人以及受害人的身份，都与新成立的地方政府巩固权力有关。屠杀并不是毫无规则地分散发生。倘若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话，就要解释两个问题。一是事件前后的政治环境。在什么样的政治和司法环境下，施害人认为杀人不会受到惩罚？二是施害人的心理。他们为何要做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我讨论集体屠杀成因的动机来自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的决策者是故意要用这种方式杀人，或者集体屠杀仅是无意造成的结果？这个问题乍一看也许太简单，却是一个有益的起点，它可以使我们探讨与集体屠杀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政治结构。在以下讨论中，我对中央权力和地方政府做了区分。中央政策在字面上一再反对极端暴力行为，然而只有一部分地方领导真心诚意地接受它。随着讨论的展开，可以看出这一特点至关重要。

ａ．取缔群众组织，成立“革委会”

“文化大革命”始于１９６６年5月，１９７１年逐渐退潮。两次事件的大潮把这场运动分成了三个阶段：１９６７年1月的“夺权”运动和１９６７年底及１

９６８年各地“革委会”的成立。〔５４〕最初的参与者只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后来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被卷了进去。有一年多的时间允许人们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但是这种自由和“大民主”并没有带来毛泽东设想的新秩序；相反，各地派系林立，街头武斗时见发生。１９６７年底，毛泽东要求群众派别全部解散，并号召四分五裂、相互打斗的人民实行“革命大联合”。１９６８年2月，即中国的春节，他又要求各地成立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５５〕然而对于省、县、公社和大队的地方官员来说，这项任务并不轻松。事实上毛泽东的计划落空了，直到１９６８年9月，最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新疆）才建立起来。有些基层地区更是延迟到１９６９年9月才成立了“革委会”。〔５６〕湖北省“革委会”成立于１９６８年2月1日，大多数县级“革委会”是成立于当年春天。广东省“革委会”成立于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０日，大多数县级“革委会”成立于１至３月。广西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才成立省一级“革委会”，而大多数县级革委会成立于当年的２至４月。

建立新秩序涉及到两个相关的任务：配备有效的地方政府，消灭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反对派。新的“革委会”是由军人、经过挑选的原党政干部和群众派别领袖组成的。在“革委会”中得到任命的前党政干部和群众派别的领袖经常引起激烈的争议；被挤出“革委会”的群众派别领袖有可能成为新秩序的激烈反对者。

例如，广西和广东的反对派联盟持续与支持新政府的人“武斗”，广西省会南宁的武斗更是遍地开花。直到１９６８年８月，在中央的协调干预下，广西省“革委会”才告成立。〔５７〕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初就要求广东在一个半月内成立“革委会”，可是这项任务直到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０日才完成。〔５８〕但秩序却未能及时恢复，作为反对派的群众联盟“红旗”派继续公开对抗，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多次挑起人称“大武斗”的街头武斗。〔５９〕湖北省“革委会”则是派系斗争的产物，这种派系斗争在１９６７年7月２０日的“武汉事件”中达到顶点。在这次事件中，前政府及支持它的群众组织遭到惨败。反对派在中央支持下胜出。新的“革命委员会”于１９６８年2月5日成立，前反对派占据了群众代表的席位。〔６０〕

各省持续的混乱让中央感到不安，它敦促新成立的“革委会”要捍卫权力，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对付反对派。省级“革委会”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常常把“阶级斗争”口号喊得震天响。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各县政权及基层干部的行为，于是许多人用恐怖运动的方式做出响应，无论政治威胁真的存在还是纯粹出于想象。

ｂ．选定迫害对象和编造威胁

中央当局建立新秩序的要求是毫不含糊的。反映着这种政策的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话，见于同时刊登在中共三家重要出版物上的１９６８年“元旦社论”：“毛主席说：‘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混在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绝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一定还会采取各种形式，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６１〕

纳粹德国宣扬一种把犹太人视为劣等民族的种族理论；斯大林的共产国家编造出了必须予以消灭的“人民公敌”。可见，在集体屠杀过程的早期，国家的宣传机器通常会把一部分人打成异类。中国发明的这个异类便是“阶级敌人”。“文革”期间镇压群众组织的独特之处是，在辨别谁是“阶级敌人”时不是根据他的固有特征（种族、民族或宗教），而是更多地根据政治标准：只要地方政府视为阻碍建立新秩序的人就是“阶级敌人”。上述那篇社论说：“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６２〕

如同其他时期一样，这一阶段党的政策依旧十分笼统，并无具体规定。它强调存在着“阶级敌人”及其潜在威胁，但并没有提供辨别的标准。地方政府可以随意给“阶级敌人”下定义。为了弥补政策语言空泛之不足，党会宣传一些地方经验。例如在上述社论发表４天后，中央便下发文件赞扬黑龙江省“深挖叛徒”的工作。〔６３〕这一年中期又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宣传一篇关于北京一家工厂“斗敌”经验的报导。〔６４〕　地方政府通过模仿这些榜样去执行全国性的政策。

在中共统治下，“阶级斗争”语言并非什么新鲜东西，它把某些人打入另类的功效也非无前例可循。但发生集体屠杀这种极端行为，还需要另一个因素发挥作用：编造威胁。国家不但要创造一个异类，还要编造出某种迫在眉睫的危险。这在集体屠杀的过程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伎俩，省和基层政府把某种威胁说得有鼻子有眼，作为恐怖行为的借口。

在这类事件中，地方政府热衷于编织所谓的“阴谋集团”正在从事有组织的活动。地方政府要求“对阶级敌人先发制人”，而且往往是以“刮十二级台风”的方式。当北京在１９６８年３月底突然停止了反对“极左”的运动，转而展开所谓“对右派反扑的反击”时，湖北省相对温和的时期也随之结束。在该省省会武汉，那些自封的群众专政团体把武汉体育馆变成了一座大监狱。〔６５〕挨打的人不计其数。反右运动也蔓延到了各县。当年４、５月份在全省范围内出现了恐怖统治，打着“三反一粉碎”的旗号对所谓“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６６〕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７日，据说破获了一个两广的巨大阴谋集团“反共救国团”。据称，这个阴谋集团在广西的部分只是“分团”，其总部设在广东省会广州。两个武斗的群众派别之一“联指”很快便用以下语言攻击对手：“反共救国团在四·二二组织中有很深的根子。四·二二组织的领导就是反共救国团的领导。迅速行动起来，对拒捕者要就地正法。”〔６７〕

有证据表明，恐怖行为的动员得到了中央少数关键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而对恐怖行为采取纵容鼓励的态度。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５日，周恩来和康生在接见广西群众代表时，对这种存在着“巨大阴谋”一说表示了认可，他们同意这一说法：“反共救国团”的总部设在广州，在广西有分团。更重要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把“反共救国团”与两个群众组织——广西的“四·二二”和广东的“红旗”联系在一起。〔６８〕

大气候助长了“阴谋论”谣言在乡村的传播。不但有这些来自上面的、表明存

在危险的政治“标签”，还有大量关于危险迫在眉睫的断言——据说已经找到了“暗杀队”和“行动宣言派”。在前述广西全州的坑杀事件中，公社民兵营长从临近的县开会回来后，对他的下属说，“四类分子”就要动手了，最先受害的是干部党员，接下来是贫农。〔６９〕

两广湖北这３个省的县志中材料有限，但在章成对湖南省道县的具体叙述中，一位县领导的讲话也许可以作为集体屠杀之前编造危险迫在眉睫的典型语言：“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７０〕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７１〕

ｃ．对过火行为的警告

不说事情的另一面，对国家在集体屠杀中的作用的理解就是不全面的：中央和省级官员不断对过火的暴力行为发出警告。在所有党的文件或讲话中，都找不到允许集体屠杀的证据。只要下面传来集体屠杀的可靠消息，上级政府总是予以谴责，有时甚至派军队前去恢复秩序。

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０日，党中央就转发了北京市的一项政策，指示全国各地的政府要禁止“私设监狱法庭，私自抓人打人”。它警告说，这些行为“违反党纪国法”。〔７２〕此后，中央在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又一再重申“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５日；１９６７年1月２８日；１９６７年4月6日；１９６７年6月6日；１９６８年5月１５日；１９６８年7月3日、２４日和２８日；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７３〕

对于广西省政府向极端暴力行为发出警告时是否真诚，是存有争议的，但它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说的。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即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发生新一轮集体屠杀一个月后，省政府发布了１０条命令，其中便包括“群众组织不得任意抓人、打人和杀人。所有在押人员要立即释放。”接着便发明了“乱打乱杀”这个新说法〔７４〕，指出暴力的蔓延是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破坏。例如，自治区政府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公布了一份有关容县黎村“乱打乱杀”的报告；对９个县做了调查后，又于１９６８年5月3日发出制止“乱打乱杀”的命令；１９６８年6月２４日下发了“关于制止乱打乱杀的指示”的文件；１９６８年9月１９日开始收缴群众组织的枪械；最后又在１９６８年9月２３日发出“关于制止乱打乱杀的通知”。〔７５〕

官方反对极端暴力行为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在许多地方，这类事件的消息一传到上面，当局就会派领导或部队干预。例如，在北京郊区最早发生的集体屠杀事件中，有个县领导五次赶往马村制止杀戮。与他一起做工作还有北京市政府的官员。〔７６〕在最严重的湖南道县集体屠杀事件中，省政府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前去制止杀戮。〔７７〕

至于集体屠杀究竟是如何制止的，县志中没有详细记载，但数据显示，集体屠

杀通常集中发生在某个时期，大多数县的杀人潮只出现过一次，这说明它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某种外部限制。有理由断定，中央和省一级发布的官方政策有助于阻止集体暴力的升级。但是这些努力由于两个原因而效力有限。

第一，官方政策没有规定任何切实的惩罚。警告通常只是作为未来的行动指南。事实上，在集体屠杀期间或过后，没有关于有人受到惩罚的任何证据。公安部长谢富治１９６８年5月的讲话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对施暴者给予宽大处理的一个有力证据。在这篇看似反对武力的讲话中，他似乎是在说，施暴者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反革命分子只要愿意接受再教育，就不应把他们杀掉。打死人更是错上加错。但出现这种（杀人的）事是因为缺少经验；所以就不必追究责任了。重要的是吸取经验，认真执行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７８〕直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即在事情过去大约１０年以后，当局才对施害人提起了公诉。

第二，资料未显示省和地方政府在禁止极端暴力行为时是否在权宜行事。例如，上述广西针对集体屠杀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同时，也出台了对"阶级敌人"进行迫害的另外一系列政策。该自治区当局可能认为，乡村的"乱打乱杀"是胡作非为，但它也有动机对城市的反对派群众组织动用武力，此乃它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这一角色的基础。

ｄ．国家控制力的削弱

"文革"的本质是摧毁地方政府，然后予以重建，这一点使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遭到重创，公检法系统一度陷入瘫痪。１９６７年8月，甚至连公安部长谢富治也呼吁"砸烂公检法"："从去年'文革'开始到今年的'一月风暴'，大多数公检法部门都在保护走资派，压制革命群众。……不全面改造公安系统，这种情况就难以改变。必须砸烂这架旧机器。"〔７９〕据县志记载，县、公社和村一级的这些机构在１９６７年已经陷入瘫痪。逮捕和起诉不是根据任何法律，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

"文革"的另一个结果是阻塞了上传下达的信息渠道。与本文讨论密切相关的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失灵，这使得基层出事时上级部门即使知道了也为时已晚。地方领导宣扬自己在运动中取得的"成就"时会掩盖暴力行为。例如，１９６７年1月北京市政府向中央提交报告，介绍了清华大学新领导班子如何忠实地贯彻执行中央政策。这份报告着力描述了做过"坏事"的人如何得到善待，为他们提供了自我改造的机会。报告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批示把报告下发全国作为学习的榜样。〔８０〕直到１９７８年，即在政治气氛已大不相同的１０年之后，当局又公布了一份报告驳斥了原来的那份报告，新报告详细介绍了该大学挨过批斗的人的真实命运。据这份新报告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短短两个月内，就有十多人被害。〔８１〕下面县里的情况也与此相似，由于向上级通报的渠道受阻，上级政府只有在死了很多人时才会插手干预。

五、集体屠杀的原因：国家鼓励与国家权力失灵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归纳出集体屠杀模式的4个突出特征：

第一，三省的情况大不相同，但每个省的内部有着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这些模式意味着对发生集体屠杀起更大作用的是各省特有的政治形势，而不是整个国家的政局。在此，我尝试性地把各省之间的差异归因于省内群众派系和政府权力之间关系形成的格局。在湖北，有中央政府撑腰的反对派在以往的冲突中占了上风，被吸纳进新成立的“革委会”。相反，广西和广东的反对派被排挤在权力之外，所以这两个省的“革委会”更倾向于用暴力手段对付这些“造反派”。

第二，集体屠杀集中发生在大多数县已经成立了“革委会”、但省会城市依然受困于派系斗争的月份。集体屠杀的高峰期，也正是中共中央发布禁止派系武斗和解散群众组织的两项指示之时。这一发现有助于理解集体屠杀的性质和起源。集体屠杀大多发生在新的“革委会”成立以后，这一事实意味着集体屠杀是地方政府镇压的结果，而不是群众团体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集体屠杀与镇压反对派群众组织同时发生，这意味着省政府在鼓励暴力手段，尽管地方公社和村庄的极端暴力行为也许不合它的本意。

第三，集体屠杀主要发生于乡村一级的农村地区。这与“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如针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运动，以及大多发生在城市的派系武斗形成鲜明对照。由上而下扩散的设想不适用于集体屠杀。这意味着当城市的阶级斗争语言向下传播时，在乡村以极端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很可能是由于国家没有办法让基层官僚对他们的行为负责。这种解释得到了另一个证据的支持——越是贫穷的边远地区，越有可能发生集体屠杀。

第四，施害者是地方官员及其群众追随者（例如民兵），这说明“文革”期间集体屠杀具有政治性质。

从上述归纳中能得出哪些认识？它们能够解释清楚国家在集体屠杀中的作用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里不妨简要说明一下我对中国政府的认识，它一直引导着我的这项研究。

我把中国政府分为三个层次——中央、省级和地方一级（包括县、公社和大队）。北京的中央政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这是它当时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何建立地方政府，解散群众运动——时喜欢采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集体屠杀的倡导者，至少它对集体屠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正如政策语言所示，中央也认为地方的极端暴力现象是局势混乱的标志。就此而言，集体屠杀的发生表明“文革”时期中央政府无力左右地方官员的行为。

省政府，特别是两广的政府，在对付城里的群众反对派时，有将阶级斗争的宣传升级的动机。当面对严重的挑战时，省级政府也许比中央更愿意使用暴力。事实上，集体屠杀的高潮恰恰发生在各省利用中共中央 7 月发布两项指示镇压群体反对派之时。然而，现在无法弄清楚的是，公社和村庄发生的大量杀人行为多是针对没有组织的“四类分子”，这是否就有助于镇压城市的反对派？或许可以合理地认为，除了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外，它没有多少直接的帮助。换言之，省政府也把发生村一级的集体屠杀视为胡作非为，这标志着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

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县、公社和大队）显然是集体屠杀的直接策动者，虽然不清楚它们的动机是什么。它们也许曲解了上面传达的政策，遵命行事的热情过了头；地方政府也许把恐怖当作巩固自己地方权柄的现成手段。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暴行是地方干部及其同伙所为。正式的公检法系统已陷于瘫痪，为暴力找借口易如反掌，在这种时候，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和偏远地区的官员，可以任意胡为而不受任何约束。

所以，假如不把国家视为统一的整体，而是视为一个各级行动者的组合体，那么集体屠杀就不单是国家的鼓励或国家权力的失灵造成的，而是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文革”中期集体屠杀的悲剧，其根源即在于这种国家鼓励和国家权力失灵形成的悖论。

多年来，对“文革”期间群众运动的研究，一直受到一些试图找出“造反派”的利益群体基础的著述的主导。〔８２〕这种研究忽略了“文革”的两个重要特点：暴力和国家对暴力的鼓励。暴力源于“挖出隐藏的敌人”这种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早先的学者经常绕开这个教条及其导致的暴力行为。他们的研究更加关注当事人的暴力行为背后的利益和理念。然而 Walder 提醒我们说，“无论从参与者、旁观者还是受害者的经历看，他们现在普遍认为不应（把“文革”）理解为对抽象理想的追求，而是要还其本来面目：由国家策动的史无前例的迫害浪潮、酷刑、派系武斗和肆意施暴”〔８３〕。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体制内的所有行动者都忠心拥护这一斯大林主义教条。他们赞成还是反对现状在这时无关紧要。从这个角度说，某些中国学者近年对“文革”中“民主”因素的讨论具有误导性。〔８４〕

政治迫害和残酷镇压对手的方式非但没有促进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反而对它的任何表现都起着破坏作用。“假如‘文革’其实是对平等理念的追求，是一种民主形式或就国家政策开展的辩论，那么它为何采取寻找隐藏的叛徒敌人的做法？假如‘文革’的激进主义是理性的利益集团在从事活动时用来遮人耳目的借口，这些理性的行动者为何对自己的借口十分当真，要对另一些激进的工人学生进行攻讦污蔑和大动干戈，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８５〕

在这项研究中，我首先要解释的便是“文革”暴力中这种令人困惑的特点。我希望从国家体制和政治行动者中找出一种解释。

这使我们看到了“文革”的第二个明确特征：国家对暴力的鼓励。以往的研究往往专注于原有的社会分化，把它视为群体运动的动力。然而如我所说，不但国家通过政策的宣示引导着政治运动，地方干部也把政策内容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由此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本文考察的大规模暴力。为了对“文革”的这一重要特点做出正确判断，有必要把分析的重点转向国家体制和政治行动者。

〔作者说明〕本项研究得到了 Stanfor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Littlefield Dissertation Fellowship 的资助，Social Science History Institut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为我提供了访学资助。部分数据来自 Andrew W

alder 主持的一个更大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得到了 Henry R.Luce Fo
undation 和 Stanford University 的OTL Research Inc
entive Fund 及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的资助
。本文的原文是英文，标题是“Mass Killings in the Cul
tural Revolution: A Study of Three Provinces
”。其初稿曾于２００３年提交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召开的“San Diego-Stanf
ord Conference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在
此对与会者的评论和友情致谢。英文论文已收入 The Cultural Revol
ution as History, edited by Joseph W.Esherick
, Paul G.Pickowicz and Andrew G.Wal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6。作
者感谢 Andrew Walder, Doug McAdam, Susan Olzak
, Junling Ma, Dorothy Solinger 和 Wang Feng
等人给予的支持帮助，也感谢 Joseph Esherick 和 Sigrid Sc
hmalzer 的编辑工作。

〔编者说明〕本文的中文稿系张建黎译，译稿未经作者审阅。

注释：

〔１〕王友琴，“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７－３６页；王友琴，“打老师与打学生之间”，同上，３７－４８页。
〔２〕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lizabeth J.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载于者永平编，《那个时代中的我们》（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９８－４０４页。
〔４〕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香港），分４次刊于２００１年第７、８、９、１２期。
〔５〕郑义，《红色纪念碑》（台北：华视文化公司，１９９３）；Donald S.Sutton,“Consuming Counterrevolution: The Ritual and Culture of Cannibalism in Wuxuan, Guangxi, China, May to July 1968”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7, No.1 (1995): 136-172.
〔６〕宋永毅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２００２）。
〔７〕更详细的讨论见 Andrew G.Walder and Yang S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China Qu

arterly 173 (March 2003): 74-99.
〔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２日，载 Song Yongyi (ed.)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ababase (CD Ro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Research Services Center, 2002.
〔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１９４９－１９９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对数据搜集的说明见 Yang Su,“Tumult From Within: State Bureaucrats and Chinese Mass Movements, 1966-1971”(Ph.D.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3); and Walder and S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１１〕对１，４００多个县的分析表明，受害人（受迫害、受伤和死亡）的数字同县志中记述“文革”的篇幅有关。较之１２个县的另一些资料，伤亡人数低报了很多。参见 Walder and S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94, Table 10.
〔１２〕Benjamin Valentino, Final Solutions: 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Twenti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0.
〔１３〕这里的几段文字引自《全州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７页。
〔１４〕《全州县志》，１４７页。
〔１５〕《全州县志》，５６５页。
〔１６〕《临桂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１９９６)，４９２页。
〔１７〕《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１９页。
〔１８〕《蒙山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７页。
〔１９〕《横县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９页。
〔２０〕《田林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５５５页。
〔２１〕这１５个县包括全州、武鸣、临桂、都安、天等、陆川、罗城、马山、灵川、宜山、柳江、崇左和鹿寨等。
〔２２〕《武鸣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０页。
〔２３〕这６个县是阳春、五华、梅县、廉江、广宁和连县。
〔２４〕在３个省中，湖北县志中记载“文革”的平均篇幅最少。
〔２５〕《咸丰县志》(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４－２５页。
〔２６〕张连和，“五进马村”；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载宋永毅编，《“文革”大屠杀》，１３－３６页。
〔２７〕中央分别于１９６８年7月３日和２４日下发文件，要求群众组织自行解散，对武力反抗者将予以惩罚。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上册。
〔２８〕《广西“文革”大事年表》，１０４－１１１页。
〔２９〕丁抒，“风雨如磐的日子：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运动”，载《华夏

文摘》３４３期（２００３年增刊），１－１４页（网络版见http：//www.cnd.org）； Andrew Walder,“Anatomy of an Inquisition: Cleansing the Class Ranks, 1968-1971”，提交“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6 July 1996)的论文； Walder and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３０〕曲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曲江县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３６页。

〔３１〕《信宜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５２页。

〔３２〕《成海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５７页。

〔３３〕《化州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６５页。

〔３４〕这里不包括湖北各县，因为该省后来几乎未发生集体屠杀。

〔３５〕临桂县的数字见《临桂县志》(１９９６)，４９２页。

〔３６〕宾阳县的数字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１９９５)，１１１页。

〔３７〕零陵地区的数字见章成,“道县大屠杀”，２００１。

〔３８〕《广西“文革”大事年表》，１１７页。

〔３９〕参见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２００１年7月号，７１页；８月号，７７页；９月号，６１页；郑义,《红色纪念碑》，４８页。

〔４０〕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２００１年7月号，７１页。

〔４１〕《广西”文革”大事年表》，５３页。

〔４２〕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２００１年8月号，８２页。

〔４３〕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２００５年7月号，７５页。

〔４４〕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２００１年7月号，７３页。

〔４５〕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２００１年8月号，８１－８３页；郑义,《红色纪念碑》，２３－２７页。

〔４６〕《广西”文革”大事年表》，１３２页。

〔４７〕Stig Thogersen and Soren Clausen,”New Reflections in the Mirror: Local Chinese Gazetteers (Difangzhi) in the 1980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 (January 1992), 161-84; Eduard B.Vermeer,”New County Histories: A Research Note on Their Compilation and Value“, Modern China 18 (October 1992), 438-67.

〔４８〕Walder and S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81, Table 1.

〔４９〕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８６－１０８页。

〔５０〕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５１〕徐友渔认为，江西发生的政治事件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尽管该省不属于边远地区。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１００－１０８页。

〔５２〕《广西“文革”大事年表》６１－６３页、７１页、７５页。

〔５３〕Barbara Harff,”No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Holocaust? Assessing Risks of Genocide

and Political Mass Murder since 195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97, 1 (February 2003), 57-73.

〔５４〕Walder and S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５５〕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181.

〔５６〕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人民日报》１９６９年10月６日，转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３７３页。

〔５７〕《广西“文革”大事年表》，１１８－１２１页。

〔５８〕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出版社，１９７２）。

〔５９〕出处同上。

〔６０〕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６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１９６８年元旦社论”，转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３页。

〔６２〕出处同上，第４页。

〔６３〕中共中央委员会等，“关于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深挖叛徒工作会议纪要’的批示”，１９６８年2月5日，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页。

〔６４〕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１２６－１３０页。

〔６５〕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196-197.

〔６６〕这场运动有别于名称相似的“一打三反”运动，它发生在很多县。参见《郧西县志》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第２８页。

〔６７〕《广西“文革”大事年表》，９６－９９页。

〔６８〕闻于樵，“‘文革’七·二五讲话不仅仅是广西造反组织的终结”，《华夏文摘》２８７期（２００３年增刊）。网络版见www. cnd. org／cr。

〔６９〕《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５３页。

〔７０〕“区”是介于县和公社之间的一级行政单位。

〔７１〕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２００１年7月号，６８页。

〔７２〕中共中央委员会，“转发北京党委的重要通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０日。转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１６３页。

〔７３〕《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册。

〔７４〕 汉语中的“乱”字有多重含义，它即指无序、杂乱或混乱，也指违法乱纪行为，尤其是对抗政府或未经授权的行为。

〔７５〕《广西“文革”大事年表》，５８－１２７页。

〔７６〕张连和，“五进马村”。

〔７７〕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号，７１页。

〔７８〕谢富治１９６８年5月１５日的讲话，转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１１９－１２０页。

〔７９〕谢富治，１９６７年8月７日，转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

５３０页。
〔８０〕中共中央委员会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９日转发的清华大学报告，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２７５－２８１页。
〔８１〕同上，２８１－２８３页。
〔８２〕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2);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China Quarterly 83 (Sep., 1980), 397-446;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印红标，"'文革'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２３１－２４８页；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新派系成因"，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１９１－２０８页。
〔８３〕Andrew G.Walder, "Cultural Revolution Radicalism: Variations on a Stalinist Theme",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Joseph, W., C.W.Wong and David Zwei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1-62, 42.
〔８４〕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载《中国与世界》，１９９７年２月；郑义，"两个'文革'刍议"，《华夏文摘》８３期（１９９７年增刊），１－１４页，网络版见 http: //cnd.org)。
〔８５〕Walder, "Cultural Revolution Radicalism", 42

２００６·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

徐友渔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４０周年、结束３０周年之际，“２００６·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２００６年3月２４—２６日举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与会者共１６人。他们是：郝建、崔卫平、徐友渔、丁东、唐少杰、徐海亮、吴迪、叶维丽、邢小群、陈家琪、何蜀、陈东林、沈迈克、魏光奇、赵诚、吴小龙，还有其他文革研究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由北京学者郝建倡议，与崔卫平、丁东、徐友渔共同邀集。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结合论文宣读和专题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和学术界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上面，进行自由发言和无拘束的讨论。研讨会分为４个单元进行，第一个单元循一般学术会议惯例，由与会者宣读论文；其后３个单元分别研讨精心选择的论题：评价文革的标准、“两个文革”说与造反派研究、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

第一单元以徐友渔和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介绍国内外文革研究的情况开始。徐友渔在题为“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概述了从１９６７年至今中国人——观察家、评论家、学者、民间思想者、官方理论家等等——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中国大陆几家刊物在１０年前开辟有关文革的言路以及受到的挫折和打压，２００６年海外有关西藏文革书籍的出版情况。他特别指出，由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大学服务中心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致从２１世纪初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

沈迈克以熟练地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资料丰富和考据缜密而在文革研究者中享有较高声誉，他和麦克法夸尔用１０年的时间反复修改合著的一本长达７００页左右的文革史著作即将在今年8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毛的最后一场革命》，计划将成为西方一些大学的教科书。他介绍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机构，文革研究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研究资料的来源（当时的官方的宣传品、各种群众组织小报、对从广东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份子的采访、驻华外交机构的报告等等）和其他一些情况。他指出，当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者，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文革的兴趣急剧下降，转而研究当代中国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现在，文革学在西方已经成为冷门。

叶维丽的发言题目是“卞仲芸之死”，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芸被本校学生毒打致死一事，王友琴已有充分的调查和记录，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叶维丽（文革时是师大女附中初三学生）力图把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发动”这个

概念中来理解。毛泽东是８月初从外地回到北京的，这时市、区一级领导已经瘫痪，那段时间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非同寻常的上下ｒｅａｃｔｉｏｎ（互动），卞仲芸校长死于８月１５号，正处于文革再次发动的关节点，其含义值得深思。她还谈到了暴力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和意义。

陈东林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认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应当问一下，为什么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苏联却没有？他认为文革的发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模仿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尝试，带有探索和改革的意义，虽然因为错误的手段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可以说，文革对改革产生了以下的三方面催生作用：一、文革否定了文革前１７年僵化的社会传统阶级结构，用意识形态——"路线"来代替个人成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有较大解释的思想空间；二、批斗党内"走资派"，冲击了个人崇拜，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当权者脱离人民的体制弊病，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三、提倡怀疑一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催生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参政意识。

何蜀的论文是"'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包括以下各方面内容：最早出现的官办"保守派"组织；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崛起；工厂等部门的"保守派"组织；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机关干部及其他部门的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的分化；"保守派"组织退出历史舞台；"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造反、夺权期间的外地赴渝红卫兵；造反、夺权期间的群众组织小报；"镇反"与群众组织的重新组合；"红五条"前后两大派再次重新组合；两大派在全面内战中的重组和演变；两大派全面内战中的报纸、广播；"文革"群众组织的末路；重庆与成都群众组织的比较；"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论文还有附录："重庆市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看得出来，这么丰富的内容，实际上相当于一部涉及四川文革史的"简明重庆文革史"。人们知道，２００４年有人根据对一位重庆前群众组织领袖的采访而发表"重庆文革口述史"，引起很大争议，何蜀也是批评者之一，与会者认为他在争鸣之中撰写的论著对于研究重庆地区的文革历程会大有助益。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关于评价文革的标准，首先由丁东作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的发言，介绍相关背景。他说，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当时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但今天回头看，也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把毛泽东的责任归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四、不能正视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有一些学者跳出体制，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价值准绳，从反思极权主义的思路出发，对文革有既不同于毛泽东，也不同于邓小平的理解。

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其实不是先定了标准再评价，而是说人们有了评价的意见，他才会反过来从里面发现自己的评价标；文革评价必然带有片面性，只能是选取一两个角度，任何一个评价不可能是多角度的，不同角度的评价应该互补、应该兼容；评价还会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会不一样，同一个评价者不同的时代评价也会不一样。文革实际上是一个谋利的运动，都是在争利，它把利益，每个人的也好，集团的也好，给涂上神圣的光环，革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其实为的是各种利益，比如说街道有的为什么斗得厉害，实际上是因为房子，农村是因为有的家族势力在那里争，等等。

有学者表示，要把当时比较时髦的说法倒过来说。原来是说，一、毛泽东错误地判断形势；二、被野心家利用；三、全国人民遭灾；其实毛泽东非常清醒。毛泽东去世以后，文革结束以后，党的所谓路线的执行，证明他原先的担心没错。唯一错的是对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怎么看，他没想到中国老百姓其实欢迎这些东西。

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试验，它完全属于现代性的范畴，从群众的发动到上层建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到教育革命，到“五·七道路”、“赤脚医生”，再到城乡、工农、体脑差别的消灭，等等，说明毛确实是想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之路。

不止一位学者说，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官方始终用一个标准，叫做认识标准，说他对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头估计错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官方是特意回避了，即是道德标准。哪怕我们违反事实退一步说，假定毛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就算应该打倒他，你总不能够明知道刘少奇在开封那种惨死你还要那样做。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认识标准的话，那实际上是可以原谅的，什么都是认识错误，认识错误既没有法律的责任也没有道德的责任。现在我们评价毛泽东和评价文化革命的时候，哪怕我们在很多事实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应该问：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整得那么惨？就算我们不否定他有一个理想，就算承认毛泽东有一个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社会实验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有没有权利去搞这种政治清洗运动，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来进行你的共产主义实验？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人搞成下乡知识青年，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受那种苦？

第三单元讨论“两个文革”说与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评价，所谓两个文革，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徐友渔在背景介绍发言中说，据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１９８１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白霖等西方学者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利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

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在１９９６年纪念文革发动３０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２００６年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他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北京学者刘自立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人民文革’说驳难”，坚持认为“只有一个文革”。

一位学者的书面发言题目是“‘三年文革’说不能成立”，其背景是：关于文革的时间，有“３年文革说”和“１０年文革说”的对立，而“３年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是一致的。这个说法起源于陈佩华１９９０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众政治对立，人民起来造反的3年，“１０年文革说”是官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文革观点的表现。这个发言的根本是主张：３年，指的是民众造反；１０年，说的是毛泽东的文革，不能把3年造反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一位学者借助于坦诚、深入剖析自己为什么走进了文革的心路历程来说明大学生造反的动因。刺激青年思想的时代因素有：苏共２０大批判斯大林和中苏两党的分裂、彭德怀事件、两次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等等。从当时一些大学红卫兵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运动初期的大学造反潮流里，充斥着三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思想流派，以当年的话语来说，就是追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潮流，追求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潮流，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里游民、市民精神思想潮流的合流。

有学者觉得，“人民文革”是一个比较意识形态的提法，比如说我们很多事都是以人民的名义怎么样，那么民意就是真理了，就是可以压倒一切了，或者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其实不存在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的正当性都是需要和他人的正当性处于对话当中。尤其是自我反省。针对这一点，另外有人表示，假如不用“人民文革”，而用“百姓的文革”或者“下层的文革”，这个意识形态的意味就没有了。

有学者追问“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民文革？”认为有的人站在一相情愿理解的角度上，说毛当时确实有意让群众来冲一下这官僚制度，冲击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等等，其实是做了过多的善意的理解，其实毛在发动群众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你们不得有任何损害我的权威的事，也不得有任何触及这个制度的行为。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学者基本上都不赞成“两个文革”说，但他们并不想形成一面倒的意见，而是积极考虑对立观点。有人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写到的刘凤翔，他地位曾经很高，５０年代是湖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被打成右派，他对这个体制可以说看得彻底清楚，他想从文化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发动起来了，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也砸烂了，就给人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就联络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

非常自觉地既要改变他们右派的命运，又要改变中国当时那种专制制度。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他们起来造反，利用
江青等人的支持，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把全国总工会砸烂，他们内心是想改变当时的一些规章，甚至制度，他们几乎全部家庭出身不好，他们跟共产党员、积极分子造反不一样，他们确实是处在５０、６０年代那种阶级敌人、或者阶级敌人的后代的地位，他们是要改变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就绝对概括不了这个事实。

第4个单元的发言围绕“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进行。首先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3个时期，即文革前１７年、文革１０年和文革后到今天２８年的关系？官方的研究更多的是从１７年来看待１０年，他们否定１０年或者否定文革，理由是因为和１７年对立，其实１０年必然从１７年而来，１７年和１０年的关系非常微妙，就是说文革怎么爆发的，和１７年的关系是什么？再有一个维度就是现在这２８年，从否定文革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个２８年，实际上是文革所带来的走向现代化的对以前的一个反拨，这个２８年和前面的两个时期的关系非常有意思。还有学者指出，对比苏联，对比法国大革命研究文革，很有意思，很有必要，一定能开阔我们的思路和视野，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本单元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关系。首先要注意的是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４０年过去了，当年１０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５０多岁，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８０、９０岁，再不抢救，历史就要被带进棺材。但口述史的问题也很多：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使口述史的真实程度受到怀疑。这就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有学者补充说，有3种情况造成问题，一种是整理的人比较内行，但是口述者限于特殊身份和思想局限，很多该说的没有说，好多重要的事都没有讲，回避了；还有是一种整理的人太外行，整理出来错误百出，另外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双方都想借口述史来投机，他们互相利用。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把口述史和某些回忆录作比较很有意思，在当今大陆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有学者认为，尽管口述史有不可靠的危险，但我们不能弃而不用，达到信史，固然是很好的，但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语境下，以认真态度整理出来的口述史，发表出来进入公共视野，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有总比无好，即使不准确，不到位，发表出来引起争论，也可以推动文革研究。

一些与会者注意到在中国大陆近年来肯定文革的思潮出现了升温的趋向，大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和分析。

文革博物馆筹建的现状与趋势

——将“文革文化”视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朱健国

时值“文革发动四十周年”、“文革结束三十周年”，本文拟通过对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２０年的四个阶段、“巴金‘文博’模式”的功与过、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雏形）困境、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的历史经验、四川大邑樊建川文革博物馆的“声东击西”、南街村“模拟文革生活”的隐喻等经典事件的实证分析，探讨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的现状与趋势，倡导将“文革文化”视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新观念，纪念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２０周年。

一、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２０年的四个阶段

“文革”结束后有不少人想过、议论过建立“文革”博物馆，如上海杂文家林放先生；但影响最大的公开提议者，还是巴金——１９８６年6月上旬，巴金在林放的推动下撰写《“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顿时“天下风走而响应”，建立“文革”博物馆从此成为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因此，２００６年6月，可算是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２０周年纪念月——２００６年，不仅仅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不仅仅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也是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２０年周年——虽然至今中国大陆还没有建成一座完整的真正的“文革”博物馆，但已有了数以千计的形形色色的“文革”博物馆雏形（每一个文革文物交易市场或文革文物收藏商店，都可以算得一种变相的“文革”博物馆。）

粗略地概括，２０年来，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可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８６年６月至１９８９年６月，这三年是公开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纸上谈兵”阶段；其高潮是巴金《“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在潘际炯主编的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发表，范用将《随想录》“出口转内销”，１９８７年在大陆出版发行，众议沸腾。

１９８９年7月到１９９２年2月，是“文革”博物馆倡议“冬眠期”3年，其标志性事件是，“文革”博物馆倡议者巴金又开始屈服权势，一面对文革遗风的“六四暴行”一言不发；一面在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巴金选集《讲真话的书》时，默认其删除《“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一文；将“讲真话”的时间全部浪费于编辑至少有一半假话的《巴金全集》。

１９９２年3月到１９９９年，在“邓小平南巡”的“放松”下，“文革”博物馆筹建向“市场化突围”的7年，进入“文革文物收藏市场化阶段”。其标志是全国文革文物收藏家（商人）达５０００多人，文革文物收藏者逾７０００万人，文革物品身价倍增，文革文物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交易网络，文革文物收藏热与日俱增。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６年，是“文革”博物馆初具雏形阶段的６年。其代表是广东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四川大邑樊建川文革博物馆、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河南南街村（有人称南街村为“模拟文革生活村”）等“民间文革博物馆”相继形成规模公开问世，被官方传媒公开报道。

细品这一阶段“文革”博物馆，其类型有：家庭收藏型、商业收藏型、企业广告型、旅游公园型、遗址纪念型、文革生活模拟型、文物市场型、网博型等。这些类型中绝大多数是以“批判文革”为目的，也有少数是意在欣赏、怀念文革，如南街村“模拟文革生活村”。

其趋势是：“文革”博物馆从幻想官办走向自主民办，从学院精英研究走向大众市场化；文革文化从垃圾升为文物、从回忆口述走向文物实证，从“人自为战”走向“协同合作”，从政治意识形态走向人类文化遗产。其主办者类型有：学者、退休干部、民营企业家、个体户、市民、农民。

其新观念有：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创办者彭启安呼吁建立文革学，在高中和大学设立“文革学”课程——包括“文革史”、“文革文物收藏学”、“文革文艺学”、“文革”图书版本学、“文革”研究新成果、“文革”博物馆工程学（设计与工艺）、“文革”博物馆管理学等（已开始与汕头大学商洽），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创办者刘宗秀提议申请“文革文化”为人类文化遗产，将“文革文化”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并建议在香港建立一个大规模、高规格、深层次的“文革”博物馆；只有突破扬弃“巴金‘文博’模式”，“文革”博物馆才能真正以新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将“文革文化”视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早在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旅美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就撰写了论文《文化：反省文革的一个角度》，希望大家注意：“‘文革’的成因，应该用一个时下很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即‘多元’的。‘多元’似乎常被当作‘多样’使用，但更确切的意思应是‘多原因’的，由多个相对独立的自变量决定的。……本文试图分析其中的一个部分，即文化的原因。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卷入‘文革’的大多数人的一种观念系统及心理状况。”但深圳的刘宗秀先生认为，还可从更高的层次用文化来界定文革，树立一个新观念：将“文革文化”视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筹办人刘宗秀是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局级退休干部，他是一个从１９５０年代就开始收藏“毛文化”（毛泽东文化）的文革史料收藏家，他认为真正说起来，文革的历史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文革实际上是从１９５５年“反胡风”、“反右”运动开始。分析刘宗秀的想法，似乎说，因为文革的本质是专制者运用大民主手段维护专制，是皇帝发动臣民用民主方式进行的“保皇”运动。从这一角度看去，“反胡风”、反右运动也是一场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圣旨特许下的民主方式”开展的“保皇”文化运动，１９５７年的“帮助党整风”和“反右”，是“未遂文革”或“文革序幕”。

２００６年3月３１日，刘宗秀在与彭启安会师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后，对记者说：我觉得要真正建好“文革博物馆”，还必须突破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将文革只看

成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产物，文革的本质是一种华夏专制文化之集大成。对文革的研究，要更多地从中华文化专制传统的角度去挖掘。为了有利于全面永久地研究文革文化，我建议：将“文革文化”视为一种“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保护。一旦大家视“文革文化”为“人类文化遗产”，“文革文化”就从政治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了，通过压制“文革文化”和揭露“文革文化”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就可能大大缓和，走向共识。这样才有利于迅速建设更多的“文革博物馆”，更加真实地研究文革。

论者认为刘宗秀心中“文革文化”可能有六大基本构成——

（１）“毛文化”：毛泽东专制思想。毛泽东专制思想的核心来源于东西方专制文化传统，是由“秦始皇焚书坑儒传统”和“斯大林残酷肃反经验”所组成。这二者形成了毛泽东深爱“皇帝发动臣民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方式进行‘保皇’运动”的独特思想。

（２）深深打上江青个性的文革文艺作品，如八个“样板戏”。“样板戏”虽然充满宗教性的政治说教与套话，主观动机是为其专制政治服务，但其将现代音乐艺术与传统京剧音乐结合的改革，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文艺新品种，为人类的艺术百花园增添了一枝新花草。

（３）文革的民间文化——地下诗抄、大字报、造反传单、文革日记、文革标语口号、文革专用词汇等，皆是人类语言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新创造，文革的民间文化一旦离开文革恐怖时空，就具有永久地珍藏、研究、鉴赏与利用价值。

（４）文革斗争手段是人类自杀文化的一种新方式，其“批判大会”、“批判小会”、“游街”、“武斗”、“文攻武卫”、“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形式，创造了人类除战争之外自相残杀的新模式，提供了研究人性的新边疆。

（５）文革的组织形式——各种“文革领导小组”、“红卫兵”、“战斗队”、“联络站”、“兵团”“造反派”、“保皇派”、“革命委员会”、“工宣队”、“贫宣队”、“工农兵大学”等，皆是人类组织文化的新发现。

（６）文革遗址是文革的重要空间——文革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址，如毛泽东接见千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上海“一月夺权风暴”集会地，广西武斗、人吃人之发生地、文革庐山会议厅等。让后人可亲临这些“文革空间”，是丰富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宝贵文化资源。

目前大陆“文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大的困难是：１、观念滞后，政治误解和专制机制使之成为“黑事业”和“半地下工程”；２、“文革”博物馆管理人才亟缺，“文革”研究人才可能断代；３、没有合法资金链和融资渠道。４、许多天灾和人祸正在严重危及“文革文物”和“文革文化”。

所谓天灾，就是许多自然灾害在毁灭未能得到及时保护的“文革文化”遗址、遗

物，包括一些文革亲历者、研究者被生活困境和疾病夺去生命。

“人祸”则有两种，一是中国的专制机制在顽固地禁止研究“文革文化”，禁止建立各类“文革博物馆”。二是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申请办法落后于形势。

联合国是先想到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后才意识到保护“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自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国的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黄山、泰山等３１处被列入“世界物质遗产”名录，仅次于西班牙、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三位。而“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直到２０００年，联合国才启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保护工作。２００１年５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入选的１９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只有“百戏之源”的昆曲艺术名列其中。２００２年底，虽然一个名为《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在北京召开，宣称中国从当年起正式启动大规模“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计划在５年内初见成效，但一直无人想到将中国“文革文化”列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人类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共同继承的文化及自然遗产，它包括亿万年的地球史上，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地带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文革文化”正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而今，如何突破一些人将“文革文化”全部视为一无是处的“专制政治垃圾”旧观念，突破联合国规定“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两年公布一批，每一个成员国每次只能正式申报一个项目的因循守旧法则，是最终让“文革文化”成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关键。

当今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年轻的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它是在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间，用三年多时间在一片荒野上建造起来的新首都。城里不见古迹遗址，也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与喧闹，但其充满现代理念的城市格局、构思新颖别致的建筑以及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使这座新都蜚声世界。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７日，巴西利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与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相比，深藏万象、不可重复的中国“文革文化”，难道不是更有理由成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大陆“文革”博物馆在近年进入实质性操作，取得公开问世的初步成绩，固然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大陆人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从根本上突破“巴金‘文博’模式”的结果。

三、“巴金‘文博’模式”的功与过

很多人都知道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但不知巴金心中的“文革”博物馆是什么框架。正是这一“不知道”，使大陆“文革”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２０年仍然处于刚刚起步。因此，要想加快大陆各地“文革”博物馆建设，必须首先搞明白巴金心中的“文革”博物馆是什么模式，这一“巴金‘文博’模式”将指向何处，其功过何在。

史料证明，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基础是他一家在“十年文革”中受到悲惨折磨，特别是爱妻萧珊１９７３年1月１６日因文革而得不到及时治疗病逝，而重要推动者则是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炯、《新民晚报》总编辑、杂文家赵超构和北京出版家范用。

让我们通过“巴金‘文博’模式”的产生过程、“巴金‘文博’模式”的内涵与误区、“巴金‘文博’模式”的传播与退缩，来看看“巴金‘文博’模式”的功与过。

１、“巴金‘文博’模式”的产生过程。

只有首先弄清楚“巴金‘文博’模式”的产生过程，才可能明白“巴金‘文博’模式”的先天局限。“巴金‘文博’模式”的产生过程大约有四步：（１）“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观念源于“邓小平理论”，到死也不敢突破“邓小平理论”的误区与局限；（２）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炯向巴金提供自由思想《随想录》园地；（３）“怀念萧珊”让巴金开始“回忆文革”；（４）林放（赵超构）第一个逼巴金“说真话”；（５）杂文家林放（赵超构）在推动巴金以“说真话”为晚年生活目标后，又启示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

（１）“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观念源于“邓小平理论”——根据邓小平思想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是“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指南和产生背景。

１９４９年以来，巴金的文艺创作和言行准则一直是完全遵照中共“最高指示”：文革前以毛泽东思想为圣旨，文革后又对“邓小平理论”全盘接受，深信不疑。

巴金在１９７８年１2月1日一面开始写《随想录》，一面又大力歌颂“邓小平理论”。如，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１日，巴金在《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说：“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勇气更多了。……这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说：‘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其时，巴金的《随想录》只能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不能在大陆发表，但巴金丝毫没有因此怀疑“邓小平理论”是否真诚和有效。

１９８１年6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根据邓小平思想而起草的，其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表达了邓小平既要全盘否定文革，又要以“三七开”保护毛泽东，维持中共传统体制的“小改小补”之“改革开放”。“巴金‘文博’模式”就是一个完全囿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遵命建议”。

《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要点是——

１）文革的主要责任在于林彪、江青“四人帮”，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根

本联系，与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没有联系——“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份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内难。”“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2）文革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3）知识分子无罪——“‘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4）“造反派”不可饶恕——“‘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5）文革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A、全党有责任——“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B、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有责任——“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

C、党中央有责任——“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 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 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D、中华文化传统有责任——“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

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　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稍有独立思想者都可以明白，文革其实有“两个文革”，早期受压迫平民或“阶级敌人”的“造反”，是一次有限思想解放，应予深入研究，重新评价。“全盘否定文革”只能有利于坚持专制。说文革的主要责任在于林彪、江青“四人帮”，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根本联系，与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没有联系，更是一种丢卒保车的自欺欺人。

近年已有一些专家“英雄所见略同”：文革绝不止十年，至少已有二十年——旅美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新近说：“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深圳刘宗秀更认为，文革的历史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文革实际上是从１９５５年“反胡风反党集团”开始，因为文革的本质是专制者运用大民主手段维护专制，是皇帝发动老百姓用民主方式进行的“保皇”运动。从这一角度看去，反右运动也是一场“保皇”运动——建国后，毛就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将曾与自己平等的刘少奇、周恩来等政治局常委都视为皇帝下面的大臣，毛在１９５７年发动人们“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并不包括他自己，毛从１９４９年后就将自己视为党中央之上的“皇帝”。因此，“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四清，皆是与文革一脉相承的“皇帝发动老百姓用民主方式进行的‘保皇’运动”。

但巴金《随想录》中却充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一致的议论，“巴金‘文博’模式”一步也没有越出“党中央的决议”。巴金虽然曾一度提议建“文革博物馆”，但是，他从未真正批判文革的病根。他之所以批文革，不过因为文革让他个人和家庭吃了一些苦，让他失去了始终一帆风顺做“不倒翁”的好命运，他从来没有把文革和社会主义体制相联系，从来没有把文革和批胡风、反右相联系，更没有把文革和延安时代的王实味事件和三十年代上海的周扬左联事件相联系。他看不到文革与现有的执政制度根深蒂固的关联，他把文革看成一个偶然失误，一个无须进行政治改革就可永远杜绝的错误。设计在这样基础上的“文革博物馆”，纵然建立了，又岂能阻止文革再来？幻想！

他曾一面提议建“文博”，一面又大言不惭地宣称：“所以我重读旧作，并不脸红，我没有发违心之论。”

又说：“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去文革中的１０年）”。

在巴金心里，建国１７年他那些歌颂反右、大跃进的文章和小说，都是真心真情，都是至今不脸红，依然值得收入全集的佳作，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其心中的“文革博物馆”和大众心中的“文革博物馆”也就完全两样，“巴金‘文博’模式”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文革博物馆”了。

历史将愈来愈放大“巴金‘文博’模式”谬误。

这在下面的进一步分析中可以清清楚楚。

（２）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炯向巴金提供自由思想《随想录》园地。

如果没有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炯从１９７８年5月开始向巴金提供《随想录》园地，不给巴金一个比大陆宽松的言论园地，巴金就不可能由“怀念萧珊”到“说真话”，最后进入到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

巴金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中说明了这一重要史实——朋友潘际炯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炯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敬，高呼“万岁!”可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沉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做武器进行战斗。

（３）“怀念萧珊”让巴金开始“回忆文革”。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日，巴金在《〈随想录〉总序》　中说，自己《随想录》开始并没有计划反思文革，只是想沿着毛泽东思想进行文艺“百家争鸣”——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所以巴金同日写的《谈望乡——〈随想录〉》，只是谈对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放映的感想——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

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但１９７９年1月，社会上忽然有了一个谣传："巴金要结婚"，这就逼着巴金在１９７９年1月7日写《结婚——〈随想录〉四》后，于１９７９年1月２２日写了《怀念萧珊》，由此打开了巴金的文革回忆。如果没有"巴金要结婚"的谣传，巴金的《随想录》是否会马上进入《怀念萧珊》之"文革回忆"，恐怕还很难说。因此，我们不可忽视"巴金要结婚"的谣传对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一点"助攻作用"。

巴金《怀念萧珊》第四节开头是这样说的——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４）林放（赵超构）第一个逼巴金"说真话"。

巴金从"怀念萧珊"进入"回忆文革"，从"回忆文革"进入"说真话"，这期间的关键人物是《新民晚报》总编辑、杂文家林放。

巴金明确宣言要以"说真话"为己任，时在１９８０年9月２０日，当日他写了《说真话——《随想录》四十九》。这与１９７９年1月２２日写《怀念萧珊》进入"回忆文革"，已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是谁促使巴金树立"说真话"大旗呢？

先看巴金自己的回忆。

巴金在《说真话——随想录四十九》中说，林放逼他"写真话"——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

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

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

文中巴金虽然没有说明"前任社长"是谁，但有旁人见证"前任社长"就是杂文家林放（赵超构）。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８日,《新民晚报》发表林伟平的回忆录《巴金与新民晚报》,其中透露了赵超构推动巴金“说真话”，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重要史料——那一天，巴老特别提醒我，提倡“说真话”的，不是他一个人，赵超构也是“说真话”的积极倡导者。巴老的话，让我一下子觉得两人友情之深。那也是在１９８０年,“文革”中被作为“封资修”毒草而“砸烂”的《新民晚报》，在胡耀邦总书记的指示下，积极筹备复刊。在那年八九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巴金和赵超构再次相逢。赵超构告诉巴金，《新民晚报》即将复刊，并约巴金在晚报复刊后写文章。巴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赵超构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不出题目”的约稿，是赵超构和老新民报的传统约稿方式。没想到一句“只要说真话就行”，竟让巴金夜不能寐，触动了反思“说假话”的神经。人代会结束后第十天，巴老写下了他的说真话宣言书《说真话》，接着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又写了《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赞同的，反对的，叫好的，骂娘的，都有。“说真话”成为当时全社会的话题。

巴金说真话的文章并没有交给赵超构。当时，《新民晚报》尚未复刊，而这些名为“随想录”的文章已约定给了香港《大公报》。然而，这并不影响有关说真话的话题成为两位知心朋友聊天通信时的经常话题，甚至，还在说真话问题上打起赌来。……

“打赌”当然只是精神上的，但两位老友的心却是更加相通。巴金在病中完成了关于说真话的其他多篇文章，而赵超构也冒着风险写下了一系列关于说真话的文章。两位老友不仅开出了不说假话的“支票”，而且在说真话问题上开始心心相印地“以文会友”。

巴金曾回忆起他与林放交往有半个世纪之久。抗战时，赵超构时任重庆《新民报》副总主笔，常常向巴金约稿，一同喝酒喝茶，“摆龙门阵”。共同的意趣使两人成为终身挚友。

（５）杂文家林放（赵超构）在推动巴金以“说真话”为晚年生活目标后，又启示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

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背景就是担心“文革再来一次”。而最早向巴金明确发出“文革可能再来一次”消息的是杂文家林放（赵超构）。

林伟平的回忆录《巴金与新民晚报》记载——……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赵超构写了许多呼吁在各个方面清除“文革”遗毒的文章。１９８２年3月２9日发表的《江东子弟今犹在》，口气更加坚决。……一年以后，赵超构和巴金同在华东医院住院。一天上午，赵超构从南楼来到巴金住的北楼。闲聊过后，巴金向赵超构提起恐吓电话的事，赵超构并不作答，只是微微一笑。……

１９８４年，巴金在病中写下《我的噩梦》。起因是，住在医院里，半夜经常做噩梦，惊恐挣扎着大叫。巴金说，自己噩梦做得最多的是在“文革”时期，还有就是“文革”以后。虽然“文革”结束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仍然噩梦不断。巴金说，并非

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巴金回忆了许多个噩梦……一段日子以后，赵超构看到了这篇文章。他显然非常能体会巴金的那种感受，在那一年的年尾，写下《“文革”还在揪人》一文，声援巴金。赵超构的这篇文章让巴金激动。巴金这样叙述说：……朋友把《“文革”还在揪人》这篇杂文给我寄来了，我的高兴是可以想像到的。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日，巴金在《纪念——随想录一四０》 中更细致地记述了“朋友”（林放）促使他想到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一次发生在医院里的谈话，这次谈话是由讨论一个“衙内”刑事犯罪案引起的——他（林放）说：“你放心，你我的孩子还没有做衙内的资格。那些衙内是‘受害者’，他们又害了别人，他们自己有责任，别人也有责任。不过我担心的倒是另一件事。那个时候我们开口闭口都是‘紧跟’，幸好只是口说而已，我们并没有‘紧跟’的机会，否则你我将作为‘四人帮’的爪牙遗臭万年了。想到这个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天天开纪念会，这也纪念，那也纪念，是不是也要开一个会纪念‘文革’二十周年或者庆祝‘四人帮’垮台十周年。为了不再做‘牛’，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站起来，挺起胸膛做一个人!”

正是林放一句“现在天天开纪念会，这也纪念，那也纪念，是不是也要开一个会纪念‘文革’二十周年”，使巴金想到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紧接着说——“不容易啊!”我摇摇头说。“有人说：‘我们应当忘记过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给‘文革’，有人想一笔勾销‘文革’，还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让‘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满身创伤，有人从‘文革’得到好处，至今还在重温旧梦，希望再有机会施展魔法，让人变‘牛’所以听见唱‘样板戏’有人连连鼓掌，有人却浑身战栗。拿我们来说，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从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０日，巴金撰写《说真话—— 《随想录》四十九》，到１９８６年４月１日，巴金在《纪念——随想录一四０》第一次说出“朋友”（林放）促使他想到建立“文革博物馆”，经历了五年半时间的酝酿——巴金“文博”模式历经五年半时间的孕育。

２、“巴金‘文博’模式”的内涵与误区

“巴金‘文博’模式”的内涵集中在他１９８６年６月写的三篇文章中，即《“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和其前后紧接的两篇文章：《官气——《随想录》一四四》，《二十年前——《随想录》一四六》。

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２日，巴金将刚完稿的《“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等三篇文章寄给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炯。《“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华彩段落”如下：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
灭。

……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 “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这篇２０５０字的文章可算是“巴金‘文博’模式”宣言，其中有几个要点——

Ａ：巴金提出“巴金‘文博’模式”时“并没有完备的计划”。

Ｂ：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D：“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巴金想到“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

E：“文革”博物馆，要“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F：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再从《官气——《随想录》一四四》、《二十年前——《随想录》一四六》两篇文章中可以补充几个要点——

G：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我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

H：文革只是“四人帮”造成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四人帮”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唯唯诺诺，早把“学术”抛在脑后了！

I：文革只有十年，文革之前很好——今天还有人在怀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错划”和“扩大化”还不曾开始的那些日子，“服务”并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变人为“牛”的魔法也尚未发明，在新社会里我受着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别人。

从这些要点中不难看出，巴金提出“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核心：其一，建立“文革”博物馆须要党和政府来批准；其二，巴金是以全盘否定“文革”的角度来建立“文革”博物馆；其三，巴金是以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待“文革”；其四，巴金认为“文革”只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文革”只有十年，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慈祥”、“亲切”型伟大领袖无关，与共产党、社会主义体制无关；其五，建立“文革”博物馆了就能阻止“文革”再来。

由此可见“巴金‘文博’模式”虽有发动国人建立“文革”博物馆“信号弹”之功，但也有让人们坐等“政府批准”，切断文革灾难的体制根源，像办现代文学馆那样办一个让现行体制认可的国家“文革”博物馆之误区。

这一误导在由巴金之弟李济生和巴金爱女李小林１９９６年4月合力编选的《巴金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中，比比皆是——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巴金在《除恶务尽》（原题《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同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中说：“十七年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在管文艺界的事情，一直很关心、很重视文艺事业的发展。……十七年中，有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当然有。……但是，那些问题，那些缺点错误，毛主席总是及时地指出，及时地纠正过来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一系列的光辉著作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的方向，也有了贯彻这个方向的组织。……我始终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接见我和赵丹等同志时的教导。”

这种“只见流不见源”的“盲人摸象”，１９７７年5月２８日，巴金在《迎接社会主义的文艺春天——在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表达了；１９７７年7月１０日，巴金在《望着总理的遗像》中再次强调了；更不可容忍的是，１９９６年４月巴金亲自定稿的《巴金七十年文选》，仍然坚持这样的“愚忠体制”观点，将它们作为“剔除了百分之五十的废品”后的“真话”留传后人！

２０年历史一再证明，巴金虽然在潘际坰、赵超构和范用等人推动下，首先公开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其“巴金‘文博’模式”的保守幼稚浅薄偏狭，也深深地误导了中国人，导致人们因多年坐等“中央批准建立‘文革’博物馆”，至少浪费了十年光阴，直到１９９７年才有人醒悟，开始“自己动手，民办‘文博’”。

３、“巴金‘文博’模式”的传播与退缩。

“巴金‘文博’模式”主要是通过《随想录》的发表、出版、再版及其评论进行传播。１９８６年6月１２日开始启动，１９８７年出现高潮，１９８９年“六四风波”后开始退缩消沉。

（１）“巴金‘文博’模式”是以香港为“发射基地”和“根据地”向大陆挺进传播。

陆正伟《曲折随想录》中说——《随想录》首发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早在１９４７年的秋天，《大公报》刚创刊不久的副刊正筹备出版《作家及其作品特辑》，负责编稿的潘际坰来到了座落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的霞飞坊巴金的家里约稿。……１９７７年5月，潘际坰看到了巴金在“文革”结束不久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封信》和《第二次解放》两篇散文，这两篇敞开心怀诉说胸中积蓄１１年的感情的作品，使他看到了巴老心中浸透着的血泪和痛楚，但又洋溢着充沛的热情，从中也透露给他了一个喜人的信息：从苦难中走出的巴金，他的思想仍那样的敏锐，他的文笔仍是那样的流畅。

一年后，当他重新回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园》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巴老。于是，他写信向巴老约稿。

……当时他（巴金）正在翻译俄国作家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从自己所喜爱的这部作品的题目上受到了启发，他建议潘际坰为他开辟一个《随想录》的专栏，并在“文革”后给潘际坰的第一封信中说：“……两封信都收到……很感谢。《随想录》我还想写下去，你们愿意发表它，我以后写出新的东西就寄给你们。我在《随想录》(一)里说明我写作时间不会太多,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想多写点东西……”这对潘际坰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他马上高兴地答应了。

但此时，他的生命已步入了老年，多病、衰老向他频频袭来，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随想录》的写作，他不得不调整了创作计划，放下了翻译到一半的《往事与随想》，

但他创作《随想录》的思想意义同翻译《往事与随想》是一致的。

（２）范用在大陆出版《随想录》，大陆掀起热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热潮。

据张弘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在《巴金：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一文中披露：１９８５年，潘际炯被报社通知提前退休，但他向报社提出了惟一的条件——退休后义务为巴金看大样，直到“随想录”专栏结束。在过去７年时间里，他编发的“随想录”从没出过差错，偏偏就是他不在香港的一次，稿子被无理删改了。因为巴金还有２３篇文章没有发表，所以他不放心。１９８６年夏天，巴金通过邮局挂号邮寄的两篇稿子时隔两个多月还没见发表。

巴金专为此事在几天中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了潘际炯，托他帮助查找、询问。信中说：“现在有件事拜托您。《随想一四四》和《一四五》遵嘱您返京后仍寄原址交（六月中旬寄广州处转港），至今未见发表，请代问一下，要是《大公报》不愿发表最后几篇，那就到此为止吧，不必勉强……”还在另一信中说：“信收到。６月１２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已找魏帆拿回执到邮局查问了……”这两篇文章是《官气》和《文革博物馆》。……

然而这两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就这样莫明其妙地“遗失”了。没过多时，巴金知道潘际炯有事到了北京并将很快返回香港，特地委托一位已故朋友的外孙女把《官气》、《文革博物馆》、《三十年前》、《怀念叶非英》及《三说端端》五篇手稿专程送到北京，交到了潘际炯手中。

文章经潘先生之手在《大公报》专栏上一一见报了。

潘际炯虽然能保证巴金《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刊出，也能让《大公报》发表的巴金《随想录》中“建立文革博物馆”影响一些京沪高级知识分子，但是，１９８６年的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看不到《大公报》，如何让巴金《随想录》“出口转内销”？时任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先生想出了办法——据范用在《巴金先生的一封信》披露：１９８６年秋，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分册出版《随想录》，即《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随后，《随想录》精装合订本于１９８７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１９９３年，北京华夏出版社在巴金老朋友夏宗禹提议下，又把香港三联分册出版的《随想录》影印出版线装本，这三个版本皆是没有删节的全本——《随想录》先是刊于香港大公报潘际炯兄主编的《大公园》副刊。在陆续发表的时候，内地就有人说三道四，以至于对际炯兄施加压力，企图腰斩《随想录》。香港向来言论出版自由，际炯兄理所当然予以拒绝。

我得知这一情况，十分气忿。正好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我打电话问候巴老，同时请求将《随想录》交三联书店出版，可以一字不改。巴老同意，我非常高兴。

这样，《随想录》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分册出版，即《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随想录》精装合订本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由我设计版式、封面和包封。另外加

印了一百五十本编号特装本，非卖品，供巴老赠送之用；巴老签名赠我的一本为Ｎｏ。１３２。正文用纸是《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的特制纸张。我认为这种特制纸张，《毛选》可用，《随想录》也可用。当时我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手上有点小权，可以动用这种纸张。

北京华夏出版社又于一九九三年把香港三联分册出版的《随想录》，影印出版线装本，五册一函，函套用织锦，请冰心先生题签。巴老为线装本写了一篇后记：有人对我说："你写的书中印刷最多的是《随想录》，有九种印本，可是市里出售的很少。买不到书。最近我同华夏出版社的朋友谈起，他说"我还为你出一种线装本，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我连声说。我正想编一本新的《随想录》，这将是版本的第十种，我要把来不及收进合订本的两篇随想也附印在里面。我不曾同哪一家出版社订过合同，因此我还有这一点自由。

（３）巴金对"巴金'文博'模式"在大陆遭禁的谨慎抗争。尽管"巴金'文博'模式"只是一种"体制内思维"，但仍然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对此，巴金最初的反应是谨慎抗争。

１９８７年3月9日，巴金复信范用，微辞大陆当局：范用同志：信早收到。没有回信，只是因为我的病。《随想录》能够出合订本，合订本能够印得这样漂亮，我得感谢您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的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的书市的。

巴金说《随想录》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因为它进大陆后先后有几次封杀之难。

巴金《随想录》"文革话题"第一次封杀之难是在１９８８年１０月。陆正伟《曲折随想录》中说——在１９８８年１０月，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巴老为《随想录》专栏寄去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潘际炯正在北京度假没在香港报社，当文章刊登后，巴老万万没想到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非是自己的原文，而是经过了多处删节，文章中凡是与"文革"有关的词或者"牵连"的句子都给删除了，甚至连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此牛和文革中的"牛棚"有关。过后才知道这是接到上面的"指令"后才被删除的，巴老对此事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他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了潘际炯，他在信中说："……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老怀着"宁可玉碎，不求瓦全"的凛然正气，他要把真相大白于天下。他随即奋笔疾书写就了一篇名为《鹰的歌》的文章（此文没在专栏中刊出，后收入《随想录》五卷本），在该文中，他提及了苏联作家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鹰"，他愿像一只"胸口受伤"、"羽毛带血"的山鹰，当不能再飞到天空翱翔时，就走到悬崖的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以此表明心迹：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决不会使他保持沉默。

事后潘先生还是同以往那样继续向巴老约稿，巴老碍于情面，答应了潘际炯．没过多久，巴老又寄来了第七十四篇《怀念集》，他担心潘际炯会顶不住无形的压力，还专门写信告诉他如有不便就转给香港《新晚报》发。后经潘先生之手还是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紧挨在它右边方框中又加注了第七十三篇存目的黑体字，这就是巴老为了澄清事实没给《大公报》发表的《鹰的歌》，巴老用自身的行动维护了人格的尊严原则，引起了香港读者极大的关注和尊重。

时间很快进入了１９８６年夏天，巴老在《大公报》登满《随想录》一百五十篇的计划行将完成时，一件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巴老通过邮局用挂号寄出的两篇稿子时隔两个多月还未见发表，巴老专为此事在几天中一连写了三封信给潘先生，托他帮助查找、询问。这两篇文章是《官气》和《文革博物馆》，没过多时，巴老得知潘际炯有事到了北京不日将返回香港，他特地委托一位已故朋友的外孙女把《官气》、《文革博物馆》、《三十年前》、《怀念叶非英》及《三说端端》五篇手稿专程送到北京，交到了潘际炯手中。文章经潘先生之手在《随想录》专栏上一一见报了。

巴金向大陆当局抗争的《鹰的歌》，写于１９８１年１１月下旬。全文如下——

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收获》杂志向我组稿，我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文章不长，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见过鲁迅先生，脑子里还保留着鲜明的印象。

回想四十五六年前的情景，仿佛自己就站在先生的面前，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我的看法。我多么希望再有机会听先生谈笑，可是我不相信有所谓“阴间”或“九泉”，连我自己也快到“化做灰烬”的年纪了。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是受到怀念的折磨的。

七月底我把写好的《怀念》送到《收获》编辑部，拿到文章的清样后，再寄给《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的编者，当时他正在北京度假。

今年我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过国庆节，在我国驻瑞士的大使馆里听一位同志说，她在香港报上读到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回国后我杂事较多，也就忘记翻看自己的发表过的短文。倘使不是一位朋友告诉我有过删节的事，我还不知道我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在香港发表的不是全文，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讲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我的第一部小说同读者见面已经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了。难道今天我还是一个不能为自己文章负责的小学生？

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九月将近三年的长时间里，《大公园》连续刊出了我的七十二篇“随想”。我的“无力的叫喊”给我带来了鼓励和响应，

主要依靠读者们的支持。我感谢一切对我表示宽容的人(《大公园》的编者也在其中)。

我的《随想录》好比一只飞鸟。鸟生双翼，就是为了展翅高飞。我还记得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鹰”，它“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悬崖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高尔基称赞这种飞鸟说：“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我常常听见“鹰的歌”。

我想，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我也会“滚下海去”吧。

（４）巴金在“胡耀邦下台”后退缩为沉默。巴金向大陆当局抗争的《鹰的歌》，的确显示了他曾一度是鲁迅的学生。到１９８６年6月１２日寄出《“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巴金的“独立思想”达到了一生的颠峰。但巴金此后却突然一百八十度大拐弯，并没有再坚持《鹰的歌》精神，就像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选择投降一样，从１９８７年开始，又一次从抗争退缩为对专制表示沉默与顺从，明哲保身地“识时务为俊杰”。

１９８７年9月１５日，巴金写了《收获创刊三十年》；１９８７年9月３０日，巴金写了《怀念从文》。按说，这两篇文章的主题都绕不开“文革博物馆”，但巴金都悄悄绕过去了。

《收获》自１９５７年创刊，两度停刊，其中第二次停刊就是因为文革，巴金理当借此再呼吁一下“建立文革博物馆”，甚至可以提议，让《收获》先成为一个“纸上文革博物馆”，每期刊登文革回忆录或评述。但巴金在文章中只用一句话批判张春桥、姚文元对他个人的压制，绝口不论《收获》二次停刊的深层体制原因与文革的体制之病。

沈从文是文学艺术才华远高于巴金的天才作家，１９４９年以后一直深受体制压迫，文革时更深受迫害，这本是也可借题发挥“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好由头，但巴金在文中只是就事论事，并不细述沈从文一家的文革悲惨故事，更不论其一代小说天才被迫改行做服装研究的悲剧根源。

１９８６年大胆写《随想录》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巴金，何以到了１９８７年写《再思录》时却闭口不提“建立文革博物馆”？也许，一生善于随政治风向而转向的巴金，注意到１９８７年中国政治又出现了重要变化——１９８７年1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书记职务。”中共文件显示，１９８７年，中共元老们认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邓小平指责胡耀邦应该对１９８６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胡耀邦被迫辞职。

巴金可能由此开始担心自己“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会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挂钩。

就这样，即使是１９８９年“六四风波”惊天血案发生，巴金也一声不吭，既不

重申“建立文革博物馆”，更不敢对无辜百姓惨死“六四风波”发一声同情，只是加紧编校自己的“全集”——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８日，当海内外中国人都还沉浸在“六四风波”的悲痛中时，巴金却在与《巴金全集》的编辑王仰晨（树基）平静地讨论《巴金全集》的编辑问题。关心“读者也许会把全书（《巴金全集》）的四分之二扔在垃圾箱里”——担心自己身后的名声到底如何成为巴金《最后的话》。

到得１９９０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讲真话的书》，将《随想录》中《“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一文整篇删去，巴金却装聋作哑地默认，不发一声质疑或抗议。１９８１年对香港《大公报》删去几句话就大声抗争的巴金，此时竟面对整篇的删除而一言不发，一直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去世，巴金再也没有一字提及“建立文革博物馆”。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５年，整整有１５年时间啊，这期间，巴金还写了好些书信和文章——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巴金写了《致冰心》；１９９０年２月８日，巴金写了《致曹禺》；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５日，巴金写了《致成都东城根街小学学生》；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５日，巴金写了《在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２日，巴金写了《〈再思录〉序》；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３日，巴金写了《〈十年一梦〉增订本序》；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９日，巴金写了《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１９９９年１月，巴金最后续写了他十年念念不忘的《怀念振铎》——从１９８９年春一直写到１９９９年春——“１９９８年巴老过完生日后，自感身体日渐虚弱，便主动提起修改和续写《怀念振铎》。巴老口述，李小林记录，陆续完成了四千余字。”

这说明什么呢？在巴金有生命意识的最后十年里，他最关心的事，已不是什么“建立文革博物馆”，而是对一个恩人郑振铎表达最后的感激——“巴老在文章中把郑振铎称为‘先生’，他写道，‘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评论说，《怀念振铎》是巴金老人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全部投注进去的一篇文章。”

可以参照的是，１９８１年４月４日，巴金写了《现代文学资料馆——随想录》六十四》，正式提出“创办一所现代文学馆”，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巴金又写了《再说现代文学馆——随想录》九十二》，尔后多年持续呼吁，终于使得官方批准建立一期工程投资１。５亿元，建筑面积１。４万平方米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５日举行奠基仪式；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４日正式动工，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日工程竣工。在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３日（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５８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馆。巴金晚年呼吁建立两个馆，一为现代文学馆，一为“文革博物馆”。由于巴金对前者的特别努力执着，现代文学馆在巴金生前建成开馆；由于巴金对后者的虎头蛇尾，“巴金‘文博’模式”的官办“文革博物馆”，直到巴金死去也是渺无踪影，“两处茫茫皆不见”。

若是“巴金‘文博’模式”早有“民办”“自办”的思想，以巴金当时之盛名与特权，一可以在自己家里办一个“巴金家庭文革博物馆”或“文化名人文革博物馆”，二可以在《收获》杂志上办一个“纸上文革博物馆”——每期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文革史料与相关评论，谁又能阻止住巴金？权势比巴金小得多的彭启安可以建成汕头

塔园文革博物馆，文化声望比巴金低得多的刘宗秀，可以筹办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雏形），为什么巴金不能？只因“巴金‘文博’模式”有向“皇帝”和“朝庭”乞求批准的误区！彭启安、刘宗秀筹办民间、家庭文革博物馆时的１９９６年，巴金还可以写文章，编全集，完全有条件办出比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和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雏形）更深广的“巴金文革博物馆”，但巴金就是不办——巴金早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只说不做，后来则连说也不说了。个中原因，刘晓波说得好，皆因其时“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作为作家，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学语言没有什么独创性，甚至写过一些很烂的作品，对汉语文学写作的贡献远逊于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等人，甚至不如张爱玲和萧红。巴金虽然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只有一部长篇《家》还算差强人意，而且只是在社会影响的意义上，而非文学独创性的意义上。巴金的其他长篇则拖沓、臃肿、矫情，表达缺乏克制，文字毫无美感，起码我在大学时代就读不下去。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论，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六大文坛楷模中最长寿者，活成了中国文坛上第一位百岁泰斗。然而，以文学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论，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鲁迅，他毕竟没有在中共治下变成文学植物人。

最长寿、也享受了最多官方优惠的巴金，由多产作家变成文学上的投机分子和准植物人。当《边城》的作者，敏感的沈从文先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被迫害并自杀未果之时，身为老朋友的巴金并没有说真话；在沈从文先生放弃文学而选择沉默随后以“文物整理”“古代服饰研究”打发下半生之时，巴金却在高歌伟大的新时代，在反胡风运动中落井下石。面对惨遭文字狱之害的胡风等人，巴金表达了足够的“愤怒”，再次发出“我要控诉”的呐喊，他声讨胡风的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他甚至批判胡风的微笑是“包着侮蔑”，把胡风等人比喻为令人作呕的“脓”。他说：“对付他们应该用他们的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见《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载于１９５５年5月２７日《文汇报》）在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巴金的太多的熟人和朋友纷纷落难，但巴金却幸运地躲过一劫，所以他开始加倍地进行效忠表演，１９５９年中共掌权１０周年大庆，巴金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在此意义上，如果硬要说巴金是“一面旗帜”，也更多是放弃独立的中国知识界向独裁强权投降的“白旗”。遗憾的是，经历过太多灾难和教训的中国知识界，仍然把这面“无力下垂的白旗”当作“高高飘扬的旗帜”，满天挥舞。

而今，中国大陆要想加快建立“文革博物馆”，必须首先突破和扬弃“巴金‘文博’模式”！以“文革文化”为人类文化遗产之新观念，将“文革文化”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

徐友渔

一、西方学术界研究概况

最早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学术界，并且在３０年左右包揽了几乎全部研究成果，以至于长期流传着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是在西方。”

像英文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 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从１９６６年夏、秋季就开始发表对于文革的研究论文，它们长期、系统地追踪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评论文革的目的、意义，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的影响，等等。

《共产主义问题》从１９６６年９、１０月号起刊登专题讨论会“毛主义是什么”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施拉姆（stuart r.schram)的论文是“毛及其学说”，另一位专家柯亨（arthur a.cohen)的论文是“毛及其政治学”。该刊接着开展总题目为“新革命”的系列讨论，主要论文有格尔曼（harry gelman)的“毛和不停息的清洗”，陈（theodore his-en chen)的“痛苦中的民族”，特里尔（ross terrill)的“围困心理”，迈克尔（franz michael)的“权力之争”，等等。

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反应也很快，它的社会科学部的人员和顾问在１９６６年夏末开始系统研究文革，１９７１年出版由罗宾逊(thomas w.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革》一书是其第一项研究成果。此书由５篇长篇论文组成，第一篇多里尔（Ｗ．Ｆ．Ｄｏｒｉｌｌ）谈文革是权力之争、政策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物，第二篇哈定（Ｈ．Ｈａｒｄｉｎｇ）谈毛泽东的政策和组织理论，第三篇罗宾逊谈周恩来，第四篇戈托夫（Ｍ．Ｇｕｒｔｏｖ）谈中国的外交，最后一篇是巴姆（Ｒ．Ｂａｕｍ）谈中国农村。

以《刘少奇和中国的文革》一书而著名的迪特默（lowell dittmer)把西方研究文革划分为３个阶段，每个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同，材料来源不同，但都形成了研究浪潮，并取得丰硕成果。第一阶段是从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材料来源主要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各种小报，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导致文革各种事件的权力斗争，这时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层政治精英中的清洗以及升迁；第二阶段是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这时注意力转向红卫兵的派性斗争，社会矛盾与冲突，一些研究者从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参与者那里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第三阶段从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研究者有可能得到新的资料，对文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１〕

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始终是中心议题，答案基本上可以分为３种。一种认为是出于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说法

，认为因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尔（victor c.funnel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毛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２〕

有人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的起因。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认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藉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３〕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他还要通过运动来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决不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４〕

较多的人持第三种解释，认为意识形态、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革》一书的作者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之间对于采取什么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发展为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与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５〕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观点也属于这一类，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详尽分析了自１９５６年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

有一批对文革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反对把文革看成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或路线斗争，他们认为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划分和对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用利益冲突而不是思想认识的不同来解释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群众组织。他们的理论叫做"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hong yung lee)、陈佩华（anita chan)、安德佳（jonathan unger)、骆思典（stanley rosen)和白霖（lynn white)等人都有这样的主张。

李鸿永指出，在文革"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某些社会集团发现他们的利益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另一些人则力图维持现状，在群众和精英层中都发生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分化。基本区别是对运动对象的看法不同，一派攻击"走资派"，另一派攻击知识份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根据家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支持"自来红"观点，激进派根据是否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划分阵营，反对血统论。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组成，激进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很多。〔６〕

陈佩华、安德佳和骆思典在合写的论文"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中提出，学生的冲突起源于以下原因：一、在６０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学生向上的前途不广阔；二、由于入学标准的变化（从重视成绩到重视家庭出身），学生为升大学展开了剧烈的竞争；三、许多学生的竞争手段是入团；四、政治

上的竞争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矛盾。在文革中，阶级背景的对立转化成红卫兵的派性。〔７〕

文革的影响和后果是西方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１９６９年，张旭成（parris h.chang)就看出，文革对中共的统治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文革中的清洗并未按照党章国法规定的程式进行，也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干部是好的还是“三反分子”，无数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其实是无辜的，张指出：文革中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漫无边际的指控损害了党的形象，这看来是无法修复的。号召造反和夺权的效果是，不仅年轻人，而且大多数人蔑视权威，包括新建立的革委会，甚至中央领导的权威。〔８〕

泰韦斯（friderick c.teiwes)在研究中共领袖合法性问题的专著中认为，文革产生了信任危机，对毛泽东的权威是个重大打击。文革造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其中包括受到虐待的知识份子，在农村过着贫苦生活的知识青年，以及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使人反感，林彪事件使人破除了政治迷信。种种怀疑和不满终于引发了天安门的抗议事件，这是对毛的权威的直接打击。〔９〕

许多研究者敏锐地看到，文革不仅以武斗伤害了千百万人的皮肉，而且因欺骗和谎言伤害了人们的心灵，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其著作《毛和毛之后的中国》的第２０章“文革的社会后果”中说，千百万人在文革中因为斗争会、派性武斗、镇压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留下了严重创伤。孩子们因为父母的问题受拖累，父母遭到子女的批判揭发，数百万人被非法监禁，数百万人在穷乡僻壤虚度光阴。他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前程被毁掉了。青年学生的理想被粉碎，因为文革的崇高目标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 鸿沟，他们从理想的一代变成迷惘的一代。〔１０〕辛格（martin singer)以极为惋惜的口吻说：对于多数中国学生而言，文革使他们不可补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宝贵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在一个老革命家为从不可避免的历史风暴中保留自己遗产的很不成功的斗争中，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１１〕

也有人看到了文革在大破坏的同时产生的正面影响。白鲁恂（lucian w.pye)认为，文革使中共领导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失败的现实，不但看清了文革的弊害，也看到了文革前的弊病。文革还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优越感，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外国的好东西。没有文革，他们就不会和苏联模式或任何已知模式决裂。〔１２〕

二、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早在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许冠三、丁望等就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研究和评论文革的文章，许冠三的文章总题目是“有关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几点解释”，从几个方面论述，分３期连载。〔１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先驱者、思想者，他们之中很多是文革运动的参与者

和很有经历的活动者，在７０年代就开始了对文革的思考和研究，并以文字系统地、明确地表述、传播自己的思想，不时还有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它的初稿完成于１９７１年底，１９８０年１２月载于作者自己主办的广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的特刊上，这部长达１０多万字的论著于１９８６年由陈佩华翻译为出英文，〔１４〕在美国出版。另外还有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回应晋君题为“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信件的产物，在其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毛泽东决不是官僚制度的敌人，提出了文革的副产品之一是“思考的一代”在中国崛起，等等。〔１５〕

在８０年代中后期相对宽松的气氛中，大部头的文革著作也问世了，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６年在压制和阻扰中艰难出版，接着，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在１９８８年发表。当然，官方也批准出版了很少的按照党的决议精神写出的书，比如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在１９９５年出版，席宣与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在１９９６年出版。

１９９６年是文革发动３０周年的纪念日，中国人研究文革的强劲势头在这一年展现了出来。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为此推出４期文革专集（后由刘青峰编辑出版论文集《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１６〕在日本由中国学人主办的《中国研究》推出“‘文革’三十周年专号”，以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为主编的，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研究》把秋季号完全做成研究文革的专号，香港的《亚洲周刊》５月２６日那一期做了题为“文革三十年反思前瞻”的专题，《明报月刊》　在１０月号上登载王若水的重要论文“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这年５月，“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文革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由于有关当局的禁阻，受到邀请的大陆学者未能赴会，会后编辑出版题为《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的“‘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１７〕

在中国大陆，也有各种学术活动。几个学术单位召开关于文革的研讨会，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央党校召开“《‘文化大革命’简史》座谈会”，当代中国研究所于１１月５日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文革研讨会，从多个方面讨论文革，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１１月３０日召开题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几家杂志做了关于文革的专题，《青年报刊世界》从１９９５年第４期起每期都有文革专题，直到１９９６年５月被强令停止，《焦点》杂志７月号有“蓦然回首看文革”的专题，著名的《东方》杂志在５月号上精心准备了一个专题：“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在发行前被强令撤销。附带说一下，以上３家杂志后来都遭到了停刊的命运。

在于光远的建议和推动下。，北京图书馆在这年４月完成“关于北京图书馆对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收藏情况的“查报””，根据这“报告”北图（现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资料共计２６１１种，６６７９７期。需要顺便说明的是，连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的学者，以及统计资料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机会接触材料，他们的

工作只能靠查阅目录卡片进行。

在“化大”命研究中，香港中文大学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而一批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然后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学者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自己的专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专刊”之下，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部研究文革的专著（比如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１９９９年〕和唐少杰的《一叶知秋》〔２００５年〕）和论文集，他们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从２００６年２月号起连续５期推出“文革四十周年”的专题。该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与宋永毅等旅美学者合作，于２００２年出版发行（中文大学出版社）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该资料库提供了３０００多万字的关于文革的第一手材料。这个资料库在２００６年进行了升级，增加了１０００多份新的文献，成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的网络数据库。

宋永毅等人工作是一种奠基性工作，为同行和后代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条件，为中国的文革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早在１９９８年，宋就和孙大进合作，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文献目录，１９６６－１９７６》(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bibliography,1966-1976),〔１８〕他和周原等海外学者一起收集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一共３辑，共达１１２卷，包括了２，７００种小报;〔１９〕他和郭建、周原合作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已经在２００６年出版。〔２０〕宋永毅还和孙大进合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他还主编了《文革大屠杀》。〔２１〕另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学者王友琴对文革的研究工作也引人注目，她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起单独一人进行采访，收集第一手资料，记录文革中受难者的个案情况。她办了一个网站，名为“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很多读者通过访问这个网站而了解文革的真相，关心文革这段历史。２００４年她把自己的成果汇编出版，书名为《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２２〕

据我有限的了解，今年在海外已经出版的关于文革的书还有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２３〕西藏作家唯色的两本书《杀劫》与《西藏记忆：二十三位耆老口述西藏文革》，〔２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两本书，使世人得以对西藏的文革有所认识，而弥足珍贵的是，《杀劫》是一本带说明的照片集。另外，今年出版的还有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２５〕以及刘国凯的“人民文革丛书”４卷。〔２６〕

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几年前就发表评论说，大致从２１世纪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我为这种新局面的到来深感欣慰，但与此同时，我又知道，“文革学的研究已经回到中国”这个论断具有阿Ｑ意味，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学者已经是美国公民，不得不承认，正是能够享受思想、言论、出版、交流自由的条件，才使他们的研究能够进行，研究成果能够发表。

２００６年是文革发动４０年，结束３０年的纪念周年，若干研讨会在困难的条件下举行。３月２２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纪念文革的小型座谈会，主持人为郑

仲兵先生。郑仲兵先生和他的伙伴编辑了一份非正式出版的小报《往事》，主要刊登有关文革的回忆性材料，这些资料对于今后研究文革是很要的。紧接着，在３月２４—２６日举行了“２００６－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５月１２—１４日在美国纽约举行了“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虽然应邀参加会议的多名大陆学者被禁止赴会，但仍有几位学者与会，并且宣读了未能出席会议者的论文。５月１７—１９日，渤海大学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史料收集与整理”学术研讨会。

除了文革的专门研究者，对于研究文革有心和作出贡献的还大有人在，比如，湖南一位休干应山红主编和自费印刷了一本《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又如上海学者王军胜自行刊印近百万字的３卷本《文革沉思录》，这些书籍都分送到了文革研究者的手中。

三、关于“两个文革”说的有关观点

“两个文革”说是文革研究中争论最集中、最激烈的问题。

据我的了解，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这个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１９８１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１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３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２７〕

“两个文革”说脱胎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冲突论”，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支持“社会冲突论”。

杨曦光是这么说的：文革史的研究者一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的理论框架有３种，一是“权力斗争说”，用中央上层政治人物争夺权力的斗争为主线分析文革，一种是中共官方“路线斗争说”，以中共最高层的“两条路线”或“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来解释文革，文革时毛派的官方采用此说，文革后邓派的官方也采用此说，只不过正确与错误调换了位置。再一种就是“社会冲突说”。最后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不仅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且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文革中卷入斗争的红卫兵及各种群众并不是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有独立意识，利用文革的机会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现在反对官僚特权阶层，保守派维护现存体制，即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双方的社会冲突构成文革的主要内容。〔２８〕

陈佩华断定说：“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９年文革是反官僚运动。”〔２９〕她还说：“文革刚开始时，造反派被从压迫中解放自己的号召所发动。如果说他们在头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那么他们马上发展成为有自己政治计画的独立力量。”〔３０〕杨小凯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称为“准政党”，说它们是毛玩“自由结社牌”的产物。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

的人”，“１９６６年8月至１９６８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令停止军队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允许市民在政府注册自组政治组织。他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当时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３１〕王绍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证明群众组织自主性的论据，他说：“在某个意义上，我们大概可以说，不是毛泽东掌握着文革的进程，正是难以控制的文革推着毛泽东团团转。”他的论据是，毛原先预定文革只搞3个月，结果搞了１０年还未达到他的目的，这说明“不是他所发动的运动受制于他，而是他受制于他所发动的运动。他本人成了文革最大的牺牲品。”〔３２〕

文革到底是上层斗争还是社会冲突呢？为了概括这两个方面，有人从“两个文革”这一概念中寻找解答。比如，李鸿永反对把文革仅仅看成上层权力争夺，认为文革既包括上层分化，也包括群众的分歧，还包括上下层之间的复杂关Ｓ。〔３３〕杨小凯也是借助于这个概念：“在上层，这是一场以１９５９年后政策分歧为背景的权力斗争，而在下层，这是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组成的保守派与现体制的造反派的冲突。”〔３４〕郑义说，他在８０年代末发表在《作家》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文革”的分析，１９８９年在《历史的一部分》，１９９１年在《红色纪念碑》中作了进一步阐述。〔３５〕

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对陈佩华、杨小凯的论断表示不赞成：“应该承认，说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这是正确的，但这种行为的效果却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在冲击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仅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仅极易被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乾脆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他还说：“应该承认，造反派中除了许多人是受毛的号召造反之外，确有很多人怀有不满情绪，但准确地说，他们是对当时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不满，而不是对共产党不满。”〔３６〕

在１９９６年纪念文革发动３０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２００６年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导出。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刘国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刘国凯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北京学者刘自立在网络杂志《民主中国》上发表“‘人民文革’说驳难”，认为“只有一个文革，就是类似纳粹杀戮和中世纪

不宽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对于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应该包括在‘文革本身’中”。卫子游在《北京之春》２００６年3月号上发表“评刘国凯的‘论人民文革’”，刘国凯发表了回应文章“请以郑重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对刘自立的“‘人民文革’说驳难”再加以驳难。

关于“两个文革”的争论涉及到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认识与评价，何蜀在“论造反派”一文中的观点不同于“社会冲突论”：“假如没有这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广大民众不可能敢于起来造反，各地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也不可能允许民众起来造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造反派的形成，除去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之外，毛泽东的‘运动群众’，是一个重要原因和前提条件。”何蜀给“造反派”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核心允许下，以反现代文明的、非宪政民主的、从以往政治运动中学来的方式（如大字报、大批判、揪斗、监督劳动、肉体折磨等），对本部门、本地区以至更上级的官员（特别是执政党官员）进行攻击，直至将其打倒、夺权（真正的打倒与夺权均须得到更上级甚至中共领导核心的批准），在这一过程中，以‘革命群众’或‘革命群众组织’名义结合而成的政治派别或这一派别中的人物。”〔３７〕

周伦佐在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强烈主张重新认识和评价造反派，把泼在造反派身上的污水清洗乾净。他在论文“‘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主要界线”中说：“虽然按官方的说法‘文革’的时间是十年，但属于群众运动形态的时间不足三年。就全国范围而言，这是以‘路线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的三年，这是运动的重点以整党内‘走资派’取代整党外‘阶级敌人’的三年，这也是‘文革’中唯一引人瞩目的三年。群众组织划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实际只存在于这段时间。民众之所以大分化、大对峙，只是因为这时在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各级当权派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划分正是围绕这个轴心展开。离开当时两派群众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来谈论造反或者保守，难免会失去实际的背景。”他还说：“落实到具体的事发起因、行为动机、攻击对象、追求目标，双方的分别就更明显：保守红卫兵的作为，无不是为了纯化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强化极权主义的统治威权，从而维护极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造反红卫兵的作为，却客观上淡化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削弱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威权，进而冲击了极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尽管后者所体现的还不是自觉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行为，但至少是一种潜在的民主冲动——距离民主主题并不遥远。”

周伦佐在“‘三年文革’说不能成立”中从文革是3年还是１０年的角度间接支持“人民文革”观点，背景是这样的：关于文革的时间，有“３年文革说”和“１０年文革说”的对立，而“３年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是一致的。这个说法起源于陈佩华１９９０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众政治对立，人民起来造反的3年，“１０年文革说”是官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文革观点的表现。

我认为，在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６年关于文革的两个纪念日产生的最热烈争论都围绕“两个文革”的观点，决不是偶然的，值得文革研究者注意。特别是，今年

的观点中，出现了重新评价、正面评价文革中造反派作用的呼声，对于正确地、深入地认识文革，是有意义的。文革确实需要一个“再发现”、再评价的过程。

总的来说，我本人倾向于“一个文革”观点。我的理由是，如果说有另一个文革，那么也只能说是利用第一个文革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松弛和“天下大乱”的形势而产生的一些现象、活动，是第一个文革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且规模、范围、支配力与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当然，事情也不能只从数量上看，第二个文革和第一个相比虽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数人对它没有感觉，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则是巨大、深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打倒政敌，大多数人盲目、狂热地卷入这个主流运动之外，毕竟有少数人、少数组织清醒或比较清醒地利用形势，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是响应毛的号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改变现行的制度。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记录的趁乱造反的“右派份子”，１９６６年底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属于这一类。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情况，才能对文革中、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民众的生活状况、心理有全面的认识。

四、关于研究方法的几点意见

结合自己研究文革的心得体会，我觉得中国人研究文革要想取得应有的成果，应重视方法问题，特别是以下问题。

首先要明确，研究文革固然是在履行我们应负的历史责任，但一旦具体进行研究，我们就应该把它当成学问来做，不必也不能在文本中让责任感、道义感、历史感彰显无遗而让学术规范和学术风范缺位元。事实上，在研究中我们经常看到立场先行，立场、感情压倒理智分析和理性论证的情况。

做学问就要讲究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但中国人研究文革往往是白手起家、从头做起，忽视阅读以往文献，尤其不重视、不善于利用西方学者在相关问题上已经取得的成果。西方学者在研究文革时表现出来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在方法上很有讲究，背景知识相当厚重——特别是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具有坚实的、恰当的理论框架，而中国学者常常流于直观的描述和常识判断，夸大自己的直接经验的重要性，有时显得理论视野狭窄。

当然，经验和背景知识之间的关Ｓ如何，孰为第一重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文革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本质上说是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经验研究，因此经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一些西方学者，更多情况是在西方大学以文革为题目做博士论文的研究生，往往在理论框架方面很强而在经验方面很弱，有的时候他们的论著简直是各种理论的重述和罗列，经验事实只是一点不得不要的点缀。有时他们显得是在不相干地卖弄理论知识，他们的理论框架与经验事实明显是分离的两张皮，彼此没有关联。

经验——特别是亲身经验——相当重要，比如，依靠文革中的出版物进行研究容易落入陷阱，因为那时的出版物，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群众的，都充满了意识形态狂热、偏见、宣传性谎言，需要高度的技巧才能解读这些材料，而经验，尤其是亲身参加过文革的经验，非常有助于这种解读。

当然，我并不认为亲身经历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是研究文革的必需条件，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我们这些亲自参与过文革的人之后文革研究就不可能进行了，这显然与历史研究的事实不相符合。事实上，我发现中国大陆的文革经历者和积极份子对于文革的理解非常成问题，常常还不如外部的研究者，这也许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者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即使是具有一定经验，不论是亲自参加得到的经验还是从大量的访谈中取得、积累的经验，也不能过分地相信，不能以偏概全，从有限的经验事实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这是一个不容易避免的毛病，因为我们的观察和调查总是有局限的，而我们一定会受到抽取出一般结论的诱惑。当我们辛辛苦苦地、深入细致地从事调查之后，我们容易相信我们掌握了带规律性的东西。而文革的特征在于它在地区、人群等等方面的差异性，某些西方的研究者不自觉地在这方面落入了陷阱。

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是非常扎实、非常优秀的，但对于这些外部研究者极其冒险的一件事，是他们不得不从有限的采访和研究中概括出全国的情况。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运气都很不好，他们透彻研究中国一个省的情况，推导出一般的结论，但不幸的是，他们挑选的省份情况都具有特殊性，和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不一样。

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的研究完全基于广东省的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文革期间，中国完全向世界封闭，香港是唯一可以观察中国的视窗，从广东逃到香港的前红卫兵成了唯一的，也是丰富的资讯来源。但广东情况特殊，因为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尽管镇压造反派，但没有像其他地方的官员那样被撤换，因此广东的情况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保守派始终没有垮台，造反派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没有发展成为运动中后期的主要矛盾。他们对于群众组织派别对立的观察、分析局限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这就没有反映全国的情况，也漏掉了大量极其宝贵的资讯。

另一位研究者福斯特（Keith forster)看到了上面的问题，他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中国一省的造反和派性：浙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t in a province:zhejiang,1966 -1976)中宣称，广东接近香港，远离北京，那里的情况代表了例外而非规律，他认为区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是对干部的评价，这个标准在全国也适用。〔３８〕但他不知道自己遇到的也是特殊情况：浙江的造反组织听从周恩来的劝告支援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保守派而一直受到压制，浙江的“老造反”“红暴会”长期受压，而原因在于中央首长表态出尔反尔，这在全国是十分特殊的。

中国人虽然对于与研究文革相关的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较为隔膜和陌生，但反而

爱表现出一种理论癖好，觉得不把问题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面就没有达到某种高度或深度。我经常听到有人对我的研究高度评价和赞誉，但在过奖之词以后则鼓励或要求我一定要在“理论层次”上下工夫，把分析和结论上升到哲学、形而上学的高度。我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文革研究的问题用不着升华得那么高，高入云端未见得是深刻，很可能是空洞、大而无当。我认为在研究的初期，局限于经验事实的收集、积累、辨析和梳理也是不错的，当我感到可以作一定的理论概括的时候，我追求一种我所谓的“中等程度”的理论化，即高于经验事实但不过分抽象而远离事实。

与此相关的是，有些研究者在解释文革中的一些重要现象时，爱一下子就追溯到文化传统或人性的源头。我不相信，两千多年前的孔孟要为文革中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人用宗教的眼光看问题，在历史责任问题上力求深刻，认为罪过的根源不是具体事件的当事人，不是文革的发动者，“我们有原罪，罪恶深藏于每一个人心中”。我认为宗教伦理学原则在这里不适用，这种“深刻”与其说是在深入认识罪恶的根源，不如说是把罪恶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而模糊、淡化甚至解脱了文革发动者直接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注释

１，lowell dittmer,"book review:politics of chaos/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1968 -1981",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4,no.3,1990 ,pp.1094-1051.
２，Victor c.funnell,"social stritification",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xvii,iss.2,pp.14-20.
３，Simon leys,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1981,p.13
４，harry gelman,"mao and the permanent purge",problems of communism,vol.xv,november-december 1966,pp.2-12.
５，gargi dutt and vidya prakash dutt,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asia publishing house,1970,p.2.
６，Hong yung lee,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1-5.
７，anita chan,stanley rosen,jonathan unger,"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the china quarterly,no.83,september 1980,pp.397-446.
８，Parris h.chang,"mao's great purge:a political balance sheet", problems of communism,vol.xviii,no.2,march-april 1969,pp.1-10.
９，frederic c.teiwes,leadership,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new york, m.e.sharpe,1984,ch.1.
１０，Maurice meisner,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free press,1986,ch.20.
１１，Martin singer,educated youth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1,p.83.

１２，Lucia w.pye,"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hina quarterly,iss.108,1986,p.610.
１３，许冠三："有关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几点解释",《明报月刊》１９６７年，一月号，第２－７页；"夺权斗争的布局",《明报月刊》，１９６７年，二月号，第８４－９０页；"'无限风光在险峰'？",《明报月刊》，１９６７年，三月号，第３４－３７页。
１４，Ｌｉｕ，Ｇｕｏｋａｉ，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ed &tran.anita chan.armonk:m.e.shape,1987.
１５，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８１年二月号。
１６，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１７，杨建利主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１９９６年。
１８，Song yongyi &sun dajin,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bibliography, 1966 -199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1998.
１９，Zhou yuan ed.the new collection of the red guard publications:part l,newspapers,20 vols.1999;song yongyi ed.the new collection of the red guard publications:part ii,a compila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in beijing area,40 vols.;Song yongyi ed.the new collection of the red guard publications:part iii,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52 vols.2007.oakton,md.: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２０，Guo jian,song yongyi &zhou yuan,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anham:scarecrow press,2006.
２１，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１９９７年；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２００２年。
２２，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志，２００４年。
２３，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美国溪流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２４，唯色,《杀劫》、《西藏记忆：二十三位耆老口述西藏文革》，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
２５，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６年。
２６，刘国凯的"人民文革丛书"４卷分别为：《人民文革论》、《文化革命简析》、《基层文革泥泞路》、和《广州红旗派的兴亡》，美国博大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２７，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８１年二月号，第４９页。
２８，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争鸣》月刊，１９９０年8月号，第６９页。
２９，陈佩华："对文革'社会冲突论'的意见",《争鸣》月刊，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号，第６１页。
３０，Anita chen,"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tion",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no.1,1992,p.69.
３１，杨小凯:“六四省悟：反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国之春》月刊，１９９０年８月号，第４２、４３页。
３２，王绍光:“群众与文化大革命”，载于李少民编:《大陆知识份子论政治、社会、经济》，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第９０，９３－９４页。
３３，Hong yung lee,"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64,1975,p.646.
３４，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争鸣》月刊，１９９０年８月号，第７０页。
３５，郑义:“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载于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１９９７年，第４００页。
３６，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４、１７６页。
３７，何蜀论文见本书。
３８，Forster keith,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t in a province: zhejiang,1966 -1976,armonk:m.e.shape,1990.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陈奎德

本文所探讨的文革中萌芽的自由主义，与人们常说的文革中出现的异端思想，二者的概念应当有所厘清和区隔。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宋永毅与孙大进已有专书研究，同时也有其他研究者的一些文章对此作了论列，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想强调指出，当年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异端思想，绝大多数也属于一般政治光谱的左半部分，即，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它们多数应被归类于左翼思想的范畴。这一点应当不难理解，思想的出现有其精神土壤，它与其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关，具体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它与当年官方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有关，也与那个时代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有关。有鉴于此，中国的思想者很难从非左翼的思想库中攫取思想养料。在这方面，当时中国人赖以思索的精神资源是极为单一和贫乏的。

有鉴于此，应客观看到，即使是当年中国的那些勇敢的异端思想，如湖南的“省无联”思潮（代表作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北、决、扬”、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的思想、五一六思潮、清华四一四、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等等，基本上都没有逸出左翼思想的范畴，大多不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

即，在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固然是异端，但多数异端却并非自由主义。

◇　自由萌动

本文要强调的是，即便在上述极为艰难贫困的精神环境中，自由主义的幼苗仍然在文革中的大陆萌动了。这是一桩精神的奇迹，也是自由主义赋有超绝顽强生命力的见证。

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这一精神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连接毛氏中国与后毛时代之间的鸿沟的精神枢纽。它是催化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变迁以及即将降临的更大变迁的精神动力。它是跨越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到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到九十年代自由派新左派之争直到２１世纪中国转型的隐形桥梁。它是中国纳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轨道。

探索中国文革期间萌芽状态的自由主义，受限于两个基本困难，一是此类思想深埋于地下，未曾公开化，原始资料严重匮乏；二是在当时的资讯以及精神条件下，浮出水面的此类思想往往隐藏在官方话语之中，殊难剥离、梳理与整合，大多是只鳞片爪，漫无系统。但是，即便如此，有心人倘若仔细抽丝剥茧，寻绎踪迹，仍然可以看到一条时隐时现的自由思想潜行的脉络。

文革里萌芽的自由主义，渊源于自由主义与基本人性的契合，渊源于对中国当年物质与精神恶劣状况的反应，渊源于外部思想的闪电击中精神荒原产生的激荡。具体而言，是由于两大基本因素的刺激，一是自发的因素，二是来自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激发。

自发的因素，植根于对苦难现状的怀疑和否定，植根于在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下的个人利益的直觉，植根于在普遍恐惧下的换位思考，导出妥协的需求和权利的觉醒。简言之，源于人性本能的反弹。

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则因为以外来思想资源对照现实，引发了深度的心智共鸣，扩展为广泛的理性思考，从而得出了自由主义或近似自由主义的思想成果。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讨论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的全貌，只拟从如下几个关键性的脉络和人物切入，描绘并阐述其概貌。

１）对等级制和血统论的反弹：人的尊严与众生平等—“个人”的发现—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破土而出—人权理念—遇罗克《出身论》〔１〕的核心。
２）对失败的公有经济的反弹： 触目惊心的懒人社会和赤贫状况—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２〕—顾准的思考—杨小凯等（关于产权）的思考。
３）对秩序失范、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反弹：从革命民主主义到法治主义—法治观念的萌动—李一哲大字报〔３〕。
４）对政治迫害泛化的反弹：人人自危—囚徒困境—权利法案（含产权问题）—宪政思想—普遍宽容—从杨曦光到杨小凯的心路历程〔４〕。

一、《出身论》：文革中国的人权论

众所周知的遇罗克《出身论》，虽然使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语言，但他与当时那些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毫无关系，他的思考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人道的性质，人权的性质，平等的性质，自由的性质。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当时时髦的思想根本上不在一条轨迹上。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拨开其文章表面的文辞，拨开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国大地底下喷薄而出的清凉自然的自由主义言说。因此，虽然缺乏严谨的自由主义的学术语言包装，但遇罗克，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应归属于１９５７年以及１９４９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脉络之中，他是他们的毫不逊色的精神传人。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两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

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间，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

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贱民”，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与恐惧。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沈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渗透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单位，街坊…点点滴滴，早已教会了他们认明自己的身份：即，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的下等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的一生无所期待：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没有发展自己兴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权利，……只有绝望，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的隧道，漫长无尽。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一划分及其造成的社会氛围，从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逐步强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顶点。从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歧视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则是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遇克的长篇文章《出身论》破门而出，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万动摇不得的。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到后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罗克也终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对待《出身论》的根本立场上，当时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两派——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实际上并无二致。

遇罗克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这是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时，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

论》的出现和传播，在中国历史上践踏人权最黑暗的年代，竖立起了中国人权意识的里程碑。

二、顾准：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观念之兴

经济学家和思想史学者顾准的思想贡献，首先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笼罩一切的时代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实施市场经济，今天看来，也许是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四十年前的毛泽东中国，在毁弃私有制的信条笼罩一切的氛围下，却是石破天惊之言。此外，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法律体系相配套的人。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现在人们常论及的“要好市场经济，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重要主张。换言之，对顾准而言，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有与无的问题，其次还有一个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题。他的思想之触角，不仅涉及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私有产权的问题，同时也模糊的意识到了英美的普通法体系与欧洲大陆法律体系、拉丁语系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的不同作用。

作为思想者，在文革的艰困条件下，顾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过自己独立思考而获致的见解。这些见地，在今天也许并不那么惊世骇俗，也许其中还有其不确切不规范之处，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封闭的中国，可谓石破天惊，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诸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出来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长期困扰中国知识份子的问题。顾准抓住了它们，陷入长期的孤独的思考，并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顾准暗夜中的独立探索，其思想特质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以致不能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所理解。他是一位孤寂的先行者。然而，不容否认，他的思路，却为 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开掘了思想的先河。

三、李一哲大字报：法治主义的滥觞

“李一哲大字”是文革中第一农业篇对民主与法制的探讨，在实质上，它主要涉及了自由主义关于法治的一些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成果，是在批判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后获得的。

李一哲大字报是批极左的，虽然其术语还带有中共话语系统的特点，但其核心，是从西方民主法治观念出发的。李一哲大字报是文革后期对纷纷乱世、对运动无休无止、对人人自危的社会状况的厌倦情绪的反映，在当时颇得人心，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为结束文革作了思想准备，也开启了随后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的先声。

七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特别是一九七一年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许多当初文革的热情参与者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独立的民主思潮实在是自那一时期产生。七九到八一年的民主墙运动不过是七十年代的运动从地下走向公开的结果。

下层人民政治反抗与上层领导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微妙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个中妙处，存乎一心，局外人极难体会。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共产党高层有意于改革或比较温和的一派经常将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下层运动的活跃分子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总能通过某种方式与上层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不断地利用上层之间的矛盾来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李一哲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王希哲描述了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如何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以开展大规模批判李一哲的方式，使大字报广为流传，使作者们获得意料之外的影响力。直至今日，这种上下层间的微妙关系，仍然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策略及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的愤怒以及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公平的不满，成为了七十年代民主和抗议的基础。这也是将“李一哲集团”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在七九年获得平反之后，随着共产党上层路线的变化、改革的开展，“李一哲集团”便也出现了无法挽回的分裂，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途。

然而，李一哲大字报所激起的思想波澜，它对中国法治主义崛起的贡献，将长久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成为该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之一。

四、从杨曦光到杨小凯：自革命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

１９６８年，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横空出世，风行全国，震动京华。不胫而走的异类文章，使他遭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中国向何处去》带有南斯拉夫理论家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的思想烙印，也混杂有马克思早期思想以及马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等因素。是文革中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作。

但是，随着他对文革反思的深入以及其他思想资源的影响，随着杨曦光更名为杨小凯后，他后来写道：“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而他经过长期苦思力索，成年后，他已认识到“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了。他的思想基地已然转换到自由主义了。如果粗略地说，当年他关注的价值核心是社会平等和大众民主的话，那么，后来他的价值重心则变成个人自由，变成权力平衡了，换言之，如何实现宪政成为他政治思考的中心。这一转折与他对西方政治史、中国历史以及对文革的长期思考有关，同时，也与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有关。

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他认为文革把“人民”的土匪本性一面暴露无疑，因

此中国社会才在文革后期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反革命情绪”。

文革中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各种派别“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崛起和衰落，恐怖气氛蔓延全国，人人不能自保，任何人都无法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后就连写进党章宪法的毛的接班人天天被祝祷“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彪也死于非命。这使绝大多数人醒悟到：反对对他人施加政治迫害，同时也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保障。于是，对制度性的人身权利保障成为健在的强有力的社会心理。这二者，只有宪政制度，只有法治，才可能办到。在这方面，杨小凯领悟很早，他是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他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指出后发国家不应该只学先发国家的技术，也应该学习制度。　杨小凯提倡宪政的两大理由是，第一，为了经济改革，为了好的资本主义、避免坏的资本主义。第二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

杨小凯在以后谈到政治秩序的重要性时，已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口吻了：“从中国孔子的学说到当代政治学都指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的确更重要。英国的发达是因为自光荣革命建立代议制、两党制，内阁制后三百多年没有政治动乱，美国的发达也是因为她有民主制度保证其二百年长治久安。中国不要有二百年不断政治动荡而中断，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强调经济为中心，经济一定会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动荡非有结社自由，政党自由，自由选举这一套民主制度不可。从这里而言，唯生产力论是极端错误的。而建立一个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和经济发达的根本大计。”

他后来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原有的政府和共产党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政治是在军队，各派政治派别之间玩出来。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了军队以外），自由结社自然会发展出自由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种被称为“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发展的背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的人物，武汉三钢派中的北斗星学社，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湖南省无联等等。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虽还没完全摆脱中共意识形态垄断权的阴影，但他们宣称中国的政体不民主，形成了特权阶层。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群众组织应该容许反对司令部，不论其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新思潮的发展说明，只要结社自由成了事实，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残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自由的思想就会从自由的结社发展出来。我认为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结社自由，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个独立于共产党而共产党又吃不下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

五、突破时空的精神交流

１９６６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１，０４１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

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份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１０到２０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利希·Ａ·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１８９１－１９１７年回忆录》和《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吉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这种转变，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是一桩相当普遍的现象。

作为自由主义的精神源头，上述精神养料中，以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影响最深，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传布最广。它们促成了中国当年的少数先知先觉者对共产极权制度的深度批判以及对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认同。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记得自己在中国大陆看到《通向奴役的道路》的中文版时是１９６９年，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走向“复辟”的阶段。当时的一批“内部发行”的所谓“灰皮书”、“白皮书”和“黄皮书”在极小的圈子内流传，当然要靠极高的直觉极大的精力极广的联系网路才能搜寻到此类书籍。一获此书，笔者竟然废寝忘食，反复研读，浮想联翩；对照当时中国之社会状况，惊叹作者预见力之惊人；同时在猜测中国共产党高层何人有此眼力和胆魄，竟然敢于在六十年代批准（在内部）出版此书？

这些书籍的传布，像野火蔓延，影响了整整一代敏感、痛苦、寻找出路的年轻人。这些影响对于激发或强化中国这一两代人的自由主义萌芽，有着不容低估的催化作用。这些人在１９７７年之后恢复高考制度后，相当一部分进入大学深造。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变迁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思想、学术和社会政商界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在文革“瓦釜雷鸣”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声音，虽然若隐若现，纤细微弱，不成交响篇章，不为时流看重，然而，从后来的演变看，说它是历史的先声，是未来中国的精神种子，是绝不夸张的。

注释：

１、遇罗克:《出身论》，载１９６７年1月１８日《中学文革报》第１期
２、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亦凡书库，１９９２年出版
３、“李一哲大字报”：指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广州街头出现的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位作者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合名
４、杨小凯:《中国宪政的发展》，是杨小凯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１９９７年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１９９７年
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６年

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1)

李 劼

内容提要：十年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作为史无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泽东集秦始皇与陈胜、吴广于一身。毛泽东在帝王史上的的另一个史无前例，乃是集帝王和圣贤这两个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不仅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拥有以前的帝王所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话语，或者说，思想体系。1949 年，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共产党夺得了天下。1966 年，毛泽东又同样成功地把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即以毛泽东、江青夫妇为核心的家天下或曰毛天下，取代了共产党的党天下。毛泽东的文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的权力和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的帝王之尊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最后全都同归于尽。

毛泽东让中国人民在他脚下站起来

早在井冈山把共产党从五四党变成山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走进几千年来绵绵不断的历史轮回(参见拙作《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孙中山，二千多年来，在那个长长的行列里，与毛泽东的成功比较相近的有刘邦、朱元璋、李自成。1949 年 10 月 1 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说是在政协大会上所言)的时候，人们应该意识到，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皇帝宣告诞生了。假如中国人幸运的话，那么，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中国皇帝。

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可以说，是从打倒皇帝开始，到毛泽东步入中南海重新坐上龙庭结束的。这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充满了滑稽和反讽。江湖革命家孙中山无数次地组织起义，及至标志历史转折的武昌起义爆发，此公却偏偏不在场。革命家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地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而真正解决那个王朝的历史人物，恰恰是后来复辟称帝的袁世凯。袁世凯以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把紫禁城变成了满清王朝的坟墓。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整个过程之精彩之高妙，不要说孙中山和毛泽东，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华盛顿，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宠儿拿破仑，乃至英国革命的克伦威尔，都难以望其项背。孙中山的革命结果是引狼入室，将苏联革命的恐怖和专制嫁接到中国传统的草莽造反和江湖起义。毛泽东的革命完成了乌托邦专制和中国传统极权的杂交，所谓革命成功，无非是毛泽东戴着共产主义的面具，坐上秦始皇和朱元璋同样坐过的龙庭。比起毛泽东冠冕堂皇地入主中南海，袁世凯的称帝庶几成了冤大头。袁世凯不知道，中国历史到了二十世纪，皇帝已经不再叫做皇帝，而是叫做领袖。假如当年的袁世凯宣称，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那么得到的就不会是反对和哗变，而是欢呼和拥戴。聪明一世的袁世凯，实在是糊涂一时。他竟然都不知道，称领袖做领袖也一样的可以皇恩浩荡，一样的可以专制极权，一样的可以嫔妃成群，一样的可以践踏法律，一样的可以把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话语能力确实过人。他不仅知道把皇帝的称呼改成领袖，而且还懂得把自己的称帝，说成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叫做欲擒故纵，

要让国人拥戴他的称帝，非但不提皇帝这个词，而且还把自己的入主中南海说成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1949 年 10 月 1 日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所有中国人民，全都感觉自己站了起来。他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是在毛泽东的脚底下站起来的。毛泽东只消轻轻一踩，中国人民就成了粉齑。这与其说是中国人民太愚昧，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太聪明，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心照不宣。在有皇帝的时代，中国人民动不动就想起来造皇帝的反。而一旦没有了皇帝，中国人民又觉得很难受，很想找个伟大领袖作代偿。东方红，太阳升，并不是毛泽东自己唱的，也不是毛泽东逼着中国人民唱的，而就是中国人民自觉自愿地唱的。没有了皇帝的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再没有伟大领袖。这两者都没有了的中国人民，就像没了爹娘的孩子，在没有皇帝和领袖的黑暗里瑟瑟发抖。那东方红、太阳升，不唱行么？

毛泽东把自己的称帝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无疑是高明的，而中国人民心领神会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也不失为一种伟大。毛泽东的伟大，建立在中国人民伟大的基础之上。没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哪来的伟人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只不过是集中了所有中国人积攒了几千年的伟大罢了。因此，毛泽东的伟大无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还是在西方知识分子心目中，尤其是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和美国左右两派政客心目中，都是毋庸置疑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如何伟大表示五体投地，并不是客套，而是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也是对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心悦诚服。犹太人的聪明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唯有中国人的伟大，却还没有达成共识。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毛泽东，在 1949 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配合得相当默契。一部分人民跟着毛泽东，不断地打倒着、乃至在肉体上消灭着或者说清除着另一部分人民。基于一种拉帮结派的传统，中国人民很知道如何划分界线，把自己划入革命派，把别人划入反动派；把自己划入胜利者，把别人划入失败者。失败者的行列中，在农村有地主富农，在城市有资本家，在知识分子中有右派，在无业游民中有坏分子。假如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暴虐狰狞的专制舞蹈，那么无论是领舞者毛泽东，还是群舞者中国人民，全都跳得十分投入。过去鲁迅笔下的看客，如今有了把别人置于死地的机会和肆意地折磨同胞的快乐。所谓的中国历史，真的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的历史。通过不断地消灭另一部分失败的人民，胜利的那部分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走在毛泽东指定的那条叫做革命的大路上。毛泽东喜欢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不仅敢于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也善于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们和朱元璋们所望尘莫及的。

假如没有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沉缅于不停地打倒别人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感到疲惫的。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已经养成了狼狗一样互相撕咬的习性。即便是饿得头昏眼花，只要一说有敌人，马上就会眼睛发亮，怒发冲冠。用发现新的敌人来代替饥饿的感觉，使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转危为安。彭德怀不过是像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一样，做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指鹿为马的本领，在毛泽东进一步上升到了随心所欲地看风使舵。

毛泽东以善变保持其英明伟大

比起镇压反革命，屠杀地主富农，消灭资本家，1957 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的英

明不在于明察秋毫，而在于顺势作变。坐了龙庭的毛泽东，在镇压了所有失败的阶级之后，一时间有些轻飘飘。小人得志，即便在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未能免俗。在把党外的敌人赶尽杀绝之后，毛泽东开始把斗争的目标锁定在党内的同伙身上。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传统的。做皇帝的从来不把平民百姓当作对手，而总是与官吏们过不去。尤其是皇帝身边的大臣重臣，通常是皇帝的主要斗争对象。这与其说是皇帝与官僚阶级天然相克，不如说是皇帝不喜欢官僚们动不动与圣上分享权力。退一步说，就算是一伙强盗抢银行，到了分赃的时候，领头的那个总是把充满狐疑的目光投向欢天喜地的同伙。

发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不能说是毛泽东的阳谋，而是他想给党内同伙敲敲警钟，至少是提醒他们不要忘了是谁给他们带来了胜利：喝水不忘掘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在这之前的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批判《红楼梦》评论上的非毛式意识形态倾向，虽然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毕竟不过瘾。敲打文化人，只消一声令下，中国人民立马一涌而上，吐痰泼污水，热闹得很，但也无趣的很，没几下就玩腻了。生性好动的毛泽东，接下去产生了反过来玩游戏的冲动，让文化人向党提意见。这个游戏的玩法不再是批判文化人，而是放手发动文化人，让文化人大鸣大放。

号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毛泽东，在领导其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之后，内心深处产生了莫名的反党冲动。很难从意识层面上解释这样的冲动，因为这多多少少带有潜意识的成份。且不说毛泽东在成为领袖之前曾经被这个党折腾得苦，即便是党的许多纪律，也使不愿受束缚的毛泽东感到不耐烦。连讨个老婆都得通过政治局讨论。更不用说，党得了天下之后，毛泽东再英明再伟大，也不得不首先承认，这是党的天下而不是他毛泽东的天下。在打倒了所有党外敌人之后，接下去的斗争，不知不觉地渐渐朝另一个方向聚焦：究竟是党坐了天下，还是毛泽东坐了天下？这是 1957 年大鸣大放最为深层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无论在党还是在毛泽东，都是潜伏在其无意识层面里的，而不是被明确意识到的，更不被诉诸语言文字，因此是绝对不可能在任何文件里找到的。哪怕把天底下所有的秘密档案翻个底朝天，也翻不出这样一个隐秘的背景。真正的历史，不是隐藏在文件里，而是潜伏在无意识之中。

毛泽东和党内官僚的梁子，其实早在 1957 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已经结下了。只是在当时，彼此谁也奈何不了谁。结果当然是达成妥协，拿那些当真大鸣大放起来的书呆子们出气。在这个过程当中，邓小平那样的党内权贵是积极的、主动的，而毛泽东起先则是消极的、被动的。鼓励文化人向党进攻，本来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一如当年高岗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得到过毛泽东的默许。但无论是高岗还是 1957 年的知识分子，全都不懂得毛泽东的善变本性，不知道毛泽东的因势利导本事。再说，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本意，也不过是以此跟党开个玩笑，至多只是闹个别扭。一旦从鸣放中听出诸如轮流坐庄之类的意思，毛泽东的龙颜即便不怒，至少也断然不悦。一句"事情正在起变化"，就像八股文中起承转合的转字诀，一下子将斗争的矛头转向了正在鸣放的书呆子们。

真正是风云突变。刚才还是个鸣放的春天，转眼便成了知识分子的地狱。千百万右派纷纷中箭落马，在地上痛苦得翻滚不已。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党内权贵们却两情相悦，"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彼此都互相致意。毛泽东和党内官僚阶级，就这样达成了默契，就这样一笑泯恩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究竟是毛天下还是党天下，可以慢慢说，要紧的是彼此同心协力地把这天下给坐稳了。

就当政了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毛泽东既是大救星，又是麻烦制造者（Truoble Maker）。1957 年的大鸣大放，差点弄得彼此都下不了台。好在有千百万书呆子填底，彼此踩上一脚，省却了不必要的误会。这边厢刚刚摆平，一转眼，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又成了个难题。毛泽东的好大喜功，以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性命作赌注。赶超英美，大炼钢铁，多快好省，高产卫星，一日千里……搞建设就像变魔术，赢了证明伟大领袖的英明无比，输了只好请中国人民自己承认渺小。像蚂蚁一样的中国人民，饿死成千上万，也不过是伟大领袖和同样伟大的党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所交付的学费。他们的生命本来就是领袖和党给的，关键时候献出去，也不枉了领袖和党疼爱他们一场。这原本是在党和人民之间不言而喻的事情，更是伟大领袖和党内官僚心照不宣的隐秘。1959 年的庐山会议，假如大家能找出个替罪羊来，让伟大领袖仍然伟大，让党继续正确，一切都将平安无事，就像 1957 年大鸣大放造成的危机一样，毛泽东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便和党内官僚们安然度过，彼此皆大欢喜。问题只是在于，谁是替罪羊？

按说，在跟随毛泽东搞大跃进的许多个省级官僚中，随便找一个出来，就可以摆平大跃进造成的尴尬。无奈彭德怀太天真，稀里糊涂地扮演了一次说出皇帝新衣的孩子，而且还是指着皇帝说新衣，这比当众将皇帝扒光了还要让皇帝老羞成怒。面对可怜的饥民，彭德怀良心发现，忍不住喊道：我为人民鼓与呼。为人民呼吁是不错的。可是，向谁呼吁却大有讲究。向党呼吁意识着党是罪魁祸首，向毛泽东呼吁则意味着要毛泽东承担罪责。彭德怀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向毛泽东呼吁。这与其说是彭德怀赤子之心尚未泯灭，不如说是彭德怀本能地维护着党的声誉和清白。总不能让党替毛泽东承担罪责吧？按照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个人服从组织，毛泽东再伟大，也不能比党更伟大。彭德怀下意识地认为，毛泽东应该为党承担责任。就算责任本身并非全在毛泽东一人身上，也理应如此；更何况大跃进还真的是毛泽东的好大喜功所致。必须注意到，彭德怀如此呼吁的前提是，在党和毛泽东之间，必须有一方承担责任。正是这么个前提，让彭德怀吃了大苦头。

彭德怀犯了一个与袁世凯相反却又相近的错误。袁世凯称帝是为了袁氏的家天下，彭德怀呼吁是为了天下的黎民苍生。此其相异之处。袁世凯当年是搞不清楚皇帝和领袖之间的微妙区别，1959 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是没有明白党不能承担的罪责，毛泽东也同样不能承担。袁世凯没有摆平诸候，彭德怀没有提防党内同僚。此乃相近之处。彭德怀不懂、但一些党内权贵们却深知，毛泽东的错误是必须有别人来认领的，只是苦于一时找不到替罪羊。于是，彭德怀十分及时地跳了出来，成为在毛泽东和党内官僚阶层之间心照不宣地认定了的冤大头。此时此刻，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话语能力，不是把彭德怀打成大跃进的替罪羊，而是借力打力地将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机变神速，庐山会议开始之后，起先的政治风向还是力图纠正大跃进的偏颇，突然间就变成了矫枉过正。这是无法从逻辑上解释的。加在彭德怀头上的罪名，竟然不是大跃进的偏颇，而是大跃进还不够偏颇，饥民还不够多，饿孚还不够遍野。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党内官僚，全都顾不上逻辑和事实，先把彭德怀踩下去再说。在毛泽东和党之间产生危机的时刻，平衡是当务之急。而要获得平衡，又必须有人做替罪羊。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向彭德怀一发怒，党内诸公马上跟着毛泽东，群起而攻之。这与其说是这些攻讦者人品太差，不如说是他们的党性太强。即便是朱德、林

彪一类当年与彭德怀生死与共、内心深处又很不以倒彭为然的同僚，也不得不屈从他们的党性。此时此刻，党内权贵中假如有什么聪明人的话，那么应该从彭德怀的下场中看出自己的未来。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圣上与众爱卿长年龃龉的必然

在 1949 年以后执政了的中国共产党权力阶层中，有二个特点是不得不指出的。一个是文官当朝的传统，一个是五四启蒙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武人治国从来没有好结果。所谓的五胡乱华，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武夫当朝。以马上取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几乎成了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就连朱元璋都知道这个道理。文治武功，武功者，打天下也；文治者，坐天下也。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当红的权贵当然不是武夫，而是文官。首轮政治斗争，就是在文官当中进行的。自以为是的高岗，不以刘少奇周恩来为然，结果落得被毛泽东不得不遗弃的下场。高岗的自讨没趣，连站在他一边的毛泽东首席亲信林彪，都只能袖手旁观，无能为力。林彪虽然同情高岗，但骨子里并不热衷权力斗争。林彪是个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不仅明白全国解放之后，理当退到一边，而且还知道毛泽东的热衷于镇压反革命，有点类似秦始皇。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里，有三个元帅是淡泊的，不以权争为然的。一个是朱德，因其天性的忠厚。一个是刘伯承，知道战争一结束，就应该飞鸟尽、良弓藏了。再有一个就是林彪。虽然林彪战功最高，又深得圣上的信任，但一则受了重伤，一则本性淡泊，始终退居，隐居。朝鲜战争，林彪辞战。元帅授勋，林彪请假。要不是毛泽东一再相逼，林彪本来是绝对不会那么招人现眼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总之，这三位元帅明白，安邦治国，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

相比之下，彭德怀不太明白。朝鲜战争拔了头筹不说，还不小心丢失了太子毛岸英。平日里见了皇上张口闭口叫老毛，还爱管皇上的私生活，竟然把去中南海陪皇上跳舞和侍寝的文工团叫做后宫什么的。毛泽东对退到一边的明白人林彪，赶着上架；而对事事强出头的糊涂人彭德怀，只好暂且隐忍不发。就算彭德怀不在庐山会议让为民鼓与呼，早晚也会被毛泽东找个借口打发出中南海。彭德怀的糊涂在于，即便学不了朱德，至少也该学学刘伯承，找个军事学院做个教头，平平安安地了却余生。

相比之下，那些个文官重臣，一个比一个聪明。周恩来的圆通是不用说的了，刘少奇也从来不糊涂。刘少奇的商人秉性，比犹太人还精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可谓共产党生意经中的至理名言。至于后进显贵邓小平，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沉着机灵，遇事不慌。假如没有毛泽东，或者毛泽东在革命成功之后，便像周武王那样早早地撒手人世，那么这党天下便由刘、周、邓再加上陈云一类的官僚们铁板钉钉地坐定了。就安邦治国的党天下而言，毛泽东乃是多余的。这些个红色官僚们，玩权争玩不过毛泽东，说话语也说不过毛泽东，但安邦治国的本事，却个个都在毛泽东之上。

无庸置疑，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这样的反差，而是太知道这样的对比。毛泽东的应对，乃是先发制人，用大跃进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将安邦治国那么精细的事业付诸翻江倒海般的群众运动，从而将那些精明的官僚们一下子压倒。大跃进的荒唐，官僚们心知肚明，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官场上的权力运作和官场上的游戏规则，牢牢地

捆住了官僚们的手脚，也堵住了官僚们的嘴巴。这是一种庙堂内的心照不宣，官僚们让圣上始终活在圣明的光环里；作为回报，圣上自然也把官僚们叫做众爱卿。谁要想破坏这样的游戏规则，谁就是自取灭亡。

从官场的游戏规则上说，彭德怀的自取灭亡，是没人同情的。但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上说，彭德怀的敢言，迫使他们不得不回忆一下当年的"五四"精神。虽然毛泽东的革命把当年的"五四"精神改变成了打天下和坐天下，但是"五四"精神依然存活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内心深处。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许多老共产党人如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右派，不是因为他们党性不强，而是由于他们依然举着"五四"的火把。正如"五四"在过去烛照出的是传统的专制黑暗，此时此刻，"五四"精神烛照出来的，却是一党专制和党天下的黑暗。虽然共产党在 1949 年以后走进了专制极权的黑暗，但许多共产党人的内心深处，却依然"五四"不已。文革以后的 80 年代，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改革派，其基本的精神资源，就是当年的"五四"精神。专制犹在，精神的火把却从来没有熄灭过。文革以后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也跟共产党人心中的"五四"精神很有关系。

由此可见，做了皇帝的毛泽东，不仅要面对党内权力阶层中的安邦治国派，还要面对他们尚未完全泯灭的"五四"精神。即便以科学和民主来概括"五四"精神，也足以使毛泽东原形毕露。在科学面前，大跃进是绝对荒唐的。就民主而言，毛泽东的独裁和家长制作风，也是有违民主原则的。官僚们不敢跟毛泽东公开比试安邦治国的本事，但他们可以按照"五四"精神，委婉地向毛泽东暗示，天子再圣明，也有犯错时。一向玩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毛泽东，终于躲不过官僚们无言的审视，只好在七千人大会上，吞吞吐吐地下了个罪己诏。

假如在毛天下的前提下，毛泽东下个罪己诏，乃是无伤大雅的事情。但偏偏是在还没有分出这天下究竟姓毛还是姓党的情形下，毛泽东一下罪己诏，就等于明明白白地宣告了这天下不姓毛。这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窝囊。然而，官僚们却不明白个中奥妙。毛泽东的败北，使官僚们得意忘形。刘少奇代表着党内的权贵们，喜滋滋地与毛泽东平分秋色。他们满心以为，只要把毛泽东高高地捧起来，远远地架空掉，那么毛泽东再能说会道，也只好退居二线。他们哪里知道，从此以后，毛泽东不管农业，也不搞工业，正好一心一意地搞起了阶级斗争。当他说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时，等于在宣告：刘少奇一打就倒。

从安邦治国的角度说，毛泽东确实退居到了二线；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说，毛泽东无意间又占了个十分有利的位置。成了甩手掌柜的毛泽东，乐得什么事情都不做。因为不做事，意味着不犯错。任何一个做事者，在旁观者眼里都可能成为一个犯错者。世上之事，不做是没有错的；一做便有错，做对了有错，做错了更错。中国古代的无为政治，是避免犯错的政治。中国后来的有为政治，则是错得不能再错的政治。毛泽东站在不做事的有利位置上，以逸待劳地时刻准备着，收拾刘少奇。那个七千人大会，与其说是毛泽东败退一步，不如说是刘少奇自讨苦吃。精明的刘少奇和糊涂的彭德怀，在毛泽东的棋盘上一样属于要被吃掉的子儿。对于毛泽东来说，彭德怀也罢，刘少奇也罢，都是毛泽东把党天下变成毛天下的政治障碍。

"五．一六通知" 的实质：全民动员，打倒共产党

虽然不得不面对远比自己擅长于安邦治国的官僚权贵，不得不面对时不时闪烁在共产党人言词中的"五四"精神，但毛泽东同时又深知党内诸公再有本事也难免染上中国人的国民性。就像人性的弱点是独裁者的温床一样，国民性的病根是产生毛泽东一类枭雄的心理基础。毛泽东的本事与其说在于运动群众，不如说在于擅长利用国民性。长年的孔儒教化，中国人早已学会了向强权低头，向流氓致敬。讲道理的畏惧不要命的，不怕死的害怕不要脸的。张闻天认认真真地作了逻辑缜密的长篇发言，毛泽东一封短信就把他给打发了：说他得了虐疾，叫他去读《七发》。对付文官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威胁要重上井岗山打游击。摆布许世友那样的武人，毛泽东的方式是叫他去读《红楼梦》，而且一遍不行，起码要读四、五遍。周恩来要扮演《出师表》里的诸葛亮，毛泽东正好始终以秦始皇自居。即便打击刘邓也是分而治之，一面抓住刘少奇懦弱的特点，将他置于死地；一面将邓小平流放江西，不死不活地放在那里以观后效。一句刀下留人，把痛失丈夫的王光美感动得刻骨铭心。一幅龙飞风舞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硬将一避再避地退避在一旁的林彪赶进权力格杀的"斗兽场"。正如对周恩来需要不断地鼓励那种"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忠诚，利用林彪为毛天下保驾护航要的是激发其"士为知己者死"那类义气的手段。人是有弱点的，中国人是有国民性的，光凭着这两点，毛泽东就足以天不怕地不怕，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五十年代的反右和打倒彭德怀，乃是出于随机应变，而六十年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精心策划的。虽然任何计划付诸实施，都会顺势而变，但从大致上的发展轨迹来看，这场劫难绝对不是无心插柳之举。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就充分施展话语权威，大造阶级斗争舆论。那边厢是刘少奇们在想方设法地修复国民经济，以包产到户的方式，鼓励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开辟自由市场，让民间有点生意可做。且不说如何的振兴国家，至少是救饥民于水火。这边厢却是毛泽东危言耸听地四处煽风点火，一会儿指责他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会儿警告中央要出修正主义。那边厢是周恩来陈毅向文化界表示安抚，让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松一口气，安一安魂。这边厢是毛泽东大骂文艺界毒草丛生，私底下悄悄地物色姚文元之类的笔杆子，寻衅闹事。及至六十年代中期，国计民生刚刚有点起色，一场风暴便铺天盖地的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袭来。

不错，姚文元批判的《海瑞罢官》也罢，吴晗写的《朱元璋传》也罢，三家村专栏里的文章也罢，确实都有含沙射影之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小偷小摸尚且难逃法网，更何况犯下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弥天大罪。连刘少奇都忍不住地当面警告毛泽东，"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民虽然愚昧了点，都再愚昧也不能如此不把人当人。在舞台上出出怨气，在杂文里发发牢骚，这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要不是中国人民被罩在一个巨大的革命神话里，要不是理想主义的幻觉掩盖了现实生活的贫困，饥民们早就揭竿而起了。然而，历史的荒诞在于，饥民们没有造反，反倒是犯下了制造饥荒罪的毛泽东却大声疾呼：造反有理！

从刘少奇们在六十年代的一些作为上看，共产党并非没有安邦治国能力。在几千年的中国专制文化里，同样也有悠久的文官传统。在专制的权力框架里发挥文官治国的优势，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成就，不失为一个先例。如果说，刘少奇邓小平的治国能力在六十年代只是初显身手，那么在文革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邓小平的主政则

成了一个历史经典。要不是毛泽东的兴风作浪，刘邓式的安邦治国，或许也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来。但也许是命定如此，历史并没有照着刘邓的意愿走，而是转向了毛泽东的造反有理。

如果撇开道德上的是非，仅仅从操作的成功与否来看，毛泽东的打倒刘少奇，确实是一部政治杰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横加罪名，中国式政治游戏中的种种流氓手段，毛泽东几乎全都用上了。从当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评论中得到启发，毛泽东起用姚文元那样的小人物，向吴晗发难，向北京市委开火。从北大学生贴出的大字报中获得灵感，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比起当年启发文化人向党提意见时的欲盖弥彰，毛泽东此刻的矛头指向十分明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这样的定性，顺理成章地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动用了所有的资源，连自己的老婆也被他推上阵去，还硬逼着林彪站在后面助阵，制作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的谎言。毛泽东深知，让文艺界打头阵，必须得有枪杆子垫底。文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向来是用作娱乐的。唯有枪杆子，才是实力的标记。而在所有的将领当中，林彪无疑是一枝最具威摄力的枪。不管林彪愿意不愿意，必须为他毛泽东站台。江青上阵，是求之不得。林彪出场，却是勉为其难。文革之后，有许多人不理解林彪的助毛为虐，有不少人以为林彪也是个野心家。殊不知，在共产党所有实权人物当中，林彪恰恰是个十分鲜见的屡屡直言犯上者。林彪为毛泽东站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抵不住"圣上知遇之恩"的心理压力。共产党的首席战将林彪，骨子里却是个恪守儒家信条的文士。从现今解密的《林彪工作札记》中可以得知，林彪不仅深知毛泽东的胡作非为，而且也十分明白自己不得不屈从的处境。

毛泽东的利用林彪，要的是武力的威胁。毛泽东的使用江青，用途在于得有人冲锋陷阵、得有人四处得罪人、得有人做他毛泽东不便公开做的恶人。这类恶人在过去的历史上，通常有太监扮演。虽然毛泽东身边不缺类似于太监式的人物，但一旦使用上了，难免会因此坐大。与其让一个贴身保镳坐大，不如让自己老婆扮演一下八面威风的皇后娘娘。可惜的只是，江青终究不过一个戏子，既没有慈禧太后那样的心计，也没有《红楼梦》里王熙凤那样的能耐。毛泽东的使用江青，其实是将就着用的。要是毛岸英不死，毛泽东也就没有必要那么辛苦地栽培自己的老婆了。比起皇后娘娘，太子的作用无疑要大得多。二十四史烂熟于心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那样的奥秘，只是天公实在不作美罢了。

通过林彪抓住了枪杆子，通过江青握紧了笔杆子，毛泽东籍此舞动起那条意在缚住苍龙的长缨，把国家主席打下宝座，把党内的权贵阶层扫荡殆尽。他的那张大字报是一声号角，逼着政治局通过的《五. 一六通知》则是一个动员令，动员全体中国人民起来造反，以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名义，打倒共产党。饿得头昏眼花的中国人民不是心里有气么，被打倒遭迫害的那部分中国人民不是怀恨在心么？毛泽东给了他们出气的机会，给了他们报仇雪恨的机会。全体中国人民不由眼睛一亮：敌人又出现了。

伟大的中国人民有一个特点：他们不吃饭可以，但他们不能没有敌人。因为中国人民是看《水浒传》、看《封神演义》长大的，那里面的英雄，全都是靠着敌人的存

在而存在的。没有老虎，哪来的武松？没有纣王，哪来的姜子牙。自以为是武松是姜子牙的中国人民，即便没有老虎也要找一只老虎出来打一打，即便没有纣王也要立一个纣王出来杀一杀；更何况毛泽东告诉他们说，老虎出现了，纣王出现了，就在我们身边，就是躺在我们身边的那个赫鲁晓夫。中国人民能不愤怒么？中国人民能不起劲么？最为重要的是，敌人也是中国人。这是让中国人民最来劲的原因。假如敌人是日本人或者俄国人，中国人民愤怒是愤怒的，但打人家的力气是不足的。一旦敌人也是中国人，那么中国人民具有与愤怒一样足够的力气，把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被打死的敌人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国人的历史上，中国人打中国人远比中国人打外国人要狠，要来劲，要残酷，要毫不留情，要非得置于死地而后快。

可怜的刘少奇，他以为他搞活了经济，中国人民就会感谢他。他也不看看以前的曾国藩李鸿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立下汗马功劳，中国人民感谢他们过没有？中国人民从来不把给他们带来丰衣足食的人当回事。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毛泽东的流氓气本来就是来自中国人的流氓性。中国人民一向敬服的是，在历史的一轮轮流氓比赛当中最终胜出的那个最大的大流氓。中国人民会匍伏在那样的大流氓面前，唱着热烈的赞歌，跳着表忠的舞蹈。敬爱的万岁爷，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既像是一部《水浒传》的演习，又像是一部《封神演义》的操练。不要以为中国人民在那场革命中是痛苦的，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如此幸福过。敌人是明确的，方向是正确的，发嗲效忠的对象更是清楚的。中国历史上哪里有过如此阳光灿烂的日子？

应该说，在这场革命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共产党人，确实是长了见识。革命革命，革别人的命是好玩的，但革自己的命却一点都不好玩了。几乎被遗忘了的"五四"精神，从被关进牛棚或者坐进牢房的共产党人内心深处，重新激发出来。结果是，文革过去之后，形成了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和党内改革派。正是靠了这批开明的要求改革的共产党人，在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年代里，共产党得以起死回生，从革命党过渡到了执政党。

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人民也确实得到了锻练。那样的锻练绝对不啻是出出气而已，而是从中学会了如何对付官僚专制。一场文革，让毛泽东教会了中国人民如何造反，如何对官僚们说不。虽然就现代政治的层面上说，那样的造反未必导向民主政治，但毕竟对官僚们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也对在专制体制中迷恋权力的统治者构成了压力：凡事不要太过分，官逼民反的可能并非不存在。或许正因如此，在文革过后三十年的新世纪背景下，有人提出了人民文革一说。既然毛泽东让人民在文革中出过气，那么以文革的方式造反，也就成了中国人民对付专制的一个传统。七十年代的"四五"也罢，八十年代的"六四"也罢，多多少少都带有文革的印记。

记得马克思曾经预言过，阶级斗争的最后结局，乃是斗争的双方同归于尽。一场文革，最终并没有赢家。所有的参与者，全都是牺牲品。得利的，被利所伤；作孽的，被孽所作；造反的，被人所反；杀人的，被人所杀。向党天下挑战的毛泽东，最终并没有把天下变成他的毛天下。

《五.七一工程纪要》：毛泽东文革的转折点

正如在网上公布的《林彪工作札记》让人难以确信，《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实性也始终疑窦重重。假如说，《札记》可能是出自他人对林彪处境的一种理解，那么《纪要》在当时则可能出于政治对手的欲加之罪。当时同时作为中央文件下达的另一个文件，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致江青的那封信，也同样是出自抹黑林彪、维护毛泽东形象的需要。假如以往所有的党内斗争都可以让毛泽东振振有词的话，那么与林彪的分道扬镳却是让毛泽东最难解释的。

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追随来看，林彪似乎并不在意这天下究竟姓党，还是姓毛。但从对九大政治报告的重心强调来看，林彪很在意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究竟是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还是转入国计民生的考虑。为此夹在林彪和毛泽东之间受了天大的冤屈的陈伯达，晚年如此回忆道：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著。’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摘自《陈伯达回忆录》

虽然个人记忆不能作为历史本身来看，但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信度很大。在打倒刘少奇之后，最高层出现这样的分歧，是在情理之中。林彪和周恩来不约而同地误以为，打倒了刘邓及其一大批追随者，毛泽东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应该回过头来安邦治国了。这应该就是陈伯达说"彻底胜利"的意思。他们的共识既不是出于党性，更不是出于与毛泽东有什么贰心，而是基于常识，出于在长年累月的政治斗争绞杀中尚于泯灭的良心。他们哪曾料想，毛泽东会恶狠狠地作出"还要不要革命"那样的反应。

此刻的毛泽东一如当年打进天京杀人杀红了眼的湘兵，整人整出了瘾。这个信奉斗争哲学的湖南蛮子，全然成了一个政治吸毒者。相比之下，当年的朱元璋倒十分干脆，把功臣们一锅端，省得花时间一个个收拾，结果把自己弄得很变态。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泽东的变态。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是激进的杀死不激进的，然后再由更激进的杀死激进的。革命和吸毒十分相像，也跟赌博不无近似。栽进赌场的赌徒，无可救药的吸毒者，没完没了整人的独夫毛泽东，全都是一回事。这样的革命狂，放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里去的。无奈他偏偏雄踞在数亿患有皇帝崇拜的不治之症的国民头上，得以兴风作浪。

在毛泽东拂袖而去的蛮横面前，周恩来、林彪和陈伯达三个人的反应，颇有象征意味。陈伯达自然是不敢吭声，但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的带头向张春桥发难，也不失为一种勇气，不管那样的勇气是基于田家英式的书生气，还是受了林彪等一大批军人支持的激励。陈伯达式的柔弱和勇气，从大致上勾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周恩来立即投降不说，还低声下气地说出了那番"奴才该死"式的话来，把个诸葛亮活脱脱地扮演成了李莲英。周恩来这种唯唯诺诺，代表了绝大多数混迹于红色官场的官僚。这三个人之中，最为精彩的无疑是林彪。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虽然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所谓顾全大局，但还是把个腰背挺得笔直，把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毛泽东"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林彪这种不服气秉性，可能仅为共产党人中极少数精英所具备。

跳出陈伯达所描述的具体场景，将彼此的分歧置入历史的语境，中国式的权力斗争图景就更为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发展经济、结束阶级斗争的要求背后，蛰伏着一句意味深长的潜台词：刘少奇是无辜的。因为被毛泽东所指责的刘少奇，其罪责无非就是发展经济，不搞阶级斗争。非常反讽的是，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无论是谁主政，最终都得回到刘少奇曾经做过的事情上去。且不说林彪、周恩来和陈伯达，就是以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而赢得毛泽东欢心的张春桥，主政上海时的主要政绩，恰恰也是发展经济。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经济成了全中国的国民经济支柱。上海的轻纺织产品，成为中国百姓的购物首选。但张春桥的成府在于，他从来不提自己治理上海的政绩，而是顺着毛泽东的心思，高唱继续革命。在热衷于斗争哲学的独夫毛泽东的专制之下，发展经济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即便是在发展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归之于满脑子权力斗争的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假如刘少奇明白这样的奥妙，他应该在七千人大会上像林彪那样，把所有的功劳全部记到毛泽东的名下，把所有的错误全部归之于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如果说，在这样的权力斗争里还存在着什么悲剧意味的话，那么悲剧在于，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抑或是周恩来，虽然都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但毕竟都是天良未泯之人。假如他们真的犯了什么罪孽的话，那么无非就是良心罪。在当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是刘少奇犯了良心罪。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则是林彪犯了良心罪。在毛泽东的独裁之下，思想早就不存在了，任何原则也都已经丧失了意义，最后剩下的，不过良心而已。而在权力斗争的格杀当中，成为输家还是赢家的原因，恰好也在于良心的有无。有良心者必输，没良心者必赢。

周恩来原本是凭着良心说话的，只是一看毛泽东的脸色，吓得赶紧将良心收了回去。周恩来的这一退缩，使林彪和陈伯达一下子处在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好在大家全都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挣扎过来的，对周恩来的低声下气，林彪非常大度地表示了理解。不仅如此，林彪还打电话给陈伯达，特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理解。这三个在毛泽东专制面前由于为国为民而犯了良心罪的同案犯，彼此临难之际，还颇有一种以沫相濡的人情味。难怪林彪后来惨死之后，周恩来会忍不住地失声恸哭，听凭当初那颗收回去的良心，在痛哭声中和着泪水尽情地流将出来。

就林彪个人而言，当然并非完人。为了迎合毛泽东，或者说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林彪说了许多违心话，做了许多违心事。但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最终表现出来的宁死不屈，却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党政军首脑们所难以面对的。这可能也是邓小平复出之后，始终不愿为林彪平反的原因之一。尽管邓小平对林彪抱有许多个人成见，

但非常重要的隐衷可能在于，邓小平难以直面林彪的不畏强暴。比起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绝不低头，邓小平可是一再写了检讨书一再保证过永不翻案的。如此鲜明的对比一旦大白于天下，邓小平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敞蓬车上向全国人民招手？在林彪的悲剧面前，苟活下来的邓小平，纵然有改革开放的丰功伟业，也比林彪矮了一大截。只是中国人民也许不会如此看问题，他们会把邓小平的苟活，看着是一种生存智慧。假如中国人民全都像林彪那样直面暴君，那么要么是中国人民早就死绝了，要么就是暴君在中国历史上早就绝迹了。二千多年之前的殷商遗民，不管周公如何残杀和镇压，始终不屈服于周朝的统治。二千多年之后的所谓中国人民，却变得如此容易被暴君所征服。历史难道真的像有些人断言的，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么？

整个一场文化大革命，还真是幸亏留下了一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否则，被暴君如此折腾的人民竟然连暴君一词都不曾说出来过。虽然许多中国人民读到以中央文件形式下达的这份《纪要》时，依然崇毛不已，盲目痛骂林彪，但还是有不少中国人民，因此猛然醒悟，原来如此：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摘自《五.七一工程纪要》

不管邓小平与林彪有多少个人恩怨，在如此一番真话面前，竟然能够说出″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其人格也就不言自明了，其″六四″作孽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事功和人格经常是分裂的，但在指出其事功的同时，很有必要指出其人格。林彪没有机会做出邓小平那样的事功，但林彪在毛泽东的专制面前，做出了邓小平做不出的事情，说出了邓小平说不出的话。不管林彪有没有看过这份《纪要》，不管林彪知不知道这份纪要，能够把毛泽东看得如此清楚者，非林彪莫属。有其父，才有其子。因为有林彪的洞察，才会有林立果在《纪要》中的如此直言。

从《五.七一工程纪要》反观林彪和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地过于宅厚，他们的反抗太过有限。他们一方面把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是秦始皇式的封建暴君。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就曾当面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一说，向毛泽东提醒过不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辙。但在另一方面，当他们真的准备有所作为时，却完全低估了毛泽东的不可理喻。更不用说，林彪还不忍心将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林彪和陈伯达一样，基于在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把怨恨仅仅集中在张春桥头上。或许是出于对毛泽东的这种回避和退让，陈伯达等林派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的发难，有类于西汉时的清君侧。只是张春桥虽然是像晁错般的文人，但毛泽东却并不是汉景帝那样的帝王。

假如毛泽东只是汉景帝那样的帝王，那么庐山会议上的清君侧，确实有成功的可能性。不要说身为毛泽东秘书的书生陈伯达那么起劲，就连毛泽东最信任的贴身卫士汪东兴，都站在林彪一边。这些人一个个在权力斗争中饱经风霜，不说魄力如何，至少眼力是不错的。张春桥再受毛泽东青睐，也抵不过与毛泽东有着几十年生死之交的林彪。即便不算毛林间的友情，就拿林彪和张春桥在实力、人气、威望等等上的各种指标来衡量，毛泽东也不至于取张舍林。这就好比一场豪赌，就连知根知底的汪东兴，都把赌注押在了林彪这一边。这情形很像 1989 年的"六四"期间，不少人都误以会，事情闹到这个份上，邓小平再蛮横也不至于真的下令开枪屠城。他们没有设想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一个可以一再作检讨一再表示永不翻案的人，一个可以在林彪惨死之后马上乘机向毛泽东表示效忠的人，怎么不可能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断然开枪？在不顾脸面和没有底线这一点上，检讨效忠和开枪杀人，是全然统一的人格。

1970 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者，也没有设想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既然毛泽东连向他表示投降的刘少奇都不肯放过，岂会饶了向他挑战的林彪及其同党？就利害的权衡来说，林彪的份量确实是张春桥所不可比拟的。但问题在于，份量越重，毛泽东越忌惮。熟谙官场的汪东兴，至少有二点没有想到。其一是，打倒刘少奇之后的毛泽东完全处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里，胜利就像是一种特殊的兴奋剂，或者说一种革命的春药，让毛泽东欲罢不能。胜利后的毛泽东不愁斗争不已，就恨没有敌手。其二，毛泽东虽然深知林彪没有野心，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林彪赶进权力斗争中心，但毛泽东却同样深知林彪有个老虎般的儿子和自己没有那样一个儿子之间的微妙区别。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革命理论路线斗争之类来解释的。这是只能用中国传统的帝王术和权力术来解释、才会一目了然的秘密。网上有文章说，林彪纵容他人吹捧林立果，乃是其在政治上的最大败笔。此言确然。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并非偶然地曾经对地方军政大员一再说起：一个毛头小子，捧为超天才，没有好处。假如当时在场的官员之中，有点悟性的话，可以从中听出毛泽东的潜台词在于：如此吹捧你的儿子，是不是欺我毛泽东无后呀？倘若我家岸英不死，又岂是你家林立果所能比得上的？

毛泽东并不是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庸常帝王，而是个占有欲如同秦始皇一般强烈的绝代暴君。他不仅看重生前的权力，而且也同样在乎身后的名声和身后的权力所属。虽然天公不作美，绝了他的后，但他依然把目光紧紧地盯在他死后这江山能不能继续姓毛的焦点上。林彪处处小心，却还是因为对儿子的钟爱而有所疏忽。按照暴君政治和江山归属的逻辑，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接下去还要消灭一连串政治对手，无论是浮出水面的，还是潜伏水底的；也无论是林彪，是周恩来，还是张春桥，或者是其他对毛家江山构成威胁的任何人。政治只有利益没有朋友，暴君政治只有不断地消灭对手，没有任何容忍对手存在的可能。眼看着林立果青云直上，就算林彪不向张春桥发难，毛泽东也会找个籍口将他除掉。客气点，打入冷宫。不客气起来，那就是打入地狱。毛家无后，林家岂能有后？这可能是当时所有当事人都没有弄懂的一个秘密。不要说林彪不明就里，不要说陈伯达不知轻重，就是汪东兴也没有弄明白个中堂奥，自作聪明地站到了毛泽东"亲密战友"林彪一边。

不过，神机妙算的毛泽东，有一点没有算到：事事称臣的林彪，骨子里却对毛泽东是何许人一目了然。真不知毛泽东在批发那份印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文件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他应该知道，在把林彪打入地狱的同时，那份《纪要》也同时给

了他毛泽东一巴掌。林家父子的刺秦之剑没能出手，但这份《纪要》之锐利，绝不下于一把刺杀暴君的利剑。这份《纪要》使高高雄踞在神坛上的毛泽东原形毕露。毛泽东此刻也许应该明白，他早该在林彪对他"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和"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溢美之词中，听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的潜台词来。毛泽东没想到，林家父子会在死后留下一份明镜般的《纪要》，照出他毛泽东的真面目。

据毛泽东身边人士回忆，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大病了一场，神志不清，嘴里不停地说胡话，而且句句说的是林彪。经由林家父子的血祭，在毛泽东昏话中度过的那段历史，开始在毛泽东的胡话中起死回生。需要指出的是，林彪虽然不接受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但他骨子里却并没有刺秦的意图。这也是林彪掉进悲剧的原因之一。以林彪的军事才能，一旦启动刺秦行动，绝对不会做得像林立果那么稚嫩。相反，毛泽东却以防备林彪那样的戒心和警惕，布置了对林家父子的反击。初生牛犊林立果虽然行事不够老练，但他的断然出手，也确实抓住了历史的要害：面对疯狂到了不可理喻的暴君，除了博浪一击，别无选择。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好比景阳岗上碰到了老虎，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还不如放手一搏。中国人民虽然迷信帝王，但对于敢做荆轲的猛士，倒也一向心存敬意。

林彪事件及其《五.七一工程纪要》，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按说在九大开过之后，就应该出现。要是毛泽东还听得进别人意见的话，那么早该尽快结束文革，发展国民经济。由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导致了这个转折直到林彪反抗失败之后，才姗姗来迟。为此，邓小平赶紧上书效忠，陈毅得意忘形，拼着一付老命，落井下石。原先被打倒的权贵们，纷纷从地上抬起头来，盼望着圣上扔出赦令。于是，毛泽东再一次发挥出因势利导的变色龙本事，把以往的作孽朝林彪身上顺手一推，朝着倒地的权贵们和颜悦色地做起了好人。且不说这些权贵被打倒之前做过些什么，就凭着他们这付下贱的模样就可以想见，没有一个是冤枉的。只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林家父子的惨死，总算换得了"抓革命、促生产"这六个字。在革命的名义下，生产总算有了合法性。换句话说，在疯狂得不知如何了结的互相残杀中，大家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性。

从天下退向床笫，毛泽东家天下的末日

如果说，九大以后的毛泽东不用头脑思考，而是凭着意志行事；那么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不再以思想和原则取人，而是跟随着身体的感官起伏了。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上吸取的教训之一，也许就是思想是靠不住的，原则也是随时可以变动的。唯有跟他同床共枕过的女人，或者血缘关系上的亲属，肯定不会背叛他。比如，是他床上的女人，发现了有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了窃听器。更不用说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替他冲锋陷阵。即便是从他龙床上毕业出去的谢静宜，不管权力地位如何的不断升高，对他的忠心耿耿却是始终如一。据毛泽东最信任的侍妾回忆，毛泽东晚年最后定下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毛泽东的女人占了二席（江青，张玉凤），毛泽东的亲侄子占了一席（毛远新），毛泽东的大内侍卫占了一席（汪东兴），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占了一席（华国锋）。可说是个典型的毛家班底。那位侍妾还回忆道，当江青不解地问毛泽东、为什么没有王洪文和张春桥时，"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不让老帅们掌权，无疑是吸取了林彪背叛的教训。不让王洪文和张春桥进政治局，则是对这二个人不放心。王洪文是个刘盆子式的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张春桥又过于老谋深算，无论是毛泽东的女人还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或者毛泽东的侍卫，全都压不住这个军师般的政治人物。在毛泽东的权力中心里，张春桥扮演一下亚父范增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但高踞决策层却是危险的。且不说毛泽东的这个如意算盘是否把机关算尽，也不说那位侍妾的回忆是否真切，更不说网上流传的这个回忆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能够肯定的是，毛泽东对身后的权力所属，确实非常上心。

一个独裁者，在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之后，在感到终极胜利的孤独之余，最为牵挂的也许就是死后的权力归属。嬴政将自己奉为始皇，意思是皇位将世世代代传下去。这在毛泽东，牵挂的就不啻是皇位，还有他的话语权力能否得到承传。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劳什子本来不过是用来唬弄党徒和欺骗人民的，一旦成功，连毛泽东自己也迷上了。正如秦始皇四处求仙，追寻长生不老之药，毛泽东处心积虑地安排后事，求的无非是身后的权力犹在。就算身后的接班人不姓毛，执政的思想和路线也必须属于毛泽东。秦始皇以求仙缓解对死亡的恐惧，毛泽东以寻找接班人填补他死后的空虚。毛泽东明白，肉体的消失是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精神的不死却是无论如何也要拼死一搏的。连秦始皇都知道自家的王朝要永远延续下去，毛泽东岂能不懂得权力应该千秋万代承传下去？天下的男人信不过，还有床上的女人嘛。

假如上苍再给毛泽东十年、二十年的寿命，那么不仅张玉凤升入政治局常委，还有谢静宜，王海容等等一大批毛泽东的女人们，进入权力中心，从而体现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想，还可以美其名曰：让半边天们来担纲整个天下。江青主政，张玉凤主管内务部，谢静宜主管教育部，王海容主管外交部，然后再找个小女兵或者美丽的文工团员在床上栽培一下，就可以主管国防部了。毛泽东的天下就此安排得妥妥帖帖。如此一个以床治国的新时代，如同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如同茫茫大海中看得见桅尖的航船，如同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从中南海边冉冉升起。这是秦始皇所不敢想像的，也是秦始皇即便想得出来也断断乎做不到的。

要是真的弄出一个列女治天下的景观，倒也不枉了毛泽东读了场《红楼梦》。只是毛泽东在床上栽培的那些女子，实在太平庸。且不说没有一个及得上王熙凤，更不用说找不出一个贾探春，就连及得上鸳鸯水平的，也一个都没有。真是女到用时方恨庸。当初上床时也不考察一下人家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一味的猴急着满足欲望，如同解决内急一般。结果弄得武则天空缺，慈禧太后空缺，王熙凤空缺，甚至连晴雯鸳鸯平儿都通通空缺，终使以床笫治天下的创举成为南柯一梦。

无法让他的女人们来救急的毛泽东，最后只好在他不喜欢的男人当中周旋和折冲。周恩来，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还有那个跟王洪文一样平庸的亲侄子毛远新。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让毛泽东放心，没有一个能让毛泽东真正信任。尤其是那个号称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越是做出死心踏地的样子，越是让毛泽东不放心。

不管周恩来如何努力，毛泽东绝对不会相信这个当初跟刘少奇一起搞过国民经济、又跟林彪一起向他建议结束文革回到经济发展的忠实助手。在毛氏家天下和党天下之争的文革当中，毛泽东早就看清楚，周恩来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他毛家

的立场上。周恩来的忠于毛泽东，不是因为毛泽东是天下的主人，而是由于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周恩来之于毛泽东的奴性，跟周恩来之于共产党的党性，紧密相联。奴性和党性，始终在周恩来身上此起彼伏。奴性一减弱，党性马上站起来。奴性占上风，只是暂时的；党性的坚定，才是主要的并且是不变的。就因为这一点，周恩来做死奴才也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的起用邓小平，实是在个无奈之举。毛泽东虽然不把他所缔造和领导的共产党放在眼里，但他发现把党内当权派通通打倒之后，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也许是共产党把旧时代的官僚阶级扫荡得忒过彻底，以致于等到他们填补上去之后，一旦全部打倒，再也找不出另一个官僚群体来替代。当个真命天子固然轻松自得，但国家机器的运作，还得由官僚阶层来操办。一场浩劫过后，就算是马上恢复科举考试，也来不及培养足够多的管理人才维持一个国家的运行。凭着老茧上大学，一时兴起玩玩可以，当真起来却绝对误国误民。跟王洪文一样无能的准太子毛远新，以此讨好毛泽东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此治国平天下却不免会闹笑话。权衡来权衡去，毛泽东最后不得不让邓小平重新复出。这与其是对邓小平的信任，不如说是对党内官僚集团的一个让步。顺便说一句，毛泽东的这种尴尬，可能也会让将来的政治家碰上。虽说共产党的治理带有种种专制的因袭，但真的把共产党一下子摘除掉，会不会像毛泽东当年那样面对一个权力的真空？会不会像毛泽东一样，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之后，发现自己接下去面对的竟然是王洪文、陈阿大、毛远新、张铁生之流？暂且在此存疑。

虽然张春桥有政治头脑，有理论素养，但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张春桥没有林彪那样的军事天才，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治国能力，没有周恩来那样的众望所归。唯一的选择，只有在所有这些人当中走钢丝，搞平衡。林彪事件出来后，毛泽东应该后悔自己的猜疑和不择手段。毛泽东在林彪背后说的种种坏话，几乎都是毛泽东的自画像：不搞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不光明正大，背着林彪搞阴谋诡计；不搞团结，要闹分裂。林彪一死，原来的权力平衡顿时丧失。周恩来没有了制约者，张春桥没有了死对头，江青没有了忌惮者。原来被打倒的官僚们全都蠢蠢欲动，伺机翻案。逼死林彪，对于毛泽东来说真正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林彪死后的毛泽东，最好笑的事情，莫过于提携王洪文做接班人。从毛泽东的帝王术来说，这种手法颇类于当年鼓励叶群入政，以此为江青的出山作铺垫。明里提的是王洪文，暗里准备的却是毛远新。但不管毛泽东怀有什么样的鬼胎，他对王洪文那些个可笑透顶的赞誉，却铁板钉钉，白纸黑字，怎么也抹不去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一面赞颂伟大领袖，一面忍不住地会嘀咕几声：昏君。

毛泽东晚年的昏庸，有一个人看得十分真切。那就是大内主管康生。康生临终之前，做出了一系列怪异的举止。诸如揭发江青，指控张春桥，等等。康生的这些举止，很像陈伯达在 70 年庐山会议上的作为。且不说其中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奥妙，至少说明康生并非糊涂虫一个。联系到康生曾经委婉地提请毛泽东向林彪让步，林彪之死很可能对康生有所触动。中国的政治虽然是黑幕，但透过黑幕，也能看到人心的些许亮点。即便可恨可恶如康生者，最后也对毛泽东的昏庸和一意孤行不无失望。

当然，康生应该庆幸他死得及时。要不然，很可能会像周恩来那样，即便不想及时死去，也不得不及时死去。既然毛泽东的专制是架绞肉机，那么被绞进去只是迟早

之事，谁也别想抽身逃避开去。就此而言，邓小平不惜低声下气，苦苦哀求，也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之下，能够幸存的，唯有庸人。至于邓小平的永不翻案，也确实是靠不住的，该哀求时则哀求，该泼辣时耍泼辣。毛泽东在床上没能发现的王熙凤，在被打倒的男性官僚当中，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由此也可想见，苍天并不襄助毛泽东。

独裁者的末日是凄凉的。且不说最后一个除夕过得如何凄惨，即便是千选万选最后选中华国锋主政，也实在可怜可悲、无可奈何得无话可说。帕金森定律，特别适用于独裁者的专制政治：不是矮子里拔长子，而是长子里找矮子，越找越矮。中国人的退化，就是这么形成的。专制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大一统天下，但同时也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衰落。毛泽东要流氓还知道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人要流氓，却只会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如果说毛泽东以前的流氓崇拜通常诉诸英雄崇拜，那么毛泽东以后的流氓崇拜只能以崇拜流氓来表达。

从毛泽东侍妾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死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并非不清楚。这其实不用看侍妾回忆也可以推理出来的。如同秦始皇那样，企图永远窃据江山，占据国人之心，只能是一种梦想。这种梦想比毛泽东假装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还要虚幻。毛泽东更加不会不清楚的是，他的成功，是建筑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上的，一如专制通常建筑在人性的弱点之上。这可能是让毛泽东感到不无安慰的地方。只要中国人的国民性不改变，那么毛泽东永远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不是心灵的相通，而是下水道的连接。在一个精神病院里，病人和病人之间，经常是互相会意的。

毛泽东感到不安的，是他的话语和他的所谓革命路线，是否能够得以承传。这可能是毛泽东跟以前的帝王不太相同之处。以前的帝王，以姓氏的承传作为家天下的标志，而毛泽东则以他的思想和路线能否继续，作为毛氏天下有无香火的记号。这也是毛泽东跟其他同时代的东方专制者之间的区别。比如北韩的金日成，台湾的蒋介石，新加坡的李光耀。当然，毛泽东并非没有家族观念，并非没有血缘意识，假如毛岸英不死，毛泽东会毫不犹豫地把江山传给岸英皇太子。至于岸英皇太子会不会按照先父的思想和先父的路线行事，那就只能顺从天意了。就此而言，老天确实并不眷顾毛泽东，把个窝囊废毛远新代偿了英俊潇洒的毛岸英。这是邓小平以及其他所有让毛泽东感到讨厌的党内权贵深为庆幸之处。这帮马克思主义的伪信徒们，骨子里对于王朝兴衰的故事可是烂熟于心。大家全都在按照老皇历行事，虽然嘴上说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并不担心马克思主义或者列宁主义能否在中国继续下去。这跟他无关。林彪说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毛泽东其实是当代最伟大的毛泽东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之类的，可以作为前提，但最好不要说出来。无论是作为思想资源，还是作为话语权力，马克思也罢，列宁也罢，对于毛泽东来说，都不过是打鬼的钟馗，利用过了也就利用过了。既然孙悟空都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毛泽东岂能有那么多的精神之父？毛泽东的画像一旦在天安门城楼挂起来，谁也别想随便分享。

毛泽东也不担心江青在他身后会遭殃，虽然江青对他的忠诚，无人可比。毛泽东

在《蝶恋花》里怀念的杨开慧，可能对毛泽东早已生了憎恶之心。斯大林的妻子是用自杀向丈夫表明自己的失望，杨开慧却很幸运地以成为烈士的方式向毛泽东告别。稍许心高气傲一些的女人，或者说，稍许有点精神追求的女人，都不会崇拜毛泽东那样的男人的。就连江青，都嫌只知道吃红烧肉的毛泽东土里土气。忠于毛泽东的女人，不管出身于平民还是世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前提：精神上没有内容。顺便说一句，孙维世的悲剧恰好源自于她是个有精神追求的女子。孙维世的艺术气质使她既无法爱上苦苦追求她的林彪，也不喜欢霸王硬上弓的毛泽东。江青之所以非要将孙维世置于死地而后快，就因为江青感觉到在孙维世面前的自惭形秽。江青不会吃张玉凤或者谢静宜的醋，因为彼此都是同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异类是必须处死的。据说，孙维世死得惨不忍睹，赤身裸体，遍体鳞伤，脑门上还被钉进了一颗钉子。且不说其它，就凭孙维世死得如此悲惨，毛泽东也有足够的理由，不必担心江青日后会遭殃。

很难说，毛泽东的革命、尤其是他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就毛泽东所假装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言，应该说是悲剧。因为毛泽东从那个乌托邦里最后引申出来的主张，乃是解放全人类。那与其说是胸怀世界，不如说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且不说其它，只消看一看纪录片里接见马科斯总统夫人及其女儿的毛泽东，以如何贪婪的目光盯着人家母女的身子，就可以知道毛泽东的解放全人类是什么意思了。要是让马克思在天之灵阅读了毛泽东的这场革命，也许会后悔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

相反，就毛泽东处心积虑地建立的毛氏王朝来看，则是一场喜剧。这场喜剧的高潮，乃是毛泽东最后拟定的那份政治局常委名单。毛泽东在那份名单里，一笔改写了《红楼梦》：指派花官和袭人，在焦大及其家丁们的护卫下，昂首阔步地占领大观园，就像当年派军宣队工宣队占领高等学府一样。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这个班底根本不是党内众官僚的对手，只是除此之外，毛泽东别无选择。更为可笑的是，花官式的江青和袭人式的侍妾，还压不住阵脚。最后，毛泽东无可奈何地选择了焦大式的华国锋，成为他的接班人。就权力斗争而言，炉火纯青的毛泽东最后以白痴般的境界作结。就毛氏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争夺而言，毛泽东最终向对手摆出的，竟然是一个豆腐阵，一推就倒，一踩便烂。只是仅就个性而言，流氓气十足的毛泽东倒也不失为一个性情中人。从天下退向床第的结局，并非是所有流氓都能够享受的。洪秀全是死在床上的。孙中山还没等到得天下，便命丧黄泉。毛泽东无疑算是最为幸运的，当然也是三个草莽当中最有能力的。也算是多劳多得吧。

弥留之际的毛泽东，可说是四顾茫然。理想的天下，犹如理想的接班人一样，可遇而不可得。毛泽东以为，把党内所有官僚通通打倒之后，会涌现出一大批充满热情充满智慧的国家主人翁。按照毛泽东之于毛岸英的培养模式，既当过工人，又当过农民，还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练过。可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找到的王洪文，原来是个刘盆子。即便是直接从农民中提拔起来的陈永贵，也只有农民的愚忠和农民的狡猾，毫无治国能力。经过这一系列的讽刺，毛泽东应该发现传统的科举制是如何的有效，至少比以他毛泽东的方式拼凑官僚班底要强得多。科举制难免腐败，但毛泽东选拔的官僚们还没进入运作就已经腐败了。作为对毛泽东的莫大讽刺，王洪文的所作所为给那幅叫做文革的漫画，添加了意味深长的一笔。

假如除去权力斗争的手段、阴谋、权术、韬略等等，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空空如也。

要而言之：四个字，加上一句话。"造反有理"，加上"解放全人类"。造反有理的发明权，属于陈胜吴广，叫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帝王将相确实没有种姓规定，洪秀全可以做，孙中山可以做，毛泽东也可以做。至于解放全人类，则是毛泽东一个贪得无厌的白日梦。经由一场文革，让天下姓了毛不算，还想让全世界都姓毛，遍地鸡（既）毛。这种梦希特勒也做过，可是人家却并不想让全世界都姓希，而是想把日耳曼人推到世界之主的位置上。这可能是毛泽东和希特勒之间的区别。毛泽东也抬举中国人，但前提是中国人必须站在他的脚底下。在毛泽东的乌托邦里，中国人都像孙悟空拔下的一根根毫毛。或者说，毛泽东从身上随便什么地方拔下毫毛随口一吹，就变成了中国人。

这样的中国人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把文革岁月说成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可能是毛泽东身上的什么毛。但至少邓小平不愿做这样的中国人。邓小平不敢打倒毛泽东，而是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和毛泽东的话语发生冲突。然而，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却把毛泽东思想及其所谓的革命路线，不知不觉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秦始皇的江山，传了三世。毛泽东时代却随着毛泽东的仙逝而归西。毛泽东九月死，毛氏天下十月份就结束，快得足以让秦始皇的孙子瞠目结舌。毛泽东机关算尽，也算不到结束得如此之快。好在邓小平给毛泽东留足了面子，罪恶全部算在江青头上。仿佛是江青而不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江青不是毛泽东打倒了党内全体官僚，是江青而不是毛泽东处死了刘少奇等权贵。毛泽东九泉之下，应该感谢邓小平的这种党性，依然念着毛泽东是党的伟大领袖。邓小平只是把天下从毛家手中，收回到党的怀抱里罢了。似乎是为了表明心迹，邓小平不再让家属和子女像江青和毛远新那样等着接班，而是让他们去经商致富，成为新一代富人。在一个没有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时代里，邓小平不声不响地培植起了新的地主和资本家。要是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邓小平的回应是：不争论。从毛泽东时代煎熬过来的邓小平，深深地懂得，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毛泽东时代的种种痕迹，在邓小平只做不说的努力之下，慢慢地淡出。对于中国人民的遗忘本事，邓小平充满信心。只消大家都忙着赚钱，忙着买房子买地买车买妓买文凭，谁也没空怀念什么毛泽东。毛泽东最后真的成了钟馗那样的符号，让人们用来避邪避灾。以邪避邪，以灾躲灾。在迷信背后似乎也透出一种生存的智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说起毛泽东想哭，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人说起毛泽东想笑。在外国人面前一产生自卑感，中国人马上会想到，毛泽东已经让中国人站起来了。看着电视上的中国官员朝着外国政客点头哈腰，中国人民马上会说，想当年毛泽东接见谁谁谁的时候，是个什么光景。但也仅此而已，中国人民不想再回到当年的阶级斗争年代，不会把光鲜的时装脱下来，换上文革时期的破衣烂衫。这是邓小平比毛泽东聪明的地方，也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知道中国人民的地方。一旦吃饱了，喝足了，还有谁关心这天下到底姓什么？

作为一个受了五四启蒙的影响从而有抱负有理想的五四青年，毛泽东转向以他的名字为标记的革命，结局无疑是场悲剧。可是，作为中国专制传统和造反传统的承继者，作为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的最后一个帝王，毛泽东上演的却是一场喜剧。置身这场喜剧的人们，没有一个笑得出来。那样的残暴，那样的血腥，那样的黑暗，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即便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好在毛泽东把这场喜剧演到了极致，后人即便再有毛泽东的雄心，也演不了那样的喜剧。相反，毛泽东式的悲剧却依然可

能重演。由于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至今没能获得应有的彻底，致使革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将来的中国，任何一场可能发生的革命，结局都将是悲剧性的。毛泽东的时代是结束了，但毛泽东式的革命，却依然是悬在历史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的命运，前途未卜。

2006年8月23日写毕于纽约

参考书目：

《从曾国藩到毛泽东——论中国晚近历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
《论毛泽东现象的历史成因和文化心理》,《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
《商周之交与百年激变》《当代》2004年第4期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
《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张戎
《林彪和江青》
《陈伯达回忆录》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
《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
《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文革诗词见证历史

梅振才

中国是一个诗国。中国诗歌与中国历史同生共长。如沈约所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历史衍生了诗歌，诗歌亦印证了历史。当代著名史家、诗人陈寅恪倡导“以诗证史”，即以诗歌作为重要的史证之一。

被定论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这是一个“史无前例”残暴和荒诞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诗歌，也可为这段历史作出佐证。

我是一个文革时代的亲历者，一个旧体诗词的爱好者。近三年来，我致力于发掘、收集和研究文革诗词，每周写一篇在纽约报刊的诗词专栏发表。为纪念文革发生四十周年，选取其中１２６篇汇成一册《文革诗词钩沉》出版。在伏案写稿时，似重温旧梦，腥风血雨尚历历在目，哀歌悲吟犹在耳边，我时有触摸诗史的真切感。这篇《文革诗词见证历史》一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中国诗史中极为重要的段落——文革诗史，没有“文革诗史”，中国诗史是不完整的。

一、文革诗词产生的时代原因

文革浩劫伊始，一个“破四旧”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所谓“四旧”，即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无疑，旧体诗词也是属于“旧文化”之列，在近、现代已逐渐式微。奇怪的是，文革未能灭绝旧体诗词，相反，却刺激了旧体诗词的创作，以至在十年浩劫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作品。出现此种“反常”的现象，似有多层复杂的原因。

１、“大批判”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

文革时期，全国遍地文字狱。文革以“大批判”开路，“反动诗词”即为大批判的对象之一。六十年代，邓拓写有一首咏东林党人的七绝：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此首咏史诗，被文痞姚文元批判为企图以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邓拓有口难辩，最后以死抗争，成了文革时期因旧体诗词殉难的第一人。此后，按此模式，很多诗词被“上纲上线”，莫须有成了“反动诗词”。当然，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谙熟诗词的文化人。然而，这些“大批判”，却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这些“反动诗词”私下成了人们学习和欣赏的活教材。

２、“毛泽东诗词”之普及推动了旧体诗词的复兴

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与《毛主席语录》一样，被捧到类似“圣经”的地位，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典范。毛泽东的诗词，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至于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毛泽东诗词的普及，使旧体诗词重新得到重视，令旧体诗词重现生机。文革时期产生了大量诗词作品，从另一角度记录了文革的历史，这是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鼓吹者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诗词也成了毛泽东推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道具之一。１９７３年夏，为以后开展“评法批儒”，把矛头指向“现代大儒”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３、专制的利刃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专制的利刃亦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中国的诗道由来已久。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冤狱遍地，暴力与恐怖皆“史无前例”。正所谓“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诗词，也成了人们表达愤怒，宣泄情感的工具之一。文革诗词，有的是用笔和纸写成，有的是用血和泪凝成。如《出身论》青年作者遇罗克，临刑前留下悲壮豪雄的遗诗：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文革时期出现大量诗词，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上述三项是主因。

二、文革诗词作者的社会属性

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内容则反映了文革的整个进程。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我作粗线条的归纳分类，希望能理出一个文革诗词的纲要。

１、中共领袖和高干的诗词作品

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具文学素养和喜好诗词者，为数不少。在文革残酷的斗争较量中，起落浮沉，成功失败，皆决定了这些高干诗词的内容、倾向和格调。

１９６６年6月，正是文革拉开序幕之时，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有关文革题材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诗词，其生前曾反复修改并予审定，可见其本人对此诗的重视。此诗的基调是歌颂文革，而文革已受到历史的鞭挞。故有方家评之：“于今看来，它是一首有遗训价值和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的代表作。”

而毛泽东的一批战友，在文革中跌落万丈深渊，他们的诗词又是另种情景。如被判为“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身患绝症，与妻子曾志生离死别之时，写下一首《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此类“蒙垢余生”后之作，皆沈郁苍凉，甚有感染力。然就以陶铸而论，其当年在广东大反“地方主义”，害死不少地方干部，“如烟往事”，是不应该忘却的。

２、作家、学者、文化人的诗词作品

这类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份子，多擅长诗词，在文革中，多有遭批斗、抄家、下放干校劳动的经历，所历所感，随时入诗。故在文革诗词中，这类人的作品所占的份量最大，艺术性也最高。

此类文化人中，史学家、学者、诗人陈寅恪颇具代表性。１９６６年４月，即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陈寅恪写下此生的最后一首诗《丙午清明次东坡韵》，为其《诗集》的压卷编。此诗尽抒“丙午清明”“魂已断”的凄清、沉痛和愤慨：

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
贤妻孺仲恹恹病，弱女渊明款款来。翻忆凤城一百六，东风无处不花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曰下午，北京红卫兵把市文化局收存的一大批珍贵的京剧戏装和道具，堆在国子监孔庙大院焚毁。萧军、老舍、骆宾基等二十九个著名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被勒令跪在火堆前，头杵地，挨了三个多小时毒打。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折磨至翌日才释放。老舍，当日就自沉于太平湖中。萧军为此写下《国子监》一诗，描绘了文革中极为惨烈的场景：

烈火堆边喊“打”声，声声入肉地天惊。藤条皮带翻空舞，棍棒刀枪闪有风。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妇女裂褫裎。“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红。

３、普通干部和平民知识份子的诗词作品

以人数而论，这部份人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十分浩巨的阶层。他们也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在十年浩劫中，虽然处境各有差异，但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

击，他们在文革中皆有痛苦的经历和苦涩的回忆。

游街示众，乃文革一大景观，大江南北，随处可见。当年为哈尔滨六中教师的叶昌，当然难逃此劫。被批斗游街之时，叶昌有感而口占《游街四首》，此为其中一首：

头戴高冠颈挂牌，牛鬼蛇神伫列开，草索系腰成串串，敲锣打鼓上街来。

平民知识份子也算是“臭老九”。如赵振新是一个普通干部，但１９５８年因直言贾祸，曾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的风雨中更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其所写的《无题》三首，道尽平民百姓、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悲凉、无奈和愤慨。其中一首云：

满城金鼓震心肝，隐隐悲歌挟重寒。寄语故人钳口好，冬来难得是平安。

４、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的诗词作品

文革时期，特别是文革前期，大量涌现了红卫兵、造反派撰写的“颂毛诗”、“战斗诗”和“口号诗”。红卫兵的“战歌”，充斥“杀、杀、杀”之声。这些诗歌属新体诗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其中一些青年，已开始学习写作格律诗词，虽然未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

１９６６年8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２６日，在三个半月时间内，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般青年学生，视毛泽东的接见为“最大幸福”。然而，青年学生中也有清醒者，如来自广州市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振聋发馈、掷地有声的《接见》诗：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何永沂之诗词结集《点灯集》，选录其写于文革时期的诗三十五首，皆富文革色彩。除《接见》一诗外，又如“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　。登高纵目开生面，处处山镶大字‘忠。’”诗家周退密有评：“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像，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像　，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当年为北大历史系学生的李树喜，在文革中也写下五十多首旧体诗词，其中有３３首收入其《杂花树》诗集中之《文革印象》卷。此阕《水调歌头・骂声歌》，即为其中之一。

挨骂不须怪，争斗伴人生。恰如雨落风过，处处时时听。强敌高声叫骂，一似披花戴彩，哲人已叮咛。任他昏天黑地，波澜不须惊。
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真金何惧烈火，重担压骨身才硬。人生风霜雨雪，更兼天翻地覆，何处是安宁？芽烽火正未了，握笔亦从容。

骂，有口骂和笔骂，贯穿文革全程。骂，是文革的“胜景”之一。李树喜此阕词，乃从青年学子角度抒怀：“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文革亦影响了李树喜的史学观：“史家的笔墨不可不信，未可全信。一是为自己的视野能力局限，更是为时代和掌权者局限。史家也要食人间烟火，经常要求和掌权者保持一致，就主观或违心地篡改了历史，不足为怪。”

５、上山下乡知青的诗词作品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曰，《人民曰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其中一些知青，后来成了著名的知青作家。他们认为：“中国知青的生命世界是最应该被挖掘的，是最为独特的、最集体的、最个人的、最生命的，属于三千万少男少女精神世界的、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些知青在那段特殊年代，也留下不少诗词，真实记录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热、迷惘和悲壮，以及他们于自身的成长和反思。如知青作家之一的木斋，在文革中写下不少诗词，此首《无题》是写于文革的后期：

少年壮志何处寻？塞北高歌不可闻。明镜伤心我憔悴，农乡惆怅锁青春。
饮酒狂欢偷欢乐，吟诗寂寞解销魂。人生已觉不宝贵，莫论低沉与认真。

此诗真实地描绘了其当时的心境：“伤心”，“惆怅”与“寂寞”，“壮志”不再，“高歌”不闻，“人生已觉不宝贵”！此诗以“莫论低沉与认真”作结，乃回应当时广为流行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部分清醒的知青，对毛泽东的“崇拜”，已转向“怀疑”，甚至于“反对”。

６、“阶级敌人”的诗词作品

地富反坏右，即是阶级敌人，文革前已有“五类分子”的称谓，文革中又称之为“黑五类”。而“地主”，位于“五类分子”之榜首，在中共夺权前和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始终是革命和专政的首要物件，在文革中更是不许“乱说乱动”。因此，文革诗词，最难收集的，是“阶级敌人”的诗词。下面所录的《无题》诗，是一位经历文革的诗词爱好者所提供的：

迷蒙春雾剑光寒，折得梅花带笑看。楚汉而今争逐鹿，韩侯何日振师还。

此诗作者姓甚名谁，生年卒曰，皆已无从稽考，只知是广东台山人，下川岛上一个地主分子。当年此诗被红卫兵抄家发现，上交“军代表”，被作为“反动诗词”而公开批判。当时全国各地正处武斗高潮，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置身局外的“五类分子”，稍得喘息，故在“迷蒙春雾”中，“折得梅花带笑看”。“军代表”批判曰：“韩候，就是指蒋介石国民党，此诗作者盼望‘复辟’、‘变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振师还’。”

三、最具影响力的文革诗词作家

如前所述，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然以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而论，笔者从中选出四位诗人，作进一步剖析和研究。

１、“骨头如故作铜声”的李锐

１９１７年生于北京的李锐，１９３４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于民族危亡之际投笔从戎，转战南北。建国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人物，曾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贾祸，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放逐长达二十年。李锐与毛泽东的其他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诸人，皆文章华国，才华横溢。李锐十六岁时就开始写小说，以后写杂文、散文、传记、诗词，数十年间从未辍止，著述甚丰。

据李锐对笔者所述：“文革发生时，我早已是贱民，流放乡野，后又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为保持脑力不衰，思想健康，在单监狱室中，曾吟得诗词四五百首，１９８０年以《龙胆紫集》出版。呻吟诗词，让我度过这难以言说的岁月……”其诗稿结集名为《龙胆紫集》，源自其于秦城坐牢时，用护士发下的棉花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一首首“铁窗诗作”写在《列宁文集》上的空白处，以掩人耳目。

《龙胆紫集》收有李锐写于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五十自寿》一诗：

依然一个旧灵魂，风雨虽曾几度经。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
偏怜白面书生气，也觉朱门烙印黥。五十知非尤未，骨头如故作铜声。

此诗之首联“依然一个旧灵魂”，显然是回应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颔联之“延水”及“庐山”，乃李锐革命生涯之两大转折点。颈联慨叹多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沦为阶下囚。尾联以“骨头如故”之壮语作结。诗如其人，信然！

被关在牢中的李锐，曾写下“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的联句。他曾言及：“外面的世界我全然不知，只是从报纸上感到这种最强烈的印象：只有一种声音——最高指示；只有一种形式——早请示、汇报，跳忠字舞；只有一种忠诚——四个伟大，大海航行靠舵手；只有一种信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此，《龙胆紫集》中有几十首诗是为此而作。”

赵朴初曾为《龙胆紫集》题《临江仙》词一阕：

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度尽劫波才不灭，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李锐，代表了在文革的风雨中，“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一代革命者。

２、“天地古今诗刻划”的聂绀弩

聂绀弩（１９０３－１９８６），湖北京山人。１９２４年入黄埔军校，１９２５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１９２７年归国，长期作报Ｘ编辑。曾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得识鲁迅。１９３４年加入中共。著作甚丰，体裁多样，尤以杂文饮誉文坛。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然于１９５５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出狱前夕独女海燕自杀。

聂绀弩的旧体诗词，包括文革时期作品，虽散佚一些，但大部份都能收入《散宜生诗》集中。据其挚友除凤兮言：“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连中共文胆、才子胡乔木也为此诗集作序，有评：“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李慎之评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寓悲情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以为有诗人以来所未有，赞叹之余，称之为‘绝世奇诗’”。

聂绀弩的诗，多是逆境中的产物。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聂绀弩因“攻击林彪、江青”，被捕关入北京功德林监狱，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聂氏的监狱诗、流放诗，笔调潇洒与逍遥，此源自其豁达的哲人襟怀，而聂氏却常自嘲为“阿Ｑ气”。如《岁尾年头有以诗词见惠者赋谢》，即为其在文革初期所写的狱中诗之一首：

奇书一本阿Ｑ传，广厦千间Ｋ字楼。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怙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聂绀弩之诗，颇多与“落难”文化人的唱和之作。如聂绀弩曾先后写下十三首诗赠胡风。胡风夫人梅志曾言：“这些诗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友谊，也表现了他对胡风一生坎坷遭遇的不平和感慨，读这些诗能使人感到一个正直人的伟大灵魂。”１９６６年初，正处于文革暴风雨的前夕，聂绀弩亦有诗赠即将遣往成都的胡风：

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

聂绀弩的诗得以传世，有其狱中难友李世强一份功劳。被囚临汾监狱期间，被判无期徒刑的聂绀弩常李世强学诗，并把自己的诗也给李世强看。李世强感到，“这些诗句是血泪凝成的，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泪……这是千古绝唱，我一定想办法带出去！”１９７５年夏天，李世强获释，利用“一藏二背三抄”的好办法，把聂氏的诗稿偷偷带出监狱，回京后马上交给了聂氏的夫人周颖。李世强离开监狱与聂绀弩诀别时，聂氏塞给李氏一张小纸条，内有聂氏留给李氏最后一首七绝：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斗短不如长。堪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最近读到章诒和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有对聂绀弩生动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述：“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

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是老一代文化人在焚书坑儒的年代，力创旧体诗词“新声”的杰出代表。

３、高唱“红日照乾坤”的郭沫若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期间，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曾参加北阀战争、南昌起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国后，曾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郭氏集诗人、剧作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诸桂冠于一身。生前身后，毁誉相交。周恩来赞其为“革命文化的班头”，鲁迅骂其为“才子加流氓”。又有称其为“御用学者”、“无耻文棍”。

郭沫若与毛泽东相交数十年，多有诗词唱和。郭有词赞毛：“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视郭为诗友，其诗词曾请郭“加以笔削”。在文革中，虽有毛泽东之保护令，郭及其家庭仍遭巨创。郭曾提出“全部烧掉”其作品。而其两个儿子，受迫害致自杀。故郭氏年，其内心之惶惧、苦涩与痛苦，难以言表。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骤发之时，郭沫若无疑是十分惶恐，为求自保，再也不分是非，不管善恶，不辨正邪，只是一股劲“紧跟毛主席”。故其在此时期所作之诗词，皆是歌颂文革之作。在文革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郭氏往往都写诗词表态，因此，有人称郭氏此类诗词为“表态性诗词”。而这些“表态性诗词”，郭氏常喜用《水调歌头》这个词牌。且看郭氏写于文革伊始的《水调歌头·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保卫政权巩固，一切污泥浊水，荡涤不留痕。长剑倚天处，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至于随后所写的“见红日，见新月，见救星”，“伟力来何处，四卷太阳书”等肉麻词句，不必细表。直到文革后期，郭氏又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奋螳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郭沫若的文革诗词，大量借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生硬地运用一些政治概念，可说是意趣卑俗的作品。郭沫若的文革诗词，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客观上已成了毛泽东推行文革的罪恶道具。唯有其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属违心之作。它确实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时代的呼声。它勾划出“四人帮”的

丑恶嘴脸，形象且传神。此词在当时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可称之为颇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得一提的是，１９７３年春，据说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１９７３年夏，毛又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有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十批判书》，虽大骂秦始皇的残暴独裁，其实是影射当权的蒋介石。孰料此书却获罪于自诩已超越秦始皇的毛泽东。对毛的诗批，郭氏难有招架之力。于是在１９７４年2月7日，抱病捉笔，写下题为《春雷》的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胆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氏此诗，彻底推翻自己坚持一生的尊孔反法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与痛苦难堪的心情可想而知。１９７７年，文革结束后，郭沫若编印《沫若诗词选》，宁愿１９７４年留空白，也不把这首自我批判的诗列入去。

郭沫若，为求自保成为“跟风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４、“乐在天涯战恶习风”的陈明远

陈明远，１９４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旋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工作，是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撰有多种学术著作。然爱好古典文学，自中学时代起便热衷写旧体诗词，并经郭沫若、田汉等名家指点，其作品颇受师生的赞赏，不料后来遭遇奇特的事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伴随文革爆发而在全国掀起的“毛泽东诗词热”中，有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陈明远骇然发现，自己所作的十九首诗词，不知何故竟列入其中。陈立即致函周恩来总理说明事实真相，并要求把此信转呈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误传不是政治问题，澄清就行了。但陈还是被定为“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反革命份子”，遭到批斗和迫害。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专案组负责人还扬言要“处决”他。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陈氏才获平反，蒙冤长达十二年之久。

陈诗之所以误传为毛诗，乃因两者的气势和风格颇为近似。陈明远在中学时代便粗通诗词格律，加上自身的文采才华，其诗作洋溢着雄浑之气，其昂扬的基调，也与当时所宣扬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较完美的统一。如《答友人》一诗：

问余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场火正熊。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此首七律，颇有气魄，抒革命者的壮志豪情，且明白如话，好懂易记，故此诗

为其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中最为流传的诗篇。当年大江南北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皆以“战恶风战斗队”命名，可见此诗影响之巨。此诗“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之句，乃反用宋朝秦观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之词意，赋予一种进取的精神和豪壮的气魄，读之使人振奋。然以陈明远当时的身份地位，若不是误传为毛诗，也不会四海流传，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则“诗以人传”的奇谈，一个时代的玩笑。但在文革中，不论是真毛诗或陈明远的假毛诗，都曾起到了推动诗词复兴的作用。

１９８８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此书由陈明远自己选编审订，共收有诗词二百五十首，分为五缉，第三缉《春海潮》中包括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书后附有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四十封信和其自传性文章《诗歌——我生命的翅膀》。为研究陈明远，笔者曾托北京的友人代寻一册《劫后诗存》。友人来电称：“《诗存》一书到处都未能购到，问到世知社总编辑室和销售部以后，查到了该书责任编辑的电话，并从其得知：陈书确出于１９８８年，不料次年陈因卷入‘六四’事件后，此书也被令从所有书店下架……”友人却也神通广大，辗转打听到陈明远的电话。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随“美国华侨文化访问团”到中国去。在北京，我有机会与陈明远会面两次。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误传假毛诗事件中的一些疑点。据陈氏所述：“不知由何种渠道，我的诗词传入朱德元帅府中，误为毛泽东未发表的诗词，由朱德的秘书打字印出而流入社会……其实，这些诗词的真伪，只要毛泽东表个态就可以了。听说的确有很多首长当面询问过毛，但毛至死也没有未吐露过半句是或否。我没有罪，是毛泽东侵占了我诗词的署名权和发表权……”

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并不是陈明远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陈明远告诉我，他最为珍惜的，是《沁园春·咏石》。１９７２年1月，陈氏步《咏石》韵写下同调的《悼陈帅》，前后两阕《沁园春》，又被误当作毛泽东新作的诗词，争相传抄。而我最感亲切的，是他写于１９６７年春的《水调歌头　未名湖沉思》，结篇云：“望月忆当初，与汝相辉映，一卷未名书。”

陈明远，在那荒诞的年代，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国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角色。

四、文革诗词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史无前例”。的确，文革的残暴、惨酷、批斗、整人、冤案冤狱、文字狱、焚书坑儒与无耻等等，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丑恶、可怕的文革时代烙印，也留存在文革诗词中。文革诗词的内容，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残暴和荒诞。

１．史无前例的残暴

文革之凶残，举世皆知。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全国一片愁云惨雾，腥风血雨，惨不忍睹。如当时湖南省道县的“左派”，把

所谓“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以千计，捆绑至双牌水库，悉数投入水中淹死。因尸体堵塞，导致水库不能发电。“双牌惨案”，有黄心培的七绝诗留下佐证：

为标革命献忠诚，左派争先清阵营。阶级敌人皆杀尽，双牌水库胜秦坑。

２．史无前例的惨酷

１９６８年，“派性”、“武斗”处于高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死人无数。“十亿遭蒙蔽，豆萁痛相残。”当时印尼归国华侨青年冯刚毅，写下《惨象》一诗，记录了惨酷的“武斗”场景：

举国民争古未闻，一朝挑起乱纷纷。冷枪惊破佳人梦，重炮堆成乱者坟。
造反姑娘哀割乳，兵团战士惨抽筋。苍生未悉因何罪？北望神州日已曛！

此诗中间两联，如实地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而当年个人迷信处于登峰造极之时，此诗以“北望神州日已曛”作结句，指出种种惨象的根源是在北京的“红太阳”，可谓勇气过人，大胆之极！

３．史无前例的批斗整人

毛泽东之“最高指示”有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乎，上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干，下有基层千千万万的小干部，皆中箭落马。据传，夏衍被囚秦城期间有感于“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于是仿效清代之“剃头诗”，写下一首“整人打油诗”，幽默且辛辣：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坛的《三家村》，即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邓拓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而吴晗和廖沫沙，遭到无止境的“喷气式”的批斗。“喷气式”，为文革中在批斗会上对被批斗者采取的一种体罚形式。通常由几个彪形大汉架着被斗者，用暴力迫使其弯腰低头，同时向后使劲拉被斗者的双臂，使之高举，状如喷气式飞机，故名。廖沫沙有一首《嘲吴晗并自嘲》，写于遭喷气式批斗之后：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４．史无前例的冤案

文革时期，冤案无数。连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尚且被“斗倒斗臭”，最后冤死狱中。其他文化人、老百姓岂可道哉！如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潘天寿，文革伊始，就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国民党特别党员”，成为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并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受过无休止的批斗，潘氏的健康迅速恶化。１９６９年冬天，年届７３岁，身患重病的潘天寿，从杭州被押回家

乡海宁去游斗。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他拾到一张香烟壳纸，在上面写下其一生最后一首诗，不久便含冤病逝。潘天寿这首诗，道出当年无数遭受冤屈者的悲愤：

莫嫌笼縶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５．史无前例的冤狱

文革时期，处处皆冤狱，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冤狱。北京秦城监狱，当年就囚禁了不少受冤屈的共产党干部。著名作家关露即为其中之一。在一个寒冬之夜，在“铁门紧锁”的黑狱中，关露听见牢房旁边的自来水管滴滴嗒嗒之漏水声，更加难以入睡，心有所触，于是口占一绝：

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钢管有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

６．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著名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在文革初期曾写下《感事》一诗：

千古文章定知有，乌台今日已无诗。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冯其庸所感之事，应是指自报Ｘ发表姚文元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摧残文化、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随之批“三家村”，砸“四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批判烈火烧遍全国。“臭老九”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如待罪之囚，似惊弓之鸟。宋代的“乌台诗案”，乃千古奇冤，当时尚有诗可批，然文革时期，人们皆收笔禁声，如鲁迅所言：“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冯其庸“乌台今日已无诗”之句，何其沉痛悲愤！

７．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

文革时期之灭绝文化，打杀文化人之“焚书坑儒”，超越秦始皇何止千百倍。而文化育部门、学校、师更是首当其冲。当时的惨况，我曾亲历其境。２００５年秋天，我有缘在北京拜访了吴柏森先生，他是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退休老师。他向我展示了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首首皆含血和泪。其中一首为《感事》：

恶浪掀腾到学童，翻天覆地闹黉宫。千年师道成仇敌，万卷缥缃付祝融。

伦理沦亡惊世变，斯文丧尽叹途穷。春秋直笔评功罪，自有今时太史公。

８．史无前例的无耻

为林彪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黄永胜，曾授上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中受林彪提携，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然黄永胜乃好

色之徒，连其“老上级”、“大恩人”林彪的妻子叶群亦勾搭上。“黄叶”之私情，林彪至死都不知。后来林彪一家仓惶外逃，摔死异邦之后，在北京的林家大院，搜出了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情诗：

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据传，叶群当时亦有和诗：“咫尺遥知心难静，孤燃灯光不成眠。万紫千红花无意，独念西山一叶黄。”可见，当年的政坛上，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其实是一些狗男女！

五、文革诗词的创作特色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除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文革色彩和时代烙印之外，其创作过程、创作空间、创作氛围、创作方法及创作艺术，皆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１、监狱成为文革诗词的温床

文革时期冤狱遍怖中国各地，无数人因种种“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按广义而言，“牛棚”、“五七干校。”、“学留班”、“交代会”等，也是冤狱的一种。入冤狱者，有一部分人早已是诗词高手，在此高压的环境中，满腔冤愤，只有寄情于诗词。另有一些人，原来并不懂格律，入狱之后，受教于狱友，也学会写诗填词。写诗填词，不需纸笔，有时只需记在脑海中。这是在冤狱中诗词盛行的原因之一。我收集和阅读文革之后出版的个人旧体诗集，大多都收有在文革狱中所作。

如黄克诚大将，自１９６７年１月起，从太原押至北京，辗转于数间牢房，被囚长达八年之久。据黄克诚忆述：“１９６７年四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此词即为《蝶恋花·桃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此词乃借景言情，寓意甚明。此词后来被监管人员发现，批之为“讥讽时事”，因而倍加审讯和批斗。黄克诚此词中所指之“英雄”者，当首推彭德怀元帅。

２、深藏不露的藏锋诗

文革期间，比清朝康雍乾三朝更为荒唐的文字狱随处皆是。随便一首诗词，一篇文章，都可以评为“反党大毒草”。为自身的安全计，人们皆以钳口封笔为上策。然冤愤难禁者，有的仍敢寄情于诗词，不过，不用“直笔”，而用“曲笔”。“藏头诗”、“藏锋诗”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最为著名的，首推国学大师文怀沙所

作的七绝，后被钱钟书评为“浩劫诗压卷之作”：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是文怀沙（沙翁）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时所写下的一首诗。当时一位旧友李某（诗中之李龟年），传达江青要其写一效忠信即可获自由并可得重用。文怀沙遂题就此诗。结果被姚文元读出是藏锋诗，把每句的第六个字串起来，是“龟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帮垮台，文氏才未被枪毙。

３、严肃且意深的打油诗

打油诗体，虽多谐趣，但常流于俗气和油滑。然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大量打油诗，继承和发扬鲁迅以杂文入诗的传统，打油却是严肃，语浅却是意深，以杂文入诗，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文革时期的打油诗，不少乃出于大家之手，如聂绀弩、李汝伦、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等。　邵燕祥乾脆把其旧体诗词结集名之为《邵燕祥诗钞·打油诗》。诗界对这类打油诗评价甚高。如程千帆评聂绀弩：“他的诗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如水有评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的《三家诗》诗选集：“他们的诗作，让人笑，更让人哭，让人沉思和反省，更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当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相传为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此首刻划“臭老九”的打油诗，是何等生动且传神，一经传出，即脍炙人口。遭毛泽东痛骂为“野心家”，“伪君子”和“反动透顶”的梁漱溟，在“文革”中当然在劫难逃。家藏四代图书典籍，被红卫兵抄家焚毁。还被像耍猴子样地以绳系颈，手持铜锣，在得胜门一带鼓锣游街示众。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４、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因周恩来去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诗词充满了天安门广场。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的诗史上绝无仅有。天安门的“反动诗歌”，最为闻名的，乃为工人王立山作所：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５、虚假、违心的歌功颂德篇

在文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浩如烟海的“颂毛篇”。其实，绝大多数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和空话。连“笔直”的胡风，也写下肉麻的《水调歌头》：“不可鱼无水，不应水无鱼。七亿中华儿女，共沐党风舒……”１９６７年7月１日，在狱中惨遭折磨的田汉，居然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在日记写下一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田汉在诗后还注有：“党的生曰，入党３５周年纪念。”如此“豪言壮语”的打油诗，更使我感受到田汉内心的痛苦。后田汉屈死狱中，连骨灰也荡然无存。

六、文革诗词的历史价值

文革诗词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我以为起码有如下几点：

１．文革诗词在中国诗史中是不可缺少的篇章，中国诗史不能留下文革阶段的空白。

诚如李锐先生所言：“诗言志，诗言事，诗言情。我国自古诗歌相传，为中华文化一大特色……诗歌存史，是历代志士仁人的贡献……诗词语言精练，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易于记诵，便于流传，使人潜移默化，陶冶情操。这是我国独步世界的优秀文化传统。文革惨祸十年，受难者悲苦无告，惟有呻吟，有的化为诗歌。借此一斑，可窥全貌……揭露邪恶，伸张正义，正视历史，永记训，这是我们对待文革应取的态度。”

２．文革诗词与文革史实一样，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不研究文革诗词，文革史也是不完整的。

刘心武先生为我所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一书作序，序言题目为《延续民族整体记忆，修建纸上“文革博物馆”》。其序有言：“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椿重要事件，在事发４０年事止３０年之后，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加以探究，而这探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钩沉’……‘文革’中当然也有人写自由体的诗歌，但古典格律的诗词，却大行其道，蔚成大观，在历史的大断层中形成了痕迹鲜明的‘沉积岩’，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是多种因素化合的产物……每一人每一诗固然代表着一个生命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的独特状态，合成起，则又构成了相激相荡、相克相生、人有九算、天有一除的历史大面相、大趋势……延续民族整体起忆的工作是神圣的。”

３．文革诗词，一样具有千秋万代的史训价值。

广州的《当代诗词》开辟专登文革诗词作品的专栏《劫尘史鉴》，熊鉴为此题下七绝十首，首篇云：

沧海横流事足伤，十年无路可傍惶。吟成劫史供谁赏，留与儿孙作胆尝。

而熊鉴之《十年文革祭》，更是千秋不朽之大文。文中有言：“澄清往事，传后世以真情；警告来人，鉴前车之覆辙。”熊鉴此篇祭文和一些文革诗词，镂刻在一道道花岗岩石壁上，屹立在广东澄海的《塔园》中——这是目前中国仅有的文革

纪念馆。

为纪念文革四十周年，我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也即将付梓出版。虽此书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希望此书能为文革史留下一个注脚，为巴金先生所倡建的“文革博物馆”添上只砖片瓦。我下一步计画，是继续搜集和研析文革诗词，并完成另一部专著“文革诗史”。另一个构想，是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编一部像《全唐诗》那种体例的《文革诗词全编》，我将为此项神圣的工作献出余生岁月。

《文革诗词钩沉》之自序有我的一阙《临江仙》，且引此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游子心魂牵故国，难忘旧日云烟。十年浩劫史无前。霜风摧草木，血雨洒江天。
多少悲歌多少泪，犹存断简残篇。挑灯觅句总凄然。钩沉诗百首，高抬贵手此中研。

文革史料和史料学概述

周原

对于任何一项历史研究，史料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这是史家共识。现代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甚至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　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１〕文革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中国通史还是断代史研究，也不管是古代史，现代史还是中共党史，史料学的专著专论都早已层出不穷。〔２〕因而，文革研究的史料和史料学的探讨，决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有前人丰硕的学术成果可以借鉴的。

当前，研究和促进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刊发，不仅是文革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文革的发动距今已经四十周年，亲历者中当年的少年已是"知天命"者，青年步入耆年，而当年中年以上的亲历者则日见稀少。群体记忆正在逐步淡化，日益模糊。鲜活的个人记忆也被岁月剥蚀，并随著记忆者的离世而消失。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虽然在系统地整理、出版文化遗产、历史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相比之下，在整理、刊发文革史料、特别是原始资料方面，却是少之又少。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状况在短期内，恐怕难有改观。然而，文革期间的一些原始资料，特别是那些非正式出版物和印刷品，包括红卫兵小报、内部学习和宣传材料、群众组织印发的传单等等，当年就缺乏系统收集，已收入各级图书馆的，如今又大都尘封日久，乏人整理。这些史料，纸张变黄发脆，墨迹淡化模糊，以至虫蛀发霉。这类史料，急需抢救整理。

研究文革史料和发展文革史料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史料的调查和对其源流与价值的分析，给研究者提供参考，给有志于文革研究的青年学人指点门径；另一方面也希望籍此引起文革研究的学者、图书馆员、档案工作者及关心文革研究的人们的关注，并一起来参与和分担收集、抢救、整理和发布文革史料的重要使命。要知道，搜集、抢救、校勘、整理及刊发文革史料不仅会推动今天的文革研究，而且也会为文革研究的持续进行和将来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源与基础。

◇　文革史料的类型

一般说来，文革史料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即实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包括文革时的实物如红卫兵的袖章、旧军装、旗帜，各种毛泽东像章、纪念章，批斗会上用的高帽子、黑牌子，打人用的铜头武装带、木枪。再如武斗时使用过的各类武器、宣传话筒，死伤人员的血衣，等等。实物史料也包括重要历史场址、遗迹，如大规模武斗的历史遗址，关斗黑帮的牛棚，"五七干校"的旧址以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等等。音像史料包括文革时期录制发行的录影、录音资料以及图片画册，诸如记录片、样板戏影片、电视节目、歌曲集、唱片等。

文革时期大行于世的招贴画、宣传画以及其他照片、幻灯片等也是珍贵的史料。口碑史料包括所谓口述历史、民间口耳相传的文革故事、往事、传闻等，但这一部分资料势必要记录成文字或经录音、录影后，才能成为史料。最后一类为文字史料，这类史料数量最多，流传最广，记录史实最具体、详细，是文革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如果依时间划分，文革史料又可分为１）文革期间产生的史料，和２）文革结束后产生的史料。本文先集中谈一下文革期间的各种资料，而将文革后发布的史料放在第二部分，即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发布与研究部分一并讨论。

根据发布和制作的方式，文革期间产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为：１）正式出版物，２）非正式出版物，３）非出版印刷品，和　４）非印刷品资料。以下就每一种类，做一简要介绍分析。

一、文革期间的正式出版物

文革期间，特别是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９年间是正式出版物十分凋敝的阶段。各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许多报刊被迫停刊。图书的出版发行则呈畸形状态。一方面，图书出版的种类和数量，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图书出版，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则一版再版，发行量连创纪录。尽管如此，文革期间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基本资料，例如，被视为当权者喉舌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此外，《文汇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等也含有许多重要史料。至于各省市级的报刊虽然连篇累牍地大量转载新华社、中央及上海报刊的内容，甚少新意，但仍然记载了各地文革期间的重大事件，反映出该地文革进展的特点，不失为研究地方文革史的基本的、也是比较易得的史料。在期刊中，文革中期出现于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以及后期的《北京大学学报》和《复旦大学学报》等都收有相关时期的有用文献。至于图书，为配合各个时期运动重点而出版的毛泽东最新或专题指示汇编，各种政治运动的小册子，政治学习辅导材料，大批判文集，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等宣传品，甚或样板戏剧本及少得可怜的文学作品，都可成为研究文革某一阶段或某一专题的有用资料。

二、文革期间的非正式出版物

这类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众组织、红卫兵等印行的各类小报、刊物、海报、传单和小册子等。其特点是虽无正式出版社介入，却是公开出版，旨在发行、广为流通的。这类出版物主要见于文革之初的前三年（１９６６－１９６８）。与当时官方出版物一派凋敝的景象形成对比的是此间非官方出版物的空前繁荣。初步估计，仅群众组织出版的各类小报一项在全国就有八、九千种之多。小报主要是自办自销，流通则或免费散发，或沿街叫卖。有些影响较大的小报，则可以通过邮局订阅。如此众多的非官方报纸在数年间广为流行，这种状况不仅是中共建国以来所仅见，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报刊史上也是空前的。应当指出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著文革带来了出版自由。事实上，文革的领导者们对这些非官方的小报采取不仅容忍而且支持的态度，是由于它们在深入发动和推进文革的许多环节上起到

了官方舆论工具所起不到的作用。而一旦有人胆敢利用小报挑战当局或“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定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打击。由遇罗克主笔并参与出版的《中学文革报》因发表挑战中共阶级路线的《出身论》等文章而遭取缔的事例，就是一个明证。

总体上说，群众组织的小报，特别是铅印发行、质量较高的小报是反映这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系统、某一单位、某一组织文革运动发生发展过程的最系统、最详尽的文字，也是我们所知的现今保存较全和整理较好的史料。对于文革初期的社会运动，基层情况，特别是地方文革史的研究来说，小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有时甚至是现今仍存的、绝无仅有的第一手资料。

文革期间的非正式出版物也包括一些群众组织出版的刊物，其在种类上大大少于小报。而且，不定期出版的或专辑、专刊性质者居多，定期出版的刊物则比较少见。这恐怕是与文革初期运动发展疾风暴雨、政治气候瞬息万变，出版周期偏长的定期期刊不能满足群众组织在政治宣传、舆论造势以至派性斗争方面的需要所分不开的。

三、文革期间的非出版印刷品

这部分资料专指那种文革期间印制的，限于小范围使用或仅在特定范围内流通，不对公众发行的印刷品。例如，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文件、讲话汇编、各种内部学习资料、大批判文集、大字报选以及斗私批修的心得等等。这部分资料的特点是种类庞杂，数量极多，内容常有重复而发布范围较小，给收集、挑选、鉴别和校勘带来一定困难。尽管此类资料并不都有收藏价值，但其中有重要价值者也很多。如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收集了许多未曾正式发表的毛的文稿、讲话、批示和谈话。又如篇幅不一、版本各异的《中央首长讲话汇编》，以及运动各阶段，如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整风的档案、讲话、学习材料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对这部分资料的整理发布，已有一些成果，后文将予介绍。另外，还有一部分数量很大的、属于这一类或上一类（即非正式出版物）的油印资料，包括油印小报、毛、林指示和首长讲话传抄、快讯、传单及大、小字报等。这部分资料内容更杂，纸张、油墨和装订质量最差，已经散佚和正在散佚的数量最多，急需抢救。总体上说，非出版印刷品、特别是油印的资料在收集、挑选、整理和发布工作上，难度最大，目前已有的成果也最少。

非出版印刷品中，也包括少量官方印刷的、供传达、学习和执行的档案。这类档案常常用来指导运动，反映文革领导人和各级权力机构的意图、政策、计画、和对运动的判断，　对于文革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档案因当年冠以的保密级别和发放的范围不同，收集的难度也不一样。

四、文革期间的非印刷品资料

这类史料中数量最多、最为重要的是各级各类档案。尽管文革期间各级政府部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商学各个单位都没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档案的工作。档案的内容品种很多，包括指示、会议记录、简报、总结、统

计、下达的档案和上报的材料等等。除此还有个人挡案，包括所谓专案材料，像本人写的检查、“交待”，他人写的揭发、检举、证言等。档案提供原始资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在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有一些档案已经经过废品回收站，在国内一些地摊上可以买到。当然，开放文革档案，特别是中央一级的档案供研究者使用，看来仍是遥遥无期。

除档案外，非印刷品文革资料还包括大字报、小字报、日记等。大字报、小字报除当时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凤毛麟角了。个人笔记、日记得以留存的机会应比大、小字报大些。这些资料，特别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资料。

◇　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

一、文革期间的工作与成果

对文革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在大陆境外自文革期间就已经开始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和欧洲都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其中比较著名的如香港友联研究所，它在文革发动后不久就开始著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也做了一些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工作，如该所编印的《红卫兵资料目录》（１９７０），著录该所收藏的红卫兵小报５６１种；又如该所编印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　（关于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和以缩微胶卷型式出版的《中共资料剪辑》（１９７４）。《中共资料剪辑》共１，４４７卷，含该所收集的文革期间的各类简报资料，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军事、文化、教育、财政、侨务等。在台湾，搜集比较用力的单位有中央图书馆、国立政治大学及其下属的国际研究中心图书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军情局等。台湾出版的资料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报》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专题汇编，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７３）等。这些都成为文革期间以至以后海外学者研究文革不可缺少的资料。欧美及日本等地的搜集工作主要是由设有中文馆藏的大学和研究图书馆所进行的。总的说，受资料来源和供货渠道的限制，成果有限。

在中国大陆，当年对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级图书馆进行的，且通常为被动的收集。但也有少数主动去搜访这些资料，如北京图书馆就曾经在１９６６年８月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出过＜把这些珍贵文献记录下来＞的保存史料的号召。３　除图书馆外，大陆还有许多私人收藏，其中也不乏有分量、有特点者。在文革期间，正式出版物以外，大陆对其他文革资料的整理、发布工作，基本上没有进行。

二、文革后的工作与成果

１、大陆方面的进展

尽管文革研究在大陆仍然设有许多禁区，当局对文革研究和文革类书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较紧，不时干预施压，三十年来还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除学人们所熟知的研究文革全程的历史著作，如

严家琪、高皋的《中国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等，还有许多类别不同的出版物和资料，以下就每类举其要者，罗列一二，以资说明：

Ａ、大事记及编年史性质的史料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５０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此书以编年体记事，自１９４９至１９９９年每年一卷，文革十年亦不例外；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５卷１０　册（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其中第三卷两册为《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再如《共和国史记》４卷（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其卷三为“神州板荡”，记述文革十年。这类史料不但是研究者在查证某一时间、事件或史实时所不可少，还有助于研究者较系统地了解某些事件发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以至相关事件在时间上或因果方面的联系。

Ｂ、中共有关领导人的著作、文稿

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１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９９８），《周恩来选集》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邓小平文选》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和《刘少奇选集》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８５）等。虽然这些出版物收选的著作在时间跨度上涵盖著作人的一生，但都不同程度地收有著作人在文革期间及（或）文革前夜的一些著作和讲话，无疑都是研究文革的重要资料。

Ｃ、资料汇编

最有价值的首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内部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３卷，１９８８年）。这一大型资料集由文革史专家王年一选编，包括了上千份中共中央文件、报刊社论、重要首长讲话和回忆录，对文革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其他公开出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１５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和团结出版社所出六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１９４９－１９９２》４卷（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３），其中第三卷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包括总论、重大事件、典章制度、文献选编及文献资料等部分。这些大书除提供一些提纲契领式的述外，最重要的是汇编了一些原始的文献与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Ｄ、纪事本末体资料

如《国史纪事本末（１９４９－１９９９）》７卷　（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其中第五卷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其中第三卷“十年风雨”所含为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所发生的事件；再如一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亦含有几十条文革期间事件的条目。顾名思义，这类著作以文革

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为记述对象，撰者力求对所事件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描述，因此在搞清某一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变化以至结局等方面尤为下力，是文革研究者应该重视的资料与研究成果。

Ｅ、回忆录、亲历记

这类资料已出版的不算太少，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众人的片断回忆，编汇成集。如者永平、关圣力等主编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下〕，（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８）；又如《无罪流放：６６位知识份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等。二是个人亲历记式的回忆，如杨绛的《干校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１９８１），徐友渔编的《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纪希晨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元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以及汪东兴的《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等。三是自传体式的回忆录，这种回忆录记述的年代，常常不限于文革十年，而是作者的一生或一个时期但含文革时期，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和江渭清的《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等。

Ｆ、传记、传记文学

这类资料出版的相对较多，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官方组织力量撰写的，多为身居要职的“正面”人物所撰，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人的传记。二是传主的亲朋或属下写的，如邓榕（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黄编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６９》（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等。第三种是职业作家采访撰写而成的，如叶永烈的王、江、张、姚以及陈伯达的系列传记，权延赤的《陶铸在“文化大革命”　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和《龙困：贺龙与薛明》（广东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７）等。第四种是散见于报端杂志的小传，虽篇幅较短但数量颇多；也有编辑成册的，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狱》系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等。

Ｇ、词典、事典、年谱等工具书

较为重要的工具书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三卷本，１９９１年初版，２００１年增订本。第一卷人物卷收有大量文革时期中共领导人的辞条，第三卷记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包括一些有关文革的条目；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又如金春明等编著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９），是一本较早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准词典。年谱类如《刘少奇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６９》（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和《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修订本１９９８）等。这类年谱看似以流水账般简记谱主生平，文献价值不高。但其实不然，细读会不时发现一些鲜见的史实或细节，有些史实是首次披

露于公众或被官方证实。

H、报刊文章

介绍、研究文革的文章以及文革事件、人物的回忆录、纪念文章自文革结束以来，就有见诸报端，随政治气候的变化，时多时少。而近年来数量有明显增加。常刊载这类文章的期刊有《中共党史研究》、《炎黄春秋》、《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纵横》、《党史博览》、《党史博采》等等。

再有，技术革命带来了近年间电子出版物和文献数位化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及一些杂志有了光碟版或网路版，虽然电子版在内容上并未增加新的史料，却给研究者查找、利用这些史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综观已有的成果，这些年来，大陆陆续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文革史专著、资料、回忆录、传记、传记文学和工具书，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革的回忆、追述和研究文革的论文也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增长。这一方面反映出学者、亲历者对追述、研究这段历史难以压制的兴趣和愿望以及出版社、杂志社一些编辑人员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局对文革研究在控制策略上有所变化。从以压制和限制为基本态度的方针，转变为限制性“开放”的方针：即一方面对官方、半官方性质的大事记、工具书、及撰史活动持相对开放、甚至鼓励态度，另一方面对相对独立的研究者、亲历者的撰史和研究活动则继续采取不鼓励和严格审查的限制态度，以期影响文革研究的话语，制导甚至把握话语权，把文革研究尽可能纳入和控制在官方史学的轨道。还有一点应指出的是，市场的力量对有关文革的图书、传记文学、论文等出版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由于这类图书、文章有广大的读者群，发行量和利润都比较大，促使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知难而上，找变通办法，打擦边球。

２．香港（台湾）方面的进展

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环境，在出版文革资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块独特的园地，贡献很大。如前所述，还在文革期间，搜集、整理文革资料，出版、发表有关文革的图书、研究成果就已经在香港开展得很活跃。文革结束以来，又出版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和有关图书。这些图书资料有些是大陆学者、亲历者所撰，但不宜或无法在大陆出版，有些则是在海外和香港的学者、研究者所为。这里就重要者，作一简述。与香港相比，台湾的文革出版物实在太少，本文就不再专门设章节研究。但是今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西藏女作家唯色的《杀劫》（图文集）和《西藏记忆》（口述史）却是意外地填补了文革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西藏文革。

A、词典、工具书

如《文化大革命词典》巢峰主编（港龙出版社，１９９３），又如赵无眠编著的《文革大年表》（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６）等。

b、回忆录、追述、亲历记等

这些重要的回忆录均是涉及上层政治斗争内幕，在大陆无法出版的。如陈伯达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杨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５），王力的《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和《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张的《尘劫》（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７），徐景贤的《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３），聂元梓的《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４），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开放杂志社，２００４）等。

c、资料汇编

最重要者当属《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宋永毅主编，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它开启了使用当代电脑技术保存、校勘、整理和重印文革史料的先例和风气。这张光碟共分七个部分，分别为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讲话和指示，重要报刊社论文章，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异端思潮重要文献，是由八位海外学者（宋永毅、石之瑜、丁抒、周原、沉志佳、郭建、周泽浩、王友琴）合力汇编而成。文库共收一万多篇文献，近三千万字，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其中中共档案，毛、林讲话、指示和中央首长讲话是研究文革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必不可少的原始文献。而报刊社论、红卫兵运动和异端思潮等重要文献，也是研究者做有关专题研究时，一定要研读的基本资料。与光碟一并发行的还有中英文双语的目录一册，方便使用者流览查阅。光碟自２００２年出版后，海内外许多文革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编者们提供了一些未收的资料和好的建议，编委会也陆续搜集到了一些新的资料。为此，编委会对《文库》的内容作了较大的增补和重新校勘的工作，于２００６年年底前推出了第二版。第二版分两种版本，即面向世界各地图书馆和机构用户的互联网网路版和面向个人研究者的光碟版。第二版新增的文献有近千篇，约五百万字。而互联网版在利用文献组织与传播的新技术方面，较之前面的光碟版又进一步，　不仅具备包括全文检索在内的多样化的检索功能，而且对图书馆与研究机构而言，网路版比光碟版少受地域与时间上的限制，为读者、研究者从他们自己的办公室、居住地“全天候”使用提供方便。

还有一本十分重要的资料是杨克林编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初版，２００２再版）。这是一套两卷本的文革时期的照片集，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除资料汇编外，香港还出版了一批文革研究的专著，如《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编，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宋永毅、孙大进著，田园书屋，１９９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徐友渔著，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文革大屠杀》（宋永毅主编，开放杂志社，２００２），《晚年周恩来》（高文谦，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一九六八：一叶知秋—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谈起》（唐少

杰著，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等等，囿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３．海外方面的进展

近年以来，海外文革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的热潮，无疑是一个异军突起的领域。因本文意在介绍中文相关资料，这里就不涉及英文及其它外文的资料和成果了。

A、红卫兵资料汇编

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周原主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一部分》二十卷，和宋永毅主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二部分》四十卷，分别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于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２年出版。第一部分收入全国各地红卫兵、群众组织小报近５００种，其中３０多种为全套，既自创刊号至终刊全部收齐，包括增刊和号外。重要的小报如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出版的《新北大》（全）和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井冈山》（几乎全）。第二部分所收的全部为北京地区出版的小报，共　４５６种，其中２００多种为全套或几近全套。重要的小报包括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及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由宋永毅主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三部分》，计画为五十二卷，目前也已基本编迄。第三部分所收为北京地区以外其他省市的群众组织小报，逾一千五百种，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出版。

在此之前，中国研究资料中心还曾出有《红卫兵资料》（２０卷，１９７５），《红卫兵资料续编一》（８卷、１９８０）和《红卫兵资料续编二》（８卷、１９９３）。该系列收录内容除小报外还有文革中群众组织出版的各种刊物，是国外收集、整理、发布红卫兵及群众组织所出版资料的最早成果。

以上两个先后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大套系列资料，收录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两千多种，范围涉及全国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对北京地区出版的小报收录尤为齐全，是研究文革、特别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群众组织运动十分宝贵而难得的原始资料。在目前大陆各图书馆的同类收藏尚未系统整理发布、不向公众开放的情况下，这两套系列资料对文革研究者的价值，尤显突出。

b、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

这是一套已经出版了千余册并且还在继续出版的资料汇编，是由位于洛杉矶的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选编、出版。所含资料包括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共的各种内部出版物，其中涉及到文革的资料在已出版的部分中占主要比例。由于文献的类别、性质，汇编所含内容略显庞杂，各辑、各分册的史料价值也各有千秋，良莠不齐。但总的说，还是一套很有价值的、研究中共及文革的重要资料。

c、两种重要的工具书

最后再介绍两种海外出版的、有助于文革史料研究的工具书。

一是宋永毅、孙大进编著的《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bibliography: 1966-1996》（Ｈａｒｖａｒｄ－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1998). 该书著录１９９６年以前中、英、日文出版的文革研究专著、文章共七千余条，分十四个大类编排，是迄今见到的规模较大、专收文革研究资料的唯一书目索引，是学者、研究者了解１９９５－９６年以前所发表的文革研究成果的便利工具。

另一种是由日本学者鳟泽彰夫编著的《红卫兵新闻目录》（东京博二出版，２００５）。编者为红卫兵小报收藏家，是日本文革研究学会的会长。该目录实际上是一本日本所藏红卫兵小报的调查目录。该书虽以日文出版，但因书的主体是以中文著录各种小报，不懂日文的中文读者仍可借助使用。

４、文革资料的网上发布

网路的出现，给整个资讯发布和传播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也给文革资料的发布以及文革研究成果的交流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非常有效的途径。随著网路技术的日益普及和线民的不断增加，通过网路发布文革资料和研究成果不但简便可行，少受时间及地域的限制，而且可获最大范围的读者。在突破官方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对发布文革资料或研究成果设置的限制方面，也有独到的优势。因此，会逐步成为文革资料和成果发布最具活力和最富前景的一种方式。现就笔者所知的有关网站，择要简介如下：

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

《华夏文摘》是海外第一个中文电子刊物（１９９１年）和广为人知的中文网站。其下属的文革博物馆网页建于１９９６年（华新民主编），目前分为文献资料、学术研究、史海钩沉、往事回忆、上山下乡、国际风云、人物追踪、文艺作品等八个“展厅”。已出４００多期数百万字。它目前的网址为：Http://www.cnd.org/cr/pref.htm.

B、澳洲国立大学的“中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电子档案”网站

该网站目前发布有几百种文革期间各个时期的印刷品，主要为非正式出版物或是非出版印刷品，所收都是原件，扫描后以图像形式发布，原汁原味，别有一番“原始资料”的风味。惟材料组织上缺乏系统，有待进一步改进。其目前的网址为：http://anulib.anu.edu.au/subjects/ap/digilib/chi/cr/china.html.

C、中国文革研究网

该网站是近年间建立的，在观点上明显“左倾”的文革研究网站。目前列有文献、文革研究、文革口述、万象视野、百花齐放、民谣、文艺、美术、论坛等栏目。该网站选取与刊载的文章与评论，对毛泽东及其时代、包括文革，多持维护以至赞扬的观点，对后毛时代多持批评与否定的观点。该网站目前网址为 http://www.wengewang.org/.

C、渤海大学文革史网站

这个网站由位于辽锦州的渤海大学历史系所创建与维护。中国大陆的一所高校敢于创建这样一个以文革研究为主旨的网站，勇气可嘉。所收资料、文章范围较广，但目前数量仍然有限。然从该大学已设立了文革史研究所，建立了文化大革命史展馆，并举办文革史料搜集与整理研讨会等系列举措来看，这个网站的发展值得期待。该网站目前的网址为：http://www.jznu.edu.cn/page/depart/lsx/wenge/index.htm.

D、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该网站由旅美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女士创办，专门为纪念文革众多死难者而设。收集与发布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人们的名单、生平，以及受害者的不同故事，致力于“记录每一位元受难者”，特别是那些名不见经传、无人知晓的普通人。其网址为：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简短的结语

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后代学者对于前人研究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史料上突破的。尽管有种种不应当有的政治阻力，四十年以来文革史料的搜集、校勘和整理出版，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以海外的中国学者为主体的有计划地保存、征集和大规模地出版文革史料，为文革史料学的发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不仅在国内以种种方法坚持出版文革史料，还通过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在海外出版被禁止的回忆录和工具书等等。纵观这四十年来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学的发展，不仅在对编撰史料的原则、角度、内容、类型等方面，就文革史料的版本问题诸如源流、异同、真伪、参照等方面也都在这些大型的文革史料出版项目中 ——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和《新编红卫兵资料》——有所涉及和探讨。这些都标志著文革史料学的良好发端。现代化电脑和网路技术的发展，为文革史料的征集出版和整理研究提供了传统的印刷出版所无法提供的绝对优势条件，并对冲破政治阻力、传播文革史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预料：今后几十年的文革史料的整理出版会有更大的起色，网路和多媒体的现代电脑技术所支持的电子出版物也会使它的发展更加 “有声有色”。

注释：

１．转引自谢咏 ＜回到傅斯年＞，载他的《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5月出版。
２．这方面出版物众多。在中国通史领域，有陈高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３年；谢国祯的《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在断代史方面，有谢尔康的《清史史料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在近现代史方面，有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和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史料指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２００２年等。
３．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录

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

乔治．布什

谢谢你们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请各位就座。爱德华兹博士，谢谢你的溢美之辞。还有兰托斯议员，再也没有比你更伟大的自由之友了；罗赫拉巴切尔议员，你也一样。捷克和匈牙利议会的议员们，大使们，尊贵的来宾们，更重要的是***压迫的幸存者们，今天，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里，能与你们在一起，我感到万分荣幸。（掌声）

此时此地，在曾经抵抗邪恶和帮助推翻一个帝国的人们的陪同下，我代表美国人民自豪地接受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揭幕。（掌声）

20 世纪将被作为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载入史册。这一残暴时代的记录被铭刻在了这座城市的纪念碑上。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却没有一座纪念极权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夺走了估计高达 1 亿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受难者的纪念碑。因此，我们在此集会，纪念那些消逝在共产主义的手里的生命，并为这座将他们的苦难和牺牲铭记在全世界的良心里的纪念碑举行落成仪式，

建造这座纪念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其在我们首都的落成是两个杰出的美国人热情和决心的确切证明。列夫• 杜布里亚斯基，他的女儿葆拉在这儿（掌声），请向你的父亲转达我们最良好的祝愿，还有李• 爱德华兹博士。（掌声）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挫折和挑战，但他们从未放弃，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听见了那些受难者的呐喊声：“请记住我们”。

这些声音对所有人呼喊，它们不计其数。那些死于共产主义名义下的冤魂的绝对数目骇人听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确切的计算死亡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学者的研究估计，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夺走数千万人生命，在北朝鲜、柬埔寨、非洲、阿富汗、越南、东欧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数百万人受难。

在这些数目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个家破人亡、梦想破碎的人性故事，他们的生命被那些追求极权主义权力的家伙无情地消灭。其中一些共产主义的受难者是世人皆知的，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劳尔• 瓦伦贝格的瑞典外交官，他从纳粹分子的手里解救出了 10 万名犹太人，却被斯大林密令逮捕，投入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在那儿他人间蒸发。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波佩卢兹科的波兰神父，他让华沙的教堂变成团结工会地下活动分子的避难所，但最终他惨遭秘密警察的绑架、殴打并被淹死在维苏拉。这些牺牲者的幽灵常徘徊在历史当中——在他们背后，还有数百万或更多的籍籍无名的人死于共产主义的毒手。他们有在斯大林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无辜的乌克兰人，有死于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有将全部家当装上牛车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北极这一苏联

共产主义死亡集中营的立陶宛人、拉托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有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有在波尔布特的杀戮战场中被屠杀的柬埔寨人，有为了投奔自由试图挖掘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有在"红色恐怖"中被屠杀的埃塞俄比亚人，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独裁政权中被谋杀的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有为逃离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些死难者的人的名字，但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无名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名字将被祭献于历史，永远被铭记。

我们为这座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因为我们对那些死难者负有义务，去铭刻他们的生命，尊崇他们的记忆。捷克作家米兰• 昆德拉曾经将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形容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政权不仅夺走了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杀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要恢复受害者的人性，恢复对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记述了共产主义无辜的无名受难者，他们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们再也不会被遗忘！（掌声）

我们为这座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因为我们有义务让未来子孙记录下 20 世纪的罪行，并保证未来不再重蹈覆辙。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们回顾冷战的重大教训，那就是：自由是宝贵的，不可随意被剥夺；邪恶是真实的，必须被反抗；如果再有机会，那些在冷酷和憎恨驱使下的家伙还会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教训极其重要，因为给 20 世纪带来生灵涂炭的邪恶和憎恨今天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在 2001 年 911 事件中看到了这张面孔。同***一样，那些袭击我们国家的恐怖分子和激进分子都是冷血的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们鄙视自由，压制异己，野心勃勃，谋求建立极权统治。同***一样，我们新的敌人相信，可以通过滥杀无辜来实现他们激进的目标。同***一样，我们新的敌人对自由人民不屑一顾， 声称我们这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懦弱的，声称我们缺乏捍卫自由生活方式的决心。同***一样，那些暴力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追随者注定要灭亡！（掌声）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自由的事业，我们将确保，未来的美国总统再也不会站立在今天这个地方，为 21 世纪被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谋杀的上百万人举行纪念碑落成典礼。

我们相信自由的力量，因为我们已经看见自由战胜了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和恐惧。爱德华兹博士说里根总统去过柏林。他清楚记得里根总统的演讲。他说："推倒这堵墙吧"，两年后，柏林墙倒了。中东欧的人民终于从令人窒息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恰逢里根总统演讲 20 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为纪念碑举行落成仪式，这座纪念碑反映了我们对自由力量的信心。

设计这个纪念碑塑像的人们完全可以为这个场地选择一个描述镇压的形象，比如曾隔离东西柏林的柏林墙复制品，或者冷冰冰的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或者白骨堆砌的红色高棉杀人场。然而，设计者选择了一个希望的形象-- 一位女神手持自由的火炬。她让我们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也让我们想起了战胜共产主义的力量。

正如同我们的自由女神像一样，她提醒我们，自由之火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

她是一盏再也不能被暴虐的恐怖主义分子或专制暴君扑灭的明灯。她提醒我们，只要屠杀上千万人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只要其仍在苟延残喘，那么与这股比死亡强大的力量作斗争将继续进行。（掌声）她提醒我们，自由是我们创世主的礼物，自由是所有人类天赋的权利，自由将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掌声）

我感谢你们每一个人为这座纪念碑，为自由事业作出的贡献；我感谢你们为保存死于共产主义恐怖统治的受难者的记忆作出的贡献。愿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灵魂安息吧，愿那些继续遭受共产主义苦难的人们寻找到他们的自由，愿给予我们自由的上帝保佑这座伟大的纪念碑吧，保佑来参观她的所有人。

上帝保佑大家。（掌声）

译者按：本文译自美国总统布什 2007 年 6 月 12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演讲。题目为译者所加。

译于 2007 年 6 月 13——14 日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

——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余杰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举办了“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紧接着展开了整整一天的纪念活动。我与妻子作为来自中国大陆、全天参与了各项活动的人士，在这一天里深受感动和鼓舞。在两百多年的建国历程里，美国本土从未受到共产主义幽灵的攻击与伤害；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美国却一直充当着抵抗共产暴政的中流砥柱。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作为反共标竿的美国的存在，今天的世界将会怎样。如今，美国在首都的中心地带修建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纪念超过一亿死于共产暴政的、遥远的国度的人们，这本身就显示出其博大的胸襟和气魄。

今天是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大门前发表讲话，向苏联领导人发出拆毁柏林围墙、将自由还给人民的呼吁。里根信心百倍地对当时咄咄逼人的苏联政权说，恐怖暴政必将垮台，自由之花必将开遍世界。这篇正气凛然的讲话被列为当代经典之一。东德共产党的党魁昂纳克则恶狠狠地回应说，柏林墙将存在一百年，共产主义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是，正义的迅速降临让所有人都感到眼花缭乱：两年之后，柏林围墙被推倒，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四年之后，苏联解体，存在时间最长的苏联共产党政权被人民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当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马萨诸塞大道和新泽西大道交接处的纪念碑附近时，才发现附近的几条街道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出入。警察解释说，上午的仪式有上千人出席，布什总统将亲自前来致辞，因此采取了严密的警戒措施。我们只好在远处停放好车辆，绕道步行来到近前。

据说，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最初的设计方案有三份：一是柏林墙，一是布兰登堡城门，一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经过投票，最后确定为天安门民主女神像。为铸像奔走了十七年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基金会主席、保守派历史学家爱德华兹?李指出，民族女神像“不只代表天安门屠杀的悲剧”，还蕴含了人类“拥抱希望的梦想”，象征着所有人对自由的追求。是的，她定格了十几亿生活在共产暴政下的民众的呐喊与抗争，也宣示了人权和自由价值的不可摧毁、不可侮辱。昔日，中共政权悍然动用坦克碾碎了天安门广场上那尊用石膏塑造的、简陋的民主女神像，也碾碎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梦想；今天，一尊同样的铜像却在美国国会山庄附近的街区浴火重生，与韩战、越战、二战这三大纪念碑及犹太大屠杀博物馆一起，构成了华府的标志性建筑群。这尊铜像提醒所有的人：自由来之不易，自由需要每一个人去争取和捍卫。

人越聚越多，大部分都是普通的美国民众。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推着婴儿车的美国女士。在闲聊当中，她自豪地告诉我们，她的父亲是纪念碑基金会的副主席，多年来一直为基金会做义工。在华府的黄金地带建立一座纪念碑，程序相当复杂，前后经过二十四道关卡的审批。今天，她特意将躺在摇篮中咿呀学语的孩子带来，让孩子也来分享外祖父的成就。当得知我们几位来自中国的观礼者，要么是年逾古稀、在劳改营中度过长达二十年炼狱般生活的老右派，要么是为争取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

仍然在遭受监视与骚扰的知识分子，她向我们做了一个“V”形的手势说：“你们一定会胜利的！”这些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是多么可爱啊，他们才真正做到了中国先贤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今天，前来观礼的超过了千人。其中，既有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的越南、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也有来自欧洲国家的议员、外交使节和知名人士。中共的外交官当然是不会来参加的，据说他们曾经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然，美国政府对这样的抗议根本不屑一顾。

上午十点多，当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纪念碑前现身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作为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基金会的名誉主席，布什总统在致辞中指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值得警惕的是，以邪恶和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到今天还继续存在。今天，自由世界仍然面对着两大威胁，一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二是共产主义专制制度。布什说，竖立在这里的民主女神像“高举自由的火炬。她唤醒我们毋忘共产主义的受难者，毋忘打败共产主义的力量。就像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一样，她唤醒我们毋忘每颗人心燃点的自由之火，那亮光是恐怖分子或暴君不能以残暴的手段来熄灭的。……直至最后，自由会胜利。”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意识形态。布什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前苏联夺走数千万人性命，在北韩、高棉、越南、阿富汗、非洲、东欧及很多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数百万人受难。布什特别指出，许多中国人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非命，柬埔寨人遭到波尔布特的屠杀，东德人被射杀在柏林墙下，波兰人被屠杀于卡廷森林，古巴人则溺死于投奔自由的海洋上……那是一幅幅惨绝人寰的图画。布什强调说，共产主义不只夺走受难者的生命，还企图盗窃受难者的人性、抹消受难者的记忆。这座纪念碑的落成，就是要归还受难者的人性，重建受难者的记忆。受难者永远不会被忘记，“我们为这座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因为我们有义务让未来子孙回顾二十世纪的罪行，并保证未来不再发生。”

遮盖着铜像的幕布缓缓解开。人们以持久的掌声欢迎民主女神的降临。我们在几十米外眺望这座纪念碑，它并没有我以前想像的那么宏大，在上午灿烂的阳光之下，民主女神手持的火炬似乎在灼灼发光。这是一尊高三米的铜像，是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为原型来塑造的。与之相似的民主女神的铜像，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唐人街也有一座，两者出于同一位艺术家之手。在一个星期之前的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活动中，我到旧金山的那座民主女神像前献花和默哀。

当正式的仪式结束、人群散去之后，我们得以走到纪念碑跟前仔细瞻仰，并与基金会的负责人及纪念碑的设计者合影留念。其间，我们也接受了多家美国媒体的访问。在纪念碑底座正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则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两段文字，一段面对过去，一段朝向未来。如今，处于共产专制下的，还有将近十五亿左右的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尤其以中国、北韩、越南和古巴四个国家为代表。如此庞大的人口仍然在共产制度下挣扎和呻吟，特别是中共政权，以经济腾飞而洋洋得意，公然宣称“大国崛起”，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亚于昔日的苏联帝国。在此意义上，冷战并未结束，自由仍需要努力。

下午两点，美国共和党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传统基金会”，举办了题为“共产主义的迫害与犯罪”的学术研讨会，先后有十四名学者、人权活动家和共产政权的幸存者作了主题发言。能容纳两百多人的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基金会的负责人指出，他们还将继续筹划设立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网站，搜集和发表更多的历史资料，并计划修建与

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类似的共产主义大屠杀博物馆。学者们指出，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它们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依靠的是谎言和暴力。共产党当局需要不断制造谎言，并让民众生活在谎言之中，最终完全接受和适应谎言；与此同时，共产党当局还肆无忌惮地使用军队和警察，用暴力来制造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让民众成为恐惧的奴隶。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纳粹主义的恐怖人人皆知，但谁知道苏联杀死了二千万人？谁知道中国的独裁者杀了超过六千万人？谁知道共产主义屠杀的死亡人数，比起二十世纪所有战争加起来还要多？我们不能让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暴行淡出历史背景之中。"若干幸存者讲述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人权活动家、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指出，今天的共产党政权表面上变得温情脉脉，普通的西方人到中国旅行，看到的是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和办事处。但是，中共的本质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尽管当局不再使用"劳改"一词，但劳改营依然存在。中国公民并不能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其他的基本人权。面对中共，不能与虎谋皮。主题演讲结束之后，听众踊跃提问，热烈参与讨论。

晚上七点，基金会在一家酒店举办盛大晚宴，并邀请苏联著名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的遗孀、萨哈罗夫基金会的负责人爱莲娜?波娜女士前来发表主题演讲。晚宴约有五百人出席，除了美国政府、国会、人权组织和基金会的重要人士以外，组织者还按照国别将每一桌的客人都作了划分，比如来自波兰、德国、北韩、越南等国的客人，均人数多寡分别安排为一桌甚至两桌。由于前来出席的中国客人的人数寥寥，居然不能单独设立一桌，我们只好坐在旁边的自由席上。与我们同桌的有来自缅甸和白俄罗斯的人权活动人士。一位目前居住在加拿大的白俄罗斯裔的老太太告诉我们，她在加拿大主持一个游说西方对白俄罗斯实施武器禁运的机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共产党的残余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独裁者，"与中国的领导人一样"。因为她所从事的活动，被禁止回到白俄罗斯。中国那些流亡海外的人权活动人士，不也是同样的命运吗？

在今天的会场上，我看不到有几个中国人。本来中国是受共产主义荼毒最深的国家，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有六七千万中国人死于共产党政权的苛政与屠杀，占全球共产主义死难者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国人（包括侨居或移民美国的华人华侨）最应当纪念自己死难的同胞和谴责共产党政权的邪恶。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却选择了沉默和冷漠，包括在美国的三百万华人，真正敢于公开谴责中共的人少之有少。在基金会的手册上，我看到了一批为纪念碑捐款的、熟悉或不熟悉的中国人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的数量在整个名单中的比例，与中国的死难者的人数相比，却少得不成比例。此时此刻，我不禁为我们民族善于忘却的劣根性感到羞愧与耻辱。

晚宴开始之前，一位牧师带领全体人员起立，为死难者默哀和祈祷。他说，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纪念那些无辜的受难者，我们不能忘记苏联古拉格劳改营的铁丝网，我们不能忘记越南船民的船艇，我们不能忘记德国柏林墙下的尸体，我们不能忘记柬埔寨红色高棉留下的骷髅骨阵，以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死难者。自由和尊严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那些剥夺我们的自由与尊严的邪恶势力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上帝将赐公义和慈爱予我们。萨哈罗夫遗孀波娜女士在演讲中回顾了丈夫为人权奋斗的经历，并提醒今天的人们不能掉以轻心，独裁的势力和思想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暗潮汹涌的趋向，争取和捍卫自由的斗争从来不会一劳永逸。

一天的活动结束了，当我们踏上归途的时候，华府正是雨后的清凉。在这一天活动中，我获得了巨大的勇气与力量。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在国内的抗争并不是孤单的，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与我们站在一起。人类的自由是整全性的自由，

人类的权利也是整全性的权利，只要还有一个人的自由受到剥夺，只要还有一个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我们就不能安歇与休闲。我要特别地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国内那些在监牢中的朋友们，那些生活受到监控和骚扰的朋友们，那些著作被禁止出版的朋友们，那些宗教信仰被禁止甚至侮辱的朋友们，你们并不孤单，因为有千千万万热爱自由的人与你们同在，有全能的慈爱的上帝与你们同在，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若干年之后，当我们接过民主女神手上的火炬，跑完当跑的路的时候，我们就能骄傲地对我们的后辈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由真正地实现，但我们早已品尝到了为自由而争战那无比美好的滋味。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华府

这本不是《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完整电子书

只是根据【香港金陵出版公司 2006《思想者》增刊，同名书的翻版】在网络所提供目录收集

和田园书屋的出版物比较还有部分缺失